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2](#_Toc54510979)

[導讀 光輝歲月 3](#_Toc54510980)

[譯序 勇者曼德拉 6](#_Toc54510981)

[致謝 10](#_Toc54510982)

[影像集 自由之路（1918——2013） 11](#_Toc54510983)

[第一部 鄉村童年 34](#_Toc54510984)

[第二部 約翰內斯堡 58](#_Toc54510985)

[第三部 一個自由戰士的誕生 71](#_Toc54510986)

[第四部 斗爭是我的生命 91](#_Toc54510987)

[第五部 叛國罪 113](#_Toc54510988)

[第六部 黑色的海綠花 140](#_Toc54510989)

[第七部 利沃尼亞 158](#_Toc54510990)

[第八部 羅本島：黑暗的歲月 187](#_Toc54510991)

[第九部 羅本島：希望的曙光 216](#_Toc54510992)

[第十部 與敵人對話 242](#_Toc54510993)

[第十一部 自由 262](#_Toc54510994)

[［譯名對照表］ 291](#_Toc54510995)

[［納爾遜·曼德拉年表］ 308](#_Toc54510996)

[313](#_Toc54510997)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 導讀 光輝歲月

熊培云

一切個人傳記必然是“斷章取義”的。這未必是壞事。曼德拉愿意以“Long Walk to Freedom”為主題來回溯自己的一生，既是為了在書面上為自己的人格賦予意義，也是在表明他對自由的態度——追求自由，是他生死以之的志業。

早先讀《漫漫自由路》的時候，我也注意到網上有一些關于曼德拉的負面評價。比如他腦子里還有些列寧、斯大林式國家主義的東西，作為總統不懂市場經濟，等等。批評者感嘆曼德拉在破除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和促進族群和解方面光彩照人，其他細節卻被世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不過依我之見，上述細節即便是事實，歷史也會將它們慢慢淡忘。世人樂于銘記的還是那個意義最大化的曼德拉。正如喬治·華盛頓雖然曾經有過不光彩的蓄奴經歷，但這些并不影響美國人將他尊為國父。沒有誰是完人，英雄、圣人、偉人都不是。你我肉身凡胎所能企及的“完人”高度，也不過是盡量做個能完成自己某一天命的人。前提是，你還要知道自己有何天命，因何而往。

或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只是有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何天命，或雖知其天命，大多又都辜負了自己的天命。就后者而言，他們不是死在人生的結尾，而是死在人生的中途。曼德拉的幸運在于他很早就發現了自己的天命，并且堅持到了人生最后。此天命就在于讓四分五裂的南非走向團結與自由。對于這樣一個人物，了解他的優點遠比缺點更重要，因為他的某些缺點已廣泛地存在于同時代人物當中，而他在完成天命時所具有的良知、勇氣在同時代卻是屈指可數的。

《漫漫自由路》是一本關于南非黑人爭取自由歷程的書。在回憶自己的童年生活時，曼德拉曾談到自己并非生來就渴望自由，因為他生下來就是自由的。那時候他可以在家里自由地奔跑，在村旁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這些都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但是隨著年歲的增長，他發現生活中的不自由越來越多。換句話說，這種不自由感是從他的生活經驗中慢慢生長出來的。而當他意識到“不僅我的自由被剝奪，像我一樣的每個人的自由都被剝奪了”的時候，他開始擔負自己的天命，開始從一個膽怯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勇敢的青年，從一個遵紀守法的律師變成了一個“罪犯”，從一個熱愛家庭的丈夫轉變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從一個熱愛生活的人轉變成了一個“修道士”。

曼德拉的傳奇主要集中在兩段人生：一是為反對種族隔離而坐了二十七年牢，二是當選總統后致力于推動南非族群和解。這兩段人生在本質上一以貫之，都是避免一個國家處在事實的分裂之中。作為新南非的領導者，曼德拉更希望建立起一套制度，使“一群人壓迫另一群人”的悲劇永遠不再發生，希望太陽永遠照耀在“這個輝煌的人類成就之上”。

監禁，這一剝奪人類自由的刑罰，比起直接戕害身體的刑罰貌似進步。米歇爾·福柯將監禁視為精神的刑罰，其作用主要在于規訓，在于摧毀人的意志。在此意義上，曼德拉又是幸運的。他不僅沒有被訓服，反而在二十七年后破繭而出。

曾經關押過他十八年的羅本島監獄如今早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并被人稱為“曼德拉學校”。正是在那些漫長而寂寞的監禁歲月里，曼德拉更好地理解了自由和奴役。一方面，他從對自己的自由的渴望變成了對所有的、不論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另一方面，正像被壓迫者的親身感受一樣，壓迫者必須得到解放，因為剝奪別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可恨的囚犯，他們被鎖在幽暗人性的鐵窗背后。兩種解放所針對的，都是被束縛的人性。曼德拉洞悉人性中被遮蔽的光亮。他相信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存在著一定的仁慈和慷慨。他相信沒有一個人由于他的膚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個人。既然恨是后天學來的，那么愛也一定可以通過后天學習獲得，而且愛在人類的心中遠比恨來得更自然。

獲得自由的人，同樣要經受自由的考驗，才能真正擁有自由。對自由的理解讓曼德拉變得寬宏大量，也更好地認識了自己的天命。“當我走出監獄的時候，解放被壓迫者和壓迫者雙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說，這個使命已經完成了，但是我認為，情況并非如此。事實上，我們還沒有自由，我們僅僅是獲得了要自由的自由，獲得了不被壓迫的權利……獲得自由不僅僅是擺脫自己身上的枷鎖，而是尊重和增加別人的自由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們獻身于自由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回想人類歷史中的無數革命與苦難，這段話尤顯意味深長。筆者相信，真正偉大的革命，不在于擺脫自己身上的枷鎖，翻身做主人，而在于讓這個國家從此不生產奴隸。

在《漫漫自由路》中，讀者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一些與曼德拉精神有關的詞匯：勇敢、仁慈，以及心懷希望。這些品質也并非與生俱來。如其所述，“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懼，而是戰勝了畏懼。我記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懼，但是我把這種畏懼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覺不到畏懼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懼的人”。關于這一點，我讀馬丁·路德·金的傳記時也深有體會。這是一種在恐懼面前讓自己免于恐懼的自由。

曼德拉曾經在法庭上念完自己四個多小時的稿子后，靜靜等待死刑判決。但只要是活下來了，哪怕是在監獄里，也要積極生活——哲學意義上，我們誰又不是在獄中求存呢？在此，我愿意將他的獄中生活概括為“小處安身，大處立命”。

相信許多人都在在曼德拉身上看到影片《肖申克的救贖》里主人公的影子：堅守心中的維度，不被監獄體制化，與惡周旋同時堅守底線，相信人性中的善。此外，力求從小處著手改變自己的生活。比如，曼德拉和獄友們不僅一度爭取到了《經濟學人》雜志，還給自己開辟了網球場。甚至，曼德拉還在羅本島監獄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塊菜地。1982年，曼德拉被轉移到波爾斯穆爾監獄后，有了更大的菜園，近900株植物讓他變成了一個“菜農”。種植菜園成了曼德拉在獄中最愉快的消遣，也是他“逃避周圍單調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種方式”。這些植物的榮發生長除了給了他耐心和時間感，還有其他意義。而且，曼德拉很快注意到，當獄警吃了囚犯種的番茄后，舉起皮鞭的手不再那么有力了。

歷史上任何直接針對人性的改造都以失敗告終，真正有希望的變革是將人性置于美好的關系（制度）之中，讓人性之惡得到規避，人性之善得到弘揚。所以說，不是人壞，是關系（制度）壞。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壞的關系（制度）徹底改變之前，人必定甘于束縛而無所作為。若真如此，新關系（制度）也必然無從建立。

曼德拉諳熟“小處安身”的道理，他很快意識到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長、監獄管理局局長，甚至也不是監獄長，而是負責其監禁區的獄警。前者會以不合規定（制度）為由拒絕給你一條毯子，但走廊內的那位獄警可能會二話不說，立即到倉庫里給你拿條毯子。這樣的交往在曼德拉眼里意義非凡——獄警身上那些若隱若現的人性，雖然短暫無比，但作為人性永不熄滅的火種，卻能給他無窮信心。另一方面，監獄里的這些“小處安身”，也是曼德拉“與敵人對話”的開始，所謂“設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們的敵人”。

當然，上述權宜之計和細碎的希望并不能掩飾苦難本身，肩負天命者還必須于“大處立命”，融入時代的洪流。熟悉南非轉型歷史的人知道，南非最終能夠平穩轉型，仍決定于那是一個敵友雙方都是英雄輩出的時代。這一合力，遠非曼德拉一人所能完成。除了大主教圖圖、流亡律師奧比·薩克斯，更有白人政府時期的當政者德克勒克。人勢已有，時勢同樣重要。如果沒有東歐劇變，蘇聯無力支持非國大，一直拒絕對話的非國大能否與南非白人政府走向談判桌？如果德克勒克是個鐵血的獨裁者，曼德拉又是否可以平安地走出監獄？

從這些方面說，曼德拉和南非是幸運的。1993年，放下權柄的德克勒克與走出監獄的曼德拉同時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彰顯轉型時期當政者與反對派聯手推進的積極意義。相較于曼德拉，許多人并不熟悉德克勒克也獲過諾獎，大概是因為前者人生實在過于傳奇，以至于閃現在德克勒克身上的人性的光輝被部分遮蔽了。對于德克勒克，圖圖大主教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中有較為公允的評價——德克勒克當時的言行為他帶來的巨大功績，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抹殺的。“如果他沒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們就會歷經許多人預測的、使南非在劫難逃的血腥屠殺。”當然，幸運同樣給了德克勒克。如果德克勒克遇到的是個一心復仇，誓死讓白人以血還血的人，他也可能無所作為。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走完了他九十五年的人生歷程。曾經有人問他，希望世人如何紀念他，他的回答是——“我希望在我的墓志銘上寫一句話：埋葬在這里的是已經盡了自己職責的人”。

為自己盡責，在我看來就是“以己任為天下”，就是“以不負自己之天命而不負世界”。曼德拉的上述遺言讓我想起刻在倫敦西敏寺地下無名墓碑上的文字：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的想象力從沒有受到過限制，我夢想改變這個世界。

當我成熟以后，我發現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我將目光縮短了些，決定只改變我的國家。

當我進入暮年后，我發現我不能改變我的國家，我的最后愿望僅僅是改變一下我的家庭。但是，這也不可能。

當我躺在床上，行將就木時，我突然意識到：如果一開始我僅僅去改變我自己，然后作為一個榜樣，我可能改變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幫助和鼓勵下，我可能為國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誰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變這個世界。

據說這是塊改變了曼德拉一生的墓碑。幾十年前，他因為看到這篇碑文而茅塞頓開，從此放棄了急功近利、以暴易暴的思維，努力于讓自己成為親友和同胞眼中的榜樣。幾十年后，他終于因為改變并堅持那個最好的自己而改變了他的國家。我不確定這段傳聞是否屬實，但我確定西敏寺已經在2014年3月宣布將為曼德拉安放紀念石，因為這位黑人的確改變了世界。

曼德拉是一個傳說，他將以意義曼德拉的形式在世界流傳。2013年初，我在美國開始第二次為期一月的旅行。為更好地了解這個國家的非暴力抗爭史，我橫穿大陸，多次搭乘了夜間巴士趕往下一座小城。在那一次次漫長而孤獨的旅程中，伴我最多的歌聲是黃家駒為曼德拉出獄而寫的《光輝歲月》。記得有個晚上，當大巴車穿行至一片雪地山林時，耳畔正好傳來“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迎接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一時竟至熱淚盈眶。

一個來自東方的游子，在美國的風雪中懷想起遠在非洲的曼德拉，這是一幅怎樣穿透黑夜的人類精神交流圖景？我們總是盼著自由來臨的時候，將迎來光輝歲月，其實光輝歲月并非只在將來，更在我們承受并拒絕苦難之時。

2014年8月8日，于東京大學訪學期間

# 譯序 勇者曼德拉

譚振學

勇者曼德拉自傳的創作本身就充滿著傳奇色彩。在獄友瓦爾特·西蘇陸和凱西的建議下，曼德拉于1975年在羅本島獄中開始撰寫自己的回憶錄。羅本島監獄當局當時對以曼德拉為首的政治犯管理很嚴，撰寫回憶錄只能在秘密狀態下進行。開始數周，曼德拉白天去石料廠勞動，晚上吃過晚飯后先睡一覺，然后從晚上10點鐘開始在墻上撐起的簡易書桌上伏案寫作。后來，由于身體實在是吃不消，于是只好請病假不去石料廠勞動。監獄當局似乎對此并不介意。因此，曼德拉得以白天睡覺，夜間秘密地撰寫回憶錄。為了不讓監獄當局發現，曼德拉及其獄友建立起了一條處理手稿的“流水線”。每天，曼德拉把寫好的手稿設法交給凱西，凱西看過后再設法把手稿交給瓦爾特，瓦爾特看過后再交給拉魯·奇巴。最后，由拉魯·奇巴把手稿轉換成微型速記稿。經過4個月的機智而辛勤的勞作，他們終于共同完成了回憶錄的初稿。按照刑期，獄友麥克將于1976年出獄，因此將手稿帶出羅本島監獄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在麥克出獄之前，厚達500頁的手稿必須妥善隱藏。為此，在獄友的幫助下，曼德拉把書稿分成三捆，分別用塑料布包好后埋在了院子內的角落里。不幸的是，后來其中的一捆被監獄當局無意中發現了。這給曼德拉及其獄友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麥克于1976年12月份被釋放。幾經周折，麥克成功地把書稿帶到了倫敦。在倫敦，麥克對書稿進行了整理，并設法將書稿打印成冊。直到1994年，曼德拉就任南非總統之后，書稿才經過認真整理正式由英國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該書一面世立即引起了轟動，很快成為全世界最暢銷的書。1995年該書由Abacus（阿巴克斯）公司再次出版。此后，其印刷次數達到27次之多。

曼德拉出身于南非泰姆布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既是泰姆布國王的參事，也是姆衛佐部落的酋長。曼德拉9歲時父親就去世了。不久，泰姆布代理國王容欣塔巴收養了他。容欣塔巴對他非常好，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對待他。在代理國王的監護下，曼德拉完成了初級和中級學業，并順利地考取了福特黑爾大學。在學校里，曼德拉不但是一位好學上進的學生，而且也是一位滿腔熱情的社會活動積極分子。遺憾的是，由于曼德拉堅持原則，拒絕向學校當局低頭，最終他不得不選擇了中途輟學。

按照他的監護人對他的定向培養，曼德拉本來也可以像其父親一樣做泰姆布國王的參事。但是，為了逃避代理國王為他安排的婚姻，曼德拉毅然決然地與代理國王的兒子一起離家出走。他們兩人幾經周折來到約翰內斯堡，從而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在約翰內斯堡，曼德拉受盡了各種苦難和磨煉，先后干過金礦保安、律師事務所學徒、律師。在入不敷出的艱難困苦中，他邊謀生邊學習，依靠堅忍不拔的毅力，順利通過了南非大學考試，拿到了福特黑爾大學畢業證。隨后，他又考取了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獲得了法學學士學位。這為他后來興辦律師事務所創造了條件，也為他從事反對白人專制和種族隔離政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從事律師工作期間，曼德拉親眼目睹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野蠻和黑暗。他義無反顧地投身于南非人民的解放事業，并為此獻出了自己的一生。早在1944年，曼德拉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并參與組建了“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他先后擔任過德蘭士瓦省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一副主席、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

1961年，曼德拉創建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軍事組織——民族長矛軍（又譯“民族之矛”），從而結束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無法對南非獨裁政府開展武裝斗爭的歷史。為應對南非獨裁政府要取締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曼德拉起草了著名的“曼德拉方案”，簡稱“曼氏方案”。該方案在后來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曼德拉參與領導了一系列反對種族歧視、種族壓迫和種族迫害的斗爭。最著名的是“沙佩維爾反通行證法大示威”和“全國抗議日大罷工”。隨著斗爭的深入，南非白人獨裁政府對曼德拉及其他非國大黨人的迫害和鎮壓也逐步升級。曼德拉曾經多次被“禁止”（一種限制人身和言論自由的治安處罰）和逮捕：1953年被禁止參加集會2年；1956年被禁止參加政治活動5年；1962年8月被逮捕入獄，同年11月被判處5年監禁；1964年6月12日被判處終身監禁。曼德拉在監獄里度過了27個春秋，其中在羅本島監獄里就被關押了18年。

即使是在極其艱難的監獄生活中，曼德拉也依然保持著高昂的斗志。他把監獄里的斗爭看作整個南非反對種族歧視、種族壓迫和種族迫害斗爭的一部分，把監獄變成了與白人獨裁政府作戰的戰場和學習的課堂。有人甚至把羅本島監獄稱作“曼德拉大學”。

長期惡劣的斗爭和監禁生活并沒有摧毀他的身軀和意志，反而使他政治上更加成熟，觀察問題更加周全，人格魅力得到了升華。曼德拉的偉大人格和堅強意志甚至感動了監管他的獄警，后來他們彼此竟然成了朋友。這種非凡的人格魅力幫助曼德拉成為南非第一個黑人總統、世界上最受敬重的政治家。他的貢獻已經超越了他的國土。因此，他當之無愧地榮獲了許多世界級榮譽：1991年，他與南非總統德克勒克一起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烏弗埃－博瓦尼和平獎”；1993年7月4日，曼德拉獲得了美國克林頓總統授予的“費城自由勛章”；1993年10月，曼德拉與德克勒克一起榮獲“諾貝爾和平獎”；1998年9月，曼德拉又獲得了美國“國會金獎”，成為第一個獲此獎項的非洲人；2000年8月，南部非洲共同體授予他“卡馬獎”；2005年，曼德拉被聯合國任命為“聯合國親善大使”。

作為一位當代偉人，曼德拉博大寬廣的胸懷備受世人敬仰。2000年，南非全國警察總署發生了這樣一件嚴重的種族歧視事件：在總部大樓的一間辦公室里，當工作人員開啟電腦時，電腦屏幕上的曼德拉頭像竟逐漸變成了“大猩猩”，全國警察總監和公安部長聞之勃然大怒，南非人民也因之義憤填膺。消息傳到曼德拉的耳朵里，他反而非常平靜，對這件事并不“過分在意”。他說：“我的尊嚴并不會因此而受到損害。”幾天后，在參加南非地方選舉投票時，當投票站的工作人員例行公事地看著曼德拉身份證上的照片與其本人對照時，曼德拉慈祥地一笑：“你看我像大猩猩嗎？”逗得在場的人笑得合不攏嘴。此后不久，在南非東部農村地區一所新建學校的竣工典禮上，曼德拉不無幽默地對孩子們說：“看到你們有這樣的好學校，連大猩猩都十分高興。”話音剛落，數百名孩子直笑得前仰后合，曼德拉也會心地笑了。他善于巧用別人對自己的惡作劇來活躍氣氛。在這里，幽默成為曼德拉博大胸懷的自然寫照，書寫著一種坦蕩而豁達的胸襟，也體現著一種“厚德載物”的至高境界。

2003年年底，我有幸去南非參加了商務部機電司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中國機電產品展覽會”。正是利用這次機會，我購得曼德拉先生的自傳——Long Walk to Freedom。當時購買此書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拜讀，并沒有翻譯出版的打算。

當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讀完了這本巨著之后，曼德拉先生那坎坷的人生和志存高遠、好學上進、百折不撓、豁達開朗、虛懷若谷、甘愿為人民的利益和正義事業獻身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因此，產生了把這本書譯成中文、介紹給廣大中國讀者的強烈愿望，以便讓中國讀者深入了解這位南非歷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當今世界偉人——納爾遜·曼德拉。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山東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于是，我從1月份正式開始動筆翻譯。在周圍朋友和同事們的熱情鼓勵和幫助下，翻譯工作進展得十分順利。到7月份，基本完成了全書的翻譯工作。

翻譯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書中出現的南非人名的翻譯問題。盡管這些人名都采用英文字母書寫，但是，由于這些人來自不同的種族和不同的部落，其發音往往與英文習慣大相徑庭。據了解，即便是南非人，其中包括南非英國人、南非荷蘭人，甚至南非其他部落的人，對于出自不同種族、不同部落的人的名字，也很難正確無誤地把它們讀出來。例如，曼德拉的父親給曼德拉起的名字是“Rolihlahla”。這個名字按照英文發音應該譯成“勞利赫拉赫拉”，但是，根據科薩人的發音，這個名字則應該譯成“豪利沙沙”。按照英文翻譯這個名字不但聽起來別扭，而且也無法讓南非科薩人接受。為了盡量準確地把書中涉及的大量人名翻譯出來，我利用8月份第二次去南非的機會，請教了許多不同種族、不同部落的南非人，使本書中涉及的每一個名字都基本上得到了核準。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我的同事及親朋好友都為我提供了無私的幫助。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李建生和張臺安同志，他們為本書提供了多幅照片，感謝我的同學及好友李華軒同志，他是本書譯稿的第一個讀者，并為譯稿提出了寶貴的意見。我還要特別感謝姜洪和王萍女士，她們倆在百忙中為我打印了部分譯稿，王萍女士還對部分打印稿進行了校對。

另外，由于時間緊，特別是由于自己的翻譯水平有限，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最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曹凌志先生通過我單位辦公室的同事與我取得聯系，出版社已委托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購得了翻譯出版Long Walk to Freedom一書的版權，為曼德拉自傳再次與中國讀者見面創造了條件，也為我修改和完善這部巨著的譯文提供了機會。

與第1版相比，本版中除對個別地方進行了必要的譯文修訂外，沒有太大的變動，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初版的原貌。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再版增加了“譯名對照表”部分，一一列出了書中出現的人名、地名和重要歷史事件的名稱。

好了！說起曼德拉，譯者總是有著說不盡、道不完的贊美之情。但是，作為序言已經說得不算少了，因此只好就此住筆。

借此機會，我十分感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對本書的厚愛！

2010年5月于濟南

謹以本書

獻給我的6個子女：馬迪巴和馬卡紫薇（我的大女兒）——

他們現在已經去世，以及馬卡托、馬卡紫薇、澤尼和津澤，

我十分珍惜他們的支持和愛；

獻給我的21個孫輩和3個曾孫輩，他們給了我巨大的歡樂；

獻給我所有的同志、朋友和那些我為之服務的南非同胞，

他們的鼓勵、決心和愛國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源泉。

# 致謝

正如讀者將會發現的那樣，本書具有很長的歷史。早在我被囚禁于羅本島期間的1974年，我便暗暗地開始創作本書。沒有我的老同志瓦爾特·西蘇陸和阿邁德·卡特拉達孜孜不倦的提醒和鼓勵，能否完成本書的書稿值得懷疑。

我隨身保存的手稿被監獄當局發現并沒收了。但是，除了他們獨到的書寫技巧之外，我的獄友麥克· 馬哈拉基和伊蘇·奇巴確保將書稿安全地轉移到了目的地。1990年出獄后，我也恢復了對本書的完善工作。

自從出獄后，我的日程一直被數不清的責任事務所擠占，因此，留給我寫作的自由時間少之又少。幸運的是，我有樂于奉獻的同事、朋友和專業人士的幫助。最終，他們幫助我完成了出書工作。在此，我向他們表示感謝！

我十分感謝理查德·斯騰格爾（Richard Stengel），他與我合作完成了本書的創作。在對本書第一部分的編輯和改寫中，以及在后面部分的寫作中，他提供了寶貴的幫助。回想起我們在特蘭斯凱一起散步的那些清晨，在約翰內斯堡謝爾大廈和我在霍頓的家中的許多次長時間的采訪，總是令人高興。特別感謝馬麗·普法夫，她協助理查德完成了他的工作。同樣感謝法蒂瑪·彌爾、皮特·馬古巴尼、納丁·戈迪默和伊齊基爾·莫法萊勒，他們的意見和支持使我受益匪淺。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同志阿邁德·卡特拉達，他在對本書的修改、校訂方面花費了很多時間，為書中信息的準確性提供了幫助。多謝我的非國大辦公室的職員們，他們耐心地承擔起了后勤工作，特別是芭芭拉·馬塞凱拉， 她為本書提供了高效的協調工作。同樣感謝伊克巴爾·梅爾，他在本書的商務方面花費了許多時間和心血。我十分感謝我的編輯——“Little, Brown”出版公司的威廉姆·菲利普斯，他早在1990年就開始對本書的出版工作提供了指導意見，后來又對文本進行了編輯工作；也感謝他的同事喬丹· 帕夫林、斯蒂夫·謝利得、麥克曼·馬提爾和唐娜·彼得森。我也想感謝蓋爾·格哈特教授，她基于事實對書稿內容做了審核工作。

納爾遜·曼德拉

# 影像集 自由之路（1918——2013）





19歲的曼德拉（193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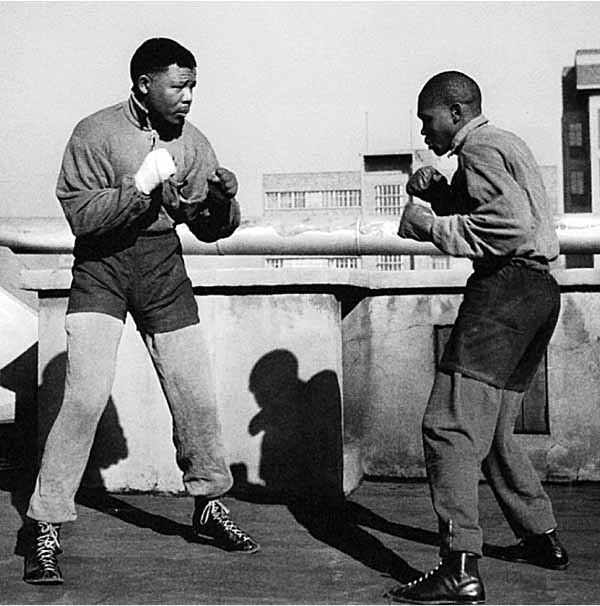
身著科薩傳統民族裝的曼德拉



行割禮后的科薩族少年



1952年，曼德拉在他與奧利佛·塔博開辦的律師事務所辦公室，那是約翰內斯堡第一家黑人開辦的律師事務所。



曼德拉練習拳擊



曼德拉與溫妮結婚照（1958年）



溫妮與女兒津澤



溫妮與曼德拉的母親



1958年叛國罪審判期間的曼德拉



曼德拉在倫敦



轉入地下工作的曼德拉（1962年）



曼德拉與西蘇陸在羅本島監獄交談（1966年）



2011年2月，南非比勒陀利亞的最高法院司法大廈底下的囚室，墻上寫著著名的“自由憲章”。1963——1964年利沃尼亞審判中的政治犯們被囚于此，曼德拉在審判期間發表了著名的演講——“我已做好赴死的準備”。（CFP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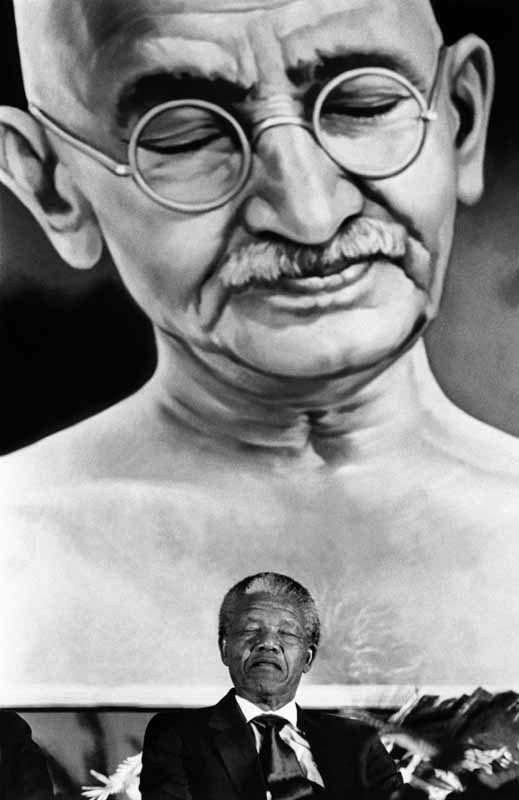
2003年11月28日，南非開普敦羅本島監獄舊址中曾經關押曼德拉的牢房。（CFP供圖）



1990年2月12日，南非開普敦，曼德拉出獄后第二日。左起：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曼德拉、溫妮·曼德拉和瓦爾特·西蘇陸。（CFP供圖）



曼德拉與孫子巴姆巴塔



1990年10月15日，曼德拉訪問印度新德里時在圣雄甘地巨幅像下，似在冥想之中。（CFP供圖）



1994年4月，南非舉行首次不分種族的大選，黑人城鎮居民排隊等待投票，多數黑人期待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曼德拉獲勝。（CFP供圖）



1993年12月10日，曼德拉與當時的南非總統德克勒克共同接受諾貝爾和平獎。



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宣誓就職南非總統，成為南非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







上圖：曼德拉在開普敦會見法國總統密特朗；中圖：曼德拉在英國與克林頓和布萊爾一起出席文藝晚宴；下圖：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訪問曼德拉。



2007年7月18日，南非約翰內斯堡，曼德拉迎來89歲壽辰，他發起創建的國際長者會也于當日宣告成立。這個獨立的智囊機構旨在匯集這些前任領導者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智慧，為一些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提供新思路。圖中左起：曼德拉、美國前總統卡特和圖圖大主教。（CFP供圖）



2010年5月29日，約翰內斯堡，曼德拉與國際長者會成員會面。左起：曼德拉夫人格拉薩、巴西前總統卡多佐、圖圖大主教、美國前總統卡特、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芬蘭前總統阿赫蒂薩里、印度自我就業婦女協會創始人埃拉·巴特、前聯合國特使拉赫達爾·卜拉希米與曼德拉（坐者）。（CFP供圖）



2011年6月21日，曼德拉在家中會見到訪的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和她的兩個女兒。（CFP供圖）



2013年6月30日，南非開普敦，美國總統奧巴馬偕同夫人米歇爾及兩個女兒探訪曼德拉在羅本島監獄時的牢房。（CFP供圖）



2013年12月15日，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世紀葬禮在南非的庫努村舉行。庫努村是曼德拉的故鄉，他幼時在此地度過了近10年的快樂時光。在經歷了壯闊、偉大的一生后，曼德拉終于魂歸故里。（CFP供圖）

# 第一部 鄉村童年

1...

除了讓我具有強壯體格并與泰姆布王室有著永恒聯系的一條生命外，我父親還給了我一個名字——豪利沙沙。在科薩語中，豪利沙沙字面是“拽樹枝”的意思，但其口語意思更為準確，意思是“惹是生非的家伙”。我不相信名字能決定命運，或者說，我不相信我父親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預測了我的前途。但是，后來的歲月中，親戚朋友竟然認為我出生時的名字注定會給我帶來許多風風雨雨。直到上學的第一天，我才有了更讓人熟悉的英文名字，即教名。但是，現在我正在超越我自己。

1918年7月18日，我出生在姆衛佐。這是一個位于烏姆塔塔地區穆巴謝河邊的小村莊。烏姆塔塔是特蘭斯凱的首府。我出生的那年，世間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這場大戰中，南非爆發了流感，數百萬人在這場流感中死于非命；二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派代表團參加了“凡爾賽和會”，代表們在會上講述了南非人民的苦難。但是，姆衛佐是一個偏僻的地方，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地方。生命數百年來一直平靜地在這里延續著。

特蘭斯凱距離開普敦800英里，距離約翰內斯堡550英里。它位于凱伊河和納塔爾邊界之間，北有德拉肯斯山脈，東有藍色的印度洋。這是一個美麗的、群山連綿起伏的地區。這里土壤肥沃，數千條小河使它一年四季保持濕潤。特蘭斯凱曾經是南非最大的行政區劃區之一，其占地面積有瑞士那么大，擁有大約350萬科薩人，另外還有少量的巴索托人和白人。它是泰姆布人的家園，而泰姆布人又是科薩民族的一部分，我本人是科薩民族中的一員。

我父親名叫格達拉·亨利·穆帕卡尼斯瓦，他從血緣和傳統上說都是一個酋長。泰姆布國王任命他為姆衛佐部落的酋長，但是，在英國人的統治下，他的任命需要政府承認。姆衛佐政府以地方行政長官的形式實施統治。作為一位政府認可的酋長，他可以得到一份薪金和一部分由政府從該部落征收的牲畜接種疫苗稅和公共牧場稅。盡管酋長是一個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角色，但在75年前，這一角色由于白人政府統治的冷漠無情而早已經被貶低了。

泰姆布部落向上追溯20代到雷戴王朝，按照傳統，泰姆布人往往居住在德拉肯斯山脈的山腳下。他們從16世紀開始向沿海遷徙，在沿海與科薩民族融為一體。至少從11世紀算起，科薩人就是居住在南非富饒而氣候溫和的東南沿海地區的恩古尼人的一部分。恩古尼人在這里以狩獵和捕魚為生。這個東南沿海地區橫跨北起內地大草原、南到印度洋的大片土地。恩古尼人可以被劃分為北部部落和南部部落。北部部落由祖魯人和斯威士人構成；而南部部落則由阿馬巴查、阿馬崩瓦納、阿馬嘎萊卡、阿馬木棼古、阿馬木旁多米斯、阿馬木旁多、阿比索托和阿比泰姆布組成，他們一起構成了科薩民族。

科薩民族是一個富有自豪感的父系民族，他們擁有表達力強且悅耳動聽的語言。他們崇尚法律、教育和禮節，組成了一個平衡而和睦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每一個科薩人都屬于向上追溯到一個祖先的氏族。我是馬迪巴氏族的一員。馬迪巴氏族是以一位泰姆布酋長的名字命名的，這位酋長在18世紀曾統治著特蘭斯凱。作為對我的尊稱，常常有人叫我“馬迪巴”。

恩古奔庫卡死于1832年。他是偉大的君主之一，是他把泰姆布部落聯合在了一起。作為傳統習慣，他擁有三個后宮：大后宮、右后宮和伊基巴宮。王位繼承人通常是從大后宮選擇。有人也把伊基巴宮叫做左后宮。解決國王家的爭端是左后宮兒子們的責任。大后宮的長子穆提克拉克拉繼承了恩古奔庫卡的王位。他的兒子中還有恩干蓋里茲韋和馬嘆茲瑪。薩巴塔是恩干蓋里茲韋的孫子，他從1954年開始統治泰姆布。恩干蓋里茲韋是卡爾澤·達里旺伽的長輩。薩巴塔還有一個更為人熟悉的名字是K. D.馬嘆茲瑪，是特蘭斯凱的前首相。從法律和血緣關系上說，他是我的侄子，也是馬嘆茲瑪氏族的后代。伊基巴宮的長子是西瑪卡德，其弟弟就是我爺爺曼德拉。

盡管數十年中有許多關于我是泰姆布王室的后裔的傳說，但是，我剛剛簡要敘述的宗譜表明，那些傳言都是荒誕之說。盡管我是王室眷屬中的成員，但我并不屬于作為王位繼承人來培養的少數特權人員之列，而是作為伊基巴王室的后代之一，被預備擔任像我父親一樣的王室參事。

我父親有著高高的個子、黑黑的皮膚，為人正直，姿態嚴肅。我認為自己繼承了他的這些特點。他有一頭蓋在額頭以上的簇狀白發，孩提時代，我往往弄一些白灰搓在頭發上去模仿他。父親很嚴厲，對孩子從不嬌生慣養。他意志堅強，這也是他傳給兒子的又一個特點。

我父親有時被誤認為是達林迪葉波在泰姆布當政時期的首相。達林迪葉波是薩巴塔的父親，他在位于20世紀20年代早期，據說他的兒子容欣塔巴繼承了他的王位。其實這是誤傳，根本就沒有達林迪葉波這個朝代。但是我父親所擔任的角色與首相并沒有什么差別。作為輔佐過兩代君主的參事，他經常伴駕外出，并且每當有國王會見英國政府官員的重要活動時，他經常陪伴在國王的身邊。他是一位公認的科薩歷史專家，部分原因是他作為一名參事得到了承認。我個人早就對歷史感興趣，父親也鼓勵我了解歷史。雖然我父親既不會讀也不會寫，但是，他仍然被譽為優秀的演說家。他通過傳播歡樂和知識讓聽眾對他的演講著迷。

后來，我發現父親不但是國王的參事，而且還是國王的擁立人。20世紀20年代，容欣利茲韋過早地辭世之后，大王后的兒子薩巴塔因為年幼而不能登基。于是，圍繞其他王后所生的容欣塔巴、達布拉曼茲和麥里塔法三個最大的王子中誰來繼承王位而展開爭論。王室征求我父親的意見，他推薦容欣塔巴繼承王位，理由是容欣塔巴受過最好的教育。他說，容欣塔巴不僅是最好的王位繼承人，而且還是幼小王子的一位優秀的輔佐。我父親和幾個有影響的酋長都十分重視教育。他們經常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中講這個問題。大家對推薦容欣塔巴繼承王位存有爭議，因為其母親的地位相對較低。但是，我父親的意見最終被泰姆布王室和英國政府采納了，容欣塔巴后來以我父親當時無法想象的方式作了報答。

眾所周知，我父親有四個妻室，其中的第三個就是我母親諾塞凱尼·范妮。她是恩凱達瑪的女兒。恩凱達瑪出生于科薩民族中的阿馬穆俳夫家族，屬于右妻室。大妻室、右妻室（我母親）、左妻室和伊夸狄（也叫家務助理）四個妻室都有自己的克拉爾。一個克拉爾就是一處家園和田產，通常由存放牲畜的圍欄、種植農作物的田地和一座或多座圓草頂房子構成。我父親四個妻室的克拉爾彼此相距數英里，他定期輪流在四個克拉爾居住。我父親和四個妻室共生了十三個孩子，其中四個男孩、九個女孩。我是他右妻室的長子，也是他四個兒子中最小的。我有三個姊妹，她們是巴利韋、諾坦楚和瑪庫茨瓦娜，其中巴利韋在三姊妹中最大。盡管父親的長子是穆拉爾瓦，但是，父親作為酋長的繼承人是大妻室生的達利基里。達利基里死于20世紀30年代。除了我以外，父親的兒子都已經去世，他們從年齡和家庭地位上說都高于我。

當我還是一個新生嬰兒的時候，我父親陷入了一場圍繞剝奪他的姆衛佐酋長職務的爭論。此事充分反映了他的人格素質。我相信他的這種素質也傳給了他的兒子。我堅持認為教養而非天性，是人格的主要造型材料。但是，我父親具有一種富有自尊心的叛逆性格和追求公道的、百折不撓的正義感。這也是從我自己身上可以找得到的性格。作為一個酋長，或者正如白人經常說的那樣叫首領，我父親必須不但要服從泰姆布國王的領導，還要服從當地英國政府的行政長官的領導。有一天，我父親管轄下的一個老百姓因丟失了一頭牛而告了他。行政長官立即送信要我父親去見他。當我父親收到這封召見信的時候，他作了如下回復：“Andizi，ndisaqula”（我不去，我還準備戰斗）。當時，這種違抗英國政府的行為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

我父親所作出的反應說明，他相信英國政府沒有法定的權力能對他怎么樣。當遇到氏族問題時，他不是按照英國國王的法律去處理，而是按照泰姆布慣例去處理。這件事不是一個愿意去或不愿意去的問題，而是一個原則性問題。他是在維護他作為一個酋長的傳統權力而向英國政府挑戰。

當這位行政長官收到我父親的回復時，他立即指控我父親犯上作亂。但沒有人對此事進行詢問和調查，因為這種指控只適用于白人公務員。這位行政長官干脆罷免了我父親，于是曼德拉家族的酋長地位就結束了。

當時我并不知道這件事情，不過我并沒有受到什么影響。我的父親按照當時的標準是一個富有的貴族，這樣一來，他既失去了財富，又失去了官職。他被剝奪了絕大多數本屬于他的牲畜和土地，也失去了這些牲畜和土地給他帶來的收入。由于我們陷入了這樣的困境，母親只好搬到庫努去居住。那是一個位于姆衛佐北面比較大一點的村子，在那里她可以得到親戚朋友的接濟。雖然我們在庫努的居住條件不太體面，但正是在烏姆塔塔附近的這個小村落里，我度過了孩提時代中最愉快的歲月。并且正是在那里，我開始了我最初的記憶。

2...

庫努村位于狹窄而雜草叢生的山谷，清清的小河在這里相互交錯，村子被環抱于青山之中。這里不過居住著幾百人，都是清一色的茅草房。這種茅草房的結構如同蜂窩，墻是泥巴墻，房中央立著一根柱子，支撐著用草搭成的錐形房頂。地面是用粉碎了的蟻巢上面的土丘硬殼鋪成的，通過定期涂上新鮮牛糞使它保持光滑。煙從房頂上冒出，房子唯一與外面相通的就是一個低矮的門道。人們必須彎下腰才能從門道里通過。居住區內的茅草房一般是成組建造的，并且選擇在玉米地附近。那里沒有大路，只有被赤腳的小孩和婦女們在草地上踏出的羊腸小道。村子里的婦女和小孩身上都裹著用赭石染成的毯子，只有很少的基督教徒穿西式服裝。牛、綿羊、山羊和馬都在公共牧場上吃草。庫努周圍的土地上基本沒有樹，只有遠處的小山上有一片片白楊。土地本身歸國家所有。那時，非洲人在南非幾乎沒有土地，租種土地的人每年要向政府繳納租金。在這個地區，有兩所私立小學、一座倉庫和一個用來為牲畜洗去寄生蟲和污物的水池。

玉蜀黍（西方稱玉米）、高粱、大豆和南瓜構成了我們的主要食品。這不是因為我們對這些食品情有獨鐘，而是因為南非人買不起其他富有營養的食品。村里的富裕戶另外會有茶、咖啡和糖之類的食品。不過，對庫努村的大多數人來說，這些食品是他們無法得到的奢侈品。澆地、做飯、洗涮用水都是用水桶從河里或泉邊打來的，這是婦女們干的活兒。的確，庫努是一個婦女兒童村：多數成年男人大部分時間都在遙遠的農場或礦脈一帶的金礦上打工。礦脈是一個由含金量很高的巖石和頁巖構成的山脈，它形成了約翰內斯堡的南部邊界。他們可能一年回兩次家，主要是回鄉耕作自己的土地。鋤地、拔草和收割等農活都留給婦女和孩子們去做。村子里極少數人能讀書寫字，教育這個概念對多數人仍然是陌生的。

我母親在庫努有三座茅草房。根據我的記憶，三座茅草房內總是被親戚家的幼童擠得滿滿的。實際上，在我的記憶中，我作為一個孩子似乎從來沒有獨處過。在非洲文化中，姑姨叔舅家的兒女都被認為是兄弟姐妹，而不是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我們不像白人那樣劃分親屬關系。我們沒有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我母親的姊妹我也叫母親，我叔叔的兒子也是我的兄弟，我兄弟的孩子也是我的子女。

我母親的三座茅草房，一座用來做飯，一座用來睡覺，一座用來儲藏東西。我們睡覺的那座房子里，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家具。我們睡在席子上，坐在地板上。在去穆克孜韋尼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枕頭。我母親在房間中心或房子外面點起的火堆上用三腳鍋做飯。我們吃的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種的和制作的。我母親自己耕種并收割玉米，玉米干了以后才從地里收獲回家。玉米被裝在袋子里或放在地里挖的坑內儲存。婦女們用不同的方法對玉米進行加工。她們用石磨將玉米加工成玉米粉，用來做面包；或者是先把玉米煮熟，然后再加工成“阿穆佛蘇拉”（一種就酸奶吃的玉米面）或“阿蒙苦梢”（玉米面粥，有時也摻上大豆）。玉米有時供應不足，但從我們家的牛和羊身上擠出的奶卻總是充足的。

從年齡不大的時候開始，我的空余時間多數都是在多巖石的草地上度過的，和我們同村里的其他男孩子一起玩耍和打斗，因為整天在家里圍著母親圍裙轉的男孩被認為是懦夫。晚上，我把我的食物和毯子同這些孩子一起分享。不到5歲的時候，我就成了一個牧童，在田野上照料牛羊。我發現，科薩人給牛加上了幾乎神秘的色彩。他們不但把牛作為食物和財富的來源，而且也把它們看作上帝的賞賜和幸福的源泉。正是在田野里，我學會了如何用彈弓把飛鳥從天空打落，如何采集野生蜂蜜、水果和可食根類，如何直接從牛的乳房吸取熱而甜的牛奶，如何在又清又涼的河中游泳，如何用線和一頭磨尖的鐵絲釣魚。我還學會了“棍戰”，這是一種鄉下非洲男孩都要掌握的基本格斗知識，也是各種格斗技術的基礎。例如，“躲閃出擊”、“聲東擊西”、“快步逃脫”。在這些時光中，我建立起對多巖石的草地、廣闊的田野、大自然的簡單之美以及清晰的地平線的熱愛。

作為男孩子，我們可以毫無約束地玩耍。我們玩自己制作的玩具，用黏土制作各種飛禽走獸，用樹枝制作牛拉雪橇，大自然就是我們的運動場。庫努周圍的小山上到處都是平滑的石塊，我們用石塊做成“過山車”。我們坐在平滑的石塊上從平滑的大巖石上滑下來，一直玩到我們的屁股酸痛無比、無法坐下為止。我在斷了奶的小牛背上練習騎術，摔下幾次后就學會了這種技術。

一天，我從一頭沒有馴服的驢子那里得到了一個教訓。我們輪流在驢背上爬上爬下，輪到我的時候，我一躍爬上了驢背，驢子一陣狂奔后鉆進附近的荊棘叢中，它猛一低頭想把我摔下來。我還真的被它摔了下來，我的臉被荊棘刺破了。這時，我的朋友們來到了我的面前。像東方人一樣，非洲人很有自尊心，或者說非洲人如同中國人所說的很要“面子”。我在朋友面前丟了臉。盡管是一頭驢子把我摔下來的，但是，我懂得了羞辱別人就是讓人家遭受一種不必要的、殘酷無情的打擊。即使是在很小的時候，我打敗了我的對手，我也不會羞辱他們。

通常，男孩子會找男孩子玩。但是，有時候也容許我們的姐妹和我們一起嬉戲。男孩和女孩都玩諸如“恩迪茲”（ndize，捉迷藏）和“埃塞闊”（icekwa，抓人游戲）之類的游戲。不過，我最喜歡與女孩子們玩的游戲是我們叫做“基薩”（khetha）或“挑選你最喜歡的那一位”的游戲。這不是一種很有組織的游戲，而是一種在我們請到一群年齡同我們相仿的女孩子后即興玩的游戲，要求她們每人從我們中間挑選一位她喜歡的男孩。我們的游戲規則規定，尊重女孩子的選擇，一旦選中她所喜歡的男孩，她可以在她喜歡的那個幸運男孩的護送下繼續她的行程。但是，女孩子都很聰明，比我們這些愚蠢的男孩子精明得多。她們常常商議后再挑選一個男孩，通常是最平庸的一位，然后她們會在回家的路上戲耍他一路。

男孩子最普通不過的游戲莫過于“森提”（thinti），和大多數男孩子們玩的游戲一樣，“森提”是一種富有孩子氣的戰爭模仿游戲。兩根棍子作為打擊的靶子，將一頭牢牢地直插入地中，彼此間相距100英尺。游戲的最終目標是每個隊向對方的靶子扔棍子并將靶子打倒。我們每人都要捍衛自己的靶子，并設法阻止對方補給棍子。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還組織起來同鄰村的男孩子們進行比賽。在這種友誼賽中，獲得勝利的那些人很讓人羨慕，作為獲得勝利的大將理所當然要接受大家的慶賀。

做完這種游戲后，我回到母親的克拉爾，這時母親正在那里做飯。我父親常常給我講歷史戰爭和科薩戰爭英雄的故事，而母親則常常會給我講科薩人的傳奇故事和寓言。這些故事往往讓我非常入迷。這些傳奇故事和寓言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已經流傳了無數代。這些故事激發了我幼年的想象力，其中就包含一些倫理道德方面的內容。記得母親曾經給我講過一個行人的故事：有一個行人遇見了一位雙目患嚴重白內障的老婆婆。她請求這個行人給予幫助，而他沒有幫她。然后又來了一位行人，老婆婆又趕上前去，請求他幫她治療自己的眼睛。盡管第二位行人有點不愿意幫她，但最終還是按照老婆婆的請求做了。白內障奇跡般地好了，老婆婆變得年輕又漂亮，最后這個行人與她結了婚，并從此富了起來。這是一個情節簡單的故事，但是，它有著深刻的寓意：行善和慷慨助人總會得到自己意想不到的報答。

像所有的科薩孩子一樣，我主要靠觀察積累知識。我們的父輩要求我們通過效仿和競爭獲得知識，而非通過提問來增長見識。當我第一次到白人家里去的時候，我對孩子們向他們的父母提問的次數和性質以及他們的父母無不愿意一一回答感到驚奇。在我家里，孩子向大人提問題是令人厭煩的事情，成年人只有認為有必要時才回答你的問題。

我的生活，也是當時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是由當時的習慣、禮節和戒律決定的。毫無疑問，這是我們生命的全部。男人們沿著父輩為他們鋪設的路子往前走；女人們則過著與其母親所過的相同的生活。雖然沒有人告訴我，但我很快懂得了男女之間相處的規矩。我發現一個男人不能進入剛剛生過孩子的婦女的房間，一個剛剛結婚的女人不舉行儀式不能進入新家的克拉爾。我還懂得了忘記自己的祖先會招來厄運并在生活中失敗。如果你做了有辱你祖先的事，唯一的贖過辦法就是求助于傳統司神人員或氏族長輩與祖先溝通并表達深深的歉意。所有這些信仰對我來說都是很自然的。

孩提時代，我在庫努很少見到白人。當地的行政長官當然是白人，他也是距離庫努最近的一個商店的店主。偶爾有白人或白人警察從這里路過，這些白人對我來說看上去就像上帝那樣尊貴，他們既讓人畏懼又讓人尊敬。但是，他們在我生活中的影響是遙遠的，我一般很少想或根本就不想我們自己的人民與這些令人好奇而距離遙遠的人之間的關系。

在庫努這個小小的世界里，不同氏族或氏族部落之間的唯一矛盾是科薩部落與阿馬木棼古部落之間的隔閡。阿馬木棼古是居住在我們村里的一個少數氏族部落。埃馬非卡尼時代，阿馬木棼古部落在逃離沙卡祖魯軍隊后來到了東開普。1820——1840年，由于沙卡祖魯國的崛起，爆發了大戰和移民浪潮。在此期間，祖魯軍隊企圖用武力征服和統一所有的部落。阿馬木棼古部落是來自埃馬非卡尼的難民，他們原不是講科薩語的氏族。他們被迫去做其他非洲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在白人的農場和白人企業中勞作。這些都是科薩人看不起的工作。但是阿馬木棼古人民是勤勞的人民，他們與歐洲人接觸，因而往往比其他非洲人接受的教育更多，也更西方化。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阿馬木棼古是最先進的部落。他們為我們提供職員、警察、教師、公務員和翻譯。他們也是最早信仰基督教、最早建造好房子、最早用科學方法從事農業生產的非洲人。他們比他們的科薩同胞更富有一些。他們接受了傳教士的公理，即信仰基督教就是文明化，文明化就是信仰基督教。科薩人對阿馬木棼古人仍然有些敵對情緒，但我認為這更多的是出于嫉妒，而不是部落之間的敵對。根據我小時候的觀察，這種敵對形式是相對無害的。在那個階段，我沒有目睹也不會懷疑，發生暴力的部落之間的這種敵對情緒最后會被南非的白人統治者進一步激化。

我父親不贊成當地人對阿馬木棼古人的偏見，并且他還與阿馬木棼古兩兄弟喬治和本·穆貝克拉成了朋友。兩兄弟在庫努村非同一般：他們受過教育并皈依了基督教。老大喬治是一位退休教師，本·穆貝克拉是一名警察士官。盡管穆貝克拉兄弟信奉另外的宗教，但我父親卻仍然遠離基督教而堅持自己的信仰，堅定不移地信仰偉大的科薩精神——“夸馬塔”——父輩的上帝。我父親是一個非正式任命的神職人員。他主持宰殺牛羊的宗教儀式，并且主持關于種植、收割、出生、婚嫁、入會、喪葬等當地傳統禮儀。其實，他不需要被任命，因為科薩傳統宗教是以博大為特點的，所以在神圣與世俗、自然與超自然之間只有很小的區別。

雖然穆貝克拉兄弟沒有在我父親身上產生影響，但他們的確影響了我母親，她皈依了基督教。事實上，范妮就是她的基督教教名，因為她是在教堂里開始叫這個名字的。由于穆貝克拉兄弟的影響，我自己也成了衛理公會的教徒，或者按照當時的叫法，我成了“美以美教派”的教徒，并且被送進了學校。穆貝克拉兄弟經常看見我在一邊玩耍或放羊，并經常過來與我談話。一天，喬治·穆貝克拉拜訪了我母親。“你兒子是個聰明的小家伙，”他說，“他應該去上學。”我母親沒有吭聲。我們家沒有人上過學，所以我母親對穆貝克拉的建議沒有思想準備。但是，她還是把這個問題留給了我父親去作決定。也許是因為他自己沒有受過教育，我父親立刻決定他的小兒子應該去上學。

學校只有一間房子，屋頂是西式的房頂，在庫努山的另一側。我當時7歲，在我上學的頭一天，我父親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要上學必須要適當著裝。直到那時，我同庫努村里的其他男孩子一樣，身上只有一條毯子，把毯子繞一邊肩膀一裹，然后別在腰間。我父親拿了他的一條褲子，在膝蓋處一剪，然后讓我穿上。這條褲子長短倒基本合適，但褲腰太肥。我父親就用細繩對褲腰進行了收縮處理。我穿著這條褲子一定是一副滑稽相，但是，我感覺穿什么衣服都比不上穿父親這條褲子更驕傲。

上學的第一天，我的老師穆丁佳尼女士給我們每人起了個英文名字，并告訴我們，從今以后這個英文名字就是我們在學校里用的名字。這在那個年月是非洲人的習慣，但毫無疑問，這是英國人對我們教育的偏見造成的。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一種英國教育，在這種教育下，英國思想、英國文化和英國政體自然被認為是最優越的。在非洲文化中根本就沒有這種事。

我這一代非洲人，即使是今天，一般都有兩個名字，一個英文名字，一個非洲名字。白人不是不能就是不愿意念非洲名字，他們認為有一個非洲名字是不文明的。那天，穆丁佳尼女士告訴我，我的新名字叫納爾遜。我不知道她為什么給我起這個名字。可能與英國偉大的船長納爾遜爵士有某種關系，但這僅僅是一種猜測。

3...

我9歲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預感到家中要出亂子。我父親回來了，他通常輪流去看望他的四位妻子，大概一個月來我們這里住一個禮拜。然而，這一次卻不是他通常來的時候。我看見他在我母親的房間里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一陣陣地咳嗽。憑我這個小孩的目光也能看出，父親將不久于人世了。他患了某種肺病，但到底是什么病并沒有確診，因為我父親從來就沒有找醫生看過病。他連續在房內躺了好幾天，既不動彈也不講話。隨后，有一天夜里，他的病情加重了。我母親和我父親最小的夫人娜達伊瑪妮正伺候在他身旁。那天深夜，他呼喊娜達伊瑪妮：“給我拿煙來。”我母親和娜達伊瑪妮經商量后認為，在他處于這種狀態下抽煙是不明智的。但是，他卻堅持要抽。最后，娜達伊瑪妮只好給他裝好煙袋，點上后遞給他。我父親抽上煙并安靜了下來。他幾乎不住地抽了一個小時，然后就去世了。他的煙袋仍然冒著煙。

在我的記憶中，我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大的悲痛。盡管我母親是我生存的核心，但是，我還是認為自己不能沒有父親。當時，我并沒有想到父親的去世會立刻改變我的一生。經過一段時間的哀悼之后，母親告訴我，我將要離開庫努。我沒有問她為什么，也沒有問上哪里去。

有一天大清早，我帶上屬于我的幾樣東西，向西踏上了新的旅途。我為父親的去世感到悲傷，更為我行將離開的這片土地感到悲傷。庫努是我知道的全部，我以一個小孩熱愛他的第一家鄉的方式無條件地熱愛著它。在身后那些小山丘在我的視線中消失之前，我回轉身來，尋找想象中的村莊是什么樣子。我能夠看到那簡陋的房屋和四處奔波的村民，我能夠看到我曾經與其他孩子一起戲水的小河，我能夠看到那一片片的玉米地和成群的牛羊正在懶洋洋地吃草的草場。我想象我的小朋友們外出打鳥、直接從牛的乳房吸食甜甜的牛奶、在小河盡頭的水池里跳躍的情形。尤其是，我的目光停留在了那三座圓頂茅草房上，在那里，我得到了母親的慈愛和呵護。正是在這三座圓頂茅草房內，我感受到了世間所有的幸福和愉快。就這種生活本身，我為在離開前沒有親近它們而感到后悔。我無法想象，我面對的將來能從哪些方面與我就要拋在身后的過去相比擬。

我們默默地步行，直到太陽慢慢地接近地平線。但是，母親與兒子之間的沉默并不是孤獨的。母親和我之間的話本來就很少，但是，我們并不需要有很多的話語。我絕不懷疑她對我的愛和支持。這是一次筋疲力盡的長途跋涉，我們沿著多石而塵土飛揚的道路，越過起伏的山巒，穿過無數的村莊，一路上沒有停步。傍晚時分，在一個綠樹環繞的山谷里，我們來到了一個村莊。村莊中心有一個大宮殿，這是一座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大宮殿”。望著它，我只有感到驚奇。大宮殿的建筑由兩個長方形的大房子和七個圓形的大房子構成，都刷著白色的石灰，在落日的余暉中顯得更加耀眼奪目。宮殿前有一個大菜園，玉米地四周種著桃樹。宮殿后有一個更大的菜園，里面有蘋果樹、蔬菜，還有一個狹長的花園和一片金合歡。宮殿附近是一個白灰粉刷的教堂。

主房前面的門道上有兩棵增光添彩的橡膠樹，樹蔭下大約坐著20位長者。宮殿周圍有一大群牛羊在茂盛的草地上吃草，至少有50頭牛和500只羊。一切是那樣井井有條。這是一派我想象不到的、富庶而有秩序的景象。這個宮殿叫穆克孜韋尼，是泰姆布臨時首府，也是泰姆布人民的攝政王——容欣塔巴·達林迪葉波的王宮。

正當我被這座壯麗的宮殿深深地吸引住的時候，一輛豪華轎車隆隆地駛進西大門，坐在樹下的那些人立刻摘下帽子，然后站起來呼喊：“Bayete a-a-a, Jongintaba!”（向容欣塔巴致敬！）這是科薩人向其首領致意的傳統禮節。從車內（后來我才知道這種氣派的汽車就是福特V-8）走出一位身穿華麗服裝、身材不高但體格健壯的人。我能看出他是一位充滿信心、習慣于行使權力的人，他的名字對他來說也很合適，因為容欣塔巴字面上就是“雄視群山”的意思。他受人敬仰、強健有力、儀表非凡，黑黑的皮膚，容貌儒雅。他隨和地與樹下的那些人一一握手。后來我才知道，樹下的這些人是泰姆布最高行政院的組成人員。這就是即將成為我的監護人并且是今后十年中撫養我的那個人。

在驚奇地看到容欣塔巴及他的行政院班子的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好像是一棵從地里連根拔起并被扔進河中心的小樹苗，無法抵抗那強大的水流。我既感到迷惑，又感到敬畏。到這時，我除了高興之外沒有任何別的想法。我除了想吃好并成為一名棍戰冠軍之外再沒有別的野心。我本來不想有錢、有地位、有名聲或有權力。但是，一個新世界忽然展現在我的面前。來自貧窮家庭的孩子在忽然面對時來運轉的時候，經常發現自己被許多誘惑所欺騙，我也不例外。我感覺許多已經樹立起的信仰和忠誠開始漸漸消失，父母給我打下的單薄的基礎開始動搖。在那個時刻，我看到生活可能會給我帶來比當棍戰冠軍更好的前程。

后來我才知道，在我父親臨去世前，容欣塔巴提出要當我的監護人。他將會把我當做他自己的孩子，我將得到和他的孩子們一樣的待遇。我母親沒有別的選擇，她沒有拒絕攝政王的提議。盡管她會想念我，但讓她高興的是，在攝政王的呵護下我將會得到更好的教育。攝政王沒有忘記，正是在我父親的干預下，他才成為至高無上的代理國王。

我母親在穆克孜韋尼住了一兩天后就回了庫努。我們之間的別離并沒有激動。她沒有訓誡，沒有囑托，也沒有與我吻別。我知道，她不想讓我為她的離去而感到傷心。當然，這種傷心是毫無疑問的。我知道我父親在世的時候就希望我受教育，以便將來有好的前程。然而在庫努，我無法實現他寄予我的厚望。她那溫柔的表情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母愛和支持。在她即將離我而去的那一時刻，她轉過身來對我說：“Uqinisufokotho, Kwedini !”（振作起來，我的孩子！）小孩子常常最不會傷感，特別是在他們正沉溺于某種歡樂之中的時候。就連我親愛的母親也是我最親愛的朋友即將離開我的時候，我仍然滿腦子沉浸于新家的興奮之中。我怎么會不振作起來呢？我已經穿上我的監護人專門為我新買的漂亮衣服。

我很快適應了穆克孜韋尼的日常生活。一個小孩的適應能力往往是很強的，雖說并非完全適應，但是我已經習慣了這個大王宮，就好像我一直生活在這里。對于我來說，它是一個奇幻的王國，一切都那樣令人愉快。在庫努是平淡的日常生活，而在穆克孜韋尼卻變成了冒險。當我沒有上學的時候，我曾經是農夫、車夫和牧童。我騎馬，用彈弓打鳥，找別的男孩子一起玩騎馬打仗的游戲。有時，我們跳舞，并聆聽泰姆布少女美妙的歌聲和掌聲。盡管我想念庫努和母親，但是，我完全被這個新的世界吸引住了。

我在一所與王宮相鄰的獨屋學校里上學，在那里學習英語、科薩語、歷史和地理。我們學的是Chambers English Reader。我們在黑色石板上做作業。我們的老師是法達納先生，后來是吉克瓦先生，他們對我特別感興趣。我在學校里學習好不是因為我聰明，而是因為我勤奮。我的自我約束能力在姑媽法斯維的幫助下得到了加強。她就住在王宮里，她每天晚上都要仔細檢查我的作業。

穆克孜韋尼是衛理公會的一個傳教站，遠比庫努繁華，西方化的程度也比庫努高。那里的人穿著時髦，男士穿西裝，女士受新教派傳教士的影響，身穿又厚又長的裙子和高領襯衫，并且肩上披著披肩，頭上圍著頭巾。

如果穆克孜韋尼的世界是以攝政王為核心，那么我的小世界就是以攝政王的兩個孩子為核心。老大佳士提斯是攝政王唯一的兒子，是王室的繼承人；諾瑪福是攝政王的大女兒。我同他們生活在一起，受到完全相同的待遇。我們吃的是同樣的飯，穿的是同樣的衣，干的是同樣的事。后來薩巴塔的大哥、王位繼承人恩凱考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我們四人組成了一曲“四重奏”。攝政王和王后對我就像對他們自己的孩子一樣，把我撫養長大。他們為我操心，教育我，也懲戒我。這一切都是出于對我的愛。容欣塔巴為人嚴肅，但我從來不懷疑他對我的愛。他們叫我“塔陶木庫魯”，這是對我的愛稱，是“爺爺”的意思。因為他們說，當我很認真的時候，看上去就像是個老年人。

佳士提斯比我大四歲，在我眼中，他是除了我父親之外的第一個英雄，我非常敬重他。他已經在克拉基伯雷上學，那是一所寄宿學校，離穆克孜韋尼大約60英里。他身材高大、英俊瀟灑、體格健壯，是一位優秀的運動員，特別擅長田徑及場地項目，如板球、橄欖球、英式足球；他快活外向，是一位天生的演員。他有使觀眾為之傾倒的歌喉，他的舞蹈也能使觀眾迷得目瞪口呆。他有一大群女性追隨者，不過對他持批評態度的也大有人在。有些人認為他是紈绔子弟、花花公子。佳士提斯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盡管我們在很多方面不同：他性格外向，而我性格內向；他無憂無慮、漫不經心，我嚴肅認真；他什么都來得容易，而我必須依靠自己努力。我認為，年輕人在各方面都要向他看齊，都要以他為榜樣。雖然待遇相同，但我們的命運卻是不同的：佳士提斯將根據繼承權成為泰姆布最有權力的酋長，而我則將取決于攝政王的慷慨，他讓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每天在王宮里出出進進地做事，當然是為攝政王做事。我最愿意干的事是給攝政王熨衣服，這是一項非常令我引以為豪的工作。他有六套西裝，我要花個把小時才能把他褲子上的褶子熨平。他的王宮可以說由兩所薄頂西式房子構成。那個年月，沒有幾個非洲人擁有西式房子，它們被認為是擁有巨大財富的象征。圍繞著主房呈半圓形坐落著六座圓形房子，里面都是木地板鋪地，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攝政王和王后住在右面的圓形房子里，王后的妹妹住中間那座，左面的圓形房子是餐廳。王后的妹妹住的那個圓形房子地板下面有蜂房，我們有時掀開一兩塊地板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頓蜂蜜。我搬來穆克孜韋尼不久，攝政王和王后就搬進了中間那個圓形房子里，它自然就成了大王后宮。大王后宮附近有三個小一點的圓形房子：一個供攝政王的母親住；一個供來訪的客人住；一個供佳士提斯和我共同居住。

在穆克孜韋尼，左右我生活的兩條原則是王權和基督教教規。盡管當時我沒有把這兩條原則看成是相互對立的，但它們之間并不容易協調。依我看，基督教與其說是一種信仰體系，倒不如說是馬替奧羅牧師個人的信條。我認為，他的存在體現了基督教的誘惑。他與攝政王一樣家喻戶曉、令人敬愛，可以說是攝政王在精神方面的領路人，這個事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教堂與這個世界的關系是，事實上可以說非洲人所有的成就似乎都是來自教堂的傳教。宗教學校培訓傳教士、翻譯和警察，而當時這些人代表了非洲人的最高理想。

馬替奧羅牧師是一個55歲左右的矮胖子，他用一副低沉有力的嗓子講道和吟誦。當他在穆克孜韋尼西部的那座簡易教堂講道時，大廳里總是擠滿了人，大廳里響徹著信徒們的贊美之聲。此時，女士們會跪在他的腳下乞求得到拯救。我到了王宮聽到的第一個故事是，他僅僅用一部《圣經》和一個燈籠就趕走了一個危險的魔鬼。我認為，在這個故事里，既沒有不真實性也沒有矛盾。馬替奧羅牧師講的衛理公會有所不同，摻雜著一點萬物有靈的味道。上帝是聰明和萬能的，但是，他也是個復仇心很強的上帝，不會讓任何邪惡逃脫懲罰。

在庫努，我唯一一次去教堂是我受洗禮的那一天。宗教是我因為母親而迷上的一種儀式，我對這種儀式并沒有別的意思。但是，在穆克孜韋尼，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每個禮拜天都跟隨攝政王和王后去教堂。攝政王對他的宗教信仰非常認真。事實上，他給我的唯一一次庇護是在我沒有去教堂做禮拜而是去參加了與另一個村里的孩子打架的時候，后來我再也沒有犯過這樣的錯誤。

這不是我由于冒犯傳教士而受到的唯一一次指責。一天下午，我溜進馬替奧羅牧師的菜園偷了一些玉米，并在菜園里藏著吃起來。一位小姑娘看見我在菜園里吃玉米，立即向牧師告了密。這個消息很快就被傳揚了出去，并傳到了攝政王王后那里。那天晚上，她一直等到祈禱的時間——這是每天在家中舉行宗教儀式的時間。對我所犯的錯誤，她責備我拿了一個可憐的上帝服務人員的食物，給家里丟了人。她說，小鬼一定會帶我去贖罪。我感到既害怕又羞愧：怕的是我將受到上帝的懲罰，羞愧的是我玷污了攝政王，毀壞了家里的名聲。

因為攝政王受到白人和黑人的普遍尊敬，而且擁有似乎不可動搖的權力，所以我認為王權就是生活的中心。王權的力量和影響在穆克孜韋尼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是任何人能獲得影響和地位的主要方法。

我后來關于王權的認識是通過觀察攝政王和他的內閣而受到深刻影響的情況下形成的。我經常通過王宮召開的部落會議進行觀察和學習。這些會議并非預先計劃舉行的，而是根據需要舉行，研究各種國家大事，如旱災、確定宰殺的牛、行政長官要出臺的政策，或者英國政府新頒布的法律。所有的泰姆布人都可以自由參加，他們都騎馬或步行來開會。

在這種場合，攝政王都是被他的智囊團或者被稱為高參的一伙人簇擁著，這些高參起著攝政王的議會和司法部的作用。他們都是有智慧的人士，腦子里裝著部落的歷史和風俗，他們的意見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

召集開會的通知從攝政王的王宮發到參加會議的那些部落首領和酋長那里后，泰姆布王國各地的重要人物很快都會來到王宮。客人集中在攝政王王宮前面的大院內，攝政王將首先感謝大家來參加會議，并說明為什么把他們召來，然后宣布正式開會。從這個時候開始，他就不發表任何意見了，直到會議接近尾聲的時候他才開始講話。

每個參加會議的人都可以發表意見，這是最單純的民主。在這些講話的人中，可能有重要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必須發表意見，包括酋長和庶民、軍人和醫生、店主和農民、農場主和雇工。一個人講話時，不準有人打斷。會議要持續好幾個小時。自我管理的基礎是大家都能自由地發表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意見意味著公民是具有平等價值的（女人恐怕天生就是二等公民）。

開會的這一天要舉行盛大宴會，我總是邊聽邊吃，常常由于吃得太多而肚子痛。我看到，有的人胡吹海侃，卻似乎總是說不到點子上，而有的人直接切入話題，觀點清晰而有說服力；我看到，有的人在發表意見的時候，試圖用情感和戲劇語言來打動聽眾，而有的人則鎮定、平和，避免激動的情緒。

起初，我對會議的熱烈氣氛感到吃驚。人們熱烈、直率地批評攝政王，不僅僅是有人批評他，事實上，他常常是批評的主要目標。但是，不管對他的批評何等激烈，攝政王總是認真聽，也不為自己辯護，絲毫也不激動。

會議一直開到達成某種共識后，在和諧的氣氛中結束。但和諧有時是由不和諧達成的協議，等到一個更恰當的時間再提出解決辦法，民主的意思就是讓大家都發表意見，并且集中大家的意見后形成一種決議。“大多數原則”只是外國人的一種概念，少數人的意見也不能因大多數原則而不予理睬。

只有到了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隨著太陽將要落山，攝政王才發表講話。他講話的目的首先是總結大家所講的內容，并且在不同意見中形成某些共同的認識。但是，不會有強加于持不同意見者的結論。如果達不成共識，他將再召集會議進行研究。會議結束時，唱頌歌的歌手或者詩人會向古代的國王獻頌歌，對現在的領導人則既稱贊又諷刺。在攝政王的帶領下，觀眾會哄堂大笑。

作為一個領導人，我總是遵循我起初在王宮看到的攝政王演示過的原則。我總是努力傾聽參加討論的每一個人發表的意見，然后才發表自己的意見。通常情況下，我自己的意見僅僅是我在討論中聽到的一種共同認識。我總是記著攝政王的至理名言。“一個領導，”他說，“就像一個牧羊人。他站在羊群后面，讓最敏捷、最聰明的羊走在前面，而其它羊則緊隨其后。不要指望從羊群后面對它們發號施令。”

正是在穆克孜韋尼，我才開始培養起對非洲歷史的興趣。直到那時，我只聽說過科薩英雄的故事。但是，在王宮內我又知道了其他的非洲英雄，如巴培迪國王塞庫庫尼、巴索托國王摩舒舒、祖魯國國王丁岡，另外還有巴木巴塔、辛沙、馬卡納、蒙齊瓦和科嘎瑪。我是從王宮解決爭端和審理案件的酋長和頭領那里聽到這些英雄人物的。這些人雖然不是律師，但是他們介紹案情，然后再對案件進行裁決。有時，他們早早辦完事后就坐下來講故事，我則徘徊于他們的周圍靜靜地聽。他們使用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方言，演講嚴謹而莊重，神情不慌不忙。我們語言的傳統節奏富有長長的韻味和表演性。

開始時，他們攆我走，說我太小了，聽不懂。后來，他們讓我為他們取火或者打水，或者告訴女士他們要喝茶。在早些日子里，他們分派我的差事太多，無法聽全他們的談話。但是后來，他們允許我待在那里聽，我知道了許多抵抗西方統治的偉大的非洲愛國志士。這些非洲戰士的光榮事跡激發了我的想象力。

最老的一位酋長是茲韋立班紀利·兆伊。他用古老的故事招待聚集在一起的老人。他是恩古奔庫卡國王的大王后生的兒子。兆伊酋長太老了，他長滿褶子的皮膚罩在身上就像一件寬松的外衣。他慢條斯理地講著故事，并且常常由于一陣陣激烈的咳嗽而被迫中斷幾分鐘。兆伊酋長是泰姆布歷史的權威，因為他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生活了許多年。

但是，兆伊酋長經常就像個孩子一樣，當講到恩干蓋里茲韋國王軍隊中的戰士們抗擊英軍的時候，他似乎一下子年輕了幾十歲。兆伊酋長一邊講著勝利和失敗的故事，一邊揮動著長矛，沿著草原潛行，他還講述過恩干蓋里茲韋的英雄主義、慷慨和謙讓。

兆伊酋長講的故事人物并不全是泰姆布人。他第一次講到科薩人以外的戰士時，我不知其所以然。我就像一個崇拜當地足球英雄的男孩，對于與自己沒有聯系的外國球隊的球星不感興趣。直到后來，我才被非洲歷史的廣闊范圍和所有非洲英雄人物的事跡所感動。

兆伊酋長控訴白人，他認為是他們故意分裂科薩部落，使科薩兄弟四分五裂。白人告訴泰姆布人，他們真正的領袖是大西洋對面偉大的英國女王，泰姆布人是她的臣民。但是，英國女王除了給黑人帶來苦難和不忠不義之外，什么也沒有帶來。如果她是一個領袖，那她也是一個罪惡的領袖。兆伊酋長的戰爭故事和他對英國的控訴使我感到氣憤和上當受騙，好像我已經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

兆伊酋長說，非洲人民，直到白人帶著冒火的武器來到非洲之前，一直生活在相對安靜的生活之中。他說，以前泰姆布人、旁多人、科薩人和祖魯人都是同一個父親的兒子，他們像兄弟一樣生活，白人破壞了各部落之間的兄弟情義。白人對土地十分渴望和貪婪，而黑人同他們分享土地，就像同他們分享空氣和水一樣，土地并非個人所有，但白人就像一個人牽走另一個人的馬一樣占有了這片土地。

我并不知道，我們國家的真實歷史并沒有寫進標準的英國教科書。英國教科書聲稱，南非歷史從簡·范·里貝克于1652年在好望角登陸開始。從兆伊酋長那里，我開始發現，講班圖語的這些人的歷史在遙遠的北方，那是一個有湖泊、有綠色的平原和山谷的國家，經過數千年的漫漫遷徙，我們南下到了這個偉大大陸的南端。但是后來我發現，兆伊酋長關于非洲歷史的說明并非那么準確，特別是1652年之后的歷史。

在穆克孜韋尼，我的感覺與每一個剛到大城市的鄉村男孩并無不同，穆克孜韋尼遠比庫努發達，庫努人被穆克孜韋尼人認為是落后的。攝政王不愿意讓我去庫努探親，害怕我會倒退，回到我老家那幫壞伙伴之中。當我真正回到庫努，我感覺攝政王已經向我母親簡單介紹了我的情況，因為她會詳盡地問我同哪些人玩。攝政王也曾多次安排把我母親和妹妹接到王宮去住。

當我剛到穆克孜韋尼的時候，我的同輩人把我當做鄉巴佬，認為我無法像在王宮那樣一切都很講究的氣氛中生存。作為一個青年人，我努力做到舉止文雅、成熟。一天，在教堂里，我看見一個可愛的年輕姑娘，她是馬替奧羅牧師的女兒，名叫溫妮婭。我請她出來，她同意了。她對我很熱情，但是她姐姐諾瑪木旁多卻認為我是一個非常蠢笨的人。她告訴她妹妹，我是一個野孩子，不配和馬替奧羅的女兒一起玩。為了向她妹妹證明我如何不開化，她邀請我到教區長家里去吃午飯。我們仍習慣于在家里吃飯，在家里我們不使用刀子和叉子。在她家的飯桌上，這個頑皮的姐姐遞給我一個盤子，盤子里有一個雞翅。但是雞翅沒煮爛，所以雞肉不容易從骨頭上弄下來。

我觀察別人熟練地使用刀子和叉子，于是我也拿起了刀子和叉子。觀察了別人一會兒后，我就想割那個小雞翅。一開始，雞翅在我的刀叉并用下在盤子里直打轉，我希望把肉從骨頭上弄下來；然后，我把雞翅叉住，用刀子割，但是也沒有成功。在一次一次的失敗中，我的刀子搗得盤子叮當作響。我一次一次地努力著。此刻我發現那位姐姐在沖著我笑，并故意看她的妹妹，好像在說：“我告訴過你他是一個很蠢笨的孩子。”我努力了又努力，搞得渾身是汗，但是我不愿意承認失敗，于是我用雙手抓起了那個小東西。那天的午飯我并沒有吃到多少雞肉。

后來，那位姐姐告訴她妹妹：“如果你愛上這么蠢笨的一個男孩兒，你將毀掉你這一輩子。”但是，我高興地說，那位年輕的姑娘沒有聽她姐姐的話，盡管我很蠢笨，但她仍然愛我。后來，我們當然各奔東西，彼此離開了對方。她上了另一所學校，并成了一名合格的教師。我們通信聯系了幾年，后來與她失去了聯系。不過，到了那個時候，我在飯桌上的禮節已經得到了相當大的提高。

4...

當我滿16歲的時候，就到了攝政王決定讓我成為成年男子漢的歲數。在科薩傳統中，這只能通過一個辦法來實現，就是舉行割禮。在我們的傳統中，一個沒有行割禮的男性不能繼承其父親的財產，不能結婚或者行使部落宗教儀式。因為沒行割禮的科薩男人從詞語上講就是矛盾的，因為他根本就不被當成一個成年男子漢，只是一個男孩子。對于科薩人來說，行割禮代表男性正式融入了社會。它不僅是一個外科手術，更是準備做成年男子漢的一種冗長的、精細安排的禮儀。作為一個科薩人，我從行割禮的那天計算作為成年男人的年齡。

割禮訓練的傳統儀式主要是為佳士提斯安排的，我們其余的24個人在那里主要是為他做伴兒。新年伊始，我們來到穆巴謝河岸僻靜山谷里的兩座小草房前。這個山谷叫提亞拉哈，是泰姆布國王行割禮的傳統地方。兩座草房是很幽靜的住所，我們將與社會隔離居住在這里。這是一個神圣的時刻，我感到高興，我將完成加入到我們的人民中間的習俗，并準備由男孩變為男子漢。

在行割禮儀式的前幾天，我們就搬到了河邊上的提亞拉哈。作為男孩子的最后幾天是與其他開始做成年男子漢的人一起度過的，我們之間建立了令人愉快的友情。我們的住所就在巴納巴基·布拉伊家的附近。巴納巴基·布拉伊是這次割禮培訓中最有錢、最知名的一個男孩兒。他是一個有魅力的孩子，也是一名棍戰冠軍和衣著亮麗的孩子，他的許多女朋友使我們不斷地有好東西吃。盡管他既不能讀，也不能寫，但他卻是我們中間最有才氣的一個。他給我們講述他去約翰內斯堡旅行的故事，那是我們都沒有去過的地方。這些故事使我們很振奮。他勸我說，當一個礦工比當一個君主更有吸引力。礦工有一種神秘性，當一名礦工意味著強壯和勇敢，這是成年男子漢的理想。后來，我認識到，正是像巴納巴基這樣的男孩子所夸大的神話故事，才使那么多青年男子跑到約翰內斯堡的礦上去打工。在那里，他們往往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在那些日子里，在礦上工作幾乎與取得割禮培訓合格證一樣重要，但這是一個有助于礦主而不是有助于我們的人民的神話。

割禮訓練這種習俗是一個人必須在行割禮前完成的勇敢行為。在古時候，這種習俗可能包括與牛搏斗，甚至包括參加一次戰役，不過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英雄事跡更多地表現為惡作劇而不是什么勇敢行為。在我們搬到提亞拉哈的兩個夜晚之前，我們決定偷一頭豬。在穆克孜韋尼，有一個族人養著一頭老豬。為避免出聲引起這個農戶的警覺，我們想了一個讓這頭豬成全我們的辦法。我們拿了一把家釀非洲啤酒的酒渣，豬喜歡這種氣味很濃的酒渣，把它放在豬的上風處，這種氣味對那頭豬非常有誘惑力，于是它走出了克拉爾，沿著我們放的酒渣一步一步地向我們這里走來，邊哼哼，邊吃酒渣。當它走到我們身邊的時候，我們把這個可憐的家伙抓獲并殺掉。然后點起了一堆火，在星光下吃起了烤豬肉。在這之前和之后，我們從來也沒有吃過那么香的豬肉。

行割禮之前的那個夜晚，在我們住的小房前舉行了一個儀式，大家盡情地唱歌、跳舞。女士們從附近的村子里趕過來，我們伴隨她們的歌聲和掌聲翩翩起舞。隨著音樂節奏的加快和聲音的加大，我們的舞蹈也越來越瘋狂，使我們忘記了即將到來的那個時刻。

天快要黎明的時候，星星仍然掛在天上，我們開始作準備。我們被送到寒冷的河水中進行沐浴，這是在舉行割禮儀式前所進行的一種凈身儀式。割禮儀式定在中午舉行，我們被要求在離那條河有一段距離的空地上排成一行。有一群父母和親戚，其中包括攝政王以及少數酋長和參事聚集在那片空地上。那天，我們每個人圍了一條毯子，當儀式開始的時候，隨著咚咚不停的鼓聲，我被吩咐雙腿向前伸開，坐在地上的一個毯子上。我感到有些緊張，不知道這一刻到來的時候將會作何反應。畏縮和哭叫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也是對其成年榮譽的污辱。我決心不給自己這一伙人和我的監護人丟臉。割禮是一種對勇敢和堅強的檢驗：不使用麻藥，行割禮的人必須默默地忍受疼痛。

通過眼睛的余光，在右邊我看見一位瘦瘦的年長者從帳篷里走出來并跪在一個男孩子面前。人群中一陣激動，我也有點戰栗，知道儀式將要開始。老人是一位來自基卡雷卡蘭的著名割禮專家，他用木柄標槍一下子就讓我們從男孩子變成成年男人。

忽然，我聽見第一個男孩喊出聲來：“Ndiyindoda!”（我是一個男子漢！）這是我們在訓練期間要求在行割禮時說的一句話。幾秒鐘后，我聽見佳士提斯那低沉的嗓音發出了同樣的喊聲。現在，再有兩個男孩就輪到我了，我的心里一定是一片空白，因為沒等我反應過來，老人就已經跪在了我的面前，我直勾勾地盯著他的眼睛，他面色黯淡，盡管那一天很冷，他的臉上仍然閃動著汗水。他的手是那么快，似乎是受另一個世界的力量所控制。他一言未發，就捏住我的包皮，向前一拽，然后一標槍刺下去。我感覺好像是火焰注入了我的血管，疼痛是那樣的劇烈，我把我的下巴緊緊地貼在了胸前。若干秒過后我才想起那句話，然后我醒過神來并喊了一句：“Ndiyindoda!”

我低下頭，看見了一塊整齊的包皮，干凈并呈圓形，好像是一個環。但是我感到羞愧，因為其他男孩似乎比我更堅強。他們更及時地喊出了那句話。我為自己的沒用而難過，盡管疼痛很短暫，我仍竭力地加以掩飾。一個男孩可以失聲慟哭，但一個男子漢則要隱藏他的疼痛。

現在，我邁出了每個科薩男子漢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現在，我可以結婚，建立自己的家庭，耕種自己的田地。現在，我可以成為社團的一員，我的意見也將被人重視。在行割禮的儀式上，我被給予了割禮名：“達利班佳”，意思是“班佳的創始人”，班佳是特蘭斯凱傳統統治的體現。按照科薩人的傳統意思，這個名字比我的其他兩個名字豪利沙沙或納爾遜更好聽。我自豪地聽到我的新名字：達利班佳。

行完割禮后，一位跟隨割禮大師的助手把割下來的包皮從地上拾起來并把它綁在我的毯子的一個角上。然后，我們的傷口被用一種有助于愈合的植物葉子包扎起來，這種植物葉外面多刺，但里面平滑，可以吸收血和其他分泌物。

在儀式結束的時候，我們回到了小草房，房內點起了一堆木柴，冒出濃濃的煙，這種煙被認為可以加速傷口愈合。我們被吩咐仰面朝天地躺在滿是濃煙的草房內，一條腿伸直，另一條腿彎著。我們開始進入了男子漢的世界。我們得到一位監護人的照料，這位監護人向我們說明，如果想正常地進入男子漢時期，就必須遵守戒律。監護人的第一項工作是在我們赤身露體并刮過汗毛的身子上，從頭到腳涂上一層白色的赭石涂料，把我們變成小鬼。白色象征我們的純潔，至今我仍然記得身上有這層干了的涂料而產生的那種僵直感。

第一天夜里夜半時分，有一個隨從人員圍著房子爬行，輕輕把我們每個人喚醒。我們在他的引領下離開草房，摸黑去掩埋我們被割下來的包皮。傳統理由是，這樣我們被割下的包皮不等男巫用它們來干壞事就已經被藏了起來，同時，我們也象征性地把我們的孩提時代埋入了地下。我不想離開溫暖的草房并在灌木叢中摸黑行走，而是走進樹林，并在幾分鐘后解下我被切下的包皮埋進了地里。我感覺好像現在拋棄了自己孩提時代最后的剩余物。

我們住在兩間草房內，每間13人，直到我們的傷口愈合為止。在房外的時候，我們裹上毯子，因為不準讓女人看見。這是一個平靜的時期，也是即將做男子漢的一種精神準備。在我們重新出現在眾人面前的那一天，我們一早就走進河里，用穆巴謝河水把身上的白色赭石洗掉。一旦身子洗凈并晾干后，我們又被涂上紅色的赭石粉。根據傳統，一個人被涂上紅色赭石粉，就應當與一個女人睡覺，這個女人后來將成為他的妻子，她會用她的身體擦掉他身上的涂料。但是，我身上的涂料是用植物油和豬油的混合物除掉的。

在我們的世外生活結束的時候，草房和其他用品都要被燒掉，把我們與孩提時代的最后聯系徹底銷毀。為歡迎我們作為男子漢回到社會上而舉行了一個大型儀式。我們的家人、朋友和當地的酋長聚集在一起發表講話、唱歌、贈送禮物。我被贈予了兩頭小母牛和四只綿羊，這些東西使我感覺遠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富有，因為我作為一個以前一無所有的人忽然擁有了財產。盡管贈給我的禮物與贈給佳士提斯的禮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仍然感到很興奮。贈給佳士提斯的是一整群牛羊。我不羨慕佳士提斯的禮物，因為他是一個國王的兒子，我從命運上講最多只能成為國王的一位參事。那天，我感覺渾身是勁、滿心自豪。我記得那天走路都與往常不一樣，身子挺得更直、更高，也更堅定。我內心充滿希望，認為有一天我將會擁有金錢、財產和地位。

那天的主講人是梅利格立酋長，他是達林迪葉波的兒子。聽了他的講話后，我那充滿色彩的夢想忽然被蒙上了一層陰影。他以傳統的話語開場，講我們正在如何更好地繼承我們的傳統，這個傳統已經延續了任何人都可以想象的那樣久遠。然后，他轉向我們，調門忽然變了。“這里坐著我們的兒子，”他說，“他們年輕、健康、漂亮，是我們科薩部落的花朵，也是我們大家的驕傲。我們剛剛為他們舉行了割禮，許諾他們進入成年男子時代，但是我在這里告訴你們，這是一個空虛而騙人的許諾，也是一個永遠不能兌現的許諾。因為，我們科薩人和所有的南非黑人一樣，是一個被征服了的民族。我們是我們自己國家內的奴隸，我們是我們自己土地上的佃戶。我們沒有力量、沒有權力，不能在自己出生的這片土地上把握自己的命運。你們將走向城市，在那里，你們將住簡易房，喝低價酒。所有這些都是因為我們沒有把繁榮昌盛、繁衍生息的土地贈給你們。你們將在白人們深深的礦井中把自己的肺咳嗽出來而毀掉健康，并且永不見天日，而白人卻可以不平等地過著繁榮富足的日子。在你們這些年輕人中，有的將會成為有職無權的酋長，因為我們沒有權力來管理我們自己；有的會成為永遠不去打仗的戰士，因為我們沒有打仗的武器；有的會成為永不教書的學者，因為我們沒有地方讓他們授課。你們這些年輕人的才能、知識和前途將被消耗在維持生計的艱難之中，去為白人做最簡單、最不用腦子的工作。今天的禮物是微不足道的，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自由’和‘獨立’這些最好的禮物可以贈予你們。我深信上帝能看到一切，因為他從不睡覺。但是，我懷疑上帝可能正在打盹。如果是這樣，但愿我死得越快越好，因為這樣我就能看見上帝并把他喚醒，告訴他恩古奔庫卡的孩子們——科薩民族的花朵正在枯萎。”

隨著梅利格立酋長的講話越來越激昂，聽眾們越來越肅靜。我認為，他們越來越氣憤。沒有一個人想聽他那天講的話，我知道我自己也不想聽。酋長的話不僅對我不是一種鼓勵，而且讓我感到氣憤，認為他的話是一個無知者發表的誹謗性評論，他不能欣賞白人給我們國家帶來的教育和有益的價值。那時候，我不把白人看作壓迫者，而是看作造福者，我認為這位酋長忘恩負義。這位令人反感的酋長毀了我的重要日子，他的錯誤講話傷害了我的自豪感。

但是，不知道為什么，他的話很快在我身上發生了作用。他播下了一粒種子，盡管我認為種子將休眠一個季度，但是它最終會生長。后來我才認識到，無知者不是那位酋長，而是我自己。

行完割禮后，我回到了那條河邊，看著它蜿蜒向前流淌，流向許多許多英里以外的遠方，并消失在印度洋。我從來沒有渡過那條河，對河那邊知道得很少，或者說一點都不知道，那是一個當時向我招手的地方。太陽幾乎就要落山了，我趕忙回到我們一直居住的那些小房子。盡管在焚燒那些房子的時候禁止往后看，但是，我并沒有抵擋住往后看的誘惑。當我再回到那里的時候，所有剩下的東西只有兩堆用含羞樹燒成的金字塔形的灰燼。在這兩堆灰燼中，有一個失去的、充滿愉快的世界，那是我在庫努和穆克孜韋尼生活過的童年世界，是一個甜蜜的、無憂無慮的世界。現在我成了成年男子，我將再也不去玩森提游戲、偷玉米或者在母牛的乳房上喝牛奶。我開始為自己的少年時代哀悼。回首從前，我知道那天我還不是一個男子漢，而真正成為一個男子漢還需要許多年。

5...

與曾經和我在一起參加割禮訓練的其他大多數人不同，我并沒有命中注定要在礦脈金礦上工作。攝政王經常告訴我，如果讓你去給白人挖金礦，你絕不知道如何寫你的名字。我的命運是要當薩巴塔的參事，為此，我必須要接受教育。行完割禮后，我回到了穆克孜韋尼。但是，在那里沒有住多久，因為我要越過穆巴謝河，第一次去位于恩科波地區的克拉基伯雷寄宿學院深造。

于是，我又離開了家，我急于知道在更廣闊的世界上我如何生活。攝政王親自用他那輛氣派的福特V-8把我送到恩科波。動身之前，他組織了一場慶祝會，祝賀我通過了標準五級考試并被克拉基伯雷寄宿學院錄取。那天殺了一頭羊，人們盡情地跳舞和歌唱，這是第一次專門為我舉行的慶祝活動，因此我非常興奮。攝政王給了我一雙皮靴，這是我的第一雙皮靴，這也是成年男子漢的一種標志。那天晚上，盡管它本來已經锃亮，但我還是把它擦拭一新。

克拉基伯雷寄宿學院建于1825年，它坐落在特蘭斯凱最古老的魏斯勒陽地區。那時候，克拉基伯雷是非洲泰姆布地區的最高學府。攝政王本人上的就是克拉基伯雷寄宿學院，佳士提斯也曾在那里學習過。它既是一所中學，也是一所教師培訓學院。不過，它也提供更多的技術培訓，例如木工、裁剪和白鐵工。

在路上，攝政王就我的舉止和前途提出了要求。他激勵我只能做為薩巴塔和他本人爭光的事情，我向他作了保證。然后，他向我簡要地介紹了該學院的院長——哈利斯牧師。他說哈利斯牧師是一個獨特的人，是一個白色人種的泰姆布人，是一個心中熱愛、理解泰姆布人的白人。攝政王說，當薩巴塔老了的時候，他會把將來的國王委托給哈利斯牧師，哈利斯牧師將把他培養成既是一位基督教教徒，同時又是一位傳統的統治者。他說，我必須向哈利斯牧師學習，因為我將注定為哈利斯牧師塑造的那位領袖服務。

在穆克孜韋尼，我見過許多白人商人和政府官員，其中包括行政長官和警官，這些都是有地位的人。攝政王對他們很客氣，但是并不奴顏媚骨。他像他們對他那樣平等地對待他們。有時，我甚至看到他責備他們，盡管這種情況很少見。我直接與白人打交道的機會很少。攝政王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如何同白人交往，我總是觀察他并以他為榜樣。但是，在談論哈利斯牧師時，攝政王第一次就如何與白人打交道向我談了意見。他說，我必須像對待他一樣尊重和服從這位牧師。

克拉基伯雷遠比穆克孜韋尼大得多。學校本身就有大約24棟殖民地風格的漂亮建筑物，其中包括個人住宅、圖書館和各種授課廳。這是我住過的第一個西式而不是非洲式的住所，我感覺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但對其中的規矩當時尚不清楚。

我們被帶進哈利斯牧師的書房，在那里，攝政王把我介紹給了哈利斯。我站在那里同他握了手，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白人握手。哈利斯牧師熱情、友好，對攝政王特別客氣。攝政王對他說，我將被培養成國王的一位參事，希望哈利斯牧師特別予以關照。傳教士點頭答應，并說，克拉基伯雷的學生們在學習以外的時間里需要參加手工勞動。

結束談話時，攝政王向我告別，并給了我1英鎊作零用錢，這是我曾擁有的最大的一筆錢。我向他說再見，并保證不會讓他失望。

克拉基伯雷是一所泰姆布學院，他是偉大的泰姆布國王——恩古奔庫卡提供土地建造的。作為恩古奔庫卡的一位后人，我認為自己在克拉基伯雷也會受到在穆克孜韋尼曾經企盼得到的那種尊重。但是，我痛苦地發現我想錯了。因為我所受到的待遇與其他學生沒有任何差別。沒有人知道或關心我是不是顯赫的恩古奔庫卡的一個后代。校方沒有吹喇叭歡迎我，我的同學在我面前也不鞠躬。在克拉基伯雷，許多男孩子都有顯赫的血統，我并不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個重要教訓，因為我懷疑在那些日子里我有點高傲自大。我很快認識到，我必須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憑借血統開辟自己的道路。我的同學多數在運動場上超過我，在課堂上思維也比我敏捷，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奮起直追。

課程從第二天早晨開始，我與同學一起爬到了我們的教室所在的二樓。教室內鋪著華麗的木質地板。在第一天上課的時候，我穿上了那雙新皮鞋。以前我從來沒穿過皮鞋，第一天走路就像是一匹新釘了掌的馬。上樓時，差一點摔一跤，幾乎打了好幾次滑。當我邁著沉重的腳步進入教室的時候，我的皮鞋重重地撞擊在光滑的木質地板上，我發現坐在前排的兩個女生正在瞪大了眼睛盯著我那走了形的腳步。其中比較漂亮的那位依在另一位的身上用足以讓大家聽得到的聲音說：“這個農村男孩穿皮鞋不習慣。”此時，她的那個朋友笑了。我感到既氣憤又尷尬，兩眼直冒火花。

她名叫瑪托娜，她有點自作聰明，那天我發誓永遠不和她說話。但是，隨著怨恨的慢慢消失，加上我穿皮鞋走路也習慣了，我逐漸了解了她。她成了我在克拉基伯雷時最好的朋友。她是我第一位真正的女性朋友，我們平等相待、相互信任、共享秘密。在各個方面，她都成了我后來與女士建立友情的典范，我發現與女士交往時我能較為放松，并會坦誠自己的弱點和膽怯，而這些我是絕不會向任何男人透露的。

我很快習慣了克拉基伯雷的生活。我盡可能參加運動和比賽項目，但是，我的成績僅僅是一般水平。我參加體育活動是出于愛好，而不是為了榮譽，因此我也沒有得到過榮譽。我們用自制木板打草地網球，赤著腳在光禿禿的地上踢英式足球。

我第一次聽本身受過正規教育的教師給我們講課。他們中有好幾個人有本科學位，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一天，我正在與瑪托娜一起學習，我向她透露害怕自己到年底英語和歷史考不及格。她告訴我不要擔心，因為我們的教師格特魯德·恩特拉巴提是第一個取得B. A（學士學位）的黑人女教師。“她太聰明了，不會讓我們考不及格。”瑪托娜說。我還沒有學會不懂裝懂，由于我對B. A只有模模糊糊的概念，于是我請教瑪托娜。“咳，是的，當然，”她回答說，“B. A是一本很厚很難的書。”我對她的回答深信不疑。

另一位有文科學士學位的非洲教師是本·馬拉賽拉。我們崇拜他不僅是因為他的學術成就，更是因為他不懼怕哈利斯牧師。就是白人教師在哈利斯牧師面前也規規矩矩，但是馬拉賽拉先生竟然大搖大擺地出入牧師的辦公室，有時連帽子都不摘！他與牧師平等相待，有時也發表與牧師不同的意見，而別人對牧師的意見往往是一味地同意。盡管我尊敬哈利斯牧師，但是，我欣賞馬拉賽拉先生不懼怕哈利斯牧師這一事實。那時候，一位有B. A學位的黑人勉強能與一位受過小學教育的白人相提并論。不論一個黑人學識多么高，他仍然被認為不如水平最低的白人。

哈利斯牧師以鐵手腕和一貫公平的理念經營著克拉基伯雷學院。克拉基伯雷學院與其說是一個教師培訓學院，倒不如說是一所軍事院校，即使是最小的過錯也會立即受到懲處。在大會上，哈利斯總是面帶冷峻的表情，不會有任何輕率的表現。當他走進某個房間時，全部職員，包括培訓部和中學的白人校長、工業學院的黑人校長都要起立。

在學生中，他與其說是受人愛戴倒不如說讓人懼怕，但在花園里我所見到的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哈利斯牧師。在他的花園里勞動有兩個好處：一種對收拾花園和種植蔬菜的終身熱愛在我身上深深地扎了根，也有助于我去了解這位牧師和他的家人。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與之如此親近的第一個白人家庭。于是，我發現哈利斯牧師有兩副面孔，一是公共面孔，另一個是私下的態度。兩者有很大的差別。

在這位牧師的嚴厲面孔的背后，是一顆友善、寬宏的心。他由衷地相信教育年輕非洲人的重要性。我常常發現他在花園里陷入沉思。我不打攪他，很少與他講話。但是，作為一位無私地獻身于慈善事業的好人，他是我學習的榜樣。

與他的沉默寡言相反，他夫人卻十分健談。她是一位可愛的女士，經常到花園里來同我閑聊。我再也記不起她講了些什么，但是我仍然能回味起許多下午她送給我吃的香噴噴的面餅。

在慢慢的、平淡的學習生活開始之后，我努力學好一切功課，并加快學習速度，只用了兩年的時間就拿到了通常需要三年才能拿到的初級文憑。我因此得到了一個記憶力強的好名聲，但是，事實上我不過是勤奮而已。在我離開克拉基伯雷的時候，我與瑪托娜失去了聯系。她是一個全日制的學生，她父母不想送她去進一步深造。她是一個特別聰明、特別有天賦的人，但她的潛力由于家庭出身而受到了限制。這種事情在南非特別典型，不是能力限制了我們的人民，而是我們的人民沒有機會。

在克拉基伯雷的這段時間里，我的視野變得更開闊了。但是，到我離開那里的時候，我還不能說我已經是一位心胸開闊、沒有偏見的年輕人。我遇見了來自特蘭斯凱各地的學生，也遇見過一些來自約翰內斯堡和巴蘇陀蘭的學生。正如當時大家了解萊索托一樣，他們中有的很老練、很大氣，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有點鄉土氣。盡管我想趕超他們，但是，我從來沒有認為一個來自農村的孩子有可能與他們匹敵。我不羨慕他們，甚至在我離開克拉基伯雷的時候，我打心眼里認為我仍然是一個泰姆布人。我怎么想就怎么做，并為此感到自豪。我的根就是我的命運，正如我的監護人所要求的那樣，我認為自己將會成為泰姆布國王的參事。我的視野沒有超越泰姆布國土，我認為做一個泰姆布人是世界上最令人羨慕的事情。

6...

1937年，我19歲。我同佳士提斯一起在希爾德頓博福特堡的魏斯勒陽學院學習。這里距離烏姆塔塔大約175英里，位于烏姆塔塔的西南方。在19世紀，博福特堡是所謂“邊境戰爭”期間的英國前哨之一。在這期間，白人定居者一步一步地侵占，使各個科薩部落逐步失去了他們的土地。在一個多世紀的沖突中，許多科薩戰士因勇猛頑強而著名，例如馬克漢達、山迪勒和穆考瑪。其中后兩人被英國當局投進了羅本島監獄，并在獄中犧牲了生命。當我到達希爾德頓的時候，上個世紀的戰爭遺跡已經所剩無幾。主要遺跡是博福特堡：過去只有科薩人在那里生活和耕種，而此時卻成了一座白人城鎮。

希爾德頓坐落在一條曲折迂回的道路的末端，周圍是翠綠的群山。它遠比克拉基伯雷美麗，當時是赤道南最大的非洲院校，有1000多名男女學生在那里學習。殖民地式的建筑物上覆蓋著常青藤，校園內樹蔭幽幽，給人一種特別宜人的感覺，是名副其實的校園綠洲。和克拉基伯雷一樣，希爾德頓也是一所衛理公會教會學校，它提供英國基督教和智力開發式教育。

希爾德頓學院的院長是阿瑟·威靈頓博士，他是一個胖大而拘謹的英國人。他聲稱，自己與威靈頓公爵有血緣關系。在開學典禮上，威靈頓博士走上主席臺，用他那低沉的嗓音說：“我是偉大的貴族、議員、大將軍威靈頓公爵的后代。他在滑鐵盧打敗了法國的拿破侖，從而拯救了歐洲文明，也拯救了你們。”此時，我們會熱情地高呼。我們每個人都為威靈頓公爵的后代竟然不辭勞苦來教育像我們這樣的土著人而充滿感激之情。受過教育的英國人是我們的榜樣。我們每個人都立志做一個“黑色的英國人”，正如我們經常被這樣不無嘲笑地稱呼一樣。他們教導我們，最好的思想是英國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國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國人。

希爾德頓學院的生活是很嚴格的。第一遍鐘聲是早上6點，6點40分去餐廳吃早飯。早飯是干面包加熱糖水。餐廳的墻上有英王喬治六世的畫像。買得起黃油的可以在伙房里購買，而我吃的是干面包片。上午8點，我們在宿舍外的院子里集合，站在那里等候女生們從女生宿舍走出來。我們在教室里一直學到12點45分，然后去吃午飯。午飯有玉米面片、酸奶和大豆，很少有肉。午飯后我們一直學到下午5點，然后是一小時的做操時間，做完操后再接著學習，從晚上7點學到9點。晚上9點30分熄燈。

希爾德頓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學生，也有來自巴蘇陀蘭和斯威士蘭地區的學生。盡管多數是科薩部落的學生，但也有來自其他部落的學生。放學后或周末，來自同一部落的學生會聚集在一起，甚至不同的科薩部落如阿馬木旁多等部落的學生也會被相互吸引在一起。我也堅持這樣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在希爾德頓結交了第一個講索托語的朋友。他叫扎查里亞·莫萊泰。我認為，有一個非科薩部落的朋友是勇敢的表現。

我們的動物學教師名叫弗蘭克·勒本特萊勒。他也是一個萊索托人，學生們都很熟悉他。他長得很帥氣，并且平易近人，又比我們大不了幾歲，因此，在學生中很有人緣。他甚至參加了學院里的第一支足球隊，并且成了一個球星。最讓我們驚奇的是，他與來自烏姆塔塔的一個科薩女孩結了婚。當時，不同的部落之間通婚是很少見的。在此之前，我從沒認識過與同部落之外的人結婚的人。我們一直接受禁止這種婚姻的教育。但是，看到弗蘭克和他的夫人，我們這種狹隘意識開始動搖，并渴望沖破仍然束縛著我們的部落主義，我也開始覺察到我作為一個非洲人，而不僅僅是一個泰姆布或科薩人的身份。不過這仍然是一種初步的認識。

我們的宿舍里有40張床，一邊20張，中間是過道。我們的課外教師是性格開朗的S. S.莫基提彌牧師。后來，他成了南非衛理公會的第一個非洲主教。莫基提彌也是一位萊索托人。作為一位現代的、有覺悟并理解我們苦楚的人，他在學生中很受敬仰。

莫基提彌牧師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敢于頂撞威靈頓博士。一天晚上，兩個班級長在學院的主干道上發生了口角。班級長的責任是防止學生之間發生口角，而不是挑動學生爭吵。莫基提彌牧師被叫來做調解工作。威靈頓博士從城里回來，忽然出現在發生口角的人群中。他的出現使我們大為震驚，就好像是上帝下凡來解決我們人間的凡事一樣。

威靈頓博士自視甚高，想要了解發生了什么事。莫基提彌的頭頂只能夠到威靈頓的肩膀，他說：“威靈頓博士，事情已經解決了，我明天向你報告。”威靈頓博士沒有因此而罷休，他不高興地說：“不行，我現在就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莫基提彌堅持自己的意見說：“威靈頓博士，我是課外教師，我已經告訴你了，我明天向你報告。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們都嚇得目瞪口呆。我們從來沒看到有人特別是黑人敢于頂撞威靈頓博士。我們等待著事態的發展。但是，威靈頓博士僅僅說了聲“那好”，然后就走了。當時，我認識到，威靈頓博士并不是上帝，莫基提彌也不是卑躬屈膝之輩，黑人沒有必要主動地屈從于白人，不管白人的地位有多高。

莫基提彌牧師試圖把改革引入學院。我們都支持他為改善學生的生活和待遇所作的努力，包括他提出的關于學生有責任自己管理自己的建議。但是，有一件事讓我們擔心，特別是我們這些來自鄉下的學生——莫基提彌提出了一項建議，讓男女學生禮拜天一起在餐廳里吃午飯。我對此感到十分不快，原因很簡單，就是我仍然不習慣使用刀子和叉子，不想在眼睛尖尖的女生面前丟人現眼。但是，莫基提彌帶頭組織大家這樣吃午飯，于是，我只好每個禮拜天中午餓著肚子掃興地離開餐廳。

但是，我很喜歡在操場上參加體育活動。希爾德頓學院的體育運動水平比克拉基伯雷寄宿學校好得多。在第一年中，我的體育水平還不能參加正式比賽。但是，到了第二年，我的朋友勞吉·恩扎邁拉鼓勵我從事一種新的體育運動：長跑。他是希爾德頓學院的長跑冠軍。我是個瘦高個，勞吉·恩扎邁拉說瘦高個是長跑運動員的理想身材。在他的指點下，我開始練長跑。我喜歡長跑運動的訓練方法和獨立性，可以讓我逃離學校生活的喧囂。同時，我還參加了一項似乎不適合我的運動——拳擊。我訓練刻苦，一年后體重增加了好幾磅，并且開始參加拳擊賽。

在希爾德頓學院學習的第二年，我被莫基提彌牧師和威靈頓博士任命為班級長。班級長有各種各樣的工作，新任命的班級長要干其他班級長最不愿意干的工作。開始，在下午勞動的時間里，我負責領著一伙學生擦窗子，每天清潔一幢建筑物。

我很快得到了提升，我的職責變成了值夜班。在值夜班過程中，我從來沒有出過問題。但是，有一次，我遇到了一個道德方面的疑惑。這個疑惑一直留在了我的記憶里。我們的宿舍里沒有廁所，但在宿舍的后面大約100英尺處有一個廁所。晚上下雨的時候，學生們半夜醒來，不愿意穿過雜草叢生的泥濘小路到外面的廁所里去解手，而是站在陽臺上直接把尿撒在灌木叢中。當然，這種行為是學校明令禁止的。班級長的任務之一就是把“干壞事”的學生記錄下來。

一天夜里，我正在值班，外面下著大雨，因此我抓住了好多從陽臺上撒尿的學生，可能有15位之多。天快亮的時候，我又看見一個學生從宿舍里走出來，他左右望了望，然后就站在陽臺的一端往外撒尿。我朝著他走過去，告訴他他被抓了。當他轉身的時候，我才發現他是一位班級長。這讓我犯了難。在法律上有這么一句話：“誰來管管理別人的人？”如果班級長不遵守規章制度，怎么指望讓學生們去遵守？事實上是班級長凌駕于規章制度之上，因為，他們就相當于規章制度，一個班級長不會去告發另一個班級長。但是，我認為不告發那位班級長，只把別的學生記下來是不公平的。于是，我干脆把記下的名單撕掉，一個也沒有報告。

在最后一年中，發生了一件事情，這對我來說就像是一顆彗星從天空劃過一樣。快到年底的時候有人通知我們，偉大的科薩詩人庫魯尼·木卡伊要來這所學院參觀。木卡伊實際上是一個贊美歌手、歷史講解員，他用詩歌贊美當代的大事和歷史。這對他的人民具有特殊的意義。

學院為他的到來專門放了一天假。在指定的那個上午，學院里的全體人員，包括黑人和白人教職員工，都集中在餐廳里。這里也是我們舉行全院大會的地方。餐廳里的一頭有個臺子，從這里經過一道門就可以直接走到威靈頓博士的房子里。門本身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但是，我們把它看作威靈頓博士的象征，因為除了威靈頓博士本人，誰也沒有走過這道門。

忽然，這道門開了，走出來的不是威靈頓博士，而是一個身著民族豹皮服裝、頭戴豹皮帽子、手握木柄標槍的人。威靈頓博士一會兒也跟了出來。但看到穿部落服裝的黑人從那道門通過，我身上就像觸了電一樣。這對我們的沖擊是很難說清的。宇宙似乎被翻了個個兒。當木卡伊緊挨著威靈頓博士在主席臺上就座的時候，我幾乎無法控制我的興奮之情。

但是，當木卡伊站起來講話的時候，坦白地說我感覺很失望。他在我們的心目中早就形成了一種形象。根據我的想象，像木卡伊這樣的科薩民族英雄，應該身材魁梧、儀表堂堂，臉上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但是，他實際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除了服裝外，似乎完全與普通人一樣。當他用科薩語講話時，他的語速很慢，時講時停，常常停下來搜尋適當的詞匯。當找到適當的詞匯時，他又一遍一遍地加以重復。

當講到一個重要問題時，他會舉起他的標槍以示強調。不巧的是，標槍一下子戳在了他頭頂上方懸掛臺幕的金屬絲上，造成了一陣嘩啦嘩啦的響聲，懸在上面的臺幕也在不住地擺動。詩人看了看他的標槍尖，又向上看了看那根金屬絲，然后陷入了深思，并在主席臺上來回走動。幾分鐘后，他停住了腳步，面對著我們又來了精神。他為剛才的偶然事件而感嘆。“標槍戳金屬絲象征非洲文化與歐洲文化之間的沖突。”他提高了嗓門說，“標槍代表非洲歷史上的英雄和真理，它是非洲人作為戰士的標志，也是非洲人作為藝術家的標志。這根金屬絲，”他指著上面說，“是西方制造的標志，它包含著技術，但卻冷冰冰的，聰明而沒有靈魂。”

“我要說的，”他繼續往下講，“并不是一塊骨頭觸及一塊金屬，或者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的重疊，我要說的是土生土長的、好的東西與外國的、壞的東西之間的撞擊。我們不能容忍這些不關心我們的文化的外國人搶走我們的國家。我預測，有一天，非洲社會的力量將會戰勝入侵者。我們屈服于這些白人假上帝已經太久了。但是，我們將擺脫這些外國雜種。”

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威靈頓博士和其他白人在場的情況下談這些敏感的問題，這種膽量真是讓我們吃驚。同時，他也喚醒和激發了我們，讓我們開始改變對威靈頓這樣的人的認識。我原來一直認為他們是我們的恩人。

木卡伊然后開始背誦他的著名詩篇。在詩中，他把天上的星星比喻成世界上的各個民族。這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他在主席臺上慢慢地走來走去，用標槍指著天對歐洲人說——法國人、德國人還有英國人——“我給了你們銀河這個最大的天體，因為你們是稀奇古怪的人。你們充滿著貪婪和嫉妒，你們貪得無厭。”他把一些星星分給亞洲人、南美洲人和北美洲人。然后，他討論非洲，并把非洲大陸分成許多個國家，把特定的天體分給非洲不同的部落。他一直在主席臺上手舞足蹈，揮舞著標槍，轉換著說話的腔調。然后他忽然安靜下來，并壓低了說話的聲音。

“現在，科薩人你們過來，”他邊說邊低下身子并單膝跪倒，“因為你們是自豪而強大的人民，所以我給你們一顆最重要、最超凡的星——晨星，它是計算成年男子年歲的星。”當他說最后一句話的時候，他深深地低下頭。我們站起來，一邊鼓掌一邊歡呼，我不想停止鼓掌和歡呼。此時此刻，我感到那么自豪。我并不是作為一個非洲人而自豪，而是作為一個科薩人而自豪。我感覺自己好像是杰出人民的一員。

木卡伊的表演使我激動，同時也使我困惑。他從民族解放和包羅萬象的非洲統一這個大題目講到范圍比較小的，即我就是其中一員的科薩民族的問題。當我在希爾德頓的學習生活快要結束的時候，我的腦海里有許多新的、有時相互矛盾的問題。我開始明白，各部落的非洲人有許多相似的地方，盡管此時偉大的木卡伊在高度贊揚科薩人；我看到了一個非洲人與一個白人站在一起的可能，但我仍然在努力尋找白人帶來的好處，而這常常需要屈從。從某種意義上說，木卡伊在焦點問題上的轉變就是我自己心情的一面鏡子。因為，我自己也處在為自己是一個科薩人而自豪和與其他非洲人血緣關系相近的感受之間前后徘徊。但是，當我年底離開希爾德頓的時候，我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科薩人，其次才是一個非洲人。

7...

直到1960年，位于希爾德頓以東大約20英里的艾麗斯市的福特黑爾大學仍然是南非高學歷黑人的唯一聚集中心。福特黑爾不僅是來自南部、中部和西部非洲學者的燈塔，而且對于像我這樣的南非黑人青年而言，也是一所與牛津、劍橋、哈佛和耶魯一樣著名的大學。

攝政王急于讓我去福特黑爾大學讀書，我也很高興去那里深造。在我去福特黑爾大學之前，攝政王給我買了一套服裝，這是我自己擁有的第一套雙排扣灰色服裝。穿上它讓我感覺長大了許多，也成熟了許多。那時我21歲，還無法想象福特黑爾大學的學生有誰能比我穿得時髦。

我感覺自己是世界上的佼佼者。令我高興的是，攝政王也將會有一位具有大學學位的親屬。佳士提斯仍然在希爾德頓學院攻讀初等文憑。他喜歡玩，不怎么喜歡學習，他是一個滿不在乎的學生。

福特黑爾大學是1916年由蘇格蘭傳教士在東開普要塞遺址上建立起來的，這里曾經是19世紀最大的要塞。它建造在巖石平臺上，丘脈河像護城河一樣在它附近流過。福特黑爾位置優越，使英國人能夠與英勇的科薩王山迪勒作戰。山迪勒是拉哈貝王朝最后一個國王，他在19世紀最后一次要塞戰役中被英國人擊敗。

福特黑爾大學只有150名學生，我當時已經知道，其中有十來個學生來自克拉基伯雷和希爾德頓。我第一次見面的K. D.馬嘆茲瑪就是其中的一個。盡管按照部落血統，他是我的侄子，但是我比他小，也遠不如他老練。他個頭高大修長，并且特別自信。他是三年級學生，對我關心愛護有加，而我就像尊重佳士提斯那樣尊重他。

我們兩人都屬于衛理公會，我被安排與他住在一起。這個住所叫韋斯雷旅社，是一所漂亮的兩層樓房，位于大學附近。在他的引領下，我同他一起去拉夫迪附近的一個教堂做禮拜，并開始跟著他踢足球（他是英式足球高手）。對于他的意見，我都認真聽取。攝政王一般不給在學校讀書的孩子們寄錢，如果不是馬嘆茲瑪的資助，我衣袋里只會是空無一文。和攝政王一樣，他知道我將來要成為薩巴塔國王的參事，因此他建議我學習法律。

福特黑爾大學同克拉基伯雷和希爾德頓一樣，也是一所教會學校。我們要接受勸善教育，要服從上帝，要尊敬政府官員，并感謝教會和政府給我們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機會。這些學校，由于政治態度和實踐都有殖民主義傾向，因此經常受到批評。即使有這些短處，我也認為它們給我們帶來的益處更多一些。當政府不同意或不能開辦學校的時候，教會卻為我們開辦和經營學校。盡管教會學校常常在精神上要求很嚴格，但是，其學習環境比種族歧視盛行的官辦學校要開放得多。

福特黑爾大學既是非洲大陸一些知名的偉大的非洲學者的家園，也是他們的搖籃，Z. K.馬修斯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礦工的兒子，深受布克·華盛頓自傳《從奴隸到總統》（Up from Slavery）的影響。這本書宣揚通過努力和中庸之道獲得成功。他教授社會人類學和非洲法律，并公開反對政府的社會政策。

在德育方面，福特黑爾大學深受D. D. T.佳巴福教授的影響。在這所大學于1916年開辦時，他是第一位員工。佳巴福教授被倫敦大學授予英文學士學位，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奇跡。佳巴福教授教科薩文，也教拉丁文、歷史和人類學。當講起科薩譜系學的時候，他簡直就是一本活的百科全書。他告訴了我一些我從來就不知道的關于我父親的事情。他也是一位非洲人權代言人，1936年，他成為“全非大會”的第一任主席。該組織一直反對關于終止開普普選權的立法。

記得有一次我從福特黑爾乘火車去烏姆塔塔，坐在非洲人專用車廂里。這是唯一一節向黑人賣票的車廂。一個白人檢票員過來檢票，當發現我是從艾麗斯上的車的時候，他說：“你也是佳巴福教授那個大學的學生嗎？”我點頭說是。這個檢票員立即高興地給我檢了票，并喃喃地說：“佳巴福是個好人。”

在第一年，我學習英文、人類學、政治、土著管理學和羅馬－荷蘭法。土著管理學是研究有關非洲人法律的一門學科。如果有人想到土著事務部門去工作，他就必須要學習這門學科。盡管馬嘆茲瑪一直在勸我學習法律，但是，我卻決心要當一名土著事務部門的翻譯或公務員。那時候，當一名公務員對于一個非洲人來說是一件特別榮耀的事，也是一個黑人能夠渴望得到的最高職位。在鄉下，行政長官辦公室里的一名翻譯，被認為只比行政長官低一級。第二年，福特黑爾大學開設了翻譯專業，由提亞姆扎西授課。提亞姆扎西是一位從法院退休的著名翻譯。我成了這個專業的第一批學生之一。

福特黑爾大學堪稱是一個精英薈萃的地方。和許多高等學府一樣，它也存在一些共性的問題。例如，高年級的學生往往對低年級的學生傲慢無禮。當我第一次來到這個校園的時候，我在中心大院碰到了卡馬利爾·法巴薩。他比我大幾歲，在克拉基伯雷上學的時候，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我熱情地向他打招呼，但是，他對我卻很冷淡、很傲慢。他有些看不起地對我說，我將住在新生宿舍。然后他告訴我，他盡管是我們宿舍的委員會組成人員，但是，作為一個高年級的學生，他不再與別的同學住一個宿舍。我認為這件事很奇怪，也不民主。但是，這卻是必須面對的現實。

一天晚上，我們一伙學生議論起宿舍委員會里沒有新生代表的問題。我們決定要擺脫傳統做法，選出由兩組學生組成的宿舍委員會。我們舉行了討論會，讓所有住在那個宿舍里的學生都參加。只用了幾周，我們就擊敗了高年級的學生，選出了我們自己的宿舍委員會。我本人是組織者之一，也被選進了這個新組成的委員會。

但是，高年級的學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他們召集開會，會上，一個名叫萊克斯·塔塔尼的學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語說：“新生的這種行為是無法讓人接受的。我們高年級的學生怎么能夠被曼德拉這樣幾乎連英語都講不好的鄉下落后的新生推翻呢！”然后，他模仿我的說話方式，讓我聽起來帶有濃重的嘎萊卡口音，他的同伙對此捧腹大笑。塔塔尼的輕蔑講話使我們更加堅定了決心。我們新生組成了正式的宿舍委員會，反過來分配高年級的學生去干他們最不愿干的工作。當然，這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很丟面子的事。

大學的學監A. J.庫克牧師知道了這場爭端，他把我們召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們認為理在我們一邊，因此不準備屈服。塔塔尼呼吁學監推翻我們的意見，說著說著，他還停下來擦眼抹淚。學監要求我們改變立場，但是我們沒有屈服。像多數恃強凌弱的人一樣，塔塔尼也有脆弱的一面。我們告訴學監，如果不采納我們的意見，我們將全體退出宿舍委員會，使宿舍委員會本身失去完整性和權威性。最后，學監決定不再干預這件事。我們堅持自己的堅定立場并取得了勝利。這是我與當局之間展開的第一次交鋒，我感受到了公理、正義的力量。但在以后與大學當局的交鋒中，我就沒有那么幸運了。

我在福特黑爾所受的教育是室外、室內相結合的教育。我比在希爾德頓時更熱愛體育。這有兩個原因：我的個子更高了，我的體格也更強壯了；但更重要的是，福特黑爾大學比希爾德頓學院小得多，所以我的競爭者很少。我有能力參加足球和越野賽跑。越野賽跑對我的教育很有幫助，在越野賽跑中，訓練比固有的能力更重要，我可以通過勤奮和自律彌補自己的天賦不足。我把這種思想運用到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作為一個學生，我發現許多青年人雖然天資聰明，但卻沒有充分發揮其天賦的自律能力和韌勁。

我還參加了戲劇社，并曾在一個關于亞伯拉罕·林肯的戲劇中參與演出。這個戲劇是我的同學林肯·木肯塔尼改編的。木肯塔尼出生于特蘭斯凱地區的一個著名家庭，他是又一個我所仰視的人。“仰視”也是字面意義上的事實，因為他在福特黑爾大學是唯一比我個子高的學生。木肯塔尼扮演他的同名人，而我扮演約翰·威爾克斯·布斯，即林肯的刺客。木肯塔尼對于林肯的塑造是莊嚴而正統的。他背誦了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講中最精彩的一段，贏得了經久不息的熱烈歡呼。我扮演的是一個小角色，盡管我是這個戲的寓意的載體，說明冒大險的人常常需要承擔大的責任。

我成了學生基督教協會的成員，并負責禮拜天在附近的村子里講《圣經》。和我共同負責此事的是一位理科學生。我是在足球場上認識他的，他來自特蘭斯凱地區的旁多蘭，名叫奧利佛·塔博。我從一開始就認為他的才能很高，是一位思路敏捷的雄辯家。他不愿意接受我們許多人自覺自愿接受的陳詞濫調。奧利佛住在博達豪爾，這是一個英國教徒開辦的旅館，雖然我在福特黑爾大學與他接觸不多，但是可以看出，他將來一定會有大出息。

有時，我們一伙禮拜天步行到艾麗斯城內的某個餐館去吃飯。餐館是白人開的，那些年月，一個黑人直接從前門進入餐館是不可想象的，在里面吃飯的黑人就更少。然而，我們卻傾盡所有，圍著廚房吃了一圈，想吃什么就要什么。

我在福特黑爾大學不僅學習物理等科學知識，而且還學習交際舞。對著餐廳內的一臺音調嘶啞的破留聲機，我們花好幾個小時練習狐步和華爾茲。我們每人都輪流跳男步和女步。我們的偶像是維克多·西爾維斯特，他是交際舞世界冠軍。我們的教練員是一位同學，名叫司馬利·西萬德拉，他后來成了交誼舞高手。

在一個鄰近的村子里，有一個非洲人舞廳，名叫恩彩拉曼茲。它迎合了當地黑人社會的需求，但對在校學習的學生來說卻是個禁地。但是，一天晚上，由于急于找女舞伴練習舞步，我穿上衣服溜出了宿舍，直奔那個舞廳而去。那是一個豪華的地方，我感覺很新奇。我看見對面有一位可愛的女士，于是就請她跳舞。一會兒，她就投入了我的懷抱。我們一起跳得很默契，我能想象我當時的舞姿是多么的神氣。幾分鐘后，我詢問起她的名姓。“鮑克韋太太。”她溫柔地說。我幾乎要把她丟在現場快速離去。我朝對面望去，發現了勞斯伯瑞·鮑克韋先生。他是當時最受人尊敬的非洲領袖和學者之一。他當時正在那里和他的內弟、我的教授Z. K.馬修斯閑聊。我向鮑克韋太太表示歉意，然后在鮑克韋和馬修斯教授的目光下靦腆地把她護送到一邊。我真想鉆入地下，我違反了許多條校規。但是，在福特黑爾大學負責紀律的馬修斯教授從來沒有批評過我。他認為，只要你努力學習，就是令人高興的事，他就能容忍。自從恩彩拉曼茲那個夜晚之后，我學習更加努力了。

福特黑爾大學的特點在于它的復雜程度，無論是從學術方面還是社會方面，對我來說都是新鮮而驚奇的。按照西方標準，福特黑爾大學的開放程度可能不怎么樣。但是對于像我這樣一個來自鄉下的青年，它已經夠開放了。我第一次穿睡衣，開始感覺不舒服，但慢慢地習慣了。我以前從來沒用過牙刷和牙膏，在家里，我們用灰把牙齒擦白，用牙簽清潔牙齒。連沖水廁所和洗熱水澡對我來說也是新鮮事。我開始使用香皂，而在家里，多年來我一直使用藍色的清洗劑。

可能是由于這些不熟悉的事情，我十分想念我在孩提時代就熟悉的一些簡單的娛樂活動。有這種感情的并不是只有我一個。我參加了一個探險小組，晚上秘密到學校的農場去探險。在那里，我們點起篝火烤玉米吃。我們坐在篝火周圍，邊吃玉米，邊講荒誕不經的故事。我們這樣并不是因為饑餓，而是出于重新捕捉那些對我們來說最有鄉間趣味的一種需要。我們有膽識，有健美的體格，吹噓我們畢業后將掙多少多少錢。盡管我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青年，但是，實際上我仍然是一個迷戀鄉間樂趣的鄉下男孩。

在福特黑爾大學與世界隔絕的同時，我們則熱心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展情況。和我的同學們一樣，我是大不列顛的熱心支持者，并且，當我知道在我大學第一學期期末典禮上講話的那個人將成為英國駐南非的大律師的時候，我特別高興。他名叫揚·史末資，是南非前總理。福特黑爾大學以主人身份招待他，并把他擁戴為世界政治家，這是莫大的榮譽。當總理J. B.赫索格主張中立的時候，后來成了副總理的史末資，正在全國發動南非向德國宣戰的運動。我非常渴望親眼看到像史末資這樣的世界領袖。

三年前，當赫索格發起運動取消開普非洲人的投票選舉權的時候，我發現史末資對非洲人表示同情。我更關心的是，他幫助建立了“國際聯盟”，在世界上倡導民主，而不是在國內壓制自由。

史末資講了支持大不列顛向德國宣戰的意義，以及英國主張的西方價值思想——我們作為南非人也同樣主張。我記得，他的英語口音幾乎與我的英語口音一樣糟糕！我同我的同學們一起衷心地為他歡呼，擁護他關于為自由而戰的號召，而忘記了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還沒有自由。

史末資在福特黑爾大學對那些改變信仰的人傳教。每天晚上，住在韋斯雷旅館里的學監都要分析歐洲的軍事形勢。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會簇擁在一臺老式收音機旁，收聽BBC廣播電臺播放的溫斯頓·丘吉爾富有鼓動性的講話。盡管我們支持史末資的立場，但是，他的來訪也引發了許多爭論。在一次討論會上，我的一個同齡人，名叫尼亞提·康基薩，雖然被認為是一個特別聰明的學生，但他卻譴責史末資是一個種族歧視主義者。他說，我們可以考慮考慮我們這些“黑色英國人”自己，英國人企圖使我們文明化的同時也在壓迫我們。他說，荷裔南非人與英國南非人之間不管相互如何對立，但是，兩個白人集團總是會團結起來對付黑人的威脅。康基薩的觀點使我們很吃驚，他似乎是個危險的極端分子。一個同學低聲對我說，尼亞提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我模模糊糊聽說過非洲人國民大會這個組織，但知之甚少。隨著南非向德國宣戰，赫索格辭了職，史末資成了總理。

在福特黑爾大學學習的第二年，我邀請我的朋友保羅·馬哈巴內與我一起去特蘭斯凱過寒假。保羅來自布隆方丹，由于他父親扎丘斯·馬哈巴內牧師的原因而在福特黑爾大學很出名。他父親曾經兩次出任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他與這個組織有聯系，因而得到了一個叛逆者的罪名。當時，我對這個組織并不怎么了解。

在寒假期間的一天，保羅和我去了特蘭斯凱的首府——烏姆塔塔。當時，烏姆塔塔只有幾條大街和一些政府建筑物。我們站在郵局的外面，這時當地的行政長官——一位60多歲的白人走到保羅面前，讓保羅到郵局里面為他買幾張郵票。任何白人讓任何黑人去為自己辦事，這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事。行政長官說著就想給保羅錢，但是，保羅并沒有要。這位行政長官很生氣。“你知道我是誰嗎？”他的臉漲得紅紅地說。“沒有必要問你是誰，”馬哈巴內說，“我知道你是誰。”行政長官問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說你是個無賴！”行政長官大怒，說：“你要為此付出大的代價！”然后就走了。

我對保羅的行為感到很不舒服。我佩服他的勇氣，但也認為他這是惹是生非。行政長官很熟悉我，如果他讓我而不是讓保羅去辦這件事，我會老實地照他的吩咐去做，并把這件事忘掉。但是，我欽佩保羅的所作所為，盡管我自己還不能也這樣做。我開始認識到，一個黑人并非必須接受每天被白人強加在身上的侮辱。

寒假過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早早返回了學校。我感覺到自己更加有力量，并且感覺什么東西都變新了。我努力學習，一直到10月份考試。在這一年的時間里，我想我將成為一位有大學學位的學生，就像格特魯德·恩特拉巴提一樣。我認為大學學位不僅是做官的通行證，也是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條件。校長亞歷山大·克爾、佳巴福和馬修斯教授一直一遍一遍地教導我們，作為福特黑爾大學畢業的學生，我們是非洲的精英。我相信，世界將在我的腳下展開。

作為一名大學畢業生，我最終能使我母親重新得到財富和榮譽。這些財富和榮譽是她在我父親去世后失去的。我將在庫努為她建造一所像樣的房子，并配備花園和現代家具。我將支援她和我的姐妹們，以使她們買得起這么長時間買不起的東西。這就是我的夢想，它似乎是我能夠實現的夢想。

那一年，我被提名為“學生代表委員會”的候選人，學生代表委員會在福特黑爾是最高的學生組織。當時，我不知道圍繞選舉競爭將制造許多麻煩，而這些麻煩又將改變我的命運。學生代表委員會選舉在那年的年末舉行。當時，我們正在準備期末考試。按照福特黑爾大學的章程，從全體學生中選出6名學生代表委員會委員。選舉前不久，學校召開了全體學生大會，討論有關問題并讓大家發表意見。學生們一致認為福特黑爾大學伙食不能令人滿意，并且學生代表委員會的權力應當增加，以便讓它在學校管理中不只是一個橡皮圖章。我同意這兩個動議。如果學校當局不接受我們的要求，學生將投票聯合抵制這次選舉。我同他們一起參加了投票。

這次大會后不久，預定的投票選舉開始了。多數學生都抵制選舉，但是25個學生（約為全體學生的1/6）參加了投票，并選出了6位學生代表委員會的委員，其中也包括我本人。同一天，6位當選的委員碰頭討論選舉中出現的問題。我們一致決定集體辭職，因為我們支持聯合抵制選舉并且也沒得到多數學生的投票支持。然后，我們起草了一封辭職信，并交給了克爾博士。

但是，克爾博士很聰明。他收下了我們的辭職信，然后通知第二天晚飯時在餐廳舉行新的選舉。這將確保讓所有的同學都參加選舉，以避免產生借口，說學生代表委員會沒有得到全體學生的支持。那天晚上，選舉按照校長的要求如期舉行。但是，同樣只有那25個學生投了票，同樣還是那6個學生當選學生代表委員會委員。似乎一切還是老樣子。

正是這個時候，我們6個人召開了碰頭會，討論我們應該采取的立場。投票差異很大，其他5位當選人堅持：我們是在全體學生中當選的。我認為事實上沒有什么變化。盡管全體學生都在選舉現場，但是多數人并沒有投票，說我們擁有他們的信任從道理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一開始的目標是聯合抵制選舉，這是全體學生一致贊成采取的行動，我們應該仍然堅持那個決定，不能被校方的某些詭計所蒙蔽。我沒能說服我的那5位當選伙伴，只好第二次辭職，我是6位當選的學生中唯一第二次辭職的。

第二天，我被校長召了去。克爾博士是愛丁堡大學的畢業生，實際上他也是福特黑爾大學的創始人，是個很受尊重的人。他嚴肅地回顧了過去幾天內所發生的事情，然后讓我重新考慮我的辭職決定。我告訴他我不能重新考慮。他讓我晚上睡覺時再仔細考慮考慮，第二天告訴他我的最后決定。但是，他警告說，他絕不允許他的學生不負責任，并說，如果我堅持辭職，他將只好把我開除出福特黑爾大學。

他說的話使我震驚，并使我度過了一個不安的夜晚。以前我從來沒有作過如此沉重的決定。那天晚上，我咨詢了我的朋友兼輔導老師K. D.馬嘆茲瑪。他認為，作為一個原則問題，我辭職是正確的，不應該屈服。當時我覺得，我相信K. D.馬嘆茲瑪勝過相信克爾博士。于是我謝別K. D.馬嘆茲瑪，回到了宿舍。

盡管我認為我所做的在道理上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仍然拿不準我的辭職正確與否。難道是我正在為一個無關緊要而抽象的原則毀掉我的大學生涯嗎？我發現把堅持自己的私利而犧牲自己看作是對學生們負責的原則是難以接受的一種想法。我打定主意，不能在我的同學們眼里當孬種。同時，我也不想放棄我在福特黑爾大學的學業。

第二天上午我去克爾博士辦公室的時候，我仍然處于難下決定的心態。直到他問我是否作出了決定時，我才真的拿定了主意。我告訴他我決心已定，我無法問心無愧地為學生代表委員會服務。克爾博士似乎對我的回答有點吃驚。他沉思了一會兒，然后說：“很好。當然，那是你的決定，我也對這個問題再考慮考慮。我建議，如果你參加學生代表委員會，明年你可以再回到福特黑爾大學繼續讀書。曼德拉，你有一整個夏天的時間考慮這件事。”

正如克爾博士一樣，我對自己的回答也感到有些意外。我也知道離開福特黑爾大學是魯莽的。但是，我需要折中的時候卻又無法折中，似乎我身上有一種什么東西不讓我搞折中。我在感激克爾博士的立場和愿意再給我一次考慮機會的同時，也非常憤恨他決定我命運的絕對權力。如果我愿意，我應該有退出學生代表委員會的權利。這個不公正的處理痛苦地留在了我的記憶里。這時我才明白，克爾博士不是一個大救星，而是一個并非總是和藹可親的獨裁者。那年年末我離開福特黑爾大學的時候，我心里充滿了被遺棄的痛苦感覺。

8...

我通常總是懷著愉快的心情回到穆克孜韋尼，但這次則不然。考過試并回到家后，我把學校里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攝政王。他很生氣，他無法理解我的做法，認為我的做法完全沒有意義。甚至沒聽我解釋完，他就不客氣地告訴我，要服從校長的指示，秋天返回福特黑爾大學。他的語氣沒有商量的余地。如果我與我的資助人發生爭論，那將是沒有道理的，也是對他的不尊重。所以，我決定暫時往后放放這件事。

佳士提斯也回到了穆克孜韋尼，我們彼此相見非常高興。不管佳士提斯和我分別多久，連接我們的兄弟情義是不會改變的。佳士提斯去年離開了學校，現在住在開普敦。

幾天內，我恢復了在家里的傳統生活。我給攝政王料理事情，包括他的牛群以及與其他酋長的關系。我沒有細想在福特黑爾大學的情況，但是，生活總有辦法強迫那些猶豫不決的人作出決斷。那完全是與我必須要干的事——學習——沒有關系的事情。

回家幾周后，攝政王把佳士提斯和我叫到他面前。“我的孩子，”他用很嚴肅的語氣說，“我恐怕在這個世界上活不了幾年了，在我去見祖先前，我有責任看著我的兩個兒子結婚。當然，我已經為你們兄弟兩人安排好了婚事。”

他的這番話讓我們兩人感到很突然，佳士提斯和我懷著一種擔心而無助的心情彼此看著對方。攝政王說，兩位女孩出生于很好的家庭。佳士提斯要迎娶著名的泰姆布貴族安卡利巴的女兒，而豪利沙沙（攝政王總是這樣稱呼我），將迎娶當地泰姆布牧師的女兒。他說，婚禮要馬上舉行。彩禮通常以牛的形式由新郎的父親辦理，對于佳士提斯來說，部落將為他置備彩禮，而我則由攝政王親自置辦。

佳士提斯和我都沒說什么。這不是我們向攝政王提問題的地方，而且，只要他關心，問題就定了。攝政王不允許討論：新娘已經選好了，彩禮也置備齊了，事情最后就這么定了。

佳士提斯和我低著頭從攝政王那里走出來，心里感到茫然而沮喪。攝政王是按照泰姆布的法律和風俗習慣辦的，他的動機也是無可非議的，他要求我們在他有生之年都安頓下來。我們以前認為攝政王有權為我們安排婚姻大事，但是現在，這不再是絕對的了。兩位新娘并不特別出眾，據我們所知，她們不過是有血有肉的女流之輩而已。

盡管我對女方家庭十分尊重，但是，如果說攝政王為我選擇的新娘就是我夢想中的伴侶，那也不是事實。她的家庭是顯赫而令人尊重的，她那種特有的尊嚴也是很有魅力的。但是，這位小姐恐怕早就愛上了佳士提斯，可攝政王對此卻不會知道。因為，父母很少知道他們子女愛情的浪漫的一面。毫無疑問，對于與我成婚，我的那位已經選定的伴侶也不會比我更熱切。

那時候，我在社會方面比政治方面更超前。在我還沒有考慮反對白人的政治制度的時候，就做好了反對我們自己人民的社會制度的準備。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間接地也是攝政王自己的過失，因為正是他出錢讓我們接受的教育才使我們背叛這種傳統的社會制度。我與女士們一起在中學和大學里待了好幾年，難免有一點點風流韻事。我是浪漫的，我不準備讓任何人，甚至攝政王，為我選擇伴侶。

我與王后——攝政王夫人，定了一個君子之約，那就是把我的婚姻大事托付給她。我不能告訴她無論如何不讓攝政王為我選擇新娘，因為她當然不會同意。我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告訴她我想在她的親戚中選擇一位我認為理想的伴侶。這個姑娘確實很漂亮，但我不知道她對我印象如何。我說，我一完成學業就立即娶她。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個騙局，但總比攝政王的主意要好。雖然王后在這個問題上同我站在一起，但是攝政王并沒有被說服。他已經作出了決定，并且不會改變這個決定。

我認為好像他不給我選擇的余地，但我不能接受這樁婚事。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也是欠考慮的。同時我也認為，如果我拒絕了攝政王為我安排的這樁婚事，我將無法再在他的庇護下生活。佳士提斯也同意我的看法，我們倆認為唯一的選擇就是溜之大吉，而且，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約翰內斯堡。

回想起這件事，我認為我們當時并不是沒有更好的選擇，我們可以設法通過中間人與攝政王商量，也許通過商量就使這個問題在我們部落和家庭的范圍內得以解決。我可以去請求攝政王的堂兄孜林德勞佛酋長，他是穆克孜韋尼內閣最開明、最有影響的酋長。但是，我太年輕、太急躁，沒有看到耐心等待的好處，一味認為逃走似乎是唯一的辦法。

我們在保守秘密的同時制訂出了詳細的逃跑方案。首先，我們需要機會。攝政王認為佳士提斯和我在一起會出亂子，至少佳士提斯喜歡冒險和狂歡會對我比較保守的立場產生影響。因此，他想方設法盡量不讓我們在一起。當攝政王打算出游的時候，他一般都讓我們其中一人跟隨，這樣當他不在宮內的時候，我們就無法在一起。他更多的是帶著佳士提斯，因為他喜歡讓我留在穆克孜韋尼照料他的事情。但是，我們得知攝政王準備外出一個禮拜，去參加特蘭斯凱立法大會，這次我們兩個他誰也不帶，我們認為這是逃走的最理想的機會。我們決定，攝政王一動身去開會我們就去約翰內斯堡。

我沒有什么衣服，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裝進一個箱子里。攝政王禮拜一一早就走了。我們準備接近中午的時候再動身。但是，正當我們準備要走的時候，沒想到他又回來了。我們看見他的車開進了王宮，就立刻跑進了花園，并藏在玉米秸中。攝政王一進屋就問：“兩個孩子上哪里去了？”有人回答說：“啊，他們就在附近。”但是，攝政王有些懷疑，對這個回答并不滿意。他說他回來是因為忘記帶瀉鹽了，他四處觀察了一會兒，然后似乎還滿意。我想他可能有某種預感，因為他可以在城里很容易地買到瀉鹽，當他的車消失在群山之中的時候，我們也上了路。

我們倆都幾乎沒有錢，但是，那天上午我們去了當地的一個商人那里，說好把攝政王的兩頭牛賣給他。那位商人認為是攝政王吩咐我們來賣牛的，我們也沒有糾正他的錯誤想法。他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價錢。我們用賣牛的錢租車去了當地的火車站。我們打算從那里乘火車去約翰內斯堡。

一切似乎進行得很順利。但是，我們不知道攝政王已經駕車來過火車站，并告訴車站經理，如果有兩個青年人來買去約翰內斯堡的車票，一定不要賣給他們，因為他不允許他們離開特蘭斯凱。我們到了火車站，發現那位經理說什么也不賣給我們票。我們問他為什么，他說：“你們的父親來過這里，說你們想跑。”我們大吃一驚，趕緊回到我們租的那輛車上，告訴司機把我們送到下一個車站。下一個車站距離這個站大約50英里，我們用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達那里。

我們好不容易才上了車。但這趟車最遠到昆斯敦。在20世紀40年代，一個黑人外出旅行是件很復雜的事情。所有滿16歲的非洲人必須有土著事務局頒發的“土著人通行證”，要求遇到白人警察、公務員或雇工老板都要出示這種通行證。不出示通行證就會被逮捕，送上法庭，判處監禁或罰款。通行證上記有持證人的住址、酋長姓名，是否繳納了人頭稅等。當時，這種人頭稅只向非洲人征收。后來，這種通行證變成了小冊子，即“身份證”。據悉，這種身份證記錄了持有人的詳細資料，并且每月必須由持有人的雇工老板簽字。

佳士提斯和我都已辦好通行證。但是，一個非洲人要離開原屬地到另一個地區去工作或居住，還需要有旅行文件，即此人的雇工老板（像我們這樣的就需要監護人）出具的許可證或許可函，而這些我們都沒有。就是這些文件都有，警察也可能因為其中有的文件沒簽字或日期不對找你的碴兒。如果根本沒有這些文件，那就很危險。我們的計劃是在昆斯敦下車，然后去一家親戚那里辦理這些文件。這也是一個欠考慮的計劃，不過幸運的是我們在昆斯敦遇見了穆旁多比尼酋長。他是攝政王的一個弟弟，對佳士提斯和我都很好。

穆旁多比尼酋長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我們說明了需要當地行政長官簽發的旅行文件，并編造我們需要這些文件的原因，謊稱我們出來是為攝政王辦事的。穆旁多比尼是從土著事務局退休的翻譯，與行政長官很熟悉。他沒有理由懷疑我所說的話。他不但領著我們去找行政長官，而且還為我們擔保，并說明我們所遇到的困難。行政長官聽了酋長的說明后，馬上為我們辦理了所需要的文件，并加蓋了公章。佳士提斯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滿意地笑了。但是，正當行政長官準備把這些文件遞到我們手上的時候，他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說：作為禮節，應當告知烏姆塔塔的行政長官，我們認為這件事是在他的管轄范圍內。他的話讓我們很不安，但是我們仍然安坐在他的辦公室里。行政長官用他的電話與烏姆塔塔的行政長官取得了聯系。糟糕的是，攝政王正在拜訪烏姆塔塔行政長官，此時他正坐在行政長官的辦公室里。

當昆斯敦的行政長官把我們兩人的情況告訴了烏姆塔塔的行政長官時，烏姆塔塔的行政長官似乎說：“啊，他們的父親正好在這里！”然后讓攝政王接了電話。當昆斯敦行政長官把我們的請求告訴攝政王時，攝政王勃然大怒。“把兩個孩子抓起來！”他高聲說，足以讓我們通過話筒聽見他的聲音，“把他們抓起來，然后立即把他們送回來！”行政長官放下電話，對我們很生氣。“你們兩個是小偷，并且撒謊。”他對我們說，“你們企圖欺騙我，現在我要把你們抓起來。”

我立即站起來為我們辯解。通過在福特黑爾學習，我懂一點法律，這回派上了用場。我說，我們向你們說謊是事實，但是我們并沒有違反法律，你們不能僅僅依據攝政王的建議就逮捕我們，何況他又正好是我們的父親。這位行政長官作了讓步，沒有逮捕我們。但他讓我們離開他的辦公室，并且不允許我們再登他辦公室的門。

穆旁多比尼酋長也很氣憤，他也不再管我們的閑事。佳士提斯想起在昆斯敦有一位朋友，名叫西德尼·恩克蘇，在白人律師事務所工作。我們去找此人，把我們的情況告訴了他。他對我們說，他為之打工的那個白人的母親正打算開車去約翰內斯堡，他問問看，是否能讓我們搭個便車。隨后，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付15英鎊，他母親就讓我們搭她的車。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價錢，比買火車票貴得多。搭車費讓我們掏空了腰包，但是又沒有別的辦法。我們決定冒險，到約翰內斯堡后再辦理有效的旅行文件。

第二天一早，我們動身去約翰內斯堡。在那些日子里，如果白人開車，按照習慣，黑人必須在后排就座。我們兩人也是按照這樣的方式就座的。佳士提斯坐在那位女士的身后。佳士提斯是個友好而精力充沛的人，他一落座就和我閑聊起來，這使那個老太太感到很不舒服。她顯然從來沒有同一個對白人毫不在乎的黑人在一起待過。行駛幾公里后，她吩咐佳士提斯同我換換座位，這樣她就可以監視他。在剩余的路途中，她就像鷹一樣監視著他。但是，一會兒，佳士提斯的魅力在她身上起了作用，她竟然偶爾被他的話逗得大笑。

那天晚上，大約10點鐘，我們發現前面燈光閃爍。迷人的燈光似乎向四面八方放射開來。對我來說，電總是神奇而奢侈的，而這里卻是電的世界、燈的海洋。看到從孩提時代就聽說過的這座城市，我特別激動。約翰內斯堡一直被描繪成夢幻般的城市。這是一個充滿危險和機會的城市，在這里，一個貧窮的農民可以變成富有的財主。我想起了巴納巴基在割禮訓練期間講過的一個又一個故事：那里的樓房高得讓你看不到樓頂，那里的人講的語言是你從來沒有聽過的語言，那里到處都是豪華的汽車、漂亮的女人和橫沖直撞的魔鬼。這是一座黃金之都，我很快就要在這里安家落戶！

在城市的近郊，交通越來越擁擠。我從來沒有看到過路上同時有那么多汽車。即使是烏姆塔塔，充其量也不過有幾輛汽車，而這里卻有成千上萬輛。我們繞城環行，而沒有直接進城。但是，我能隱約看見那一片一片的高樓大廈，在昏暗的夜空中顯得更加昏暗。在路上，我看見巨大的廣告牌上展示著香煙、糖和啤酒廣告。所有這一切，似乎特別地富有魅力。

很快，我們來到了大片的豪宅區，即使最小的豪宅也比攝政王的王宮大。豪宅前都有草坪和高大的鐵門。我們開車進入其中一所豪宅的停車道，這里是老太太的女兒居住的地方。佳士提斯和我被安排在傭人居住的偏房，我們將在那里住一宿。向老人道謝之后，我們就進入了房間，躺在地板上休息。但是，約翰內斯堡的繁榮讓我如此激動，我感覺仿佛自己那天晚上是在漂亮的羽毛褥墊上睡的覺。希望似乎是無限的，此時的我就像是經過長長的跋涉到達了終點。但事實上，這只是在更長更長的旅途中邁出的第一步，它將以我當時沒有想象到的方式繼續考驗我。

# 第二部 約翰內斯堡

9...

當我們到達克朗金礦辦公室的時候，已經是黎明了。克朗金礦位于約翰內斯堡附近的一個寂靜、昏暗的大山丘平原上。約翰內斯堡是由于威特沃特斯蘭德發現金礦于1886年建立起來的一座黃金城市，而克朗金礦則是這座黃金城市中最大的金礦。我本想能在這里看見像烏姆塔塔市內的政府大廈那樣的大樓，但克朗金礦的辦公室卻原來是建在金礦前面的銹跡斑斑的鐵皮房子。

金礦并沒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光禿禿、坑坑洼洼，到處是污泥垢土，但就是沒有樹，四周圍著籬笆墻。金礦就像是經過戰爭破壞過的戰場，到處是刺耳的噪音：有軸式卷揚機的摩擦聲，有電鉆的沖擊聲，有發電機的轟鳴聲，有下達命令的吼叫聲。所見之處，到處是身穿工作服、看上去疲憊不堪、壓彎了腰的黑人。他們住的是凄涼陰冷、單一性別的簡陋房，房子里有幾百個水泥床，彼此相隔只有幾英寸。

在威特沃特斯蘭德，采金的成本很高，這是因為礦石的含金量低、礦井深。只有成千上萬工作時間長、收入低、無人權可言的廉價黑人勞力的存在，才能使白人擁有的、建筑于黑人脊背之上的礦業公司有利可圖，掘取比克羅伊斯（Croesus，公元前6世紀呂底亞最后一代國王，以財富聞名）還要富有的財富。以前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企業、這樣大的機器、這樣得法的組織、這樣辛苦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南非的資本主義。我知道，我即將接受一種全新的教育。

我們直接去找工頭。皮利索是一個粗暴的老工頭，依靠他的冷酷無情謀生。他知道佳士提斯，因為攝政王幾個月前曾寫過一封信，要求為他安排一個管理工作。這種工作在金礦上是最令人羨慕、最受人尊重的工作。但他不了解我。佳士提斯解釋說，我是他的弟弟。

“我只接受佳士提斯，”皮利索回答說，“你父親的信沒有提你弟弟的事。”他十分懷疑地看著我。但佳士提斯請求說，那僅僅是個疏忽，攝政王對我的事也發過信。皮利索那無情的外表之下也隱藏著有同情心的一面，于是，他讓我擔任金礦上的保安，并說，如果干得好，三個月后將給我安排一份管理工作。

攝政王的話在克朗金礦很有分量。在南非，所有的酋長都是如此。采礦官員都想從農村招募勞工，各個酋長對他們所需要的人都有控制權。他們需要酋長們鼓勵自己的老百姓來礦脈做苦工。酋長的待遇與普通人大不相同。當他們來金礦參觀時，礦主總是提供特別優厚的吃住條件。酋長的一封信足以使一個人得到一份好工作。由于我們的關系，佳士提斯和我受到特別照顧。我們工作沒有定額，我們被安排了較好的睡覺的地方，并且有少量的工資。第一天晚上，我們沒有住簡陋的鐵皮房。出于對攝政王的尊重，皮利索邀請佳士提斯和我與他住在一起。

許多礦工，特別是那些來自泰姆布蘭的礦工，拿佳士提斯像酋長一樣對待，他們用現金作為禮物歡迎他。當酋長來參觀時，這通常是一種慣例。這些人多數都住在同一個住所，礦工們通常是按部落隔離安排住處。礦主這樣安排是為了防止不同部落為了共同的不滿情緒而團結在一起，因此有利于管理。但隔離安排住處也常常會導致不同部落、不同氏族之間發生派系爭斗。對于這種爭斗，礦主沒有刻意地加以防止。

佳士提斯把他得到的禮物也分給我一些，并且作為獎金另給我一點額外的英鎊。開始那幾天，我們的口袋里總是叮當響著新的有錢人通常有的那種硬幣碰擊聲。我感覺自己就好像成了一個百萬富翁。我開始覺得我是一個幸運的孩子，幸運之光就在我身上閃耀，如果我們不是在大學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說不定我們真的已經成了百萬富翁！我又一次看到，命運把我拋棄了。

很快，我作為一名值夜班的金礦保安開始工作。礦上給我發了一身保安服、一雙皮靴、一頂鋼盔、一個手電筒、一個哨子和一根圓頭木棒。這是一種一端有大圓球的木棒。工作很簡單：站在寫著“注意，土著人從這里穿行”的警示牌的礦井入口，檢查每個從這里出入的人是否有通行證。開始幾天，我在礦上巡查并未發現任何事故隱患。然而，有一天深夜，我確實逮住了一位喝醉了酒的礦工。但是，他溫順地出示了通行證，然后就回了他的住所。

由于讓成功沖昏了頭腦，佳士提斯和我向我們在家就認識的一位朋友吹噓起了我們的聰明，這個人也在這個金礦上工作。我們對他說，我們如何逃出王宮，如何欺騙攝政王等。盡管我們讓那人為我們保密，但是，他卻直接去找那位工頭告了密。一天以后，皮利索召見了我們。他問佳士提斯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攝政王批準你弟弟出來工作的證明在哪里？”佳士提斯說他對此事已經作了說明，攝政王已經寄了證明信。皮利索并沒有由于他的回答而態度有所緩和。我們感覺似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從寫字臺里拿出了一封電報。“我與攝政王已經取得了聯系。”他用嚴肅的口氣說，并把電報遞給了我們。電報上說：“立即把兩個孩子送回家。”

然后，皮利索對我們大為惱火，罵我們向他撒謊，說我們濫用他的熱情和攝政王的好名聲。他告訴我們，他準備在礦工中集資，買火車票把我們送回特蘭斯凱。佳士提斯反對回家，并說，我們僅僅是要在礦上工作，我們能自己做主。但是，皮利索根本不予理睬。我們感覺很丟面子，也感到受了侮辱。于是，我們離開了他的辦公室，但下定決心不回特蘭斯凱。

我們很快想出了另一個主意，去找A. B.埃克蘇瑪醫生。他是攝政王的一個老朋友，也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埃克蘇瑪醫生來自特蘭斯凱，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醫生。

埃克蘇瑪醫生見到我們很高興，并非常熱情地向我們打聽穆克孜韋尼家鄉的情況。我們告訴他許多有關我們來約翰內斯堡的半真半假的情況，并說很想在金礦上找個工作。埃克蘇瑪醫生說他愿意幫助我們，并馬上給金礦協會的維爾比拉伍德先生打了電話。金礦協會是代表礦主的很有權威的組織，專門管理礦工雇用事務。埃克蘇瑪醫生告訴維爾比拉伍德先生，我們是如何如何優秀，他應該給我們找個地方。我們謝別了埃克蘇瑪醫生，馬上去找維爾比拉伍德先生。

維爾比拉伍德先生是一個白人，他的辦公室比我見過的任何辦公室都氣派。他的寫字臺似乎有足球場那么大。我們在一位名叫費斯特爾的金礦老板的陪同下見到了他。我們把說給埃克蘇瑪醫生的原話又向他復述了一遍，維爾比拉伍德先生對我說的來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繼續深造但并非完全是事實的理由印象很深。“好吧，小伙子們，”他說，“我將介紹你們去與克朗金礦的經理皮利索聯系，我告訴他給你們安排個管理工作。”他說他與皮利索在一起工作了30年，在這么長的時間里，皮利索從來沒有對他不忠過。佳士提斯和我聽后感覺局促不安，但是并沒有說什么。盡管有些擔心，但我們幼稚地認為，我們現在比皮利索占優勢，因為我們有他的上司維爾比拉伍德為我們撐腰。

我們又回到了克朗金礦辦公室。由于我們遞交了維爾比拉伍德的信，那里的一位白人經理對我們很客氣。就在這時，皮利索從辦公室門前經過，他一眼看見了我們，于是氣勢洶洶地走了進來。“你們這兩個青年人！你們又回來了！”他生氣地說，“你們在這里干什么？”

佳士提斯很鎮定。“我們是維爾比拉伍德先生派來的。”他回答說，語氣中帶有一點挑釁的味道。皮利索先生考慮了一會兒。“你告訴他你們是背著父親偷著跑出來的了嗎？”皮利索反問道。佳士提斯沒有吭聲。

“你們不用指望在我管理的金礦上找到工作！”他吼叫著說，“現在，你們給我走遠點！”佳士提斯揮舞了一下維爾比拉伍德先生的信。“我不在乎這封信！”皮利索說。我觀察那位白人經理，希望他能管管皮利索。但是，他卻像雕塑一樣在那里不吭聲，似乎像我們一樣膽怯。我們拿皮利索毫無辦法，只好乖乖地離開那個辦公室，感覺比第一次還要沮喪。

我們的時運開始逆轉：沒有工作，沒有希望，也沒有地方住。佳士提斯在約翰內斯堡認識各種各樣的人，他進城為我們尋找居住的地方。與此同時，我提著我們的行李箱，打算隨后在約翰內斯堡南面的小城鎮喬治高詩與他碰頭。

我請求在老家就認識的一位名叫比基沙的人幫我把箱子提到前門，有一位保安把我們擋在門口，說是要搜查一下箱子。比基沙不同意，說箱子里沒有犯法的東西。保安說搜查是例行公事。他草率地搜查了一下箱子，連里面的衣服都沒有翻動。比基沙是個高傲的人，當保安正準備蓋上箱子的時候，他說：“你為什么找這個麻煩？我告訴你，里面沒有什么犯法的東西。”這句話激怒了保安，他決定仔細檢查箱子里的東西。當他搜查箱子里的每個角落并搜查每個衣服口袋的時候，我越來越緊張。他一直翻到了箱子底，找到了我不希望他找到的那件東西：裹在我的衣服里面的那把左輪連發手槍。

他轉身對比基沙說：“你被捕了。”然后，他吹響了哨子，哨音喚來了一群保安。當他們把他帶往當地警察局的時候，比基沙用擔心而困惑的神情看著我。我與他們保持一段距離，跟在他們后面考慮對策。老式左輪連發手槍是我父親的遺物，是他臨死前留給我的，我從來沒有用過。但是，為了防身，我把它帶在身上來到了這座城市。

我不能讓朋友承擔罪名，在他們進了警察局不久，我就進去要找負責此事的警察官。我被帶到了一個警察官面前，盡量直截了當地坦承：“先生，在我朋友的箱子里發現的那支槍是我的。它是在特蘭斯凱從我父親那里傳給我的。我把它帶到這里，是怕遇上強盜。”我向他們解釋說，我是福特黑爾大學的學生，我僅僅是暫時住在約翰內斯堡。警察官隨著我的解釋也和氣了一點，他說，他將馬上釋放我的朋友。并說，盡管他不逮捕我，但是因為我擁有槍支，必須把我送上法庭。需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禮拜一上午去法庭應訴。我很感激他，告訴他我禮拜一上午一定去法庭。那天上午我真的去了，在法庭上我只收到了一張象征性的罰單。

與此同時，我也作出了安排，準備去喬治高詩鎮，住在我的堂哥戈利克·穆貝基尼家。他是一個賣衣服的小商販，只有一間盒子大小的小房子。他友好而熱情，到了那里不久，我就把我準備當一名律師的真實愿望告訴了他。他稱贊我有志氣，并說他將對我說的話認真加以考慮。

幾天后，戈利克告訴我，他準備帶我去見“約翰內斯堡一個最好的人”。我們乘坐去市場大街的汽車來到了一個財產代理公司。市場大街是一個人口密度大、玩耍娛樂地方多的去處。這里的每條街道都有滿載旅客的有軌電車和布滿攤販的人行道，讓人感覺財富就在每一個角落。

那時的約翰內斯堡既是一個新開發的城市，又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屠夫就在辦公大樓臨近的大街上賣肉，擁擠的商店附近到處都是帳篷，高聳入云的大樓旁邊晾曬著女士們洗好的衣物。工業由于戰爭而得到振興。1939年，南非作為一個英聯邦的成員國曾向納粹德國宣戰，農村為戰爭輸送人力和物力。勞工們的需求量很大，約翰內斯堡成了吸引非洲人從農村到城市尋找工作的“磁鐵”。我在約翰內斯堡的1941年到1946年之間，這座城市里的非洲人成倍地增加。每天早晨，人們會感覺這座城市又比昨天擴大了一圈。男士們在非歐洲化城鎮上尋找工作和住處。這些城鎮包括紐克萊爾、喬治高詩、亞歷山大、索菲亞頓和西部土著人鄉鎮。數千個火柴盒式的房子像監獄般建造在光禿禿的土地上。

戈利克和我坐在財產代理公司的會客廳里，一位可愛的黑人招待員向辦公室里面的老板報告了我們的到來。報告完此事之后，她那靈巧的手指開始隨著打印信函在鍵盤上來回舞動。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非洲人打字員，見到女性黑人打字員的機會就更少。在我參觀過的烏姆塔塔和福特黑爾為數不多的政府部門和貿易公司里，打字員總是白人和男士。我之所以對這位年輕女士印象特別深，是因為那些白人男打字員只能用兩個慢慢移動的手指打字。

她很快讓我們進了辦公室，在那里我被介紹給一位男士。此人看上去有30多歲，長著一張聰明、善良、表情豐富的臉。他身穿一件雙排扣的上衣，盡管年齡不大，但在我看來卻很老練。他也是特蘭斯凱人，但他卻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通過人來人往的會客廳和寫字臺上堆著厚厚的材料判斷，他是一個忙忙碌碌、事業有成的男士。不過，他并沒有草率地應付我，似乎對我的到來由衷地感興趣。他名叫瓦爾特·西蘇陸。

西蘇陸的辦公室專門配備了非洲辦公用具，在20世紀40年代，仍然有一些地區允許非洲人購買不動產。非洲人購買的小農場大多坐落在像亞歷山大和索菲亞頓這樣的地方。非洲人連續幾代都在其中一些地方擁有自己的家。其余的非洲人則居住在城市，城市里有許多火柴盒式房子，住戶需要向約翰內斯堡市政廳繳納租金。

西蘇陸由于既是商人又是當地的領導人而出名，他已經是社團的代表人物。在我敘述我在福特黑爾遇到的困難、準備當律師的決心和想在南非大學注冊以便通過函授教育取得學位的過程中，他一直認認真真地傾聽。由于疏忽，我沒有告訴他我到約翰內斯堡的情況。當我說完后，他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沉思我所講的事情。然后，他看了看我說，他的同事中有一個白人律師，名叫拉澤·希代爾斯基，并稱贊他是一位高雅而進步的人。他說，希代爾斯基對非洲教育很熱心，他將與他談談，讓我當他的合同雇員。

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英語嫻熟和生意成功都是獲得高學歷的直接結果。我推斷，西蘇陸事業有成，他當然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但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在我們離開西蘇陸的辦公室后，我堂兄告訴我，西蘇陸從來沒有通過標準六級教育考試。在約翰內斯堡，我必須忘卻從福特黑爾大學得到的這個教訓。我一直接受這樣的教育：取得文科學士學位就意味著當官，要想當官就必須有文科學士學位。但是，在約翰內斯堡，我發現許多杰出的官員根本就沒上過大學。即便是我學完文科學士學位所要求的全部英語課程，我的英語流利水平和口才也比不上我在約翰內斯堡遇見的許多從來沒有獲得學歷畢業證的人。

與堂兄一起住了短短的一段時間后，我準備搬到圣公會教堂的J.馬布托牧師家里去住。他家位于亞歷山大鎮第八大街。馬布托牧師是泰姆布人，也是我家的朋友。他是一個慷慨、信奉上帝的人。他的夫人（我通常稱她高誥），是一位熱情好客而樂意幫助別人的人，她也是一位高級廚師。作為一個對我家庭很熟悉的泰姆布人，馬布托牧師認為有責任幫助我。他經常對我說：“我們的祖先教導我們，有福共享，有難同當。”

但我還是沒有從克朗金礦的經歷中吸取教訓，因為我沒有把我離開特蘭斯凱的情況告訴馬布托牧師。搬到馬布托牧師家中不久，有一位客人來拜訪馬布托牧師，我陪著他們喝茶。不湊巧的是，來客正是金礦協會的費斯特爾先生。當佳士提斯和我去找維爾比拉伍德先生的時候，費斯特爾一直在場。費斯特爾先生和我以彼此相識的方式相互打了招呼。盡管我們沒提上次見面的事，但第二天，馬布托牧師就把我叫到一邊，明確告訴我，我不能再在他家住下去了。

我埋怨自己沒有把全部真實情況告訴他。我變得如此習慣于說謊，甚至不需要說謊的時候也說謊。我相信，如果我事先把全部真實情況告訴他，他肯定不會介意。但是，他從費斯特爾那里知道了我的情況后，他感覺上當受騙了。在約翰內斯堡短暫的逗留期間，我說了一路的謊話，而每次說謊最終都會給我帶來苦果。當時，我認為沒有別的辦法，因為我膽小且沒有經驗。我知道，我還沒有在新的生活中邁出正確的一步。在這種情況下，馬布托牧師可憐我，于是又給我找了一個居住的地方，讓我與他的鄰居庫瑪住在一起。

庫瑪先生是亞歷山大很少的擁有土地的黑人精英之一。他的家在第七大街46號。房子很小，特別是他有6個孩子，房子就更顯得狹小。房子雖小但很溫馨，不但有一個圓形房子，而且房子前還有一個微型菜園。為了勉強度日，庫瑪先生像許多亞歷山大居民一樣，只好向外租賃住房。他在房子后面建了一個薄頂房，比棚子好不了多少，地面又臟又亂，沒有取暖設施、沒有電、沒有自來水，但是它卻是我自己的一個小天地。有這樣一個小房子住，我已經感到心滿意足了。

同時，在瓦爾特先生的推薦下，拉澤·希代爾斯基同意我取得文科學士學位時聘用我。“維特金－希代爾斯基－埃代爾曼”三人公司是約翰內斯堡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受理黑人和白人的訴訟案子。除了學習法律和通過一定水平的考試之外，為了在南非成為一個合格的律師，還必須經過幾年的學徒生涯，這種學徒叫供職約定。但是，為了能獲得供職約定，我必須首先取得文科學士學位。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在南非大學讀函授。這是一種很受歡迎的教育形式，人們可以通過函授獲得學歷證書和學位。

除了受理常規訴訟案子之外，該律師事務所還向非洲訴訟委托人提供財產交易方面的法律服務。瓦爾特給這個律師事務所介紹了許多需要財產抵押的訴訟委托人，律師事務所將受理他們的貸款申請，然后收取代理費。這種代理費需要分給非洲財產代理公司。事實上，律師事務所拿大頭，剩下的一小部分留給非洲財產代理公司。黑人只能拿到一點零頭作報酬，并且別無選擇。

就是這樣，該律師事務所也比其他絕大多數律師事務所自由得多。這是一家猶太人開辦的事務所。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猶太人在種族和政治問題上比白人心胸寬闊得多。這可能是因為他們自己就是歷史上偏見的犧牲品。作為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之一，拉澤·希代爾斯基能接受一個非洲青年作為約定雇員，這在當時是沒有聽說過的新鮮事兒。這個事實也是該律師事務所更崇尚自由的一個證明。

希代爾斯基先生是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畢業生。我非常尊敬他，他對我也特別好。我到該事務所工作的時候，他只有35歲左右。他熱心于非洲教育，為非洲學校捐錢，有時免費服務。他身材修長，有尊嚴、有禮貌，留著整齊的八字胡。對我的事，他是真心實意地關心。他告訴我，教育對我個人和全體非洲人都非常重要，只有大規模地開展教育，我們的人民才能獲得自由。他認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不會遭受壓迫，因為他能夠自我思考。他一遍一遍地告訴我，成為一個成功的律師也就為非洲人樹立了成功的榜樣。這就是我應該走的最有價值的道路。

上班的第一天，我在辦公室里與該事務所的多數職員見了面，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高爾·瑞德貝的非洲雇員。我與高爾就在一個辦公室。高爾比我大十歲，他既是一個職員，又是翻譯和通信員。他個子不高，但肌肉發達，很結實。他能流利地講英語、索托語和祖魯語，并能用這些語言準確地表達自己。他很幽默，很有信心，也有很強的判斷能力和辯論能力。在約翰內斯堡的黑人社會里，他是一個著名的人物。

在律師事務所上班的第一天上午，一位年輕的白人秘書麗波曼女士把我拉到一邊說：“納爾遜，在這個律師事務所里沒有膚色隔閡。”一位服務生托著茶盤和杯子來到了前會客廳。她說：“為了你的到來，我們為你和高爾買了兩個新杯子，秘書負責給幾位主管端茶倒水，而你和高爾需要自己端，我們也都是自己端。當茶水來了的時候我會叫你們，然后你們可以拿你們的新茶杯。”她還讓我把這些話告訴高爾。對她的殷勤我很感激。但是我知道，她那么認真地提及“兩個新杯子”只不過就是她聲稱不存在膚色隔閡的一種證明。秘書們可以與兩個非洲人共同喝茶，但喝茶的杯子不能混用。

當我把秘書麗波曼的話轉告給高爾的時候，我注意到了他的表情變化，他說：“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樣，一種有害的思想進入了一個小孩的頭腦中。納爾遜，在喝茶的時候不要擔心，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11點鐘，麗波曼女士告訴我們茶水來了。秘書和其他職員面前都有了茶水，高爾走到茶盤前假裝沒有看見那兩個新杯子，而是從舊杯子中選了一個，緊接著大方地放入糖、牛奶，然后倒上茶水。他慢慢地攪動著杯子里的茶水，然后站在那里非常自我滿足地喝起來。麗波曼瞪大眼睛看了看高爾。此時高爾向我點了點頭，好像是說：“輪到你了，納爾遜。”

我困惑了一會兒，我既不想冒犯麗波曼，也不想疏遠我這位新同事。因此，我決定采取對我來說似乎是最謹慎的應對方式：我一點都不想喝茶，我不渴。當時我23歲，作為一個男子漢，作為一個約翰內斯堡的居民，作為一個有上百人律師事務所的雇員，我才剛剛獨立，我把中間道路看作最好、最理智的道路。從此之后，一到喝茶的時間，我總是獨自一人到事務所內的小廚房里去喝茶。

秘書也并非總想得那么周到。過了一段時間后，我在所里也更有經驗了。有一天，我正在向一位白人秘書口授情況，這時，這位秘書認識的一位白人訴訟委托人走進了辦公室，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為顯示她并不是在聽一個非洲人口授，她從錢包里掏出6個便士，傲慢地說：“納爾遜，出去到化妝品商店給我買些香波。”于是，我離開辦公室去給她買香波。

開始，我在律師事務所里干的都是些很基礎性的工作，既是一個法律職員，又是一個通信員。找資料、整理資料、資料歸檔，這都是我要干的活。后來，我又為非洲訴訟委托人起草合同。但是，不管活多么小，希代爾斯基先生總是向我說明為什么干和為什么讓我干。他是一個有耐心、寬厚待人的師長，不但努力向我傳授法律知識，而且還告訴我背后的道理。他的法律知識面很寬，因為他認為法律是可以用來改變社會的工具。

在希代爾斯基先生傳授他的法律觀點的時候，他警告我要抵制政治方面的影響。他說，政治會在人們中間產生壞的影響，政治是麻煩和腐敗的根源，應當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政治的影響。他認為，如果沾染上政治，我將有可能陷入可怕的境地。他忠告我，不要與他認為是制造麻煩和煽動是非的人在一起，特別是高爾·瑞德貝、瓦爾特·西蘇陸。希代爾斯基在尊重他們的才能的同時，也厭惡他們的政治傾向。

高爾的確是一個“制造麻煩的人”，這種表述恰如其分。他是一個在非洲社團內有影響的人，但對于其影響方式，希代爾斯基先生并不知道，或者說只是有點懷疑。他是西部土著人鎮上的咨詢委員會成員，該委員會是選舉產生的，由4位為了鎮上的問題出面與當局交涉的人組成。盡管權力不大，該委員會在土著人中卻有很高的威望。我很快知道，高爾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既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又是南非共產黨黨員。

高爾是個很有主心骨的人。他對我們的雇主并不客氣，常常因為幾位雇主對非洲人不公而譴責他們。他會說：“你們的人竊取了我們的土地，并奴役我們，現在你們又無情地剝削我們。”一天，我外出辦完事回來走進了希代爾斯基的辦公室，高爾轉身對他說：“看！你坐在這里和老爺一樣，而我們四處奔忙為你們辦事。這種局面應該倒過來，有一天是會倒過來的，我們將把你們趕進大海里去。”然后高爾離開了辦公室，希代爾斯基在那里沮喪地直搖頭。高爾雖然沒有文科學士學位，但他卻是比帶著閃光的學位離開福特黑爾大學的那些人水平還高的一個榜樣。這不僅表現在他接受知識快，也因為他勇敢而自信。盡管我有意為完成學業、獲取學位去法學院學習，但是，我從高爾那里得知，學位本身并不是晉升的保證，只有走出大學、融入社會中證明自己，學位才有價值。

在“維特金－希代爾斯基－埃代爾曼”律師事務所，我并不是唯一的約定職員。一個年齡與我差不多的人名叫耐特·布瑞格曼，他在我被錄用前不久才開始在該事務所工作。耐特聰明、友好、思路開闊，似乎完全“色盲”，可以說是我的第一個白人朋友。他模仿能力很強，可以逼真地模仿揚·史末資、富蘭克林·羅斯福、溫斯頓·丘吉爾的聲音。我經常見他對法律事務和辦公程序發表意見，并不知疲倦地幫助別人。

有一天吃午飯的時候，我們正坐在辦公室里，耐特掏出了一包三明治。他拿了一個三明治對我說：“納爾遜，拿著三明治的那一頭。”我不知他為什么讓我這樣做，但是，我餓了，因此決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好，掰一塊。”他說。于是我就掰了一塊，三明治變成了兩塊。“好吧，讓我們一起吃。”他對我說。在我嚼著三明治的時候，耐特說：“納爾遜，我們現在做的就象征著共產黨的理論——分享我的一切。”他告訴我他是一名共產黨員，并向我介紹了共產黨的基本知識。我知道高爾是共產黨黨員，但是他從來沒有向我介紹過共產黨的基本知識。那天我聽了耐特的話，后來，他在宣傳共產主義優越性的時候試圖勸我加入共產黨。我聽出他的意思，也提問了問題，但是并沒有參加。我不想參加任何政治組織，希代爾斯基的忠告還在我的耳邊縈繞。我對宗教相當執著，共產黨對宗教的立場使我對它敬而遠之。不過，我很感激那半塊三明治。

我喜歡與耐特在一起，我們經常到外面走走，其中包括去聽演講和參加共產黨的會議。我出去參加這些活動，主要是出于知識分子的好奇心。我越來越了解我們國家種族壓迫的歷史，并且把南非的斗爭看成是純粹的種族斗爭。但是，共產黨則是通過階級斗爭的透鏡觀察南非問題，他們認為是有沒有壓迫的問題。這個理論激發了我的興趣和好奇心，但我又覺得這種理論與今天的南非似乎沒有特別的關系。它可能適用于德國、英國或俄國，但對我所了解的這個國家似乎不適用。即便如此，我仍然去聽、去學這些東西。

耐特邀請我參加了幾次聚會，那里各種人混雜在一起，白人、非洲人、印度人，也有有色人。這些聚會是由共產黨組織的，多數參加者都是共產黨員。我記得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時自己心里有些擔心，主要是因為沒有適當的服裝。在福特黑爾大學，我們接受的教育是，參加任何社會活動都要系領帶、穿正規衣服。盡管我的衣柜里的衣服極其有限，但我還是設法找到了一條領帶去參加聚會。

我發現了一群有生氣且喜歡群居的人，他們似乎根本不在乎膚色。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各色人種混雜在一起的聚會。我與其說是一位參加聚會者，倒不如說是一位觀望者。我感到羞澀，擔心出現什么差錯，不習慣參加海闊天空、情緒激昂的對話。與我周圍發表成熟見解的人相比，我的思想似乎還沒有開化。

那天晚上，通過別人介紹，我認識了邁克爾·哈邁爾先生。我聽說他是羅德斯大學畢業的英文碩士。我對他的這一學位印象尤其深刻，但到我見到他的時候，心中卻在犯嘀咕：“這個人有碩士學位，竟然沒有打領帶！”對于這個認識上的矛盾，我無法理解。后來，邁克爾和我成了好朋友。我開始佩服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幫我拋棄了極其愚蠢的舊思想。他不僅是一個卓越的作家，也是一個執著的共產主義者，盡管他能夠享受很富有的生活，但是，他卻堅持與非洲人相同的生活方式。

10...

亞歷山大的生活是愉快的，也是令人感到不穩定的。那里的氣氛活躍，那里的精神富有冒險性，那里的人民足智多謀。盡管那里的城鎮也有個別漂亮的建筑，但是公正地說，那里可以用“貧民窟”、“當局對那里的生活漠不關心”來描述。那里的道路什么也沒鋪，臟亂不堪，饑餓、營養不良的兒童半裸著身子四處亂跑。空氣中混合著濃濃的、從馬口鐵火盆里和爐灶里冒出的煤煙。幾戶人家共用一個水龍頭，從路旁流下匯聚而成的一攤攤死水蛆滿為患，散發著惡臭。由于根本沒有電，亞歷山大被認為是一座“黑暗城鎮”。夜間步行回家非常危險，因為沒有燈光。寂靜偶爾被喊叫聲、狂笑聲和槍聲打破。這種黑暗與特蘭斯凱的黑暗完全不同，那里的黑暗似乎是把一個人包裹在歡迎的懷抱里。

城鎮區擁擠得令人絕望，每平方英尺土地不是被搖搖欲墜的房子占據，就是被鐵皮屋子充斥。在特別差的地方，邪惡暴力經常發生。生命在這里是廉價的，夜里經常發生動刀動槍的暴力事件。這里身帶彈簧刀的強盜很多，也很出名，當地人把這些強盜稱作“曹次司”（tsotsis，歹徒）。那個年月，他們模仿美國電影明星，頭戴淺頂呢帽，身穿雙排扣上衣，系著寬而華麗的領帶。在亞歷山大，警察出警是生活中的一大特點。警察經常大量地抓人，因為那里的人行施暴力，擁有烈性酒，也不繳納人頭稅。幾乎每個角落里都有鐵皮屋地下酒吧、非法沙龍，這些地方都出售自釀啤酒。

盡管亞歷山大的生活像地獄，但是，這里也是個致富之地。作為南非為數不多的非洲人可以積累私有財產的地區之一，他們可以在此經營自己的產業。在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市政管理當局磕頭。亞歷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見證了我們的人民沖破當地的約束、成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歷程。為了讓非洲人生活在農村或在礦上打工，白人政府堅持認為非洲人本質上就是農村人，不適合城市生活。亞歷山大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它卻戳穿了這種無恥的謊言。其居民來自各個非洲部落，完全適應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識。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間和種族之間的隔閡，我們不是科薩人、索托人、祖魯人或山杠人，我們是亞歷山大人。這種生活創造的團結意識，在白人當局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白人政府在處理非洲人的時候總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和依靠人民中的種族分裂勢力。但是在亞歷山大這樣的地方，這些差別是不存在的。

亞歷山大在我心中占據著重要位置，因為這是我離家之后居住的第一個地方。盡管后來我居住在索韋托地區的奧蘭多，而且居住的時間遠比居住在亞歷山大的時間長，但是，我總是這樣看，雖然在亞歷山大沒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卻是自己的家，而奧蘭多雖然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卻不是自己的家。

在亞歷山大的第一年，我比在庫努生活的孩提時代更加了解貧窮的含義。我似乎從來就沒有錢，我想方設法依靠各種生活資源生存。律師事務所每周付給我2英鎊，其中包括合同約定職員一般要付給律師事務所的一大塊學徒費。在每周2英鎊的收入中，作為房費，我每月支付庫瑪先生13先令4便士；來往亞歷山大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是只供非洲人乘坐的“土著人巴士”，每月要支付1英鎊10便士，這用去了我收入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為了通過函授完成學業，我還要支付南非大學的各種學習費用；另外大約1英鎊是生活費。薪金的一部分還要購買更重要的物品——蠟燭，沒有蠟燭我就無法學習。我買不起一盞煤油燈，蠟燭陪伴著我每天苦讀到深夜。

顯然，每個月我都要差幾便士。為了節省車費，每月有幾天我要早晨走6英里去城里上班，晚上再走6英里回家。我常常餓著肚子度過一天又一天，衣服也無錢更換。有一次，希代爾斯基先生把他的一身舊衣服給了我，他與我一般高。衣服縫了又縫、補了又補，五年中我幾乎天天穿著它，到后來，那套衣服到處是補丁摞補丁。

一天下午，我乘巴士回亞歷山大，與一個年齡和我差不多的人坐在一起。他是那種喜歡穿美國電影中強盜穿的服裝的青年人。我發現我的衣服剛剛觸及他的衣服邊，他就看到了，于是他非常在乎地動了動身，使我的衣服不再靠在他的衣服上。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動作，想起來有點可笑，但當時卻令人痛心。

幫助窮人是沒有什么好說的，但是，幫助窮人常常是真實友情的孵化器。當有錢的時候，許多人都會向你表示友好，但是，當你貧窮的時候，則很少有人與你交往。如果財富是一塊吸鐵石，那么貧窮就是一個排斥器。貧窮也常常會引起別人的同情。一天早晨，為了省錢，我決定步行去城里上班。在路上認出了一位年輕女士，她是我在福特黑爾大學的同學，名叫皮利斯·馬賽庫。她在大街的同一側向我走來。我由于穿得太破而不好意思見她，因此想橫過大街，希望她認不出我。但是，我聽她喊“納爾遜……納爾遜”！我停住了腳步，并轉身走上前去，假裝這時才認出了她。她見到我很高興，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么寒磣。“納爾遜，”她說，“這是我的地址，奧蘭多東234號，請你到我家里去玩。”我決心不再自己羞辱自己，但有一天我需要正常地吃一頓飯，于是就來到了她的家里。她沒有因為我貧窮而小看我，從那以后，我經常去看她。

我的房東庫瑪并不富裕，但是，他是一位慈善家。每個禮拜天，我往往一整天都在挨餓，他和他的夫人總是為我提供免費午餐。那些蒸豬肉和蔬菜常常是我一周能吃上的唯一一頓熱飯。不管我在哪里或做什么，禮拜天我決不會不到庫瑪先生家。其余時間，我都是靠面包維持生活。有時候，所里的秘書們也會給我帶些吃的。

那時候我很落后，貧窮和鄉土習慣有時會鬧出笑話。有一天，我搬到庫瑪先生家里時間不長，我走在從約翰內斯堡回家的路上，十分饑餓。我已經節余了一點錢，決定揮霍一次，買點鮮肉。我好久沒有吃到肉了。因為周圍沒有正規的屠宰肉店，于是我走進了一家熟食店。這是我來到約翰內斯堡之后才看到的一種商店，透過玻璃，我看見一大塊令人饞涎欲滴的肉。我叫站在柜臺后面的一位先生給切了一塊。他把肉包好遞給了我。我拿著那塊肉，抱著有一頓美餐等著我的夢想直奔家中而去。

當我回到亞歷山大我的房間的時候，我招呼房東的小女兒。她只有7歲，但她是一個聰明的小女孩。我對她說：“你把這塊肉拿去讓你姐姐幫我做熟好嗎？”我看她想笑，但又控制著沒笑出來。因為她十分尊敬長者。我感覺有些不對勁，于是問她是否有什么差錯。她乖乖地說：“這塊肉是熟的。”我問她說什么，她解釋說我買的是一塊火腿，可以直接吃。這對我完全是一件新鮮事。我沒有承認自己完全無知，告訴她我知道那是一塊做熟了的火腿，但我想熱一下。她知道我是在不懂裝懂，便跑著離開了我。那塊肉好吃極了。

在亞歷山大，我與生性活潑的愛倫·恩卡彬德續上了舊。我在希爾德頓讀書時就認識她，這時她正在亞歷山大的一所學校里教書。事實上，愛倫和我已經墜入了愛河。在希爾德頓，我對她只是稍有了解。直到在亞歷山大我們重逢的時候，我們之間的愛情種子才開始綻開花朵。那時，我與她在一起的空閑時間太少了，談情說愛很困難：我們周圍總是有那么多人，幾乎沒有適合談戀愛的地方。我們唯一能單獨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外面的露天場所，因此，愛倫和我只好在亞歷山大城內的草地上或小山上走一走。我們大多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當時間允許的時候，我們也有可能搞一次野炊。

愛倫是斯威士人，盡管城內的部落觀念越來越淡薄，但是，我的一位朋友卻說我們之間的關系純粹是建立在部落基礎上的關系，我明確反對這種觀點。但是，我們的不同背景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馬布托太太對愛倫不感興趣，主要因為她是斯威士人。有一天，我正在馬布托家里，馬布托太太聽見有人叫門。是愛倫，她正在找我。但馬布托太太卻說我不在。后來她才對我說：“哼！納爾遜，有位姑娘曾經來這里找你。”然后馬布托太太問我：“那個姑娘是山杠人吧？”盡管山杠人是名門望族，但是在當時，山杠人是個貶義詞。我對此很生氣，說：“不，她不是山杠人，她是斯威士人。”馬布托太太堅持認為我應該找個科薩姑娘。

這個勸告并沒有阻止住我。我喜歡愛倫、尊敬愛倫。我認為，不聽這個勸告倒是有點紳士風度。這種關系對我來說是新鮮的，與一位非科薩姑娘交往使我感覺自己很有膽識。我年輕，在城里無依無靠，愛倫不但擔當了我的浪漫伴侶的角色，而且還擔負起母親般的責任。她支持我，給我信心、力量和希望。但是，幾個月后，愛倫就搬走了，我們痛苦地相互失去了聯系。

庫瑪先生有5個女兒，每個都十分可愛。最令人喜愛的是他的那個名叫迪迪的女兒。迪迪和我差不多大，她多數時間都在約翰內斯堡郊外的白人區里做家政服務。我剛剛搬進她家的時候，很少能見到她。但是，后來當我對她熟悉了的時候，我也愛上了她。但是迪迪對我卻不屑一顧，原因是我只有一套補丁外衣和一件臟襯衣，形象與一個流浪漢沒有什么兩樣。

迪迪每周末都返回亞歷山大，總是在一位年輕小伙子的陪同下回家。我估計送她回家的那個年輕小伙子是她的男朋友，他帥氣而又有錢，還有汽車，這是很少見的。他身穿昂貴的美國式雙排扣服裝，頭上戴著寬邊帽子，很注意外表。他可能干過強盜，對此我不敢肯定。他站在房子外面的院子里，雙手插在西裝背心的衣袋里，顯得很神氣。他客氣地與我打招呼，但能看得出來，他并沒有把我看作他的情敵。

我渴望告訴迪迪我愛她，但是我又害怕她不認真對待我的求愛。我幾乎算不上風流小伙兒，在女士面前有些靦腆。我不知道或不懂得浪漫，而別人似乎玩浪漫絲毫都不費勁。周末的時候，迪迪的母親有時讓迪迪給我送一盤食物，迪迪會端著盤子來到我的門口。她似乎只是盡快地完成她的差使，而我則盡量讓她多停留一會兒。我會問她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你在學校里達到了幾級水平？”我問她。她回答說五級。“你為什么不繼續上學？”我又問。她說上煩了。“你一定要回學校繼續上學，”我繼續說，“你與我年齡差不多，這個年齡重新回學校學習不會錯。不然，到老了的時候你會后悔的。你必須認真考慮考慮你的前途。你現在條件很好，年輕、漂亮，有很多人追求你，但是，你需要一個獨立的職業。”

我知道這些話并不是一個年輕男士向他愛上的年輕女士說的最浪漫的話，但是，我不知道另外再對她說些什么。她聽得很認真，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對我說的話感興趣，或者說，她是否認為她比我更優越。

我想向她求愛，但又不愿意這樣做，除非我確信她會答應我。盡管我愛她，但我不想讓她因為拒絕我而得到滿足。我想追求她，但又沒有勇氣和決心。搞戀愛不像搞政治，小心謹慎通常不是好事。我既沒有足夠的信心去想我能夠成功，也沒有足夠的勇氣去忍受萬一不成功而帶來的痛苦。

我在那個房子里大約住了一年，最終我也沒有表露我的這種情感。因為迪迪既沒有對她的那位男朋友不感興趣的任何表示，也沒有對我更有意的任何意思。我懷著對她的友誼和對她全家的熱情款待十分感激的心情告別了她和她的家人，隨后好多年沒有見到她。后來有一天，我在約翰內斯堡當律師的時候，有一位年輕女士和她母親走進了我的辦公室。那位年輕女士已經有了孩子，但她的男朋友仍然不愿意同她結婚，她想起訴她的那位男朋友。那位女士就是迪迪。只是當時她看上去有些憔悴，并且穿著一身褪了色的衣服。我看見她感到很難過，我想，事情怎么會是這樣的一種結局？最終，她沒有起訴她那位男朋友，從此之后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

盡管缺少浪漫，但我還是漸漸適應了城市生活，開始養成了一種自立感，相信自己能夠在我長大成人的這個世界上干出一番事業。我慢慢發現，我不必依靠我的王室關系或家庭支持去發展。我已經與那些不知道或不關心我與泰姆布王室有聯系的人建立起了關系。我有我自己的家，盡管我的這個家很簡陋，我要培養支撐自立所需要的自信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1941年年末，我接到攝政王準備訪問約翰內斯堡并想見我的信。我很緊張，但是我知道應該見他，而且我也確實想見他。他住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土著勞工協會總部大院。威特沃特斯蘭德土著勞工協會是一個沿礦脈招募礦工的辦事機構。

攝政王幾乎變成了另一個人，也可能是因為我的變化很大。他不再提我離家出走、福特黑爾大學和給我安排婚姻的事。他對我客氣又關心，以慈父的方式詢問了我的學習和未來的打算。他知道我的生活正在認認真真地開始，并且與他為我設想的完全不同。他沒有試圖勸我離開我自己要走的道路，他對我絕對信任，這使我十分感激。

我與攝政王的見面起到了雙重作用：我不但恢復了自我，同時也恢復了我對他和泰姆布王室的崇敬。我對我的舊親屬關系不再看得那么重要，這是我在一定程度上證明離家出走的正確性的一種姿態，它同時也緩解了我與我熱愛并看重的世界相隔離的痛苦。這是對我回到攝政王溫暖懷抱中的一種安慰。

在攝政王似乎對我很滿意的同時，他對佳士提斯卻很生氣。他說，佳士提斯必須回穆克孜韋尼。佳士提斯已經與一個年輕女士形成了戀愛關系，我知道他沒有回家的打算。攝政王走后，攝政王的一位大臣潘金達沃起訴了佳士提斯。當土著人特派員傳喚佳士提斯的時候，我答應幫助他。在聽證的時候，我指出，佳士提斯已經是成年人，他不必僅僅因為他父親讓他回去就回穆克孜韋尼。潘金達沃講話時，他沒有就我的主張予以反駁，只是指責我對攝政王不忠。他叫著我的氏族名字“馬迪巴”，這樣稱呼的目的是提醒我不要忘記自己的泰姆布血統。“馬迪巴，”他說，“攝政王關心你，供你上學，對你就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現在你卻讓他的親生兒子離開他。這是與你的監護人的意志相違背的，也是與他為佳士提斯鋪設的道路背道而馳的。”

潘金達沃的話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佳士提斯確實與我的命運不同，他是攝政王的兒子，將來有權繼承王位。聽了潘金達沃的這番話后，我告訴佳士提斯我的主意變了，我認為他應該回去。他對我的這個反應不理解，拒絕聽我的話，決心留下來。他一定是把我的勸告告訴了他的女朋友，因為從此之后她再也沒有理我。

1942年初，為了節約費用，并盡可能住得離約翰內斯堡市中心近一點，我從庫瑪家后面的那個小房子搬到了威特沃特斯蘭德土著勞工協會大院。我得到了金礦協會的費斯特爾先生的幫助，他在我的生活中又一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主動決定在金礦協會大院免費為我提供食宿。

威特沃特斯蘭德土著勞工協會大院是一個多種族、多語言社團，那里有索托人、茨瓦納人、文達人、祖魯人、佩迪人、山杠人、納米比亞人、莫桑比克人、斯威士人和科薩人。那里很少有人講英語，而是講混合語，也叫法納加洛語，是一種多種語言混雜而成的語言。在那里，我不僅看見種族之間的對立，而且看到不同背景的人也有可能聯合在一起。我仍然感覺不太適應，我不是在地下當礦工，而是在一個律師事務所學習和工作。在那里，我唯一的體力活動就是去外面辦事或整理資料。

威特沃特斯蘭德土著勞工協會大院是來訪酋長的落腳之地，因此，我能見到來自南非各地的部落首領。記得有一次，我見到了現在叫萊索托、過去叫巴蘇陀蘭的攝政王后曼彩博·摩什威士韋。王后由兩個酋長陪著，他們都認識薩巴塔的父親容欣利茲韋。我向他們請教了有關容欣利茲韋的事情，他們談了一個小時。在他們繪聲繪色地講述他早年的故事的時候，我似乎又回到了泰姆布蘭。

王后特別注意我，有時直接與我談話。不過，她講的是塞索托語，我只懂得只言片語。塞索托語是索托人和茨瓦納人的語言，他們中有一大批人住在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她用懷疑的目光看著我，然后用英語說：“你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懂，將來還當什么律師和領導人？”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使我很難堪，也使我清醒。它使我認識到自己目光短淺，沒有做好為自己的人民服務的準備，我自覺不自覺地屈服于白人政府鼓勵的種族區分，不知道如何同自己的親屬朋友講話。因為沒有語言就無法與人們交流，也就談不上理解他們；沒有語言，就不能共享他們的希望和理想，也不能掌握他們的歷史、欣賞他們的詩詞和歌曲。我又一次認識到，我們不是講不同語言的不同的人，我們是講不同語言的同一種人。

攝政王訪問約翰內斯堡之后不到6個月，佳士提斯和我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那是1942年的冬天。當我最后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身體很差，他的去世并不十分令人感到突然。我們是在報紙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的，因為發給佳士提斯的電報給丟失了。我們立即動身去特蘭斯凱，到達的前一天，攝政王的葬禮已經舉行了。

盡管我因為沒有趕上攝政王的葬禮而痛心，但是又為在他去世前與他消除了隔閡而慶幸。然而我依然感到內疚，我一直知道，即使是我與攝政王疏遠的時候，雖然我的朋友可能會拋棄我，我的一切計劃可能會落空，我的希望可能都會破滅，但是，攝政王絕不會拋棄我。即使是這樣，我仍然背離了他，我不知道我的離家出走是否與他的逝世有關。

攝政王的逝世使政治舞臺上失去了一位開明的、寬容的領袖。他實現了一切偉大的領袖人物所追求的標志性目標：讓他的人民團結一致。大家都忠于他，不論自由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傳統派還是改革派、白領官員還是藍領礦工。不是因為他們總是與他保持一致，而是因為他傾聽和尊重不同的意見。

葬禮后，我在穆克孜韋尼待了將近一周，這是一段回顧與發現的時間。沒有什么事情像回到什么也沒有發生變化的地方而自己的生活卻已經發生變化那樣令人浮想聯翩。大王宮依然如故，與我在那里長大的時候沒有任何差別。但是，我發現我自己的觀點和世界觀已經發生了演變。我不再向往在公共事業中服務或在土著事務局擔任翻譯的職業；我不再認為我的前途與泰姆布蘭和特蘭斯凱捆綁在一起；我甚至認為我的科薩語不再那么純正，受到了祖魯語的影響。祖魯語是礦脈一帶的主要語言之一。在約翰內斯堡的生活中，我接觸了像高爾·瑞德貝這樣的人；我在律師事務所獲得的經驗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信仰。我回想起當年那位年輕小伙子，他離開了穆克孜韋尼，作為一位土著人，他的視野很小。現在，我相信我是從事情的本來面貌理解這些事情的。當然，這也是一種幻覺。

我仍然感覺自己的大腦和心靈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沖突。我的心告訴我，我是一個泰姆布人，我被撫養成人，并被送進學校讀書，這樣我就在維護王權中起到了特別的作用。難道我對去世的先人沒有感激之情？難道我對使我得到攝政王的關愛的我的父親沒有感激之情？難道我對像親生父親一樣關愛我的攝政王本人沒有感激之情？但是我的大腦卻告訴我，按照自己的意愿計劃自己的未來、選擇自己的生活是每個人的權利。難道不允許我作出自己的選擇嗎？

佳士提斯的情況與我的情況的確不同。攝政王去世后，他擔負起了新的重要責任。他繼承了攝政王的王位并決定留在穆克孜韋尼，享受他生來就有的權力。我必須返回約翰內斯堡，甚至不能參加他的就職典禮。在我們的語言中有這樣一句話：“Ndiwelimilambo enamagama”（我渡過了著名的河流）。意思是說，一個人已經走了很遠的路，從中獲得了豐富的經驗和智慧。在我獨自一人回約翰內斯堡的時候，我想起了這句話。從1934年開始，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渡過了許多重要河流：在我去希爾德頓的時候，我渡過了穆巴謝河和大凱河；在我去約翰內斯堡的路上，我渡過了奧蘭治河和法爾河。但是，我還有許多河流需要渡過。

1942年年末，我通過了最后一次文科學士學位考試，取得了我曾經夢寐以求的資格。我為取得學位而自豪。不過，我也知道，學位本身既不是輕易取得成功的法寶，也不是輕易取得成功的通行證。

在律師事務所，我與高爾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這讓希代爾斯基越來越惱火。高爾說，教育對我們的進步是基礎，但是，他指出，至今沒有哪國人民或哪個民族僅僅通過教育而獲得自由。“教育確實是好東西，”高爾說，“但是，如果我們準備依賴教育，我們將需要等上1000年才能等來我們的自由。我們貧窮，我們幾乎沒有教師，甚至連學校都沒有。我們甚至沒有教育自己的權利。”

高爾認為，解決的辦法不能到滔滔不絕的理論中去尋找。他斷言，對于非洲人來說，變化的引擎是非洲人國民大會，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是在南非尋求權利的最好方式。他強調，非洲人國民大會倡導變革的歷史十分久遠，它建立于1912年，是南非最早的全國性非洲人組織。它的章程公開譴責種族歧視，其領導人來自不同的部落團體，倡導非洲人的目標是全南非公民化。

盡管高爾缺乏正規教育，但他事實上從各方面都是我的老師。中午吃飯休息期間，他常常即興發表演說。他借書給我讀，推薦人士同我交流，推薦會議讓我參加。在福特黑爾大學，我學過兩個學期的現代史，盡管我也知道許多歷史事件，但是，高爾能解釋歷史事件的過程和人們采取行動的原因。我感覺好像是在身臨其境地學習歷史。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高爾全身心地投入為自由而進行的斗爭，他似乎是為自由而生。高爾有時一天出席幾個會，在會上他總是作為演說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只考慮革命，而不考慮別的任何事情。

我與高爾一起去參加城區咨詢委員會和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的會議。我是以觀察者而不是以參會人員的身份參加這些會議的，因為我從沒想過在會上發表任何講話。我是為了解討論的問題、評價爭論的焦點、領教演講人員的口才而參加會議的。咨詢委員會的會議大多馬虎、敷衍、官僚，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會議則往往充滿活力，討論的問題包括議會、通過法律、公共汽車票價等一切對非洲人有影響的公共話題。

1943年8月，我與高爾和其他一萬多人參加了游行，支持亞歷山大公共汽車職員罷工，抗議公共汽車票價由4便士漲到5便士。高爾是這次罷工的組織者之一。在這次罷工中，我認真觀察了高爾。這次罷工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初步告別了觀察者的身份，真正成為一個參與者。我發現，與人民一起游行是令人高興和鼓舞的事情。我也對那次罷工的效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罷工后連續9天公共汽車一直空車運行，公共汽車公司不得不把車費又恢復到了4便士。

在律師事務所里，高爾的觀點并不是我唯一注意的觀點。有時，與希代爾斯基一起做生意的白人地產商漢斯·穆勒討論問題也吸收我參加。他是一個典型的商人，完全從供求關系這個棱鏡觀看世界。一天，穆勒先生指著窗外說：“看外面，納爾遜，你看沒看見那些男男女女在大街上跑來跑去？他們在追逐什么？他們為什么那么賣力地工作？我告訴你，他們都在追逐錢財。因為錢財就等于幸福，也是你必須為之奮斗的東西：金錢，不是別的，是金錢，一旦你有了足夠的金錢，你生活中就再也不缺別的東西了。”

威廉·史密斯是一個做非洲人財產生意的有色人，經常在我們事務所附近轉。史密斯是工商工人聯盟的老盟員。工商工人聯盟是柯萊門茨·卡德利埃發起成立的南非第一個黑人商會。但是，史密斯的觀點自從這個時候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納爾遜，”他說，“我涉足政治已經很長時間了，我現在每時每刻都在為此而后悔。我的年華都浪費在了徒勞之中，為空虛而自私的人服務，這些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他們假裝為政治服務，憑我的經驗，那不過是從窮人身上竊取錢財的騙局。”

希代爾斯基不參加這些討論，他好像認為討論政治幾乎與參與政治一樣浪費時間。他一次又一次地勸我遠離政治，他以高爾和瓦爾特·西蘇陸為例提醒我：“這些人會毒害你的大腦。”“納爾遜，”他問我，“你要當一名律師對不對？”我說“對”。“如果你要當律師，你就要當一個成功的律師，難道不對嗎？”我又回答說“對”。“那好，如果你參與政治，”他說，“你的工作就要遭受損失。你將與當局產生麻煩，而這些人又往往是你工作中的同盟者。你將失去客戶，面臨破產。你的家庭就會破裂，最終你將被投入監獄。如果你涉足政治，這就是你的結局。”

我聽著這些人說的話，認真掂量這些話的分量。這些話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已經傾向于某種政治，但是，我不知道我所傾向的政治是什么政治和為什么傾向這種政治。我正在邊緣上徘徊，不知如何是好。

只要一涉及我的工作，高爾就不僅僅是在勸告我了。1943年初，這時我已經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了將近兩年。他把我拽到一邊說：“我的小伙子，只要我在這個律師事務所，他們就絕不會與你簽訂工作合同，不管你有沒有學位。”我感到驚訝，告訴高爾說，這不可能是真的。因為，他又沒參加成為律師的培訓，他的工作怎么會影響我與該律師事務所簽訂工作合同。“那不重要，納爾遜，”他繼續說，“他們將會說，‘我們有高爾，他能對我們的人講法律，我們為什么再要一個呢？高爾已經為我們律師事務所帶來了客戶。’但是，他們不會當面對你說這件事。他們只是往后推，拖延時間。你當律師，這對我們在這個國家里的斗爭前途是很重要的。因此，我準備離開這個律師事務所，自己開辦一個房產代理公司。當我走了的時候，他們除了與你簽訂勞動合同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我請求他不要辭職，但是，他已經拿定了主意。幾天內，他向希代爾斯基遞交了辭呈，正如高爾說的那樣，希代爾斯基最終與我簽訂了勞動合同。我說不清高爾的辭職與這件事有沒有關系，但是，他的辭呈是他慷慨無私的又一證明。

1943年初，我通過了南非大學的考試之后，需要回福特黑爾大學辦理畢業手續。在我動身去福特黑爾大學之前，我決定為自己買一身合適的衣服。為此，我不得不向瓦爾特·西蘇陸借錢。當我要去福特黑爾大學讀書的時候，攝政王為我買過一身新衣服，現在在這里畢業的時候，我要自己給自己買一身新衣服。當時，我還從我的朋友兼校友蘭道爾·皮特尼那里借了一身校服。

我的侄子K. D.馬嘆茲瑪已于幾年前畢業，他開車把我母親和攝政王的遺孀“非英格蘭”送到福特黑爾大學參加我的畢業儀式。我為母親來參加我的畢業儀式感到很高興，事實上，“非英格蘭”王后來參加我的畢業儀式使我感覺好像是攝政王親自為我的畢業祝福。

畢業后，我在達利旺伽（馬嘆茲瑪的氏族名，我通常這樣稱呼他）家里住了幾天。達利旺伽已經選擇了世襲酋長的道路。他按照世襲關系要出任泰姆布蘭埃米格蘭特的酋長。埃米格蘭特位于特蘭斯凱的最西部。我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勸我當上律師后回烏姆塔塔工作。“你為什么住在約翰內斯堡？”他問道，“你更需要在這里工作。”

這個建議有一定道理：在德蘭士瓦的專業非洲人員當然比在特蘭斯凱的專業非洲人員多。我告訴達利旺伽，他的建議為時尚早。但是，我心中知道自己正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通過與高爾和瓦爾特結識，我開始認識到自己的責任是要為全南非人服務，而不是僅僅為某一個局部或某一部分人服務。我感覺到生命中的潮流正在把我從特蘭斯凱沖走，沖向似乎是屬于中心的地帶，沖向忠于地區利益讓位于忠于全南非的共同利益的某個地方。

在福特黑爾大學畢業給了我自省和反思的時間。自己的舊設想與實際經歷之間的反差強烈地震撼了我，使我丟棄了以前那種大學畢業自然要當官做老爺和我與泰姆布王室的親屬關系自然保證我的尊貴地位的想法。有一份成功的職業和可觀的薪金不再是我的最終目標。我發現自己被拉進了政治領域，因為我不再滿足于我原有的信仰。

在約翰內斯堡，我進入了見識和實際經驗比高學歷更重要的圈子里。我恰恰在得到學位的時候才發現，在大學里學的東西好像與我的新環境沒有什么關系。在大學里，老師們羞答答地避開諸如種族壓迫、非洲人缺少機會、鎮壓黑人的法律和規定這樣的課題。但是，在約翰內斯堡的生活中，我幾乎天天遇到這些問題。從來沒有人提出如何消除種族歧視的建議，我不得不通過不斷摸索進行學習。

在我1943年初回到約翰內斯堡的時候，我考入了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攻讀法學學士。對于一個律師來說，這是預備性培訓。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大家習慣稱“威特大學”，位于約翰內斯堡市中心偏北部的布拉姆方丹，許多人認為它是南非第一所講英語的大學。

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使我第一次接觸白人，而在福特黑爾大學我只是偶爾接觸到來自格拉姆斯敦的羅德斯大學的白人學生。但是，在威特大學，我卻直接與白人一起上課。這對他們和對我一樣，都感到新鮮，因為我是法律系唯一的非洲學生。

南非講英語的大學是自由價值的孵化器，這是對這些接收黑人學生的大學的一種贊揚。對于南非白人大學來說，這種事情是不可思議的。

盡管這所大學提倡自由價值，但我在那里從來沒有真正感到舒服過。除了服務人員外，始終只有我一個黑人。往最好處說，我被別人當珍奇人物看待；往最壞處說，我被別人看作一位闖入者。這并不是一種愉快的經歷。我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要十分警惕。我既遇到過慷慨，也遇到過敵意。盡管我設法尋找同情自己的白人，而且這些白人成了我的朋友，后來又成了我的同事，但是，威特大學的大多數白人并非不是種族歧視者或不抱種族成見的人。記得有一天，我上大堂課時遲到了幾分鐘，因此沒注意與一個名叫薩雷爾·替基的同學靠著找了個座位坐了下來，他后來成為合眾黨的一位議員。盡管這堂課已經開始，并且只有幾個空位子，但是，他卻故意收拾起東西挪到離我比較遠的座位上。這種行為并不是個別、偶然的現象。沒有人說“卡非爾”（非洲黑人）這個詞，他們的敵意雖已較為溫和，但是，我的感覺倒是沒有什么區別。

我們的法學教授哈羅先生是一個嚴格而聰明的人，不允許他的學生有過多的獨立性。當他談到女人和非洲人的時候，他堅持一種奇怪的法律觀點。他說女人和非洲人不應該當律師，他認為法律是社會科學，而女人和非洲人的大腦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不能掌握錯綜復雜的法律內涵。他曾經告訴我，我不應該在威特大學學習，而是應該通過南非大學取得學位。盡管我不贊成他的觀點，但是，我無法證明他的這些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我作為一個非洲學生的處境是十分凄慘的。

我在威特大學遇到了許多人，他們與我一起經歷了解放斗爭的興衰。沒有他們，我將沒有成就可言。許多白人學生讓我感到超乎尋常的溫暖。在威特大學第一學期，我認識了喬·斯洛沃和他未來的夫人魯思·弗斯特。那時和現在一樣，喬是我遇見的頭腦最敏銳、思維最敏捷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熱情的共產主義者，因為精神高尚而聞名。魯思具有外向的個性，也是一位有天賦的作家。他們兩人都是南非猶太移民的孩子。我開始與喬治·畢佐斯和布拉姆·費希爾建立了終生友誼。喬治是希臘移民的孩子，是一個富有同情心且頭腦敏捷的人。布拉姆·費希爾業余時間當助教，他是一個著名的南非白人[[1]](#_1_Ben_Shu_Zhong__Nan_Fei_Bai_Re)家庭的子孫。他爺爺曾是奧蘭治殖民地的總理，父親則是奧蘭治自由邦的首席法官。盡管他或許可以擔任南非的總理，但是，他卻成為我所知道的為自由而斗爭的最勇敢、最堅強的朋友之一。我與托尼·奧多德和哈羅德·沃爾佩成了朋友，他們都是政治激進分子和共產黨黨員。朱利斯·布朗德及其夫人也是我的朋友，他們都是反對南非種族隔離事業的精英。

我也與許多印度學生建立了親密的友誼。盡管在福特黑爾大學也有一小部分印度同學，但他們住在另一個旅店里，我很少與他們接觸。在威特大學，我認識了伊斯梅爾·彌爾、J. N.辛格、阿邁德·布拉和拉姆拉爾·布里亞，并同他們成了朋友。這個緊密團體的中心是伊斯梅爾的住處，位于市中心住宅區考爾沃德平房13號，有4個房間。我們在那里學習、談話，甚至跳舞，一直到第二天凌晨。這里成了年輕自由戰士的司令部。如果太晚，趕不上回奧蘭多的火車，我有時就住在那里。

伊斯梅爾·彌爾是一個聰明而嚴肅認真的人，他出生于納塔爾。在威特大學法學院的時候，他成為德蘭士瓦南非印度人大會的主要成員。J. N.辛格是一個多數人喜歡的漂亮小伙子，與所有有色人都處得很融洽，他也是一名共產黨黨員。有一天，伊斯梅爾、J. N.辛格和我正在急急忙忙地去考爾沃德平房，盡管事實上是印度人能乘而非洲人不能乘有軌電車，但是，我們還是都乘坐了有軌電車。還沒走多遠，有軌電車的售票員就用南非荷蘭語對伊斯梅爾和J. N.辛格說不允許他們的“卡非爾”朋友乘坐。伊斯梅爾和J. N.辛格對那位售票員非常氣憤，告訴對方他連“卡非爾”這個詞都不懂，用這樣的名字稱呼我是對我的冒犯。那位售票員立即讓電車停下來去喊警察，警察把我們逮捕并送進警察局控告我們，并命令我們第二天去法院應訴。那天夜里，伊斯梅爾和J. N.辛格安排布拉姆·費希爾為我辯護。第二天，地方法院院長似乎了解布拉姆的家庭關系，我們很快就被無罪釋放。我第一次看到，執法人員的眼睛一點兒都不會放過黑人。

威特大學為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一個理想、政治信仰與辯論的世界，一個人們對政治滿腔熱情的世界。我融入了我們自己那一代的白人和印度知識分子之中，這些青年人將在隨后幾年中成為最重要的政治運動的先鋒。我第一次看到，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正在堅定地開展自由解放斗爭，盡管他們都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但是他們都做好了準備：為了被壓迫人民的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

[[1]本書中“南非白人”（Afrikaner），指17——19世紀移居南非的白人后裔，以荷蘭裔為主，又稱阿非利卡人、布爾人。與后來的英國殖民者有所區別。——編注](#_1)

# 第三部 一個自由戰士的誕生

11...

當我知道我將在自由解放斗爭中度過我的一生的時候，我已經記不清是在什么時刻被政治化了。在南非做一個非洲人意味著他從出生的那一時刻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不管他知道這個事實與否。一個非洲兒童，要在只有非洲人的醫院里出生，要在只有非洲人乘坐的公共汽車里被抱回家，要生活在只有非洲人生活的區域，如果要上學則只能上只有非洲人就讀的學校。

當他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只能做只有非洲人才做的工作，只能租住只有非洲人居住的村鎮的房子，只能乘坐只有非洲人乘坐的火車。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有人讓他在哪里停下他就得在哪里停下，要他出示通行證，沒有通行證他就會被逮捕并被投入監獄。他的生活要受種族歧視性法律、法規的制約，從而使他的成長受到阻礙，他的潛力發揮受到限制，他的生命遭到扼殺。這就是現實，一個人可以采取各種各樣的方式應對這個現實。

我沒有靈光一現的頓悟，沒有奇特的啟示，沒有上帝的顯靈。但是，我有無數次的被輕視和慢待，無數次的被侮辱和傷害，無數次的憤怒和反抗，我無數次地希望與束縛我們人民的制度開戰。我不知道在哪一個特定的日子說過“從今以后我將為人民的解放而獻身”，但是，我完全知道我正在這樣做，而且是別無選擇。

我提到了許多對我有影響的人，但是，我越來越崇拜英明的瓦爾特·西蘇陸。瓦爾特身體強壯、通情達理、老練且富有獻身精神；他在危急關頭絕不會不知所措，他往往在別人大喊大叫的時候保持沉默；他堅信非洲人國民大會是改變南非的有效方式，是黑人希望和理想的源泉。我知道，有時候可以通過參加某個組織的人去判斷這個組織，所以我為參加瓦爾特參加的任何組織而自豪。那時，幾乎沒有供選擇的余地。非洲人國民大會是歡迎每個人參加的一個組織，大家把這個組織看成是一個巨大的保護傘，在它的下面，所有的非洲人都能得到保護。

20世紀40年代，政治風云發生了變化。1941年，羅斯福和丘吉爾簽署了《大西洋憲章》，再次肯定了個人的尊嚴，推出了許多民主原則。西方有人把這個憲章看作空頭許諾，但是，我們非洲沒有人這么看。在《大西洋憲章》和聯合作戰反對專制與壓迫政策的鼓舞下，非洲人國民大會制定了自己的憲章，稱為“非洲聲明”。它規定所有的非洲人都有完整的公民權，都有購置土地的權利，要求廢除一切歧視性的立法。我們希望政府和普通的南非人都能看到，他們在歐洲為之戰斗的原則也是我們在南非提倡的原則。

瓦爾特在奧蘭多的家就是南非先進分子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的“麥加”，是一個溫暖而熱情的地方。我經常去那里，在那里或是舉行討論，或是品嘗西蘇陸太太烹調的美味食品。有一天夜晚，我遇見了安東·萊彼德（他有文科碩士和法學學士雙學位）和A. P.穆達。從我聽萊彼德講話那一時刻開始就感覺到，他有強大的人格魅力。他思考問題的方式獨特，能令人耳目一新。當時，他已經是南非為數不多的黑人律師之一，是德高望重的皮克雷·卡賽彌博士的法定伙伴。皮克雷·卡賽彌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創始人之一。

萊彼德說，非洲大陸是黑人的大陸，只有非洲人才有權利主張對它擁有主權。他反對黑人是次等公民的理論，譴責對西方及西方思想的崇拜和偶像化。他斷言，次等公民的主張是消除種族歧視的最大障礙。他指出，哪里的非洲人被給予機會，哪里的非洲人就有能力與白人一樣地發展，他列舉的這方面的非洲英雄有馬庫斯·加維、杜波伊斯和海爾·塞拉西。“我們的皮膚，”他說，“就像我們非洲的黑色土壤，是美麗的。”他認為黑人在能夠發動大規模行動之前，必須改善自己的形象。他提倡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并且把他的理論稱作“非洲主義”。我們認為，他理所當然地應當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袖。

萊彼德聲明：新的精神正在人民中傳播，種族差別正在消失，青年人不分男女都要想到自己最重要的首先是非洲人，不要認為自己僅僅是科薩人，或恩德貝勒人，或茨瓦納人。萊彼德的父親是納塔爾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祖魯農民，而他則畢業于亞當斯學院的師范系。這是一所美洲人開辦的教會學校。他在奧蘭治自由邦任教數年，學習了南非荷蘭語，開始把南非白人的民族主義看作非洲民族主義的典型例證。

正如萊彼德后來在納塔爾一家名叫Inkundla ya Bantu的非洲報紙上發表文章所說的那樣：

現代歷史是民族主義的歷史。民族主義已經在人民的斗爭中和戰火中得到了考驗，被認為是抵制外國統治和現代帝國主義的唯一解毒劑。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帝國主義列強才瘋狂地、竭盡全力在他們統治的人民中阻止和根除民族主義傾向。為達此目的，他們投入大量的錢財反對民族主義。他們貶稱民族主義是“狹隘的”、“沒開化的”、“不文明的”、“惡魔般的”，等等。有些外國統治下的人也成了這種險惡宣傳的上當受騙者，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因此，他們受到了帝國主義的高度贊揚，到處宣揚他們是“文明的”、“思想解放的”、“進步的”、“胸懷寬闊的”，等等。

萊彼德的觀點打動了我的心弦。我也一直對家長式的英國殖民主義和白人關于“文明”、“進步”、“開化”的要求有所懷疑。我已經被拉上充當英國人企圖在非洲培養黑人精英的道路，這也是從攝政王到希代爾斯基對我的要求。但是，這是個幻想。像萊彼德那樣，我開始把富有戰斗精神的非洲民族主義看作一劑抵制外國統治和現代帝國主義的解毒劑。

萊彼德的朋友兼伙伴皮特·穆達被大家稱呼為“A. P.”。萊彼德偏重于高談而冗長，而穆達則傾向于節制且準確；萊彼德可能顯得含糊和神秘，而穆達則崇尚清晰和科學。穆達的這種可操作性對萊彼德的理想主義正好是一種完美的襯托。

其他年輕人考慮問題的思路都相同，我們準備湊在一起討論這些思路。除了萊彼德和穆達之外，這些人還包括瓦爾特·西蘇陸、奧利佛·塔博、蘭奈爾·馬喬寶茲、維克多·穆珀博，他們都是我在希爾德頓大學上學時的老師；還有醫學專業的學生、共產黨員威廉·恩考茂，記者喬丹·恩古巴尼，他是Inkundla報和非洲最大的報紙《班圖世界報》的記者；還有非洲人國民大會駐德蘭士瓦書記大衛·博帕佩，他也是共產黨黨員。另外還有很多人。他們很多人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從整體上看已經成了陳舊的、戰斗精神不強的、有特權的非洲精英壟斷的組織，關心得更多的是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群眾的利益。這種評價可能是有失公允的，但大家的共識是必須采取某種措施。馬喬寶茲建議組建一個青年組織，能夠在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層下面點一把火。

1943年，由萊彼德、穆達、西蘇陸、塔博、恩考茂和我組成了一個代表團去見埃克蘇瑪醫生。他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住在索菲亞頓的一所相當大的住宅里。埃克蘇瑪醫生除了有一個小農場外，還有一個外科診所。他對非洲人國民大會貢獻很大。當該組織在卡賽彌領導下其規模和地位都受到削弱時，他使它擺脫了低迷狀態。在他就職該組織主席的時候，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財力只有17先令6便士。而在他的領導下，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財力猛增到4000英鎊。傳統領導人都很贊賞他，他也與內閣官員們建立了聯系，使該組織通過他而有了安全感和信心。但是，他自己也開始表現出與一個群眾組織的領袖不相稱的傲慢姿態。隨著他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作出的貢獻日漸明顯，他的診所也獲得了優先權。埃克蘇瑪把持了代表團的選舉、人員的委任、信函和電報等工作。一切都采取英國方式，其思想是，盡管我們有分歧，但我們都是正人君子。他愿意與白人建立聯系，不想采取政治行動損害白人的利益。

在會見中，我們告訴他我們想組建青年團，以贏得更多群眾的支持。我們隨身帶了一份起草的章程和宣言。我們告訴埃克蘇瑪，如果我們不振作起來采取新的方式和方法，我們就會面臨危險。埃克蘇瑪感覺受到了我們這個代表團的威脅，因此堅決反對成立青年團的章程。他認為青年團應該是一個松散型組織，主要發揮非洲人國民大會招募委員會的作用。埃克蘇瑪以家長式的口吻說，非洲人作為一個團體，其組織性和紀律性都很差，不能搞群眾運動。如果搞這樣的群眾運動，那將是魯莽的，也是很危險的。

與埃克蘇瑪醫生會見后不久，在威廉·恩考茂的領導下，我們建立了一個臨時性的青年團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委員們參加了1943年12月在布隆方丹舉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在這次會議上，我們建議正式成立青年團，以協助非洲人國民大會招募新會員。這個建議被采納了。

青年團正式建立于1944年復活節，建立地點是位于埃勞佛大街的班圖男士社交中心，大約由100人組成，最遠的來自比勒陀利亞。這是一個有代表性的團體，一個由精英組成的團體，多數都是福特黑爾大學的畢業生，我們根本不是在搞群眾運動。萊彼德作了一個關于民族史的報告，他從古希臘講到中世紀歐洲，然后講到殖民化時代。他強調了非洲和非洲人民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說明白人把自己看作優秀人種和天生的優越種族是何等的愚蠢。

喬丹·恩古巴尼、A. P.穆達和威廉·恩考茂都在會上講了話，強調了非洲民族主義精神的崛起。萊彼德被選為青年團主席，奧利佛·塔博任書記，瓦特爾·西蘇陸任財政部長，A. P.穆達、喬丹·恩古巴尼、蘭奈爾·馬喬寶茲、康古萊斯·穆巴塔、大衛·博帕佩和我本人被選進了執行委員會。后來又吸收了一些著名的青年人，例如大學生戈佛雷·皮徹（他后來當了教師和律師），醫生阿瑟·萊泰勒、威爾遜·康考、迪利扎·穆吉、恩塔托·莫特拉納；還有貿易聯合會會員旦·圖魯麥，大學生喬·馬修斯、杜馬·諾克韋、羅伯特·索布克韋。隨后，各省很快也建立起了分支機構。

青年團的基本方針與1912年制定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一個章程沒有差別。不過，我們重申和強調了那些原來就關心的問題，其中許多問題已經被擱置到了一邊。我們的戰斗口號是非洲民族主義。我們的宗旨是構建一個多部落的民族，推翻白人的霸權政治，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我們在宣言中聲明：“我們相信非洲的民族解放要靠非洲人民自己實現……大會青年團必須做非洲民族主義精神的智囊團和加油站。”

宣言公開反對“托管政治”，反對關于白人政府終究會關心非洲人民利益的見解。我們列舉了自1913年《土地法》開始40年來極其有害的反非立法，這項立法最終從黑人手中攫取了生養他們的87%的土地；1923年的《城市區域法》，為了給白人的工業提供廉價的勞動力而制造了許多貧民窟，他們卻把這些貧民窟美其名曰“土著人居住點”；1926年出臺的《種族隔離法》，禁止非洲人從事他們所熟悉的貿易活動；1927年出臺的《土著人管理法》，使不列顛王國政府而不是使那些最高酋長成了所有非洲人地區的最高長官；最后，1936年出臺的《土著人代表權利法》，剝奪了非洲人在開普地區的普選權。這就徹底粉碎了關于白人會讓非洲人控制自己命運的一切幻想。

我們對共產主義特別謹慎，所以在宣言中聲明：“我們可以借鑒外國思想，但是，我們反對把外國思想完全照搬進非洲。”這是對共產黨人的一種含蓄的指責。萊彼德和其他許多人，也包括我本人，認為“外國”思想不適合非洲的形勢。萊彼德認為，共產黨由白人支配，完全破壞了非洲的獨立自主和自信。

當天還成立了幾個委員會，但是，青年團的主要目的是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在探索政治自由中指引方向。盡管我也同意這個觀點，但是，我當時對參加青年團仍有些緊張，仍然顧慮政治對我的約束程度。那時，我全日工作，并利用業余時間學習，除了這兩項活動外幾乎沒有時間。我仍然有些局促不安，認為自己與瓦爾特、萊彼德和穆達相比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們是胸有成竹的人，而我仍然不成熟。我對演講仍然缺少自信，并且在青年團內用得特別多的口才方面有些膽怯。

萊彼德的“非洲主義”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因為他的思想以種族排他性為特點，從而引起了其他青年團員的某種反感。有的青年團員認為，包括有同情心的白人在內的民族主義更為理想。包括我在內的其余人則認為，如果黑人堅持多種族斗爭形式，他們將仍然迷戀白人文化，繼續受自卑感之害。當時，我堅決反對允許共產主義者或白人加入青年團。

瓦爾特的房子就是我的家。20世紀40年代初期，那里的確是我的家，因為當時我沒有別的住處。瓦爾特的房子里總是住滿了人，似乎那里正在進行著無休止的政治討論。瓦爾特的夫人阿爾博提娜是一個聰明的大好人，也是瓦爾特政治活動的堅定支持者。在他們的結婚典禮上，安東·萊彼德說：“阿爾博提娜，你現在是與一個已經結了婚的人結婚，瓦爾特在與你結婚之前早就與政治結了婚。”

正是在西蘇陸家的休息室里，我認識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艾韋琳·馬賽。她是一個安靜而漂亮的農村姑娘，她似乎沒有對西蘇陸家里來來往往的人過于吃驚。當時，她與阿爾博提娜和皮特·穆達的夫人羅斯一起在約翰內斯堡非歐洲人總醫院參加護士培訓。

艾韋琳來自特蘭斯凱的英格考勃，從烏姆塔塔向西還有一段距離。她父親是礦工，當她還是嬰兒的時候，她父親就去世了。在她12歲的時候，她又失去了母親。完成初級教育后，她被送到約翰內斯堡讀中學。她與哥哥薩姆·馬賽一起生活。薩姆·馬賽當時就住在西蘇陸家里。瓦爾特的母親西蘇陸太太是艾韋琳的祖母的妹妹。西蘇陸夫婦拿艾韋琳當掌上明珠，他們給了她許多愛。

第一次與艾韋琳見面不久，我就約她出去玩，并很快墜入了愛河。幾個月后我要求她嫁給我，她答應了。我們在約翰內斯堡土著人傳教的教堂里舉行了公證式結婚典禮。只需要簽個字并有人證婚就算結了婚，因為我們辦不起傳統式結婚典禮，也辦不起結婚筵席。我們當時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找個地方安頓下來。開始時，我們住在位于奧蘭多東面她哥哥的家里，后來又住在深礦市她姐姐家里。她姐夫姆孫古利·穆古達爾瓦是礦上的一個職員。

12...

1946年發生的幾個重大事件決定了我的政治發展和斗爭方向。首先是礦工大罷工，整個礦脈地區有7萬名非洲礦工參加了罷工。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在J. B.馬科斯、旦·圖魯麥、高爾·瑞德貝和許多非洲人國民大會積極分子的發動下，非洲礦工工會（AMWU）于20世紀40年代一直醞釀組織這次大罷工。礦脈地區有40萬非洲礦工，他們多數人一天只掙兩個先令。礦工工會多次要求礦業協會最少一天支付每個礦工10先令，另外給礦工提供住處并每年提供兩周的休息時間。礦業協會對礦工工會的要求不予理睬。

在這次南非歷史上最大的罷工中，礦工們團結一致，堅持罷工一周。政府野蠻地進行了報復，領頭罷工的人遭到了逮捕，礦工大院被警察團團圍住，非洲礦工工會各辦公室遭到了洗劫，游行隊伍遭到了警察的野蠻鎮壓，有12名礦工被打死。土著人代表委員會以休會表示抗議。我有幾個親戚是礦工，罷工期間我看望了他們，同他們討論了出現的問題，對他們表示支持。

J. B.馬科斯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資深會員和共產黨黨員，當時任非洲礦工工會的主席。馬科斯出生在德蘭士瓦的一個混血家庭里。他是一個富有魅力而十分幽默的人，高高的個頭，膚色不太黑。在罷工期間，我經常同他一起從一個礦到另一個礦，與礦工交談，謀劃斗爭策略。從早到晚，他一直表現出冷靜而理智的領導才能，他的幽默甚至可以使大的危機化險為夷。礦工工會組織及其控制礦工的能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在這樣的野蠻鎮壓面前，工會組織仍然沒有失控。

最終，政府占了上風：罷工被鎮壓，工會被破壞。這次罷工使我與馬科斯開始建立了親密關系，我經常到他家去拜訪他，一起詳細討論我對共產主義所持的反對意見。馬科斯是共產主義堅定分子，但是，他絕不會因為我的反對意見就對我個人抱有成見。他認為，青年人擁抱民族主義是很自然的，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經驗的豐富，我的視野會更寬闊。我與摩西·考塔尼和玉蘇福·達杜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他們兩人與馬科斯一樣，都認為共產主義必須與非洲的形勢相結合。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其他共產黨人譴責我和其他青年團團員，而馬科斯、考塔尼和達杜絕不會這樣做。

罷工后，有52人被逮捕并起訴，其中包括考塔尼、馬科斯及其他共產主義者。開始他們被指控煽動罷工，然后又被指控挑動叛亂。這是一種政治審判，是一種政府表示不會對紅色威脅手軟的努力。

同年，另一件重大事件迫使我徹底改變了對政治工作的態度。1946年，史末資政府通過了《亞洲人土地占有權利法》。這個法律禁止印度人自由遷移，限制印度人居住和經商的區域，嚴格禁止他們購置不動產的權利。作為回報，他們以白人替代者的身份被授予議會代表權。德蘭士瓦南非印度人大會主席達杜醫生把這種禁令和提供議會代表權譴責為“一種虛偽的選舉權的虛假授予”。而大家把這個法律叫做《貧民窟法》，視之為對印度社團的嚴重污辱，是《社團區域法》的前奏，最終將限制全南非有色人的自由。

印度社團非常氣憤，他們發起了為時兩年、協調一致的消極抵抗運動來反對這些措施。在達杜醫生和納塔爾南非印度人大會（NIC）主席G. M.奈克醫生的領導下，印度社團開展了群眾運動，其組織和獻身精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庭婦女、牧師、醫生、律師、學生、商人和工人，都走上抗議斗爭的前線。兩年中，他們不怕犧牲、堅持戰斗。他們多次舉行群眾大會，占領白人保留的土地，至少有2000名志愿者被抓進了監獄，達杜醫生和奈克醫生都被判罰6個月的重體力勞動。

參加這個運動的組織僅限于印度社團，并不鼓勵其他社團組織參加。即使如此，埃克蘇瑪醫生和其他非洲領導人還是在幾次會議上講了話，與青年團一起對印度人民的斗爭給予道義上的全力支持。政府用嚴厲的法律和威脅對這次抵抗運動進行鎮壓，但是，我們作為青年團團員并以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的身份親眼目睹了印度人民以非洲人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沒有采取過的方式對種族壓迫表示反對。伊斯梅爾·彌爾和J. N.辛格中止了學業，告別了他們的家人，走進了監獄；阿邁德·卡特拉達還是一位中學生，也被投進了監獄。我過去經常去阿米納·帕哈德家里去吃午飯，那時，這位漂亮、動人的女士忽然為了信仰而放下圍裙被關進了監獄。如果我過去曾經對印度社團反對壓迫的精神有過懷疑，那么，現在我對此不再有任何懷疑。

印度社團的斗爭在我們青年團所要求的那種反抗斗爭方式方面成了一個典范，從而在人民中灌輸了一種反抗和激進主義精神，使人民不再害怕坐牢，提高了納塔爾南非印度人大會和德蘭士瓦印度人大會（TIC）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他們提醒我們，自由斗爭不僅僅是作演講、召開大會、通過決議和派代表團的問題，而是一個精心組織、發動群眾，特別是要有犧牲精神的問題。印度人的這次運動使我回想起1913年的消極反抗運動。在那次運動中，圣雄甘地領導一支喧鬧的南非印度人游行隊伍，由納塔爾非法越境前往德蘭士瓦。那次運動已經成為歷史，而這次運動就發生在我的眼前。

1946年初，艾韋琳和我搬進了奧蘭多東我們自己租用的一套兩室平房里，隨后又搬進了奧蘭多西8115號稍大一點的房子里。奧蘭多西是一個灰塵滿布、到處是方盒子式小房子的一個區域，后來成了大索韋托的一個部分。“索韋托”是西南城鎮的縮寫。我的房子位于一個被這里的居民稱作西懸崖的地方，其北面就是迷人的白人居住區。

我的新房子的月租金為17先令6便士。房子本身與數百處其他房子一樣，都是沿著泥濘的街道建造在巴掌大小的一塊地皮上。房頂是標準的鐵皮房頂，地面是清一色的水泥，廚房不大，后面有間斗室作衛生間。盡管外面有路燈，但由于房子都沒有通電，所以房內點的是煤油燈。臥室很小，一張雙人床幾乎占滿了整個房間。這些房子是城市管理部門專門為必須在城市附近居住的工作人員建造的。為了緩解單調乏味，有的人開辟了一小塊花園或把門涂上醒目的顏色。雖然房子很小，但它是我擁有的第一個真正的家，我因此感到非常自豪。一個男人直到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才算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當時我并不知道，這所房子將是我以后多年的唯一住處。

政府之所以把這個房子分給我和艾韋琳，是因為我們不再是一個兩口之家，而是一個三口之家。那年，我的第一個兒子馬迪巴·泰姆比基勒降生到了這個世界。他被起了個馬迪巴的氏族名字，但是，大家都稱呼他的小名泰姆比。他是個健康活潑的小男孩，多數人都說他更像他的母親。現在，我有了繼承人，盡管我沒有東西可以留給他。但是我留給了他曼德拉這個姓和馬迪巴這個氏族名，這是一個科薩男性的基本責任。

我終于有了一個固定的住所，實現了由到別人家做客到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的轉變。我妹妹麗比葉和我們住在一起，我把她送到鐵路對面的奧蘭多中學去讀書。按照我們的文化習慣，一個家庭的所有成員都有責任款待本家庭的其他成員。我親屬眾多，又有新的房子，這兩條就意味著我有許多客人。

我幾乎沒有時間去享受家庭生活，但是，我熱愛家庭生活，我喜歡與泰姆比一起玩，給他洗澡、喂食，講故事哄他睡覺。事實上，我喜歡與小孩們玩耍和聊天，這也一直是使我感到最安逸的事情之一。我喜歡在家里松弛一下，靜靜地讀書，聞著從廚房里沸騰的鍋中散發出的甜甜的、香噴噴的飯菜味。不過，我很少在家里享受這一切。

那年下半年，邁克爾·斯克特牧師開始在我家居住。斯克特是一位英國國教會的神職人員，也是一位偉大的非洲人權運動的戰士。有一個名叫科莫的人一直在找他。科莫正在約翰內斯堡外面的一個棚戶區謀求住處，而政府打算對那個地方實施搬遷。科莫要求斯克特出面反對這個搬遷計劃。斯克特說：“只有你要占的那個地方也算上我的一份，我才幫你這個忙。”他準備搬到那個棚戶區并在那里傳教。斯克特為無家可歸的人在一個巖石圓丘上建造了一個棚戶區，這個棚戶區在北非戰爭結束后被居住在那里的人稱作“陶布盧克”。禮拜天早上，我有時帶泰姆比去那里玩，因為他喜歡在那里捉迷藏。在斯克特建立起他的傳教點之后，他發現科莫正在侵吞人們為反對搬遷而捐的錢財。當斯克特去找科莫理論此事時，科莫把斯克特從棚屋里轟了出來，并威脅說要要他的命。

斯克特來奧蘭多我的家中避難，并帶了一個名叫德拉米尼的黑人神甫。德拉米尼也有妻子兒女。我家很小，斯克特住在會客室里，德拉米尼一家住在另一個房間里，而我只好把所有的孩子都安排在廚房里。斯克特是一個很謙虛、很平易近人的人，而德拉米尼則有點難以相處。有時，他抱怨飯菜不好。“看這里，”他說，“這塊肉太瘦、太硬，根本沒做熟，我不喜歡吃這種肉。”斯克特對此感到很吃驚，并勸他不要挑剔，但德拉米尼卻不在乎。第二天晚上，他可能又說：“好，這次比昨天好了點，但是離好吃還差得遠。曼德拉，你夫人就是不會做飯。”

德拉米尼間接地使問題得到了解決，因為我想盡快讓他離開我家，所以，我親自到了那個棚戶區，說斯克特不像科莫，是他們的真正朋友，要求那里的居民在這兩個人中挑選一個。他們隨后組織了選舉，斯克特在選舉中取得了勝利。于是，他又搬回了棚戶區，并把德拉米尼神甫一起帶回了棚戶區。

1947年初，我完成了硬性規定的三年見習期，在“維特金－希代爾斯基－埃代爾曼”律師事務所里的合同見習期已滿。我決心做全日制學生，以便獲得法律學士學位，這樣我就可以通過自己努力開啟律師生涯。我在希代爾斯基那里每月掙8英鎊10先令1便士的薪金沒有了，這種損失簡直就是災難性的。我向約翰內斯堡南非民族學院的班圖福利信托公司申請250英鎊貸款，以支撐我的學業。這筆錢包括大學學費、教科書費和生活用度。最后，我獲得了150英鎊的貸款。

三個月以后，我又向福利信托公司寫了申請，說明我太太要休產假，每月我們將失去17英鎊的工資，而這個錢是我們生活所絕對必需的。我真的又得到了一筆貸款，我為此而非常感激，但是貸款后的境況卻很不幸。我女兒馬卡紫薇的出生并沒有什么困難，但是，她的體質比較差。從此之后，我們擔心會發生最壞的情況。許多夜晚，艾韋琳和我輪流看護著她。我們不知道是什么病正在危及這個小女孩的生命，醫生也沒有說清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艾韋琳以一位母親的不知疲倦和一位護士的專業技能監護著這個小生命。在9個月大的時候，馬卡紫薇夭折了。艾韋琳十分傷心，唯一能減輕我的悲傷的事就是設法安慰她。

在政治上，不管你考慮得多么周密，環境條件常常起到決定性的作用。1947年7月，我與萊彼德就青年團的事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討論。他對我說，他的胃突然疼痛，而且伴隨著發冷。當疼痛惡化時，我把他送進了嘉勉醫院，當天夜里，他就去世了，當時他只有33歲。許多人為他的去世而感傷，瓦爾特·西蘇陸似乎無法忍受這種巨大的悲痛。他的去世是非洲青年運動的一大損失，因為萊彼德是思想的源泉，他能把其他人吸引到這個組織里來。

萊彼德的職務由皮特·穆達接任，他的分析方法、清楚而簡單地表達自己的能力和豐富的斗爭經驗，使他成為一個卓越的政治家和青年團的杰出領袖。穆達比較瘦弱，不愿意多說話。他對不同的觀點能夠兼容并包，他的思想比萊彼德更成熟、更先進。我認為，穆達的領導水平在萊彼德之上。

穆達認為，青年團應當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起到內部增壓器和民族起飛的翅膀的作用，以便把非洲人國民大會推向一個新的紀元。那時，非洲人國民大會連一個全日制工作人員都沒有，組織一般很差，運行缺少計劃性（后來瓦爾特成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專職職員，薪金極為微薄）。

在Z. K.馬修斯和人類學講師戈佛雷·皮徹的指導下，穆達在福特黑爾大學建立了青年團支部。他們在那里招募大學生，為青年團吸收新鮮血液和思想，其中最杰出的是馬修斯教授的兒子喬和羅伯特·索布克韋。羅伯特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演說家和卓越的思想家。

穆達在民族主義方面比萊彼德溫和，他的思想沒有萊彼德那種激進的色彩。他仇恨白人壓迫和白人統治，但不是仇恨白人本身。他對共產黨也不像萊彼德和我那樣極端。我是青年團成員中對白人內部左派持懷疑態度的人。盡管我有許多白人共產黨朋友，但我警惕白人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影響，反對與共產黨聯合行動。我擔心，共產黨會在聯合行動的幌子下接管我們的民族運動。我認為，我們的運動是純粹的非洲民族主義運動，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或多種族主義運動，通過這種運動可以使我們獲得自由。我甚至與青年團中的幾個同事一起在主席臺上鬧事，扯掉標語，搶奪麥克風，破壞共產黨的大會。在12月份召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大會上，青年團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驅逐共產黨人。但是，我們遭到了慘重的失敗。盡管受1946年印度非暴力反抗運動的影響，我擔心印度人同擔心共產黨人一樣，害怕他們謀求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獲得主導地位，部分原因是他們在受教育、經驗和訓練方面都優于我們。

1947年，我被選進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執行委員會，在德蘭士瓦省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C. S.拉默哈諾的領導下工作。這是我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的第一個正式職務，它代表著我獻身這個組織的一個里程碑。直到這個時候，我所作出的犧牲僅僅是周末不能在家陪伴我的太太，晚上回家很晚。我沒有直接介入任何大的運動，我還不懂得一個自由戰士的生活是何等危險和困難。我不必為我的獻身而付出大的代價。自從被選進德蘭士瓦省執行委員會，我開始認識到自己與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整體，不論是希望還是失望、成功還是失敗，我此時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業之中。

拉默哈諾是另一個讓我受益匪淺的人。他是一個堅強的民族主義者和卓越的組織者，能權衡不同的看法，從而達成折中認識。盡管拉默哈諾不同情共產黨人，但是他仍然能夠與共產黨人很好地交往。他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全國性的民族主義組織，應該歡迎一切支持我們事業的人。

1947年，在印度非暴力反抗運動的啟發下，埃克蘇瑪、達杜、奈克分別以非洲人國民大會、德蘭士瓦南非印度人大會和納塔爾南非印度人大會主席的名義簽署了“醫生公約”，同意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這是朝著非洲人與印度人聯合在一起所邁出的重要一步。不是創立一個核心政體去領導所有的運動，而是同意在共同利益問題上開展合作。后來，“非洲人民組織”（APO）也參加了這一合作。當時，非洲人民組織是一個有色人的組織。

不過，這種協議至少是一種嘗試，因為每個民族集團所面對的問題不盡相同。例如，“通行證法”只影響印度人和有色人，而“猶太人法”對印度人的抗議活動是一種促進，但對非洲人也有影響。有色人當時更關心種族劃分和工作保留問題，而這些問題并沒有嚴重地影響到非洲人和印度人。

“醫生公約”為將來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之間的合作奠定了基礎，因為它關系到每個民族的獨立，并且也說明通過一致行動可以獲得成效。“醫生公約”在全國促成了一系列非激進的反政府運動，其目的是把自由斗爭中的非洲人、印度人團結在一起。在這些運動中，首先是第一次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人民公投選舉大會，這是一個把選舉權推廣到全南非的運動。在我主持的一次非洲人國民大會緊急會議上，埃克蘇瑪宣布了此事。當時我認為，這一運動將在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控制之下進行，但是，當我得知非洲人國民大會不準備領導這個運動的時候，德蘭士瓦執行委員會決定，非洲人國民大會應當立即從運動中退出。當時，我的想法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應該只介入自己領導的運動。與關心運動能否成功相比，我更關心誰能獲得信任。

即使在退出運動之后，非洲人國民大會德蘭士瓦省主席拉默哈諾又發表了一個緊急聲明，號召本省非洲人參加普選，明確反對德蘭士瓦執行委員會的決定。這是執行委員會不能容忍的背叛行動。在為解決這個問題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有人要求我提出一個不信任動議，反對拉默哈諾違反執行委員會的決定。我感覺在義務與個人忠誠之間、組織責任與個人友情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我十分清楚，我將要譴責的是這樣一個人的行動——我對他的忠誠和奉獻毫不懷疑，他在解放斗爭中的犧牲遠比我的犧牲要大；我知道，他號召采取的這種行動實際上是崇高的行動，因為他認為非洲人應該幫助他們的印度兄弟。

但是，拉默哈諾違抗上級的決定，其性質是嚴重的。雖然像非洲人國民大會這樣的組織是由個體組成的，但是，它比任何一個個體都要大，忠于組織勝過忠于個人。我同意帶頭對他展開斗爭，于是提出了譴責他的動議。這種譴責得到了奧利佛·塔博的支持，這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支持其主席的與會者與站在執行委員會一邊的與會者之間展開了唇槍舌劍的爭斗，會議在混亂中收場。

13...

非洲人不能投票，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關心誰贏得了選舉。在1948年的白人大選中，執政的合眾黨在史末資將軍的領導下反對復興的國民黨。當時，合眾黨正處于國際威望鼎盛時期。在史末資使南非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陣營的同時，國民黨拒絕支持英國而公開同情納粹德國。國民黨的競選運動以“黑人危險”為中心，在競選中打出了兩個口號：“黑鬼待在他該待的地方”、“苦力們滾出這個國家”。苦力是南非白人對印度人的貶稱。

在前荷蘭歸正會的牧師、一家報社的編輯丹尼爾·馬倫的領導下，國民黨是一個受仇恨驅使的黨派。他們對英國人充滿仇恨，英國人幾十年來一直把他們當做次等人；他們對非洲人也充滿仇恨，國民黨人認為黑人是對南非白人文化的繁榮和純度的威脅。非洲人對史末資將軍談不上忠誠，而我們對國民黨就更沒什么忠誠可言。

馬倫的理論平臺就是種族隔離。“種族隔離”是新術語、舊思想。其字面的意思是“隔開”，它代表的是一種壓迫制度下的所有法律、法規的總和，這些法律和法規使非洲人在地位上低于白人達幾個世紀。這種或多或少的非法現實無情地被合法化。在過去300年中，偶然的隔離常常被鞏固成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其行政手段是殘忍的，行政范圍是無所不包的，行政權力是至高無上的。種族隔離的前提是白人比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優越，其作用就是永遠維護白人的霸權地位。正如國民黨人所指出的那樣：“白人必須始終保留其上司地位。”他們的理論平臺是建立在“白人至高無上”這一基礎之上的，“白人至高無上”的含蓄意思就是在各個領域內保持白人的絕對統治。這個理論得到了荷蘭歸正會的支持。荷蘭歸正會用宗教理論為種族隔離提供依據。這種宗教理論暗示南非白人是上帝的選民，黑人是南非白人的附屬。按照南非白人的世界觀，種族隔離和教會兩大武器要同時并舉。

國民黨的勝利是英國人結束對南非白人的控制的開始。英語作為一種官方語言僅次于南非荷蘭語。國民黨的口號包藏了他們的使命：“我們自己的人民，我們自己的語言，我們自己的土地。”按照南非白人扭曲的宇宙理論，國民黨的勝利就像以色列人到“應許之地”一樣。這是上帝應許的實現，在他們看來，南非應該永遠是白人的國家。

這次勝利也是一種震驚。合眾黨和史末資將軍打敗了納粹，他們也一定能擊敗國民黨。大選的那天，我與奧利佛·塔博及另外幾個人一起在約翰內斯堡開了一個會議。我們幾乎沒探討國民黨人政府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想到會有這個政府。會議進行了一整夜，天亮的時候我們看見有一個賣報的售貨亭正在出售《蘭德每日郵報》：國民黨人勝利了。我感到吃驚和失望，而奧利佛的態度更見考量。他說：“我喜歡這個結果。”我想象不出他為什么說這句話。他解釋說：“現在我們明確了誰是我們的敵人和我們將采取什么立場。”

就連史末資將軍也認識到了這種理論的危險，他把“種族隔離”譴責為“狂熱的概念”，是由于偏見和恐懼而產生的理論。自從國民黨人當選的那一時刻，我們就知道，我們的土地從今以后將成為緊張、沖突的戰場。在南非歷史上，一個唯我獨尊的南非白人政黨第一次把持了南非政府。馬倫在他大選勝利后演講時宣布：“南非屬于我們了。”

同一年，青年團在穆達起草的、執行委員會公布的文件中闡述了自己的方針，這就是號召一切愛國青年推翻白人獨裁統治。我們反對南非共產黨人關于非洲人主要是作為一個階級受壓迫而不是作為一個種族受壓迫的見解，并且指出，我們必須在非洲民族主義的旗幟下，由非洲人自己領導發動一個強大的民族解放運動。

我們提倡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廢除禁止非洲人從事技術工作的種族歧視法律，要求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該文件也重點批評了更極端的馬庫斯·加維主張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民族主義與青年團的非洲民族主義兩大理論之間相互拆臺的做法，后者承認南非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

我贊成非洲民族主義的極端革命傾向。我對白人不滿，而不是對種族主義不滿。雖然我不準備把白人趕進大海，但是如果他們爬上他們的輪船自愿地離開這個大陸，我將十分高興。

青年團或多或少地對印度人和有色人更友好一些，與非洲人一樣，青年團把印度人也視作被壓迫的人民。但印度人有自己可以依靠的祖國——印度。有色人也是被壓迫人民，但是他們不像印度人，他們除了非洲之外并沒有自己的祖國。如果他們接受我們的方針政策，我愿意接受印度人和有色人。但是，他們的利益與我們的利益是不相同的，我懷疑他們是否能夠真的投入到我們的事業中來。

馬倫立即開始實行他的惡毒綱領。上臺幾周內，國民黨政府就赦免了戰時的叛徒羅貝·雷布朗特——他曾經組織叛亂，支持納粹德國。國民黨政府企圖限制商會運動，廢除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有限的權利。《選民分離代表法》最終剝奪了有色人在議會中的代表權。《禁止通婚法》于1949年出臺，緊接著又出臺了《不道德行為法》，使白人與非白人之間的性關系非法化。《人口登記法》把南非人按種族加注標簽，使膚色成了個人最重要的仲裁條件。馬倫出臺了《社團區域法》，并把這個法描述成“種族隔離的核心”，要求為每個種族社團劃分居住區。過去，白人依靠武力奪取土地，現在他們又通過立法把掠奪的土地合法化。

面對來自政府的這種新的強大威脅，非洲人國民大會開始走上不平常的歷史性道路。1949年，非洲人國民大會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努力，把自身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群眾組織。青年團起草了行動綱領，綱領的核心就是發動群眾運動。

在布隆方丹舉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年會上，非國大采納了青年團的行動綱領，號召舉行聯合抵制、罷工、消極抵抗、抗議示威及其他形式的群眾行動。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過去，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斗爭策略一直是把其活動控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我們青年團團員早就看到了采取合法的手段打擊種族壓迫的失敗。現在，整個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開始邁出了更積極的一步。

如果沒有內部的劇烈變動，這些變化是不會發生的。在召開年會的前幾周，瓦爾特·西蘇陸、奧利佛·塔博和我在索菲亞頓埃克蘇瑪醫生的家里私下會見了埃克蘇瑪。我們向他說明，按照甘地在印度發動的非暴力抗議活動和1946年開展的消極抵抗運動，我們認為采取群眾行動的時機已經到來，并堅持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壓迫面前太軟弱。我們說，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終究要準備沖破法律的束縛，并且如果有必要則愿意像甘地那樣為了自己的信仰去坐牢。

埃克蘇瑪堅決反對，聲稱這種策略是不成熟的，只能讓政府抓住鎮壓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借口。他說，這種形式的抗議，最終必然會在南非發生，但是，在眼下這個時刻邁出這一步是致命的。他明確表態，他是一個遠近聞名且事業有成的醫生，他不會去坐牢，把自己置于危險的境地。

我們向埃克蘇瑪攤了牌：如果他支持我們建議的行動綱領，我們將在下一次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選舉中支持他；如果他不支持我們的綱領，我們就不會支持他。埃克蘇瑪生氣了，罵我們是敲詐，斷然拒絕我們為他投票的條件。他說我們年輕氣盛，不尊重他。我們規勸他，但是沒起作用，他沒有支持我們的建議。

深夜11點，他不禮貌地把我們從他家中轟出門外，然后立即關上了門。索菲亞頓沒有路燈，那天又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并且所有的公共交通早就停止運行，而我們則住在幾英里外的奧蘭多。奧利佛說，埃克蘇瑪至少應該為我們提供交通工具。瓦爾特在附近有個朋友，我們說服他留我們在那里住了一宿。

在12月份召開的大會上，青年團團員都知道不投埃克蘇瑪的票。由于只有兩個候選人，我們準備選J. S.莫羅卡為主席。他本來不是我們的第一選擇，Z. K.馬修斯才是我們想選的人，但是，馬修斯認為我們太激進，我們的行動計劃太不可行。他稱我們是幼稚的狂熱分子，說我們隨著年齡的增長才會成熟起來。

莫羅卡先生是一位希望不大的候選人。他是全非大會會員，當時全非大會是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組織。當他同意反對埃克蘇瑪的時候，青年團把他作為會員吸收進非洲人國民大會。開始時，他堅持把非洲人國民大會作為全非洲的“國務院”。他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并不太了解，也不是一個有經驗的活動家，但是他尊重別人，支持我們的綱領。和埃克蘇瑪一樣，他也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南非很富有的黑人。他在愛丁堡和維也納上過學，而他的曾祖父曾經是奧蘭治自由邦的總統。19世紀，他曾祖父曾經張開雙臂歡迎南非白人，并且向南非白人贈送土地，后來卻被出賣了。埃克蘇瑪被擊敗了，莫羅卡醫生成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瓦爾特·西蘇陸當選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總書記，奧利佛·塔博當選為全國執行主席。

在這次年會上行動綱領獲得通過，它號召通過聯合抵制，即罷工、不服從政府和不與政府合作，去爭取政治權利。另外，大會還號召一個全國性停止工作日，抗議政府的種族歧視和反動政策。這是一種脫離單純地依靠溫和抗議的騰飛，許多老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堅定分子在這個富有更偉大的戰斗精神的新時代變得大為遜色。如今，青年團團員登上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舞臺。我們正在引導非洲人國民大會走上更積極、更革命的道路。

我只能在遠處慶祝青年團的勝利，因為我不能出席大會。當時我正在一個新的律師事務所工作，上司不準我請兩天假去布隆方丹參加會議。這家律師事務所雖然是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律師事務所，但是，要求我忘記政治，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如果我去參加大會，我將丟掉工作，我經不起這個損失。

群眾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漲，但是我卻對共產黨人和印度人一起采取的任何行動仍然抱有懷疑。1950年3月，由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德蘭土瓦印度人大會、非洲人民組織和共產黨地區委員會一起組織的“捍衛自由演講大會”，吸引了上萬人集中在約翰內斯堡的貿易廣場上。莫羅卡醫生沒經過咨詢執行主席，就主持了“捍衛自由演講大會”，這是一個成功的大會。但是，我仍然對此保持警惕，因為其背后的發起者是共產黨。

在共產黨和南非印度人大會的鼓動下，大會通過了舉行一天總罷工的決議，這一天是5月1日，被稱作自由日。這次罷工要求廢除“通行證法”及所有種族歧視性法規。盡管我支持這些目標，但是，我認為共產黨人企圖搶奪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抗議日的勝利果實。因為非洲人國民大會沒有首先發起這次運動，所以我反對五一大罷工，并認為我們應該集中力量搞自己的運動。

阿邁德·卡特拉達當時只有21歲，和其他青年一樣，他極力為準備大干而摩拳擦掌。他是德蘭士瓦印度青年大會的一名骨干。他聽說我對五一大罷工持反對態度。一天，當我走在總督大街上的時候，碰見了卡特拉達。他很生我的氣，指責我和青年團不想同印度人或有色人合作。他用挑釁的口吻說：“你是非洲人的一個領導，我是一個印度青年，但是我相信非洲群眾是支持五一大罷工的。我向你提出挑戰。你可以指定在任何一個非洲人居住的城鎮召開一次會議，我保證那里的人民將會支持我。”這純粹是一種恐嚇，但也使我很氣憤。我甚至要求非洲人國民大會、南非印度人大會和共產黨三方執行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并準備在會上提出申訴，但是伊斯梅爾·彌爾勸我冷靜下來。他說：“納爾遜，他年輕，頭腦發熱，不要和他一般見識。”最后，我對我的這一行動感覺有點厭倦，并撤回了申訴。盡管我與卡特拉達有分歧，但是我佩服他的激情，我們之間出現的小插曲僅僅是個偶然事件。

運動在沒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正式支持下提前進行。正如預料的那樣，政府禁止5月1日這天召開任何會議和集會。這一天，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洲人都在家中靜坐。當天夜晚，盡管政府禁止集會，但是群眾仍然在奧蘭多聚集。當時，瓦爾特和我就在奧蘭多西區自由日群眾集會的外圍。天上的月亮皎潔而明亮，當我們看著整齊的抗議隊伍游行的時候，我們發現500碼以外的小河對面有一伙警察正在集中。他們一定也看見了我們，因為他們忽然向我們這個方向開槍。我們假裝被擊倒在地上，看著警察沖向人群用警棍擊打群眾。我們躲進附近的一個護士宿舍里，在那里聽見子彈射入墻中的聲音。在這次不加區別的、無緣無故的襲擊中，有18名非洲人被打死，另有許多非洲人被打傷。

盡管這次暴行遭到了抗議和譴責，但是民族主義者的反應卻是保持克制。幾周后，政府出臺了臭名昭著的《鎮壓共產主義條例》，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約翰內斯堡召開了緊急會議。這個法律宣布南非共產黨是非法的，使參加共產黨成了犯罪，最多可判處10年監禁。這個法律的打擊面太大，它把一切僅僅是最溫和地向政府提出的抗議也列為違法，把犯罪范圍擴大到在工會內進行任何引起“政治、工業、社會或經濟騷亂或混亂”的理論宣傳。這個法律基本上允許政府隨意把任何一個組織列為非法組織，禁止任何個人反對政府的政策。

非洲人國民大會、南非印度人大會和非洲人民組織再次召開會議討論新對策。除了其他人在會上發表了講話外，達杜醫生也講了話，他說，允許過去的分歧阻礙聯合陣線反抗政府是愚蠢的。我發言支持他的觀點：顯然，對任何一個自由團體的鎮壓都是對所有自由團體的鎮壓。在這次會上，奧利佛說了一句預言性的話：“今天鎮壓的是共產黨，明天將會是我們的商會、我們的南非印度人大會、我們的非洲人民組織和我們的非洲人國民大會。”

在南非印度人大會和非洲人民組織的支持下，非洲人國民大會決定將1950年6月26日定為全國性抗議活動日，抗議政府5月1日殺害18名非洲人和通過《鎮壓共產主義條例》。這項建議獲得了批準，在準備全國抗議日的過程中，我們進一步密切了與南非印度人大會、非洲人民組織和南非共產黨的關系。我相信，我們面臨著很大的威脅，但這種威脅可以使我們與我們的印度盟友和共產黨盟友攜起手來。

這一年年初，我被選進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執行委員會，接替了埃克蘇瑪醫生的位置。埃克蘇瑪在再次競選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落敗后辭去了職務。我并非沒有注意到這樣的事實：在我10年前來到約翰內斯堡的時候，是埃克蘇瑪醫生設法為我安排了第一份工作，當時我還沒有介入政治的想法。現在，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我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中資歷最深的人一道工作。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我已經由一個“牛虻”變成了一個我一直反對的實權人物。這是一種很難理解的感覺，讓我百感交集。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一個異見人士更容易一些，因為他沒有責任。但是，作為一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我必須權衡各種意見并作出決定，而且還要預料到來自像我自己這樣的反對者的批評。

群眾運動在南非是危險的。在這里，非洲人舉行罷工是犯罪，言論自由和集會運動的權利被無情地剝奪。舉行罷工，一個非洲人不但要承擔丟掉工作的危險，而且還有可能丟掉他的全部生活條件，甚至還會丟掉他在本地居住的權利。根據我的經驗，政治性罷工要比經濟性罷工更危險。因為出于政治上的不滿而舉行的罷工，與因為一個明確的利益訴求而舉行的罷工相比——諸如要求提高工資或減少勞動時間，是一種更危險的活動，需要特別有效的組織。全國抗議日正是一次政治性罷工，而不是一次經濟性罷工。

在醞釀6月26日大罷工的過程中，瓦爾特走遍了全國，征求各地領導人的意見。在他外出期間，我主持繁忙的非洲人國民大會辦公室的日常工作，這里是組織這次全國性大罷工的指揮中心。每天，各種各樣的領導人都到這個辦公室了解按計劃準備這次罷工的進展情況。他們有：達杜醫生、迪利扎·穆吉、德蘭士瓦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J. B.馬科斯、玉蘇福·凱查利亞和他的弟弟莫拉維、行動委員會書記高爾·瑞德貝、邁克爾·哈邁爾、皮特·拉寶羅克、恩塔托·莫特拉納。我負責協調全國各地的行動，與各地領導人保持電話聯系。我們一點閑空都沒有，匆匆忙忙地做著各種謀劃。

全國抗議日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一次嘗試在全國范圍內舉行的政治性大罷工，也是一次恰到好處的、成功的大罷工。在城市里，多數工人都待在家里，黑人經營的商店和公司都關門停止營業。在貝瑟爾，后來成為德蘭士瓦省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的格特·西班德領導了5000人的游行隊伍，這次活動成為全國各大報紙的重要新聞。全國抗議日鼓舞了我們的士氣，使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給馬倫政府傳遞了一個警示：我們不會在種族隔離面前一直保持被動。因此，6月26日成為自由斗爭中的一個里程碑。在解放運動中，它被看作自由日。

這是我第一次在全國運動中擔任重要角色。我感覺到一種由于計劃周密而取得對敵斗爭勝利迸發出來的興奮感和與可怕的敵人斗爭中產生的同志情誼。

我正在學習的斗爭是非常耗費精力的。如果一個人投身于斗爭中，他就成了一個沒有家庭生活的人。在準備全國抗議日期間，我的第二個兒子馬卡托·萊瓦尼卡出生了。他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我正在醫院里陪著艾韋琳。但是，這僅僅是一段短暫的日常休息時間。他的名字來源于兩個偉大人物：一個是自1917年到1924年擔任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二任主席的賽法庫·馬寶高·馬卡托，一個是贊比亞一位領導者萊瓦尼卡。馬卡托是一個佩迪酋長的兒子，他曾經帶領志愿者反對不允許非洲人在比勒陀利亞人行道上行走的種族歧視性法令，他的名字對我來說是膽識和勇氣的象征。

在全國抗議日的準備期間，有一天我太太告訴我，我那當時只有5歲的大兒子泰姆比問她：“我父親住在哪里？”我一直是深夜他已入睡的時候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他還沒醒我就早早地離開了家。我不想離開我的孩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十分想念他們，不知不覺我竟然幾十天沒和他們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反對什么。我長期堅持反對共產黨的立場發生了動搖。共產黨的總書記、非洲人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摩西·考塔尼經常深夜來我家，我們常常一直辯論到第二天早上。考塔尼頭腦清醒、自學成才，是德蘭士瓦省一位農民的兒子。他說：“納爾遜，你為什么反對我們？我們都反對同樣的敵人，我們不想獨攬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權力，我們也是為非洲民族主義工作。”最后，我無法找到理由反駁他的觀點。

由于我與考塔尼、伊斯梅爾·彌爾和魯思·弗斯特之間的友情和我對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的觀察，我越來越難找到對共產黨抱有偏見的正當理由。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像J. B.馬科斯、埃德溫·莫福參亞納、旦·圖魯麥和大衛·博帕佩這樣的共產黨人比別人更埋頭苦干、努力工作，他們作為偉大的自由戰士是無可挑剔的。達杜醫生，1946年抵抗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作為一個爭取人權的戰士而起到的作用使他成為各個團體組織的英雄。我不能再懷疑這些人的誠意。

即使我不再懷疑他們的獻身精神，但是我仍然可以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從哲學和實踐角度提出問題。然而，我對馬克思主義又知之甚少。在與我的共產主義者朋友開展的政治討論中，我常常由于對他們的理論的無知而陷入尷尬的境地。我決定改變這種狀況。

我找來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的全套著作，探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理。我沒有時間認真研究這些著作。雖然我對《共產黨宣言》產生了興趣，但是研讀《資本論》卻讓我疲憊不堪。不過，無階級社會的思想卻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認為，這種思想與非洲傳統思想很相似。在非洲傳統思想中，生活是共同享受的，財產是共有的。我贊成馬克思的基本理論，它既簡單明了又慷慨無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辯證唯物主義似乎既是驅趕種族壓迫黑暗的明燈，又是用來結束種族壓迫的工具。我認識到要通過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通過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關系去認識形勢。因為，如果我們的斗爭要取得勝利，我們必須超越黑人和白人的概念。我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總是傾向于相信我能證實的東西。我認為馬克思關于經濟的唯物主義分析很有道理。商品價值是由進入該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這個思想特別適合南非。統治階級支付給非洲勞工僅供生存的工資，然后在商品成本中增加價值，這種增加的價值被他們自己留下了。

馬克思主義號召采取革命行動像音樂一樣縈繞于自由戰士的耳畔。他關于通過斗爭取得歷史進步和革命飛躍中發生變化的思想同樣富有感染力。在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大量的知識，這些知識對于一個政治家解決面臨的問題是很有針對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民族解放運動給予了很大的關注，蘇聯特別支持許多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這就是我為什么改變對共產黨人的看法、接受非洲人國民大會歡迎馬克思主義者加入的另一個原因。

有一個朋友曾經問我為什么能在堅持非洲民族主義的同時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對我來說，這并不矛盾。我首先是一個為我們從少數統治者那里解放出來而戰、為控制自己命運的權利而戰的非洲民族主義者，但同時，南非和非洲大陸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的問題除了鮮明性和特殊性之外并不是獨一無二的。因此，一個把問題置于世界范圍和歷史過程之內進行研究的思想是有價值的。我愿意使用一切必要的方式、方法加速清除人類偏見，加速結束沙文主義的、暴力的民族主義。我不必要為了同他們一道工作而成為一個共產黨人。我發現，非洲民族主義者和非洲共產主義者應當更多地加強團結，而不是加劇分裂。懷疑者總是說共產主義者正在利用我們，但是誰又能說我們不是在利用他們呢？

14...

如果說在國民黨上臺之前我們還對他們抱有某種希望或幻想，那么我們很快也就把這些希望和幻想放棄了。他們威脅要把卡非爾人置于應有的位置上并不是一句空話。除了《鎮壓共產主義條例》以外，1950年又通過了《人口登記法》和《社團區域法》兩部法律，這些法律形成了種族隔離的基礎。正如我所提到的，《人口登記法》使政府有權按照種族把南非人劃分成若干類別。如果當時種族還不是南非社會等級劃分的先決條件的話，而實施新的法律后也將會是如此。這種專橫地、毫無意義地把黑人從有色人中劃分出來或把有色人從白人中劃分出來的做法常常導致悲劇的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個家庭的成員也可能被劃分成不同的人種，劃分的標準完全是依據孩子膚色的深淺。一個人能不能在某個地方居住和工作，要依據他的頭發是卷是直、嘴唇是大是小作出荒唐的劃分。

《社團區域法》是實現種族隔離居住的基礎。按照這個法律的規定，每個種族社團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房產占地和經商只能在該種族擁有的獨立區域內進行。因此，印度人只能在印度人區域內生活，非洲人只能在非洲人區域內生活，有色人只能在有色人區域內生活。如果白人需要另一個種族社團的土地或房子，他們只需簡單地宣布這塊土地是一個白人區即可拿走。《社團區域法》開始了一個強迫搬遷的時代。一旦非洲社區、城鎮和村莊被劃成“白人”居住區，那么其中的非洲人就被強迫搬到別的地方居住，因為附近的白人土地擁有者不讓非洲人住在他們附近，或者說白人僅僅是為了取得他們的土地。

列入搬遷名單的第一個城鎮是索菲亞頓，這是一個擁有5萬人的生氣勃勃的社區，也是約翰內斯堡最古老的一個黑人居住區。盡管索菲亞頓比較貧窮，但是這里卻充滿著豐富的生活氣息，它是非洲人生活和文化中許多新的有價值的東西的孵化器。甚至在政府努力對其實施搬遷政策之前，盡管人口不多，但索菲亞頓對非洲人卻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義。

第二年，政府又出臺了兩個直接侵犯有色人和非洲人權利的法律。《分離代表投票法》目的是把有色人轉移到開普省的分離投票處，從而淡化他們享受了一個多世紀的特權。《班圖管理機構法》解散了土著代表委員會這個間接的非洲人全國代表機構，由政府指派的氏族酋長等級制度取而代之，目的是恢復傳統的、主要由保守的種族酋長享受的權力，使開始腐朽的種族差別永遠存在下去。兩個法律充分暴露了國民黨政府的道德嘴臉，都謊稱保留他們企圖消滅的種族，明明是剝奪人民權利的法律，卻一定要標榜成恢復人民權利的法律。

有色人舉行集會反對《分離代表投票法》，他們于1951年3月在開普敦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4月份他們又舉行商店關門罷市、學生罷課活動。正是在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積極行動精神的鼓勵下，瓦爾特·西蘇陸第一次向我們中的小部分人提出了全國公民表示不服從的抗議活動思想。他草擬了一個計劃，從各個社團中挑選不怕坐牢的志愿者，以反對某些種族歧視性法律。

這個思想立即對我產生了影響，同時也感染了其他人。但是，在挑選誰參加的問題上，我與瓦爾特持有不同的意見。我當時剛剛成為青年團的全國主席，我以我的這個新職務的名義力主全部挑選非洲人。我說，普通非洲人仍然對與印度人和有色人采取聯合行動存有戒心。雖然我在對待共產主義的態度上已經有了進步，但是我仍然害怕印度人的影響。另外，我的許多非洲支持者都把印度人看成是黑人勞工的剝削者，因為他們是商店老板和商人。

瓦爾特堅決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建議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緊緊地團結在一起。這個問題被提交到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上，我的意見遭到了否決，甚至那些被認為是最堅定的非洲民族主義者也堅持否決我的意見。但是，我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把這個問題又提交到1951年12月舉行的全國會議上。和在全國執行委員會上一樣，我的意見又被代表們堅決地否決了。既然我的觀點在非洲人國民大會最高級別的會議上被否決，那么，我完全接受和同意大家的立場。雖然大家對我發表的主張非洲人單獨行動的講話反應冷淡，但是，在青年團宣誓支持聯合行動的新政策之后，我以青年團主席的身份發表的講話卻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在莫羅卡醫生、瓦爾特、J. B.馬科斯、玉蘇福·達杜組成的聯合計劃委員會的要求下，非洲人國民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政府廢除《鎮壓共產主義條例》、《社團區域法》、《分離代表投票法》、《班圖管理機構法》、“通行證法”，以及1952年2月29日出臺的《限制牲畜法》。出臺《限制牲畜法》的目的是減少牛的數量，防止過度放牧。但是，這個法律將使非洲人的土地進一步減少。聯合委員會決定，非洲人國民大會將在1952年4月6日舉行示威活動，作為發動抗議不公平法律運動的序幕。同一天，南非白人將慶祝簡·范·里貝克于1652年到達好望角300周年。4月6日是南非白人一年一度地慶祝他們的國家建立的紀念日，非洲人則把這一天詛咒為“300年受奴役的開始日”。

非洲人國民大會給總理寫了信，把這些決定告訴他，并提出了他廢除這些法律的最終期限。這封信是以莫羅卡的名義發出的，而莫羅卡并沒有參與寫這封信。按照上級的指示，我駕車到薩巴恩楚把這封信送到了他的家里。薩巴恩楚是奧蘭治自由邦布隆方丹附近的一個小城鎮，而奧蘭治自由邦是南非的一個保守地區。我差一點沒能趕去那里見他。

僅僅幾周前，我剛剛參加了汽車駕駛執照考試。那時候，駕駛執照對于一個非洲人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因為沒有幾個黑人能夠有汽車。在指定的那一天，我借了一輛車去參加考試。我有點過于自信，決定自己開車去。我出發時有點晚，所以開車開得太快。當我駕駛著汽車沿大街的一側行駛到一條主干道上的時候，由于沒有觀察左右兩側是否有汽車，與來自另一個方向的汽車撞在了一起。撞得雖然不怎么厲害，但是我卻誤了考試的時間，與我撞車的那位駕駛員是一位通情達理的人，我們雙方同意分別擔負自己修車的費用了事。

當我到達考場的時候，我看見一個白人婦女正在我前面接受考試，她開得很好，也很小心。當考完試的時候，考官說：“謝謝你，請把車停到那邊去。”他用手指了指附近的一片空地。她圓滿地通過了考試，但是，當她去停車的時候卻沒注意拐彎，后輪軋在了路邊石上。考試官立即趕過去說：“對不起，太太，你沒有通過這次考試，請另約定時間重新參加考試。”我感覺自己信心也不大了。如果這個考官設圈套不讓這位白人女士考試過關，我還有什么希望？但是在考試的時候，我表現不錯。當考官告訴我把車停在考場一端時，我非常小心，甚至擔心他會因為我開得太慢而不讓我通過考試。

一旦能夠合法地駕駛汽車，我立即成了一個“私人出租車司機”。我把讓同志和朋友搭車看成是自己的義務，所以，我也就有責任去給莫羅卡醫生送這封信。這對我來說并不是什么難事，我總是把駕著汽車透過車玻璃看著外面當做一大樂趣。當我駕車穿過農村、外面的風從窗子吹進車內的時候，我的心情似乎會處于最佳狀態。

在去薩巴恩楚的路上，要穿過克龍斯塔德。這是一個保守的自由邦的小城鎮，在約翰內斯堡以南大約120英里的地方。當我開著車爬上一座小山時，我看見兩個白人孩子正在前面騎自行車。我的駕駛技術仍然不怎么熟練，當我行駛到他們身邊的時候，其中卻有一個孩子忽然沒來由地來了個急轉彎，于是，我們撞在了一起，他被從自行車上撞了下來。當我下車去扶他的時候，他在地上直呻吟。正當我讓他伸出胳膊想把他抱起來的時候，一個白人卡車司機喊我不要動那個孩子。卡車司機使小孩產生了恐懼，他放下了胳膊，似乎不讓我把他抱起來。那個孩子并沒有嚴重受傷，卡車司機把他領到了附近的警察局。

當地警察很快就到了，警察中士看了我一眼說：“卡非爾人，你今天要拉屎（shit）了！”我為這次事故及他說話的兇狠態度而十分擔心，但是我仍然態度鮮明地告訴他：“我愿意什么時候拉就什么時候拉，不用警察來指點。”聽了我這句話，那位中士掏出了筆記本開始記錄我的詳細情況。如果一個黑人能講英語，不用多說，南非白人警察會感到非常吃驚。

我就我的身份作了自我介紹之后，他轉身去查看汽車，并仔仔細細地進行搜查。從車內的墊子底下，他抽出了一份左翼周報《衛報》。這份周報是我在發生事故后立即藏在墊子下面的，同時，我把給莫羅卡的信偷偷放進了我的襯衣里。他看了周報的標題，然后舉在空中，就好像是一個海盜得到了戰利品：“我抓到了一個共產黨人！”他一邊喊叫一邊揮舞著那份周報匆匆地離我而去。

四個小時后，那個中士又回來了，同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官員。這位官員也是一個南非白人，他想正常地履行他的公務。他說他要勘察一下事故的現場，并填寫警察記錄表。我告訴那位中士說，事故是白天發生的，到了晚上再勘察是不適當的。我又說我打算在薩巴恩楚住宿，我不能住在克龍斯塔德。那位中士不耐煩地看了看我說：“你叫什么名字？”

“曼德拉。”我回答。

“不，我問你的名字而不是問你姓什么。”他對我說。我告訴他我叫納爾遜。

“納爾遜，”那位中士說，就好像是在同一個小孩子說話，“我想幫助你重新上路。但是，如果你想找麻煩，我只好與你過不去，把你銬一夜。”這些話讓我心中有了數，于是我同意他進行勘察。

那天晚上很晚我才重新上了路。第二天早晨，我正穿過伊克賽爾西亞地區的時候，我的汽車拋了錨，車沒有油了。我走到附近的一個農戶家里，用英語向一個老太太說我想買點汽油。她把門一關說：“我沒有汽油賣給你。”我又好歹向前行了2英里，來到了另一個農戶家里。由于第一次失敗的教訓，我采取了另一種方式。我請求見這個農戶，他露面的時候我很謙卑地說：“我的巴士（baas）跑沒油了。”（baas是南非荷蘭語，是老板的意思，也有奉承之意）。這個農戶很友好，也很樂意幫助別人。他是總理大臣斯特里德的一個親戚。我想，如果我向他說了實話并不使用baas這個討厭的詞的話，他可能不會給我汽油。

我與莫羅卡的會面并不像我在去那里的路上那樣值得一提。他接受了那封信之后，我就回了約翰內斯堡。回來的路上也沒遇到什么麻煩。給總理的信表明，非洲人國民大會在我們的建議下將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憲法手段爭取合法權益，我們的要求是到1952年2月29日廢除6部不公平的法律，不然，我們將采取憲法以外的行動。馬倫通過他的私人秘書作了回復，聲稱白人天生有權采取措施保護自己作為獨立社團的身份，并且最后威脅說，如果你們采取行動，政府將毫不猶豫地利用一切手段進行鎮壓。

我們把馬倫拒絕我們的要求看作是一種宣戰。現在，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只能訴諸公民抑制、抗議。我們開始竭盡全力準備發動群眾運動。招募和訓練志愿者是組織這場運動的基礎工作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這場運動的成敗。4月6日，在約翰內斯堡、比勒陀利亞、伊麗莎白港、德班、開普敦舉行了初步的示威活動。當莫羅卡在對約翰內斯堡自由廣場的人群發表講話的同時，我正在服裝工人工會向準備擔當志愿者的人群講話。我向幾百名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解釋說，由于政府當局可能會恐嚇、拘禁，甚至襲擊志愿者，因此，志愿者運動是一個困難的甚至危險的任務。無論政府當局采取什么手段，志愿者不能以牙還牙，不然，我們的整個計劃就會遭到破壞。志愿者必須用非暴力對付暴力，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紀律。

5月31號，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的執行委員們在伊麗莎白港召開了會議，宣布抗議活動將在6月26日開始，這天是全國抗議日活動一周年紀念日。他們還組建了一個全國行動委員會指導運動，建立了一個全國志愿者委員會招募和培訓志愿者。我被任命為全國運動志愿者統帥和行動委員會與志愿委員會主席。我的職責是組織運動、協調各地區分支機構的關系、動員志愿者和籌集資金。

我們還就運動是否遵循非暴力的甘地原則或“不合作主義”展開了討論。不合作主義是一種設法通過轉化來征服對方的斗爭方法。有的人站在純道德的立場上贊成非暴力原則，并認為從道德上講，非暴力原則比其他任何原則都優越。馬尼拉·甘地十分贊成這個思想。他是圣雄甘地的兒子，也是《印度輿論》（Indian Opinion）的編輯和南非印度人大會的著名成員。馬尼拉·甘地舉止文雅，儼然就是非暴力主義的化身。他堅持認為，抗議運動要遵循其父親在印度舉行抗議活動時所采取的路線。

其他人則認為，我們不應從原則的觀點，而應該從戰略戰術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應該根據情況選擇斗爭方式。如果某種斗爭方法或戰略戰術能夠讓我們打敗我們的敵人，那么，我們就應該采用這種斗爭方法或戰略戰術。在當前情況下，政府遠比我們強大，我們任何使用暴力的企圖都會遭到毀滅性的鎮壓。這種情況使非暴力成為實踐的必然，而不是一種選擇。這是我的觀點，我按照甘地的模式看待非暴力。不能把非暴力看作一種神圣不可違背的原則，而應當把它看作一種根據形勢需要而使用的戰略戰術。正如甘地本人認為的那樣，這個原則并沒重要到即使它已在妨礙我們的目的時，仍需堅持不變。我們主張非暴力抵抗，但前提是它是有效的。盡管馬尼拉·甘地堅決反對，但是這種觀點仍然占了上風。

聯合計劃委員會同意根據情況靈活運用不合作和非暴力戰略戰術，并建議采取兩個階段進行抗爭。第一階段，少量訓練有素的志愿者將在幾個市區違反要求廢除的法律。他們不經允許就進入前面講過的區域，使用只有白人才允許使用的設施，例如衛生間、火車廂、會客室和郵局入口。他們將故意在宵禁后滯留在市區。每批反抗人員都有一個領導人，由他提前把這些不服從行為告訴警察，這樣，小范圍的騷亂就會導致逮捕行動的發生。第二階段，按預想的謀劃采取大規模反抗活動，同時在全國舉行大罷工和其他大規模行動。

在開始發動反抗行動前，我們于6月22日在德班召開了一個大會，并取名“志愿者日”。納塔爾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魯圖利酋長、納塔爾南非印度人大會主席奈克醫生都在會上講了話，表示全力以赴地參加這個運動。我在那天前就駕車來到了德班，而且是這次德班會議的主要發言人。大約有一萬人出席了會議，我告訴大家，這次反抗運動將是南非被壓迫群眾采取的最大的行動。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在那么多人面前發表過講話，這是一次令人興奮不已的經歷。一個人面對廣大的聽眾發表講話不可能像面對少數人發表講話一樣，但是，我總是試圖做得就像面對少數人發表講話一樣。我告訴大家他們將創造歷史，要求他們密切注意南非的種族歧視政策。我強調，黑人，其中包括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要加強團結。在南非，這一點終將成為現實。

在全國各地，那些參加6月26日反抗運動的人們就是帶著勇氣、熱情和歷史感這樣做的。當天一大清早，反抗運動在伊麗莎白港開始。在那里，33名反抗者在雷蒙德·穆拉巴的帶領下，從只允許白人進入的一個入口進入火車站并遭到逮捕。他們高唱著自由歌曲，在朋友和親屬的喝彩聲中往前行進著。反抗者和聚集的群眾一唱一和地高聲呼喊：“Mayibuye Afrika!”（讓非洲再回來！）

26日上午，我在非洲人國民大會辦公室里密切關注著當天的示威活動。德蘭士瓦的志愿者計劃中午在約翰內斯堡東面一個靠近非洲人居住區的城鎮上采取反抗行動。在N. B.坦茨的帶領下，他們將由于未經允許而進入博克斯堡市區而被法院拘留。坦茨是一位上了年紀的人，他是非洲衛理公會英國教堂的牧師，也是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執行主席。

那是快到中午的時候，我正在等待坦茨牧師從比勒陀利亞過來，他從辦公室給我打來了電話。他聲音中帶著遺憾告訴我，他的醫生反對他參加反抗運動和去坐牢。我向他保證，我們將為他提供暖和的衣服，并且保證他只在監獄里住一個晚上。但是，我的努力沒有起作用。這使我很失望，因為坦茨牧師是一個著名人物，我們選擇他的目的是向政府表明我們并不是一伙年輕的鬧事者。

我們很快找到了一個同樣德高望重的人代替坦茨牧師——德蘭士瓦南非印度人大會的主席納納·西塔。他在1946年的抗議運動中因為消極反抗而在監獄里待了一個月。盡管他年齡偏大，而且患有關節炎，但是，西塔是一個斗士，他愿意帶領我們的反抗者進行抗議。

下午，正當我們準備去博克斯堡的時候，我發現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書記不知去向，我們本來打算讓他陪著納納·西塔去博克斯堡。這是又一個緊急事件，我轉身對瓦爾特說：“你必須去。”這是我們在德蘭士瓦的第一件大事，必須有著名的人物帶領反抗者，不然，當群眾遭受懲罰的時候，領導人倒顯得畏縮不前。盡管瓦爾特是組織者之一，并且按計劃是在運動的后期參加反抗，但是他還是欣然同意了。我主要擔心他正穿著的西裝不適合監獄，但我們設法給他另弄到了一些舊衣服讓他換上了。

然后，我們動身去博克斯堡。在那里，玉蘇福·凱查利亞和我打算給博克斯堡的市長發一封信，告訴他，我們50名志愿者將在那天不經允許進入他轄區里的非洲城鎮。當我們到達市長辦公的地方時，我發現有大批的新聞記者聚集在那里。當我把信遞給市長的時候，攝影記者紛紛拍照。市長躲開照相機的閃光燈，然后邀請玉蘇福和我到他的辦公室里私下進行商談。他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他說，他的辦公室總是對我們敞開的，但是過多的公開將只能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我們從市長辦公室直接去了市區，那里正在進行著示威活動，即使是在半英里以外，也能聽見我們的志愿者和前來鼓勵他們的大批支持者的高昂歌聲。到了現場，我們看見進入市區的大鐵門被上了鎖，我們的志愿者耐心地在門外等候著，要求進入市區。總共有52名志愿者，其中有非洲人，也有印度人，另外還有幾百名熱情的圍觀者和記者。瓦爾特站在志愿者的最前列，他的存在顯然起到了預期的作用。但是，示威者的精神領袖是納納·西塔，盡管他患有關節炎，但他仍然精神飽滿地在示威者中間走動，用他的自信鼓勵示威者，使他們增強了勝利的信心。

不到一個小時便出現了僵局，警察從來沒有那么克制，他們的行為使我們感到困惑。難道他們的克制是一種消耗志愿者斗志的策略？難道他們等候記者們散去后再在黑暗的掩護下采取大屠殺？難道由于逮捕我們將會面臨進退兩難的局面，因此他們將按我們的要求去做？就在我們捉摸不定的時候，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警察命令把門打開。志愿者立即跨過大門，這樣志愿者們就違反了法律。一個警察中尉吹了聲口哨，幾秒鐘后，警察就包圍了志愿者，并開始逮捕他們。運動正在按計劃進行，示威者被用車送到當地的警察局并被提起公訴。

同一天晚上，行動委員會的幾個領導人，其中包括奧利佛·塔博、玉蘇福·凱查利亞和我本人，在市內出席了一個會議，討論白天要采取的行動，并計劃下一周要采取的措施。開會的地點就在由非洲人國民大會中心支部主席弗拉格·博西亞羅帶領的第二批反抗者被司法拘留的場所附近。晚上11點過后不久，我們發現他們整齊地行進在大街上。按規定，宵禁在晚上11點鐘開始，此時非洲人在外面活動需持有許可證。

會議一直開到午夜，我感到疲憊不堪，此時我正在想的不是反抗，而是吃一頓熱飯并睡上一覺。就在這時，一個警察走到玉蘇福和我的面前。很明顯，當時我們正準備回家，而不是準備去參加反抗。“不，曼德拉，”那個警察說，“你跑不掉了。”他用警棍指了指停在附近的警車說：“上車。”我想向他解釋，我負責抗議運動的日常組織運行，而不打算這么早就自己參加反抗并受到逮捕。當然，這有點對牛彈琴。我看著他逮捕了玉蘇福。面對這具有諷刺意味的一切，玉蘇福突然大笑起來。他笑著被警察帶走的情景簡直就是一幅生動的圖畫。

不大工夫，玉蘇福和我來到了弗拉格·博西亞羅帶領的那50多位志愿者面前，他們正在被用卡車送到被稱作馬歇爾廣場的紅磚警察局。作為行動委員會的領導人，我們擔心別人不知道我們的去向，我也關心誰將領導下一步的行動。但是，我們的精神是振奮的。就是在走向監獄的路上，警車在反抗者高唱的《上帝保佑非洲》（Nkosi Sikelel’ iAfrika）的歌聲中搖晃著向前行駛，那是一曲曲調優美的南非國歌。

第一天晚上，我們有位同志在軍隊操練大院里被一位白人獄警野蠻地推倒在幾步之外，扭傷了腳脖子。我對那個獄警的野蠻行徑提出了抗議，他一腳踢在我的脛骨上。我要求給受傷的人治療，發動了一個規模不大但卻聲勢強烈的示威活動。我們被告知，如果受傷的人希望去治療，第二天可以申請找醫生。那天，我們聽見他痛苦地呻吟了一整夜。

當時，我雖然只在監獄里度過了很短的時間，但是，這卻是使我第一次具有強烈仇恨的一次經歷。馬歇爾廣場是骯臟而黑暗的地方，但是，我們大家在一起情緒十分高漲，因而似乎沒有注意到周圍的環境。反抗戰士之間的友誼使我們感到那兩天的監獄生活過得十分快樂。

在舉行反抗運動的第一天，全國有250多名志愿者因違反不公平法律而被投進了監獄。這是一個好的開端。我們的隊伍是一支整齊的、守紀律的、充滿信心的隊伍。

在隨后5個月的時間里，共有8500人參加了反抗運動。醫生、工人、律師、教師、學生、牧師中都有人因參加反抗運動而走進了監獄。他們唱著：“嗨，馬倫！打開監獄門，我們要進去。”運動不僅蔓延到威特沃特斯蘭德、德班、伊麗莎白港、東倫敦和開普敦等大城市，也蔓延到了東開普和西開普等地區的小城鎮，甚至滲透到了農村地區。多數人所犯的“罪”都比較小，受的懲罰從監禁幾天到最多監禁幾周，罰款很少超過10英鎊。反抗運動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會員從2萬人左右猛增到10萬人。會員數量增長最快的地區是東開普，有一半新會員來自那里。

在歷時6個月的反抗運動期間，我在全國走了很多地方。我一般都是駕駛汽車天不亮就出發。我去了開普、納塔爾和德蘭士瓦，向一個個小型的社團宣傳反抗運動，有時只能在一個城鎮內挨家挨戶地宣傳。我的任務大多是為了消除準備發起運動與當時剛剛發起過運動的地區間的分歧。那時候，非洲人的群眾通信手段是原始的，或者說是根本不存在的，在政治方面也是目光短淺的。我們必須一個人一個人地去爭取人民的支持。

有一次，我開車去東開普，解決與艾爾克特·格溫奇有關的爭端。當時，艾爾克特·格溫奇正在東倫敦開展活動。他是一個成功的商店店主，曾在兩年前組織“6·26東倫敦罷工”中起到過重要作用。這次反抗運動一開始，他就毅然走進了監獄。他是一個能力很強的人，但是，他又是一個個人主義很嚴重的人，他無視執行委員的勸告，單獨作出決定。現在，他與執行委員又發生了爭執。這種問題主要發生在知識分子之間。

格溫奇明白如何利用特定的問題對付他的對手。他會在當地工人會員而不是知識分子會員面前演講，而且用的是科薩語，他從來就不用英語，因為英語是知識分子使用的語言。他說：“同志們，我想你們知道，我在這次斗爭中遭受了很大的損失。我本來有一份好工作，但是在反抗運動一開始我就進了監獄并丟了工作。現在我雖然出了監獄，但這些知識分子來了，他們對我說，‘格溫奇，我們受的教育比你好，也比你有能力，應該讓我們領導這次反抗運動’。”

在我了解情況的時候，我發現格溫奇確實沒有理會執行委員的勸告。但是，他后面有群眾支持，他造就了一支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志愿者隊伍，這支志愿者隊伍在格溫奇進了監獄之后仍然以整齊的陣容參加了反抗。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格溫奇無視執行委員是錯誤的，但是他工作做得不錯，他的權力地位很牢固，難以直接罷免他的職務。當我見到執行委員們的時候，我說，現在對現狀進行任何變動都是不切合實際的，如果想更改，只有在下一輪選舉中擊敗他。我第一次看見他們如此魯莽地違背人民的意愿。群眾不贊成，采取什么行動都沒有用，因為強迫將是不可能的。

政府把這次反抗運動看作對他們本身的安全和種族隔離政策的一種威脅。他們不是把公民的不順從看作一種抗議活動，而是看作一種犯罪，他們因為非洲人和印度人之間的合作而憂心忡忡。種族隔離本來是打算把種族分開，但是，我們卻表明不同的種族能夠在一起工作。非洲人和印度人、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組成聯合陣線的前景使他們大傷腦筋。國民黨人堅持認為，共產主義鼓吹者煽動并領導了這次反抗運動。司法部長宣布，他將很快通過立法對付我們的反抗。在1953年議會召開會議期間，作為對我們的威脅手段通過了《公共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公共安全法》授權政府可以宣布戒嚴令，不經審判即可逮捕人；而《刑法修正案》則授權政府可對反抗者實施肉體懲罰。

政府使用了許多卑鄙手段阻撓這次運動。政府宣傳喉舌一再叫嚷，運動的領導人都在舒舒服服地過日子，而群眾卻在監獄里受苦。這種指控遠非事實，但是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政府還派遣間諜和密探打入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自然是歡迎任何人士加入的。盡管我們的志愿者在被選中參加反抗活動之前已經經過了認真的挑選，但是警察還是設法不僅打進了我們的地方分支機構，而且也打進了某些志愿者隊伍。當我被捕后被送到馬歇爾廣場的時候，我看見反抗志愿者中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我從來沒見過。他身上穿著非同一般的監獄服裝：系著領帶，身穿外套，脖子上還有一條絲綢圍巾。什么樣的人在監獄里還有這身打扮？他名叫拉麥拉，第三天我們被如期釋放時，他干脆消失了。

第二個人名叫馬克漢達，他因為舉止酷似軍人而十分顯眼。我們都是來自農村，情緒都很高。反抗者們走到玉蘇福和我的面前都要給我們敬禮。馬克漢達是個瘦高個，他以軍人的姿態走到我們兩人面前行了個非常正規的軍禮。許多人都與他開玩笑，說他敬禮敬得那么好，一定是個警察。

馬克漢達以前只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個看門人。他很勤快，人緣也算不錯，因為不管誰餓了，他都會出去買魚和炸薯條。但是，在后來的審判大會上，我們發現馬克漢達和拉麥拉兩人都是警察派來的間諜。經證實，拉麥拉打進了反抗者的隊伍，而那個被認為信得過的馬克漢達原來是警探中尉莫特龍。

非洲人當間諜對付他們自己的兄弟一般都是為了錢。南非很多黑人認為，黑人向白人挑戰的任何努力都是有勇無謀的，并注定要失敗，因為白人太精明、太強大。這些間諜認為我們的行動不是對白人權力構成威脅，而是對黑人利益構成威脅，因為白人會由于少數煽動鬧事者的所作所為而虐待所有的黑人。

也有許多黑人警察偷偷地幫助我們。他們是正派人，知道自己的處境在道德上是進退兩難的。他們忠于他們的雇主，需要有個工作來養家糊口，但是又對我們的事業非常同情。我認識少數在安全警察局工作的黑人官員，當警察要襲擊和搜捕我們的時候，他們會向我們通風報信。這些人是在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我們的愛國志士。

政府不是我們的唯一障礙物，其他一度幫助過我們的人也可能會成為我們的絆腳石。在反抗運動處于高潮的時候，合眾黨派了兩個議員督促我們停止反抗運動。他們說，如果我們響應合眾黨領導人J. G. N.斯特勞斯的號召，放棄我們的反抗運動，將有助于該黨在下一輪選舉中擊敗國民黨。我們拒絕了這個要求，因此斯特勞斯也開始采用國民黨人的手段攻擊我們。

我們還受到一個從非洲人國民大會分裂出去的“民族意識團體”組織的攻擊。當J. B.馬科斯當選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的時候，在前全國執行委員會成員賽羅佩·苔瑪的領導下，這個團體從非洲人國民大會中分裂了出去。苔瑪是《班圖世界報》的編輯，他在他的報紙上對反抗運動進行了猛烈的批評，聲稱共產黨人把持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大權，印度人的經濟利益與非洲人的經濟利益是沖突的。雖然他們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只是少數，但是苔瑪的這種觀點在一些激進青年團團員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5月份，J. B.馬科斯在反抗運動中期遭到了“禁止”，依據的是1950年《鎮壓共產主義條例》，罪名是“繼續堅持共產主義目標”。這種“禁令”是政府下達的一種法律命令，一般是強制被禁止的人脫離某些組織，并被嚴格禁止參加任何形式的集會，具有監外關押的性質。禁止某一個人，政府不需要證據、不需要起訴，由司法部長作簡單宣布即可。這是一種用來限制個人參加斗爭，只允許他遠離政治、在一個規定的狹小空間中生活的措施。如果違反或無視禁令，就意味著請你去坐牢。

在那年10月召開的德蘭士瓦大會上，我被提名取代被禁止的J. B.馬科斯，他推薦我繼任他的職務。我是青年團全國主席，是繼任馬科斯職位的最佳人選。但是，我的候選人資格卻遭到了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一些人的反對。這些人自稱“Bafabegiya”（寧死不屈的人），主要由極端非洲民族主義者組成。他們企圖切斷與印度積極分子的一切聯系，把非洲人國民大會拉到對抗主義策略的方向上去。他們的領導人是麥克唐納·馬賽庫和賽皮瑞皮爾·馬如朋。麥克唐納·馬賽庫以前是共產黨人，曾經在反抗運動期間擔任過非洲人國民大會奧蘭多分部的主席；賽皮瑞皮爾·馬如朋則是威特沃特斯蘭德反抗運動志愿者的帶頭人。馬賽庫和馬如朋都想當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

人們大多認為馬如朋有點兒像蠱惑人心的政客。他習慣于穿帶有肩章和金色扣子的卡其布軍衣，隨身帶著因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而聞名的那種類似于警棍的東西。他常常把警棍夾在腋下站在會場的主席臺上說：“我等自由等得不耐煩了，我現在就要自由！我要在十字路口見馬倫，并告訴他我所要的東西。”然后，把警棍往講臺上一放，高聲說：“我現在就要自由！”

因為他的這番講話，馬如朋在反抗運動期間特別出名。但是，在選舉中被大家熟悉僅僅是一個因素。他認為，自己最近一段時間知名度高，因此一定能當上主席。在選舉前，當我已經知道自己將是候選人的時候，我走到他面前說：“我想讓你當執行委員會的候選人，這樣，我當上主席你就可以與我一起干。”他對我所說的話不屑一顧，認為我實際上是讓他降級，他拒絕了我，自己堅持要當主席。但是他失算了，因為我以壓倒多數的選票當選了主席。

1952年7月30日，反抗運動正處在高潮期。當時，我在H. M.巴斯納律師事務所工作，警察拿著逮捕證來抓我，罪名是違反了《鎮壓共產主義條例》。政府同時在約翰內斯堡、伊麗莎白港和金伯利逮捕了許多反抗運動的負責人。在那個月初，警察在全國各地突襲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人士的家和辦公室，并沒收了資料和文件。這種突襲以前很少見，它開了普遍非法搜查的先河，非法搜查到后來成為政府行為的一大特點。

我和其他人士被逮捕后，一直到9月份才進行審判。在約翰內斯堡有21人被指控，包括非洲人國民大會、南非印度人大會、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和德蘭士瓦南非印度人大會的主席和總書記。在約翰內斯堡受審的有莫羅卡醫生、瓦爾特·西蘇陸和J. B.馬科斯。幾位印度領袖人物也遭到逮捕，其中包括達杜醫生、玉蘇福·凱查利亞和阿邁德·卡特拉達。

我們出現在法庭時，法庭很快就變成了一場政治集會。大批示威群眾穿過約翰內斯堡大街，聚集在地方法院。其中有來自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白人學生，有來自亞歷山大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老會員，也有來自小學和中學的印度學生。各種年齡、各種膚色的人都有。這個法院過去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人。審判大廳也擠滿了人，此起彼伏的“Mayibuye Afrika!”喊聲不時打斷審判的進程。

這次審判也應被看成一次顯示決心和團結的機會，但是，它卻由于莫羅卡醫生制造的信仰分裂而變得遜色。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反抗運動的頭面人物莫羅卡自己雇用辯護律師之舉使我們感到震驚。我們的計劃是大家一起被審判。我們這批被指控的人讓我去同莫羅卡商量此事，想說服他不要把自己同大家分開。審判前的那天，我到約翰內斯堡迪珀村去見了莫羅卡醫生。

在我們見面一開始的時候，我向他提了幾條建議，但是他都不感興趣，反而有幾次表現得很不冷靜。他認為，他已經被排除在運動策劃者之外。莫羅卡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相當不感興趣，并且以后也會如此。他說，最讓他不安的是與我們其他人一起進行辯護，那樣的話他就會跟共產黨扯上了關系。莫羅卡與政府一樣對共產主義懷有仇恨。我規勸他，說與任何反對種族壓迫的人合作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傳統。但是，莫羅卡沒有被說服。

最令人震驚的是，莫羅卡為了讓拉姆頗福法官對他從輕判決而提出了一個恥辱的請求，他當著證人的面正式同意放棄非洲人國民大會確立的原則。當他被問及是否認為在南非的黑人與白人之間應該平等的時候，莫羅卡回答說絕不會平等。對此，我們感到非常失望。當他的律師問他在反抗者中是否有共產主義者時，莫羅卡真的用手指指向了許多人，包括達杜醫生和瓦爾特·西蘇陸。法官告訴他沒有必要那樣做。

他的表現對組織是一次嚴重的打擊。我們馬上意識到，莫羅卡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的日子已經不多了。他犯了把個人利益置于組織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錯誤。他不愿意因為政治信仰危害他的醫生生涯和財富，因此，他毀壞了他個人通過三年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反抗運動所作的大無畏努力而樹立起來的形象。我認為這是一個悲劇，因為，莫羅卡醫生在法庭上的背信棄義有損反抗運動的光輝形象。曾經到全國各地宣傳反抗運動并具有重要意義的人現在卻背離了反抗運動。

12月2日，我們都被拉姆頗福法官判定犯有“法定共產主義罪”。換句話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共產主義。按照《鎮壓共產主義條例》的規定，事實上，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反對政府都可以被判處“法定共產主義罪”，哪怕是你從來就沒有參加過共產黨。拉姆頗福法官很公正，也很理智。他說我們策劃的行動屬于“公開不遵守法律并達到了與叛國罪相等的程度”，但是，他承認我們一貫堅持要求我們的會員“遵循和平行動原則，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我們被判處9個月的監禁，并參加重體力勞動，但緩期兩年執行。

我們犯了許多錯誤，但是，反抗運動標志著斗爭歷史翻開了新篇章。我們列出的6部歧視性法律沒有被廢除，當時，我們從來沒有幻想過他們會廢除這6部法律。我們選擇的這6部法律是壓在人民身上的直接負擔，最好的辦法是讓廣大的人民都參加斗爭。

在這次反抗運動之前，非洲人國民大會說得多但采取行動少。我們沒有付給組織者們任何報酬，也沒有付給非洲人國民大會工作人員和會員任何報酬，我們所做的充其量不過是為我們的事業提供嘴皮子服務。作為反抗運動的結果，我們的會員一下子劇增到10萬人。非洲人國民大會真正作為一個以群眾為基礎的組織展現在世人面前。它擁有一支活躍而富有經驗的積極分子隊伍，敢于直接面對警察、法院和監獄。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因為害怕坐牢是解放斗爭的一大障礙。因參加反抗運動而走進監獄，在非洲人中成為一種榮譽標志。

我們為自己在6個月反抗運動期間的作為而感到特別驕傲和自豪。我們沒有采取過任何暴力行動，我們的反抗戰士的紀律性堪稱楷模。在反抗運動的后期，伊麗莎白港和東倫敦發生了暴亂，40多人在這場暴亂中喪生。盡管這些暴亂與反抗運動沒有任何關系，但是，政府卻企圖把這些暴亂與我們聯系在一起。在這個問題上，政府是成功的。因為暴亂使一些白人的觀點發生了轉變，不然的話，這些白人是會同情我們的。

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有些人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相信通過反抗運動能推翻政府。我們提醒他們，反抗運動的目的是讓政府了解我們的冤情，而不是想推翻政府。他們堅稱我們要讓政府疲于應對，我們應該無限期地進行反抗運動。我插話說，這個政府太強大，也太殘忍，用這樣的方式無法推翻它。我們能反抗它，但是，通過反抗運動去推翻它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我們開展反抗運動的時間太長了，當初我們應該聽從埃克蘇瑪醫生的勸告。當計劃委員會在反抗運動收尾期間去看望埃克蘇瑪醫生的時候，他告訴我們，反抗運動的勢頭很快就會減弱，在它完全失去動力之前立即剎車是聰明的。在反抗運動仍然處于高潮階段的時候立即停下來，將是具有重大新聞效應的明智之舉。埃克蘇瑪醫生是正確的，反抗運動的勢頭很快就衰減了下來，但是，我們卻憑著我們的熱情，甚至是高傲自大，把他的勸告放在了一邊。我的內心想把這場反抗運動繼續進行下去，但是，我的大腦卻讓我把運動停下來。我主張停下來，但是沒有堅持自己的主張，而是從眾了。到了那年年底，反抗運動真的衰敗了下來。

反抗運動從來沒有超過第一階段主要由市民構成的反抗隊伍的規模，群眾性的大規模反抗，特別是在農村的大規模反抗，從來沒有實現過。東開普是唯一把反抗運動成功地推進到第二階段的地區。在那里，農村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從總體上說，我們沒有把反抗運動滲透到農村，這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個歷史性缺點。反抗運動實際上是受到了沒有專業組織者的限制。我想去組織，但是我必須同時要干律師工作，沒有辦法組織大規模的反抗運動。我們仍然是反抗運動的業余組織者。

但是，我仍然有很大的成就感和滿足感：我從事了一種正義的事業，我有力量為這個正義事業去戰斗，并在戰斗中取得勝利。反抗運動使我擺脫了我也許仍然存在的不自信或自卑感，使我從被某種力量壓倒的感覺中和白人及其制度似乎永遠不可戰勝的感覺中解放了出來。現在，白人已經感覺到了我們的力量，我能夠抬著頭像男子漢那樣走路了，也可以用自尊的目光去看每一個人了。這種尊嚴來自沒有屈服于鎮壓和恐嚇。我已經成長為一名自由戰士。

# 第四部 斗爭是我的生命

15...

在1952年年末召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年會上，我們的領導班子有了新的變化。非洲人國民大會任命了新的、更有朝氣的主席，開創了一個新的、更積極的時代，即阿爾伯特·魯圖利酋長時代。按照非洲人國民大會憲章，我作為德蘭士瓦省級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成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四個副主席之一。而且，全國執行委員會任命我為第一副主席。魯圖利作為為數不多的有實權的酋長之一，積極主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工作，堅決抵制政府的種族歧視政策。

魯圖利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一位牧師的兒子，生于當年的南羅得西亞，在納塔爾接受教育。他在德班附近的亞當學院接受過師范教育。他個頭相當高，體格粗壯有力，皮膚烏黑，笑聲爽朗；他謙虛而非常有信心，也很有耐心，是一個堅韌不拔的人；他講話不慌不忙，口齒清楚，好像每個字都一樣重要。

我在20世紀40年代第一次見到他，他當時是土著代表委員會的一個成員。1952年9月，距離召開非洲人國民大會年會只有幾個月，魯圖利被召到比勒陀利亞。他被下了最后通牒：政府要求他必須放棄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身份，并不再支持反抗運動，不然，他將被免去已當選并由政府支付薪水的酋長職務。魯圖利是一位教師，是虔誠的基督教教徒，也是引以為豪的祖魯部落酋長。不過，他更是堅定地獻身于反抗種族隔離斗爭的志士。魯圖利拒絕辭去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職務，因此，政府撤銷了他的酋長職務。作為回應，他發表了一項原則聲明“通向自由的道路避不開十字架”，在聲明中，他重申對非暴力消極反抗運動的支持，并用至今仍悲哀地回響著的一句話對他的選擇進行辯護：“誰會否認我30年的生命中一直在徒勞地、耐心地、順從地、謙讓地叩響那扇緊閉且上了閂的大門？”

我支持魯圖利酋長，但是，我卻不能出席會議。開會前幾天，全國52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遭到了禁止，6個月內不準出席任何會議或集會。我就屬于這52人中的一員。6個月中，我的活動范圍被限制在約翰內斯堡地區之內。

對我的禁止包括參加各種會議，并不僅僅限于政治性會議。例如，我連我兒子的生日舞會也不能參加，并且也不準我同時與一個以上的人談話。這是政府對那些為種族隔離而戰的領導人實行全面封殺而作出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他們不讓這些領導人說話，對這些領導人實行迫害，限制這些領導人的行動。這也是對我采取的一系列封殺中的第一次，這種封殺斷斷續續地進行著，直到幾年后，我被剝奪了一切自由。

禁止不僅是從肉體上進行限制，而且也從精神上進行禁錮。禁止還會導致一種心理上的幽閉恐懼癥，被禁止的人不僅渴望行動自由，而且渴望精神上的逃脫。禁止是一種危險的處罰，因為被禁止的人并沒有被銬在或鎖在監獄里。法律、法規就是監獄，這種法律、法規是可以輕而易舉地違反的，并且常常被違反。一個人可以短時間地迅速走開，并且可以暫時幻想自由，但禁止后面隱藏著的影響是，被禁止的人在某個時刻開始感到壓迫者并非來自外界，而是已經潛入內心。

盡管不準我參加1952年的年會，但是有人立即把會上發生的情況告訴了我。其中一個重要的決定在當時是要保密的，不能公布于眾。

與許多其他人一樣，我相信政府將會宣布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為非法組織，就像宣布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一樣。政府似乎必然要盡快禁止我們以合法組織開展工作。心里想到了這個問題后，我建議全國執行委員會必須有一個應付不測情況發生的方案。我說，我們作為人民的領導人，如果沒有這樣的方案，那就是失職。全國執行委員會讓我起草一個能使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地下運轉的方案。這個方案后來被稱作“曼德拉方案”，簡稱“曼氏方案”。

曼氏方案的主導思想是建立一種能使非洲人國民大會上下政令暢通的組織體系，通過這個體系，最高層形成的決議不需要召開會議就可迅速傳達到整個組織。換句話說，通過這個組織體系，一個非法的組織仍可繼續發揮作用，被禁止的領導人仍可繼續起到領導作用。曼氏方案可以使非洲人國民大會招募新會員，能夠對地方和全國性問題作出反應，使會員與地下領導之間保持正常的聯系。

我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的領導（包括被禁止的和沒有被禁止的）召開了幾次秘密會議，共同討論方案的內容。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最后完成了這個組織系統的起草工作。該系統涉及面很寬，適合地方的條件，也不會挫傷個人的積極性。就詳細程度而言，它足以保證工作秩序。最小的單位是基層組織，在城市內，一個基層組織基本由一條街上的10戶人家構成。每個基層組織有一個干事負責。如果一條街道有10戶以上人家，那么街道干事將負責整條街道的組織工作，基層干事要接受街道干事的領導。幾條街道組成一個區，這個區由一名區長負責，該區長又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當地分支機構的書記處負責。當地分支機構的書記處是分支執行委員會的基層委員會，負責向省級書記報告情況。我們主張，每個基層干事和街道干事應當熟悉本組織內的每個人和每個家庭。因此，干事就會得到本組織內各組織成員的信任，并且也會知道誰值得信任。基層干事負責召集基層會議，組織政治學習班，并收繳會費。基層組織的干事是該方案的關鍵環節。盡管這個方案從戰略上主要是以市區為主，但也適合于農村地區。

該方案被采用了，并準備立即實施。我們隨即通知各分支機構開始準備秘密調整組織機構。盡管多數分支機構都接受了這個組織方案，但是邊遠地區的分支機構的某些人士卻認為，這個計劃是約翰內斯堡為加強對邊遠分支機構控制的一種努力。

作為曼氏方案的組成部分，非洲人國民大會引入了對全國會員講授政治基礎知識的機制。這種講座的目的不僅是對會員進行教育，而且也是一種把全國非洲人國民大會團結在一起的方法。講座由分支機構的領導人秘密進行，聽過講座的會員依次再把聽到的講座內容傳達給各基層成員。開始，講座內容不太系統，幾個月后，我們有了成套的課程。

當時有三種教材，即《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我們是如何被統治的》和《變革的必要性》。在第一種教材中，我們討論了世界和南非之間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是一種概括了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情況的教材。例如，我們探討了南非黑人如何作為一個種族和經濟階級受壓迫的問題。講授者多數都是被禁止的會員，我本人也經常在晚上開授講座。這種安排有利于保持被禁止的個人之間的溝通，也有利于使會員與這些被禁止的領導人保持聯系。

在這個時期，被禁止的領導人經常秘密地單獨見面，然后再設法與現任的領導人見面。新老領導人之間配合得很好，決策程序和以前一樣，仍然是通過集體研究。我們有時感到，似乎除了必須秘密見面之外，并沒有發生什么變化。

曼氏方案構思很好，但是，實施情況卻并不理想，事實上從來沒有真正普及到基層。實施情況最好的地區還是東開普和伊麗莎白港。反抗運動的精神在其他地區早已銷聲匿跡之后仍然在東開普繼續著，那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們認為，貫徹曼氏方案是繼續反抗政府的有效途徑。

該方案遇到了許多問題：在會員中宣傳不夠，沒有專職的組織者負責實施或監督，分支機構內常常意見不一致，無法形成實施這項方案的一致意見。有的省級領導人抵制這一方案，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方案不利于他們的權力。對有的人來說，政府的鎮壓似乎還很遙遠，因此，他們沒有必要提前采取措施。但是，當政府的鐵拳落下來的時候，他們卻沒有任何準備。

16...

在反抗運動期間，我的生活遵循著兩條不同的軌跡：我在斗爭中工作，并通過當律師維持生計。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我從來也沒有專職擔任過組織者。非洲人國民大會只有一個專職組織者，那就是托馬斯·提圖斯·恩考比。我要做的工作必須圍繞我作為律師的計劃作出安排。1951年，我與“維特金－希代爾斯基－埃代爾曼律師事務所”的勞動合同期滿后，我又到“特布蘭奇－布雷基施合伙律師事務所”工作。在完成合同約定見習后，我仍然不是一個羽翼完全豐滿的律師，我的工作只是起草辯護書、寄送傳票、找證人談話，都屬于一個律師必須在案子遞交法庭前所做的工作。

離開希代爾斯基之后，我找了許多家白人律師事務所，因為當時沒有黑人律師事務所。我對這些律師事務所的收費標準很感興趣。我非常氣憤地發現許多獲利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對黑人收取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律師費遠遠高于他們對富裕的白人當事人的收費。

在“特布蘭奇－布雷基施律師事務所”工作了大約一年后，我又加入了海爾曼－邁克爾合伙律師事務所。這是一家思想自由的律師事務所，也是一家為數不多的對黑人收費合理的律師事務所。另外，這家律師事務所以熱心于黑人教育著稱，他們在捐助黑人教育方面非常慷慨。海爾曼先生是律師事務所的第一合伙人，在很少有人關注黑人事業之前就開始參與黑人事業。該律師事務所的另一個合伙人羅德尼·邁克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一位退伍軍人，思想也十分開明。他是一名飛行員，幾年后，他幫助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人在鎮壓最嚴重的時期飛離南非。邁克爾的唯一惡習是抽煙，他一天到晚都在辦公室不住地抽煙。

我在海爾曼－邁克爾律師事務所工作了幾個月，當時我正在準備律師資格考試，一旦通過這個考試，我就會成為一個合格的正式律師。在幾次未能通過考試后，我不得不放棄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攻讀法律學士學位。我選擇了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因為只有通過這種考試我才能當律師，并且能掙足夠的錢養家糊口。那時候，我妹妹和我們在一起生活，我母親也經常來。艾韋琳當見習護士的工資加上我那點少得可憐的收入，并不足以讓家中的每個人都吃飽穿暖。

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后，我在H. M.巴斯納律師事務所當了一名正式的律師。巴斯納一直是參議院的非洲人代表，是一位比較早的共產黨員，也是非洲人權事業的熱情支持者。作為一名律師，他是非洲領導人和非洲商會領導層的辯護人。在那里工作的幾個月時間里，我經常代表事務所出庭為許多非洲委托人辯護。巴斯納先生是一個杰出的老板，只要我做好所里的工作，他就鼓勵我參加政治活動。在該律師事務所取得經驗后，我準備離開那里，去開辦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1952年8月，我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正式開門營業。我早期能夠事業有成，還應該感謝我的秘書祖備達·帕特爾。我是在她去H. M.巴斯納律師事務所取代講南非荷蘭語的秘書科克女士時認識她的，科克女士拒絕過我的口授。祖備達是我朋友凱西姆·帕特爾的太太，凱西姆當時是南非印度人大會的會員。祖備達沒有絲毫種族歧視的思想，她的朋友圈子很大，在法律界認識很多人，在我出去自己開辦律師事務所的時候，她同意跟著我干。她通過她的門路給我帶來了大批生意。

奧利佛·塔博當時在一家叫“考瓦爾斯基－塔克合伙律師事務所”工作。在他的午餐時間，我經常去看他，我們進的是只有白人才能進的會客室，坐的是只有白人才能坐的椅子。奧利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在午餐期間我們主要討論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情。我第一次對他產生印象還是我在福特黑爾大學讀書的時候。在那里，我注意到他思維敏捷，特別善于辯論，他的冷靜和重邏輯的風格可以擊敗任何對手。更準確地說，這種才能在法庭上更為有用。在去福特黑爾大學之前，他一直是約翰內斯堡圣皮特學校的優秀學生。他遇事冷靜，這與我容易沖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很值得我學習。奧利佛篤信宗教，并且一直期許成為一名神職人員。他也是我的一個老鄉，來自旁多蘭地區的畢扎納，是特蘭斯凱的一部分，他臉上有明顯的氏族印記。我們一起做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我邀請他跟我合伙干。幾個月后，奧利佛可以從他工作的律師事務所脫身了，于是，我們在約翰內斯堡市中心開辦了我們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我們的辦公地點設在法官大廈，辦公室門上掛著“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的銅牌。法官大廈位于約翰內斯堡市中心，與市法院前高聳的大理石正義女神雕像相隔一條馬路。這座大廈屬于印度人，是市內為數不多允許非洲人租用辦公室的幾個地方之一。從一開業，“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就被委托人圍得水泄不通。當時，我們雖然不是南非僅有的非洲人律師，但是，我們的事務所卻是南非唯一一家非洲人開辦的律師事務所。對于非洲人來說，我們這個律師事務所是首選的最后的求助對象。每天早晨到辦公室上班，我們都不得不從擁在走廊里、樓梯上和我們的小會客室里的人群中擠過去。

非洲人對于在政府大廈中獲得法律援助往往感到失望：走只有白人才能走的門是犯罪；乘坐只有白人才能乘坐的公交汽車是犯罪；使用只有白人才能使用的飲水機是犯罪；行走在只有白人才能在上面行走的海灘上是犯罪；晚上11點后在大街上走是犯罪；沒有通行證是犯罪；通行證上簽字有誤是犯罪；在不恰當的地方被解雇是犯罪；在不恰當的地方被雇用是犯罪；在某些地方居住是犯罪；沒有地方居住也是犯罪。

我們每周都會接待從農村來的老漢，他們告訴我們，他們祖祖輩輩都在一塊荒涼的土地上勞作，現在他們被驅逐出了那塊土地。我們每周都接待老嫗，她們以釀造非洲啤酒作為她們微不足道的收入的一種補貼，而現在她們卻面臨著被判處監禁或被罰她們支付不起的款項的困境。我們每周都會接待一些委托人，他們在同一座房子里已經住了好幾十年，但是，現在那里被宣布為白人居住區，他們被迫在沒有任何補償的條件下離開自己的房子。每天，我們都會聽到和看到普通非洲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形形色色的侮辱性事件。

奧利佛有驚人的工作能力。他在每一位委托人身上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并不是因為專業上的問題，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有無限同情心和耐心的人。他完全進入了當事人的案情和生活之中，被群眾的困境，即作為一個群體的困境和單個人的困境所觸動。

我很快認識到，“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這是一個他們可以隨時進來并能找到同情和支持的場所，一個不會被拒絕和欺騙的場所，一個他們可以實實在在地為有與自己膚色相同的代表而驕傲的場所。這是我當初選擇當律師的原因，我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覺自己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我常常一上午處理五六個案子，整天在法院里進進出出。有些法院對我們很客氣，而有的法院則對我們不怎么尊重。即使是我們準備充分，經過論戰打贏官司的時候，我們也始終很清楚，無論我們作為律師工作做得多么好，我們也不會成為監察員、地方法官或法官。盡管我們在與能力不比我們強的官員打交道，但是，他們的權威卻是建立在他們的膚色基礎之上并因他們的膚色而受保護的。

我們常常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白人證人常常拒絕回答黑人律師的質詢。地方法官并不指責他們藐視法庭，而是重復提出他們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我例行公事地讓警察到庭，向他們提出質詢。盡管我能當場抓住他們說話前后不一致和撒謊，但是，他們絕不把我放在眼里，他們認為我只不過是“黑人律師”。

記得有一次，一開庭我就被要求確認身份，這本是一個慣例。我說：“我是納爾遜·曼德拉，是當事人的辯護律師。”地方法官說：“我不認識你，你的執照在哪里？”營業執照是鑲在框子里并掛在墻上的證書，并不是律師隨身攜帶的一種文件。這就像是要求人出示大學學位證書一樣。我請求地方法官開庭，到時候我會提交我的營業執照。但是，地方法官拒絕聽案情，甚至讓一名官員趕我出去。

這顯然違反了法庭的有關規定。這件事最終被上訴到最高法院，我的朋友喬治·畢佐斯律師出庭為我辯護。在聽審會上，首席法官批評了那位地方法官的違規行為，并責成另一位地方法官審理那個案子。

盡管我是一名律師，但也不能保證受人尊重。有一天，在我的辦公室附近，我看見一位白人老太太的汽車被夾在兩輛車中間，我立即走上前去幫助她把車推出來。說英語的老太太轉身對我說：“謝謝，約翰。”約翰是白人用來向任何不知姓名的黑人打招呼時的稱呼，然后她遞給我一枚6便士的硬幣。我很客氣地謝絕了。她又一次強塞給我，我又一次謝絕了她。她大聲說：“你拒絕6便士，是想要1先令，對不對？但是你撈不到！”她說完后，把錢扔在地上就開著車走了。

不到一年，奧利佛和我發現，按照《城市區域法》，沒有部一級的批準，不允許我們在市內擁有經營場所。我們的申請被拒絕，但是，按照《社團區域法》我們得到了臨時許可。臨時許可很快就要到期，當局拒絕為我們辦理新的臨時許可，要求我們把辦公室搬到許多英里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區。事實上，我們的當事人到不了那里去。我們認為，這是當局為把我們擠出律師這個行當而出的黑點子。他們不斷地以驅逐相威脅，并非法侵占了我們的營業場所。

在南非，當律師意味著在一種惡劣的法律制度下工作。那不是一種神圣、平等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種根本無平等可言的制度。在這方面，最說明問題的例子是《人口登記法》，這個法使不平等合法化。有一次，我接了一位有色男子的案子。由于疏忽，他被錯劃為非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為南非去北非和意大利參戰，但回來的時候，一位白人官僚卻把他劃成了非洲人。這是一個在南非比較典型的案子，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道德拼板難題。我不支持也不承認《人口登記法》的原則，但是，我的當事人需要一種代表權，他被劃進了他本不屬于的那個群體。被劃成有色人而不是非洲人，有很多好處。例如，有色人就不需要隨身攜帶通行證。

我代表他上訴到人口劃分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審理有關《人口登記法》的案子。該委員會由一名地方法官和兩名其他官員組成，他們都是白人。我為這個案子收集了許多證據，檢察官也正式表示他不反對我們的上訴。但是，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對我們收集的證據和檢察官的意見不感興趣。他直視著我的委托人，并粗暴地讓他轉過身去，讓他背對著審判臺。他仔仔細細地打量了我的委托人的肩膀，在發現他屬陡肩型后，才向另外兩個官員點頭示意，確認了這一上訴。那時候，當權的白人認為，陡肩是有色人典型的體形特征。這樣，這位男士的命運純粹由地方法官對其肩膀的結構形狀的認識來決定。

我們受理了許多涉及警察施暴的案子，盡管我們的勝訴率很低。警察施暴問題通常難于取證。警察很聰明，總是拘留被施暴的犯人很長時間，直到他的傷口愈合、傷痕消退。而且，警察的陳述常常與我們的委托人的陳述不一致。地方法官自然是站在警察一邊。警察監管下的驗尸官所作的死亡結論常常是“多種原因造成死亡”，或者作一個模糊不清的解釋，使警察輕易就能擺脫責任。

當我受理約翰內斯堡以外的案子時，我就申請暫時對我解除禁止，而且常常會得到批準。例如有一次，我去東德蘭士瓦為卡羅萊納鎮的一個當事人辯護。我的到來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因為許多人以前從來沒見過非洲人律師。我受到了當地法官和檢察官的熱情接待，案子等了好大一陣子才開庭，因為他們就我的職業和怎樣成為律師問了我許多問題。當時，法院里擠滿了看熱鬧的城鎮居民。

在附近的村子里，我遇到了一個當地醫生被指控使用巫術的案子。這個案子也吸引了很多人，他們不是來看我，而是看白人的法律是否適用于桑戈人。那位醫生在當地有很大的勢力，許多人對他既崇拜，又害怕。在法庭上，我的當事人強烈地打噴嚏，使法庭產生了混亂，多數人都認為他正在施巫術。他被證明無罪，不過我懷疑，當地人并不把這次勝訴歸功于我的辯護技巧，而是歸功于那位醫生的巫術。

作為一名律師，我在法庭上很紅火。在白人的法庭上我并沒有感覺黑人低人一等，而是感覺大家不論黑人白人都是法庭上的客人。當我介紹案情的時候，我常常做大幅度的揮手動作，使用夸張的語言。對于法庭規定，我常常是一絲不茍，但是，有時我也同證人使用非正統的語言技巧。我喜歡盤問對方，常常制造出一種緊張氣氛。聽眾席上常常坐滿了人，因為城鎮上的人把出席法庭當成一種消遣。

我記得有一次為一個非洲女士辯護的情景。她在城里做家政工作，當時被指控偷了她的“太太”的衣服。依照要求，被偷的衣服被擺在法庭里的一張桌子上。那位“太太”舉證后，我走到放物證的桌子前開始質問。我仔細地查看了那堆衣服，然后用鉛筆尖挑起了一件女人的內衣。我慢慢轉身走到證人席揮舞著那件內衣問：“太太，這個……是你的嗎？”“不是。”她快速回答，窘迫使她不承認那件內衣是她的。因為這個回答和她所作的證詞存在著矛盾，所以地方法官駁回了這個案子。

17...

在約翰內斯堡市中心以西大約4英里，在露出地面的巖石上坐落著非洲人城鎮索菲亞頓。該城鎮最偉大的朋友之一特瑞弗·赫德爾斯頓神甫曾經把它比作意大利的一座山城。從一定的距離遠遠看去，那里確實有許多漂亮的東西：彼此緊緊挨著的紅頂房屋、裊裊升入粉紅色天空的炊煙、高聳云霄的橡膠樹，但近距離則只能看到貧窮和悲慘。太多太多的索菲亞頓人就生活在這種貧窮和悲慘中。那里街道狹窄，并且是土路，街道兩旁都是擁擠不堪的簡陋小房。

索菲亞頓是西部城區的一部分，同屬西部城區的還有馬丁代爾和紐克萊爾。這個地方原本被劃為白人區，一家房地產商在這里為白人買主建造了許多房子。因為市政部門拒絕為這里提供服務，所以白人另選了其他地方，房地產商只好把這些房子賣給了非洲人。索菲亞頓是德蘭士瓦地區非洲人在1923年《城市區域法》出臺前能購買小塊地皮的為數不多的地區之一。許多磚石結構的鐵皮圓頂房屋仍然聳立在索菲亞頓城內，使它具有一種古樸、優雅的感覺。隨著約翰內斯堡工業的發展，索菲亞頓成為快速膨脹起來的非洲勞工的家園。這里距離市區很近，生活十分方便。勞工們就住在老住戶前后院內建造的簡陋小房子里。他們可能幾家人共住一個小房子，40人共用一個自來水龍頭。盡管貧窮，但是索菲亞頓很有特色，對于非洲人來說，它就是巴黎的左岸和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它是作家、藝術家、醫生和律師的家園。它既時髦又傳統，既有生氣又非常安靜。它既是埃克蘇瑪醫生的家鄉（埃克蘇瑪曾在那里行醫），也是各種各樣的強盜橫行之所，住在那里的著名強盜有柏林幫和美國幫——他們都采用美國電影明星的名字，例如約翰·韋恩和亨弗萊·鮑嘉等。索菲亞頓有約翰內斯堡為非洲兒童建的唯一的游泳池。

在約翰內斯堡，西部搬遷計劃意味著要把索菲亞頓、馬丁代爾和紐克萊爾騰出來。當時，這三個城鎮共有6萬到10萬人口。1953年，國民黨政府買了一片名叫“牧場”的土地，距離市區13英里。三個城鎮的人將分成7個不同的種族重新在那里安置。政府的借口是清除貧民窟，這是試圖把整個市區都劃為白人區，只準非洲人臨時在市區居住而放的煙幕彈。

政府受到了來自維斯特迪恩和紐蘭茲周圍地區支持者的壓力。這些地區是相對貧窮的白人區，那里的白人羨慕索菲亞頓黑人擁有的好房子。另外，政府要控制一切非洲人的活動，而這種控制在自由擁有不動產的城鎮是很難做到的。在那里，黑人可以有自己的房地產，人們來去自由。盡管通行證制度仍然實行，但是，非洲人進入自己永久擁有房地產的城鎮不需要特別許可，不像非洲人進入市內某些區域那樣，必須要獲得特別許可。非洲人在索菲亞頓生活并擁有自己的房地產已經有50多年的歷史。現在，政府無情地計劃把索菲亞頓的全部非洲人都搬到另一個黑人城鎮，政府的計劃是如此不懷好意，以至安置搬遷戶的房子還沒有建好就開始實施搬遷。索菲亞頓的搬遷是繼反抗運動之后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及其同盟組織能力的又一次重要考驗。

盡管政府對索菲亞頓的搬遷計劃從1950年就已經開始，但由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努力，使得它直到1953年才開始實施。到了1953年年中，非洲人國民大會、德蘭士瓦印度人大會（TIC）和當地納稅人協會發動人們進行抵制。1953年6月，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德蘭士瓦印度人大會省級執行委員會在索菲亞頓奧丁電影院召開了公共大會，討論反對搬遷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活躍而很有生氣的大會，有1200多人參加了會議，他們根本不懼怕全副武裝的大批警察的存在。

召開這次會議的前幾天，我和瓦爾特的禁止期滿。這意味著我們不再被禁止出席會議和在會上發表講話，因此，根據安排，我要在奧丁電影院發表講話。

會議馬上就要開始的時候，一個官員看見我和瓦爾特正在電影院外與反對搬遷的一位帶頭人赫德爾斯頓神甫講話。旁邊的一位官員告訴我，我們作為被禁止的人無權到那里去，然后命令警察逮捕我。赫德爾斯頓神甫沖著朝我走過來的警察高聲說：“不，親愛的，你們要逮捕就逮捕我。”警察命令老人站在一邊，但是，他拒絕躲開。在警察把老人推到一邊的時候，我對那位警察說：“你們必須搞清楚我們是否仍然是被禁止的人。小心，我們的禁止已經期滿，你們對我們逮捕是錯誤的。你想，如果我們的禁止期未滿，我們今天晚上能在這里與你說話嗎？”

那位官員以不做記錄而廣為人知，當禁止期滿的時候，他常常并不清楚，要不就是裝傻。那位官員和我一樣對此心知肚明，他掂量了一會兒，然后命令警察退后。他們站在一邊，看著我們走進大廳。

在大廳里，警察仍然傲慢無禮。他們挎著手槍和來復槍，大搖大擺地四處走動，不時地推搡人群，說傷害別人的話。我同其他幾位領導人在主席臺上就座，正當會議準備開幕的時候，我看見普林斯陸少校帶領著幾個武裝警察從通往主席臺的門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我沖著他的眼睛打了個手勢，意思是說：“找我？”他搖了搖頭，然后走上主席臺，命令逮捕玉蘇福·凱查利亞。此時，玉蘇福已經在演講臺的后面開始演講。就在他們抓住玉蘇福的胳膊往下拽的同時，警察在外面已經逮捕了羅伯特·萊沙和阿邁德·卡特拉達。

人群開始喊叫并發出陣陣噓聲，我發現如果不控制事態的發展，將一發不可收拾。我跳上演講臺，帶領大家唱起著名的抗議之歌。我一唱出歌曲的開頭幾個字，大家就同我一起唱起來。如果大家失去控制，我擔心警察會開槍。當時，非洲人國民大會每天晚上都在索菲亞頓城鎮中心的自由廣場舉行會議，動員大家反對搬遷。這些會議的場面聲勢浩大，會上不時回響著“Asihambi!”（我們不想搬遷！）的喊聲和“Sophiatown likhaya lam asihambi”（索菲亞頓是我們的家，我們不想搬遷）的歌聲。在會上發表講話的有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房產持有人、租房戶和鎮上的政務委員。赫德爾斯頓神甫不顧警察讓他把行為限制在教堂事務之內的警告，也頻頻在會上發表講話。

有一個禮拜天晚上，在奧丁電影院發生那次事件后不久，我準備在自由廣場發表講話。那天，大家心情很激動，他們的激情無疑影響了我的情緒。那天晚上有許多年輕人在場，他們義憤填膺，準備采取行動。和往常一樣，警察聚集在周圍，身上帶著槍和鉛筆，鉛筆用來記錄誰在會上發表了講話和講了些什么。我情愿與警察保持透明，讓他們知道我們并沒有什么要隱藏的。即使是他們厭惡的東西，我們也想讓他們知道。

我開始講話，話題從反抗運動之后政府的鎮壓愈演愈烈開始。我說，政府現在懼怕非洲人民的力量。發表講話時，我越講越激動。那年月，我被認為是煽動鬧事的演說家。我喜歡鼓動群眾，并且那天晚上我正是這樣干的。

當我譴責政府殘暴、不講法律的時候，我有點講過了頭。我說，消極反抗的時期結束了，非暴力是一種行不通的反抗策略，依靠這樣的策略絕不會推翻不惜一切代價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少數白人政權。那天晚上，我說暴力是唯一能夠消滅種族隔離的武器，我們必須準備在不久的將來使用這個武器。

大家都很激動，特別是青年人，他們一陣一陣地鼓掌和歡呼。他們準備按照我當時說的去做。那時，我開始唱起一首自由之歌，歌詞是：“有敵人，讓我們拿起武器，對他們展開襲擊。”大家也跟著唱起來。當唱完這首歌曲的時候，我指著警察說：“那里有我們的敵人！”大家又開始歡呼，并沖著我指的方向做出挑釁的手勢。警察看上去有些緊張，他們有的人指著我，似乎在說：“曼德拉，我要讓你對此事負責。”我沒有理會，在我頭腦發熱的時候，我沒有想到后果。

我那天晚上說的話并不是沒有道理，我一直在考慮未來怎么辦。政府采取了措施，防止再次發生反抗運動之類的事情。我開始分析考慮其他斗爭方式。非洲人國民大會決心開展群眾斗爭，讓南非廣大的工人、農民都投入到同一個運動之中，形成足夠強大的、能推翻白人壓迫的力量。但是，國民黨政府正在千方百計地使一切合法的表示異議或抗議的方式都變成不可能的事情。我看到，政府無情地鎮壓廣大非洲人舉行的任何合法的抗議活動，一個警察政府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我開始懷疑，合法的和憲法規定之外的抗議都將很快失去可能性。在印度，甘地一直與外國統治勢力周旋，最后外國勢力變得更實際、更有遠見。南非的白人卻是另一種情況。只要堅持同樣的準則，非暴力消極反抗就會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和平抗議中發生暴力，其作用也就變得不復存在。在我看來，非暴力并不是一種道德原則，而是一種斗爭策略。使用無效的武器就沒有道義可言。不過，在這個問題上，當時我的思想還不成熟，對我來說還是一件言之過早的事情。

非暴力消極反抗當然是全國執行委員會的一貫原則。當他們知道我發表了這個講話的時候，我因為宣揚這個有違既定方針的激進思想而受到了嚴厲責備。盡管全國執行委員會也有人同情我的觀點，但是，沒有人支持我發表這些觀點的過激方式。他們告誡我，我宣傳的思想不但太超前，而且是很危險的。這樣的講話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將會導致敵人徹底摧毀我們的組織。我接受了執行委員會的批評，從此之后，我在公開場合都忠實地捍衛非暴力策略。但是，我心中明白，非暴力策略并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方式。

那些日子，我常常與執行委員會發生摩擦。1953年初，魯圖利酋長、Z. K.馬修斯教授和非洲人國民大會一小部分高級領導人被邀請與一伙正在組建自由黨的白人見了面。后來，非洲人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召開會議，會上，我們幾個人要求他們提交與自由黨人會見情況的報告。而參加會見自由黨人的幾個人拒絕提交這樣的報告，說他們是以個人身份而不是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名義與那幾個自由黨人會的面。我們繼續就此事與他們糾纏，最后，馬修斯教授說，那是一個被特別授權的會談。馬修斯也是一位律師，我有點氣憤地說：“你們能與白人自由黨討論問題，事后又不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與大家通報情況，你們是什么領導人？那是你們找的麻煩，你們懼怕白人，你們把與他們合作看得比與你們的非洲同志合作還要重要。”

這次沖突使馬修斯教授和魯圖利酋長都很惱火。首先，馬修斯教授反駁說：“曼德拉，你們了解過白人嗎？我告訴你，不管你是否了解過白人，你仍然是無知的。即便是現在，你也僅僅是剛剛脫下學生服裝罷了。”魯圖利則冷冰冰地發著火說：“好，如果你們責怪我害怕白人，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辭職。如果你那樣說，那么我也就那樣干。”我不知道魯圖利是否在嚇唬人，但是，他的威脅確實讓我很害怕。我說話太魯莽，沒加考慮，不負責任，現在我很后悔。我馬上收回我對他們的指責，并向他們賠禮道歉。我是個年輕人，企圖用戰斗性彌補自己的無知。

我在索菲亞頓發表講話的同時，瓦爾特·西蘇陸告訴我，他被邀請以客人的身份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世界和平與友誼”青年學生節。由于邀請的時間緊迫，他沒有機會向全國執行委員會請示。我十分希望他去，不管請示執行委員會與否，我都鼓勵他去出席會議。瓦爾特決心去參加這個會議，我幫助他辦理了證明他身份和國籍的代用護照（政府絕對不發給他正式護照）。以瓦爾特·西蘇陸和杜馬·諾克韋為團長的代表團，將乘坐唯一允許持代用護照者乘坐的一個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飛往布加勒斯特出席會議。

盡管我遭到了執行委員會的責備，但是，我仍然相信國民黨人的政策將很快使非暴力策略變成一個更有局限性、更不起作用的策略。瓦爾特知道我的想法，在他動身去布加勒斯特之前，我向他提了個建議：他應該設法順訪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他們討論向我們提供武器以便開展武裝斗爭的可能性。瓦爾特贊成這個主意，答應順便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些行動純粹是我的個人行動，也是很大膽的行動。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行動是出自一個頭腦發熱的革命者未經認真思考且無組織紀律的行動，是由于種族隔離的不道德和政府在維護這種不道德中殘酷無情而迫使受害者所采取的行動。

瓦爾特的出訪在執行委員會中引起了一場風波。我承擔起了轉達他的個人辯解的任務。不過，我沒有提及我建議他順訪中國的事情。魯圖利批評說，這是無視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行為規范，馬修斯教授對瓦爾特出訪社會主義國家感到驚愕，執行委員會對瓦爾特的出訪動機產生了懷疑，要求我對情況作出說明。有的人提出要處分瓦爾特和我，但是后來并沒有給我們處分。

瓦爾特設法到了中國，在那里，他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熱情接待。他們對我們的斗爭表示支持，但是，當瓦爾特談及進行武裝斗爭的想法時，中國領導人有些擔心和謹慎。他們告誡瓦爾特，武裝斗爭是極端嚴肅的行動，他們詢問南非的解放運動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裝斗爭的程度。瓦爾特帶著中國領導人的鼓勵回到了南非，但是他并沒有帶回槍支。

18...

在約翰內斯堡，我變成了一個城市人。我身上穿著整齊的西裝，開著巨大的奧茲莫比爾（Oldsmobile）轎車，并且熟悉市內的大街小巷。我每天都要到市內我的辦公室去工作。但事實上我從內心里認為自己仍然是一個農村小伙子，沒什么東西比藍天、草原和青草更使我興奮。9月份，當我的禁止期滿的時候，我決定利用我獲得自由的機會暫時離開這個城市。我要去奧蘭治自由邦真正自由一番。

開車從約翰內斯堡到自由邦通常需要幾個小時，我凌晨3點鐘就從奧蘭多出發了。外出時，我通常喜歡在這個鐘點動身，我無論如何也算得上是一個喜歡早起的人。早上3點，路上空無一人，十分清靜，很適合靜靜地思考。我喜歡看黎明的到來和從黑夜到白天的變化過程。這種變化是恢弘壯麗的，這個時間也是出發最方便的時間，因為這個時間通常不會碰到警察。

盡管一些白人極端種族歧視者稱自由邦是他們的家，但是，奧蘭治自由邦對我總是有一種神奇的作用。那里有一眼望不到頭的平原沃土，有遼闊無邊的蒼穹，有一片又一片金黃色的玉米地，有無拘無束的灌木叢。不管心境如何，自由邦的風光總會使我心曠神怡。當我抵達那里的時候，我感覺什么東西也不能把我封閉起來，我的思想可以任意翱翔，直到海角天涯。

那里的風光殘留著南非白人克里斯田·德·維特將軍的烙印。在英國人與南非白人之間的戰爭進入最后幾個月的交鋒中，他遠遠勝過了英國人。他毫無畏懼，自信而明智，如果他一直為南非人的權利而不是僅僅為南非白人的權利而戰，他將一直是我崇拜的英雄。他顯示了一個戰敗者的勇氣和智慧，代表著一支不很成熟但卻愛國的軍隊敢于抗擊久經戰爭鍛煉的軍隊的力量。我一邊開著車，一邊想象德·維特將軍部隊的埋伏地點，不知這些埋伏地點是否有一天也會埋伏非洲反叛者。

駕車去維萊也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樂趣。當9月3日上午我走進一個基層法院的時候，在安全的錯覺下，我并未意識到一紙禁令正在等待著我。我發現，那里有一伙警察正在等著我。他們二話沒說就對我宣布，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要求我退出非洲人國民大會，兩年內把我限制在約翰內斯堡地區，禁止我出席任何會議和集會。我知道這種禁止將會到來，但是，我沒想到會在遙遠的維萊聽到對我的禁止。

我當時35歲，新一輪更嚴厲的禁止使我結束了近10年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政治生涯。這幾年是我政治覺醒與成長的時期，是我逐步投身于斗爭的時期。斗爭成了我的生命。從此以后，我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和解放斗爭所采取的一切行動和出謀劃策都成了秘密的和非法的。禁止生效后，我必須立即回到約翰內斯堡。

對我的禁止使我從斗爭的核心轉到了外圍，從主角轉為配角。常常有人來咨詢我，而且我的影響仍能左右斗爭的方向，但是，這都是遠距離的作用，而且是在被明確要求時才產生的作用。我不再認為自己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個重要器官，例如像心臟、肺和脊椎那樣，而是覺得自己成了一節斷肢。即使是自由戰士，至少在當時也要遵守法律。那時候，為沖破對我的禁止而去坐牢，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我自己都是徒勞無益的。當時，我們沒有必要作為公開的革命者而不惜一切代價公開與政府開戰。當時，我們認為在地下活動比走進監獄要好些。當我被迫退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時候，組織不得不解除我在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職務，不管我原來是什么角色，但現在我不能再行使我曾經擁有過的權力。在我駕車回約翰內斯堡的路上，自由邦的風光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使我神清氣爽了。

19...

當我接到對我的禁止處罰的時候，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會議正準備在下個月舉行，我已經起草了我的主席就職講話。這個講話后來由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安德魯·庫耐尼在會上進行了宣讀。在后來被稱作“艱難的自由路”的這個講話中，我從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那里借鑒了一條思路。我說，群眾現在必須準備采取新的政治斗爭形式。政府出臺的新法律和新策略使舊的群眾抗議斗爭形式，其中包括召開公共大會、發表聲明、靜坐等，變得特別危險，并且有自我毀滅的可能。報紙不發表我們的聲明，印刷公司拒絕為我們印刷宣傳冊子，他們都害怕被指控違反了《鎮壓共產主義條例》。我說：“這些變化需要我們研究新的政治斗爭形式。現在使用老的斗爭方法無異于‘自殺’。”

“被壓迫人民與壓迫者之間現在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力量與反動力量之間的清算日為時不會太遠，我一點都不懷疑這一天的到來。真理和正義將會取得勝利……被壓迫人民的感情已經痛苦不堪。人民的困境驅使他們與統治我們國家的強盜所采取的卑鄙政策反抗到底。推翻壓迫已經得到全人類的支持，并且也是每個自由戰士的最高理想。”

1954年4月，德蘭士瓦法律協會向最高法院申請把我的名字從被認可的律師名單中取消，理由是我因參加政治活動而被證明有罪，因而有不稱職、不名譽行為。這件事發生在“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正非常紅火的時候，當時我每周都要在法庭上露面十多次。

申請將我除名的文件被送到了我的辦公室，這個申請一公開，立即有人對我進行聲援和支持，甚至許多非洲白人律師也表示幫助我。他們中有許多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但是，他們仍然認為這個申請有失公正。他們對此事的反應告訴我，即使是在種族歧視的南非，職業上的團結一致有時也能超越膚色，仍然有律師和法官拒絕當不道德政權的橡皮圖章。

我的案子由約翰內斯堡律師協會主席、王室法律顧問瓦爾特·波拉克為我辯護。在我雇瓦爾特·波拉克作為我的辯護律師的時候，有人建議再雇一個與斗爭沒有牽連的人做我的辯護律師，因為那樣會對德蘭士瓦的律師界產生積極的影響。因此，我們請威廉·阿龍桑作為我的指導律師。威廉·阿龍桑是約翰內斯堡一家歷史最悠久的律師事務所的掌門人。兩位律師都免費為我辯護。我們堅持這個申請是對正義的褻瀆，我有天生的權利為我的政治信仰而戰斗，這是每一個法治國家的每個人都享有的權利。

最有分量的辯護理由是波拉克引用了一個叫斯揣敦的人的案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與B. J.沃斯特（他后來成為總理）一起被拘留，罪名都是因為以前堅持過納粹立場。斯揣敦除了企圖逃跑未遂，還被發現犯有偷車罪。后來被釋放后，他向律師協會申請當辯護律師。盡管他犯過罪，并且有律師協會的強烈反對，法庭仍決定接受他所犯的罪是基于政治的，而一個人不能因為政治信仰而被剝奪擔當辯護律師的權利。波拉克說：“當然，斯揣敦與曼德拉是不同的。曼德拉不是國民黨人，曼德拉也不是白人。”

法官拉姆斯博頓聽說過這個案子，他是法官的楷模，拒絕當國民黨人的喉舌，堅持司法獨立。在審理這個案子時，他完全支持了我的請求，認為我有權為我的政治信仰而戰斗，即使這些信仰是反政府的。他駁回了法律協會的申請，并破天荒地讓法律協會承擔己方的訴訟費。

20...

索菲亞頓反對搬遷的斗爭是一場持續時間很長的激烈斗爭。我們堅持我們的立場，政府堅持政府的立場。從1954年到1955年，每個禮拜的禮拜三和禮拜五晚上都舉行大會。會上的演講者一個接一個，繼續譴責政府的搬遷計劃。在埃克蘇瑪的指導下，非洲人國民大會和納稅人協會以書信和請愿書的形式向政府提出抗議。我們打著“從我們的尸體上跨過去”的口號開展反對搬遷運動。這個口號成為臺上演講者和臺下聽眾的共同口號。有一天晚上，這個口號甚至使小心謹慎的埃克蘇瑪喊出震撼人心的、19世紀用來聯合非洲戰士參加戰斗的口號：“Zemk’inkomo magwalandini”（膽小鬼，敵人搶奪了我們的牛）。

政府計劃在1955年2月9日完成搬遷。隨著這一日期的逼近，奧利佛·塔博和我白天都在城內，會見當地的領導人，討論行動計劃，從我們的專業角度為那些已經被趕走或遭起訴的人出謀劃策。我們試圖設法向法庭證明，政府的文件常常是錯誤的，因此政府頒發的指令也常常是非法的。但是，這僅僅是臨時措施，政府不會讓幾個非法的指令擋他們的路。

在完成搬遷的日子即將到來之前，我們計劃在自由廣場召開一個特別大會，屆時將有一萬人集中在一起聽魯圖利酋長的演講。但是，魯圖利酋長剛一到約翰內斯堡，禁令就落到了他的頭上，強迫他返回納塔爾。

搬遷之前的那個夜晚，當地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中最投入的領導人之一喬·毛迪斯召集了一個500多名青年積極分子參加的緊急會議。他們希望非洲人國民大會下達命令向警察和軍人開戰。他們準備連夜修筑防御工事，第二天用武器和手中任何可以拿到的東西對付警察。他們借用我們的口號說：“只有跨過我們的尸體，索菲亞頓才能搬遷。”

但是，與包括我在內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充分討論后，喬還是告誡青年人冷靜下來。他們非常氣憤，感覺非洲人國民大會背叛了他們。但是，我們相信暴力將是一場災難。我們指出，一個武裝行動需要認真策劃，不然就無異于自殺。也就是說，我們還沒有做好對敵人以牙還牙的準備。

2月9日天剛蒙蒙亮的時候，4000多名警察和部隊士兵封鎖了索菲亞頓。同時，有工人開始把清空的房子拆毀，政府派來的卡車開始把住戶從索菲亞頓搬到牧場。那天天黑之前，非洲人國民大會已經把幾戶人家安排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市內前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的家里。但是，我們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也來得太遲，不過是權宜之計。軍隊和警察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幾周后，我們的反抗就失敗了。我們多數地方領導人都被禁止或逮捕，最后，索菲亞頓沒有被摧毀于炮火聲中，卻被摧毀于隆隆的卡車和大錘聲中。

如果是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看到這條新聞，那么你對一個政治行動總會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但是，當你處于政治斗爭的垓心，你卻沒有時間去回想它。在西部城區反對搬遷運動中，我們暴露出許多缺陷，得到了許多教訓。“從我們的尸體上跨過去！”這是一個很有鼓動性的口號，但是，實踐證明這個口號的負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一個口號是組織與其試圖領導的群眾之間的重要紐帶，理應把特定的不滿情緒融入簡明扼要的語言中，借以動員人民去戰斗。我們的口號抓住了人民的想象，但是，卻使他們誤認為我們將誓死反對這次搬遷。事實上，非洲人國民大會根本就沒有準備那樣去做。

我們從來沒有為人們提供搬遷到牧場之外的另一種選擇。當索菲亞頓的群眾認識到我們既阻攔不住政府的搬遷，又沒有別的地方可供居住時，他們自己的反抗情緒也不會那么大，流向牧場的人就會增多。許多租房戶愿意搬遷，因為他們在牧場會有更寬綽、更干凈的房子住。我們不曾考慮房主和租房戶的不同處境。雖然房主有理由留下來，但許多租房戶卻愿意搬走。非洲人國民大會受到許多非洲主義人士的批評，他們指責非洲人國民大會以犧牲租房戶的利益為代價來保護房主的利益。

我從這次運動中吸取的教訓是，我們始終沒有別的辦法武裝起來進行抵抗。我們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我們“武器庫”中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講、派請愿團、威脅、游行、罷工、自愿去坐牢。這些“武器”都沒有效果，因為不管我們采取哪種方式都會遭到鐵拳的打擊。一個自由戰士逐漸明白了這個艱難歷程，即由壓迫者確定斗爭的性質，被壓迫者常常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去借鑒壓迫者。也就是說，發展到一定時刻，只能以火救火。

教育是個人成長的巨大動力，正是通過教育，一個農民的兒子才能成為醫生，一個礦工的兒子才能成為一個礦長，一個農場雇工的孩子才能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總統。我們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別人的饋贈，以求得發展。這種發展也就使人與人之間出現了差別。

自進入20世紀以來，非洲人擁有了受教育的機會。最初，外國教會和傳教團創辦了學校。在合眾黨的領導下，非洲人中學和白人中學的教育大綱基本是一樣的。教會中學為非洲人提供了西式英語教育，我所接受的就是這種教育。但是，我們卻受到了教學設施的限制。

即使是在國民黨人上臺之前，投資上的差別也說明了這種種族主義教育的事實。通常，政府花在每個白人學生身上的教育經費是花在每個非洲學生身上的經費的6倍。對非洲人的教育并不是義務性的，只有在小學紙年級時才實行免費。有一多半非洲學齡兒童根本就沒有上學的機會，并且只有少數非洲人學到中學畢業。

即使是花在非洲學生身上的教育經費如此之少，仍然使國民黨人感到不快。非洲白人對非洲人的教育歷來不感興趣。對他們來說，這簡直是一種浪費，因為非洲人天生無知、懶惰，什么樣的教育也不能彌補他們的這些不足。非洲白人從傳統上就對非洲人學習英語有敵意，因為英語對非洲白人來說是一種外來語言，而對我們則是一種求解放的語言。

1953年，國民黨統治下的議會通過了《班圖教育法》，這個法律企圖把種族隔離的“圖章”加蓋在非洲人的教育事業上。這個法律把非洲人的教育管理權從教育部轉到了土著事務管理局。根據這個法律，由教會和傳教機構負責的非洲人的小學和中學可以選擇靠攏政府否則只能接收逐漸減少的補貼，或者由政府接管對非洲人的教育，否則干脆取消對非洲人的教育。非洲人教師不得批評政府或學校當局。這是在知識方面搞白人至上，也是教育歧視制度化的一種手段。

班圖教育部長亨德里克·沃爾沃德解釋說：“必須根據其生活中的機遇進行培訓和教育。”他的意思是，非洲人現在沒有并且將來也沒有任何機會，那么，為什么要教育他們呢？他說：“在歐洲人社區里，班圖人也就只能停留在勞工階層。”總而言之，非洲人應當被訓練成低賤的勞工仆役，處于永久附屬于白人的地位。

對于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這個法律是一個非常險惡的法律，其目的在于從總體上阻止非洲人的文明進步，如果獲得通過，將會使非洲人民的自由斗爭受到扼殺，將來非洲人的智力前景也就成了問題。正如馬修斯教授當時所說：“在沃爾沃德的學校里的愚昧教育和歧視性教育，比根本沒有教育更糟糕。”

這個法律和沃爾沃德的拙劣行徑引起了黑人和白人的廣泛憤慨。除了支持種族隔離的荷蘭歸正會和路德宗傳教團之外，所有的基督教教會都反對這個新法律。但是，這種反對僅限于譴責，而沒有進行抵制。英國國教會采取了抵制政策，他們對這項新政策的批評最大膽，也最堅決。約翰內斯堡大主教安布羅斯·里夫斯采取了極端行動，干脆把他的學校都關閉了。在他的學校里就讀的兒童總數達1萬名之多。但是，南非教堂的大主教，為了不讓孩子們流落街頭，把其余的學校都交給了政府。盡管他們表示抗議，但除了羅馬天主教、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聯合猶太改革圣教沒有政府的經費仍然堅持下去之外，其他教派都開始執行這個法律。即使是我自己所屬的魏斯勒陽（Wesleyan）教會，也把20萬名非洲學生交給了政府。如果其他教派都像堅持抵制的教派那樣，政府將面臨僵局而可能被迫作出讓步。但是，政府卻踏著我們的尸體過去了。

把學校管理交給土著管理局這項法律定于1955年4月1日正式施行。非洲人國民大會開始討論當天學校聯合抵制方案。我們執行委員會內部首先秘密討論了我們是否宣告持久地進行抵制，以便在《班圖教育法》生效前就使它失敗等問題。討論是激烈的，兩種意見都有一定的道理。堅持持久抵制的人認為，《班圖教育法》是一杯毒水，渴死也不能喝。以任何方式接受它都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他們說，國家正處于臨爆狀態，人民正在渴盼采取比抗議更強烈的抵制活動。

盡管我有煽動鬧事者的壞名聲，但是我總認為，組織絕不應作出做不到的承諾，因為，那樣會使人民失去信心。我的觀點是，我們的行動不應該基于理想主義的思考之上，而應基于對現實的思考。持久抵抗需要大規模的組織系統和大量的資源，而那是我們所欠缺的，我們過去的運動沒有跡象表明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快速建立我們的學校以容納成千上萬的學生，這對我們來說簡直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不能向我們的人民提供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提供的任何東西就幾乎都等于零。與其他人一起，我堅持主張開展為期一周的抵制活動。

全國執行委員會決定，從4月1日開始進行為期一周的學校聯合抵制活動。這是1954年12月在德班舉行的年會上建議的，但是，代表們拒絕了這個建議，大家贊成開展持久的抵抗運動。年會是最高級別的會議，它比執行委員會級別還要高，我們不得不肩負起幾乎沒有可能產生效果的一種抵制運動。沃爾沃德聲明，政府將永久性關閉所有進行抵制活動的學校，參加罷課的學生將被禁止重新上學讀書。

由于這次抵制活動，學生家長和社團將不得不介入教育，取代學校的位置。我向學生家長們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們發表講話，告訴他們，每一個家庭、每一間簡陋房屋以及每一個社團組織都必須變成培養我們的孩子的學習中心。

抵制活動從4月1日開始，并出現了復雜局面，因為這種抵制常常是偶然發生的、無組織和無效果的。在東蘭德，有大約7000名學童受到了影響。黎明前舉行了游行，并號召學生家長們讓孩子待在家中。許多婦女在學校里放哨，動員已經進入學校的學生們離開學校。

在城市東南的一個名叫格米斯頓的小鎮上，非洲人國民大會地方分支機構的主席喬舒亞·馬庫伊，為800名參加抵制運動的學生開辦了一所學校，這所學校持續了三年之久。在伊麗莎白港，巴雷特·鐵西辭掉了正式的教學職位，專門為參加抵制的學生興辦學校。1956年，他讓其中的70名學生去參加六級標準考試，除了三名學生之外，其他都通過了考試。許多地方都有臨時學校（為了避免引起當局的注意，對外稱“文化俱樂部”），為參加抵制活動的學生提供學習機會。政府后來出臺了一個法律，從事未經批準的教育工作可處以罰款和監禁，警察經常騷擾這些俱樂部，但是許多仍然堅持在地下活動。最后，社團學校衰敗了，面臨接受歧視性教育還是干脆不接受任何教育的學生家長大多選擇了前者。我自己的孩子在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學校學習，這是一所私立學校，不依靠政府補貼。

這次抵制運動應當從兩個層面判斷其是否成功：是否達到了直接的目標，是否使更多的人提高了政治覺悟并把他們吸引到斗爭中來。從第一個層面看，這次抵制運動顯然是失敗了，我們沒有使全國的學校都關門，也沒有使自己擺脫《班圖教育法》。但是，我們要求修改這個法律的抗議活動，使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動，沃爾沃德被迫宣布：教育應該一視同仁。政府在1954年11月起草的教育大綱就是對原先根據種族改造教育體制的主張的讓步。最終，我們除了“兩害相權取其輕”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同意接受一種被降格的教育。但是，“班圖教育”的后果卻出乎意料地給政府帶來了麻煩。正是由于實行“班圖教育”，才使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在這個國家從未看到過的最憤怒、最叛逆的一代黑人青年。當這些在“班圖教育”下的兒童進入他們的青年時代的時候，他們滿懷著憤慨和叛逆的激情出現在了世人面前。

魯圖利酋長當選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幾個月后，Z. K.馬修斯教授結束了在美國一年的訪問學者生涯，帶著改變斗爭策略的思想回到了南非。他在于開普舉行的非國大年會上發表的講話中說：“我想知道這樣一個時刻是否還沒有到來——即非洲人國民大會考慮召開一個全國大會，為將來的民主南非起草《自由憲章》。這個大會要代表南非所有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種族、什么膚色。”

幾個月內，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會議收到了提案，要求建立一個人民大會政務院，讓魯圖利擔任主席，瓦爾特·西蘇陸和玉蘇福·凱查利亞聯合擔任書記。人民大會準備制定一套建立新南非的原則，新憲章將聽取人民的建議，全國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被授權以書面形式聽取本地區每個人的意見。這個憲章將是一個來自人民的文件。

人民大會代表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存在的兩種主要觀點之一，即非洲人國民大會似乎將不可避免地遭到政府取締。許多人堅持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做好轉入地下爭取秘密活動的準備。同時，我們也不想放棄重要的公開策略和行動，以給非洲人國民大會帶來關注和群眾支持。人民大會將是一種公開的力量展示。

我們關于人民大會的夢想是讓它成為自由斗爭歷史中的劃時代的大事，通過聯合所有南非被壓迫人民和進步力量，形成要求改變南非現狀的強烈的呼聲。我們的希望是有一天會看到像1912年建立非洲人國民大會那樣莊嚴的場面。

我們設想吸引最廣泛的贊助組織，并邀請200個左右的組織出席人民大會，不管是白人組織、黑人組織、印度人組織或有色人組織，我們都請他們派代表參加1954年3月在德班附近的湯加特召開的籌備會。在會上成立了全國行動委員會，委員會由8名委員組成，分別來自4個贊助組織。該委員會由魯圖利酋長擔任主席，書記處由“南非印度人大會”的瓦爾特·西蘇陸（后來由于對他的禁止而被迫退出該組織，其職位由奧利佛接任）、玉蘇福·凱查利亞，“南非有色人組織”（SACPO）的斯坦利·洛蘭和“民主人士大會”（COD）的萊昂內爾·波恩斯坦組成。

南非有色人組織由有色人領袖人物和商業工會人士于1953年9月在開普敦成立，是一個為了在開普保留有色人投票權而開展的斗爭中遲到的產物，該組織是有色人利益的代表。在南非有色人組織成立的大會上，奧利佛·塔博和玉蘇福·凱查利亞發表了講話。在反抗運動的鼓舞下，民主人士大會于1952年下半年成立，它是一個激進的、反政府的左派白人政黨。民主人士大會雖然是一個小組織，主要局限于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但是，其影響與其人數卻不成比例。民主人士大會的成員如邁克爾·哈邁爾、布拉姆·費希爾、拉斯迪·波恩斯坦，都是我們爭取自由事業的雄辯家。民主人士大會緊密地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保持一致，提倡普遍公民權和黑人與白人完全平等。我把民主人士大會看作直接就我們的觀點與白人共和黨相聯系的橋梁。民主人士大會對非洲人起到了一種重要的象征作用，因為反對白人而參加斗爭的黑人發現，確實有一些平等對待黑人的心懷善意的白人。

全國行動委員會邀請所有的參與組織及其追隨者對《自由憲章》提出自己的建議。傳閱函被發往全國的每個鄉鎮和村莊，傳閱函上寫著：“如果讓你制定法律……你將怎么辦？你將如何把南非變成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的幸福樂園？”有的傳單充滿著體現憲章特點的詩一般的理想主義：

我們呼喚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讓我們一起講自由！

讓所有人的聲音都能被聽到，讓所有使我們自由的要求都記錄在案，讓這些要求統統寫進《自由憲章》。

這種號召體現了人民的想象力，各地的運動和文化俱樂部、宗教團體、納稅人協會、婦女組織、學校、商業工會紛紛提出建議，有些建議就寫在餐巾上、從練習本撕下來的紙上、錐形紙帽上、我們發的傳單的背面。看到普通人的建議遠比領導人的建議更高明，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最集中的要求是“一人一票”制。大家的共識是，這個國家屬于所有以它為家的公民。

非洲人國民大會分支機構在起草《憲章》的過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事實上兩份最好的草稿來自德班和彼得馬里茨堡。這些草稿經過綜合整理，然后再發往各地和各委員會征求意見。全國行動理事會有一個專門班子負責起草《憲章》，然后由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負責審閱。

《憲章》需要提交人民大會討論，每個條目都要經過代表批準。6月份，在召開大會的前幾天，我們的一個小組審閱了《憲章》的草案。我們僅僅作了很小的修改，因為時間緊迫，并且這個文件已經很像樣。

人民大會在約翰內斯堡西南數英里之外的克里普敦舉行，這是一個坐落在草原上的村莊。大會會期是1955年6月25日至26日，這兩天晴空萬里，陽光明媚。3000多代表不顧警察的威脅和恐嚇參加了大會并表決通過了《憲章》的最后文本。他們有的自己駕駛汽車，有的乘坐公共汽車、卡車，有的步行來到會場。盡管大多數的代表都是黑人，但是，其中也有300多名印度人、200多名有色人和100多名白人。

我與瓦爾特一起駕車到了克里普敦。因為我們兩位都遭到了禁止，所以，我們兩個人在會場邊緣一個不顯眼的地方坐了下來。與會的人數和良好的秩序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佩戴著黑、綠、黃袖章的“自由志愿者”迎接每位代表的到來，并負責給他們安排座位。有身穿會議裙、會議襯衫、會議頭巾的老太太和青年女士，也有戴著會議袖章和會議帽子的老頭和青年男士。到處掛滿了“我們終身自由，斗爭萬歲”的標語。主席臺上五彩繽紛：在象征四個聯盟組織的四色四輻條巨型車輪前就座的，有來自民主人士大會的白人，有來自南非印度人大會的印度人，也有來自南非有色人組織的有色人。白人警察、黑人警察及特警偵探在會場周圍不時地走動，他們又是拍照，又是記錄，徒勞地試圖對參會者進行威脅和恐嚇。

在會上，大家演唱了許多歌曲，許多人在會上發表了講話。會議期間，代表們統一安排就餐。會議的氣氛既嚴肅又活潑。第一天下午，分別用英語、塞索托語、科薩語向與會者逐段大聲宣讀了《憲章》。每讀完一段，代表們都會高呼“Afrika!”（非洲！）和“Mayibuye!”（回來！）表示贊同。會議的第一天是成功的。

第二天，《憲章》每一段都在代表們的歡呼聲中得到通過，當下午3時30分準備最后投票通過《憲章》的時候，一伙荷槍實彈的警察和特警偵探蜂擁跑上主席臺，一個警察拿起麥克風用粗啞的聲音宣布我們有謀反的嫌疑，未經警察允許任何人不準離開會場。警察開始把主席臺上的人都趕下了臺，并沒收了他們的文件和照片，甚至在文件上做上“肉湯”和“素湯”的標志。另一伙持來復槍的警察在會場周圍布置了警戒線。會議代表高唱《上帝保佑非洲》，表達強烈的抗議。然后代表們被允許一個一個地離開會場，警察一個一個地進行盤問，并把每個人的名字記下來。當警察開始襲擊的時候，我正在會場邊上，我本能地想站出來為代表們說話，但是，我想到謹慎似乎是聰明之舉，因為如果我站出來，我們立即就會被逮捕入獄。會后立即在約翰內斯堡召集了緊急會議，我回去后也參加了這個會議。在回約翰內斯堡的路上，我意識到這次襲擊是政府將要采取更嚴厲措施的信號。

盡管人民大會遭到了破壞，但是《憲章》本身卻成了指引解放斗爭的偉大燈塔。像其他不朽的政治文獻如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和《共產黨宣言》一樣，《自由憲章》是現實目標和詩一般的語言相結合的產物。它贊美廢除種族歧視和人人獲得平等的權利，歡迎熱愛自由并參與創造一個民主的、沒有種族歧視的南非的所有人士。它代表著人民的希望和夢想，成為解放斗爭和國家未來的藍圖。《憲章》的前言部分說：

我們南非人民向全國和全世界宣布：

南非屬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體人民，沒有黑人和白人之分，除非根據人民的意愿，沒有任何政府能夠聲稱對它享有統治權；

我們的人民被建立在不公正、不平等基礎之上的政府剝奪了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的與生俱來的權利——自由與和平；

我們的國家，只有我們的所有人民都和睦相處、共享平等和機會的時候才能繁榮昌盛；

只有一個建立在所有人民的意愿之上的民主政府才能保證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權利，不管他或她是什么膚色、什么種族、什么性別或什么信仰；

因此，我們南非人，不管是黑人或白人，大家以彼此平等的同胞和兄弟的身份接受《自由憲章》。我們決心一起努力，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直到獲得民主。

然后，《憲章》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南非提出了要求：

人民當家做主！

每個男人和女人都將有立法部門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所有的人都將有權參與國家的管理；

人民的權利，不分種族、膚色或性別，都是平等的；

少數人統治的一切機構，包括咨詢委員會、政務部門和當權機構，都將被民主政府部門所取代。

全國一切團體都有平等的權利！

全國各團體、各種族在政府各部門、法院、學校將享有平等的地位；

全國各團體將受法律保護，使種族和民族自尊不再受到傷害；

所有的人都有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發展他們自己的文化和習慣的平等權利；

宣傳和實施民族、種族或膚色歧視或輕視將是一種犯罪行為；

一切種族隔離政策都將被廢除。

人民共享國家的財富！

我們國家的財富、南非的所有遺產都要歸還給人民；

地下的礦產、銀行及壟斷性產業都要總體上歸人民所有；

將對其他所有工業和商業強化管理，使它們有助于為人民造福；

所有的人都將享有平等權利在他們選擇的地方經商、生產，并可進入各種貿易、手藝和專業領域。

在土地上勞作的人們共同分享土地！

以種族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將被廢除，所有的土地都將由在其上勞作的人們重新分配，以消滅饑荒和土地匱乏者……

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有的人，特別是反共產黨、反白人的一部分非洲主義者，對《憲章》持反對態度，因為它與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整個歷史上所要求的南非根本不同。他們聲稱《憲章》有利于社會主義，并認為國民黨人和白人共產黨人對《憲章》的意識形態有很大的影響。1956年6月，我在《解放》月刊上發表文章指出，《憲章》贊成私有企業，將會首先使資本主義在非洲人中繁榮。《憲章》保證，當自由到來時，非洲人將有機會以他們自己的名義擁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財產，總之，將過上資本家和企業主那樣的生活。《憲章》中沒有說要消滅階級和私有財產，或生產資料公有，或公布任何科學社會主義信條。《憲章》中關于礦產、銀行和壟斷性行業可能國有化的條款，是如果經濟不僅僅由白人商人擁有和經營則需要采取的一種措施。

《憲章》事實上是一個革命性的文件，因為，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南非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憲章》所展望的變化就不可能實現。它并不是要搞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關于人民要求結束壓迫的總體主張。在南非，實現公平就必須廢除隔離，因為隔離恰恰是不公平的體現。

21...

1955年9月初，我的禁止期滿。我上一次休假還是在1948年。當時我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中還是一個沒有經驗的輕量級人物，除了參加德蘭士瓦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和偶爾在公共大會上發表講話之外，沒有多少責任。現在到了38歲的年紀，我進入了次重量級級別，可以承擔更重的擔子和更多的責任。我在約翰內斯堡被禁止了兩年，忙于法律和政治工作，忽視了特蘭斯凱那邊曼德拉家族的事情。我渴望再去農村看一看，再體驗一下我孩提時代那開闊的草原和連綿起伏的山巒。我渴望見到我家中的親人，并就涉及特蘭斯凱的問題與薩巴塔和達利旺伽談談。同時，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也很希望我就政治問題同他們一起探討一下。我將休一個工作假，這也是我唯一知道如何度過的一次假期。

我動身之前的那個夜晚，許多朋友聚集在我的家里為我送行，杜馬·諾克韋也在其中。他當時是全國青年團書記，是一個年輕而厚道的高級律師。杜馬曾經陪同瓦爾特去布加勒斯特參加世界青年節。那天，他為我們唱了他在青年節期間所學的俄國歌曲和中國歌曲。半夜時分，正當我的客人們準備離去的時候，我的女兒馬卡紫薇醒了，當時她只有兩歲。她問我，她能不能與我一起去。我同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時間一直很少，馬卡紫薇的請求使我產生了一陣內疚。我去特蘭斯凱的熱情忽然消失了。但是，我最后還是把她放回床上，并吻了她，道了晚安。當她睡著了以后，我也為我的特蘭斯凱之行做完了最后的準備。

我準備動身去進行一番實地調查，通過這次調查我將得到多種喜悅，既看了農村，又看了親朋好友和同志。我一直被隔絕于南非其他地方的發展之外，很想親眼看看內地發生了什么變化。盡管我看過全國各地的報紙，但是，那只不過是對實際情況的不真實報道。了解他們的情況對于一位自由戰士是重要的，不是因為這種了解可以反映事實真相，而是因為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披露某些新聞的炮制者和讀者的偏見。在這次旅途中，我將首先要同在地里勞動的人民談一談。

午夜過后不久，我就動身了。不到一個小時，我就行駛在了去德班的公路上。路上沒有車輛和行人，伴我而行的只有星星和德蘭士瓦的微風。盡管我一夜沒睡覺，但是我的心情十分舒暢。天亮的時候，我穿過福爾克斯勒斯特到納塔爾，那曾是祖魯最后的獨立的國王塞奇瓦約的國家。1879年，他們的部隊在伊散德爾瓦納擊敗了英國的一個縱隊。但是，塞奇瓦約國王沒有頂住英國人的炮火，最后被打敗了。越過納塔爾邊界上的一條河流時，我看見了馬柱巴群山，這里有陡峭的懸崖。塞奇瓦約失敗后不到兩年，一小股布爾人部隊在這里伏擊并打敗了英國紅衣軍團的一支駐軍。在馬柱巴山，南非白人通過頑強抵抗英國帝國主義來保衛他們的獨立，他們為民族主義而戰。現在，原來那些自由戰士的后代卻正在迫害我們的人民，而我們的人民正在為獨立而斗爭，這正是南非白人曾經為之戰斗并獻出生命的共同事業。我駕車穿過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山峰，沒怎么考慮這些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的事情——他們從受壓迫者變成壓迫者，考慮得較多的是殘酷無情的南非白人，應該從我的人民中得到他們自己在馬柱巴山給英國人留下的教訓。

這種苦澀的沉思被車上收音機里班圖電臺播放的歡快的樂曲所打斷。雖然我對政府經營的南非廣播公司資助起來的班圖廣播電臺的保守政治宣傳持鄙視態度，但是，我卻對它播放的音樂非常著迷（在南非，一般是非洲藝術家創作音樂，但白人錄制公司從中贏利）。我收聽的是一個大眾節目，名叫“轉播服務”，這個節目主要播放南非最著名的歌星演唱的歌曲，他們是米瑞亞姆·麥克巴、多利·拉斯比、多蘿西·馬蘇庫、陶庫·舒庫瑪和曼哈頓弟兄等。我喜歡各種音樂，不過這種本就在我血脈中流淌著的音樂更能直達我心。非洲音樂的美妙之處在于，它好像是在訴說一個個悲慘的故事。你可能很窮，你可能只有一間搖搖欲墜的房子，你可能失去了工作，但是，這種音樂會給你希望。非洲音樂能夠反映非洲人民的理想，它能使那些不關心政治的人點燃起政治激情。在非洲人的集會中，你可以親耳聽到這種富有感染力的歌聲。政治可以借助于音樂而得到加強，但是音樂有時也有一種反抗政治的力量。

我在納塔爾作了幾次逗留，秘密地會見了那里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在快要抵達德班的地方，我順便到了彼得馬里茨堡，在那里與晁塔·摩特拉、摩西·馬布黑達和其他幾位朋友共同度過了一個整夜，共同分析了國內的政治形勢。然后我又到了格魯特維勒，與魯圖利一起過了一天。盡管他遭到禁止已經一年多，但是，他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活動仍然很熟悉。他為約翰內斯堡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越來越集權、使地區的權力越來越弱化而感到不安。我向他保證，我們將會使各地區維持強大的權力。

我的下一站是去德班與奈克醫生和納塔爾印度人大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見面，在那里我提出了一個敏感的問題：全國執行委員會認為，印度人大會最近有點消極，由于奈克比我年長，而且是一個比我遭受了更大打擊的人，所以我本不愿意這樣做，但是，我們是在探討克服政府限制的辦法。

離開德班，我驅車沿海岸線向南行駛，經過謝普斯通港和圣約翰斯港，這是點綴在印度洋上的兩個小殖民地城市。在被這個美不勝收的地區迷住的同時，我也不斷地對命名建筑物和街道的白人帝國主義者深有感觸，是他們鎮壓了原本屬于這個地方的人們。在這里，我調轉方向朝內地行駛，去烏姆茲姆庫陸與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財政部部長康考會面，進一步探討了出現的問題。

然后，我滿懷興奮的心情直奔烏姆塔塔。當我行駛在烏姆塔塔的主要街道——約克大道上的時候，我立即產生了一種親近感，并找到了一種長時間離家后又重新回到家鄉的感覺。我離開這里已經13年了，盡管沒有彩旗和肥牛歡迎我這個游子回到故里，但是，見到我的母親、我的草舍和我小時候的朋友，我非常高興。不過，我到特蘭斯凱還有第二個目的：我要與一個專門考察小組在這里見面。該考察小組此行的目的是了解特蘭斯凱由棒哈管理體制向班圖管理體制的過渡情況。

棒哈管理體制由108名成員組成，四分之一是白人，四分之三是黑人，其作用是在當地就非洲人立法以及當地事務的管理問題，如稅收和道路的管理方面，給政府當參謀。棒哈體制雖然是特蘭斯凱最有影響的政治體制，但是，其決議是咨詢性的，其決定要接受所屬地區白人行政長官的審查。白人給棒哈體制多大的權力，它就有多大的權力。而按照班圖管理法，它即將被一種更有約束力的管理體制所取代。這種管理體制是封建式的管理體制，其基礎是政府控制下的世襲制和部落制。政府嘴上說是通過實行班圖管理體制將使人民擺脫地方白人長官的控制，但是，這實際上是政府暗中破壞民主、制造部落矛盾的煙幕彈。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認為，接受班圖管理體制就意味著向政府投降。

到達烏姆塔塔的那天晚上，我立即會見了特蘭斯凱的議員和我的侄子K. D.馬嘆茲瑪，我一直稱他為達利旺伽。達利旺伽在說服棒哈人接受班圖管理體制方面起到了主導作用，因為新的管理體制將強化他作為移居泰姆布蘭的酋長的權力。在這個問題上，達利旺伽與我意見并不一致。我們的分歧在于：他選擇了傳統的領導體制，并準備與這種體制合作。但是，那天太晚了，無法與他深談，我們決定第二天再談。

我在市內的一家寄宿公寓住了一夜，第二天起得很早，兩位當地酋長在我房間里一邊喝著咖啡，一邊談論他們在新的班圖管理體制中所擔當的角色。在我們談話期間，寄宿公寓的女東家神情緊張地把一個白人領進了我的房間。那個白人問：“你是曼德拉嗎？”

“你是什么人？”我問。

他報了姓名，說自己是保安警察局的偵探中士。

“請出示你的證件好嗎？”我問道。顯然他對我的大膽冒犯很生氣，但是他還是不情愿地拿出了他的身份證明。我告訴他：“是的，我是納爾遜·曼德拉。”他告訴我：“警察局局長要見你。”我說：“如果他想見我，他知道我在哪里。”然后，那個中士讓我跟他去警察局。我問他是否要逮捕我，他說不是。

“那樣的話，”我說，“我不想去。”他對我的拒絕感到有些吃驚，但是他知道我的拒絕是合法的。于是，他盤問了我一連串的問題：我是什么時候離開約翰內斯堡的？我到了哪些地方？我與誰談了話？我有沒有進入特蘭斯凱的許可證？準備在特蘭斯凱住多久？我告訴他，特蘭斯凱是我的家，進入自己的家不需要許可證。隨后，那位中士離開了我的房間。

兩位酋長對我的行為感到吃驚，責備我太無禮。我解釋說，我僅僅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兩位酋長沒能理解我，顯然認為我是一個自找麻煩的年輕人。這兩位酋長就是我打算勸他們反對班圖管理體制的人，顯然，我沒給他們留下什么好的印象。這件意外的事情提醒我，如今回到了家鄉，我已經不再是13年前離開家鄉的那個我。

特蘭斯凱的警察是不識時務的，自從我離開那家寄宿公寓，他們就一直跟著我，我與任何人講完話后，總有警察走到與我談話的人的面前說：“如果你與曼德拉談話，我們就來逮捕你。”

我與一位當地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進行了短暫的會晤，并且得知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缺少資金，對此我很吃驚。但是，此時此刻我主要想到的不是組織，而是我的下一站：庫努。我是在那里長大的，我母親仍然在那里居住。

我叫醒了我母親，她猛然看見我吃驚得像是看見一個幽靈一樣。但是，她非常高興。我給她帶來了食物，有水果、肉、糖、鹽和一只雞。然后，我母親為我生爐子沏茶。我們沒有擁抱和親吻，因為擁抱和親吻不是我們的習慣。盡管我回到家里很高興，但是看到她老人家一個人生活在那樣差的環境中，我很內疚。我試圖說服她隨我去約翰內斯堡住在一起，但是，她說她不愿意離開她熱愛的農村。我不止一次地想，一個人置自己家庭的幸福于不顧，而為別人的幸福去奮斗，這是否是合理的。難道能有比照顧自己年邁的母親更重要的事情？難道政治就是推卸自己的責任和原諒自己沒有盡職的借口？

我同我母親一起待了一個小時左右，然后動身去穆克孜韋尼過夜。到了那里已經是夜晚，我興奮地鳴著汽車的喇叭，根本沒有考慮人們如何理解這種噪音。人們擔心地從他們的房子里走出來，可能以為來了警察。但是，當他們認出我來的時候，一群鄉親開始驚喜地問這問那。

我沒有像一個孩子躺在原來的床上那樣香甜地入睡，而是翻來覆去地睡不著，我又在思考我所走的路是否正確。從道義上講，我認為我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并不是說自由斗爭比照顧家庭更重要，因為自由斗爭和照顧家庭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第二天返回庫努后，我用了一天的時間與鄉親們敘舊，到村子的田地里轉轉。我也看望了我的妹妹馬貝爾，她是我的姐妹中最老練最通情達理的一個，我十分欣賞她。馬貝爾已經結了婚，但是，她的出嫁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的另一個妹妹巴利韋比馬貝爾大，她與一個小伙子訂了婚，并且也收了人家的彩禮。但是，在出嫁前兩個禮拜，勇敢的巴利韋卻逃之夭夭。接受了人家的彩禮又無法退回，所以，家里決定讓馬貝爾代替巴利韋出嫁，馬貝爾竟然同意了。

那天下午，我很晚才回到穆克孜韋尼去休息。我又是夜晚到達那里，并高聲鳴著車喇叭告訴大家我回來了。不過，這次人們認為是他們的酋長佳士提斯回來了。佳士提斯被政府免去了酋長職務，當時他住在德班。盡管政府指定一個人代替了他的酋長位置，但是酋長是世襲的，是因為他的血統才能行使權威的。他們見到我，很高興，但是，他們更希望能歡迎佳士提斯回家。

在我到達我的第二個母親、攝政王的遺孀“非英格蘭”的克拉爾的時候，她早就休息了，但當她穿著睡衣出現在我的面前的時候，她還是非常高興，立即讓我開車拉著她去附近的親戚家去慶祝我的到來。她跳進我的車內，我們立即驅車穿過荒蕪的草地，來到她親戚家的圓形房子。在那里，我們還拜訪了另一戶人家。最后，直到拂曉前才躺下睡覺，雖然筋疲力盡，但我卻很高興。

接下來的兩個禮拜，我往來于庫努和穆克孜韋尼之間，輪流住在我母親和“非英格蘭”的克拉爾里，不是走親訪友，就是接待來客。我吃的是與我小時候吃的一樣的飯菜，我走的是與小時候走的一樣的路，白天看的是與小時候所看的一樣的天空，晚上看的是與小時候所看的一樣的星星。保持與自己的根接觸對一個自由戰士是重要的，喧鬧的城市生活容易把過去抹去。這次回家訪問使我重新恢復了我對生我養我的那個地方的感情。我又一次想起我是我母親原來那個房子里的兒子，我又一次想起攝政王對我的撫養。

這次訪問也是檢測我與我家鄉所產生的距離的一種方式。我看到我自己的人民仍然停留在一個地方，而我卻不停地遷移，去感受新鮮事物，去獲得新的思想。如果我以前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那么此時我知道了當年在福特黑爾大學讀完書后沒回特蘭斯凱是正確的。如果當時我回到特蘭斯凱，我政治命運的變化將不會如此之快。

當專門委員會考慮推遲采用班圖管理體制的時候，達利旺伽和我前往烏姆塔塔醫院看望了薩巴塔。我希望與薩巴塔談談班圖管理體制，但是他的身體卻不允許這樣做。我要求薩巴塔病情好轉立即和他弟弟達利旺伽談談這個問題，并把它搞清楚。組織恩古奔庫卡的兩個后人共商大事使我感到自豪，我思忖著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許多年之前就準備把我培養成薩巴塔的參事，而我最終也起到了這種作用。

達利旺伽與我一同驅車從烏姆塔塔前往佳馬塔，在那里我們見到了達利旺伽的弟弟喬治。當時，喬治是一個實習律師，他的兩位合同見習職員與我很熟悉，我見到他們很高興。這兩位合同見習職員就是A. P.穆達和采波·萊特拉卡。他們兩人都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堅決擁護者，并因此而放棄了教學，決定做律師。在佳馬塔，我們圍坐在一起，研究強制實行的班圖管理體制問題。

我此行的目的是說服天生要在特蘭斯凱的政治中擔任領導角色的達利旺伽，反對強迫接受班圖管理體制。我不希望我們的會談變成一次攤牌或論戰，我也不希望坐視不管或挑毛病，而是希望在心中裝著人民和國家最高利益的人之間展開一次認真的討論。

在許多方面，達利旺伽仍然把我看作他的下級，不論是從泰姆布的等級制度還是從我自己的政治發展上看，我都應該是他的下級。雖然在以前的王國中我是他的臣民，但是，我認為我的政治見解已經超過了以前的參事。他關心的是他自己的部落，而我是從整個國家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我不想引用政治理論的大道理使討論復雜化，我只依靠歷史常識和事實說明問題。在我們開始討論前，達利旺伽邀請穆達、萊特拉卡和他的弟弟喬治參加，他們有點猶豫，堅持聽我們兩人的意見。穆達帶著尊敬的口吻說：“讓侄子與叔叔進行辯論。”按照禮節，我要先發表我的意見，而達利旺伽不能在中間插話，然后，在達利旺伽發表意見的時候，我再當聽客。

首先，我說班圖管理體制是不適合實際的，因為越來越多的非洲人已經從農村搬到了城市。政府的政策是想把非洲人圈在民族部落里，因為他們害怕非洲人團結起來的力量。我說，人民要民主，政治領袖身份要建立在功績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狀況之上。班圖管理體制是民主的倒退。

達利旺伽的意見是想恢復他被英國人毀掉的王室地位。他強調部落制和傳統領導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不想反對把這些東西奉若神明的班圖管理體制。他也期待一個自由的南非，但他認為這個目標通過政府的隔離發展政策能夠更快、更和平地實現。他說，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將帶來流血和災難。他最后責備我置自己在泰姆布王室的地位于不顧，不支持傳統的領導體制，他對此感到吃驚和擔心。

當達利旺伽說完了的時候，我說，盡管我十分理解你個人作為一個酋長的地位，但是，我認為你自己的利益與部落的利益是相沖突的。我還說，如果我處在與你相同的位置上，我會試圖讓自己的利益服從人民的利益。我立即對我最后說的話感到后悔。因為我認識到，在討論中采取從道義上比對方優越的口吻說話是絕對沒有益處的。我注意到在自己說這句話的時候，達利旺伽板起了面孔。因此，我立即把話題轉到了更一般性的問題上。

我們談了一整夜，但是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當太陽正在冉冉升起的時候，我們分手了。我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道路當然會使我們彼此發生沖突。這使我很難過，因為沒有幾個人能像達利旺伽那樣曾經鼓勵過我，沒有什么事情能比與他一起戰斗給我的愉快更多。但是，將來則不同了。我們在家庭問題上發生糾紛仍能保持友好，但在政治上，我們是屬于彼此敵對的兩個陣營。

那天上午我回到了庫努，在那里又住了幾天。我穿過草地走親訪友，但是，孩提時代的那種奇幻的世界已不復存在。一天晚上，我告別了母親和妹妹。我去醫院看望了薩巴塔，祝愿他很快康復。凌晨3點，我又行駛在去開普敦的公路上。明亮的月光和清新的微風一直伴我渡過了凱河。行駛在步步登高、崎嶇不平的山路上，隨著太陽的升起，我的心境也開闊起來。18年前，當容欣塔巴開車送我去希爾德頓時，我就曾經走過這條路。

我發現路邊有一個跛腿行走的男士舉手向我示意，于是我把車速降了下來。我本能地停下來讓他搭車。他大約和我年紀差不多，身材不高，很邋遢，看樣子已經有些日子沒洗澡了。他對我說，他的車壞在了烏姆塔塔另一側，他要去伊麗莎白港，已經走了好幾天。我發現他說的話有些漏洞，我問他車是什么牌子的，他說是別克。我又問他車牌號，他告訴了我一個牌照號。幾分鐘后我又問他是什么車牌號，他告訴了我一個不同的牌照號。我懷疑他是個警察，因此決定少說話。

我的謹慎并沒有引起他的注意，因為他一直嘮叨到伊麗莎白港。他似乎對這個地區的歷史很熟悉，講了許多奇聞軼事。他沒問我姓甚名誰，我也沒有告訴他我的名字。但是他很有意思，我發現他說的話很有用，也很令我感興趣。

我在東倫敦停了一下，與幾個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談話。離開東倫敦之前，我還與其他一些人有過交談，其中一個人有可能是便衣警察。搭我車的那個人知道了我的身份，我們回到車上幾分鐘之后，他對我說：“曼德拉，我懷疑那個人是警察。”這更讓我對他產生了懷疑，于是對他說：“你知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自己不是警察？你必須告訴我你是什么人，不然我就再把你丟在路上。”

他辯解說：“不是，我將對你說實話。”他坦白說，他是一個走私犯，一直在從旁多蘭沿海一帶走私大麻。當時，他遭到了警察的封堵。當發現有警察時，他跳出了車，企圖逃跑。警察向他開了槍，打傷了他的腿，這就是他腿瘸和沒有交通工具的原因。他之所以搭我的車，是因為他認為警察正在追捕他。

我問他為什么選擇這么危險的生計。他告訴我，他本想當教師，但是他父母太窮，無法供他上大學。中學畢業后他只好在一家工廠里工作，但是工資太低，連自己都養活不了。所以，他開始走私大麻以補貼生計。他很快發現這個買賣很賺錢，于是就離開了工廠。他說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他都能找到發揮才能的機會。“我發現那些才能比我差的白人所賺的錢竟然是我的50倍。”停了好長一段時間后，他用認真的語氣說：“我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他告訴我，他參加了1952年的反抗運動，曾經在伊麗莎白港多個當地委員會內供職。我問起幾個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他似乎都了解。后來，在伊麗莎白港我確認了他的話是實話。事實上，在那次反抗運動期間，他是走進監獄的最可靠的自由戰士之一。自由斗爭的大門對選擇從其通過的所有的人都是敞開的。

作為一名曾經受理過大案的律師，我對這種事很熟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與我這位朋友一樣精明的人為了生計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雖然我確實認為，有的人天生或由于教育不良而去犯罪，但是我相信種族隔離使許多遵紀守法的公民變成了罪犯。完全可以推斷，一種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法律制度會使其法律和法規遭到蔑視。

太陽落山的時候，我們抵達了伊麗莎白港，Z. K.馬修斯和他的兒子喬·馬修斯為我安排了住處。第二天上午，我會見了雷蒙德·穆拉巴、弗朗西斯·巴爾德和戈萬·姆貝基。這是我第一次見戈萬·姆貝基。我了解他所做的工作，因為我上學的時候讀過他寫的一本小冊子《發展中的特蘭斯凱》。他過去一直在特蘭斯凱經營合作商店，罷手不干后又擔任了《新時代》周報的編輯。戈萬辦事認真、思路清晰且講話溫和，在學術界和政治界都很有名。他深深地潛心于人民大會的計劃工作，在組織中是天經地義的高級領導人。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時候，我動身去開普敦，一路上只有收音機做伴。以前，我從來沒有在伊麗莎白港與開普敦之間的公路上行駛過，我盼望飽覽路旁綿延不斷的迷人風光。天氣很熱，路兩旁長滿了茂密的植物。我幾乎沒離開這座城市多遠就軋死了一條正橫穿馬路的大蛇，我不迷信，也不信有什么預兆。但是，那條大蛇的死亡使我很掃興。我不想殺死任何生靈，甚至那些讓一些人恐怖的生靈。

一過許曼斯多普，森林變得越來越茂密，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大象和狒狒。一只狒狒正在我的前面橫穿馬路，于是，我停下了車。它站在那里目不轉睛地盯著我，活像一個特警偵探。十分諷刺的是，我雖然是一個非洲人，卻第一次看見故事和傳奇中描繪的非洲。我想，這么美麗的地方，包括那些人跡罕至之處，無一例外地都被白人擁有，而黑人卻無法涉足，我就是不去競選議會議員，也要選擇住在這樣美麗的地方。

一個自由戰士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會有煽動性的思想。在伊麗莎白港以西100多英里的小城鎮克尼斯納，我停下來對周圍的環境進行了考察。這里的道路比城鎮所處的位置高，因此，可以極目遠眺整個周圍環境。周圍到處是雜亂的茂密森林。我對草木并沒細想，但是，我卻想到，這里有許多地方可供一支游擊隊秘密地在這里駐扎和訓練。

當天午夜，我抵達了開普敦，在那里一住就是兩個禮拜。我住在瓦爾特·苔卡牧師家里，他是衛理公會教堂的主教。白天，我大部分時間都與約翰森·恩格衛韋拉和格林伍德·恩告提亞納在一起。恩格衛韋拉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西開普地區的主席，恩告提亞納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西開普地區執行委員會成員。兩人都是共產黨人，也是韋斯利安教堂的負責人。我天天去會見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當地官員，例如沃爾賽斯特、帕爾、斯德琳寶士、西蒙斯敦和荷馬努斯等地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官員。我在開普敦每天都有活動安排，當我問禮拜天安排什么活動時，他們告訴我安息日是專門去教堂做禮拜的時間。我雖然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仍尊重他們的安排。共產主義和基督教至少在非洲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一天，我正走在市內的大街上，我看見一個白人婦女正在貧民窟里啃魚骨頭。她很窮，顯然是無家可歸。但是，她年輕，也并不是沒有魅力。我當然知道也有貧窮的白人，有的白人與黑人一樣貧窮，但是，卻很少見到他們。在大街上，我見慣了黑人乞丐，而看見白人乞丐則使我感到驚奇。雖然我通常不對非洲乞丐施舍，但是，我卻很想給這個女人一點錢。此時，我認識到種族隔離制度對人的虐待，雖然非洲人把天天受煎熬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已經接受，但是，我的心卻立即對這位貧窮而邋遢的白人女士產生了同情。在南非，黑人受窮好像是正常的，而白人受窮則似乎是一種悲劇。

在我準備離開開普敦的時候，我去了《新時代》報社，想看幾個朋友，并想同他們探討一下他們的出版策略。《新時代》是早期被取締的著名左翼出版物之一，同時也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朋友”。那是9月27日上午，當我走在樓梯上的時候，我聽見辦公室內有憤怒的吵鬧聲和搬動家具的聲音。我聽出那是這家報社的經理費雷德·卡恩森的聲音，我也聽見了安全警察的粗暴吼叫聲，他們正在搜查報社的辦公室。我悄悄地離開了那里，后來我發現那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南非歷史上在全國進行的最大規模的警察襲擊行動的一部分，警察帶著搜查被視為叛國、煽動叛亂或違反《鎮壓共產主義條例》的證據的一切東西的許可令，對全國500多位人士的家和辦公室進行了襲擊。我在約翰內斯堡的辦公室以及莫羅卡醫生、法瑟·哈代爾斯頓和馬修斯教授的家，都遭到了搜查。

這一次襲擊為我在開普敦的最后一天投下了陰影，因為它預示著政府將開始采取新一輪的嚴厲鎮壓。至少，新一輪的禁止將會發生，而且我一定是被禁止的人之一。那天晚上，苔卡牧師和他的夫人邀請了幾個人一起為我送行，在他的帶領下，我跪在地上為那些被襲擊的家庭祈禱平安。我在我喜歡的時間即凌晨3點離開了他們的家，不到半小時后，我就行駛在了去金伯利的公路上。金伯利是一個礦業小鎮，19世紀，南非的鉆石生意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我準備在阿瑟·萊泰勒醫生家住一晚上。阿瑟后來成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財政部長，他是一位很細心的醫療工作者。我患了感冒，他把我接到他家后立即讓我上床休息。他是一個勇敢而執著的人，在反抗運動期間，他帶領一小股志愿反抗者走進了監獄。在黑人很少參與政治行動的一個小鎮上，這對于一位醫生來說是一種冒險的行動。在約翰內斯堡，一個人可以得到幾百甚至幾千同樣參與這種冒險活動的人的支持，而在像金伯利這樣的保守小鎮，沒有媒體或司法部門對警察的監督，這種行動確實需要巨大的勇氣。正是在金伯利，反抗運動期間有一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成員被地方法官處以鞭刑。

盡管我患了感冒，阿瑟仍然讓我第二天晚上在他家里舉行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會議上發表講話。我準備第二天早上3點離開金伯利，但是阿瑟夫婦堅持留我吃早飯，我只好吃完了早飯后動身。我回約翰內斯堡一路很順利，晚飯前我就回到了家中，我的孩子們高興地迎接我，他們知道我會給他們帶回禮物。我把在開普買的禮物一個一個地送給他們，并回答他們就我這次旅行提出的問題。雖然不是真正的節日，但是，它與節日具有相同的效果，我感覺又恢復了活力，準備再一次去沖鋒陷陣。

22...

我一回到約翰內斯堡，馬上向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報告了我此行的情況。他們主要考慮的是大會聯盟是否已經強大到足以制止政府的計劃，但我并沒有帶給他們好的消息。我說特蘭斯凱不是一個有良好組織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地區，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一旦能夠造成影響，它會很快被安全警察鎮壓下去。

我提出了另一個辦法，我知道這種辦法并不是一種正常的辦法。為什么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不應該參與新的班圖管理體制，并以此作為與人民群眾保持聯系的一種辦法呢？如果及時的話，這種參與將會成為宣傳我們的主張和政策的平臺。

凡是有關參與隔離體系的建議，肯定會遭到強烈的反對。開始，我也會堅決反對這樣的建議。但是，我認為，只有少數人愿意為了國家去犧牲自己而投身于斗爭之中。我們應該滿足人民自己的要求，哪怕是看起來有通敵之嫌。我的主張是，我們發起的運動應該像一個巨大的帳篷，盡可能地容納更多的人。

但是，當時由于我的報告與另外一個相關報告分歧較大，所以我就報告作了一個簡短的說明。湯姆林森考察團關于班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報告的公布引發了一場全國范圍的論戰。政府炮制的這個考察團就所謂的班圖地區或班圖斯坦（或者叫“保留地”）的發展提出的建議計劃，實際上是“獨立發展”或大種族隔離的一個藍本。

班圖斯坦體制是由土著事務部部長H. F.沃爾沃德博士策劃的。這是一種既可平息國際上對南非種族政策的批評，又能使種族隔離制度化的手段。班圖斯坦將把所有的非洲公民劃分成彼此隔離的黑人居住區或居住地。沃爾沃德說：“非洲人應該堅持在保留地上沿著自己的路線發展。”其主張是保留現狀，讓300萬白人擁有87%的土地，而800萬非洲人仍然維持只擁有13%的土地。

這個報告的中心思想是反對種族之間的結合，提倡黑人和白人彼此獨立地發展。為達此目的，該報告建議非洲人居住區實行工業化，聲稱不為非洲人在自己的居住區提供發展機會的任何計劃注定要失敗。該考察團指出，現在非洲人居住區的地點分布太零散，建議把非洲人居住區合并成7個被他們美其名曰“歷史居住地”的主要黑人部落。

但是，該考察團建議創建這種獨立的自給自足的班圖斯坦的計劃無疑是荒謬的。作為這種非洲人居住體制的示范，特蘭斯凱將按地理劃分成3個獨立的區域。斯威士班圖斯坦、利博娃和文達各由3個區域組成，加贊庫勒由4個區域組成，西斯凱由17個區域組成，博普塔茨瓦納由19個區域組成，科瓦祖魯由29個區域組成。國民黨人打算拿人民的生活玩野蠻的七巧板游戲。

政府炮制黑人居住體制的目的是把特蘭斯凱和其他非洲人居住區作為白人工業廉價勞力的供應地。同時，政府的潛在目的是制造一個非洲中產階級來堵住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呼聲，從而破壞解放斗爭。

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譴責了湯姆林森考察團的考察報告，盡管這個報告中有一些更開明的建議。正如我告訴達利旺伽的那樣，獨立發展對于白人不知如何管控的問題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解決辦法。結果，政府批準了這個報告，而否決了許多他們認為太激進的建議。

盡管形勢越來越黑暗，我對政府政策的悲觀情緒也越來越大，但是，我仍然構想著未來。1956年2月，我回到了特蘭斯凱，想在烏姆塔塔買一塊土地。我總認為，一個男子漢應該在他出生的地方擁有一個家，可以在那里逃避喧囂找到安寧。

我與瓦爾特一起北下特蘭斯凱。我們首先到了烏姆塔塔和德班，在那里見到了許多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我們對特別分部的政策再一次感到失望。為提高該地區的積極性，我們在德班拜訪了納塔爾印度人大會的朋友。

在瓦爾特的幫助下，我在烏姆塔塔向C. K.薩克韋預付了定金，算是買下了他在市內擁有的一塊土地。薩克韋是棒哈組織的成員，他當時在土著事務局工作。我們在烏姆塔塔的時候，薩克韋告訴了我們一件不幸的事，這件事上個禮拜天剛剛發生在薩巴塔的一個地方——巴姆博哈尼。在政府官員和酋長們共同舉行會議討論實行班圖斯坦制的時候，有幾位酋長反對政府的政策，對地方長官進行了語言攻擊，會議因此不歡而散。這件事讓我們知道，基層對班圖管理體制方案是持反對態度的。

1956年3月，經過幾個月的相對自由之后，我遭到了第三次禁止。這次禁止讓我在約翰內斯堡受禁5年，受禁期間，不準我參加任何會議。此后6個月中，我將被隔離在同一個區域內，看同樣的街道、同樣的金礦和同樣的天空。我將不得不依靠報紙和別人的報告去了解約翰內斯堡外面發生的事情，別的任何東西我都不能指望。

但是，這次我對待禁止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當我第一次被禁止的時候，我遵守了迫害者的規定，而現在我對這些限制卻不屑一顧。我不想讓我的敵人左右我的斗爭范圍和政治活動范圍。聽任敵人的擺布就是一種失敗，我決不會畫地為牢。

不久，我在約翰內斯堡卷入一場棘手的政治糾紛的調解中。這場糾紛涉及相互對立的兩派勢力，雙方都謀求得到我的支持。雙方在這個特定的組織內都有委屈，兩派都很不愿接受調解。這場爭論有發展成一場內戰的危險，我竭盡全力避免了這次分裂。

我當然想談談我在拳擊和舉重俱樂部的事情，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在唐納森奧蘭多社團中心參加訓練。

我于1950年加入這個俱樂部，如果沒有其他事情，我幾乎天天在該社團中心活動。前幾年，我總是帶著我兒子泰姆比去參加訓練。到1956年，泰姆比已經10歲，他也很喜歡拳擊。該俱樂部是由約翰尼斯·摩洛茨創辦的，其會員既有專業拳擊手也有業余拳擊手，另外還有許多愛好舉重的人士。我們的拳擊明星杰瑞（猶茵伽）·摩勞伊后來成為德蘭士瓦輕量級冠軍，并獲得了全國第一種子選手的稱號。

運動館的設備很差。我們沒有錢建拳擊臺，只好在水泥地上訓練，當拳手被擊倒的時候，這往往是很危險的。我們只有一個吊袋和幾副拳擊手套。我們沒有藥物和梨球，沒有拳擊短褲和拳擊鞋，也沒有護齒。盡管缺少設備，但是這個運動館卻培養出了許多冠軍，如南非最輕量級拳擊冠軍埃里克（布萊克·莫鐵羅爾）·恩彩樂，德蘭士瓦蠅量級冠軍弗雷迪耶（托冒豪克）·恩基迪——他曾經在“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給我當過助理。我們大概總共有二三十名會員。

盡管我在福特黑爾大學也參加過拳擊訓練，但是直到來約翰內斯堡后，我才真正對這項運動產生了興趣。作為拳擊手，我從來沒有成名過。體格上我屬于重量級拳擊手，但是我既沒有足夠的力量彌補我速度上的不足，也沒有足夠的速度平衡我力量上的欠缺。我喜歡拳擊運動的技巧，但卻不怎么喜歡拳擊運動的暴力。我感興趣的是一個人如何通過移動自己的身體來保護自己，如何運用戰術既出擊又退卻，如何在比賽中保持正確的步法。拳擊運動主張人人平等。在拳擊臺上，身份、年齡、膚色和貧窮都沒有什么關系。當你正在拳擊臺上與對手搏擊并試探他的力量和弱點的時候，往往不會考慮他們的膚色或社會地位。自從涉足政治后，我再也沒有參加過真正的拳擊運動。我的主要興趣是參加訓練。因為我發現，嚴格地進行拳擊練習是消除緊張和壓力的最好方式。認真練習過后，我感覺頭腦和身體都輕松了許多。拳擊練習是我恢復精力和體力的一種方式，經過一晚上的練習，第二天早上起來我感覺精力和體力都十分充沛，隨時準備再去戰斗。

從禮拜一到禮拜四，我每晚花一個半小時健身。下班后我會直接回家，然后帶上泰姆比一同驅車去社團中心。我們做一個小時的拳擊訓練和其他綜合性練習，如長跑、跳繩、健身運動或空拳練習，再做15分鐘的體能練習和舉重練習，然后就進行拳擊練習。如果我們為了參加比賽而進行練習，那么練習時間將延長到兩個半小時。

為了培養領導能力、積極性和自信心，我們每人輪流領導練習活動。泰姆比特別喜歡擔任這種領導角色。每當我兒子擔任領導角色的時候，事情往往多多少少地讓我有些狼狽，因為他專門對我吹毛求疵。不管什么時候，只要我一有懈怠，他很快就會懲罰我。在運動館內，大家都叫我“酋長”，而他卻不使用這個尊稱，而叫我“曼德拉先生”，偶爾當他同情他的老爸的時候，他會叫我“老兄”，這種稱呼是鎮上的一句土語，意思是“我的兄弟”。當看見我四處游蕩的時候，他會嚴肅地說：“曼德拉先生，今天晚上你在浪費我們的時間，如果你不加油，為什么你不在家陪伴老太太？”有這些笑料，大家都非常開心，看到我兒子如此高興和自信，我也非常高興。

由于那年斯基珀·摩勞茨與杰瑞·摩勞伊之間發生矛盾，俱樂部的友好氣氛遭到了破壞。杰瑞和其他拳擊手認為，斯基珀對俱樂部沒有足夠重視。斯基珀是一個技術水平很高的教練員，但是他很少到現場傳授相關的知識。他對拳擊運動的歷史很有研究，能夠完整敘述1915年在哈瓦那舉行的杰克·約翰遜參賽的那場著名拳擊賽的全部26輪過程。在那場拳擊賽中，世界上第一位黑人重量級冠軍丟掉了他的頭銜。不過，斯基珀只有在拳擊賽舉行之前才愿意露面，露面的目的是收取小費。我同意杰瑞的觀點，但是，為了保持和睦，我盡力彌合他們之間的糾紛。最后，就連我兒子也贊成杰瑞對斯基珀的批評，但我沒有辦法避免這次分裂。

在杰瑞的領導下，拳擊手們威脅要退出俱樂部，他們要成立自己的俱樂部。我把所有的成員召集起來開了個會。這個會開得很活躍，同時采用塞索托語、祖魯語、科薩語和英語進行交流。在攻擊反對他的拳擊手時，斯基珀甚至引用了莎士比亞的話，指責杰瑞如同布魯特斯背叛愷撒一樣欺騙他。我兒子問：“愷撒和布魯特斯是誰？”在我回答他的提問之前，有人說：“啊，他們死了，但是背叛的事實卻在延續著！”

會上什么問題也沒有解決，拳擊手們離開后去了別的運動場所，只有舉重運動員仍然留在了社團中心。在我與拳擊手們一起離開社團中心后的前幾周里，我們在警察運動館內練習，那里對自由戰士來說是個讓人很不舒服的地方。此后，英國國教教堂許諾以合理的租金在奧蘭多東給我們提供一個練習場所，我們在西蒙（木神古）·薩巴拉拉的帶領下進行練習。西蒙后來成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名地下自由戰士。

我們的新練習場設施并不比原來的練習場好，而俱樂部再也沒有能夠重新組成。像其他黑人運動員和藝術人員一樣，非洲拳擊手也受到貧窮和種族歧視這兩方面的限制。一個非洲拳擊手所能掙的錢僅僅夠吃飯、租房和買衣服，如果能剩下一點，就被用來購置拳擊器械和用于拳擊練習。他無法得到加入白人拳擊俱樂部的機會，白人俱樂部擁有培養一流的、世界級拳擊手所必須具備的設備和教練員。與白人專業拳擊手不同，非洲專業拳擊手白天需要全天干苦力勞動。陪練員很少，而且賺錢也不多。他們沒有正規的練習機會和實戰機會，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成績。但是，一些非洲拳擊手卻能夠克服這些困難，并取得偉大的成就。像艾利伽（梅斯特勞）·莫考尼、艾諾奇（斯古寶艾）·恩拉珀、堪格魯·冒托（他是拳擊運動圈內自成一派的最偉大的拳擊手）、萊衛（金童）·馬迪、恩考撒納·穆格基、馬基德·莫佛和諾曼·賽伽帕尼，他們都獲得過很大的成功。而佳克·吐力這位最偉大的拳擊英雄，則獲得過英國皇家蠅量級冠軍。這都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說明如果給予機會，非洲的拳擊手同樣能夠獲得成功。

# 第五部 叛國罪

23...

1956年12月5日，天剛蒙蒙亮，我就被一陣咚咚的敲門聲驚醒，從來沒有鄰居或朋友如此蠻橫地敲過門，我立即意識到這是安全警察。我很快穿上衣服去開門，發現是巡警隊隊長盧梭在敲門，他是我們這個地區大家都熟悉的安全警官。另外還有兩個警察。他出示了搜捕證，然后三人立即開始仔細搜查了整個房子，以尋找犯罪文件和資料。這時，孩子們被驚醒了，我用嚴肅的面孔讓他們保持安靜。孩子們看著我，想從我身上獲得安全感。警察搜查了抽屜、櫥柜和衣櫥，搜遍了任何可能藏匿非法物品的地方。45分鐘之后，盧梭冷冷地說：“曼德拉，我們對你依法實施逮捕，請跟我走一趟。”我看了一眼逮捕證，上面寫著：“HOOGVERRAAD——高級叛國罪”。

我跟著他們走到一輛警車前。當著孩子們的面被逮捕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情，即使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但是孩子們不可能理解當時的復雜情況，他們只知道，他們的父親被白人警察不作任何解釋就抓走了。

盧梭開著車，我挨著他坐在前面的座位上，他沒有給我戴手銬。他有搜查我市內辦公室的搜查證，就近放下那兩位警察后，我們直奔我的辦公室。要進入約翰內斯堡市區，必須經過一段沒有人煙的荒涼公路。當我們行駛在這段路上的時候，我對盧梭說，你單獨一個人同我一起，并且不給我戴手銬，你一定對我很放心。他沒有吭聲。

“如果我反抗并把你制服，那將發生什么事情？”我問他。

盧梭不高興地轉過身來。“曼德拉，你在玩火！”他說。

“玩火是我的一種游戲。”我回答說。

“如果你這樣說話，我就把你銬起來。”盧梭用威脅的口氣說。

“如果我拒絕戴手銬呢？”

我們繼續這樣爭辯了幾分鐘，當進入蘭拉格特警察局的時候，盧梭對我說：“曼德拉，我對你不錯，我希望你也能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我。我不喜歡你開這種玩笑。”

在警察局停了一會兒，另一個警察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然后我們一起去我的辦公室。他們在我的辦公室里又搜查了45分鐘。我被從我的辦公室帶到紅磚結構的約翰內斯堡監獄——馬歇爾廣場，1952年反抗運動期間我曾經在這里蹲過幾天。我的幾個同事已經被關押在這里，他們是同一天早晨遭到逮捕并被關進來的。幾個小時之后，有更多的朋友和同志被關了進來。這是政府早有預謀的一次突然襲擊。有人偷偷帶進來一份下午版的《星報》（The Star），我們從通欄大字標題得知，這次襲擊是全國性的，大會聯盟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以高級叛國罪和陰謀推翻政府罪被逮捕的。在各個地區被捕的有魯圖利酋長、蒙蒂·奈克、雷基·賽普泰姆波、莉蓮·恩高義、皮特·貝萊威爾德，他們被用飛機運送到約翰內斯堡，并將在這里接受審訊。當天，共有144人被逮捕。第二天，我們出現在法庭上并被正式起訴。一周后，瓦爾特·西蘇陸和其他11名同志也陸續被捕，被捕人數上升到156人。總共有105名非洲人、21名印度人、23名白人和7名有色人。幾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所有主要領導人，不論是被禁止的還是沒有被禁止的，統統遭到了逮捕。政府最終還是采取了行動。

我們很快被轉移到約翰內斯堡的一座監獄，大家通常把這座監獄叫做福特監獄。它位于約翰內斯堡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上，是一座凄涼的城堡式建筑。被關進監獄后，我們立即被帶到一個四方形院子內，并被命令扒光衣服面墻而站。我們被強迫在那里站了一個多小時，在寒風中瑟瑟發抖，感覺十分痛苦。我們大多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其中有牧師、教授、醫生、律師和商人，理應受到尊重。盡管我十分氣憤，但仍然禁不住看著周圍這些人發笑。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人靠衣裳馬靠鞍”這句俗語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如果體格是做領導的基本條件，我看我們幾乎沒有一個人符合條件。

一個白人醫生最后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問我們中有沒有人患病。我們沒有一個人說生病。我們被命令穿上衣服，然后被押送進兩個大房子。里面是水泥地面，沒有任何家具。兩個大房間剛剛被粉刷過，仍然散發著油漆味。我們每人發了三條薄毯子，外加一張劍麻席。每個房間有一個毫無遮掩的公用廁所。有人說過，只有進了監獄才能真正了解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不應從它如何對待其高級公民來判斷其好壞，而應當從它如何對待其最底層的人來判斷其優劣。南非政府對待其非洲犯人就像對待動物一樣。

我們在福特監獄待了兩周，盡管很苦，但我們的情緒仍然特別高。我們被允許看報紙，通過報紙高興地獲知，我們的被捕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浪潮。南非到處都在舉行抗議集會和游行示威，標語上寫著“我們支持我們的領袖”。我們還了解到，我們的被捕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抗議。

我們的公共牢房成了各地自由戰士的集會地。我們中的許多人一直在嚴厲的禁令下生活，相互見面和交談都是非法的。現在，我們的敵人卻把我們集中到了一個房頂之下，監獄儼然成為多年來會議聯盟最大、最長的不受禁止的一個會場。年輕的領導人與年長的領導人以前只是從報紙上彼此了解，但現在卻生活在了一起。納塔爾的領導人與德蘭士瓦的領導人住在了一起。在等待審判的兩周時間內，我們有機會交流思想和經驗。

每天，我們湊在一起搞活動。帕特里克·莫勞和皮特·恩泰特都是著名的青年團領袖，他們負責組織體育訓練。另外，我們還安排了各種專題講座，我們可以聽馬修斯教授講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史和美國黑人史，聽德比·辛格講南非印度人大會史，聽阿瑟·萊泰勒講非洲巫醫，聽詹姆斯·卡萊塔講非洲音樂，他還用他那美妙動聽的男高音嗓子為大家唱歌。烏伊西勒·米尼則每天帶領大家一起唱自由歌曲。幾年后，烏伊西勒因政治罪被政府判處了絞刑。他帶領大家唱的最流行的歌曲是“Nans’ indod’ emnyama Strijdom, Bhasobha nans’ indod’ emnyama Strijdom”（這里是黑人，斯揣敦，當心黑人，斯揣敦）。我們高聲歌唱，保持著高昂的斗志。

有一次，馬薩巴萊拉·英瓦（都叫他M. B.英瓦）——他是祖魯勞動人民的兒子，也是納塔爾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省級書記——為大家舉辦了一個音樂講座。他朗誦了贊揚傳奇的祖魯勇士、國王沙卡（Shaka）的贊美歌曲。英瓦身披一床毯子，卷起一份報紙當寶劍，然后開始來回走動著朗誦贊美詩的歌詞。我們都聽得入了迷，即使那些不懂祖魯語的人也不例外。然后，他突然停止朗誦，大聲喊著：“Inyon’ edl’ ezinye! Yath’ isadl’ ezinye, yadl’ ezinye!”這句歌詞把沙卡比作捕食的大鳥，毫不留情地把敵人殺死。朗誦結束時，立即爆發了一陣歡呼聲。魯圖利酋長之前一直保持沉默，而這時他卻站起來怒吼一聲“Ngu Shaka lowo!”（這就是沙卡！）然后他開始邊跳邊唱。他的舉動激發了我們的熱情，我們都站了起來，不論舞場高手還是既不會跳傳統舞又不會跳西式舞的懶漢，都跳起了傳統祖魯戰爭舞“印德拉姆”（indlamu）。有的跳著優雅的舞步，有的模仿凍壞了的山地人試圖擺脫寒冷，大家都跳得熱情而投入。一時間，沒有了科薩人或祖魯人之分，沒有了印度人或非洲人之分，沒有了右派和左派之分，沒有了宗教領袖和政治領袖之分，我們都是一家人，都是愛國者，一種對我們的共同歷史、對我們的文化、對我們的國家和對我們人民的愛把我們團結在了一起。此時此刻，我們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強烈而親密的激情，它把我們緊緊地聯系起來；此時此刻，我們感覺到有一只造就我們本來面目的偉大的歷史之手，巨大的力量把我們同偉大的事業聯系在了一起。

兩周后，即12月19日，我們將被押到約翰內斯堡的軍訓大廳進行預審。軍訓大廳是一個軍用建筑物，一般不會被用作法庭。房頂是用鐵皮瓦做成的，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牲口棚，當時它被認為是唯一能容納下如此多起訴對象的公共建筑。

我們坐在封閉的警車里，另外有六輛裝滿武裝士兵的軍車押送。政府對我們如此戒備，好像發生了全面內戰。我們的支持者阻斷了特威斯特大街的交通，我們在車內能聽見他們的喊聲和歌唱聲，他們也能聽見我們在車內對他們的回應。群眾簇擁著警車慢慢地行駛，使這次押送變成了一次成功的大游行。軍訓大廳周圍全是荷槍實彈的警察和士兵。警車開到軍訓大廳后面停了下來，這樣就可以直接把我們從警車押進審判庭。

在審判庭內，我們遇見了另一群支持者。所以，審判庭與其說是一個莊嚴的法庭，倒不如說是一個熱鬧的抗議大會會場。我們一邊伸著大拇指行著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禮走進審判庭，一邊向坐在非白人席上的支持者點頭致意。里面的氣氛不像是審判大會，倒像是慶祝大會，因為被起訴者與其支持者和朋友混合交融在了一起。

政府正在以高級叛國罪、全國性陰謀使用武力推翻現政府并企圖用共產主義政府取代現政府罪對我們156人提起公訴。根據起訴，我們的犯罪期是從1952年10月1日至1956年12月13日，其中包括反抗運動、索菲亞頓搬遷和人民大會等事件。南非高級叛國罪并不是根據英國現行法律，而是以傳統的羅馬－荷蘭法為準繩。高級叛國罪被定義為故意擾亂、傷害或危害國家的獨立或安全，其量刑標準是死刑。

預審的目的是確定政府的指控是否足以將我們送上最高法庭，其中有兩個舉證階段是在地方法庭進行。如果地方法官認定有足夠的證據證實被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子將被移交到最高法庭進行審判。如果地方法官認定證據不足，被告則將被撤銷指控。

地方法官是F. C.韋賽爾先生，他是布隆方丹的審判長。第一天，韋賽爾說話的聲音太小了，我們無法聽清他到底說的是什么。政府沒有準備麥克風和喇叭，預審被推遲了兩個小時以便找到擴音設備。我們被集中在院子內就餐，很像是在搞野炊，食品都是從外面送來的，氣氛幾乎像是在過節。兩小時后，法官宣布休庭一天，因為沒找到合適的喇叭。在群眾的歡呼聲中，我們又被押送回福特監獄。

第二天，外面的群眾更多，警察也更多了，有500名武裝警察圍在軍訓大廳外面。我們到達軍訓大廳的時候發現，政府為我們設立了囚籠。囚籠是用菱形鋼絲網制成的，被固定在立柱上，前面和頂部裝了鐵格子板。我們被帶進囚籠內坐在板凳上，囚籠外有16名武裝軍警守衛著。

除了其象征效果之外，囚籠把我們同我們的律師隔離開，并且不允許他們進入囚籠。我們的一位同事在一個紙條上寫道：“危險，請不要喂食。”并把紙條貼在囚籠的側面。

我們的支持者組織集合了龐大的辯護隊伍，其中包括布拉姆·費希爾、諾曼·羅森伯、伊斯雷爾·梅賽爾斯、莫里斯·弗蘭克斯和弗農·貝瑞奇。他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審判陣勢。弗蘭克斯公開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反對政府給予他的委托人這樣“荒謬”的待遇。他說：“像對待動物一樣。”他聲明，如不立即把囚籠拆除，整個辯護律師隊伍將離開法庭。經過短暫的休庭之后，地方法官決定把囚籠拆掉，同時，囚籠前的鐵格子板也被拆除。

直到這時，政府才開始對我們進行預審。首席檢察官范·尼克先生開始宣讀長達18000字的起訴書，指控我們違反了刑法。由于法庭外面的呼喊聲和歌聲，即使是使用了擴音設備也無法聽清他的起訴。一伙警察忽然沖了出去，隨之聽見了連發左輪手槍的射擊聲，緊接著是呼叫聲，然后又是一陣槍聲。法官宣布休庭，并與辯護律師一起召開了會議，共有20人在這次沖突中受傷。

宣讀起訴書用了兩天的時間，范·尼克說，借助于其他國家的幫助，他將向法庭證明被起訴者正在謀劃用暴力推翻現政府，并把一個共產主義政府強加給南非。起訴書認定我們犯了高級叛國罪。政府引用了《自由憲章》作為我們搞共產主義政府的證明，同時也作為我們策劃推翻現政府的物證。到了第三天，多數囚籠都已經被拆除。第四天，我們被允許申請保釋。保釋金又是一個種族歧視的例子，白人保釋需要繳250英鎊，印度人則需要繳100英鎊，非洲人和有色人卻只需要繳25英鎊。連叛國也有膚色之分。各行各業的好心人主動站出來為我們保釋。這種支持后來成為里夫斯大主教、艾倫·佩頓和亞歷克斯·赫普爾發起的叛國審判辯護基金會的基礎。這批基金在馬麗·本森及其以后的弗雷達·萊弗森審判期間派上了用場。如果我們每周向警察報告一次，我們就可以被釋放，但被釋放后不準出席公共集會。法庭將于1月初重新開庭。

第二天，我們一早來到我的辦公室。由于奧利佛和我都一直在監獄里，事務所積累下了許多案子。那天上午正當我們準備工作的時候，一位名叫佳巴福的老朋友來拜訪我，佳巴福是一個專業翻譯，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見到他了。在被捕前，我故意減輕體重，準備監禁生活的到來，在監獄中瘦一點好，可以在艱苦的條件下存活下去。在監獄中，我仍然繼續進行訓練，并且為有如此修長的身材感到高興。但是，佳巴福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馬迪巴，”他說，“你為什么看上去這么瘦？”按照非洲文化，肥胖常常是富有和健康的表現。他脫口而出：“老兄，說到底你是害怕坐監獄。你給我們丟了臉，給我們科薩人丟了臉。”

24...

甚至在審判前，我同艾韋琳的婚姻就已經出現了裂痕。1953年，艾韋琳決心在4年護理專業學歷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深造，她考上了德班愛德華七世醫院的產科專業，這使她必須離家幾個月。因為我母親和妹妹都與我們一起生活，她們可以照料孩子，所以，她離家深造倒是并無大礙。她住在德班的時候，我至少去看過她一次。

幾個月后艾韋琳回來了，并且通過了結業考試。這時，她又懷孕了，那年年底生下了馬卡紫薇，這是6年前夭折的前一個女兒的名字。按照我們的傳統，給新生小孩起一個已經夭折的小孩的名字被認為是對已故孩子的紀念，以此對來到這個世界不久就匆匆離去的孩子寄予哀思。

第二年，艾韋琳加入了“瞭望塔”組織，它是“耶和華見證人”教會的一個分支。這是否是她當時對其生活不滿的原因，我無法知道。耶和華見證人教會以《圣經》作為唯一信仰依據，相信哈米吉多頓善惡大決戰即將來臨。艾韋琳開始熱心地分發她們的出版物《瞭望塔》，也開始做我的工作，催促我從獻身于自由斗爭轉為獻身于上帝。盡管我對瞭望塔組織有些興趣并認為值得信仰，但是，我不能也沒有加入她所信仰的瞭望塔組織。它有一種強迫觀念使我對該組織敬而遠之。從我所觀察到的情況可以知道，她的信仰是讓大家在壓迫面前保持無所作為和屈從，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始終如一地獻身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自由斗爭，這讓艾韋琳很煩惱。她總認為搞政治是幼稚的，我總有一天會回到特蘭斯凱，并在那里當律師。隨著這種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她堅決不同意把約翰內斯堡當做我們的家，或者說她決不放棄我們回烏姆塔塔的想法。她認為，我一旦回到家鄉特蘭斯凱，給薩巴塔當參事，我就不會再迷戀政治。她讓達利旺伽設法把我勸回烏姆塔塔。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發生過許多次爭吵，我耐心地向她解釋：政治并不是我的一種娛樂，而是我畢生從事的事業，是我生命的必需的、基本的部分。她對此不能接受。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如果對他們的人生憧憬有著這樣不同的看法，那是無法保持親近的。

我試圖說服她理解自由斗爭的必要性，而她則企圖說服我相信宗教信仰的價值。當我告訴她我是在為國家服務的時候，她卻說，為上帝服務高于為國家服務。我們發現越來越沒有共同的理想，我相信這個婚姻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下去了。

同時，我們也為孩子的信仰發生過爭執。她要孩子們信仰宗教，而我則認為他們應該關心政治。她一有機會就帶著他們去聽瞭望塔組織的宗教演講，她甚至讓孩子們在城內散發宗教宣傳冊《瞭望塔》，而我則習慣于給兩個男孩講政治。泰姆比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少年先鋒隊隊員，因此，他已經是一個有政治見解的少年。他會用最簡單的語言給馬卡托講白人如何迫害黑人的故事。

我家里的墻上懸掛著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甘地的畫像和描繪1917年圣彼得堡冬宮革命風暴的圖畫。我給兩個男孩一個一個地講這些人是什么人，這些人主張什么。他們知道，南非白人政府領導人的主張與這些白人的主張是完全不同的。有一天，馬卡托跑進房內說：“爸爸，爸爸，山上有馬倫！”馬倫一直是國民黨的總理，孩子錯把班圖教育官員威利·麥瑞當成了馬倫。威利·麥瑞宣布，那天他將在索菲亞頓公共大會上發表講話。我想出去看看馬卡托講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因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已經組織了游行示威，確保讓他們的大會開不成。當我走出家門的時候，我看見有幾輛警車正護送麥瑞去他準備發表演講的地方。但是，會議從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麥瑞不得不逃之夭夭，當然也沒有發表講話。我告訴馬卡托，那不是馬倫，但他也有可能已經變成了馬倫。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工作日程總是排得滿滿的。我每天早晨總是很早就離開家，一直到深夜才回來。在辦公室里工作一整天后，我通常總是有這樣那樣的會議需要參加。艾韋琳對我晚上開會也不能理解，當我回來晚了的時候，她總是懷疑我去找別的女人。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她解釋，我參加的是什么會，我為什么要去參加會議，以及會上討論的是什么事。但是，她總是不相信。1955年，她對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必須在她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作出選擇。

瓦爾特和阿爾博提娜與艾韋琳關系很近，他們對我們最殷切的希望是我們仍然在一起。艾韋琳對阿爾博提娜很信任。有時瓦爾特出面干預此事，我粗暴地告訴他，這不關他的事。我為自己對他的粗暴態度而感到內疚，因為瓦爾特一直都像是我的兄弟一樣，他的友情和支持是絕不容置疑的。

有一天，瓦爾特告訴我，他想帶一個人來辦公室與我見面。他沒有告訴我那是我的一個連襟，看到他我感覺非常突然，但很高興。我對自己的婚姻感到悲觀，我認為把自己的感情告訴他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三個人一起誠懇地討論了這次糾紛，討論時瓦爾特引用了像“人以群分”之類的成語。艾韋琳的姐夫是個商人，一直反對政治和從事政治的人。他非常生氣，說：“如果你們認為你們與我的地位相同，那就是可笑的。不要拿你們同我相提并論。”當他離去的時候，瓦爾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然后開始笑了起來。

在我們12月份被逮捕并在監獄內待了兩周后，艾韋琳來探望了我一次。但是，當我被保釋的時候，我發現她已經從家中搬走，并把孩子也帶走了。我回到了空空的、靜靜的家中，發現她甚至把門簾也帶走了，這使我有些心煩意亂。一天，她與她哥哥突然走了進來，她哥哥對我說：“這可能是最好的辦法，當事情冷下來后，你們將會再一起回到這個家中。”這是一種理性的規勸，但是，事與愿違。

艾韋琳和我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分歧。我不會放棄我的斗爭生涯，而她也不會接受我不專心傾注于她和家庭而獻身于別的事情。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她漂亮、體格健壯且忠誠可靠，并且是一個好母親。我對她的尊敬和愛慕從未消退，但是，我們最終沒能維持住我們的婚姻。

任何婚姻破裂都是一種傷害，特別是對孩子。我們的家庭也不例外，所有的孩子都由于我們的離異而受到了巨大的傷害。馬卡托開始睡在我的床上。他是一個很懂事的孩子，也是一個天真的和事佬，一直設法在我和他媽媽之間進行某種調解。馬卡紫薇還很小，我記得有一天，當時我還沒有被捕入獄并被送上法庭，我沒有提前告訴她就去托兒所看她。她一直是一個情感熱烈的孩子，但是那天她見到我的時候，卻愣在那里。她不知道是該沖著我跑過來還是退縮，是該歡笑還是不滿。在她幼小的心靈里有一種矛盾，她不知道如何去解決這種沖突，這令人十分傷心。

泰姆比當時已經10歲，我們的離異對他的傷害最大。他不再喜歡讀書，變得沉默寡言。他曾經一直喜歡英語和莎士比亞，但是我們離婚后，他似乎對學習失去了興趣。有一次，他的校長對我說起此事，但是我無計可施。我帶他到我能去的體育館，他偶爾也會顯得有些開心。有許多次，當我不能去接他或者很晚才去接他的時候，當我轉入地下活動的時候，瓦爾特讓泰姆比和他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有一次，瓦爾特帶他去看了一場拳擊比賽，后來瓦爾特對我說：“老兄，小家伙太安靜。”我們離婚后，泰姆比常常穿我的衣服，雖然他穿起來顯得太大，但是，這些衣服可以帶給他某種對經常不在身邊的父親的感情。

25...

1957年1月9日，我們又一次被集中在軍訓大廳。當時，辯護律師開始反駁政府對我們的指控。對指控我們所犯的刑事案件進行了一次總結后，我們的主辯護律師弗農·貝瑞奇談了我方的辯護意見。“辯護方，”他說，“將堅決反對《自由憲章》的條款是叛國和刑事犯罪的指控。相反，辯護方將主張該憲章所表達的思想和信仰，雖然與現政府的政策不一致，但是，恰恰是人類各種族絕大多數人都贊成的，也是這個國家絕大多數公民都贊成的。”經過與我們的辯護律師商議，我們決定，不僅要證明我們未犯叛國罪，而且要證明這是一次政治審判，在這次審判中，政府因為我們所采取的正義的行動而對我們實施迫害。

但是，開始辯護要經歷一系列單調、冗長的法庭程序。開庭后的第一個月，幾乎全部被政府一系列的舉證所占用。一個證據接一個證據，每一份資料、每一種宣傳冊子、每一份文件、每一本書、每一個筆記本、每一封信、每一本雜志，以及警察在過去三年中所積累的每一份研究資料，都被一一出示，總數達12000份。取證范圍大到美國的《人權宣言》，小到俄國的一本烹調書，他們甚至把人民大會的兩個標記“肉湯”和“素湯”也當做證據提交了出來。

在接連數日的預審期間，我們一天又一天地聽非洲黑人偵探和南非白人偵探宣讀他們關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會議記錄和演講稿。這些東西大多都被作了篡改，往往不是荒誕不經就是徹頭徹尾的假話。貝瑞奇通過巧妙的質問，揭露了許多非洲人偵探對發表這些講話所用的英語一竅不通。

為了支持政府關于我們希望用蘇聯式的政府取代現政府的指控，他們企圖利用開普敦大學政治系系主任安德魯·默里教授的證據。默里把從我們那里拿到的許多文件都加上了共產主義標簽，其中包括《自由憲章》。

一開始，默里教授似乎知識很淵博，但當貝瑞奇開始對他盤問的時候，他的知識就顯得不再那么淵博了。貝瑞奇說他想在提供的各種文件中選幾段讀給默里聽聽，然后請默里辨別，這些話是否是共產主義的言論。貝瑞奇給他讀的第一段是關于普通工人需要相互合作但不相互剝削的話。默里說是共產主義的言論。然后貝瑞奇說，這段話是南非前總理馬倫博士說的。貝瑞奇然后又給他讀了兩段話，默里都說是共產主義的言論，而這兩段話事實上是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和伍德羅·威爾遜說的。最精彩的是當貝瑞奇給默里讀了一段話之后，這位教授毫不猶豫地一聳肩說是共產主義的言論。然后貝瑞奇揭曉，那是默里教授本人在20世紀30年代寫的一段話。

審判進行了7個月后，政府聲稱將提供我們在反抗運動期間策劃暴力事件的證據。政府找來了他們的明星級證人所羅門·恩古貝斯，他提供了關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近乎聳人聽聞的證言。恩古貝斯快40歲了，說話很溫柔，但說的英語卻不怎么流利，他正在因欺詐罪服刑。但在恩古貝斯的證言中他告訴法庭，他從福特黑爾大學獲得了文學士學位，是一位律師。他說自己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伊麗莎白港的書記，也是全國執行委員會的一名成員。他聲稱參加了一個全國執行委員會召開的會議，會上作出過一個決議，派瓦爾特·西蘇陸和大衛·博帕佩去蘇聯采購武器，以便準備在南非開展暴力革命。他說他參加了策劃1952年伊麗莎白港暴亂的會議，他聲稱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作出決定，要采用肯尼亞的摩摩（Mau Mau）大屠殺的方式把特蘭斯凱的白人斬盡殺絕。恩古貝斯富有戲劇色彩的證詞在法庭內外引起了轟動，并最終成為我們謀劃叛國的證據。

但是，當弗農·貝瑞奇對恩古貝斯進行盤問的時候，他的狂人說狂話的嘴臉便暴露無遺了。貝瑞奇的盤問技巧在他的委托人中間為他贏得了驅邪除怪大師的稱號。他很快證實，恩古貝斯既不是一個大學生，也不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更不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貝瑞奇提供的證據證明，恩古貝斯偽造大學學士證書，非法從事律師職業達數年之久，他又一次犯了欺詐罪。他聲稱參加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會議策劃伊麗莎白港暴亂的時候，其實他正因欺詐罪在德班監獄服刑。恩古貝斯的證言遠非事實，在盤問結束的時候，貝瑞奇問這位證人：“你知道什么是無賴嗎？”恩古貝斯說不知道。貝瑞奇告訴他：“先生，你就是一個無賴！”

喬·斯洛沃是被起訴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高級辯護律師，因此可以為自己作辯護。這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因為，他提的問題十分尖銳，并試圖揭露違反法律的是政府，而不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與貝瑞奇的盤問一樣，斯洛沃的盤問也非常精彩。杰里邁亞·莫爾森是特警中為數不多的黑人偵探之一，他聲稱親自逐字逐句地從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演講中聽到了一些言論。但是，他的證詞同樣也是胡言亂語或者說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斯洛沃：“你懂英語嗎？”

莫爾森：“不怎么懂。”

斯洛沃：“你的意思是，你舉報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用英語發表的講話，但你又不怎么懂英語？”

莫爾森：“是的，閣下。”

斯洛沃：“你承認不承認你的證詞中有許多廢話？”

莫爾森：“我不知道。”

他最后的回答引起了哄堂大笑。地方法官對我們的大笑提出了責備，并說：“法律程序并沒有什么好笑的。”

這時，韋賽爾告訴斯洛沃，他是在破壞法庭的嚴正性，并要以藐視法庭論處。他的話引起了多數被起訴人的憤怒。只有魯圖利保持著克制，這才使幾個被告沒被指責為藐視法庭。

隨著舉證的進行，我們開始干一些別的事情。因為多數舉證都是單調乏味的法律游戲。我常常隨身帶著一本書或案情摘要，其他人有的看報，有的玩填字游戲，有的下棋，有的亂涂亂畫。有時法官會訓斥我們不專心，大家會立即把書和填字游戲藏起來。但是，隨著舉證又慢了下來，大家又開始玩游戲的玩游戲、看資料的看資料。隨著預審的進行，政府越來越感到失望。越來越明顯，政府正在搜集證據。不！應該說是正在捏造證據，以挽救這場似乎已成定勢的敗局。

最后，在9月11日，也就是在我們被集中在軍訓大廳10個月后，起訴檢察官宣布預審已經完成。地方法官給辯護律師4個月的時間，以便對8000頁證詞和12000份文件進行仔細審查，做好辯護的準備。

預審持續了1957年一整年。法庭于9月份休庭，辯護律師開始審查證詞。3個月后，沒有通告，沒有解釋，刑事庭突然宣布被告中的61人被免予起訴。這些被告多數都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中職位相對比較低的人，不過魯圖利酋長和奧利佛·塔博也在其中。刑事庭釋放了魯圖利和塔博使我們很高興，也讓我們迷惑不解。

1958年1月，政府準備進行起訴。刑事庭請來了一位新的起訴檢察官，他就是令人生畏的奧斯瓦德·皮洛。奧斯瓦德是前司法部部長，也是國民黨的政治頂梁柱。他是南非白人中的老牌國民黨員，也是德國納粹的公開支持者。他曾經把希特勒描繪成“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他還是著名的反共產主義分子。任命皮洛擔任起訴檢察官又一次證明了政府對審判結局的顧慮和重視。

在皮洛起訴前，貝瑞奇宣布，既然政府拿不出足夠的證據，他申請政府為我們撤訴。皮洛反對撤訴的申請，他從被告所作的幾個具有煽動性的演講稿中摘錄出一些言論并告訴法官，警方發現了更多的極其危險的陰謀叛國的證據。他煽動性地預言說，這個國家正處在火山口上。這是一次很有影響、具有高度戲劇性的表演，皮洛使審判的氣氛發生了變化。我們有點過于自信了，皮洛的表演提醒我們，我們將面臨更嚴厲的指控。律師告訴我們，不要自己欺騙自己，你們的人可能要去坐牢。他們的警告讓我們冷靜了下來。

經過13個月的預審之后，地方法官裁決，他們發現了足以把我們送上德蘭士瓦最高法庭的叛國證據。法庭于1月份休庭，決定對剩下的95名被告進行正式審判。但什么時候才開始審判，我們對此一點也不知道。

26...

預審休庭期間的一天下午，在我同一位朋友駕車從奧蘭多去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醫學院的時候，恰好路過巴拉格瓦納斯醫院。這家醫院是約翰內斯堡最大的黑人醫院。當我們行駛到一個公共汽車站附近的時候，我眼睛的余光看見一位可愛的年輕女士在那里等公共汽車。我被她的美貌所打動，于是想回頭仔細看看她。但是，我的車速太快，沒能看清她。這位女士的面容總是伴隨著我，我甚至想掉轉車頭，讓她搭我的車。但是，我并沒有那樣做。

此后不久，奇特的巧合發生了。一天，在我的辦公室里我偶然抬頭看了奧利佛一眼，發現那位年輕女士同她哥哥一起正坐在奧利佛的寫字臺前。我感到吃驚，努力控制著我的驚喜。奧利佛把他們介紹給我，說他們是為法律上的事來找他的。

她名叫諾姆薩莫·溫妮佛雷德·馬蒂奇澤拉，不過，大家都叫她溫妮。她當時剛剛畢業于約翰內斯堡的詹·赫福梅爾社會工作學校，是巴拉格瓦納斯醫院的第一位黑人女社會工作者。當時我并不怎么關心她的背景和法律問題，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著我，我考慮的不是如何受理她的案子，而是如何請她到外面去約會。我說不準是否有一見鐘情這樣的事情，但是，我當時確實是第一次見到溫妮·諾姆薩莫就想讓她做我的夫人。

溫妮在C. K.馬蒂奇澤拉的七個孩子中排行第六。馬蒂奇澤拉主要從事商業活動。她取名諾姆薩莫，意思是努力磨煉或經歷磨難。這個名字與我的名字一樣具有預言性。她來自旁多蘭省的比薩那，與我的老家特蘭斯凱的一個地區相鄰。她出生在阿馬恩古提亞納宗室中的芳多部落。她的曾祖父名叫馬蒂奇澤拉，是19世紀納塔爾的酋長，很有勢力。在埃馬非卡尼時代，他舉家遷到了特蘭斯凱定居。

第二天，我給溫妮打了電話，請她在赫福梅爾社會工作學校為叛國審判辯護基金會募集資金，這不過是邀請她出來吃午飯的借口。我在她城內的住處接上她，然后把她帶到我的辦公室附近的一個印度飯館，這是為數不多的對非洲人開放的飯館之一，我經常去那里吃午飯。那天，溫妮真是光彩照人。事實上，她以前從來沒有吃過咖喱飯菜，她一杯接一杯地喝水，好冷卻她的嘴，而這更使她增添了幾分美麗。

吃過午飯后，我駕車帶她去了位于約翰內斯堡與伊瓦頓之間的草地，這是距離埃爾德拉多公園不遠的一片開闊地。我們一起在草深及膝的草地上散步。這里的草與我們長大成人的共同家鄉特蘭斯凱的草十分相似。我告訴她我的希望和面臨叛國指控的種種困難。我很想立即娶她做夫人，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她。她充滿活力、感情奔放、年輕漂亮、勇敢大方、積極向上，我一見到她就立即感覺到了這一切。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我們只要有時間就見面。無論是軍訓大廳或我的辦公室，她都去過，她還去過體育館看我練習拳擊和舉重。她與泰姆比、馬卡托和馬卡紫薇也見了面。她參加我們的政治會議和政治討論。我一邊追求她，一邊從政治上教育她。當學生的時候，溫妮曾經迷戀過“非歐洲人團結運動”，因為她有一個哥哥參加了這個組織。后來，我曾經拿這件事與她開玩笑說，如果她不是遇見了我，恐怕早已同某個非歐洲人團結運動的領導人結了婚。

與艾韋琳辦理了離婚手續后不久，我就告訴溫妮，她應該去拜訪邁克爾·哈邁爾的夫人雷·哈邁爾，讓她做一身結婚禮服。雷不但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積極分子，還是一個做服裝的好手。我問溫妮想要幾個女儐相，并建議她回比薩那把我們要結婚的事告訴父母。溫妮開玩笑地告訴人們，我從來沒有向她求過婚，但是，我總是告訴她，我第一次見面就向她求過婚，從那天起，我認為她理所當然要做我的夫人。

叛國審判進入了第二個年頭，它對我們的律師業務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因為我們不能堅持營業，“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面臨著破產的危險，奧利佛和我都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困難。由于對奧利佛的指控已經被解除，他可以做一些彌補性的工作，但是，造成損害已經成為事實。原來曾一度門庭若市而現在則只能四處去找委托人。我甚至付不起我在烏姆塔塔購買那塊地的50英鎊余款。

我把這些事情都告訴了溫妮。我告訴她，我們很有可能要靠她作為社會工作者的微薄工資生活。溫妮表示理解，她說她做好了承擔各種風險的準備，愿意與我同甘苦、共患難。我從來沒有許諾給她買金首飾和鉆石，我也沒有能力給她買這些東西。

我們于1958年6月14日舉行婚禮。我申請中止對我的禁令，當局給了我6天解除禁止的假期。在此期間，我可以離開約翰內斯堡。我也準備了彩禮，這是一種風俗，應該送給溫妮的父親。

結婚隊伍于6月12日早晨一早就離開約翰內斯堡，當天下午晚些時候到達了比薩那。按規定，被禁止者要到警察局報到，因此，我們到比薩那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當地警察局報到。根據當地風俗，傍晚我們去新娘的老家慕邦維尼，在那里，一群當地女人高興地歡呼著迎接我們。此時，溫妮和我被分開，她去了新娘的房子，而我則到溫妮的一個親戚家去赴宴。

婚禮在當地一個教堂里舉行，婚禮過后，我們在溫妮的大哥家里舉行了慶祝活動。溫妮的大哥住的房子是馬蒂奇澤拉祖上傳下來的。婚車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標志色進行了裝飾。大家又是跳，又是唱。溫妮的奶奶身體十分健康，她還專門為我們跳了舞。我們給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都發了邀請，但是，由于他們都正在被禁止，有的不能來參加我們的婚禮。來參加我們婚禮的有杜馬·諾克韋、莉蓮·恩高義、詹姆斯·恩章韋醫生、威爾遜·康考和維克多·提亞姆扎西。

最后的招待會在比薩那鎮政大廳舉行。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溫妮的父親發表了講話。他注意到被邀請的來賓中有一些是警察，其他人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他十分愛他的女兒，而我作為一個獻身于國家的搞政治的人，生活是十分危險的。當溫妮第一次告訴他這樁婚事的時候，他曾經驚呼：“你要嫁給一個囚犯！”但在婚禮上，他說他對未來并不樂觀。在如此困難的時期，這樣的婚姻注定要經歷一種持續的考驗。他告訴溫妮，她要嫁給的是一個已經與斗爭結了婚的男人。他祝他的女兒好運，最后用一句話結束了他的講話：“如果你的先生是男巫，那么你就必須成為女巫！”這句話的意思是你先生走什么樣的道路，你也必須跟著他走什么樣的道路。然后，我姐姐康斯坦茨·穆貝基尼代表男方在招待會上講了話。

婚禮過后，他們為新娘包上了一個婚禮餅，以便帶到婆家再舉行另一半婚禮。但我們無法舉行另一半婚禮，暫停禁止的期限已滿，我們必須立即回約翰內斯堡。溫妮小心翼翼地珍藏起那個婚禮餅，作為結婚的紀念。在奧蘭多西8115號我的家中，許多朋友和親屬歡迎我們結婚歸來。他們殺了一只羊，并以我們的名義舉行了宴會。

我們沒有時間也沒有錢度蜜月，生活很快圍繞著審判安頓了下來。我們早晨起得很早，通常是4點起床。我離家前，溫妮就把早飯準備好，吃完早飯后，我乘公共汽車去法庭接受庭審，或者到辦公室工作。下午和晚上，我盡可能多地堅持在辦公室工作，設法維持律師業務，以便掙點錢貼補家用。晚上的時間常常被大量的政治工作和會議占用。一位自由戰士的夫人就像寡婦，即使是丈夫不在監獄里，也很少有時間在一起。盡管我被指控犯有叛國罪，但是溫妮給了我希望，我感覺自己似乎有了第二次生命，我對她的愛使我增添了斗爭的力量。

27...

1958年，南非面臨的重大事件是大選。所謂“大選”，僅僅是300萬白人參加選舉意義上的大選，而1300萬非洲人沒有一個能身與其中。我們對是否進行抗議展開了討論。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只允許白人參加的選舉與非洲人有沒有關系？回答是，即使不讓我們參加大選，我們也不是局外人。雖然我們被排斥在大選之外，但是大選并不是對我們沒有影響。國民黨在大選中失敗將符合我們的利益，也符合全體非洲人的利益。

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其他大會組織及貿易工會南非大會聯合在一起，號召4月份大選期間舉行3天大罷工。傳單發往工廠和商店，發往火車站和汽車站，發往啤酒館和醫院，發往每家每戶。“國民黨必須下臺！”是這次運動的主要口號。我們的行動讓政府很擔心。大選前4天，政府作出規定，市內任何地方，10人以上的非洲人集會都是非法的。

在舉行罷工之前的那個夜晚，組織這次運動的領導人都轉入了地下，以防止警察突然襲擊。但是，這種襲擊后來真的發生了。警察還沒有對我們實行連續不斷的監視，一兩天不露面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天夜晚，瓦爾特、奧利佛、摩西·考塔尼、G. B.馬科斯、旦·圖魯麥、杜馬·諾克韋和我都躲在奧蘭多我的醫生恩塔托·莫特拉納家中。第二天早晨，我們很早就轉移到另一個鄰居家。在那里，我們能夠與全市其他領導人保持電話聯系。那時候，通信手段不很完備，特別是在鄉鎮上，幾乎沒有人擁有電話，指揮罷工是一項艱難的任務。第二天上午，我們一早就派人到各個情報站去打探火車、公共汽車和出租車上是否有人去上班。他們帶著不好的消息回來了：公共汽車和火車都滿載著去上班的人，大家對罷工的號召沒予理睬。這時我們才發現，我們躲藏在他家的那個房東也已不知去向，他溜走并上班去了。罷工遭到了失敗。

我們決定取消這次罷工。一場為時三天的罷工第一天就取消僅僅是失敗一天，而第二、第三天全都失敗就成了徹底的失敗。被迫退縮是一種恥辱，但是，我認為不退縮遭受更大的失敗則是更大的恥辱。我們發出了取消罷工的聲明，不到一個小時，政府辦的南非廣播公司就全文廣播了我們的聲明。正常情況下，南非廣播公司根本不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這個茬兒，只有我們失敗的時候才會播放我們的消息，而這次竟然稱贊了我們的決定。這讓摩西·考塔尼大為惱火。他搖著頭說：“讓南非廣播公司贊揚我們，這太過分了。”考塔尼問，我們是否太草率，為政府提供了方便？這種考慮是合理的，但是，決策者不應被驕傲或難堪的情緒所左右，而應完全從戰略角度去考慮。當時，我們取消罷工是正確的策略。敵人利用我們的退縮，并不意味著我們的退縮就是錯誤的。

但是，有的地區并沒有聽到取消罷工的消息，同時，也有一些地區拒不服從我們取消罷工的號召。伊麗莎白港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大本營，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反應就比第一天好。但是，總而言之，我們不能掩蓋罷工失敗這個事實。光是我們的失敗還似乎不夠，國民黨人在這次選舉中得票率反而上升了10%以上。

我們就是否采取強制措施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難道我們應該采用糾察隊的形式去阻止人們上班？堅持強硬路線的人認為，如果我們采用了糾察隊，這次罷工就能取得成功。不過，我一貫反對采取這種辦法，最好是依靠人民自覺自愿的支持，不然的話，這種支持就是微弱的和暫時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應該是庇護所，而不是監獄。但是，如果多數組織和人民支持一項決定，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在一定的情況下，也可以采取強制措施反對少數持不同意見的人。少數持不同意見的人不應該妨礙多數人的意志。

在自己家中，我曾嘗試采用不同的強制措施，但都沒有取得成功。埃達·馬提木苦陸是一個與我年齡差不多的講索托語的女士，當時她在我家打工。埃達不像是我家的雇工，而像是我家的成員。我叫她凱塞迪，意思是“姊妹”，是一種更親近的稱呼。埃達用軍事方式管理我家的事務，溫妮和我甘心情愿地聽從她的指揮，我經常按照她的吩咐去辦事。

準備舉行罷工的前一天，我開車把埃達和她12歲的兒子接回家，我讓她第二天給我把幾件襯衣洗一下，并把它們熨好。經過一陣沉默之后，埃達轉身用毫不掩飾的口吻說：“你很清楚，我不能干這件事。”

我對她的頂撞感到吃驚，問：“為什么不能干？”

“難道你忘了我也是一個工人？”她得意地說，“明天我將與我的人民和同事一起罷工！”

她的兒子見我很尷尬，想用孩子的特有方式緩和一下緊張氣氛，說：“納爾遜叔叔總是拿你當姊妹，而不是當工人。”埃達生氣地對她善意的兒子說：“孩子，當我在這個家為我的權利而斗爭的時候，你站在哪邊？如果我不對你納爾遜叔叔斗爭，我就沒有今天像姊妹一樣的地位！”埃達第二天沒干任何工作，我的那幾件襯衣當然也沒有洗熨。

28...

最敏感不過的問題是女人通行證問題。政府在決心對婦女實行通行證問題上毫不妥協，而婦女們決心抵制到底，也毫不讓步。盡管政府當時把通行證叫做“身份證”，但是婦女們并不是那么好欺騙。如果不帶身份證，她們將被罰款10英鎊或坐一個月的監獄。

1957年，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婦女組織的領導下，全國婦女，不分鄉下和城市，一致反對政府堅持要她們隨身攜帶通行證。婦女們勇敢、執著、熱情、不屈不撓地進行斗爭。她們抗議實行通行證，為反對政府的抗議活動樹立了新的典范。正如魯圖利酋長所說的那樣：“當婦女開始參加斗爭的時候，世界上就沒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們有生之年獲得自由。”

在東南德蘭士瓦、斯坦德頓、海德堡、巴爾弗和其他黑人村莊，數千名婦女舉行了抗議活動。借叛國審判休庭的機會，弗朗西斯·巴爾德和佛羅倫斯·麥托米拉組織他們家鄉伊麗莎白港的婦女拒絕實行通行證制。10月份，在約翰內斯堡，一大批婦女集中在中央通行證辦公室，趕走了前來領取通行證的人和該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使中央通行證辦公室陷入了癱瘓。為此，警察逮捕了數百名婦女。

這次逮捕發生后不久，溫妮和我吃過晚飯后正在休息，她悄悄告訴我，她將去參加奧蘭多婦女團體的活動，第二天，她們將在中央通行證辦公室舉行抗議活動。我有點吃驚。同時，我也為她的獻身精神而高興，并欽佩她的勇氣，當然我也有些擔心。溫妮自從和我結婚后，對政治越來越感興趣，她加入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婦女組織奧蘭多西支部，所有這些都得到了我的鼓勵。

我告訴她，我支持她的決定。但是，我也必須告訴她參加這個行動的嚴重性。我說，一次行動將會從根本上改變她的人生。按照非洲人的標準，溫妮出生在一個富有的家庭里，她一直接觸不到南非那些不愉快的現實生活，至少她絕不會擔心下一頓飯來自何處。在我們結合之前，她一直生活在相對富足和舒適的環境中，她的生活與自由戰士勉強能夠糊口的生活有著天壤之別。

我告訴她，如果她被捕，她必將被她的雇用單位即省社會工作管理局解雇。我們兩人都知道，她的微薄收入是我們養家糊口的支柱，而且她可能永遠失去社會工作者這一身份，因為被監禁的污點將使任何公共部門都不愿意雇用她。特別是她已經懷孕，我警告她監獄生活會摧殘和傷害她的身體。我的話聽起來可能有些逆耳，但我認為這是我作為丈夫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的責任，應該盡可能清楚地讓她知道自己行動的后果。我自己從感情上也是復雜的，因為作為一個丈夫和一個領導人，要關心的事總是有些不一致。

但是，溫妮是一個有決心的人，我相信，我的這些話只能增強她的決心。她聽完了我所說的一切，然后告訴我她的決心已定。第二天早晨，我一早起來為她準備了早餐。吃過早餐后，我開車把她送到西蘇陸家去與瓦爾特夫人阿爾博提娜見面，阿爾博提娜是這次抗議活動的領導人之一。然后，我們驅車到奧蘭多帕菲尼火車站，婦女們將在那里乘火車進城。在她上火車的時候，我擁抱了她。溫妮上火車后通過車窗向我揮手致意，她依然十分堅定。我感到，她要踏上一次遙遠而危險的征程，其終點我們兩人誰也不知道。

數百名婦女集中在約翰內斯堡市中心的中央通行證辦公室周圍。她們中有老人，也有年輕人，有的背上還背著孩子。她們有的身披非洲部落服裝，有的身穿漂亮的套裝。她們不停地歌唱、示威和歡呼。幾分鐘之內，她們就被數十名武裝警察包圍起來。警察把她們全部逮捕，然后用警車送到馬歇爾廣場警察局。參加抗議的這些婦女自始至終都很興奮。當她們被抓走的時候，有的還向記者高聲說：“告訴我們的那些太太、小姐們，明天我們不會去工作！”據說，當天有1000多名婦女被逮捕。

我了解這些情況，并不是因為被逮捕的婦女中有一位是我的夫人，而是因為曼德拉－塔博律師所受召喚，代表這些被逮捕的婦女進行交涉。我很快趕到馬歇爾廣場去探望她們，并設法保釋她們出獄。我設法找到了溫妮，她看見我后露出了笑容，好像待在空蕩蕩的警察局拘留室里并沒讓她不適。這樣，她似乎給了我一個會使我高興的大禮物。我告訴她，我為她而驕傲。但是我不能在那里待太長時間，因為我還有許多法律方面的事情要做。

到第二天晚上，被逮捕的人數又增加了許多，將近2000名婦女遭到了監禁。她們中有許多人被送到了福特監獄等候審判。她們不但給奧利佛和我帶來了許多麻煩，而且也給警察和監獄當局帶來了許多問題。他們簡直沒有地方關押她們。毯子、席子、廁所和食物都太少，監獄里又臟又擁擠。雖然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有許多人（包括我）急于把這些婦女保釋出來，但是，全國婦女組織的主席莉蓮·恩高義和南非婦女聯合會的書記海倫·約瑟夫卻認為，因為這次抗議是真實有效的，所以地方法官讓這些婦女坐多久監獄她們就應該堅持多久。我也規勸過她們，她們清清楚楚地告訴我，這是女人們的事，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心急如焚的丈夫們都不要干涉。我堅持告訴莉蓮，我認為她應該在作決定之前與這些婦女就面臨的問題進行討論。我一直護送她到了監獄，在那里，她可以征求被監禁婦女們的意見。許多婦女都對被釋放感到絕望，并且她們對自己在監獄里到底會出現什么情況并沒有充分準備。作為一種折中，我建議莉蓮讓這些婦女在監獄里蹲兩個禮拜，然后我們把她們保釋出來，莉蓮接受了這個建議。

在接下來的兩周時間里，我在法院里花了許多力氣，設法把這些婦女保釋出獄。有的人給我設置障礙，甚至拿我出氣。“曼德拉，我對你這個案子等得不耐煩了，”一位婦女對我說，“如果今天再辦不完，我再也不在法庭上露面了。”在親屬和基金募集組織的幫助下，我們兩周內就把她們全部保釋了出來。

在監獄里，溫妮似乎沒受多大的罪。當然，她就是受了罪也不會告訴我。在監獄里，她與兩個南非白人女獄警成了朋友。她們都很有同情心，也很熱心。溫妮被保釋出獄后，我們邀請她們到我家做客。她們接受了我們的邀請，乘火車來到了奧蘭多。我們請她們吃午飯，然后，溫妮帶她們參觀了索韋托。溫妮與兩位女獄警年齡差不多，她們相處得很好。她們在一起非常高興，就像是親姐妹。兩位女士那天玩得很開心，在向溫妮表示感謝后，她們答應將會再來拜訪。事實上并不是這樣，因為要到奧蘭多，她們必須乘坐非歐洲人乘坐的火車（因為沒有白人來奧蘭多，所以沒有白人乘坐的火車），結果，她們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兩位福特監獄的白人女獄警來看望溫妮和我的消息很快傳播開來。這對我們倒沒有什么，但是，事實證明，這件事對她們影響很大，因為監獄當局解雇了她們。我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們，也再沒有聽到過她們的消息。

29...

自從1月份的聽證會之后，6個月來我們一直等待著對我們的正式審判。正式審判計劃在1958年8月開始，為此政府專門設立了高級法庭。該法庭由三人組成：大法官F. L.拉姆頗福——他是三人法庭的庭長，另外還有法官肯尼迪和魯道夫先生。我們對這個法庭并不抱多大希望，因為三人都是白人，并且都與當政的國民黨有聯系。但是，拉姆頗福是個很有能力的人，比一般南非白人要正直一些。據傳說，他是南非白人秘密組織“秘密兄弟會”的成員。這個組織的宗旨就是鞏固南非白人政權。魯道夫和肯尼迪兩位法官都是著名的國民黨黨員。肯尼迪有“絞刑法官”的壞名聲，曾經因為兩名白人警察被殺，就有23名黑人被他送上了絞刑架。

開庭不久，政府對我們耍了另一個花招。他們宣布將審判地點由約翰內斯堡轉移到36英里以外的比勒陀利亞，審判將在華麗的原猶太會堂內進行。當時，這個會堂已經被改成了法庭。我們這些被告和律師都住在約翰內斯堡，所以我們不得不每天去比勒陀利亞，這次審判將讓我們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對我們來說，時間和金錢都是不富裕的。我們有的原來還能設法維持自己的工作，因為原來的法庭就在我們工作的地點附近。但是，現在我們無法繼續把我們的工作維持下去了。轉移審判地點也是一種借助于使我們同我們的支持者分開而從精神上摧垮我們的陰謀詭計。比勒陀利亞是國民黨的老巢，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在那里卻沒有任何基礎。

幾乎全部92名被告都乘坐一輛車速緩慢且極不舒適的大巴士去比勒陀利亞。車內的座椅是用木條做成的。每天早晨6點從約翰內斯堡發車，用兩小時才能到達猶太會堂。往返一次幾乎要花費5個小時，我們用這段時間掙點錢養家糊口那該有多好啊！

我們又一次十分幸運地擁有一支精干而咄咄逼人的辯護隊伍。這支隊伍以伊斯雷爾·梅賽爾斯為首，成員有布拉姆·費希爾、雷克斯·維爾什、弗農·貝瑞奇、西德尼·肯特利奇、托尼·奧多德和G.尼古拉斯。在開庭的那天，他們采取了一種具有一定冒險性的辯護策略，充分顯示了他們的辯護才能。這個策略是我們與律師們一起制定的。伊斯雷爾·梅賽爾斯站起來申請取消魯道夫和拉姆頗福兩位法官的審判資格，因為他們與被告有利益沖突，這有礙他們對我們的案子作出公正的判決。此時，法庭上可以聽到大家交頭接耳的議論。辯護律師認為，作為1952年反抗運動的審判法官，拉姆頗福已經對現在指控的某些方面作過判決，因此，讓他來審理這個案子是不公正的。我們認為魯道夫有偏見，因為，1954年他作為警察的律師曾經代表政府出過庭。當時，哈羅德·沃爾佩請求法庭禁止將那位警察從人民大會的一次會議中驅逐出去。

這是一個危險的戰略，因為，雖然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取得一次交鋒的勝利，但卻可能會使整個戰爭以失敗而告終。盡管我們把魯道夫和拉姆頗福作為國民黨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但是，這個國家有許多比他們還要壞的法官能取代他們的位置。事實上，在我們希望他們讓位的同時，我們也暗中希望被我們尊為忠誠的政治中間人的拉姆頗福能夠拒絕放棄自己的審判資格。無論他自己堅持什么政治觀點，拉姆頗福還是一貫堅持以法律為準繩的。我們相信，從法律上講我們只能是無辜的。

那個禮拜一，當三位身著紅袍的法官步入法庭的時候，那種氣氛正是我們所期望的。魯道夫法官宣布他將讓位，并說，他已經完全忘記了上一個案子。但是，拉姆頗福拒絕放棄自己的審判資格，他反而作出保證，對反抗運動案的審判將不會影響他對此案的審理。我們對這個決定很滿意。政府提出讓比克法官取代魯道夫的位置，正如我們一開始就希望的那樣，他與國民黨沒有任何聯系。

第一個策略旗開得勝后，我們又設法實施第二個策略。這個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危險性，我們開始進行連篇累牘、詳詳細細的辯解，對指控本身提出抗議。我們堅持認為，說到底這個指控是捏造的，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我們也對策劃暴力就是高級叛國罪的證據提出了異議，指出需要拿出其聲稱我們打算實施暴力的證據。經過我們的辯解，案情變得十分清楚，三個法官也都同意我們的辯解。8月份，法庭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取消了兩項指控中的一項。10月13日，經過兩個月的法庭辯論后，刑事庭忽然宣布全部駁回關于暴力叛國的指控。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情況，但是，我們對政府狡猾的行徑十分了解。一個月后，起訴檢察官就公布了一項新的、措辭更加嚴謹的指控，并宣布只審判30個被告，其余的被告以后再審。這30名被告全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我也是其中之一。

按照新的指控，起訴需要證明實施暴力的意圖。正如皮洛指出的那樣，“被告知道《自由憲章》的實現將必然涉及用暴力推翻政府”。法庭辯論一直持續到1959年的中期。這時，法庭駁回了對其余61名被告的刑事指控。可以想象得出，法庭連續幾個月來一直在玩弄枯燥乏味的法律花招。盡管在揭露政府制造冤假錯案過程中的辯解是成功的，但是政府仍然頑固不化地堅持原來的指控。正如司法部部長說的那樣：“不管花費幾百萬英鎊，這個審判都要進行下去。多花些時間又有什么關系？”

1958年2月4日剛過午夜，我參加完一個會議后回到了家中，發現只有溫妮一個人在家，當時她感覺腹部疼痛難忍，她就要臨產了。我趕忙把她送往巴拉格瓦納斯醫院。但是我被告知，溫妮幾個小時后才會生產。我一直等到不得不去比勒陀利亞候審的時候才離開醫院。這一輪審理后，我立即與杜馬·諾克韋一起趕回家，發現她們母女倆一切平安。我抱著我的新生女兒，稱她是一個真正的曼德拉。我的親戚木丁基酋長建議給她取名澤尼，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你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么？”這是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它象征著挑戰，寓意必須為社會作貢獻。這意味著，擁有這個名字的人不僅僅是擁有這個名字，而且要實踐這個諾言。

我母親從特蘭斯凱來索韋托幫助溫妮，并請了一位部落術士給澤尼行部落洗禮。但是，溫妮堅決拒絕了，認為這種洗禮不衛生，也不合時宜。她給澤尼涂橄欖油，搽強生嬰兒粉，并喂她鯊魚油。

溫妮剛開始下床活動，我就擔當起教這個新生兒的媽媽駕駛汽車的任務。那時，駕駛汽車是男人的事，幾乎沒有女人，特別是非洲女人，能坐在駕駛座位上。但是，溫妮有獨立的見解，很想學習駕駛汽車，因為我老是不在她身旁擔任司機。因此，她認為學習駕駛很有用處。可能我是一個不怎么耐心的教師，或者可能我的學生是一個任性的學生，當我試圖沿著相當平坦而寧靜的奧蘭多路教她駕駛時，我們似乎每次換擋總會爭吵一番。我給她提了太多太多的建議，當她對我的一個建議不予理睬的時候，我生氣地下車跑回了家。沒有我這個教練，溫妮似乎學得更好，因為她竟然自己駕駛汽車繞索韋托轉了一小時。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愿意和解，此事后來成為一個相互取笑的故事。

對溫妮而言，婚后并做了母親的生活是一種調節。她當時只是一個25歲的年輕女士，她的性格和脾氣還沒有完全形成。我的性格雖然已經形成，但就是有點倔。我知道別人常常把她看作“曼德拉的夫人”。在我的影子下，讓她形成自己的個性毫無疑問是困難的。我努力讓她發揮自身的優勢，她很快就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無需我的任何幫助。

30...

1959年4月6日，是簡·范·里貝克登陸好望角紀念日。這一天，誕生了一個企圖挑戰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一政治組織地位的新組織，并且，該組織否認白人歷時三個世紀的統治。憑借數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聚集在奧蘭多鎮政大廳，“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作為一個明確反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多種族主義的非洲主義者組織粉墨登場。像我們中間15年前成立青年團的那些人一樣，該組織的締造者們認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缺乏戰斗精神，脫離了廣大群眾，被非非洲人所把持。

羅伯特·索布克韋當選為主席，波特拉考·利寶羅擔任總書記。他們兩人都是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團員。在索布克韋的開場白之后，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發表了宣言和章程。在宣言和章程中，索布克韋要求“非洲人的政府由非洲人說了算，并為非洲人服務”。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宣布要推翻白人霸權，建立一個內容上是社會主義、形式上是民主主義的非洲人政府。他們認為，白人和印度人是“外國少數團體”或“異邦人”，南非并不是他們的故土。南非是非洲人的南非，而不是別的什么種族的南非。

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誕生對我們來說并不感到奇怪。三年多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中的非洲主義者一直頗有怨言。1957年，非洲主義者在全國大會上發動了對德蘭士瓦執行委員會的不信任投票，但沒有取得成功。他們反對1958年的大選日罷工。他們的領袖被驅逐出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在1958年11月召開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會議上，一伙非洲主義者宣布反對《自由憲章》，聲稱《自由憲章》違反了非洲民族主義原則。

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聲稱，他們從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1912年建立時的原則中吸取了靈感，但是，其觀點顯然主要出自1944年成立青年團時期由安東·萊彼德和A. P.穆達提出的具有感情色彩的非洲民族主義。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反映了當時的理念和口號：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是一個非洲合眾國。不過，分裂的直接原因是他們反對《自由憲章》和白人、印度人參與大會聯盟的領導。相對于種族之間的合作，更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認為白人共產主義者和印度人已經把持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

我對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締造者們都很熟悉。羅伯特·索布克韋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一個很健談的君子和學者（他的同事們都稱他“教授”）。他總是愿意承擔由于他的原因造成的錯誤的責任，從而贏得了我一貫的尊敬。波特拉考·利寶羅、皮特·拉寶羅克和澤法尼·馬托朋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得知我政治上的良師益友高爾·瑞德貝也加入了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使我頗為吃驚，并且確確實實讓我有些難過。我很奇怪，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成員竟然決定加入當時就明明白白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組織。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出于個人嫉妒或不滿而與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站在一起的。他們沒有考慮到斗爭的進步性，只考慮自己的恩恩怨怨。我總是認為，要當一名自由戰士，必須超越許多讓他感覺自己是一個獨立的自我而不是作為群眾運動的一部分的個人感情。一名自由戰士要為千千萬萬人民的解放去戰斗，而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譽而戰。我并不是主張自由戰士都變成機器人，完全擺脫自己的感情和動機。但是，同樣，一個自由戰士要把自己的家庭服從于人民的大家庭，他必須讓個人的感情服從于自由運動。

我發現，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觀點和行動都是不成熟的。有一位先哲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當他老了的時候又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那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而是一個逐步成熟的人。我認為自己年輕時的一些觀點是不成熟的，甚至看起來有點乳臭未干。雖然我贊成非洲主義者的某些觀點，并且曾經與他們有某些共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斗爭要求一個人應該講點折中，不要做一個幼稚的、容易沖動的人。

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提出了一個過激的、過于野心勃勃的、承諾速戰速決的綱領。最過激、最幼稚不過的是承諾1963年年底就獲得自由解放，督促非洲人自己準備迎接這個歷史時刻的到來。他們斷言：“1960年取得第一步勝利，1963年最后獲得自由和獨立。”盡管這種預言激發了等得不耐煩的人們的希望和熱情，但是，作出根本無法實現的承諾對于一個組織來說是危險的。

由于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反對共產主義，該組織成為西方媒體和美國國務院的寵兒。他們把該組織的誕生當做插在非洲左派心臟上的一把匕首。甚至國民黨也把他們看作潛在的盟友：他們把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當做反對共產主義、支持隔離政策的典范。國民黨人也反對種族之間的合作，因此，國民黨和美國國務院決定對這個新生組織的規模和意義進行夸大的宣傳。

雖然我們歡迎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發動大家參加解放斗爭，但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卻幾乎總是與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唱對臺戲。他們在關鍵時刻造成了人民的分裂，這是一個令人難以忘卻的教訓。當我們號召人民開展大罷工的時候，他們卻讓大家去上班。每當我們發表一項聲明，他們總是反其道而行之。盡管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締造者們都是從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分裂出去的人，但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在我看來仍然是有希望的，我們兩個組織之間的團結是有可能的。我認為，一旦激烈的爭執冷靜下來，斗爭目標的基本一致性將會把我們聯合在一起。在這一信念的驅使下，我對他們的政策和行動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想法是尋找彼此之間的共同點，而不是尋找彼此之間的分歧。

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舉行成立大會的第二天，我向索布克韋索要他在大會上發表的主席就職演說稿，以及章程和其他文件。我認為索布克韋似乎對我的關注感到高興，他說他一定滿足我的要求。后來不久我又見到他，提醒他我所要的資料，他說資料已經發過來了。隨后我又見到了波特拉考·利寶羅，我對他說：“伙計，你們許諾給我一套你們的資料，但到現在也沒有人給我。”他說：“納爾遜，我們決定不給你，因為我們知道你想用這些資料來攻擊我們。”后來，我消除了他的這種錯誤想法，于是他大發慈悲，把我所要的一切都給了我。

31...

1959年，議會通過了《班圖自治政府促進法》，這個法律制造了8個隔離的部落班圖斯坦。這是政府所說的“格魯特隔離”或“大隔離”的基礎。大體是在同一時間，政府又以欺騙性的名字出臺了《大學教育擴展法》，這也是一個隔離性的立法。這個法律把白人以外的人統統拒于“開放的”大學校門之外。在關于《班圖自治政府促進法》的介紹中，班圖管理與發展部部長德·韋特·納爾說，每個隔離部落的福利在自己的部落內能夠最大限度地得到發展。他說，非洲人再也不會與白人融為一體。

班圖斯坦政策讓70%的人只占有13%的土地，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按照這個新政策，盡管有三分之二的非洲人生活在所謂的白人區，但他們的公民權也僅限于自己的“部落家園”。根據這個政策，在他們“白人區”內，我們非洲人無從獲得自由，而在他們所謂的“我們的”區域里，我們仍然不能獨立。沃爾沃德說，班圖斯坦的創立用意如此良善，這些地區再也不會成為反叛者的溫床。

事實恰恰相反，農村地區出現了動亂。例如，澤盧斯特等地區的反抗就非常激烈，在那里，阿布拉姆·莫伊勒娃酋長在喬治·畢佐斯律師強有力的支持下，領導他的人民反對所謂的班圖當局。這些地區的情況通常在報紙上看不到，政府借口這些地區不容易接近以掩蓋政府隔離措施的野蠻性。許多無辜者被逮捕、起訴、關進監獄、驅逐流放、鞭打、折磨和殺害。塞庫庫尼蘭地區的人民隨之也揭竿而起。莫洛默曹·塞庫庫尼、戈佛雷·塞庫庫尼兩位極其重要的酋長和其他參事被逮捕的逮捕，流放的流放。一位塞庫庫尼酋長考拉尼·克高勞考遭到暗殺，因為大家都認為他是政府的走狗。到1960年，塞庫庫尼地區的反抗發展到了公開的對抗，人們甚至拒絕納稅。

在澤盧斯特和塞庫庫尼蘭地區，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支部在反抗斗爭中發揮了顯著作用。幾個新建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支部，不顧嚴厲鎮壓，在澤盧斯特舉行起義，其中一個支部發展了2000多名會員。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首次被政府取締就發生在塞庫庫尼蘭和澤盧斯特這兩個地區，這從另一方面展示了我們在這些偏遠地區所具有的力量。

在東旁多蘭也爆發了抗議活動，在那里，政府的追隨者不是遭到暗殺就是被公開處決。泰姆布蘭和祖魯蘭也發生了激烈的反抗，它們也是屬于堅持到最后的兩個地區。那里的人民有的被毒打，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驅逐，有的被關進了監獄。在泰姆布蘭，人們借助薩巴塔的反抗力量從1955年就開始進行反抗。

使我特別痛心的是特蘭斯凱，人民的不滿情緒直接對準了我的侄子K. D.馬嘆茲瑪。他過去曾經是我的良師益友。達利旺伽與政府勾結在了一起，我多年來對他的呼吁成了泡影。有報告說，馬嘆茲瑪的心腹把反對他的村莊給放火燒了，有人幾次要暗殺他。同樣讓我痛心的是，溫妮的父親也是馬嘆茲瑪的內閣成員，并且毫不動搖地支持馬嘆茲瑪。這對溫妮是個可怕的難題：他的父親和丈夫彼此成為一場爭端的對立面。她愛她的父親，但是，她卻反對他的政治立場。

有好多次，特蘭斯凱的親屬來奧蘭多看我，他們都抱怨酋長與政府同流合污。薩巴塔反對班圖當局，并且不會屈服，但是又害怕馬嘆茲瑪會罷免他。最后，馬嘆茲瑪真的罷免了他。有一次，達利旺伽在叛國審判期間親自來看我，我把他帶到比勒陀利亞。在法庭上，伊斯雷爾·梅賽爾斯把他介紹給了法官，法官們還給他設了一個名譽席位。但是，在外面，在被告中間，他所受到的待遇卻沒有這樣幸運。他開始放肆地問辯護律師們為什么反對隔離政策，而這些辯護律師則把他當叛徒看待。莉蓮·恩高義說：“Tyhini，uyadelela lo mntu（天啊，這個人真能制造事端）”。

32...

據說上帝的磨轉得特別慢，但是，與某些南非司法機制相比，上帝的意旨也難以同日而語。1959年8月3日，我們被捕兩年零八個月之后，也就是經過一整年的法律演練之后，真正的審判才在比勒陀利亞老猶太會堂開庭。我們最終受到了正式指控，而我們30名被告都申辯無罪。

我們的辯護隊伍還是以伊斯雷爾·梅賽爾斯為首，他的助手有西德尼·肯特利奇、布拉姆·費希爾和弗農·貝瑞奇。這次審判將馬上進行。在頭兩個月，刑事庭又收到了約2000份證據，動員了210名證人，其中200名是特警偵探。這些偵探承認采取秘密方式混進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隊伍，實施了一切能使他們獲得有關我們組織情報的欺騙手段。而在政府提交的這些文件和他們記錄的講話中，有許多是公開發表的，大家都可以拿得到。和以前一樣，刑事庭提供的證據多數都是在1952年到1956年期間在一次次的襲擊中從被告那里獲取的。另外，還有一些是警察在此期間從非國大召開的大會上獲取的記錄。并且，特警提供的這些關于我們講話的報告仍然和以前一樣，是雜亂無章的。我們曾經把大廳內效果很差的擴音設備和特警偵探提交的雜亂無章、很不準確的報告當笑料，但我們也可能因為我們沒有說過的話而受罰，因為沒聽見過的事被關進監獄，因為沒做過的事被推上絞刑架。

每天吃午飯的時候，政府允許我們坐在隔壁寬敞的教區花園內，吃上一份由令人生畏的塔亞納基·皮利太太及其朋友為我們準備的飯菜。他們幾乎天天為我們準備辛辣的印度餐。上午和下午休息的時候，還有茶水、咖啡和三明治，這時就像是休庭，是我們相互議論政治的一種機會。坐在教區內藍花楹樹下的草皮上是審判期間最愉快的時刻，因為從各個方面說，這個案子與其說是審判，倒不如說是對我們的耐力的檢驗。

10月11日上午，我們正準備去法庭，卻忽然從收音機里聽到了起訴檢察官奧斯瓦德·皮洛被刺身亡的消息。他的死對政府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刑事庭審判隊伍的有效性和攻擊力被削弱了。那天在法庭上，法官拉姆頗福很動情地為皮洛歌功頌德，贊揚他的法律敏銳性和奉獻精神。盡管我們將會由于他的死而受益，但是，我們并沒有因為他的死而感到高興。我們對自己的對手已經有了某種感情。因為盡管皮洛的政治觀點是有害的，但是，如果他不是扮演政府惡毒的種族主義代言人的角色，他還是一個有人情味的人。他習慣客氣地稱我們“非洲人”（連我們自己的一位律師有時也會說漏了嘴，稱我們“土人”），這與他的政治至上主義的觀點形成了反差。在舊猶太會堂內，當我們每天上午看到皮洛在他的審判桌上閱讀右翼刊物《新秩序》，而布拉姆·費希爾在我們被告席上閱讀左翼刊物《新時代》的時候，我們這個小小的世界似乎以古怪的方式獲得了平衡。他免費為我們提供了100多卷預審材料，他的慷慨為我們的辯護節省了大量資金。德·沃斯法官成了刑事庭的新庭長，但是，他的口才和機智卻無法與他的前任相比。

皮洛死后不久，控方不再提供新的證據，而是開始檢驗、鑒定證人。這一步從長期忍受耐心等待之苦的默里教授開始，他是政府指定的有關共產主義的材料方面的鑒定證人。在預審期間，他被證明是不稱職的。在梅賽爾斯的盤問下，默里承認《自由憲章》事實上是一個人道主義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代表了非白人對南非惡劣狀況的不滿和希望。

默里并不是對政府關注的這個案件幾乎未能提供幫助的唯一刑事案件證人。盡管政府從他們的鑒定證人那里弄來了數不清的刑事案件證據和證詞，但控方并沒有提供任何證實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策劃暴力的有效證據。而他們也明白這一點。到了3月，控方突然信心劇增，他們將展示毀滅性的證據。隨著宣傳大張旗鼓地進行，政府向法庭提供了羅伯特·萊沙的一篇秘密錄音講話。他發表這個講話幾周之后，我們就都被逮捕了。法庭上很靜，盡管這個錄音有靜電干擾，并且錄音背景中有其他人講話，但是，羅伯特的話仍然能夠聽得很清楚：

如果你們是守紀律的人，并且組織上告訴你不要實施暴力，那么，你不得實施暴力……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志愿者，并且組織要求你實施暴力，那么，你就必須絕對地實施暴力，你必須殺人！殺人！事情就這么簡單。

控方認為，這篇講話將使這個案子得以了結。報紙把萊沙的講話刊登在了顯要位置上，這無疑是政府的意思。政府認為，這個講話暴露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真實的、秘密的意圖，說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所謂不實施暴力僅僅是一種表面偽裝。而事實上，萊沙的話卻是反話。羅伯特如果不是一位充滿激情的演說家，也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演講人，他使用了類推法是不幸的。但是，正如辯方所言，他僅僅是強調紀律的重要性，作為志愿者，組織讓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管你自己是否愿意干。我們的證人一次又一次地說明萊沙的講話不僅是離題的，而且也不代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

控方于1960年3月10日結束了指控程序，4天后我們將讓我們的第一位證人出庭參加辯護。幾個月以來，我們一直很消沉，但是，當我們開始自己準備證詞的時候，我們則希望盡快進行辯護，因為我們一直回避敵人的攻擊。

在輿論宣傳中，雙方一直在斗智斗勇，都知道我們的第一位證人將是魯圖利酋長。政府方面當時也這樣認為。當3月14日獲知我們的第一位證人不是魯圖利而是威爾遜·康考時，控方顯得有點不知所措。

康考是納塔爾省伊克索珀地區一個祖魯牧民的兒子，除了行醫，他還是青年團的締造者之一，是抵抗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也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財政部長。由于做好了出庭作證的準備，大家就他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優秀記錄提了許多問題。他是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高材生，名列所有白人特權家庭的子女之前。因為康考的證書都被采納為證據，我有一個清清楚楚的印象，法官肯尼迪似乎很自豪，因為他本人也是納塔爾人。納塔爾人一般都忠于自己的家鄉，這種感情的紐帶似乎超越了膚色的隔閡。確確實實，許多納塔爾人都認為自己是白色祖魯人。肯尼迪法官似乎還算是一個主持公道的人，我覺得，通過威爾遜·康考這個榜樣，他已經開始不把我們當做粗魯的煽動者看待，而是把我們看做有遠大理想的人。如果國家幫助我們，我們也會幫助國家。在康考的證言結束的時候，他在醫學方面的成就被節錄了下來，肯尼迪用流利的祖魯話說“Sinjalo thina maZulu”，意思是“我們祖魯人就是那樣的人”。康考被證明是一個能言善辯的證人，從而再次證實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承諾不動用武力。

魯圖利是第二位證人，他以其高尚的品質和誠摯給法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患有高血壓，法庭同意他只在上午出庭作證。他的證言持續了好幾天，幾乎被質詢了三周的時間。他認認真真地敘述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政策的演變，把事情說得簡潔而清楚。他過去當過教師和酋長的身份使他的證詞增加了分量和權威。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成為討論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如何真誠地使種族之間和諧的最佳人選。

酋長堅持認為，人類的本質是天生善良的，道德信仰加上經濟壓力就能對白色南非人產生影響，使他們的心靈發生變化。在討論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非暴力政策時，他強調非暴力與和平主義之間是有區別的。和平主義者拒絕捍衛自己，即使在自己受到攻擊的時候也是如此。但是，對于主張非暴力的人來說，拒絕保護自己是沒有必要的。有時候，堅持非暴力的人和國家，當受到攻擊的時候也不得不保護自己。

當我們傾聽康考和魯圖利發表證詞的時候，我在想，法官有生以來第一次不是在聽他們的公務員說他們的主子喜歡聽的話，而是在聽獨立的、話語流利的非洲人一字一句地說出他們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他們又是多么希望實現這種政治信仰。

特瑞格福對酋長進行了質詢，他固執地企圖讓酋長說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被共產黨人所把持，并且有兩套政策，非暴力政策是公開的，另一套秘密計劃是要發動暴力革命。酋長堅決否認了特瑞格福的指控。他本人就是溫和派的中堅，特別是當特瑞格福似乎失去控制的時候就顯得更為溫和。特瑞格福有一次指責酋長偽裝善良，而酋長沒有理會特瑞格福對他的中傷，他沉著地對法官說：“我的上帝啊，我認為法庭已經失去控制。”

但是，3月21日，酋長的作證被法庭外面所發生的事件打斷了。那天，南非舉國上下都為發生如此重大的事件而感到震驚，當魯圖利一個月后回來繼續作證時，法庭乃至全南非已經是另一番天地。

33...

1959年12月，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年會在德班舉行，在此期間，德班正轟轟烈烈地進行反對通行證的示威游行。大會一致同意在全國范圍發動大規模的反通行證運動。這項運動于1960年3月31日開始，到6月26日以點燃大篝火焚燒通行證而達到了高潮。

策劃工作立即開始。3月31日，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向地方當局派去了代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官員到各地動員分支機構參加運動。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現場工作人員在鄉鎮和工廠進行宣傳，印制傳單、標語和其他張貼物，并發往各地。火車和公共汽車上到處都貼滿了這樣的宣傳品。

整個國家的氣氛十分緊張，政府威脅要取締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內閣部長們警告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馬上要出“重拳”予以打擊。在非洲的其他地方，自由斗爭正在向前發展：1957年，加納出現了獨立的共和國，加納泛非主義者、反對隔離的領袖克瓦麥·恩克魯瑪使國民黨人更加警覺，因而加緊對國內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壓制。1960年，非洲17個前殖民地國家紛紛準備成立獨立的國家。2月，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訪問了南非，并在議會發表了演說，他在演說中大講“事變風云”正在吹遍整個非洲。

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此時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他們正處于尋找追隨者的階段，還沒有發動能讓他們得以在政治上揚名的運動。他們知道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發動的反通行證運動，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也一直在邀請他們參加這個運動。但是，他們非但不和我們攜起手來，反而企圖從中破壞。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聲明，他們要在我們開始發動運動前10天，也就是3月21日，發動他們自己的反通行證運動。他們沒有召開任何會議討論發動運動的時間表，也沒有做任何重要的組織工作，純粹是一場機會主義的鬧劇。他們的目的不是去打擊敵人，而是企圖動搖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治地位。

在計劃發起示威的4天前，索布克韋邀請我們與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聯合行動。索布克韋的邀請并不是一個聯合的姿態，而是防止我們對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提出批評的一種策略。他直到最后時刻才邀請我們進行聯合，我們理所當然地拒絕了他的邀請。3月21日上午，索布克韋和他的執行委員會成員步行去奧蘭多警察局，隨之束手就擒。成千上萬的人并沒有買這些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人士的賬，照舊去干自己的工作。在地方法院，索布克韋聲明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不會試圖給自己辯護，這個聲明倒符合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不保釋、不辯護、不繳罰金”的口號。他們認為，他們這些違抗者將被監禁幾周的時間，但是，由于沒有選擇繳納罰金，索布克韋不是被監禁了幾周，而是被監禁了三年。

在約翰內斯堡，響應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號召的也沒有幾個人。德班、伊麗莎白港、東倫敦等地根本就未出現示威活動。不過在伊瓦頓，Z. B.莫萊特在喬·莫里菲的大力支持下與烏蘇姆茲·梅克一起得到了全鎮的支持，數百人因沒出示通行證而被捕。開普敦也發生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反通行證示威。在開普敦市外的蘭伽鎮，大約有3萬人在青年學生菲利普·考薩納的帶領下聚集在一起，并由于警察揮舞警棍襲擊群眾而激化成了一場暴亂，有兩人在暴亂中被殺。發生示威的地區中，最后一個也是最不幸的一個地方，其名稱一直彌漫著悲劇的陰影，這個地方就是沙佩維爾。

沙佩維爾是一個位于約翰內斯堡南大約35英里的小城鎮，其位置正好處在弗里尼欣周圍令人恐怖的工業區。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積極分子在這個地區做了充分的組織發動工作。那天下午一早，數百人的群眾隊伍包圍了警察局。示威群眾很克制，并且手無寸鐵，而75名警察卻是一支數目不小的、足以引起恐慌的隊伍。沒有人聽見鳴槍示警和其他警告，警察就忽然向人群開了槍，當示威群眾轉身驚慌失措地四散逃跑時，警察仍然繼續開槍射擊。清理現場的時候，有69名非洲人倒在血泊中，他們多數都是在逃跑時被從身后射中的。總共有700多發子彈射向了人群，有400多人受傷，其中包括許多婦女和兒童。這是一場大屠殺。第二天，世界各地的報紙都在頭版刊登了記錄這場野蠻行動的照片。

沙佩維爾大屠殺激起了全國性的動亂，引發了一場政府危機。憤怒的抗議聲來自世界各地，其中包括美洲國家。聯合國安理會破天荒第一次出面干涉南非事務，譴責南非政府槍殺群眾，敦促南非政府采取措施，實行種族平等。約翰內斯堡股市發生跳水，資本開始流向國外。南非白人開始準備向國外移民。自由人士敦促沃爾沃德向非洲人讓步。政府堅持認為，沙佩維爾事件是共產黨人陰謀制造的結果。

沙佩維爾大屠殺使南非出現了新的形勢。盡管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領導人還不成熟，并且有機會主義的傾向，但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卻在他們組織的沙佩維爾和蘭伽示威活動中顯示了偉大的勇氣和堅韌不拔的斗志。只有一天的時間，他們就走到了斗爭的前線，羅伯特·索布克韋被國內外擁戴為解放運動的大救星。我們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作出快速調整，以適應這一新的形勢。我們也確實這樣做了。

我們中的少數人，其中包括瓦爾特、杜馬·諾克韋、喬·斯洛沃和我本人，在約翰內斯堡通宵召開了會議，研究應對措施。我們知道，必須采取某些措施讓人民了解這些事件，讓他們出出氣、鳴鳴冤。我們把計劃轉給魯圖利酋長，他立即接受了我們的計劃。3月26日，魯圖利酋長在比勒陀利亞當眾把他的通行證付之一炬，并號召其他人也這樣做。他宣布全國在3月28日舉行在家中靜坐活動，將這一天作為對沙佩維爾暴行進行悼念和抗議的國家紀念日。在奧蘭多，杜馬·諾克韋和我當著數百名群眾和數名攝影記者的面燒掉了自己的通行證。

兩天后，也就是28日，舉國上下有數十萬非洲人響應了魯圖利酋長的號召。只有真正的群眾組織才能協調這樣大規模的活動，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不愧為真正的群眾組織。在開普敦，有5萬群眾在蘭伽鎮集會，抗議槍擊事件。許多地區發生了暴亂。政府宣布全國處于緊急狀態，并中止實行人身保護法，動用全部武力對付一切形式的顛覆活動。此時，整個南非開始戒嚴。

34...

3月30日凌晨1點半，我被激烈的、兇悍的敲門聲驚醒，這無疑又是警察。“政府采取行動的時候到了。”我一邊動身去開門一邊自言自語地說。開門后發現，門外果然站著6名武裝警察。他們把我的房子翻了個底朝天，把他們能夠找得到的一切資料統統收繳，包括我近期整理的我母親收藏的家史和部落傳說手稿。從此之后，我再也沒有看見這些東西。我當時被逮捕時他們并沒有出示逮捕證，連叫我的律師的時間都沒有。他們拒絕告訴我夫人把我帶往何處。我僅僅向溫妮點頭示意，連對她說句安慰話的時間都沒有。

30分鐘之后，我們到了紐蘭警察局，這里我很熟悉，我曾經多次來這里看望我的訴訟委托人。該警察局位于索菲亞頓，這里只剩下了這個警察局，因為這個過去曾經非常熱鬧的城鎮現在變成了一片推土機推倒的建筑物廢墟和空曠的場地。在警察局，我見到了我的幾位同事，他們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被從床上叫醒后抓到這里來的。在那個夜晚，又有許多人被帶到了該警察局，到第二天早晨，我們總共有40人被抓。我們被關在一個露天的小院子內，只有一只小燈泡照明。空間很小，又很潮濕，我們只好站了一整夜。

早晨7點一刻，我們被關進了一間小屋，小屋只有地面上一個排水孔，而且只能從屋外沖洗。他們沒有為我們提供毯子、食物、席子和衛生紙。排水孔常常被堵上，屋內的臭氣讓人難以忍受。我們多次提出抗議，其中包括要求提供食物。當然，這些要求都被拒絕了，于是我們決心下次開門時涌進隔壁的院子，直到提供給我們食物才肯回到小屋子里去。當我們從屋內一擁而出的時候，值班的青年警察被嚇跑了。幾分鐘后，一位魁梧、冷酷的中士來到了院子里，他命令我們回到小屋子里去。“進去！”他大聲喊，“如果你們不進去，我將叫50名帶警棍的人來敲碎你們的頭蓋骨！”在發生過沙佩維爾慘案后，這種威脅似乎并不只是停留在口頭上。

警察局的局長來到了院子的門口，看我們要干什么。他走過來訓斥我，因為我的雙手插在衣服口袋內站在那里。“這就是你在官員面前站立的姿勢嗎？”他大聲訓斥說，“把你的手放下來！”我仍然使勁地把手插在衣服的口袋中，就好像是在冷天里散步。我反駁說：如果你們給我們飯吃，我也許會屈尊把手放下來。

下午3點，我們多數人到達這里已經有12個小時，他們給我們送來了一個容器，里面有半干半稀的玉米飯，但是沒有餐具。正常情況下，我們會認為無法進食。但是在當時，我們手都沒洗就伸進了容器，撈起玉米飯就吃。我們吃著玉米飯，就像是在享用天底下最香最可口的美食。吃過飯后，我們選出一個委員會作為我們的代表，其中有杜馬·諾克韋、Z. B.莫萊特和我。莫萊特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書記。我被推選為發言人。我們立即起草了請愿書，抗議給我們不公正的待遇，并要求立即釋放我們，因為對我們的逮捕是非法的。

下午6點，我們分到了睡覺的席子和毯子。這些睡覺用具到底有多么臟，我們簡直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毯子上到處是血漬和嘔吐的污跡，爬滿了跳蚤、臭蟲和蟑螂，散發著臭水溝般的臭氣。

接近午夜的時候，有人讓我們等待召喚，我們不知道究竟為什么。有的人認為他們將釋放我們，有的人則比較冷靜一些。我是第一個被叫出去的人。我被帶到這座監獄的前門，在那里，當著一隊警官的面被短暫釋放。但是，沒等我離開，一位警官就高聲喊：

“叫什么名字？”

“曼德拉。”我說。

“納爾遜·曼德拉，”那個警官說，“我們根據緊急狀態令要逮捕你。”我們根本就不會被釋放，這時我才明白，我們被依據緊急狀態令再次遭到了逮捕。我們每人都只自由了幾秒鐘，隨之又被重新逮捕。在實施緊急狀態令之前，我們一直被非法拘押，現在緊急狀態令在午夜生效后就算是正式逮捕了。我們起草一個備忘錄交給警察局局長，要求知道我們的權利。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那個局長的辦公室。在那里，我見到了我的同事羅伯特·萊沙，他也被抓進了警察局，正在那里接受局長的訊問。當我走進屋內的時候，萊沙問那個局長，為什么提前逮捕曼德拉。他的回答方式是典型的白人方式：“曼德拉厚顏無恥。”我反擊說：“像你這樣的人，我什么時候也不會在你面前把手從衣袋中抽出來。”局長從椅子上跳起來想撒野，但很快被別的警察勸阻了下來。這時，特警偵探赫爾伯格中士走進辦公室高興地說：“你好啊，納爾遜！”我回敬道：“‘納爾遜’不是你可以叫的，我是曼德拉先生。”當我們被告知我們必須離開這里去比勒陀利亞接受叛國審判的時候，警察局局長的辦公室已經到了發生全面“戰爭”的邊緣。我哭笑不得，但是，在這次長達36小時的不公正對待期間，在宣布實行緊急狀態令的情況下，政府仍然決定讓我們回到比勒陀利亞，繼續對我們進行本來令他們失望而現在似乎又是不合時宜的叛國審判。于是，我們直接被押往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

35...

當法庭于3月31日在我們缺席的情況下重新開庭的時候，證人席上卻沒有人。當時，在場的只是警察在緊急狀態下漏捕的那些被告。魯圖利酋長一直沒有作完他的證言，法官拉姆頗福要求就他的缺席作出說明。有人告訴他，魯圖利在之前那個夜晚已經被逮捕。拉姆頗福對此表示氣憤，他說他不明白緊急狀態為什么要阻礙他的審判。他要求警察把酋長帶到法庭上，以便繼續讓他作證，為此，法庭延期開庭。

后來我們發現，酋長被抓之后曾遭到了毆打。當他被一名獄警推搡著上樓時，他的帽子掉在了地板上。他彎腰去撿帽子的時候，獄警抽了他耳光。這讓我們難以容忍。一個有尊嚴、有成就的人，一個終身信仰基督教的人，一個身患危重心臟病的人，竟然受到了一個不配給他提鞋的人的畜生般的對待。

當我們那天上午被喚回法庭的時候，法官拉姆頗福被告知，警察拒絕把魯圖利酋長帶到法庭上，法官于是宣布再推遲一天開庭。我們希望回家，但是，當我們離開法庭去找交通工具的時候，我們又都被逮捕了。

但是，警察由于通常那種無組織的過火行為而犯了個可笑的錯誤。被告之一、商會的長期領導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維爾頓·穆夸毅從伊麗莎白港趕到比勒陀利亞接受審判，他沒有和我們在一起。當他走到法庭門口的時候，發現自己的伙伴們又遭到了逮捕。他問一名警察發生了什么事，那個警察命令他離開，于是，維爾頓告訴那個警察說他就是一位被告。那個警察說他在說謊，并威脅說他阻礙執法，要把維爾頓抓起來。那位警察生氣地命令他盡快離開，于是維爾頓聳了聳肩走出了法庭大門。這是最后一次有人在法庭上看見他。隨后兩個月，他一直在地下工作，并成功地躲過了逮捕。后來他逃到了國外，很快以商會大會外國代表的身份重新露面，再往后，他去了中國，并在那里接受了軍事訓練。

那個夜晚，我們與德蘭士瓦其他地區的被拘留者會合在一起。全國范圍的警察襲擊導致2000多人未經審判就被投進了監獄。這些男女志士屬于各個種族和各個反對種族隔離的黨派。政府宣布征召新兵，調動軍隊到全國各個戰略地區進行駐防。4月8日，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都被依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宣布為非法組織。一夜之間，參加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成了重罪，不僅要被判處監禁，還要被罰款。繼續堅持參加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活動將被監禁10年以上。現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資助下的非暴力、法律允許的抗議也成了非法的活動，斗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說，我們都成了不法之徒。

在實施緊急狀態令期間，我們被監禁在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里，那里的裝備與紐蘭監獄一樣差。5個人為一組，被關在一間八九英尺見方的小屋子里。屋子里很臟，光線昏暗，通風也不好。我們5人共用一個掉了蓋的馬桶，睡覺用的毯子生滿了臭蟲，每天只被允許在屋外放風一小時。

在比勒陀利亞的第二天，我們派代表就監獄的條件問題向監獄長斯尼曼上校提出抱怨。上校的回答很粗野，他要求我們提供證據，說我們在撒謊。他污蔑說：“是你們從你們骯臟的家中把臭蟲帶進了我的監獄。”

我說，我們也需要一個安靜且亮堂的房間，以便為我們的案子做些準備。上校又傲慢地說：“政府規定，根本就不準犯人讀書。”盡管上校的態度十分傲慢，但是，囚室還是很快被粉刷并噴灑了除臭劑，我們也有了新毯子和馬桶。我們被允許白天在院子內有更長的放風時間，同時，還為我們叛國審判涉案人員提供了一個大房間，以便相互商量。在這個房間里，允許我們保留法律方面的書籍。

我們預料，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將成為我們的“家”。我們早晨離開監獄去受審，下午再返回監獄。監獄當局根據隔離規定，按種族膚色將我們隔離關押。我們當然已經不能與我們的白人同事關押在一起，但是，讓我們同我們的印度同志和有色同志也分別關押似乎有點犯神經病。我們要求一起生活，但是，監獄當局總是以種種理由予以拒絕。官僚作風的那種頑固性與種族主義的狹隘性夾雜在一起，其結果將是難以置信的。但是，監獄當局最后還是作了讓步，允許叛國審判涉案人員生活在一起。

盡管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的伙食待遇卻因種族不同而有差別。早餐，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飯菜數量基本相同，只是印度人和有色人多了半調羹糖，而我們非洲人則沒有糖。晚飯，食譜也基本一樣，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多給了4盎司面包，而我們非洲人卻沒有。這種區別的理由十分可笑，說非洲人吃不慣面包，或者更專業一點的解釋：非洲人不習慣吃西餐。白人的伙食比非洲人的伙食優越得多。監獄當局的膚色觀念非常強，就連供給的糖和面包，黑人和白人也不一樣：白人吃的是白糖、白面包；有色人和印度人吃的是棕色的糖和棕色的面包。

我們紛紛抱怨伙食質量上的等級劃分，結果，我們的辯護律師西德尼·肯特利奇在法庭上提出了正式的抗議。我聲明食物不適合人類食用，法官拉姆頗福同意當天親自抽查伙食的質量。玉米粥和大豆是監獄提供的最好的食物，同時監獄當局這次提供的大豆和肉湯也比往常多一些。法官吃了幾勺，然后說伙食做得很好、味道不錯。他確實也提出了改進的建議，那就是，飯菜應當趁熱供應。我們對關于提供“熱”監獄飯的想法感到好笑，因為這在詞義上就是矛盾的。最終，監獄當局為被監禁者提供了他們所說的改善了的伙食：非洲人有面包吃；印度人和有色人享受與白人同樣的食物。

我在監禁期間享有一種特權：周末可以回約翰內斯堡。這并不是監獄里的休假日，而是常規工作假日。在實施緊急狀態令前不久，奧利佛按照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指示離開了南非。我們早就預料到我們的組織將被取締，因此，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決定在被全面取締之前需要派部分人離開南非到國外加強組織建設。

奧利佛離開南非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采取的計劃最周全、最幸運的措施之一。當時我們就幾乎毫不懷疑，外交努力將會是至關重要的。根據他的智慧和冷靜、他的耐力和組織才能、他的領導能力和鼓動而不冒犯別人的感情的能力，奧利佛無疑是擔當這項使命的最佳人選。

動身之前，奧利佛請托我們共同的朋友——當地律師海彌·達維多夫，幫助我們律師事務所做善后工作。達維多夫向普林斯陸上校提交了專門申請，請他允許我周末去約翰內斯堡幫他做這些善后工作。上校一時慷慨，竟然同意了這個申請，允許我禮拜五下午去約翰內斯堡工作兩天，然后在禮拜一上午回比勒陀利亞出庭受審。每個禮拜五下午1點休庭后，克魯格中士和我就一起離開比勒陀利亞，到我的辦公室與達維多夫和我們的會計內森·馬庫斯一起工作。那些日子，我夜晚在馬歇爾廣場監獄坐牢，白天在辦公室工作。

克魯格中士，高高的個子，是一個儀表堂堂的人。他對我們很好，在從比勒陀利亞去約翰內斯堡的路上，他常常停下車讓我自己待在車內，而他則去商店為我們買干肉條、橘子和巧克力。我也曾經萌生跳車逃跑的念頭，特別是禮拜五人行道上和大街上行人很多，很容易逃之夭夭。

在辦公室工作的時候，我可以到樓下的咖啡館買一些零星物品，當溫妮偶爾來看我的時候，克魯格往往會扭過頭去假裝沒看見。我們之間似乎有一個君子協定：我不會逃跑給他帶來麻煩，而他會給我一定的自由。

36...

4月25日，即復庭前的那一天，伊斯雷爾·梅賽爾斯把我們召集在一起討論實施緊急狀態令對審判的嚴重影響。由于實施緊急狀態令，被告與我們的律師之間的相互溝通成為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的律師都住在約翰內斯堡，無法到監獄里與我們溝通，也就無法為我們的案子做辯護準備。他們常常駕車到比勒陀利亞，但是卻無法見到我們，就是能見到我們的時候，與我們的交流也會受到阻攔。更重要的是，梅賽爾斯說，根據緊急狀態令，已經被監禁的人僅僅由于出庭作證，就可以被再一次監禁，因為他們必然被列為“危險分子”，因此會遭到更嚴厲的懲處。而未被監禁的辯護證人如果現在出庭作證，也會有被逮捕的危險。

辯護班子建議，他們應撤出這個案子以示抗議。梅賽爾斯說明了這種撤出的重要用意和我們在死刑案中進行自我辯護的后果。他說，在這種敵對的氣氛中，法官可能決定判處我們更長的監禁時間。我們討論了這個建議，29名被告（當時，維爾頓·穆夸毅已經逃走）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見，同意在我們的律師不在的情況下，由杜馬·諾克韋和我擔當辯護律師打這場官司。我贊成這種高調的姿態，因為這樣可以揭露緊急狀態令的不公正。

4月26日，德蘭士瓦的第一號非洲辯護律師杜馬·諾克韋在法庭上發表了充滿強烈情感的聲明，宣布被告決定請辯護律師撤出本案。接著梅賽爾斯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不再有辯護委托在身，我們也將不再麻煩諸位先生。”隨后，辯護隊伍默默地走出了老猶太會堂。這個行動讓三位法官感到震驚，他們用強硬的措辭告誡我們，自己為自己辯護是危險的。但是，我們非常生氣，急于與政府較量一下。在隨后的5個月中，我們一直是自己為自己辯護，直到緊急狀態結束。

我們的策略很簡單，并且實際上也很有效：拖延時間，直到取消緊急狀態令，使我們的律師能夠重返法庭。這個案子拖得時間已經很長了，再往后拖似乎也沒有什么關系。實際上，這個策略相當富有戲劇性。根據法律，我們每個人現在都能名正言順地為自己辯護，并能為自己作證，而且，我們每個被告也理所當然地能對每個證人進行問詢。我們按審理中被告名字的字母順序進行排列，一號被告是德蘭士瓦印度人青年大會的法里德·亞當姆斯。法里德將讓二號被告海倫·約瑟夫做自己的第一證人。法里德對證人進行提問后，其余的27名被告都再向她提出質詢，然后，刑事庭還要對她進行質詢，最后，一號被告第二次對她進行質詢。亞當姆斯質詢完第一證人后，他將讓三號被告作證……整個程序將一直重復下去，直到每個被告都作完證為止。按照這樣的速度，我們的案子將無限期地拖下去。

在獄中為打官司做準備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這個案子中，我們就遇到了隔離政策的重重阻礙。所有的被告都需要相互見面溝通，但是，監獄按規定卻禁止男女之間、黑人與白人之間相互見面。因此，我們不能與海倫·約瑟夫、里昂·萊韋、莉蓮·恩高義和伯塔·瑪裟巴見面溝通。

作為被告的第一個證人，海倫需要在杜馬、我本人和法里德·亞當姆斯不在的情況下自己準備證詞，而我們也需要向她提出質詢。與監獄當局交涉后，我們被允許在非常嚴格的條件下進行相互溝通。海倫、莉蓮、里昂和伯塔被從她們各自的監禁室帶到非洲男子監禁區。首要條件是，白人和黑人之間、男人和女人之間沒有身體接觸。監獄當局豎起了一個鐵格子擋板，把海倫和里昂（都是白人）與我們隔開，然后又把海倫、里昂與莉蓮（非洲人）隔開，她們也參與了出庭準備工作。就是最優秀的設計師，設計這樣的結構也會感到頭疼。在監獄里，我們彼此被這種精心設計的金屬隔板隔開，而在法庭上，我們大家則可以自由溝通。

我們首先需要教會法里德熟悉法庭的禮節，同時，讓海倫演練證詞。為了幫助海倫，我扮演了法里德將要在法庭上擔當的角色。我用法庭通常采用的程式進行提問：

“姓名？”我問道。

“海倫·約瑟夫。”她回答。

“年齡？”

一陣沉默。我接著問：“年齡？”

海倫閉上嘴不說話。然后，她緊皺眉頭對我不滿地說：“納爾遜，我的年齡與案子有什么關系？”

海倫長得很可愛，也很有勇氣，不過她也有專橫的一面。她是一位到了一定年齡的女性，對年齡十分敏感。我向她解釋說，記錄證人的有關情況如姓名、年齡、地址和出生地是法庭的慣例。一個證人的年齡可以幫助法庭權衡他所作證詞的分量，從而影響對被告的量刑。

我繼續問：“年齡？”

海倫較上了勁。“納爾遜，”她說，“我在這里不回答這個問題，到法庭上再回答。我們還是往下問吧。”

然后，我又問了她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可能在法庭上被問及的問題。我的提問方式對她來說可能太真實了一些，因此，海倫有時回頭問我：“你是曼德拉還是檢察官？”

我們還有其他一些令人開心的時刻，有時甚至十分令人鼓舞。

我被允許在周末探望海倫·約瑟夫，給她送去關于法律程序的記錄。利用這些機會，我能夠與其他被監禁的女士見面，把她們作為可能的證人，與她們一起商量案情。我對白人女獄警一向很誠懇，同時也發現她們對我去女監禁室探望被監禁的女士很感興趣。那些女獄警絕不可能知道還有黑人律師或醫生這種存在，因而把我當做異邦人。但是，隨著我們之間的逐步熟悉，她們對我越來越友好和放心。我與她們開玩笑說，如果她們要打官司，我將愿意受理她們的案子。我明白，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杰出的、受過教育的白人女性與一個黑人男士討論重大問題可以淡化她們的種族歧視意識。

有一次，我正在與海倫進行長時間的談話，我轉身對按照要求坐在我們旁邊聽我們兩人談話的女獄警說：“對不起，我們進行這么長時間的談話一定讓你很厭煩。”“不。”她說，“你們一點也沒有讓我厭煩，我對你們的談話很感興趣。”我能看出，她已經進入了我們的話題之中，偶爾她還會給我們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議。我把這件事看作這次審判帶來的一種額外的收獲。這些女獄警大多不知道我們為什么被關進監獄，她們逐漸開始明白我們為什么進行戰斗，為什么甘愿身先士卒冒牢獄之險。

這正是國民黨為什么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融合的原因所在。只有抱有黑人威脅論并且不了解黑人的想法和主張的白人，才支持國民黨這種荒謬的種族歧視哲學。在這種情況下，相互了解帶來的將不是歧視而是理解，甚至最終會帶來種族和諧。

在獄中，令人愉快的時刻并不能彌補令人悲傷的時刻。我在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坐牢的時候，有時溫妮被允許來獄中探視，每次她都帶著澤尼來。當時，澤尼剛剛學會走路和說話。如果獄警允許，我會把她抱在懷里吻她幾下。探視將要結束的時候，我會把澤尼遞給溫妮。當溫妮說再見的時候，獄警會讓她們母女離開監獄，這時澤尼常常要我與她們一起走，從她那迷惑不解的小臉上，我能明白她不理解我為什么不能與她們一起離開監獄。

在法庭上，法里德·亞當姆斯熟練地引領著海倫完成了她的主要證詞。他常常與法官們爭執不下，完全稱得上是三位法官的對手，有時還會比法官高出一籌。我們當時的精神十分振奮，因為我們不再是靠玩填字游戲打發時間的被告。當被告輪流對證人提出質詢的時候，三位法官和起訴檢察官才第一次領略到這些被告的真正才干。

按照南非法律，既然我們是在最高法院，那么，杜馬作為一名辯護律師就是唯一被允許直接向法官陳述意見的律師。我作為一名律師可以向他提供指導，但不允許直接在法庭上辯護，其余的辯護人也是如此。我們采取正確的策略辭退了我們的辯護律師，這樣一來，被告就可以在辯護律師不在的情況下直接向法庭陳述自己的意見。當我向法庭陳述自己的意見的時候，拉姆頗福企圖阻止我，他打斷了我的講話。“曼德拉，你要明白這個事實，”他說，“諾克韋先生作為辯護律師是唯一被允許向法庭陳述意見的律師。”我回敬說：“閣下，那很好。只要你準備付給諾克韋先生律師費，我們都準備遵守這個規定。”此后，再也沒有人反對我們任何一個被告向法庭陳述自己的意見。

當法里德向海倫及之后的其他證人提問的時候，杜馬和我分別坐在他兩側給他提示，幫助他應付出現的法律問題。總體來說，他不需要很多的提示。但是，有一天，當他處于連續不斷的壓力下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每隔幾秒鐘就小聲向他提出一次建議。法里德似乎很擔心，杜馬和我準備的材料都用完了，因此，法里德沒同我們商量就請求法官向后延期，說他感到很疲勞。法官拒絕了他的請求，說那不是延期的充分理由，并重申在我們的律師撤出時曾向我們提出的警告。

那天下午，我們回到監獄的時候沒有人唱歌，大家都垂頭喪氣地坐在那里。我們中間正在潛伏著一場危機。一回到監獄，就有一小部分人要求召開會議，我把所有的男被告都召集起來。來自伊麗莎白港的商人J.恩卡佩尼帶頭對我進行指責。他在反抗運動期間曾經幫助過反抗戰士的家屬。

“馬迪巴，”他喊著我的氏族名字以示尊敬，“我要求你告訴我們，你為什么把我們的辯護律師都給辭退了。”我提醒他說，辯護律師并不是被哪個人辭退的，他們的撤出是經過大家同意的，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但是，我們怎么知道法庭的審理程序，馬迪巴？”他說，“我們完全依靠你們這些律師。”

還有一些人，他們也有與恩卡佩尼相同的憂慮。我告誡他們，思想不一致是危險的。我說，我們干得很不錯，今天的事情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挫折，我們還將會遇到更大的困難。我們的案子遠遠不是一個法院與一伙觸犯法律的人之間的司法審判，而是力量的證明，是道義與非道義力量之間的較量。我說，我們擔心的不是我們的辯護律師的法律技巧問題，更讓我們擔心的是其他問題。于是，大家的爭議逐漸平息了。

海倫·約瑟夫被多次質詢后，三號被告阿邁德·卡特拉達開始陳述他的案情。正是在凱西的第二個證人，即四號被告、有色人大會的執行委員斯坦雷·羅蘭作證期間，總理沃爾沃德宣布取消了緊急狀態。政府絕對沒有打算長期實行緊急狀態，他們當時認為，緊急狀態已經成功地扼殺了解放斗爭。這時候，我們的辯護律師回來了，盡管我們又在監獄里待了幾周，但是，我們都感到松了一口氣。5個多月來，我們一直被關押在獄中，并在我們的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仍然出庭應訴。

8月3日，我本人開始出庭作證。我感覺通過為別人準備證言，自己的準備工作做得很充分。在經歷了三年的沉默、被禁止和國內流放之后，我盼望有機會在想要審判我的法官面前申訴冤情。在我作主要證詞期間，我竭力宣傳種族間相互調和妥協，并重申非洲人國民大會承諾進行非暴力斗爭。在面對通過逐步改革能不能實現民主這樣的問題時，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們要求實行成年人普選，并且準備通過從經濟上施加壓力實現我們的要求。我們將發動反抗運動、家中靜坐，或采取個人行動，或采取集體行動，直到政府說：“先生們，我們不能把事情搞成這個樣子，法律遭到了踐踏，是在家中靜坐制造了這種局面，讓我們坐下來談一談。”按照我的觀點，我會說：“對，讓我們坐下來談談。”政府會說：“我們認為歐洲人現在對非歐洲人可能當政的政府沒有準備。我們認為，我們應該給你們60個席位，由非洲人選出60名代表參加議會。我們將把這個問題拖上5年的時間，5年后我們再來重新討論這個問題。”我想，那就是一個勝利，我們將采取重要措施，爭取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獲得成人普選權，那么，我們將在5年中停止公民抵抗活動。

政府決心證明我是一個危險的、制造暴力的共產主義分子。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或共產黨員，但我也不想使自己看上去像是在疏遠我的共產黨盟友。盡管我可能會因為發表這樣的觀點而再次身陷囹圄，但是，我毫不猶豫地重申，共產黨人已經給予了我們巨大的支持。有一次，法庭問我是否認為南非可以選擇一黨執政，我回答說：

閣下，這不是一個形式的問題，這是一個有關民主的問題。如果通過一黨制可以最好地體現民主，那么我也會認真考慮這個主張。但是，如果多黨制能夠最好地體現民主，那么我會認真考慮多黨制。例如，在這個國家，我們現在就是一種多黨制，但是，對非歐洲人而言，這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邪惡的專制政治。

當拉姆頗福法官犯了與那么多南非白人在普選權問題上所犯的同樣的錯誤時，我與他爭執了起來。他們的主張是，要盡到這種責任，選民必須是“受過教育的人”。對于一個思路狹隘的人來說，很難搞清受過教育的人不僅僅是指有文化修養的人和擁有學士學位的人，也很難搞清一個沒有上過學的人可能是遠比擁有高學位的人更“有素質”的選民。

拉姆頗福：一個什么也不知道的人參加一個國家的政府有什么意義？

納爾遜·曼德拉：閣下，如果沒有上過學的白人投票又會發生什么事情？

拉姆頗福：難道他們在選舉領導人時所發揮的影響還不如孩子們大嗎？

納爾遜·曼德拉：不，閣下，這就是實際上正在發生的情況。一個人站出來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競爭一個席位，他起草了一份聲明，說“這是我的想法”。如果是在農村地區，他說，“我反對限養牲畜”。那么，聽聽這個人的想法，如果你選他當議員，你就要確信這個人將會代表你的權益，在這個基礎上你才投票選他當候選人，這與教育沒有任何關系。

拉姆頗福：他只關心他自己的利益？

納爾遜·曼德拉：不，你要考慮到他能不能以最好的方式表達你的觀點，如果能，就投票選他。

我告訴法庭，我們相信，我們可以通過非暴力和人數上的優勢實現我們的要求。

我們心里想，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有可能實現這些要求。就是從歐洲人自己的情況看，盡管他們對我們存有偏見和敵意，但是，他們不會永遠無視我們的要求，因為我們將用經濟政策打擊他們。歐洲人不敢對這個問題掉以輕心。他們必須作出回應，閣下，他們也正在作出反應。

緊急狀態令是在8月份的最后一天取消的。在5個月中，這是我們第一次回家。當約翰內斯堡的人聽到取消緊急狀態的時候，他們立即開車到比勒陀利亞，因為他們預料到我們可能會被釋放。當我們被允許離開監獄的時候，我們受到了親屬朋友們的熱烈歡迎。溫妮已經來到了比勒陀利亞，我們的重新團圓令我們非常高興。我已經有5個月沒有和我的夫人在一起生活，5個月沒有見到我夫人的笑臉。5個月以來，我第一次躺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覺。

一個人蹲過監獄后，他對生活中的小事情就會很感激：愿意什么時候散步就去散散步，走進商店買份報紙，或講話或保持沉默。其實，都是些自己說了算的簡單行動。

即使是取消緊急狀態令之后，叛國審判還是又進行了7個月，直到1961年3月29日才結束。從各個角度說，這些日子對被告來說都是光榮的，因為我們自己的人民無所畏懼地堅持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羅伯特·萊沙有力地批駁了政府的謬論，說什么非洲人國民大會想引誘政府使用暴力，這樣，我們就可以也還以暴力。格特·西班德雄辯地向法院陳述了非洲農民的悲慘生活。德高望重的伊薩克·本蒂已是81歲高齡，是一位非洲土著傳教教堂的世俗教士。他對我們為什么選擇在家中靜坐而不選擇罷工作了充分說明。

10月份，令人敬畏的馬修斯教授被要求做我們最后的一位證人。他在證人席上表現得從容不迫，把檢察官視為需要嚴加管教的沒有素養的學生。面對傲慢的檢察官，他常常使用這樣的語言：“你要我說的是，你們所說的那次講話是一個鼓動暴力的講話，代表著我們的組織政策。而我要說的是，第一，你們的論點是不正確的；第二，我不想說這句話。”

他用漂亮的語言說明，非洲人民知道非暴力斗爭會承受苦難，但是，我們之所以選擇非暴力斗爭，是因為我們把自由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他說，為了擺脫壓迫，人民愿意承擔最大的苦難。馬修斯站在被告席上，辯護在高調中結束。他作完證后，肯尼迪法官與他握手，并表示希望能在好一些的環境下再次與他見面。

37...

取消緊急狀態令之后，全國執行委員會在9月份秘密召開了會議，討論將來的形勢和對策。雖然我們在審判期間就曾經舉行過討論，但是，這是我們舉行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政府正在加緊武裝，不僅從組織外部對我們形成威脅，也從組織內部對我們形成威脅。我們不會聽任政府取締我們的組織，而是在地下繼續進行斗爭。我們不得不暫時放棄非洲人國民大會章程規定的關于舉行全國大會、支部會議和公共集會的民主程序。為了與未被取締的大會組織保持聯系，必須創建新的組織結構。但是，新的組織結構都被認為是非法的，參加新的組織結構的人將有被捕和被關押的危險。執行委員會及其附屬組織將不得不嚴格周密地進行組織，以適應非法斗爭的環境。出于需要，我們解散了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和婦女聯合會。有人強烈反對這些調整，但是，我們現在是非法組織，是不得已而為之。對于參加組織活動的人來說，政治斗爭的潛在危險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危險。

盡管“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已經關門停業，但是，我繼續盡可能地做各種法律工作。許多同事都準備開辦律師事務所，他們紛紛派人或打電話邀請我入伙，但是，我寧愿多數時間在科爾瓦德房產大街13號阿邁德·卡特拉達的平房內工作。盡管我的律師事務所已經停業，但是，我作為律師的聲譽并沒有消失。很快，13號平房和外面的走道上都擠滿了訴訟當事人，凱西回家后不得不躲到廚房里才能享有安靜。

在此期間，我幾乎忙得連飯都顧不上吃，更是很少有時間回家。我經常在比勒陀利亞一直工作到深夜，或者匆忙趕回約翰內斯堡處理別的案子。當我真的與家人一起坐下來吃一頓晚飯的時候，電話鈴也往往會忽然響起，我又不得不匆忙離開自己的家。溫妮又懷了孕，她以無限的耐心忍受著一切。她希望她的丈夫在她分娩的時候能在醫院陪伴她，但是，事實卻讓她很失望。

在1960年圣誕節休息期間，我得知馬卡托在特蘭斯凱生了病。他在那里讀書，我不顧自己正處于被禁止的境地，趕到特蘭斯凱去看他。我開了一夜的車，除了加油沒停過車。馬卡托需要動手術，我決定把他帶到約翰內斯堡進行治療。回來時又開了一夜的車，把他送到他母親的住處，然后為他安排住院接受手術治療。當我回到家的時候，我得知溫妮已經分娩。我趕忙去了布里奇曼紀念醫院的非歐洲人分院，發現溫妮和新生女兒已經被安排住在那里。新生女兒很好，但溫妮的身體卻非常虛弱。

我給我的新生女兒取名津澤斯娃，她是以科薩桂冠詩人塞繆爾·木卡伊的女兒命名的。在我去希爾德頓讀書之前，塞繆爾的詩句曾一直鼓舞著我。當這位詩人經過很長時間的外出周游之后回到家中的時候，發現他的夫人生了一個女孩。他不知他夫人懷孕的事，認為這個女孩是別的男人的孩子。按照我們的風俗，當一個女人分娩后，丈夫10天之內不準進入夫人的房間。這位詩人十分生氣，他沒有遵循這個風俗，拿著長矛氣沖沖地闖進他夫人的房間，想把夫人和孩子一起殺死。但是，當他看見那個嬰兒的時候，發現她長得非常像自己，于是就又縮了回去，并說了聲“u zindzile”，意思是“你長得太像我了”。于是，他給女兒取名津澤斯娃（Zindziswa），也就是他說過的那句話。

38...

最高法庭用了一整個月的時間對叛國案進行最終結案。最終結案常常由于法官的提問、指出爭論中的問題而中斷。3月份，輪到我們了。伊斯雷爾·梅賽爾斯直截了當地駁斥了暴力指控。“我們承認存在不合作和消極反抗的問題，”他說，“我們非常坦誠地說，如果不合作和消極反抗也構成高級叛國罪，那么我們就是有罪的。但是，不合作和消極反抗顯然不屬于叛國罪。”

對于梅賽爾斯的論點，布拉姆·費希爾繼續進行辯論。但是，3月23日，法官中斷了布拉姆的結論性辯論。我們還有幾周的辯論時間，但是，法官要求休庭。這是不正常的。但是，我把這次休庭當做一個有希望的信號，因為，休庭說明法官已經形成了他們的觀點。6天后，我們將再回到法庭，我們認為到那時將被正式判決。同時，我還有其他工作要做。

我受到的禁止處罰預計在休庭后兩天期滿。幾乎可以肯定，警察當時并不知道這件事，因為他們很少注意禁止什么時候期滿這件事。到那時，我將在近5年以來第一次可以自由離開約翰內斯堡，自由參加會議。我們早就計劃那個周末在彼得馬里茨堡舉行聯盟會議，目的是鼓動全體南非人參加全國憲章大會。我被秘密指定為會議的主講人，因此必須在發表講話前的那天晚上驅車300英里趕到彼得馬里茨堡。

我動身前的那天，全國工作委員會秘密召開了會議，討論斗爭策略問題。在監獄內外召開了許多會議之后，我們決定轉入地下開展工作，按照曼氏方案開展斗爭。整個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也將在暗中開展活動。我們決定，一旦我們被宣告無罪，我將立即轉入地下，在全國范圍內組織提議中的全國代表大會。當時，只有轉入地下工作的人才不會受到敵人強加限制的影響。組織決定讓我在某些事件中露面，希望公開的程度最大化，以說明非洲人國民大會仍然在戰斗。這個建議對我來說并不感到奇怪，我也并非特別喜歡這樣做。但是，我知道這是我必須要做的事情。這是一項危險的使命，我將離開我的家人。但是，當一個人被剝奪了他所信奉的生活的權利之時，他就沒有了別的選擇，只能成為一個違法者。

當我開完會回到家的時候，溫妮似乎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一看我的臉色，她就知道我準備過我們兩人都不想要過的一種生活。我向她說明了情況，第二天我將離開自己的家。她對此很坦然，似乎已經早有預料，非常理解我必須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必須做的那些事情并沒有讓她有任何更安心的地方。我讓她為我準備了一個手提箱，并告訴她，我走后，朋友和親屬會照顧她，但是沒有告訴她我將在外面待多久，她也沒有問。這并不令人感到遺憾，因為，我也不知道答案。我將回到比勒陀利亞，聽候禮拜一的判決。無論什么結果，我都不會再回家：如果我們被判有罪，我將直接走進監獄；如果我們被判無罪，我將立即轉入地下。

我的大兒子泰姆比在特蘭斯凱的一所學校里讀書，所以我無法向他說一聲再見。但是，那天下午我把馬卡托和我的大女兒馬卡紫薇從奧蘭多東他們母親那里接出來。我們一起過了幾個小時，一起在城外散步，交談和玩耍。我向他們說了再見，我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再見到他們。自由戰士的孩子們也知道不向他們的父親提太多的問題，從他們的眼神里我能明白他們知道要發生重大的事情。

在家中，我吻別了兩個小女兒，當我與威爾遜·康考一齊上車的時候，她們向我揮手致意，我們將開始去納塔爾的長途跋涉。

來自全國各地的1400名代表聚集在彼得馬里茨堡參加聯盟大會，他們代表著150個不同宗教、不同階層、不同文化、不同政治的團體。當我于3月25日禮拜六晚上走上演講臺，面對忠誠而熱情的聽眾的時候，我受到了大家的熱烈歡迎。我已經接近5年不能自由地在公眾講臺上發表講話了，我幾乎忘記了在大庭廣眾面前發表講話所經歷的那種激情。

在講話中，我號召成立全國大會，通過這個大會，所有的南非人，不分黑人和白人，也不分印度人和有色人，將以兄弟般的關系，坐下來共同創造一個能夠代表整體國家的國體。我號召大家精誠團結，我們將是戰無不勝的。

聯盟大會要求全國代表大會從所有的成年人選出的代表中在平等的基礎上成立一個全國大會組織，以便為南非制定一部全新的、無種族歧視的民主憲法。會上選舉產生了一個全國行動理事會，選舉我擔任名譽書記，并就這個要求與政府溝通。如果政府不同意召開這樣的代表大會，我們將號召全國人民在5月29日舉行三天大罷工，同時宣布在南非建立共和國。當時，我對政府同意我們的建議并不抱任何幻想。

1960年10月，政府進行白人投票表決，決定南非是否應該變成一個共和國。這是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者長期抱有的一個理想，為了拋棄與這個國家的聯系，他們在英布（英國人與布爾人）之間的戰爭中浴血奮戰。贊成成立共和國的觀點贏得了52%的選票，確定在1961年5月31日宣布成立共和國。我們在宣布成立共和國的那天，開始了以家中靜坐為形式的全國罷工，表明我們認為這樣的變化僅僅是在做樣子。

會議一結束，我立即給總理沃爾沃德發了一封信。在信中，我正式要求他召開一個全國立憲大會。我警告他，如果不召開這樣的大會，我們將在全國舉行三天最大規模的罷工，并且罷工將在5月29日開始。“我們對于你的政府可能采取共和制不抱任何幻想，”我在信中寫道，“在最近12個月中，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個黑暗時期。”我還發表了緊急聲明，宣布罷工采取和平的、非暴力的家中靜坐形式。沃爾沃德除了在議會中把我的信描繪成“傲慢無禮”以外，并沒有作任何答復。政府反而開始顯示其在南非歷史上從來未曾有過的最嚇人的力量。

39...

1961年3月29日早晨，沒等老猶太會堂開門，一大群支持者和新聞記者就擠了進來。這天是期待已久的叛國案宣判的日子。有數百人被拒絕進入宣判大廳。當法官宣布開庭時，觀眾席和記者席都已經擠滿了人。當拉姆頗福法官用木槌敲響最后的判決之時，政府提出了一個特別申請，要求對控告書進行更改。此時已是11時59分，已是最后的時刻，這個請求整整遲到了兩年。法庭拒絕了這個請求，而聽眾席上開始嘀咕著表示同意。

“法庭內保持肅靜！”維持秩序的官員高聲說，拉姆頗福宣布三名法官組成的宣判小組已經達成了判決意見。此時，法庭一片寂靜，拉姆頗福用他那低沉而平靜的聲音重申了法庭的結論。是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想用“激進的、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取代現政府；是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在抵抗運動期間確曾采用非法手段進行抗議；是的，某些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發表講話，鼓動群眾使用暴力；是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具有很強的左翼傾向，具體表現在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西方、贊成蘇維埃的態度上，但是——

根據提交給本法庭的所有證據和我們發現的事實真相，本法庭不可能得出非洲人國民大會采用了暴力政策推翻現政府，即發動群眾直接使用暴力反對政府的結論。

法庭認為，控方沒有證據證明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共產主義組織，或者證明《自由憲章》就是向往共產主義國家。于是拉姆頗福法官宣布：“由于發現被告無罪，因此他們將被釋放。”

觀眾席上的旁聽者爆發出一陣歡呼聲。我們站起身來，相互擁抱，向沉浸在歡樂中的人們揮手致意。然后，我們步入法院的大院內，有的臉上露出燦爛的微笑，有的放聲大笑，有的歡呼雀躍。當我們出現在群眾當中的時候，大家一起高興地歡呼。我們被告中有些人把我們的辯護律師高高地舉了起來。把伊斯雷爾·梅賽爾斯舉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他身材很魁梧。我們周圍到處都是閃光燈，我們四處張望，想從人群中找到朋友、妻子和親屬。溫妮走了過來，我高興地把她擁抱在懷里，盡管我知道，雖然此時此刻我也許是自由的，但是，我將不能享受這種自由。當我們大家一起走出法院大院的時候，叛國審判庭里的人都開始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政府在法庭上費了4年多時間，指派了幾十個起訴人，提供了數以千計的文件和數以萬計的證詞，但是他們的目的并沒有得逞。判決結果對政府來說是十分尷尬的，在國內和國外都丟了面子。但是，這樣的結果只能使政府對我們更加仇視。他們所吸取的教訓不是冤枉了我們，而是要對我們采取更加無情的打擊。

我不認為這次判決說明這個法律體制本身是正確的，或者說，它證明黑人在白人的法庭上能討到公道。它不過是唯一的一次正確判決而已，從很大程度上說，它是優秀的辯護隊伍和審判班子秉公斷案的結果。

這個法庭可能是南非唯一的讓非洲人能夠有公正聽證并仍能夠采用法律規定的地方。在一個合眾黨提名的、由開明的法官主持下的法庭上，這一點尤為真實。因為，這些人中的多數仍然能夠堅守法律的規定。

作為一名學生，我一直受到這樣的教育：南非是一個法治國家，法律適用于每個人，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職位高低。我由衷地相信這一點，并且按照這個信念對我的人生作了安排。但是，我作為律師和社會積極分子的生涯卻使我擦亮了眼睛。我發現，課堂上教的與法庭上學的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我從認為法律是一把正義之劍的理想主義觀點，轉變為認為法律只是統治階級用來維護自己統治的一個工具。盡管我為正義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并且有時我也得到過正義，但是，我絕不會期待在法庭上能得到正義。

在叛國審判中，法官超越了他們的偏見、教育和背景。人的身上有一種善良的傾向，這種傾向可以被埋沒或隱藏，也可以出乎意料地顯現出來。拉姆頗福法官，以他的冷淡態度在整個審理期間給大家留下了與少數白人統治者有相同的觀點的印象。但是，最后判決時，一種基本的正義感主導了他的審判。與他的同僚相比，肯尼迪并不太保守，他似乎受到了平等思想的影響。例如，有一次他和杜馬·諾克韋乘坐同一航班從德班飛往約翰內斯堡，當航空公司開往城里的公共汽車司機拒絕杜馬乘坐的時候，肯尼迪也拒絕乘坐那輛公共汽車。法官比克總是給我胸懷坦蕩的印象，并且似乎知道坐在他面前的被告在政府手中遭受了許多痛苦。我是從這三人的個人角度來評價他們的，并不是把他們當做法庭或政府或他們所屬的種族的代表，而是把他們當做反逆流的人類行為的榜樣。

法官比克的夫人是一個對別人的需要很敏感的人。在緊急狀態期間，她曾募集物資援助被告。

但是，政府蒙受恥辱的失敗之后，決心不再讓這種失敗重演。從那天起，他們不再打算依靠那些不是自己指派的法官。他們也不準備奉行他們認為的那些法律上美好的東西，例如，保護恐怖主義者或允許被判決的服刑者在監獄里有一點權利等。也就是說，在叛國審判期間，沒有什么人曾受到隔離、拷打和折磨等形式逼供，而所有這一切在判決之后不久都將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

# 第六部 黑色的海綠花

40...

判決后，我并沒有回家。盡管別人的心情像過節一樣，急于慶祝一番。但是我知道，當局隨時隨地都可能發動襲擊，而我不想給他們留下襲擊的機會。我急于在被禁止或逮捕前脫身，當天夜里我住在了約翰內斯堡一棟安全的房子里。那是一個睡在陌生床上不安寧的夜晚，每輛汽車的鳴叫聲都會讓我擔驚受怕，認為可能是警察來抓我。

瓦爾特和杜馬把我送上路，這次的目的地是伊麗莎白港。在那里，我將與戈萬·姆貝基和雷蒙德·穆拉巴見面，并探討新地下組織結構問題。我們在馬斯拉·帕澤醫生的家里見了面，馬斯拉·帕澤后來因為允許我們在他家里會面而被判監禁了兩年。在組織上安排的一所安全房子里，我會見了自由派報紙《伊麗莎白港晨報》的一位編輯，與他討論了全國代表大會運動問題，目的是贏得另外幾家報社的支持。我后來又拜訪了帕特里克·鄧肯，他是自由派周報Contact的編輯和出版人，也是自由黨的創始人和反抗運動期間第一個白人志愿反抗者。他的報紙一直譴責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由共產黨人控制，但是當他見到我的時候，他說的第一件事卻是仔細閱讀叛國審判記錄使他糾正了錯誤觀念，他將在他的報紙上對這些錯誤觀念進行更正。

那天夜里，我在開普敦召集的非洲人鄉鎮牧師會議上講了話。我之所以提及這次會議，那是因為有一位領禱牧師幾年來一直與我在一起，可以說是我困難時期的力量支柱。他感謝上帝的慷慨、仁慈、憐憫和對全人類的關心。但是，他當時也以自由的名義提醒上帝，他的子民中的某些人正在被另一些人蹂躪，而上帝對這個事情似乎沒有給予注意。那位鄉鎮牧師后來說，如果上帝不在引導黑人得到拯救時表現得更積極一點，黑人將不得不依靠自己拯救自己，阿門！

在開普敦的最后那個上午，我要在南非有色人組織的創始人之一喬治·皮克的陪同下離開賓館，我對賓館的有色人經理表示感謝，因為他對我照顧得非常好。他非常和善，不過也非常好奇。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告訴我有色人社團擔心在非洲人執政后，他們將和現在在白人執政下一樣受壓迫。他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生意人，可能與非洲人接觸不多，因此，擔心黑人也會和白人一樣壓迫他們。這種擔心在一部分有色人社團中很普遍，特別是在開普地區。盡管時間已經不早，但我還是向這位經理介紹了《自由憲章》，并強調我們承諾不搞種族歧視。一個自由戰士必須抓住每一個機會向人民宣傳自己的主張。

第二天，我在德班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與大會運動聯合執行委員會一起召開的秘密會議，討論即將采取的行動是否應該采用完全徹底的、配以罷工糾察隊和游行示威的罷工形式。堅持采取罷工形式的委員說，我們自1950年就采用的在家中靜坐的斗爭策略經歷的時間已經太長了，在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正在吸引群眾的形勢下，采取更具有戰斗性的形式是必要的。我贊成另一種觀點，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在家中靜坐可以打擊敵人，同時又可以防止敵人對我們反撲。我堅持認為，人民的信心在我們的運動中得到了提高，因為他們認識到了我們并不是不顧他們的生命。我說，在沙佩維爾由于示威者的英雄主義，使敵人打死了我們的人。我堅持采取在家中靜坐的方式，盡管我知道全國人民對消極反抗已經不耐煩，但是，我認為不應該沒有全面策劃就脫離我們已經驗證過的斗爭策略，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采取更具有戰斗性的罷工形式。最后，大家一致決定采取在家中靜坐的形式進行罷工。

生活在地下需要經歷一種地震式的心理轉換。你必須對每個行動進行計劃，不管行動是小還是看似不重要，因為當時沒有什么事情是完全無罪的。一切都不確定，你不能自己左右自己，必須完全適應你所承擔的任何任務。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對一個南非黑人來說，不僅僅是適應的問題。因為按照隔離法，黑人本就過著一種陰影般的生活，生活在合法與非法、公開與隱蔽之間。做一個南非黑人就意味著不相信任何事情，這與一輩子生活在地下沒什么不同。

我變成了一個夜間活動的生靈。白天躲在隱蔽的地方，天一黑就出來做我的工作。我主要是在約翰內斯堡活動，不過根據需要我也會到其他地方。我住在空蕩蕩的公寓里，在民居中間，哪里沒有人、哪里不引人注意就住在哪里。盡管我是一個喜歡社交的人，但是我更喜歡孤獨，我希望有自己左右自己的機會，自己做計劃、自己思考、自己謀劃。不過，我孤獨得有點過分，令我十分想念我的夫人和家人。

在地下的關鍵是讓別人看不見。正如走進房間時可以使你十分顯眼一樣，你也完全能夠在走路和行動時使自己不被別人注意。作為一個領導人，他要經常拋頭露面；但作為一個亡命之徒，卻又不能這樣做。在地下工作的時候，我走路時不能挺胸，站立時不能直腰。我說話的聲音要低，且不能說得清清楚楚。我要更低調、更少管閑事，我也不刮胡子、不理發。我偽裝最多的是司機、廚師或“園藝工”。我身上穿的是工地上工人穿的藍色工作服，并且常常戴著沒有鏡框的茶色眼鏡。我有一輛汽車，并且有一頂與我的工作服配套的司機帽。裝扮司機更為方便，因為我可以找借口開著汽車外出。

在頭幾個月里，當局簽發了抓我的逮捕證，警察到處追捕我，我的潛逃生活使媒體產生了許多猜測，常常在頭版頭條發表文章，說我藏在什么什么地方。全國各地都設立了道路檢查站，但是，警察總是空手而歸。有人給我送了一個綽號，叫“黑色海綠花”。這個綽號有某種貶義，來源于奧希茲男爵夫人的虛構人物——紅色的海綠花。在法國革命時期，他曾驚險地躲過了對他的一次次追捕。

我秘密地在全國各地活動：在開普與穆斯林在一起，在納塔爾與制糖工人在一起，在伊麗莎白港與工廠里的工人在一起。我走遍了全國各地的鄉鎮，夜間在各地參加會議。我甚至帶上滿滿的一口袋三便士硬幣通過電話亭給新聞記者打電話，傳播有關我們的計劃和警察如何無能的故事，滿足人們對黑色海綠花的神話需求。我會突然出現在這里或那里，使警察感到煩惱，人民卻感到高興。

有許多關于我在地下活動的傳奇故事，人們喜歡美化勇敢者的傳說。我確實有過幾次險中逃脫的經歷，但卻沒有人知道。有一次，我正駕駛汽車在城里行駛，遇到紅燈后停在了路口。我看見左邊相鄰的轎車內坐著威特沃特斯蘭德警察局的斯彭格勒上校。對他們來說，這是逮捕黑色海綠花的最好機會。我頭戴工作帽，身穿藍色工作服，眼睛上掛著我的茶色墨鏡。他們竟然沒有認出我來。盡管我在那里等信號只等了幾秒鐘，但我感覺似乎等了幾小時。

有一天下午，我在約翰內斯堡裝扮成一個司機，身上穿著長風衣，頭上戴著司機帽，正在一個僻靜處等候接我的汽車。我發現一個非洲人警察大步朝我走來，我環視了一下周圍的情況，看是否有逃跑的可能。但是，沒等我逃跑，那個警察卻沖著我微笑，并暗暗地向我行了個非洲人國民大會豎拇指禮就走開了。像這樣的危險我遇到過多次，每當我遇見這種情況的時候，我更加確信，許多非洲人警察是忠誠于非國大的。有一天，一個黑人警察中士偷偷告訴溫妮，一定不要讓馬迪巴在星期三夜里住在亞歷山大，因為警察將在當天夜里發動襲擊。在斗爭期間，黑人警察常常受到嚴厲批評，但是，他們多數人都起到了極其寶貴的暗中保護的作用。

在我進行地下活動的時候，我盡可能地不修邊幅。我的工作服看上去就像是一個苦力穿了一輩子的工作服。警察為我畫了一張留著長胡子的像，并廣泛張貼。我的同事催促我把胡子刮掉，但是，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正因為人們認不出來，所以有時我可能會受到冷落。有一次，我計劃到約翰內斯堡遠郊參加一個會議，一位著名牧師安排他的朋友留我在那里住宿。我到達門口時，沒等我說明我是誰，在門口的那個老太太驚叫著說：“不，我不讓你這樣的人來這里！”并趕快關上了門。

41...

我在地下工作的時間主要用于策劃5月29日的罷工。政府與解放組織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戰爭態勢。5月末，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對反抗組織的領導人進行了襲擊。禁止召開會議、沒收印刷物品，議會草草通過立法，警察對沒有繳納保釋金的被指控人員可以關押12天，從而使合法的行動也遭到打擊。

沃爾沃德宣布，支持罷工的人，包括對罷工有同情心的媒體是在“玩火”，這是一個不祥的宣言，充分暴露了政府的殘酷無情。政府敦促工業界為工人提供睡覺的地方，這樣，工人在罷工期間就不必回家。在舉行罷工的前兩天，政府舉行了南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閱兵式。軍隊實施了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最大規模的調防，警察取消了節假日，軍隊封鎖了城市的出入口。撒拉森坦克在市區污濁的街道上隆隆行駛，直升機在空中盤旋，一旦發現有人集會就俯沖下來把人群驅散；到夜間，直升機在住宅區不斷地打著探照燈。

在舉行罷工幾天之前，我們廣泛地印發了英文宣傳品。但是，罷工前卻有人把這些宣傳品撕碎，敦促工人去上班。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扮演了破壞者的角色，他們散發了數千份傳單，號召人們抵制罷工，并把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污蔑為膽小鬼。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行動使我們感到震驚。有問題可以批評，我們也可以接受，但是，企圖通過直接號召人民去上班和為敵人服務來破壞罷工，這是我們萬萬不能接受的。

在舉行罷工前的那個夜里，我們計劃在索韋托的一座安全的房子里與約翰內斯堡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班子一起召開會議。為避免遭遇警察在路上設置的路卡，我從克利波頓進入索韋托，因為那里通常沒有警察巡邏。但是，當我繞進一個偏僻的角落時，卻正好撞上了我設法避免的路卡。一位白人警察示意讓我停車，當時我穿的是一身普通工作服，頭上戴的是司機帽。他瞇著眼睛透過車窗仔細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走過來親自對我的汽車進行搜查。通常，這都是黑人警察干的活。他沒有發現什么可疑的東西，然后又讓我出示通行證。我告訴他說，我的通行證遺忘在了家中，不過我能背出號碼，于是我故作漫不經心的樣子編造了個號碼背給他聽。這似乎讓他很滿意，并最終放我通行。

5月29日是禮拜一，那天是罷工的第一天，成千上萬的人冒著失業和失去生活來源的危險拒絕去上班。在德班，印度工人走出了工廠；在開普地區，數以千計的有色工人在家中靜坐；在約翰內斯堡，有一半以上的雇員待在家中；在伊麗莎白港，參加罷工的人數就更多。我對人民群眾的這種反應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贊美我們的人民“敢于藐視政府史無前例的恫嚇”。白人組織的共和國日慶祝活動被淹沒在了我們的罷工浪潮之中。

盡管有關第一天罷工的報道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是，人民對這次罷工的反應總的來看并沒有我們預想的那樣強烈。通信和交通都很困難，而且壞消息總是比好消息傳播得快，隨著報道越來越多，我感覺有些失望。那天晚上，我的情緒非常低落，也感到很生氣。我與《蘭德每日郵報》的本杰明·博格蘭德進行了交談，交談中我建議結束非暴力斗爭。

在罷工的第二天，在與我們的同事進行商量之后，我號召停止罷工活動。那天上午，在市郊白人居住區的一所公寓內，我會見了本地和外國媒體的記者，我再次聲明，這次舉行的在家中靜坐是一個“巨大的勝利”。但是，我毫不掩飾地認為，新的一天將要到來。我說：“如果政府作出的反應是用赤裸裸的武力鎮壓我們的非暴力斗爭，我們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們的策略。在我的心目中，我們正在翻過非暴力政策這一歷史篇章。”這是一個莊嚴的聲明，并且我知道，我將受到執行委員會的批評，因為我未經組織討論就發表了這樣的講話。但是，有時為了把組織推向你希望的方向，你就必須站出來。

1960年初以來，關于使用暴力的辯論就一直在進行。早在1952年，我與瓦爾特·西蘇陸第一次討論了武裝斗爭問題。現在，我又一次與他討論這個問題。并且，我們一致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著手采取新的斗爭策略。共產黨已經秘密地重新設立了自己的地下組織，現在正在考慮組建自己的軍隊。我們決定要在工作委員會上提出武裝斗爭的問題，于是，在1961年6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我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剛一提出建議，就遭到摩西·考塔尼的反對。他是共產黨的書記，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中是最有勢力的人物之一。他指責我沒有認真考慮這個建議，說我中了政府的計，被政府的行動嚇壞了，因此在絕望中企圖乞求于革命的語言。他強調：“如果我們有豐富的想象力和足夠的勇氣，我們仍然有采用老的斗爭方式的余地。如果我們采納曼德拉的建議，我們無異于把無辜的人民交給敵人進行屠殺。”

摩西能言善辯，我明白是他使我的建議遭到了失敗。連瓦爾特都不站在我的立場上說話，我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后來，我與瓦爾特交換了意見，吐露了我受到的挫折，責備他沒有站出來幫我說話。他笑著說，如果那樣做，將是如同與怒獅的傲慢爭高低一般愚蠢。瓦爾特是一個有外交手腕的人，很有心計。“讓我安排摩西單獨來見你，”他說，“那樣，你就可以陳述你的意見。”我當時在地下，但是，瓦爾特設法把我們兩人安排在市區內的一個房子里見了面，我們談了一整天。

我坦誠地說明了我認為除了轉向暴力沒有別的選擇的原因。我引用了一句非洲俗話：“Sebatana ha se bokwe ka diatla。”（打野獸不能赤手空拳）摩西是一個老共產黨員，我告訴他，反對暴力斗爭就像巴蒂斯塔當政下的古巴共產黨。古巴共產黨堅持認為，如果條件尚不成熟，只能等待時機的到來，因為他們教條地遵循了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卡斯特羅沒有等，他使用了暴力，于是他勝利了。如果你教條地等待條件成熟，那么這些條件永遠也不會產生。我直截了當地告訴摩西，他的觀點仍然是非洲人國民大會作為一個合法組織的舊模式。人民已經做好了組建自己的軍隊的準備，能夠領導他們的只有非洲人國民大會。我們總是讓人民走在我們的前面，現在仍然如此。

我們交流了一整天，最后，摩西對我說：“納爾遜，我不向你許諾任何事情，但是，你可以在工作委員會內部再次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我們看看會發生什么情況。”我們在一周內就召開了會議，會上我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這次，摩西沒有發言，會議形成了一致意見，讓我向德班的全國執行委員會提出建議。瓦爾特露出了微笑。

與當時所有非洲人國民大會會議一樣，德班執行委員會會議需要秘密地在夜間召開，以躲避警察的襲擊。我預料將會遇上困難，因為魯圖利酋長也要參加這次會議，我知道他一貫從道義上主張非暴力斗爭。我也為這個建議不合時宜而擔心：叛國審判剛剛結束，我就提出采用暴力問題，而在法庭上我們已經聲稱，對于非洲人國民大會，非暴力是一個不可違背的原則，而不是一個根據條件變化而變化的策略。而我本人則認為恰恰相反，非暴力是一個策略，當它不再有保留價值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放棄它。

在會上，我堅持認為政府不給我們選擇的余地，只有選擇使用暴力。我說，讓我們的人民別無選擇地以和平方式面對政府的武裝鎮壓是錯誤的，也是無道義可言的。我再次重申，人民已經決定拿起武器，不管我們發動他們與否，暴力斗爭都會開始。難道我們按照反對壓迫、拯救生命的原則領導暴力斗爭對人民還有什么不好嗎？我說，如果我們現在不帶頭使用暴力，我們很快就要掉隊，整個運動也將會失去控制。

酋長開始時反對我的觀點。對于他來說，非暴力不僅僅是一種策略，而且也是一個原則問題。但是，我做了一整夜的工作去說服他，因為我相信他心里知道我們是正確的。他最后同意，采取軍事行動是不可避免的。當有人含沙射影地說，可能酋長對于這樣一條路線沒有思想準備時，他反駁說：“如果有人認為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那就讓他惹惹我試一試，他將知道他是多么的錯誤！”

全國執行委員會正式認可了工作委員會的初步決議。酋長和其他人都認為，我們應該以非洲人國民大會還沒有對它進行討論這樣一個態度去對待這個新的決議，因為他不想危及沒被取締的聯盟組織的合法性。他的想法是，采取軍事行動應該成立獨立的機構，這個機構與非洲人國民大會有聯系，并屬于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的一個部門，但是，它可以基本保持獨立。我們將保持兩種獨立的斗爭方式，我們愿意接受酋長的建議。酋長和其他人都告誡我們，不要把這個新的局面當做忽視組織基本任務和傳統斗爭方式的借口。忽視組織的基本任務和傳統斗爭方式將由于武裝斗爭成為運動的核心而造成失敗，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是如此。

第二天夜里，在德班召開了聯合執行委員會會議。出席單位有印度人大會、有色人人民大會、南非商業工會和民主黨人大會。盡管這些組織一般都會接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決議，但是我知道，有些印度同事將會努力反對轉入暴力斗爭。

會議開頭就不吉利。會議主持人魯圖利酋長宣布，盡管非洲人國民大會通過了采用暴力斗爭的決議，但是，“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我希望與會的同事們今天把它作為一個新的問題進行研究”。顯然，魯圖利酋長并不完全接受我提出的新路線。

我們晚上8點開始開會，會上爭論得很激烈。我仍然堅持我一貫堅持的觀點，但是，許多人都持保留態度。玉蘇福·凱查利亞和奈克醫生請求我們不要堅持這個路線，他們認為這樣政府就會扼殺整個解放運動。J. N.辛格是一個能說會道的雄辯家，他那天夜里講的話仍然在我耳邊回響。“非暴力沒有讓我們吃敗仗，”他說，“而我們卻讓非暴力吃了敗仗。”我反駁說，事實上非暴力使我們吃了敗仗，因為，我們的非暴力并沒有阻止住政府的暴力，或者說沒有改變我們的壓迫者們的心腸。

我們爭辯了一整夜。第二天凌晨，我開始感到我們的爭論有了進展。當時，許多印度領導人對結束非暴力仍然持失望態度。但是，南非印度人大會的成員M. D.奈杜忽然開了口，他對印度同事們說：“啊，你們是害怕蹲監獄，僅僅如此而已！”他的話在會上引起一片嘩然。當你對一個人的忠誠提出疑問的時候，你可能會面臨一場戰斗。整個論戰似乎成了一個沒有答案的未了之局。不過，到天快亮的時候，大家終于想出了一個辦法。聯盟大會授權我先行一步，組建一個新的軍事組織，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保持相互獨立。非洲人國民大會將仍然保留非暴力的斗爭策略。為了組建這個軍事組織，我被授權優先挑選人才，想和誰合作就和誰合作，需要和誰合作就和誰合作，并且可以不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直接控制。

這是具有決定性的一步。50年來，非洲人國民大會把非暴力作為一個基本原則，不容置疑，也不容辯論。從此之后，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是一個與以前完全不同的組織。我們走上了一條新的、更危險的道路，一條有組織的軍事斗爭道路，其結果我們不知道，我們也無法知道。

42...

我從來沒有當過兵，從來沒有打過仗，也從來沒有朝敵人開過槍。但是，組建軍隊的任務卻落到了我的頭上。這對于一個退役的將軍來說也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更何況是一個軍事新手。這個新組織取名為“Umkhonto we Sizwe”（民族長矛軍，又譯為“民族之矛”），或縮寫為MK。我們之所以以長矛命名這個軍事組織，是因為幾個世紀以來非洲人一直用這種簡陋的武器抗擊白人的入侵。

盡管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執行委員會不允許白人參加，但是，民族長矛軍并沒有這個限制。我立即招募喬·斯洛沃和瓦爾特·西蘇陸一起組成最高指揮班子，我在這個班子內任主席。通過喬，我招募了白人共產黨員入伍，這些人早就決心使用暴力，并且已經開展了諸如切斷政府的通信線路等破壞活動。我們還招募了杰克·霍奇森和拉斯迪·波恩斯坦參加行動，他們兩人都是共產黨員。杰克曾經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并且是“跳羚軍團”的成員，他成了我們的第一位爆破專家。我們的任務就是開展針對政府的暴力活動，但到底開展什么樣的暴力活動還有待于研究決定。我們的意圖是對個人的打擊要盡可能小，而對政府的打擊則要盡可能大。

我從自己唯一能干的事情著手干起，例如幫助專家查查資料或者動動嘴什么的。我要學習發動革命的基本原理，我發現這方面有很多資料，并首先閱讀了現成的論述武裝戰爭，特別是游擊戰爭的文獻。我想弄明白什么樣的環境條件適合開展游擊戰爭，如何創建、訓練和維持一支游擊戰爭隊伍，如何對這支游擊隊伍進行武裝，物資供給從何處來，這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問題。

我對一切原始資料都很感興趣。我閱讀了古巴共產黨總書記布拉斯·羅卡的報告，這個報告是關于他們在巴蒂斯塔當政期間作為一個非法組織的斗爭經歷。在德尼斯·賴茨所寫的《突擊隊》一書中，我學習了英布（英國人－南非白人）戰爭期間布爾將軍們的游擊戰術。我閱讀了切·格瓦拉、毛澤東、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著作和關于他們的書籍。在埃德加·斯諾的光輝著作《紅星照耀中國》中，我發現是毛澤東的決心和非傳統思想把他引向了勝利。我閱讀了梅納赫姆·貝京寫的《起義》一書，并被這位以色列領袖在一個既沒有高山又沒有森林、情況與我們類似的國家里領導游擊隊的事跡所鼓舞。我渴望詳細了解埃塞俄比亞人民反對墨索里尼的武裝斗爭，以及肯尼亞、阿爾及利亞和喀麥隆游擊隊的武裝斗爭情況。

我研究了南非的過去，學習了白人入侵前后的南非歷史，探討了非洲人與非洲人之間、非洲人與白人之間、白人與白人之間的戰爭。我調查了南非的主要工業區、國家的運輸系統和通訊網絡，積累了詳細的地圖資料和對全國不同地區的地形分析資料。

1961年6月26日，我給南非新聞媒體發了一封信，贊揚了人民群眾在最近的罷工期間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并再一次號召召開全國立憲大會。我又一次發表聲明，如果政府不舉行這樣的大會，我們將在全國發動不合作運動。這封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我得知政府簽發了逮捕證，警察正在到處搜捕我。全國行動委員會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充分、認真的研究……勸我不要自首，我接受了這個勸告。我將不會向我不承認的政府自首，任何嚴肅的政治家都會發現，在南非現在的條件下，通過向政府自首自尋無謂的犧牲就是幼稚和犯罪……

我選擇了這條比坐等勝利更加艱難、更有風險的道路，我不得不離別我親愛的妻子、兒女、母親和姊妹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當一個違法者。我不得不像我們許多人正在做的那樣，關閉自己的生意、放棄自己的職業、在貧困中生活……我將與你們一起向政府宣戰，一英寸一英寸、一英里一英里地向前進，直到最后取得勝利。你們打算干什么？你們能不能與我們在一起？或者，你們想不想與殘酷鎮壓你們的人民的政府合作？難道你們打算在關系到人民生死存亡的問題上保持沉默和中立？我自己已經作出了抉擇。只有通過艱難、犧牲和軍事行動才能獲得自由。斗爭是我的生命，我將繼續為自由而戰，直到結束我的生命。

43...

在轉入地下后的頭幾個月，我在商業大街上的一戶人家中住了幾周。此后，我又在伯里亞與沃爾菲·克代士一起住在地下的單身公寓里，那里是距離市區很近的一個白人居住區。沃爾菲是一個民主黨人大會的成員，也是《新時代》的記者。他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北非和意大利打過仗。他的戰爭知識和親身戰斗經驗對我幫助很大。在他的建議下，我閱讀了普魯士將軍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經典著作《戰爭論》。克勞塞維茨的中心思想是：戰爭是外交通過其他手段的繼續，這個思想正好與我的感覺相吻合。我依靠沃爾菲為我搜集閱讀資料，但我又擔心會因此影響他的生活，打擾他的工作和休閑。但是，他是一位熱情好客且十分謙虛的人，從來沒有抱怨過。

我睡在一張行軍床上，幾乎在他的公寓里住了兩個月。白天躲在里面，通過百葉窗透進的光線進行閱讀和籌劃，召開會議則要到夜間進行。我每天早晨都會打擾沃爾菲的美夢，因為我通常5點起床并換上運動服原地跑步一個多小時。沃爾菲終于被我的養生之道所觸動，開始在早上去上班前與我一起鍛煉。

民族長矛軍當時正在訓練起爆技術。一天夜里，我陪沃爾菲到城郊的一個舊磚場去試驗起爆裝置。這要冒生命危險，但是我堅持要參加民族長矛軍的第一次爆炸裝置的試驗。在磚場里，爆炸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因為在用大機器將黏土鏟起并送進制磚機之前，要用炸藥把黏土炸松。杰克·霍奇森帶來了一個用馬口鐵桶灌入炸藥制成的爆炸物，并用圓珠筆內芯做成了一個起爆裝置。那天夜間一片漆黑，我們只有一個小小的照明裝置，我站在一旁看著他操作。準備就緒以后，我們退到遠處，并開始讀秒計時。當數到30秒的時候，裝置發生了爆炸，揚起了許多塵土。爆炸很成功，我們迅速返回車內并四散逃離現場。

在伯里亞，我感到很安全。我從不外出，因為這里是白人居住區，警察大概不會到這里來搜捕我。我白天在這個公寓里讀書的時候，常常在窗臺上放一品脫牛奶，讓它慢慢發酵并變酸。我很喜歡這種酸奶，科薩人把它叫做“阿瑪西”，并譽之為一種衛生營養食品。制作酸奶很簡單，僅僅把鮮牛奶放在露天的地方，讓它酸化即可。牛奶會變稠、變酸，很像酸乳。我甚至還讓沃爾菲品嘗了一下，但是，他只嘗了一口就露出了難咽的苦相。

一天晚上，沃爾菲回來后，我們正在公寓里閑聊，忽然聽見有人在窗子附近談話。我能聽出是兩個非洲人用祖魯語談話，但無法看到他們，因為窗簾是拉上的。我示意沃爾菲不要出聲。

“那個窗臺上怎么會有‘我們的牛奶’？”其中一人說。

“你說什么？”另一個人問。

“窗臺上有酸奶——阿瑪西，”他說，“這是干什么？”然后是一陣沉默。那個眼尖的家伙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只有黑人才這樣把牛奶放在窗臺上，黑人怎么住在白人區？我當時就意識到我需要換地方了，于是，在第二天夜里我就搬到了另一個地方藏身。

我住進了約翰內斯堡市內的一個醫生家里，夜間睡在傭人居住間里，白天在醫生的書房里工作。白天有人來的時候，我會躲進后院，假裝是園藝工。然后，我又在納塔爾的一個甘蔗種植園住了大約兩個禮拜，與一群非洲勞工及其家屬一起住在一個名叫湯加特的小社區內，那里離德班的海邊不遠。我住的是一個家庭旅館，假扮成一個受政府指派來評估土地的農業示范員。

組織上為我配備了農業示范員用的工具，我每天都要檢查土壤和做試驗。我對我所做的工作幾乎一竅不通，然而，我并不認為自己是在欺騙湯加特的老百姓。但是，這里的人多數都是農場工人，自然有辨別能力，他們沒有打聽我的身份，甚至當他們看見夜里有人開著轎車來到他們的社區，而且有些來人是當地的政治家時，他們也不打聽我是何方人士。我常常夜里開一整夜會，白天睡一整天覺，這對于一個農業示范員來說是很不正常的。盡管我潛心于別的事情，但是我感覺與這個社區有一種親近感。我禮拜天去教堂做禮拜，享受猶太復國主義基督教牧師們使人怦然心動的老式祈禱聲。在我即將離開教堂的時候，我向一位年長者表示感謝，感謝他對我的關照。他說：“千萬別客氣，但是，Kwedeni（年輕人），請告訴我，魯圖利酋長要干什么？”我被嚇了一跳，但是，我很快回答了他的提問：“你最好是親自去問他，我無法替他回答。但是，根據我的理解，他要我們的土地重歸我們，他要我們的國王重新當政，他要讓我們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過我們自己的日子。”

“他沒有軍隊怎么辦？”那個年長者問。

我很想告訴那位老人，我正在忙著組建軍隊。但是，我不能說。那位老人的感傷鼓舞了我，同時，我也擔心別人已經發現了我的使命。我在一個地方待的時間又太長了。第二天夜里，我又像到這里來的時候一樣，悄悄地離開了這里。

44...

我的下一個住處是立里斯里夫農場。這里與其說是藏身之處，倒不如說是一個避難之所。它坐落在利沃尼亞，是位于約翰內斯堡北部的一個小牧場，我是10月份搬到那里去的。那時候，利沃尼亞主要由小農場組成。那里的農舍和家庭用具都是由政府購置的，目的是讓那些在地下工作的礦工有個安身之處。當時，我住的是一個需要整修的老房子，沒有人在里面居住。

我假扮成一個給主人看管房子的男傭住進了那所房子。我化名大衛·莫扎馬義，這是我以前的一個訴訟委托人的名字。在農場里，我穿一身簡樸的藍工作服，這是非洲男傭通常穿的衣服。白天，這里有許多工人，其中有建筑工和油漆工。他們正在對原有的主要房間進行維修和擴建。我們要求增加幾個小房間，以便讓更多的人居住。工人們都來自亞歷山大城，他們稱我“服務生”或“小伙子”（他們從來沒有問過我的名字）。早晨，我為他們準備早餐；上午和下午，我為他們準備飲料。他們也派我的公差，讓我在農場里干些活，或者要我去掃地或收拾垃圾。

一天下午，我告訴他們，我在廚房里為他們準備了茶水。他們進了廚房，我把盛有杯子、茶、牛奶和糖的托盤依次端到他們面前。他們每人取了一個杯子，開始動手調制飲料。當我托著盤子來到在大家中間講故事的一個人跟前的時候，他端起了一個杯子。他只注意講故事，而沒有注意看我。他一邊講，一邊在空中揮動著茶匙，把茶匙當成了講故事的道具，而沒有用茶匙去取糖往茶中放。我幾乎在他跟前站了好幾分鐘，最后，我有些不耐煩，于是就走開了。這時他注意到了我，高聲說：“服務生，回來，我沒說讓你離開。”

許多人都描繪了一幅反映非洲社會人人平等的理想主義畫圖，我基本上同意這種描繪，但同時也認為，事實上非洲人之間并不總是能夠相互平等對待。在為城市非洲居民引入白人社會的社會地位觀方面，工業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對那些人來說，我是一個下等人，一個男仆，一個沒有正事可干的人，并因此而遭人藐視。我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他們沒有人懷疑我是他們的仆人。

每天太陽落山的時候，工人們就各自回他們自己的家，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一直獨自一人居住在那里，我喜歡這些寧靜的時間。但是，多數晚上我都是離開這里去參加會議，直到半夜才回來。在這么晚的時間，回到我不太熟悉的并且假冒他人的名字非法居住的地方，這常常使我感到不安。我記得有一天夜里，當我似乎看見有人藏在灌木叢中的時候，我感到心驚肉跳。但是，我仔細觀察后卻沒有發現什么異常。一個地下自由戰士往往連覺都不能安安穩穩地睡上一次。

數周后，我在這個農場里見到了雷蒙德·穆拉巴，他是從伊麗莎白港到這里來的。雷蒙德是一位堅定的商業工會會員，他是開普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也是一位共產黨黨員，而且是第一個在反抗運動中被捕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他被非洲人國民大會選拔為第一批民族長矛軍的軍人。他來這里的目的是準備動身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軍事培訓。當時，和他一起去中國的還有另外三個人。我們恢復了瓦爾特1952年帶回來的聯系渠道。雷蒙德與我在一起待了兩周，比較詳細地向我介紹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在東開普地區出現的問題。在起草民族長矛軍章程時，我吸收了他的意見。我們也與喬·斯洛沃和拉斯迪·波恩斯坦進行了會晤，他們兩人都參加了民族長矛軍章程的起草工作。

雷蒙德走后，我與邁克爾·哈邁爾進行了短時間的接觸。他是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關鍵人物，是民主黨人大會的創始人之一，也是《解放》雜志的編輯。邁克爾是一位杰出的理論家，他當時正在研究共產黨的策略，需要有一個寧靜而安全的地方，以便全力以赴地進行這一研究工作。

白天，我與邁克爾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如果一個白人專業人士與一個黑人家庭仆人經常在一起談話將會十分引人注意。但是在夜間，等工人們都走后，我們就會在一起就共產黨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的關系進行長談。有一天夜里，我出席了一個會議，很晚才回到農場。此時只有我一個人住在那個房子里。我確信房子的門都已經上了鎖，所有的燈也都已經關上了。我十分小心，因為一個黑人半夜三更開著車進入利沃尼亞會引起意想不到的問題。但是，我忽然發現房子里的燈又被打開了，當我走近那個房子時，聽見里面有收音機在響著。房子的前門是開著的，我走進房內，發現邁克爾已經在床上睡著了。我為這一安全隱患而感到氣憤，于是我把他推醒并告訴他：“伙計，你怎么開著燈和收音機就睡著了！”他睡得昏頭昏腦的，非常惱火。“納爾遜，你非得打擾我睡覺嗎？有事能不能明天再說？”我說不行，這是個安全問題，我對他的松懈行為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在這之后不久，阿瑟·戈德里克和他全家作為正式租住戶搬進了這所房子，我換了一處新建的家庭工住房。阿瑟的存在為我們開展活動提供了一種必要的掩護。他是一個專業藝術家和設計師，也是民主人士大會的成員，并且還是民族長矛軍第一批軍人。警察對他的政治傾向不甚了解，因此，他從來沒有受到過質詢和襲擊。20世紀40年代，阿瑟曾經與巴勒斯坦的猶太國民運動軍事組織帕爾馬赫一起戰斗過。他熟悉游擊戰，幫助我填補了許多知識上的空白。阿瑟是一個十分活潑的人，因而為農場帶來了一種歡快的氣氛。

最后一個加入農場正規組織的人是杰利曼，他是一個友好的、退休了的白人，也是解放運動組織的一位朋友，他成了這個農場的工頭。杰利曼從塞庫庫尼蘭找來了幾個年輕工人，這里很快像南非的其他小農場一樣興旺起來。他不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但是，他忠誠、賢明，并且工作非常努力。我曾經為他做早飯和晚飯，而他總是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很久以后，杰利曼曾冒著生命危險勇敢地幫助過我。

農場最有生氣的時候，是我夫人和家人來看我的時候。有一次，戈德里克全家都住在農場，溫妮利用周末來看我。我們對她到這里來作了認真安排，計劃讓她搭乘一輛車到某個地方下來，然后再搭乘另一輛車，最后再來到農場。后來，是她自己開車帶著孩子們一起來的，她盡量選擇一些迂回路線行駛，警察并沒有跟蹤她。

在這些周末，時間有時似乎凝固了，因為我們假設這些偷著在一起的時光是屬于我們正常生活以外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們在立里斯里夫比在家中更清靜。孩子們可以到處跑著玩，我們在田園詩般的幻境中，不管時間有多么短，但總是十分安全。

溫妮帶給我一把老式氣槍，這是我在奧蘭多保存下來的。阿瑟和我有時用它練習打靶，或者在農場里打野鴿子。有一天，我正在房前的草坪上瞄準棲息在一棵高樹上的一只麻雀，阿瑟的夫人黑茲爾·戈德里克正在盯著我，并開玩笑地說，我絕不會打中目標。但是，她的話音沒落，那只麻雀就被打落在地上。我轉身準備自我吹噓一番，這時候，戈德里克的兒子保爾眼睛里含著淚對我說：“大衛，你為什么打死那只鳥？它的母親會十分悲傷。”我的心情立即由驕傲變成了恥辱，我感覺這個小孩比我更仁慈。對于一個新生游擊隊的隊長來說，那是一種說不出的感情。

45...

在策劃民族長矛軍的發展方向和行動方式時，我們考慮了四種暴力活動：破壞、開展游擊戰爭、搞恐怖活動、公開進行革命。對于一支規模很小而羽翼未豐的軍隊，開展公開的革命戰爭是不可想象的。搞恐怖活動不可避免地會給活動者帶來不好的名聲，從而引起公眾的反感。開展游擊戰爭具有可能性，但是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不愿意采取暴力。我們趨向于采取對個人傷害最小的暴力形式，即破壞。

因為，破壞不會導致人員死亡，體現了以后實現種族和解的最好愿望。我們不想在黑人和白人之間埋下血海深仇。英布戰爭已經過去了50年，南非白人與英國人之間的仇恨卻仍然很深；如果我們發動一次國內戰爭，那么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種族關系將會是個什么樣子？破壞活動還有另外的好處，那就是需要的人力最少。

我們的策略是選擇軍事駐防地、發電廠、電話線和交通樞紐進行突然襲擊。目標不僅是破壞政府的軍事有生力量，而且要對國民黨的支持者產生威懾作用，嚇跑外國資本，削弱經濟實力。我們希望通過這個策略把政府推上談判桌。我們向民族長矛軍成員下達了嚴格的指令，不準造成人員傷亡。但是，如果破壞不能產生我們需要的結果，我們將轉向第二階段：開展游擊戰爭和恐怖活動。

民族長矛軍采用了親本式的組織結構。最上層是全國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之下在各省設立地區司令部，地區司令部之下是地方武裝。全國各地都建立了地區司令部。像東開普這樣的地區司令部，一般擁有50支以上的地方武裝。最高司令部確定戰略戰術和總體目標，并負責軍事培訓和財政事務。在最高司令部確定的架構中，地區司令部有權選擇當地的襲擊目標。民族長矛軍成員被嚴禁進行武裝軍事行動，無論如何不準危及生命。

我們早期碰到的一個問題是忠于民族長矛軍與忠于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的區分問題。我們的大多數軍人都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而且都是地方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的積極分子。但是，我們發現，一旦參加民族長矛軍，他們就停止了他們以前所做的地方工作。地方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的書記發現，有些人不再參加地方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的會議。他可能會走近一位軍人說：“伙計，你昨天晚上為什么沒參加會？”那位軍人會說：“哦，我參加了另外一個會議。”

“什么會？”書記問。

“哦，我不能說。”

“我是你的書記，難道你不能告訴我？”不過，書記會很快發現這個軍人具有另一種忠誠。出現了一些誤會之后，我們決定，如果我們從某一個地方支部吸收一位民族長矛軍戰士，必須告訴該支部的書記，他的會員現在加入了民族長矛軍。

12月份，在一個溫暖的下午，我正坐在立里斯里夫農場的一間廚房里，從收音機里收聽到魯圖利酋長在奧斯陸的頒獎儀式上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政府給了他12天的簽證時間，讓他離開南非去奧斯陸領獎。我們全體官兵都非常高興。首先，這是對我們開展斗爭的承認，也是對酋長作為這次斗爭的領導人和個人成就的承認。它說明，西方承認我們的斗爭是正義的斗爭，是被大國忽視了太久的斗爭。這個獎項對國民黨人是一個公開的打擊，國民黨人的宣傳媒體把魯圖利描繪成了一個危險的、煽動鬧事的共產主義陰謀家。布爾人對此目瞪口呆，因為這個獎對他們來說，正是西方自由主義者一反常態并對南非白人有偏見的例證。宣布這個獎項的時候，魯圖利酋長正處于5年被禁止期的第3個年頭上，他只能在納塔爾的斯坦格地區活動。他身體不怎么好，患有心臟病，記憶力也很差。但是，這個獎項讓他感到高興，也讓我們大家感到高興。

這個榮譽來得不是時候，因為，我們同時發布了似乎令這一獎項本身存在疑問的通告。魯圖利從奧斯陸回來后，民族長矛軍富有戲劇性地宣布誕生了。在民族長矛軍最高司令部的號召下，12月16日凌晨，自制炸彈在約翰內斯堡、伊麗莎白港和德班的發電廠及政府辦公地點紛紛爆炸。這一天正是南非白人習慣上慶祝打敗丁岡的日子。我們的一位戰士在行動中因疏忽而被炸死，他名叫皮特勒斯·莫萊福，是犧牲的第一位民族長矛軍戰士。在戰爭中死亡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參加民族長矛軍的每一位軍人都知道，他隨時都有可能被號召獻出自己的生命。

在實施爆炸的同時，新的民族長矛軍宣言也被印成傳單散發到全國各地，宣布民族長矛軍的誕生。

今天，民族長矛軍有計劃地實施了針對政府設施的攻擊，特別是那些與隔離政策和種族歧視相關的設施。民族長矛軍是非洲人新成立的、獨立的軍隊，這支軍隊由南非各種族組成……民族長矛軍將采取新的方式為自由和民主進行斗爭，這是對已確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必要補充……

在任何一個民族的生活中，都可能會面臨著只有兩種選擇：投降還是戰斗。現在，南非正面臨這樣的選擇。我們將不會投降，我們唯一的選擇是采取一切手段，盡力保衛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未來和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民族長矛軍一貫堅持通過和平方式獲得解放，這與解放運動的目標是一致的。雖然為時已晚，但我們仍然希望我們的第一次行動將喚醒每個人，讓大家認識到國民黨人的政策正在導致一種災難性后果。我們希望，政府及其支持者能夠及時地醒悟，以便在問題發展成內戰之前使政府及其政策都發生改變……

我們選擇12月16日采取軍事行動是有原因的：南非白人要在這一天慶祝1838年在血河戰役中打敗了偉大的祖魯領袖丁岡這一歷史事件。丁岡是沙卡的同母異父兄長，當時他統治著非洲最強大的酋長國，他的統治范圍甚至延伸到林波波河（也叫鱷河）以南。那天，南非白人的子彈遠遠勝過了祖魯軍隊的長矛，附近河里的水都被祖魯人的血染成了紅色。南非白人把12月16日作為他們打敗非洲人的勝利日，是上帝站在他們一邊的明證，因而進行慶祝；而非洲人卻把這一天作為南非白人屠殺他們人民的哀悼日。我們之所以選擇12月16日，是為了表明非洲人的戰斗剛剛開始，而正義和炸彈都在我們一邊。

爆炸使政府感到震驚。他們把這種破壞行動譴責為極大的犯罪，同時嘲笑這一行動是愚蠢的外行人所為。這次破壞行動也使南非白人意識到，他們正坐在火山口上。南非黑人認識到，非洲人國民大會不再是一個消極反抗組織，而是刺向白人政權心臟的一桿鋒利的長矛。我們計劃在兩周后的除夕夜再次實施一系列的爆炸，爆炸聲與鐘聲和報警的汽笛聲混合在一起，似乎不僅與迎接新年不相和諧，而且這種聲音象征著我們的自由戰爭進入了新的時代。

民族長矛軍的聲明激怒了邪惡無情的政府，對我們進行空前的反攻倒算。當時，特警部隊的第一任務就是抓捕民族長矛軍成員，他們不遺余力地執行著這一任務。我們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會停止采取行動；而他們也向我們表明，任何事情也不會讓他們放棄搜尋民族長矛軍戰士，他們把民族長矛軍戰士看作他們生存的最大威脅。

46...

當溫妮來看我的時候，我曾抱有一個幻想，不管相聚是多么短暫，總認為家庭仍然完整無缺。隨著警察的警惕性越來越高，她來的次數也越來越少，溫妮有時會把津澤和澤尼帶到利沃尼亞，但是，兩個孩子太小，不知道我正在到處躲藏。馬卡托當時11歲，已經懂事，他被告知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暴露我的真實姓名。我相信，他會以他自己的方式為我的身份保守秘密。

但是，有一天，快過年了，他正在農場與阿瑟11歲的兒子尼古拉斯·戈德里克一起玩耍。溫妮給我帶來了一本雜志——《鼓》，馬卡托和尼古拉斯一起玩的時候忽然發現了這本雜志，他們于是就翻閱起來。然后，他們忽然發現里面有我在轉入地下前拍下的照片。“那是我爸爸！”他驚喜地說。尼古拉斯不相信。他越不相信，馬卡托就越想證明他說的話是實話。馬卡托然后告訴他的小朋友，我的真實姓名叫納爾遜·曼德拉。“不對，你父親叫大衛。”尼古拉斯反駁說。然后尼古拉斯跑到他母親的面前問我的名字是不是大衛。她回答說：“是，他父親是叫大衛。”尼古拉斯然后對他母親說，馬卡托告訴他，他父親的真名是納爾遜。這句話引起了黑茲爾的警覺。我很快也知道了這件事，我又一次意識到我在這個地方待的時間太久了，但是，我并沒有立即離開農場，因為再過一周多的時間，我將離開農場去執行一項任務，執行這項任務會使我去一個只是夢想過的地方。現在，斗爭的需要將第一次把我送出我的祖國。

12月份，非洲人國民大會接到東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運動組織的邀請，去參加1962年2月在亞的斯亞貝巴舉行的會議。東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運動組織后來成為非洲統一組織，其目標是把非洲獨立的國家吸引到一起，促進非洲大陸的解放運動。這個大會將給非洲人國民大會提供重要的聯系渠道，對我們爭取支持、資金和培訓民族長矛軍來說，是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機遇。

地下組織執行委員會要我率領非洲人國民大會代表出席這次大會。盡管我希望看看非洲的其他國家，并會見我們自己的非洲大陸的自由戰士，但是，我心中仍然感到很不安，因為這樣我將違背自己不離開南非而是轉入地下開展工作的諾言。我的同事們，其中也包括魯圖利酋長都堅持讓我去，但是，要求我開完會后立即回來。我決定執行這次使命。

我在非洲的這次使命并不只是參加會議，我將為我們新建立的軍隊爭取政治和經濟支持，尤為重要的是盡可能多地在非洲大陸上為我們的軍隊尋找培訓的地方。我也決心在非洲的其他國家提高我們的知名度，因為在這些國家中，我們仍然幾乎不為人所知。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已經發動了自己的宣傳攻勢，我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代表也應盡可能地在這些國家加強宣傳。

在動身前，我秘密開車去格勞特維勒與酋長進行協商。我們在格勞特維勒城內的一個安全的房子里會面，但這次會面并不成功。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酋長出席了創建民族長矛軍的會議，并且，關于民族長矛軍的發展情況我們已向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每個成員作了介紹，其中也包括魯圖利酋長。但是，他的身體狀況欠佳，他的記憶力也不像過去那么好。他批評我沒有告訴他組建民族長矛軍的事情。我設法提醒他，我們曾經在德班就采取暴力問題進行過討論，但是，他想不起來了。這就是流傳魯圖利酋長不知道創建民族長矛軍，并極力反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使用暴力的主要原因。這些流傳的故事沒有一點是真實的。

我在出國前與溫妮在北郊的白人朋友家中住了一夜，她給我帶來了一個整理好的新旅行箱。她為我出國而感到擔憂，但是，她又一次堅持不與我親熱。她的行為與其說像是我的夫人，倒不如說更像是一名戰士。

非洲人國民大會為我安排了去達累斯薩拉姆的航班，然后從達累斯薩拉姆直飛亞的斯亞貝巴。瓦爾特、卡特拉達和杜馬·諾克韋計劃在索韋托的一個秘密地點與我見面，并把旅行證件帶給我，這也是我離開這個國家之前我們進行最后一次磋商的機會。

阿邁德·卡特拉達準時來到見面地點，而瓦爾特和杜馬卻遲遲沒來。我最后不得不改變計劃，卡特拉達設法找了一個人開車送我去貝專納（獨立后改名為博茨瓦納），然后在那里乘包機。后來，我聽說瓦爾特和杜馬在路上被逮捕了。

開車去貝專納是令人不安的，因為我擔心碰上警察，又是第一次跨越我們國家的邊境。我們的目的地是洛巴策，那里緊靠南非邊境。我們順利地跨過邊境，傍晚到達了洛巴策。在洛巴策，我收到了一封來自達累斯薩拉姆的電報，電報要求我把行程往后延兩周。我與一個叛國審判時的獄友菲什·基茨英住在一起，他自從叛國審判后就搬到了洛巴策。

那天下午，我會見了K. T.莫才泰教授，他是貝專納人民黨的主席，這個組織主要由脫離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人士組成。當時，我有了意想不到的空閑時間，我用這些時間讀書、起草參加會議的發言稿，并徒步游覽了洛巴策附近那些原始而美麗的丘陵。盡管我離自己的國家邊境并不遠，但是，我仍然有身在異國他鄉的感覺。馬克·穆瑯葉尼經常陪我在一起，他是我特蘭斯凱一個朋友的獨生子，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青年會員。我們似乎是在狩獵，因為我們碰見了各種各樣的動物，其中包括一群活潑好動的狒狒，我跟隨它們走了一段時間，非常佩服它們有軍隊一樣的組織和步調。

我很快與喬·馬修斯見了面。他是從巴蘇陀蘭趕到洛巴策的，我堅持我們應該趕快去達累斯薩拉姆。在洛巴策，有一位非洲人國民大會同事最近遭到了南非警察的綁架，因此我認為我們離開那里越快越好。我們安排了一架飛機，第一站將飛往貝專納北部的一個名叫卡薩尼的小城鎮。這是一個戰略要地，坐落在四國交界點附近，四個國家分別是貝專納、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和西南非。當時都知道這四個國家是殖民地。卡薩尼的簡易機場被水淹了，我們的飛機降落在數英里之外的灌木叢中一條比較干燥的簡易飛機跑道上，當地一個賓館經理帶著來復槍來迎接我們，他報告說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兇猛的大象，所以來遲了一步。他乘坐的是一輛敞篷面包車，喬和我坐在后排，我看到一頭母獅懶洋洋地出現在灌木叢中。我感覺遠離了家鄉約翰內斯堡的街道，第一次進入了神話和傳奇般的非洲。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出發去穆貝亞，那是離北羅得西亞邊境不遠的坦噶尼喀的一個小鎮。我們乘飛機去了維多利亞大瀑布，然后，又向北跨越一座山脈。在跨越那座山脈的時候，飛行員試圖與穆貝亞取得聯系，但是沒有應答。“穆貝亞，穆貝亞！”他不斷地通過麥克風呼叫穆貝亞。天氣發生了變化，山上充滿了氣流，使飛機像風疾浪高的海面上漂浮著的軟木塞一樣上下顛簸。我們此時在云霧中飛行，飛行員在絕望中開始沿著橫穿山脈的彎曲道路降落。當時，霧很大，我們無法看清道路，當飛行員駕駛著飛機急轉彎的時候，我意識到我們差一點撞上了突然冒出來的山頭。飛機響起了緊急報警，我記得我自言自語地說：“我們這下子完了。”連一直說個不停的喬也一聲不吭了。但是，正當我們感到絕望并想象將要撞上一座山峰的時候，我們忽然從惡劣的天氣中沖了出來，見到了晴朗的天空。我一直不很喜歡坐飛機，而那是我在飛機上最驚險的一次經歷，我有時只是為了表現勇敢，而假裝并不在意。

我們在當地一個賓館里訂了房間，在那里看到有一群黑人和白人坐在陽臺上客氣地交談，我以前從來沒有到過沒有種族歧視的公共場所或賓館。我們正在等候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的穆瓦康基勒先生。他是議會議員，我們不知道他已經到達了這里，并在到處找我們。一位非洲客人走到一個白人女接待員面前。“太太，穆瓦康基勒打聽過這兩位先生嗎？”他指著我們問。“對不起，先生，”她回答，“他打聽過，但是我忘記告訴他們了。”

“請注意，太太，”他用客氣而堅定的語氣說，“這些人是我們的客人，我希望他們能得到適當的關照。”這時我才真正認識到，我置身于一個非洲人當政的國家，我平生第一次成為一個自由人。盡管我是一個逃亡者，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追捕，但是，我感覺壓在我肩上的那副重擔被取走了。在坦噶尼喀，所到之處我的膚色都自然地被接受，沒有受到任何侮辱。我第一次認識到，衡量我好壞、高低的標準不是我的膚色，而是依據我的內在素養和品質。盡管在外期間我常常想家，但是，我感覺好像第一次真正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們到達了達累斯薩拉姆，受到了剛剛獨立的坦桑尼亞第一任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的接見。我們在他房間里進行了暢談，他的房子一點都不豪華，我記得他自己開的汽車也是一部簡陋的小奧斯汀。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這說明，他是人民群眾中的一員。尼雷爾總是堅持認為，對非洲而言，階級是格格不入的，社會主義則是天生固有的。

我向他介紹了我們的情況，最后呼吁希望能得到他們的幫助。他是一個精明而講話溫和的人，對我們的訪問處理得很得體。但是，他對形勢的理解卻讓我感到吃驚和失望。他建議我們把武裝斗爭推遲到索布克韋出獄之后。這是我第一次在非洲其他國家聽見為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呼吁。我描述了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缺陷，堅持認為推遲武裝斗爭會從總體上使斗爭向后倒退。他建議我爭取海爾·塞拉西皇帝的支持，并許諾安排引見。

我本打算在達累斯薩拉姆與奧利佛·塔博見面，但是，由于我推遲了日程，他又不能在那里等，于是給我留言，讓我跟隨他去拉各斯，因為他將在那里出席拉各斯獨立國家大會。在飛往阿克拉的航班上，我碰見了海彌·巴薩納和他的夫人。巴薩納曾經是我的雇主，他一直邀請我到阿克拉跟著他干。他在南非堅持過激的政治活動，使他在南非難以生存，所以他正在加納尋求政治避難。

飛機停在了喀土穆機場，我們排隊通過海關檢查，喬·馬修斯是第一號，然后是我，后面是巴薩納和他夫人。我沒有護照，隨身只帶著坦噶尼喀簽發的基本文件，僅僅證明“這是納爾遜·曼德拉，南非共和國的公民，他被允許離開坦噶尼喀并返回這里”。我把這個文件遞給柜臺后面一位上了年紀的蘇丹人，他抬頭看了我一眼并笑著說：“我的孩子，歡迎到蘇丹來。”然后他與我握手，并在我的文件上蓋了章。巴薩納在我的后面，他向老人遞上了同樣的文件，那位老人看了一會兒，然后用狂躁的態度說：“這是什么？這張紙是什么？這不是官方文件。”

巴薩納沉著地進行解釋，他說，這是坦噶尼喀簽發的文件，因為他沒有護照。“沒有護照？”移民局的官員輕蔑地說，“你怎么沒有護照？你是一個白人。”巴薩納回答說，因為他在自己的國家里為黑人爭取權利而斗爭，因此受到了迫害。那個蘇丹人看上去有點懷疑：“但是你是一個白人！”喬看了看我，知道我正在想什么。他低聲對我說不要介入這件事，因為我們是蘇丹的客人，不要傷了與東道主的和氣。但是，除了他曾經是我的雇主之外，巴薩納也是真正冒險為黑人解放而斗爭的白人之一，我不能丟下他不管。我沒有與喬一起離去，而是仍然站在那位官員的旁邊，巴薩納每說一件事，我總是向移民局官員點點頭，似乎是為巴薩納的話作證。那位老人明白了我的意圖，態度軟了下來，最終在文件上蓋了章，并輕聲說：“歡迎到蘇丹來。”

我幾乎有兩年沒見奧利佛了，當他在阿克拉機場迎接我的時候，我幾乎不認識他了。以前他總是把臉刮得干干凈凈，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齊齊，但是現在他留起了胡子，頭發很長，一身非洲大陸自由戰士的打扮（他可能對我也有同樣的反應）。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重逢，我贊揚他在國外干了很多工作。他已經在加納、英國、埃及和坦噶尼喀建立了非洲人國民大會辦事處，并與其他許多國家進行了頗有價值的接觸。后來，我無論走到哪里，都可以發現奧利佛給各國的外交人員和政治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可能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最好的大使。

拉各斯獨立國家大會的目標是把所有的非洲國家都聯合在一起，但是，最后卻演變成了一次吸收或不吸收哪個國家的吵嘴大會。我保持低調，盡量在會上少出頭露面，因為我不想在我出現在亞的斯亞貝巴的東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運動大會之前，就讓南非政府知道我在國外。

在從阿克拉去亞的斯亞貝巴的飛機上，我發現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高爾·瑞德貝、皮特·摩洛茨和其他人也要去參加東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運動大會。他們看見我感到很驚喜，我們立即就南非問題展開了討論。討論的氣氛是令人高興和輕松的。雖然我一直對高爾脫離非洲人國民大會感到傷心，但是，這并沒有影響我見到他的喜悅心情。高離地面，遠離家鄉，我們更希望團結，而不希望分裂。

我們在喀土穆停了不長時間，在那里轉乘埃塞俄比亞的航班飛往亞的斯亞貝巴。此時，我有一種相當奇怪的感覺。當我登上飛機的時候，我發現飛行員是個黑人。在這之前我從來沒看見過黑人飛行員，當時我只能盡力消除我的恐慌。黑人怎么能開飛機？但是，一會兒我自己就清醒了：我陷入了種族隔離的思維方式，認為非洲人是下等人，開飛機是白人的工作。我坐在后排座位上，不斷責備著自己的這種想法。我們飛上天空后，就不再感到緊張了。我開始研究埃塞俄比亞的地理，想著游擊隊如何藏在這些森林里打擊意大利帝國主義者。

47...

根據傳統說法，埃塞俄比亞——以前叫阿比西尼亞，由所羅門的兒子和示巴女王共同建立，遠在基督誕生之前。盡管埃塞俄比亞曾經被征服過多次，但是，它卻是非洲民族主義的誕生地。與其他許多非洲國家不同的是，埃塞俄比亞一直在與殖民主義戰斗。盡管埃塞俄比亞沒能抵擋住意大利人的入侵，但是，孟尼利克在19世紀卻挫敗了意大利人的入侵。1930年，海爾·塞拉西當上了皇帝，并且成為決定當代埃塞俄比亞歷史發展的人物。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亞的時候我才17歲，這次入侵不僅激起了我對專制者的仇恨，而且也點燃了我對法西斯主義的怒火。盡管塞拉西在意大利人于1936年征服埃塞俄比亞的時候被迫逃跑了，但是，1941年當盟軍趕走意大利人之后他又回來了。

埃塞俄比亞在我的想象中總是占據著特殊的位置，對我來說，訪問埃塞俄比亞，比去法國、英格蘭和美國更有吸引力。我認為，我將找到自己的起源，發現是什么根讓我成為一個非洲人，會見這位皇帝本身就好像是與歷史握手。

我的第一站是皇城亞的斯亞貝巴，這里與它的名字很不相稱，因為它沒有宏偉可言，只有幾條柏油街道，路上跑的汽車還沒有山羊和綿羊多。除了皇宮、大學和我們住的拉斯賓館以外，再沒有什么建筑物能與約翰內斯堡即使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相比。當時，埃塞俄比亞在實行民主方面也算不上什么典型。那里沒有政黨，沒有通常的政府機關，沒有權力分立體制。它只有皇帝，皇帝是至高無上的。

在大會開幕前，各代表團集中在一個名叫德布拉扎德的小城鎮上，在中心廣場上已經搭起了大看臺，奧利佛和我坐在邊上，離主席臺很遠。忽然，我們聽見遠處傳來號角聲，然后是銅管樂器和非洲鼓樂聲，隨著樂隊越來越近，我能聽見或者說感覺到幾百人行進的腳步聲。在廣場邊上的一座建筑物后面出現了一位手舞銀光閃閃的寶劍的官員，跟在他后面的是500名黑人士兵組成的四列方隊，每個士兵肩上都扛著一支擦得锃亮的來復槍。當這支隊伍直接行進到大看臺前面的時候，有人用阿姆哈拉語下達了命令，500名士兵就像一個人一樣地立即停止行進，并原地轉身，向一位身穿耀眼服裝的老人行了個正規禮，那個老人就是埃塞俄比亞皇帝陛下，猶大之獅海爾·塞拉西。

在這里，我平生第一次親眼看到黑人將軍指揮下的黑人士兵受到來自各國的黑人領袖們的歡呼和喝彩。這是一個令人陶醉的時刻。我希望這一場面將來也會在我自己的國家里出現。

上午閱兵式之后，奧利佛和我出席了一個會議，會上每個組織都必須申請遞交國書。我們發現，我們的申請被來自烏干達的一個代表團扣了下來，這個代表團說我們是一個科薩部落組織，這讓我們非常吃驚。我一時沖動，想不客氣地予以駁斥。但是，奧利佛的意見是我們應該簡單地加以說明，我們的組織是一個由非洲人聯合組成的組織，我們的會員來自各族人民。我這樣做了，并告訴他們，我們組織的主席魯圖利酋長就是祖魯族人。于是，我們的申請被接受了。我發現非洲大陸上的許多人都是通過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才對非洲人國民大會有所了解的。

大會在東道國皇帝陛下的主持下正式開幕，他身穿精心制作的錦緞軍裝。我驚奇地發現，這位皇帝雖然看上去塊頭不大，但是，他的尊嚴和自信心使他似乎像非洲巨人，他事實上也的確是非洲的一位巨人。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一個國家的領袖履行正式禮節，感到有點兒眼花繚亂。他直挺挺地站在主席臺上，他的頭微低，表明他在認真傾聽。他的一舉一動都顯示出他的尊嚴和高貴。

按照會議議程，皇帝講完話之后就是我發表講話，我是上午唯一一位發表講話的代表。幾個月以來，我第一次把大衛·莫扎馬義的身份丟在一邊而成為真正的納爾遜·曼德拉。在講話中，我回顧了南非自由斗爭的歷史，列舉了我們的人民遭受到的野蠻屠殺，從1921年183名手無寸鐵的農民被軍隊和警察殺害的巴爾胡克大屠殺，一直講到40年后的沙佩維爾大屠殺。我感謝各國對南非政府施加壓力，其中特別提到了加納、尼日利亞和坦噶尼喀，這幾個國家成功地鼓動英聯邦把南非驅逐了出去。我介紹了民族長矛軍的誕生，說明一切和平斗爭的機會對我們來說已經結束了。“如果領導集體不毅然決然地拿起武器進行反抗，那么，他們就是對其人民的犯罪……在去年12月16日的夜間，在民族長矛軍的沉重的打擊下，整個南非都在顫抖。”沒等我說完，烏干達首相就高聲大喊：“繼續干下去吧！”

然后我就我個人的閱歷作了介紹：

我來自南非，在過去的10個月中，我一直以一個不法之徒的身份生活在我自己的國家里，遠離了我的家人和朋友。當然，我在被迫過著這樣的生活時，我發表了公開聲明，在聲明中我宣布我將不會離開我們的國家，而是轉入地下繼續工作。我決心這樣做，并且將以此為榮。

我關于將回南非的聲明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我們被安排在會上第一個發言，這樣，東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運動大會就能夠對我們的事業作出評價，并給予更多的支持。許多國家當然不愿意支持在任何地方實行暴力斗爭，但是，我的講話說服了大家，南非的自由戰士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拿起武器。

奧利佛和我與北羅得西亞聯合民族獨立黨的領袖肯尼思·卡翁達進行了私人之間的討論。像朱利葉斯·尼雷爾一樣，卡翁達擔心南非自由戰士之間缺乏團結，建議在索布克韋從監獄里出來的時候，我們應該聯合所有的力量進行斗爭。在非洲人中，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在沙佩維爾已經遠遠超過其作為一個組織的影響力，因而當時出盡了風頭。卡翁達曾經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成員，他說他關注我們與白人共產黨人之間的聯合，指出這件事使我們在非洲影響不太好。共產主義不但在西方遭到懷疑，而且在非洲也遭到了懷疑。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啟發，這個觀點也是我在旅途中多次聽到的一個觀點。

當我想證實北羅得西亞聯合民族獨立黨支持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是被誤導的時候，卡翁達拍著我的肩膀說：“納爾遜，對我談這個問題就像往紐卡斯爾運煤一樣多此一舉，我是你們的支持者，是魯圖利酋長的一名信徒。但是，我并不能完全代表聯合民族獨立黨，你必須找西蒙·卡普韋普韋談一談。如果你能說服他，你將使我的工作更容易做。”卡普韋普韋是全國聯合獨立黨的第一號人物，第二天我安排時間會見了他。我請奧利佛與我一起去見他，但奧利佛說：“納爾遜，你一定要自己去會見他，這樣你才能完全坦率地與他會談。”

我與卡普韋普韋談了一整天，從他那里聽到了許多令人瞠目結舌的傳奇故事。“我對你的講話和你的全體非洲人國民大會代表成員確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說，“如果我們根據你們的講話和你們的代表團來判斷問題，我們當然要支持你們。但是，我們聽到來自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報告，說民族長矛軍是共產黨和自由黨異想天開的產物，民族長矛軍僅僅是想利用非洲人做炮灰。”

我被搞得不知所措，于是不假思索地說，我為這種彌天大謊感到震驚。“首先，”我說，“大家都知道，自由黨和共產黨是不共戴天的敵人，他們不可能走到一起玩撲克牌；其次，我在這里冒昧地告訴你，我本人就是組建民族長矛軍這一行動背后的主要運作者。”最后，我說我為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散布這樣的謊言而感到十分失望。

那天，我最后終于說服了卡普韋普韋，他說他將召集一個會議，親自研究我們的情況。他后來也確實這樣做了。不過，這又是一個例證，它既說明其余非洲國家缺乏對南非的了解，也說明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正在盡其所能地對非洲人國民大會進行誹謗。卡普韋普韋祝我好運，因為，現在會議已經結束。這是一個勝利的大會，但是，我們的工作仍然是十分繁重的。

我在做學生的時候，就對非洲文明的搖籃、擁有許多藝術杰作的寶庫——埃及十分向往，很想去看一看那里的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游覽一下非洲最大的河流——尼羅河。從亞的斯亞貝巴開始，奧利佛、羅伯特·萊沙將陪伴我進行其余的旅程，我們一起去了開羅。我第一天在開羅博物館里度過了一整天，觀看了藝術珍品和史前古文物，記錄筆記，了解創造尼羅河流域古老文明的人類。這并不僅僅是門外漢對考古學的一種興趣，這對非洲民族主義者掌握證據、駁斥白人關于非洲人與西方人相比沒有文明歷史的謬論是非常重要的。我只用了一個上午就發現，在白人還住在山洞里的時候，埃及人就已經創造了偉大的藝術和建筑奇跡。

埃及是我們偉大的榜樣，因為我們親眼目睹了納賽爾總統發起的社會經濟改革運動。他削弱了私人的土地所有權，把某些經濟部門劃歸國有，推動了工業化和民主化教育的迅速發展，建立了現代化的軍隊。這些改革也正是我們非洲人國民大會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南非實施的。但是，當時對我們更為重要的是，埃及是唯一擁有陸軍、海軍和空軍的非洲國家，這與南非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一天之后，奧利佛動身去倫敦，并計劃在加納與羅伯特和我會合。在羅伯特和我啟程前，我們討論了我們將在各個國家進行演講的內容。我傾向于盡量真實、客觀地說明國內的政治形勢，不要遺漏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所做的工作。每到一個新國家，我將首先在賓館里封閉起來，以便了解該國的政治、歷史和領導人。羅伯特則與我相反，他是一個天生外向的人，他一到達某個地方，就會立即離開酒店去逛大街，通過與當地人接觸進行學習。我們是一對古怪的伙伴，因為我喜歡穿卡其布衣服和工作服，這是我在地下工作中養成的習慣，而羅伯特則總是西裝革履、衣冠楚楚。

我們的第一站是突尼斯。在那里，我會見了國防部部長，他長得與魯圖利酋長十分相似。但是，這種相似的印象很快就消失了。因為，當我向他介紹諸如羅伯特·索布克韋這樣的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領袖人物被關進監獄之后的國內情況時，他插話說：“當那個人出獄后，他會干掉你們！”羅伯特對此十分生氣（他后來說：“伙計，你說的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比他們自己說的還好！”），但我還是堅持向國防部長全面地介紹情況。當我們第二天會見哈比卜·布爾吉巴總統的時候，他的反應卻十分積極和干脆：他答應為我們訓練軍隊，并援助我們5000英鎊以購買武器。

我們去的第二個地方是摩洛哥的拉巴特。它擁有古老而神秘的城墻、時髦的商店和中世紀的清真寺，似乎是非洲、歐洲和中東三地奇妙的混合體。自由戰士們顯然也會這樣想，因為，拉巴特是非洲大陸真正的解放運動的交叉路口。我們在那里還會見了來自安哥拉、阿爾及利亞和佛得角的自由戰士。拉巴特也是阿爾及利亞革命軍的司令部。我們在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代表團的團長穆斯塔法博士共同度過了幾天，他簡單地向我們介紹了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的歷史。

阿爾及利亞的情況與我們自己的情況十分相似，國內反叛者面對的是一個統治眾多本土人民的白人社團。他介紹了阿爾及利亞抵抗組織如何在越南奠邊府擊敗法國人的鼓舞下，于1954年以一小股游擊隊的攻擊開始進行武裝斗爭。開始，阿爾及利亞抵抗組織相信他們能夠從軍事上打擊法國人，后來認為單純從軍事上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們還是采取了游擊戰。他解釋說，之所以開展游擊戰，并不是指望從軍事上取得多大的勝利，主要是通過政治和經濟力量打垮敵人。穆斯塔法博士勸我們說，在策劃軍事行動的同時不要忽視戰爭的政治影響。他說，國際公共輿論有時比一個戰斗機群的作用還要大。

在三天會談結束的時候，他把我們送到烏季達。這里是一個跨越阿爾及利亞邊界的小城鎮，阿爾及利亞駐摩洛哥軍隊司令部就駐扎在那里。我在前線參觀了一支軍隊，并用戰地望遠鏡觀看了遠處的戰場，能清楚地看見邊境上的法國軍隊。我坦白地承認，想象中就好像自己看到的是南非國防軍的制服。

一兩天后，我又參觀了以艾哈邁德·本·貝拉命名的軍隊閱兵式。本·貝拉將成為阿爾及利亞獨立后的第一位首相，最近從一座法國監獄獲釋出來。這次閱兵式與我在亞的斯亞貝巴看見的閱兵式完全不同，這個閱兵式沒有像埃塞俄比亞那樣步伐整齊、訓練有素、著裝漂亮的軍隊，但是，它卻是阿爾及利亞游擊戰的歷史見證。

走在前面的是一些頭戴穆斯林頭巾、身穿緊身長袍、足蹬涼鞋的久經戰斗、士氣昂揚的老兵，他們在許多年之前就開始進行武裝斗爭。他們扛著他們使用過的武器：馬刀、老式來復槍、戰斧和長矛。走在他們后面的是年輕士兵，都扛著現代武器，同樣威武而自豪。有的還扛著反坦克、反飛機的重型武器。但是，就是這些戰士也不像埃塞俄比亞英姿颯爽的士兵走得那么整齊。這是一支游擊隊，他們都是在戰火中贏得肩章的戰士。他們比著裝整齊、行軍步調一致的閱兵式上的部隊更注重戰斗和戰略戰術。與在亞的斯亞貝巴被閱兵式上的部隊所鼓舞一樣，我知道，我們自己的軍隊應該更像在烏季達看到的這支部隊。我只希望他們能夠勇敢地戰斗。

走在后面的是一支衣冠相當不整齊的隊伍，由一位名叫蘇達尼的人率領。他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信心十足，膚色就像夜色一般烏黑。他揮舞著儀仗，而當我們看到他的時候，我們一群人都起立并鼓掌、歡呼。我環視了一下周圍，發現其他人正在注視著我們。我意識到我們在歡呼，只是因為那個人是一個黑人，而在摩洛哥，黑色面孔十分少見。我又一次被民族主義的偉大力量和種族劃分的惡果所震撼。我們及時地作出了反應，因為我們感到出現在我們眼前的似乎是我們的一個非洲同胞。后來，主人告訴我們，蘇達尼一直是一個傳奇式的戰士，甚至有人說他曾一個人俘虜一支法國軍隊。不過，我們向他歡呼是因為他的膚色，而不是因為他的英勇事跡。

我從摩洛哥跨越撒哈拉沙漠飛往馬里首都巴馬科，然后又到了幾內亞。從馬里到幾內亞的航班更像是一輛當地的公共汽車。小雞在走道上跑來跑去，女人們頭上頂著包裹，叫賣著成袋的花生和干蔬菜。這是一次頗具民主氣氛的飛行，我感到十分愜意。

我的下一站是塞拉利昂，當到達那里的時候，我發現議會正在舉行會議。我決定出席他們的議會會議。我以旅行者的身份進入了會場，并被安排在離講臺不遠的一個座位上。議會的工作人員走到我的跟前問我的身份，我低聲告訴他：“我是南非魯圖利酋長的代表。”他熱情地同我握手，并向主席臺報告。那位工作人員然后解釋說，他們一時疏忽給了我一個通常不允許參觀者坐的位子，但是，這次破例對他們來說卻是一種光榮。

不到一小時，大會就開始會間休息，當我站在議員和高官中間喝茶時，有人在我的面前排起了長隊。讓我吃驚的是，全體議員要排著隊與我握手。我非常高興，直到隊中第三位或第四位向我喃喃而語時我才恍然大悟。他說的話意思是：“與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尊敬的魯圖利酋長握手是莫大的榮幸。”我成了一個冒名者！原來是那位工作人員產生了誤會。然后，有人把總理彌爾敦·瑪蓋也領到我的面前與我會見。那位工作人員把我當做魯圖利酋長介紹給他，我想立即告訴那位工作人員我不是魯圖利酋長，但是，他不聽我的解釋。出于禮貌，我決定繼續冒名頂替。后來，我會見了總統，并把搞錯身份的情況作了說明，他慷慨地提供了物資援助。

在利比里亞，我會見了土布曼總統。他不但為我們提供了5000美元用于購買武器和進行培訓，并且小聲對我說：“你有沒有零用錢？”我坦白地說，我的零用錢不多了。一位侍從武官立即給了我一個信封，里面有400美元的現金。我從利比里亞去了加納，并在那里見到了奧利佛。在加納，我受到了加納行政部部長阿布杜拉葉·迪亞羅的接待。當我告訴他我在幾內亞沒見過賽考·托雷的時候，他立即安排我們回到了那片干旱的土地。在那里，托雷給奧利佛和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一棟簡陋的平房里，身上穿著早該去干洗店進行洗滌的、骯臟而且褪了色的西服。我向他介紹了我們的情況，介紹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民族長矛軍的歷史，為民族長矛軍請求5000美元的援助。他聽得很認真，他的答復也非常符合禮儀。他像是在發表講話似的說：“加納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我們的南非兄弟們的斗爭，我們在聯合國已經發表了聲明。”他走到書架前，在書架上取下兩本書，并親筆簽上名送給了奧利佛和我。他然后說了聲謝謝，我們就這樣被打發了。

奧利佛和我都很生氣：我們被從別的國家邀請到這里，難道他給我們的一切只有他自己簽過名的這兩本書？真是浪費時間。不大一會兒，我們來到了下榻的賓館。此時有一位外交部的官員來到我們的房間，送給我們一個手提箱。后來，我們打開一看，里面全是鈔票。奧利佛和我高興地相互看了一眼。但是，奧利佛的臉色很快就變了。“納爾遜，這是加納幣，”他說，“離開加納一分錢都不值，只不過是一堆廢紙。”不過，奧利佛倒是想出了一個主意：我們將把這些錢帶到捷克大使館，他在那里有一位朋友，可以請他為我們兌換成硬通貨。

悄悄劃入達喀爾港口的小船，那種美只能用身穿飄逸長袍、頭戴頭巾的塞內加爾女人款款而行之美來形容。我信步來到了附近的市場，完全被異國他鄉的香料和香水所陶醉。塞內加爾人十分漂亮，奧利佛和我在那里只住了很短的時間，但是，我十分喜歡這段短暫的時光。他們的社會表明，不同的民族，不管是法國人、伊斯蘭人還是非洲人，都能夠融為一體而創造出一種獨一無二的、與眾不同的文化。

在我們去會見總統利奧波德·桑戈爾的路上，奧利佛得了嚴重的哮喘。他拒絕直接回賓館，我只好背著他爬上樓去，到了總統辦公室。桑戈爾對奧利佛的病情十分關心，堅持讓他的私人醫生為他治病。

有人告訴我對桑戈爾要保持小心謹慎，因為有報道說，塞內加爾士兵在阿爾及利亞為法國人服務，他很喜歡法國革命前的舊制度。總有一些新生的國家向往著那些殖民者的方式方法，我本人對此也沒有免疫力。桑戈爾總統是一位學者和詩人，他告訴我們，他正在收集沙卡的研究資料，通過詢問有關這位偉大的南非勇士的一些問題，他對我們贊揚了一番。我們簡明扼要地向他介紹了南非的情況，并請求他們給予軍事訓練和資金方面的援助。桑戈爾回答說，直到議會召開會議予以批準后，他才能有這個權力。

同時，他要我們與司法部部長達布希爾談談軍事訓練的問題。桑戈爾給我介紹了一位漂亮的法國女郎，他說，她將在我與達布希爾會談中擔任翻譯。我沒有說什么，但是總感覺有些別扭。在一位我既不了解又無法信任的年輕女人面前討論軍事訓練這樣非常敏感的問題，我感到很不舒服。桑戈爾感覺到了我的不快，他說：“曼德拉，不要擔心，這里的法國人與我們非洲人的理想完全一致。”

當我們來到司法部長的辦公室的時候，我們發現接待處有一些黑人秘書。其中一位問那位法國女士在那里干什么，她說是被總統派來當翻譯的。接著，她們進行了一番議論。在議論中間，一位黑人秘書回頭對我說：“先生，你能講英語嗎？”我說我能。她說：“部長說英語，你可以直接與他交談，你不需要翻譯。”此時，那位法國女士相當不高興。當我去見部長的時候，她站在了一旁。部長答應滿足我的要求。最后，盡管部長沒有提供我們所要求的東西，但是，他卻為我們辦理了外交護照，并為我們支付了從達喀爾去我們下一站——倫敦的機票費。

48...

我承認，在某種程度上，我屬于親英派。每當我想到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時候，我就想到了英國的議會制。在很多方面，我認為英國人就是典型的紳士。盡管英國是議會民主的發祥地，但正是這種民主把一種不公正的、致命的制度強加在我們的人民身上。雖然我憎恨英國的帝國主義主張，但是我絕不反對英國式的服裝和禮貌。

我要去英格蘭有幾個理由，除了想看一看我很早就在書中讀到的和聽到的這個國家之外，我也對奧利佛的健康不放心，想說服他接受治療；同時，我也很想見一見他的夫人阿德萊德和他們的孩子們。另外，我還想拜訪玉蘇福·達杜，他現在也住在英國，擔任大會運動組織的駐英代表。我知道，在倫敦我可以獲得在其他地方無法獲得的游擊戰方面的書籍。

在倫敦，我恢復了我的地下生活方式，我不想把我在英國的風聲透漏到南非。南非安全部門的觸角一直伸到了倫敦。不過，我并不是一個隱士，我在那里的10天時間都用在了非洲人國民大會事務、看老朋友和偶爾順便進行短途旅游上。奧利佛和我與一位生在比勒陀利亞的朋友馬麗·本森一起游覽了這座曾經統治幾乎全球三分之二面積的大都市，包括西敏寺、大本鐘、議會大廈。我在為這些建筑物心存贊美的同時，也對它們所象征的意義感到憎惡。當我們在西敏寺附近看到史末資將軍雕像的時候，奧利佛和我一起開玩笑說，或許有一天這里會換成我們的雕像。

許多人告訴我，大衛·阿斯特經營的報紙《觀察家》一直突出宣傳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其編輯們有意暗示非洲人國民大會已經過時。奧利佛安排我與阿斯特在他家中會面，我們就非洲人國民大會進行了長時間的暢談。我不知道我的談話是否對他產生了影響，但是，《觀察家》的內容后來真的發生了變化。他還建議我去找幾位著名的政治家談談，于是，在工黨議員丹尼斯·希利的陪同下，我會見了工黨的領袖休·蓋茨凱爾和自由黨領袖喬·格里蒙德。

直到我快要離開英國的時候我才見到了玉蘇福，但是，這次見面并不是一次愉快的重逢。奧利佛和我在旅途中遇到了一個再三被提及的難題：一個又一個的非洲人領袖問我們與白人和印度共產黨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有時，提問者的意思無非是說白人和印度共產黨人控制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如果不是為了公開建立民族主義和反白人的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我們的非種族主義就不可能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個難題。在非洲的其他國家中，多數非洲人領袖卻更接受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觀點。奧利佛就這些問題與玉蘇福進行了探討，玉蘇福卻并不贊成奧利佛的結論。奧利佛堅持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應該更加獨立，不用別的聯盟成員插手，可以單獨采取某些行動。我對此十分贊賞。

我在倫敦度過的最后一夜，與玉蘇福探討了這些問題。我解釋說，盡管我們已經開始進行武裝斗爭，但是，我們在資金、培訓和政治聲援方面還要依靠別的非洲國家，因此，我們必須比過去更重視他們的觀點。玉蘇福認為奧利佛和我打算改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準備脫離《自由憲章》的核心——非種族主義。我告訴他這是一種誤解。我們不打算反對非種族主義，我們僅僅是說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更加獨立，并應獨立于大會聯盟發表聲明。當時，非洲人國民大會、南非印度人大會和有色人大會常常對僅僅影響非洲人的問題發表聯合聲明，這種狀況將必須改變。玉蘇福對此很不高興。“這與政策有什么關系？”他繼續問。我告訴他，我正在說的不是關于政策的問題，我是在談論形象問題。我們將仍然一道工作，不過，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被擺在第一位。

盡管離開我在倫敦的朋友們使我感到難過，但是，我現在需要著手進行我這一次出訪任務中最不熟悉的使命：軍事訓練。我準備在亞的斯亞貝巴接受為期6個月的訓練。在那里，我受到了外交部部長葉甫的接見，他熱情地歡迎我，并帶我去一個叫考爾菲的近郊去參觀，埃塞俄比亞防暴軍司令部就駐扎在那里，我要在那里學習帶兵打仗的藝術和科學知識。盡管我是一個很不錯的業余拳擊運動員，但是，我對搏斗的基本知識卻知之甚少。我的教練是一位陸軍中尉，名叫旺多尼·貝非卡杜，是一位很有經驗的軍人，他曾經與地下組織一起同意大利人戰斗過。我們的訓練計劃安排得很緊：每天從上午8點一直訓練到下午1點，中間洗個澡并吃午飯，然后從下午2點訓練到下午4點，下午4點到晚上，由塔德賽上校給我們上軍事科學課。他也是警察專員助理，曾幫助埃塞俄比亞皇帝挫敗了當時剛剛發生的政變陰謀。

我學會了如何使用自動步槍和手槍，并且與皇宮衛士一起在考爾菲練習瞄準射擊，或是在大約距離防暴軍駐地50英里的射擊場練習。我學習了如何破壞敵人的設施和使用迫擊炮，如何制造小型炸彈和地雷，以及如何避開炸彈和地雷。我感覺自己已經被訓練成了一名軍人，開始用軍人的思維思考問題，而完全脫離了一個政治家的思維方式。

我最感興趣的是“疲勞行軍”訓練，在行軍中，身負槍支、彈藥和水，要求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到達某個遙遠的地點。在這些疲勞行軍訓練期間，我親身體驗了沿途美麗的風光，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拔地而起的高地。這個國家特別落后：人們仍然使用木犁耕地，吃的是非常簡單的食物，有時喝一些家釀啤酒。他們的生活與南非邊遠地區十分相似，幾乎到處都是清一色的窮人。

在學習培訓期間，塔德賽上校與我探討了諸如如何創建一支游擊隊、如何指揮軍隊和如何加強紀律性等問題。一天晚上吃晚飯時，他對我說：“曼德拉，你現在創建的是一支解放軍，不是一支常規的資產階級軍隊。當你在崗位上工作的時候，你必須行使你的絕對權威，這是與資產階級指揮官完全不同的。但是，當你不在崗位上的時候，你必須注意與戰士們，哪怕是最下級士兵，保持平等關系。你必須與他們吃一樣的飯，并且不能把食物帶到你的辦公室里去吃，而是與他們一起吃、一起喝，不能把自己封閉起來。”

他這些話似乎都是令人欽佩的和明智的。但是，正當他與我談話的時候，一位中士走進了大廳，問塔德賽上校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某某中尉。塔德賽上校用明顯輕蔑的口氣說：“你沒看見我正在這里與一位重要人士談話嗎？你不知道在我吃飯的時候不能打擾我嗎？請你躲到一邊去！”然后，他繼續用剛才的教誨口吻對我談話。

訓練期本來是6個月，但是8周后我收到了一封來自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電報，催促我回國。國內的武裝斗爭正在逐步發展，他們需要一位現場指揮官。

塔德賽上校很快為我購買了埃塞俄比亞飛喀土穆的飛機票。在我離開之前，他送給我一件禮物：一把自動手槍和兩百發子彈。我十分感激他贈給我自動手槍，也十分感激他對我的教誨。盡管我已經進行了疲勞訓練，但是，我仍然對帶上那么多子彈有些畏難。一發子彈的重量就令人吃驚，帶上200發子彈就像身上背了一個孩子。

在喀土穆，我遇見了一位英國航空公司的官員，他告訴我飛往達累斯薩拉姆的航班第二天才起飛，并免費為我在城內預訂了星級賓館。我有些驚愕，因為我寧愿去住不惹人注意的三等賓館。

當我住進賓館的時候，我必須穿過賓館內長長的、高雅的走廊，走廊里有許多白人正坐在那里喝飲料。這里很久之前就安裝了金屬探測器和安全檢查裝置，我外衣內的手槍套里有手槍，褲腰內有200發子彈，身上還帶著幾千英鎊現金。我似乎感覺這些衣冠楚楚的白人都有X光檢測儀器，我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逮捕。但是，我被安全地送進了我的房間，在房間里我讓服務生整理房間，就連服務生的腳步也讓我感到緊張。

我從喀土穆直接飛到了達累斯薩拉姆，在那里我迎接了第一批21名民族長矛軍戰士，他們到埃塞俄比亞準備參加培訓。這是令人自豪的時刻，因為這些人都是我當時創建軍隊時自愿入伍的軍人。他們在一開始就在戰役中冒著生命危險參加戰斗，那是一場對第一批入伍的戰士來說最為危險的戰役。他們都是年輕人，多數來自城市，他們既自豪又有生氣。我們在亞的斯亞貝巴好好地吃了頓飯，人們為歡迎我殺了一頭羊。我向他們介紹了我的旅行情況，告訴他們在國外必須守規矩、講紀律，因為他們是南非自由斗爭的代表。我說，軍事訓練必須與政治培訓一道進行，因為革命并不只是一個扣扳機的問題，其目的是創造一個公平的、正義的社會。我第一次接受了自己戰士的敬禮。

尼雷爾總統為我提供了一架飛姆貝亞的飛機，然后我直飛洛巴策，飛行員卻告訴我飛機將在卡內降落。這讓我感到憂慮：飛機為什么要變更降落地點？在卡內，我遇見了當地的行政長官和保安人員，他們全是白人。行政長官走到我的面前問我的名字，我告訴他我叫大衛·莫扎馬義。他說，不對，請告訴我你的真實名字。我還是說我叫大衛·莫扎馬義。行政長官說：“請告訴我你的真實名字，因為有人指示我在這里迎接曼德拉先生，我是來為他提供幫助和交通工具的。如果你不是納爾遜·曼德拉，我恐怕就要逮捕你，因為你沒得到批準進入這個國家。你是納爾遜·曼德拉嗎？”

這倒讓我進退兩難，是不是曼德拉都有可能被逮捕。“如果你們堅持認為我是納爾遜·曼德拉而不是大衛·莫扎馬義，”我說，“我不會和你爭論。”他微笑著說：“我從昨天就盼著你來。”然后，他讓我乘電梯上樓，我的同志們正在那里等著我。我們坐車去洛巴策，在那里見到了喬·莫迪塞和一位名叫喬納斯·馬特羅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支持者，他當時就住在那里。行政長官告訴我，南非警察知道我要回來，他建議我第二天離開洛巴策。我對他的幫助和勸告表示感謝，但是當我到達馬特羅家的時候，我決定當天夜里就離開，打算與塞西爾·威廉姆斯一起開車回南非。塞西爾是戲劇導演，也是民族長矛軍戰士。我裝扮成他的司機，坐在駕駛座上。那天夜里，我們驅車直奔約翰內斯堡。

# 第七部 利沃尼亞

49...

越過邊界后，我松了一口氣。離開家鄉后再回到家鄉，使我感到家鄉的空氣總是那么溫馨。那是一個晴朗的冬夜，就連家鄉天上的星星看上去也比非洲大陸其他地方的星星更明亮。顯然，我離開了我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世界，并重新返回到我作為一個亡命之徒生活的另一個世界，但是，我仍然為回到自己的家鄉而感到高興。

在貝專納與西北德蘭士瓦之間，有十幾條沒有路標的道路橫跨邊界，塞西爾知道我們應該走哪條路。在行駛期間，他告訴了我許多我沒聽說過的大事。我們行駛了一整夜，半夜剛過就穿越了邊界，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到達了立里斯里夫農場。我仍然穿著我那身卡其布訓練服。

一到農場，我就沒有了休息和反思的時間，因為第二天夜間，我們將召開一次秘密會議，由我向工作委員會簡要報告此行的情況。瓦爾特、摩西·考塔尼、戈萬·姆貝基、旦·圖魯麥、J. B.馬科斯和杜馬·諾克韋都來到了農場，這是一次難得的重逢。我首先匯報了這次出訪的大概情況，并把我們接收到的援助資金和提供培訓的情況逐項作了匯報。同時，我也詳細報告了我對非洲人國民大會與白人、印度人特別是共產黨人進行合作的不同意見。贊比亞領導人最后會見我時說的話仍然在我耳邊回響，他們告訴我，盡管他們知道非洲人國民大會比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強大，并且更有群眾基礎，但是，他們知道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是純粹的非洲民族主義，而他們被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非種族主義和與共產主義的聯系搞得有些迷惑。我告訴他們，奧利佛和我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顯得更獨立一些，以便讓非洲大陸上的新盟友對我們放心，因為，這些新盟友將是從資金上和軍事訓練上對我們提供支持的國家。我建議對大會聯盟進行改造，這樣，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明顯地被視為領導組織，特別是在一些直接影響非洲人的問題上。

這是一個嚴肅的主張，必須征求整個領導層的意見，工作委員會敦促我去德班向魯圖利酋長匯報。除了戈萬·姆貝基之外，大家都同意這個主張。姆貝基當時不住在立里斯里夫農場，但是，他作為民族長矛軍最高司令部的成員出席了會議。他敦促我選派別的人執行我的任務，因為這個任務風險太大。他說，組織不應當危及我的安全，特別是我剛剛回國，準備進一步發展民族長矛軍。這個明智的建議被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內——拒絕了。

第二天夜間，我在塞西爾的陪同下從利沃尼亞出發。我還是扮作他的司機。我在德班安排了一系列的秘密會見，第一個就是秘密會見蒙蒂·奈克和伊斯梅爾·彌爾，向他們簡要介紹了我的國外之行，討論新建議。蒙蒂和伊斯梅爾與魯圖利酋長關系非常密切，魯圖利酋長完全相信他們兩人的觀點。我希望能告訴魯圖利，我已經對他的兩位朋友說過了，并傳達他們的意見。但是，伊斯梅爾和蒙蒂對我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需要在大會聯盟中起領導作用并在有關影響非洲人的事務方面自己發表聲明感到憂慮。他們反對任何拆散聯盟的做法。

我又來到格勞特維勒，魯圖利酋長就住在那里。我們在格勞特維勒城內的一個印度女士家中見了面。我向酋長介紹了情況，他一言不發地認真聽我介紹。當我介紹完情況的時候，他說他不贊成讓外國政治家干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他說，我們的政策已經很好地包含了非種族主義，他認為我們不應該根據幾個外國領袖的意見修改我們的政策。

我告訴酋長，這些外國政治家不是干涉我們的政策，他們僅僅是說他們對我們的政策不理解。我告訴酋長，我們的計劃僅僅是做點表面文章，以便使非洲人國民大會更讓人理解，更讓我們的同盟者接受。我把這件事看作一項防御性措施。因為，如果非洲國家決定支持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那么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這個弱小組織就能一下子變成一個強大的組織。

酋長并沒有憑一時的沖動而匆忙下結論。我能看出，他要考慮我所說的話，并就此與他的朋友們進行討論。我向他告別，他勸我要多加小心。那天晚上，我還要在那個小城秘密會見幾個人。我最后會見的是民族長矛軍德班地區司令員。

德班地區司令員是一位名叫布魯諾·姆陀羅的破壞活動專家。我以前從未見過他，但是，我以后在完全不同的場合又一次遇見了他。我簡單向他介紹了我出訪非洲數國的情況，以及我們已經接受的支持和軍事培訓承諾。我解釋說，民族長矛軍暫時僅限于搞破壞活動，但是，如果搞破壞活動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我們也有可能轉入游擊戰爭。

同一天晚上，我住在攝影記者G. R.奈杜家中，與伊斯梅爾、法蒂瑪·彌爾、蒙蒂·奈克和J. N.辛格一起舉行歡迎、歡送會，因為第二天我就要回約翰內斯堡。那是一個愉快的夜晚，是我長時間以來第一次放松的夜晚。當晚，我睡得也很好。8月5日禮拜天下午，我又去見了塞西爾，因為我將乘坐他的奧斯汀返回約翰內斯堡。

我穿著我的白色司機風衣坐在副駕駛座上，我們兩人輪流著駕駛。那是一個晴朗而涼爽的日子，我完全沉浸在納塔爾農村的美麗景色之中。即使是在冬天，納塔爾仍然是一片綠色。既然我打算回約翰內斯堡，我就要抽出點時間去看望一下溫妮和我的孩子們。我經常希望溫妮能與我一起去分享非洲的奇觀，但是，我所做到的只能是告訴她我在國外所見到的和所做的事情。

我們一離開德班的工業區就立即進入了山區，那里有一道道的山谷和深藍色的印度洋，風景十分美麗。德班是南非主要工業區和主要港口城市，通往約翰內斯堡的公路很長一段與火車道平行。我從盡情地欣賞自然美景轉向考慮鐵路線，它與公路相距那么近，這就為實施破壞提供了方便。我掏出隨身帶的小筆記本，把這個情況記錄了下來。

塞西爾和我駕車穿過彼得馬里茨堡西北20英里的霍維克，我們開始專心致志地討論破壞計劃。在剛過霍維克不遠的小城鎮塞德拉時，我發現有一輛坐滿白人的福特V-8轎車從我們右側飛速馳過。我本能地轉身向后一看，發現還有兩輛坐滿白人的轎車。忽然，那輛福特V-8轎車在我們前面發出信號讓我們停車。此時，我知道我的地下逃亡生活就要結束了，我歷時17個月的“自由”也即將到頭了。

當塞西爾放慢車速的時候，他轉身對我說：“這是些什么人？”我沒有回答，因為我們兩人都知道他們是什么人。他們選擇了一個很好的藏身之處，我們左側就是陡峭而長滿樹木的河堤，如果我們想逃跑的話，他們可以把我們趕進河堤上的樹林。我坐在右邊的座位上，曾經想跳車逃進樹林，但是，我知道那樣幾秒鐘內就會遭到槍擊。

當我們停下車來的時候，一位表情嚴肅的細高個男士直奔我這一側的車窗而來。他沒刮胡子，看上去好像已經有很長時間沒睡好覺了。我立即明白，他幾天來可能一直在等著我們。他鎮定地告訴我們，他是彼得馬里茨堡警察局的中士沃爾斯特，并向我們出示了逮捕證。他讓我說明自己的身份，我告訴他我叫大衛·莫扎馬義。他點了點頭，然后，沉著地問我一直在什么地方，準備到哪里去。我回避了他問的問題，沒告訴他多少情況。他似乎有點惱火，然后說：“你是納爾遜·曼德拉，這位是塞西爾·威廉姆斯，你們被捕了！”

他告訴我們，另一輛車上的警察少校將陪我們回彼得馬里茨堡。那時候，警察的警惕性還不怎么高。沃爾斯特并沒有對我進行搜身。我身上帶著一把連發左輪手槍，我又一次想到逃跑。但是，他們的人太多，我無法逃脫。我偷偷地把連發手槍和筆記本都藏在了我的座位和塞西爾的座位之間的裝飾件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警察竟沒有發現。這很幸運，因為如果他們發現了這些東西，將有更多的人被逮捕。

在警察局，我被帶進警察中士沃爾斯特的辦公室，在那里我看見有好幾位警察官員，其中一位是準尉特魯特，他曾經在叛國審判中出庭作證。特魯特在被告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他準確地說明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既沒有夸大，也沒有說謊。我們友好地彼此寒暄了一番。

我除了承認自己不是大衛·莫扎馬義之外仍然是什么也沒承認，特魯特對我說：“納爾遜，你為什么開這種玩笑？你明白我知道你是誰。”我僅僅告訴他我起了個新名，我的新名就叫大衛·莫扎馬義。我請求聘請一位律師，但遭到了拒絕。然后，我想到應該發表一個聲明。

塞西爾和我被分別關押在不同的牢房里。現在，我有時間反思我的處境。我總是認為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即使是自由戰士也不愿意承認這樣的事實。那天晚上，我在牢房里認識到，我對被逮捕和監禁這個現實并沒有任何準備。我輾轉反側，感到很不安。有人把我的行蹤向警察告了密，他們知道我在德班，并且知道我將回約翰內斯堡。在我回國前幾個禮拜，警察就認為我已經回國。6月份，報紙頭版頭條刊登了題為“黑色海綠花的歸來”的報道，當時我還在亞的斯亞貝巴。這是不是一種虛張聲勢？

當局一直在騷擾溫妮，他們認為溫妮知道我是否回來。我知道他們對她進行盯梢，并數次到家中搜查。我猜測他們料定我回國后將立即會去拜訪魯圖利酋長，他們猜對了。但是，我也懷疑他們得到了當時我在德班的情報。政府到處都安插了情報員，即便是很謹慎的人，一般也不能總是守口如瓶。我自己也有粗心大意和喪失警惕的時候。知道我在德班的人太多了，我竟然在動身去德班的那個晚上搞了個聚會，我為自己放松警惕而自責。我思考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告密者來自德班？來自約翰內斯堡？還是來自組織內部？或者甚至是朋友和自己的親屬告了密？但是，這種猜測是毫無價值的，由于筋疲力盡，我很快就深深地進入了夢鄉。至少1962年8月5日這一夜，我不必擔心警察是否會來找我，因為他們已經找到了我。

第二天上午，我感覺恢復了精力，并振作精神去面對擺在我面前的新的考驗。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在抓捕我的人面前表現出失望或絕望之情。8點30分，我出現在當地行政長官的面前，并被正式押送約翰內斯堡。這是一種低調處理，行政長官處理我似乎像處理一份運輸單那樣簡單。警察在送我回約翰內斯堡這個問題上并沒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僅僅讓我坐在轎車的后排座位上。當時也沒有給我戴手銬，只有兩名警察坐在轎車的前排座位上。我的朋友們發現我被逮捕了，法蒂瑪·彌爾給我送來了食物，我在車內與兩位警察共同分享了這些食物。我們甚至在沿途小鎮沃爾克斯拉斯特停下來，他們讓我下車散散步，休息一下。當人家對我好的時候，我也就沒有企圖逃跑的想法，我不想利用他們對我的信任去干對不起他們的事情。

但是，當我們抵達約翰內斯堡的時候，氣氛發生了變化。我從收音機里聽到了一個關于我被捕的通告，并命令撤掉了通往納塔爾的道路檢查站。太陽落山的時候，在約翰內斯堡的郊區，我們受到了規模龐大的警察押送隊的迎接。當時，我被戴上手銬從轎車上帶下來，換了一輛密閉的囚車。囚車的玻璃窗是不透明的，并且裝有鐵絲網。然后，車隊迂回向前行駛，選擇不為人熟悉的去馬歇爾廣場監獄的路徑，他們似乎擔心會遭到伏擊。

我被單獨關押在一個牢房里。在一片安靜中，我開始考慮第二天的對策。此時，我聽到附近牢房里傳來一聲咳嗽。我并沒有想到附近會有被監禁的犯人，但是，不但有，而且這個聲音對我來說特別熟悉。我突然坐起來，問了聲：“瓦爾特？”

“納爾遜，是你嗎？”他應聲說。我們抱著無法形容的復雜心情笑了，這里面有安慰、有驚奇、有失望，也有高興。據我所知，瓦爾特在我被逮捕不久也被逮捕了。我不認為我們先后被捕沒有什么聯系。雖然這不是全國工作委員會舉行會議的最安全的地方，但是這里當然是方便的，那一夜過得特別快，我向他全面地介紹了我被逮捕的經過和我在德班的活動情況。

第二天我出現在法庭上，面對的是一位高級法官。哈羅德·沃爾佩和喬·斯洛沃聽說我被捕后來到了法庭，我們在地下室內進行了交流。我在當律師的時候曾經多次與這位法官打過交道，我們彼此都很尊重對方。還有幾位律師也在場，有的律師我也很熟悉。一個人由于別的無關緊要的事變而在特定的場合下也能比較容易地受到稱贊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在正常的情況下我受稱贊絕不稀奇，但是，在這里我是一個罪犯，而且是一個很難抓到的、政府最想抓到的、在地下堅持斗爭達一年以上的第一號重刑罪犯，仍然受到了法官、律師和旁聽者們的尊重和職業禮遇。他們知道我是有律師身份的曼德拉，并不是罪犯曼德拉。這使我的精神振作起來。

在履行法律程序期間，法官似乎缺乏自信，并且感到不安，他不敢直接面對著我。其他律師也似乎感到困惑，當時我似乎得到了某種啟示。這些人不僅因為我是一個失去地位的同行而感到不舒服，而且因為我是一個因為信仰而遭到懲處的普通人而感到難過。在某種程度上講，我以前從來沒有很好地領會過，我認識到了我在法庭上的角色以及作為一個被告所面對的幾種可能。我在壓迫者的法庭上是正義的象征，是不尊重美德的社會中的自由、公正和民主偉大理想的代表。我此時此刻認識到，即使是在敵人的堡壘內也能進行戰斗。

當我被問及我的律師叫什么名字的時候，我聲明我將自己為自己辯護，而請喬·斯洛沃做法律顧問。通過自己為自己辯護，我將提升自己的形象。我要把對我的審判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從道義上反對種族歧視的展示。我并不打算為自己作過多的辯護，而是想方設法把政府推上法庭。那天，我僅僅回答了有關我的名字和選擇律師方面的提問，我默默地聽著對我的指控：鼓動非洲人罷工，沒有有效旅行文件擅自出國。在種族歧視的南非，這種“罪行”可以判處長達10年的監禁。這種指控并不算嚴厲：政府顯然沒有足夠的證據把我與民族長矛軍聯系在一起，不然的話，我將被指控犯有更嚴重的叛國罪或破壞罪。

當我準備離開法庭的時候，我意想不到地看見溫妮坐在旁聽席上。她面色悲涼、憂傷；毫無疑問，她正在考慮今后的艱難歲月，生活的擔子全落在了她一個人身上，在一個常常是艱難的、什么東西都經常被禁止的城市里撫養兩個孩子。要她知道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難是一回事，她們在現實中所面臨的困難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能做的一切，就是當我沿臺階步入地下室的時候給了她一個滿意的笑容，似乎告訴她我并不擔心，因此她也不必擔心。我不能想象，我的笑容會給她帶來幫助。

我即將被從法庭帶到約翰內斯堡的福特監獄。當我從法院走出來并進入密閉的囚車的時候，數百名群眾歡呼并高喊“Amandla！”然后就是“Ngawethu！”這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常喊的應答式口號，前一句意思是“政權！”然后以“屬于我們！”呼應。群眾高聲喊叫著、歌唱著。當囚車緩緩駛出法院出口的時候，他們的拳頭紛紛擊打在囚車上。我被捕和被審判的消息刊登在各個報紙的頭版頭條：一條是“警察突然襲擊，結束兩年的追捕”；另一條是“納爾遜·曼德拉被捕”。從此，所謂的黑色海綠花不再逍遙法外。

幾天后，溫妮被允許來看我。她梳洗打扮了一番，至少從面容看上去與上次相比不那么憂傷了。她給我帶來了昂貴的睡褲和漂亮的絲綢睡衣。這些東西不適合在監獄里穿，倒是更適合出席沙龍。我沒有心思告訴她這些衣服根本不適合我在監獄里穿。但是，我知道，這些衣服是她表達愛的一種方式，也是表達與我長相廝守的決心。我感謝她，盡管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但是我們還是迅速地討論了家庭的有關事情，特別是她將如何自食其力和撫養孩子的問題。我提及了幾位會向她提供幫助的朋友的名字，還告訴她我的幾位仍然欠我錢的委托人。我告訴她，把我被捕的實際情況告訴孩子們，讓他們知道我將很長一段時間不在他們的身邊。我告訴她，我們并不是第一個面臨這種遭遇的家庭，經歷過這種艱難的人才更加堅強。我讓她相信我們事業的力量，相信朋友的忠誠。她那么愛我，對我那么忠貞，無論我發生什么情況，她都會堅決地支持我。管理秩序的警察假裝看不見，我們用自己的力量和被壓抑的情感相互擁抱和依戀，似乎這就是最后的離別。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兩個人當時都沒有想象我們的別離會經歷那么長的時間。準尉警察允許我陪同溫妮走到大門口，借此機會我能仔細地看看她，她看上去顯得孤單且自豪，我一直目送她消失在拐角處。

50...

在福特監獄，我由上校敏納爾監管。敏納爾是一個神情嚴肅而有禮貌的布爾人，他那些更強硬的同事認為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明確表示將把我安排在監獄醫院里，因為醫院是最舒適的地方，在那里我將能擁有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我可以在上面準備我的辯護材料。盡管監獄醫院確實是個舒服的地方，我可以在一張正常的床上睡覺，我以前在監獄里從來沒有過這種待遇，但是，他如此慷慨的真實原因是，醫院是關押我最安全的地方。要想進醫院，必須通過兩道高墻，每道墻都有全副武裝的警衛人員站崗，并且一旦進入，任何人想接近我被關押的地方都必須通過四道上了鎖的大門。媒體推測，組織上企圖搭救我，因此，當局盡最大努力防止這種事情的發生。

在媒體和非洲人國民大會中還有一種荒誕的說法：組織內部有人出賣了我。我知道，有的人說是我在德班的朋友G. R.奈杜，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媒體宣傳我是被白人和印度共產黨人出賣的，因為他們對我關于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堅持反對泛非主義方向的主張感到不安。但是，我認為這些故事是政府為了分裂大會運動組織而編造出來的，我把這種說法看作惡作劇。我后來不僅和瓦爾特、杜馬、喬·斯洛沃和阿邁德·卡特拉達討論過此事，而且也與溫妮議論過此事。我高興地看到，他們與我的感覺完全一致。溫妮被邀請出席了德蘭士瓦印度青年大會的年會，在我的鼓動下，她駁斥了這些毫無根據的謠言。報紙對她的美麗和口才大加宣揚。“我們將不會浪費時間去尋找誰出賣曼德拉的證據，”她向聽眾說，“這種宣傳是蓄意讓我們相互爭斗，而不是相互團結起來反抗國民黨人的壓迫。”

傳說最多的是與中央情報局有聯系的美國領事向當局告的密。這個說法也未得到證實，我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可靠的證據證明這種傳說的真實性。盡管中央情報局一直對支持美帝國主義的卑鄙行徑擔負著責任，但是，我不能把我的被捕歸咎于中央情報局。事實上，我在保守我個人的活動秘密方面是有疏忽的。根據回顧我認識到，當局有很多辦法得到我去德班的情報。不知是什么原因，事實上他們并沒有立即逮捕我。

我在福特監獄醫院里只住了幾天就被轉移到了比勒陀利亞。在約翰內斯堡，當局不限制探監，所以不斷有人來監獄探望我。探望能使一個人在監獄內保持精神振奮，而沒有人來探視則會使你心灰意冷。當局把我轉到比勒陀利亞的目的是讓我與我的家人隔開，并把我關押在一個很少有朋友探視的地方。

我被戴上了手銬，與另一個犯人一起被用舊面包車送往比勒陀利亞。面包車內十分臟，我們坐在一個滿是油污的備用輪胎上，輪胎隨著面包車的顛簸而不停地滑動。為我選擇的伙伴也讓人感到奇怪，他名叫恩卡迪蒙，是索韋托最殘忍的黑社會幫派勢力的一個成員。正常情況下，當局不會讓政治犯與普通刑事犯同乘一輛車，我懷疑他們是故意讓恩卡迪蒙恐嚇我。我猜測，他是警察局安排的一個線人。到達監獄的時候，我身上很臟，又感到氣憤，把我同恩卡迪蒙關進同一個牢房更讓我氣上加氣。我要求有一個單獨的地方，以便為我的案子做準備，最終我如愿以償。

當時，我每周只準許被探視兩次。盡管路途遙遠，溫妮仍然經常來看我，并且總是給我帶來干凈的衣服和好吃的食物。這是她表達對我支持的另一種方式，每次我換上一件干凈的襯衣的時候，我總是感覺到她對我的愛和忠貞。我知道她在家中帶著兩個小孩，每周一次頂著中午的太陽來比勒陀利亞看我是多么困難。另外，還有許多人也帶著食物來看我，其中包括一直對我十分忠誠的皮利太太，她每天中午都給我送可口的飯菜。

由于來看我的人十分慷慨，這使我對監獄內的這種富足感到有些不安，只能與別的犯人分享我的食物。這是被嚴格禁止的。為了回避這些限制，我用食物賄賂獄警們，讓他們網開一面。我抱著這樣的想法把一個鮮紅的蘋果送給一個非洲人獄警，他看著蘋果，用一句“我不要”冷冷地拒絕了我。非洲人獄警往往不是比白人更有同情心，就是更嚴格，并且似乎超過了他們的白人主子。但是，一會兒，那位黑人獄警看見一位白人獄警拿了那個被他拒絕了的蘋果后，也改變了主意。很快，我就把食物分給了所有的獄友。

通過監獄里的內部消息，我得知瓦爾特也被轉移到了比勒陀利亞。盡管我們被分開關押，但是，我們仍然設法互相聯系。瓦爾特申請保釋，我完全支持這一決定。長期以來，保釋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一直是個敏感問題。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反對保釋，因為保釋可以被解釋為我們是接受法律體系下種族主義約束的膽小的反叛者。我不認為這種觀點應該被到處亂用，并認為應該在一事一議的基礎上進行檢驗。即使是瓦爾特已經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總書記，我仍然認為應該想盡一切辦法保釋他出獄。他對組織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不能允許他在監獄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在這個問題上，保釋是可行的，并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他與我不同，我一直在地下工作，而瓦爾特卻沒有在地下工作過。我已經成為反叛和斗爭的公開象征，而瓦爾特則是在幕后操作。他同意不為我申請保釋，首先，這也不會被批準，同時，我也不想讓人誤解我不準備承擔我所選擇的地下生活的后果。

瓦爾特和我作出這個決定后不久，我又被轉到了福特監獄醫院。聽證會將在10月份舉行。監獄的好處是根本談不上的，但是封閉的環境卻有利于學習。我開始利用這個環境攻讀法學學士，通過拿到這個學位，我就可以當辯護律師。我到達比勒陀利亞地方法院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當局發了一封信，告訴他們我要學習，希望允許我買一本《侵權法》，這是學習大綱的一部分。

幾天后，警察上校奧卡木博走進了我的牢房。他是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的監獄長，也是監獄官員中比較壞的一個家伙。他幸災樂禍地說：“曼德拉，這次抓住你了！”然后又說，“你為什么要買一本關于火炬的書？伙計，莫非你要把它運用于你的破壞活動？”我直到他出示了我要購買被他稱作“The Law of Torches”（應是The Law of Torts，即《侵權法》）的那封請求信，才知道他所說的話是什么意思。我對此輕蔑地一笑，他為我沒有拿他當回事而惱羞成怒。南非荷蘭語中的“torch”就是toorts，與tort很相似。我向他解釋說，英語中的tort是一門法律學科，并不是可以用來點燃炸彈的火把。他聽后氣沖沖地走開了。

一天，我正在福特監獄的院子里鍛煉，這種鍛煉包括慢跑、快跑、俯臥撐、仰臥起坐等。一位英俊的高個子印度人進入了我的視線，他名叫穆薩·迪納特。我只知道他是一個成功的甚至可以說是業績輝煌的商人。他因欺詐罪而被判處了兩年監禁。在監獄外，我們將仍然保持相識的關系，但是，監獄是友誼的孵化器。迪納特經常陪我在院子里慢跑，有一天他問我，如果他獲得監獄長的批準也和我一起住在監獄醫院里，我是否反對。我告訴他對此我會十分高興，但是我心中暗想，監獄當局絕不會允許。事實證明我錯了。

真是天大的怪事，一個像迪納特這樣已經判刑的監禁犯人竟然被允許與一個等待審判的政治犯關押在一起。但是，我沒說什么，因為我喜歡有個人與我做伴。迪納特很有錢，對于監獄當局來說，他就是一個財神，作為對他的錢的回報，他享受許多特權：他穿白人犯人穿的衣服，享受白人犯人的伙食，在監獄里根本不用勞動。

一天夜晚，我驚奇地發現監獄長敏納爾上校和一位著名的南非白人律師來提他。然后，迪納特離開監獄到外面過夜，直到早晨才回到監獄。如果不是親眼目睹此事，我怎么也不會相信。

迪納特給我講了許多關于內閣部長中間的金融欺詐和腐敗的故事，我發現很有趣。這讓我確信種族歧視是何等敗壞，它使各個領域都從道德上出現了腐敗。我小心謹慎地避免與他討論任何政治或敏感性的問題，以防他或許也是一個線人。他有一次讓我告訴他關于我的非洲之行的事情，我干脆搪塞了過去。迪納特為盡快獲釋而做了足夠的暗中操縱的事情，結果是兩年的徒刑只坐了四個月的牢。

越獄逃跑能達到雙重目的，它使自由戰士避免坐牢，這樣他就可以繼續戰斗，而且從精神上對斗爭提供巨大的鼓舞，對敵人則是一種很大的公開打擊。作為一個被監禁的犯人，我總是企圖越獄逃跑。在多次往返于監獄官員的辦公室期間，我仔細地觀察了圍墻、獄警的活動規律和用來鎖大門的鎖和鑰匙的類型。我對監獄的地形特別是監獄醫院所處的準確方位和通向監獄外面的大門都畫了詳細的草圖。這個草圖被偷偷送給了組織，并告訴組織看過后立即把它銷毀。

當時有兩套方案：一套是穆薩·迪納特制訂的，對此我沒有采納；第二套方案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制訂的，這套方案由喬·斯洛沃告訴了我。這套方案涉及行賄、配制鑰匙和準備假胡子，并準備通過把它縫在我的一件上衣的墊肩內設法帶進監獄，想法是讓我越獄逃跑后裝扮成一個大胡子。我認真考慮了這個方案，認為它不成熟，失敗的可能性太大。這樣的失敗對組織來說可能是致命的。在與喬見面期間，我遞給了他一張條子，表明了我的看法。我寫道，民族長矛軍對于采取這樣的行動還不具備條件。即使是一支精銳的、訓練有素的部隊也可能無法完成這樣的使命。我建議把這套方案推遲到對我作出判決、當局對我放松警惕之后再加以實施。我最后寫道，請閱后銷毀。喬和其他人都采納了我關于不逃跑的建議，但是，他決定把我寫的這個條子作為歷史資料保留起來，后來我卻在一個非常不幸的時刻發現了它。

51...

第一次聽證會定于1962年10月15日禮拜一舉行。組織上成立了“釋放曼德拉委員會”，發動了以“釋放曼德拉”為口號的生氣勃勃的運動。全國各地都舉行了抗議活動，標語口號出現在了建筑物的墻上。政府則以禁止與我的監禁有關的所有集會作為報復，但是解放運動組織沒有理睬這種限制。

在準備禮拜一聽證會的過程中，釋放曼德拉委員會在法院舉行了群眾示威活動。方案是讓群眾站立在押送我的囚車將要駛過的道路兩側。通過媒體記者的報道、探視者之間的談話甚至獄警之間的談話，我得知釋放曼德拉委員會將要舉行規模龐大的集會。

禮拜六，我正在準備下個禮拜一的聽證會，此時有人吩咐我立即打點行李：聽證會被轉移到了比勒陀利亞，當局沒有任何通知，沒有一位有同情心的獄警告訴我，也沒有人知道我已經離開了約翰內斯堡。

但是，運動組織的反應是迅速的，到禮拜一上午聽證會開始的時候，老猶太會堂里擠滿了支持者。叛國審判4年后，老猶太會堂就如同我的第二個家。我的法律顧問喬·斯洛沃由于被禁止僅限于在約翰內斯堡活動，不能出席聽證會，我乘機讓鮑勃·赫普爾代替喬·斯洛沃。

在那個禮拜一上午，我穿著傳統的科薩豹皮服裝進入了法庭。支持的人群行動一致，他們揮舞著拳頭高聲喊著“Amandla!”（政權！）和“Ngawethu!”（屬于我們！）。我的豹皮服裝令旁觀者們感到十分振奮，他們之中有許多朋友和親屬，有的甚至是從特蘭斯凱一路趕來的。溫妮也戴著傳統的串珠頭飾，穿著傳統的拖到腳跟的科薩裙趕到了法院。

我之所以選擇傳統服裝，為的是加強我是一個黑色非洲人走進白人法庭的印象。我原原本本地把我的人民的歷史、文化和傳統背在了我身上。那天，我感覺我自己就是非洲民族主義的化身，是非洲艱難而高尚的過去和命運未卜的將來的繼承人。豹皮服裝也象征著對白人司法制度的蔑視。我很了解，當局將為我的豹皮服裝感到害怕，正如那么多的人害怕非洲真正的文化一樣。

當人群安靜下來的時候，聽證會已經開始了。我正式與公訴人寶施先生和法官范·赫爾頓先生見面，自從當律師的時候我就認識這位寶施先生，也早就熟悉法官范·赫爾頓。我立即提出申請要求推遲兩個禮拜再進行審理，因為我被押到比勒陀利亞沒有被提供通知我的律師的機會。最后，我被批準延期一周審理。

在我回牢房的路上，一位非常神經質的白人獄警告訴我，監獄長雅各布斯上校要我交出豹皮服裝。我說：“你可以告訴他，他不可能得到它。”這個獄警是一個膽小鬼，他開始顫抖起來。他苦苦乞求我，說他拿不到那套豹皮服裝就會被解雇。我有些同情他，說：“請注意，告訴你的監獄長，告訴他這是曼德拉說的。”不大一會兒，雅各布斯上校親自來到我的面前，他要我交出被他叫做“毯子”的那套服裝。我告訴他，對于我選擇在法庭上穿什么服裝，他無權干涉，如果他想沒收我的豹皮服裝，我將把這件事一直告到最高法院。上校再沒有繼續索要我的“毯子”，但是當局只允許我在法庭上穿它，不允許在往來法庭的路上穿，以防止“影響”其他犯人。

當一周后重新開庭的時候，我被允許在我被要求辯護前可以向法庭申訴。“我希望能夠簡單地說明，”我解釋說，“這個案子是對非洲人民的遠大理想的審判，因此，我想自己辯護是正當的。”我想讓這個審判班子、旁聽者和媒體明白，我要把政府推上法庭。然后，我申請取消法官的審理資格，因為我認為，我從道義上不一定必須遵守我沒有代表的議會制定的法律，我也不可能從一個白人法官那里討得公道。

我為什么要在法庭上面對白人法官、白人公訴人，并被白人法警押解？有哪位能夠坦誠而認真地說在這種氣氛中正義的天平能夠擺平？為什么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非洲人被他自己的親戚朋友和難兄難弟審判的榮譽？我將告訴閣下這是為什么：這種鐵板一塊的種族歧視性司法制度確保了由法庭主持的正義要符合這個國家的政策，不管這種政策是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與整個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正義規范相抵觸……閣下，我十分憎恨種族歧視和種族歧視的各種表現。我將與種族歧視戰斗一生。我現在與它戰斗，直到我的生命結束，我將一直與它戰斗。我極其痛恨我周圍擺出的這種架勢，因為這讓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個黑人。這是大不應該的。

在審理期間，公訴人從全國各地，其中包括特蘭斯凱和西南非，找了100多位證人。他們當中有警察、記者、鄉鎮負責人和印刷商。他們大多數都證明我非法出國和煽動非洲工人在1961年5月舉行了三天罷工。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上我也沒有爭辯。從技術上講，我對兩種指控都不否認。

公訴人叫總理的私人秘書巴納德證明我曾經給總理寄過信，要求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并告訴他如果不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我們將組織三天的大罷工。在對巴納德進行反詰中，我首先向法庭宣讀了我寄給總理的那封信，這封信要求總理代表全南非人民大會起草一個非種族歧視的新憲法。

曼德拉：是你把這封信放在了你的總理面前的嗎？

證　人：是的。

曼德拉：那么，總理對這封信有任何答復嗎？

證　人：他沒有給寫信人任何答復。

曼德拉：他沒對這封信給予答復，那么，你同意不同意說這封信提出了對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最關心的問題？

證　人：我不同意。

曼德拉：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人權問題、人民自由問題對非洲人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問題？

證　人：是的，的確是如此。

曼德拉：這些事情在其中被提到過嗎？

證　人：是的，我認為提到過。

曼德拉：……你已經同意這封信提出了像自由權利、國民自由等問題？

證　人：是的，這封信提出了。

曼德拉：那么，你當然知道非洲人不享有信中所要求的權利？他們被政府否定了這些權利。

證　人：有些權利。

曼德拉：有沒有非洲人是議會的議員？

證　人：沒有。

曼德拉：也沒有非洲人能當上省和市政府的官員吧？

證　人：是的。

曼德拉：非洲人在這個國家里有沒有選舉權？

證　人：就議會而言，他們沒有選舉權。

曼德拉：是的，這就是我要說的，我們正在討論國家的議會及其他政府部門，其中包括省政府和市政府。他們有沒有選舉權？

證　人：沒有，他們沒有選舉權。

曼德拉：你會不會同意我說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文明國家，作為一個總理不回復提出關系到國內大多數公民的重要問題的信將是令人憤慨的，你同意嗎？

證　人：我不同意這一點。

曼德拉：你不同意作為一個總理不理睬提出關系該國多數公民的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不正常的嗎？

證　人：總理沒有不理睬這封信。

曼德拉：請你僅僅回答我的問題。你認為作為一個總理不回答關系到這個國家多數人的重要問題的請求是正常的嗎？你說那是不是錯誤的？

證　人：總理對這封信作出了答復。

曼德拉：巴納德先生，我不想對你不禮貌。你應該僅僅回答我提出的問題。我提出的問題是，你同意不同意作為一個總理不回答關系到國家大多數人的重大問題是極其不正常的？

巴納德先生和我絕對無法達成共識。最后，他只是說那封信的口氣是挑釁性的、不禮貌的。因此，總理沒給予答復。

在整個審理過程中，公訴人和法官反復地詢問我準備叫多少證人出庭作證。我總是回答說：“我打算至少叫與政府叫的證人一樣多的證人。”當政府最終結束起訴的時候，法庭上靜悄悄的，期待著我開始辯護。我站了起來，不但沒叫第一位證人出庭作證，反而實事求是地宣布我根本沒叫任何證人，這時我突然宣布結束辯護。法庭上一片議論聲，公訴人則禁不住感嘆了一聲：“我的上帝！”

我從一開始就誤導了公訴人和法官，因為我知道對我的指控是準確的，政府說的是實實在在的，我認為沒有必要叫證人出庭作證和為自己辯護。通過我的反詰，目的是迫使法官放棄自己的審判資格。我已經對法庭的不公正發表了自己的聲明。我認為，企圖叫證人否認毋庸置疑的事實是沒有什么好處的。

法官對我的行動感到吃驚，他帶有幾分懷疑的口氣問我：“你有沒有別的什么事情要說？”

“閣下，我認為我并沒有犯罪。”

“這就是你要說的全部？”

“閣下，恕我直言，如果我還有什么別的要說的話，我早就說了。”

公訴人然后匆匆忙忙地整理了一下他的資料，試圖準備發表他根本沒有預料要發表的講話。他簡單地在法庭上發表了一個講話，并提請法官在兩項指控的問題上判我有罪。然后，審理被延期到第二天進行，那時我將有機會在法官判決前發表請求從輕判決的陳述。

第二天上午開庭前，我在一個辦公室里與鮑勃·赫普爾談話，他一直在就這場官司為我提供咨詢。我們高度贊揚了頭一天發生的事實，即聯合國大會第一次投票贊成對南非進行制裁。鮑勃還告訴我，在伊麗莎白港和德班實施的破壞活動既是對聯合國投票表決結果的慶祝，也是對審判我的抗議。我們正在討論的時候，公訴人寶施先生走了進來，并請鮑勃原諒他打斷了我們之間的談話。

“曼德拉，”他等鮑勃走后說，“我今天不想到法庭上來了。這是我在我的生涯中第一次鄙視我所做的事情。我請求法庭判你坐牢是對我精神上的一種傷害。”然后，他伸出手與我握手，并表達了一切將證明我無罪的希望。我感謝他對我的好意，并向他保證我決不會忘記他所說的話。

當局那天提高了警惕。法庭里的人似乎比第一天開庭時還要多，150個“非歐洲人”坐席全都坐滿了。溫妮也來到了法庭，并且穿上了科薩民族服裝。另外還有來自特蘭斯凱的一些親屬。幾百名示威群眾站在法院的門口，警察的人數似乎與旁聽者的人數一樣多。

當我走進法庭時，我舉起右拳高呼：“Amandla！”（政權！），然后迎來了大家強有力的回應：“Ngawethu!”（屬于我們！）法官敲著木槌，讓大家遵守秩序。當法庭靜下來的時候，他對指控進行了總結，然后我有了說話的機會。我要求從輕判決的請求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其實，那根本不是一個法律請求，而是一個政治信仰的聲明。我要向法官說明，我為什么成了現在這樣的人，我為什么做了我已經做過的事情，以及如果有機會我為什么還去做這樣的事情。

許多年前，我還是特蘭斯凱一個村子中正在成長的一個孩子的時候，我聽過部落長者所講述的白人沒來之前的好日子。那個時候，人們在他們的國王和權威人士的開明領導下和睦相處，可以沒有任何障礙地在這個國家自由地、滿懷信心地遷徙。國家無論是從名義上還是從權利上都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擁有這塊土地、這片森林、這些河流，我們擁有土壤下面的礦藏和這個美麗國家的財富。我們建立和管理著我們自己的政府，控制著我們自己的武裝，我們組織我們自己的商貿活動。老人們給我們講我們祖先在保衛祖國的過程中與入侵者進行戰斗的故事，以及在那些英雄年代涌現的英雄人物……

我很欣賞這個國家的早期非洲社會結構和組織，這也從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的政治觀的演變。土地是當時的主要生產資料，它為全部落所擁有，無論什么東西都不屬于某一個人。沒有階級，沒有貧富差別，也沒有人剝削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是政府的基礎。對這些基本原則的承認可以在政務院章程中看得到，這種章程有各種各樣的叫法：有的把它叫做“Imbizo”，有的把它叫做“Pitso”，還有的把它叫做“Kgotla”，用這種章程治理部落的事務。政務院十分民主，部落里的每個成員都能夠參加審議議題。酋長和大臣、將軍和巫師都參加意見，并努力影響政務院的決定。政務院是一個舉足輕重并很有影響的機關，部落每采取一項重大措施，都要有它的介入。

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許多原始的和不可靠的東西當然不能符合現代的要求。但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已經有了民主革命的萌芽。在這樣的社會里，沒有人淪為奴隸或苦役；在這樣的社會里，沒有貧窮、短缺或不安全感。這是一段至今仍然使我和我的政治斗爭中的戰友們都受鼓舞的歷史。

我告訴法庭，我如何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民主和非種族歧視主義如何成為我的最高信仰。我也說明了自己作為一名律師常常不得不在服從法律還是服從良心之間進行選擇。

我要說，在這個國家里，任何有思想的非洲人的一生都會被迫不斷地面對一面是他的良心另一面是法律這兩者之間的沖突。這當然不是這個國家特有的一種沖突，在每個國家中，有良心、有思想、有感觸的人們都會面臨這種沖突。最近在英國，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或許是西方最受人尊敬的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伯爵被判刑，他正好犯了與今天我所犯的同樣類型的罪，因為他為了自己的良心而觸犯了法律，抗議他的政府堅持核武器政策。他只能違背法律并承擔違背法律帶來的后果。我也只能這樣做。這個國家中的許多非洲人也只能這樣做。作為正實施的法律，作為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被逐步修改的法律，特別是作為國民黨政府制定的法律，按照我們的觀點，它是一種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不可容忍的法律。我們的良心促使我們必須對法律表示抗議，表示反對，并設法修改法律……我認為，人們不能對正義無所作為、無所表示、無所反應，不能不抗議壓迫，不能不為建設一個好的社會、好的生活而作出努力。

我詳細地列舉了政府多次動用法律，通過禁止、限制和審判等形式干擾我的生活、事業和政治工作。

是那樣的法律讓我變成了一個罪犯，但是我的罪并不是因為我的所作所為，而是因為我的主張，因為我的思想，因為我的良心。

這樣的狀況使一個人成為社會的罪犯，難道還有人會對這件事有任何懷疑嗎？由于政府的原因使這樣一個人做好了準備去過違法者的生活，就像根據這個法庭所提供的證據證明我幾個月中所過的生活一樣，這難道不讓人感到奇怪嗎？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內，我一直是艱難的。我離開了我的妻子兒女，告別了美好的生活，結束了我的律師事業，我有時盼望在飯桌上與家人團聚，而不是去過連續不斷地被警察追捕的生活，遠離我最親近的那些人，在我自己的國家里，不斷地面對偵察與逮捕的危險。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遠比坐牢還要困難的生活。沒有哪個有理性的人會放著文明社區中正常的、有家有業的社會生活不過，而自愿選擇這樣的一種生活。

但是，這樣的時期到了，就像出現在我的生活之中。在這樣的時期，一個人被否定了過正常生活的權利，只能過違法者的生活，因為政府那么熱衷于使用法律，把罪行強加在他的身上。眼下，我就是被逼到了這個境地。但是，我對自己的決定并不后悔。在這個國家里，還會有其他人在警察的迫害和政府的管理下被逼上同樣的違法道路，繼承我的事業。對這一點我深信不疑。

我列舉出許多次我們把我們的冤枉申訴交給政府，而每次都被忽視或撇在一邊。我解釋說，我們1961年舉行的罷工是在政府既不采取任何措施，又不與我們對話或者滿足我們的要求之后所作的最后努力。政府通過使用暴力對付我們的非暴力要求，從而挑起了新的暴力。我申明，政府的行動使我們采取了更具有戰斗性的立場。我說，在我的整個政治生命中，我特別想與那些其能力和貢獻都遠比我自己大的同仁并肩戰斗。許多人已經在我之前為他們的信仰付出了代價，在我之后也將有許多人會這樣做。

我在宣判之前告訴法官，不管政府強加給我什么樣的懲罰，都不會改變我獻身于斗爭的決心。

閣下，我并不認為，這個宣判我的罪名并強加刑罰于我的法庭應該會被這樣的信念所打動，即刑罰將會嚇倒那些堅信其道路正確的人。歷史表明，刑罰嚇不倒已經喚起良心的人們，也嚇不倒我的人民和以前與我一起工作的同仁。

我準備接受對我的判決，盡管我知道一個非洲犯人在這個國家的監獄中的處境是多么悲慘和絕望。我已經領教過這種監獄生活，知道即使是在監獄的高墻后面種族歧視也是何等的惡劣。但是，這些考慮不會讓我偏離我所走過的道路，也不會使像我這樣的其他人偏離他們的道路。因為對他們來說，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里，自由是他們的最高理想，任何東西都不能讓這些被判刑的人丟掉他們的最高理想。我對監獄外全國人民所遭受到的令人畏懼的處境的憎恨，驅使我寧愿走進監獄去承受令人恐懼的痛苦。

不管閣下在這個法庭上決定給我定什么罪，請你們放心，我將在刑滿后繼續前進，就像人們總會憑著他們的良心在前進一樣。當我從監獄中走出來的時候，我將憑借我對種族歧視的憎恨而繼續前進，重新振作起來，為消除那些不公正而奮力斗爭，直到最后把這些不公正徹底消滅，并永遠地把它們消滅……

我已經為我的人民和南非盡到了我的責任。我相信我們的子孫將會宣布我是無辜的，在這個法庭上被判處有罪的應該是政府成員。

當我發表完講話的時候，法官宣布休庭10分鐘，以考慮給我什么樣的懲處。在離開法庭前，我轉過身來看了大家一眼。我對我將受到的懲處并不抱幻想。10分鐘后，法官在充滿緊張氣氛的法庭上宣布了對我的判決：因鼓動人們罷工判刑3年，因沒有護照出國判刑2年，總共判處5年徒刑，并且不允許保釋。這是一個嚴厲的懲處，旁聽席上有人放聲大哭。當宣判結束的時候，我轉身面對旁聽席再次握緊拳頭高呼了三聲“政權”，然后，大家開始唱起我們優美的國歌“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當我被帶走的時候，許多女士嗚嗚地大哭起來。旁聽席上的騷動使我暫時忘記了我將走進監獄，去承受南非當時對政治犯最嚴厲的懲處。

在樓下，我被允許簡短地向溫妮告別。這時，她一點都不憂傷，精神狀態很好，也沒有掉淚，似乎很有信心。她是我的夫人，同時也是我的同志。她努力讓我增強信心，當我乘坐在警車內離開法院的時候，我能聽見車外大家歌唱“Nkosi Sikelel’ iAfrika”的聲音。

52...

監獄不僅剝奪了你的自由，還企圖剝奪你的個性。每個人都穿一樣的囚服，吃一樣的飯，遵循同樣的作息時間。這確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專制政府，不允許有任何獨立或個性。作為一名自由戰士和一個男子漢，他必須與企圖剝奪他的一切個性的監獄進行斗爭。

我被從法院直接帶到了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我對這座駭人聽聞的、陰森森的紅磚建筑物非常熟悉。但是，我現在是一個被判了刑的犯人，而不是一個等待審判的拘留犯，所受到的待遇與等待審判的被監禁者沒有絲毫區別。我的衣服被扒走了，雅各布斯上校最終把我的豹皮服裝也給沒收了。我領到了一套非洲人專用的標準囚服：一條短褲、一件粗卡其布襯衣、一件帆布夾克、一雙襪子、一雙拖鞋和一頂布帽子。只有非洲人才發給短褲，因為只有非洲人才被監獄當局視為“男仆（boys）”。

我告訴監獄當局，我不穿短褲，并告訴他們我準備去法院提出抗議。后來，當獄警給我送來晚飯的時候，我發現是又冷又稠的玉米片粥和半茶匙糖。我拒絕吃這種食物。雅各布斯上校仔細地考慮了這件事，決定允許我穿長褲子，吃我自己的傳統食物，條件是同意被單獨關押。“我們準備給你與其他政治犯不同的待遇，”他說，“但是，你必須被單獨關押。伙計，我希望你能同意。”我向他保證，只要能讓我穿我所選擇的衣服和吃我所選擇的食物，單獨關押也行。

在后來的幾周時間里，我被完全單獨關押起來，我見不到別的犯人的面孔，聽不見別的犯人的聲音。我每天被關押23小時，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時的活動時間。我以前從來沒有被單獨關押過，真是感覺度日如年。關押我的囚室沒有自然光，一只燈泡在頭頂上一天24小時地亮著。我沒有手表，常常把傍晚當成了半夜三更。我沒有書看，沒有書寫用品，也沒有人跟我說話。我的心開始與外界隔絕，但很想感受一下外面的事物，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覺得，寧愿挨一頓打也不愿意被單獨關押了。被單獨關押了一段時間之后，哪怕是與囚室內的蟲子在一起也感到高興，有時甚至想與一只蟑螂一起聊一聊。

我有時能見到一位中年黑人獄警，于是，有一天我想用一個蘋果賄賂他，讓他與我說說話。“老人家，”——這是對別人的尊稱，原意是父親——我說，“我能送你一個蘋果嗎？”他對我的所有表示都保持沉默。最后，他說：“伙計，你要穿長褲子、吃好飯，現在你如愿以償，但你仍然不高興。”他的話是對的，因為沒有什么事情比沒有人做伴更使人失去人性。幾周后，我準備放下自尊，告訴雅各布斯上校我將用長褲子去換取有人與我做伴。

那幾周期間，我有足夠的時間考慮我的命運。一個自由戰士應該與他的人民在一起，而不應在監獄里，我最近在非洲獲得的那些知識和關系沒有被應用于斗爭之中，而是同我一起被禁閉起來。我為不能把自己的知識用于創建一支自由軍隊而詛咒著。

不久，我開始抗議我的監禁環境，要求與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里的其他政治犯關在一起，其中就包括羅伯特·索布克韋。我的要求最后被同意了，但雅各布斯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如果我再放肆就會導致嚴重后果。我沒想到我這輩子竟曾那么渴望吃冷玉米片粥。

我除了希望有人做伴之外，還很想與索布克韋及其他人談一談，他們多數都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成員。因為我認為，在監獄中可能會取得在監獄外無法取得的一致。監獄條件有利于化解爭議，使大家發現團結一致的因素多于分裂的因素。

當我被帶到關押其他犯人的院子里的時候，我們相互熱情地打招呼。除了索布克韋，還有“貿易工會南非大會”的領導成員約翰·基茨韋；有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艾倫·莫萊特，他是《新時代》的一位雇員；有著名的共產黨貿易工會的成員斯蒂芬·德福，他也是“泛非大會”的成員。羅伯特請我就我的非洲之行作個介紹，我高興地這樣做了。我坦誠地介紹了其他非洲國家對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是如何理解的。在介紹完情況之后，我說有一些問題需要我們探討。但是，當索布克韋與我剛開始取得一定的共識之后，監獄當局就設法把我們隔離開了。我們被關押在同一條走廊的不同的囚室里，而且兩個囚室分別位于走廊的兩頭。

有時，當我們挨靠著坐在監獄院內的地上縫補又臟又破的郵袋時，我們確實有機會說說話。我總是對索布克韋很尊重，并發現他是一個和氣而有理性的人。但是，我們對面臨的主要問題——監獄的條件顯然是有分歧的。索布克韋認為，要改善監獄的惡劣條件，首先就要承認政府是有權把他關進監獄的。而我則認為，在喪失體面的條件下生活總是難以接受的；在整個歷史中，政治犯都把為改善監獄的條件而斗爭當成了他們責任的一部分。索布克韋認為，只有當國家發生變化時，監獄的條件才會跟著發生變化。我完全贊成這個觀點，但是，我不明白在我們現在唯一能進行斗爭的地方為什么不去為此而斗爭。我們從來也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達成過一致的意見。不過，當我們向監獄當局遞交聯絡信表示對監獄條件不滿的時候，我們也確實有了進步。

索布克韋在監獄內沒有屈服過。但是，與在比勒陀利亞相比，他顯得有點神經質和暴躁，我把這歸咎于斯蒂芬·德福。德福對索布克韋構成了一種刺激，他奚落他、辱罵他，并向他挑戰。就是在最好的情況下，德福也是一個難以相處的人：他脾氣不好，喜歡爭論，專橫傲慢。他還能說會道、知識淵博，并且精通俄國歷史。他是一個斗士，但是他對誰都斗，甚至包括他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德福與索布克韋幾乎天天吵嘴。

我熱心地與索布克韋討論政策和策略問題，其中與他討論的問題之一就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那個“1963年獲得自由”的口號。當時已經是1963年，自由還是遙遙無期。“我的老弟，”我對索布克韋說，“作為一個領導人，沒有比提出自己知道不能實現的目標更危險的了，這會在人民中間引起不切合實際的希望。”

我是用非常尊重他的口氣說這件事的，但是，德福闖了進來，并開始指責索布克韋。“老兄，”他說，“你遇見了你的對手曼德拉，你知道他是正確的。”德福沿著這個話題繼續往下說，使索布克韋非常惱火。他告訴德福說：“不要打擾我。”但是德福就是不停嘴：“老兄，人們正在等著你。他們想殺你，因為你欺騙了他們。你不過是個混子。老兄，你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

德福也在竭力讓我從感情上與他疏遠。每天早上，當獄警來檢查時，他總是向他們抱怨，抱怨飯菜，抱怨監獄里的條件，說冷道熱地不停地抱怨。一天，一個獄警對德福說：“伙計，你為什么每天早晨都抱怨？”

“我之所以抱怨，是因為我有責任抱怨。”斯蒂芬說。

“但是，你看曼德拉，”獄警說，“人家就不每天抱怨。”

“嗨！”他輕蔑地說，“曼德拉是個害怕白人的小子，我甚至連他是何許人都不知道。有一天早上，我醒來發現每家報紙都在說‘曼德拉，曼德拉，曼德拉’，我自言自語地說，‘這個曼德拉指的是誰？’‘我將告訴你曼德拉是誰，他是被你們這些人以某種我不理解的理由樹起來的人，曼德拉指的就是他！’”

瓦爾特·西蘇陸與我們一起被關押了兩個禮拜，當我在比勒陀利亞受審的時候，他也因煽動人們罷工而在約翰內斯堡受審。他被判了6年監禁。我們在監獄里有幾次交流的機會，并討論了瓦爾特的申請保釋問題。當時，他的請求被擱置在了一邊。對這個動議，我衷心地給予支持。兩周后他就被保釋了，組織上指示他轉入地下，讓他在地下繼續領導斗爭，他干得很好。

瓦爾特走后不久，我正與索布克韋一起去監獄醫院的時候，在大約25碼遠的院子內見到了納納·西塔。西塔是著名的印度人運動領袖，曾領導了1952年博克斯堡的反抗運動。他由于拒絕騰房子而被比勒陀利亞地方法官判了刑。他在那所房子里住了40多年，那里緊挨著《社團區域法》公布的“白人區”。他佝僂著身子，盡管患有嚴重的關節炎，但是卻一直赤著腳。這讓我這個穿著涼鞋的人很難過。我想走上前去與他打個招呼，但是，在六七名獄警的眼皮底下我只好繼續向前走。

我忽然一陣頭暈目眩摔倒在水泥地上，我的左眼眉被碰了一道深深的大口子，需要縫三針。早在福特監獄的時候我就被診斷為患有高血壓，一直在服降壓藥。這次暈倒顯然是服用過量的藥片造成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并堅持吃低鹽食物，我治好了這個毛病。

那天下午，溫妮來監獄探望了我，這是自從我被判刑以來她第一次來看我。縫不縫傷口倒無所謂，但我不想失去這次機會。她看到我的時候十分著急，但是我安慰她說我很好，并且把摔倒的情況和經過向她作了說明。盡管這樣，仍有傳言說我的身體已經被搞垮了。

53...

1962年10月在我被審期間，非洲人國民大會召開了自1959年以來的第一次年會。由于非洲人國民大會是非法的，會議在貝專納邊界另一邊的洛巴策舉行。這次會議是一個里程碑，因為它實現了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民族長矛軍之間的聯合。盡管全國執行委員會聲明：“我們的重點仍然是采取群眾政治行動，民族長矛軍只是作為我們斗爭的一個軍事翅膀。”這是為了制止當時“Poqo”不負責任的恐怖主義行動。“Poqo”是科薩語，意思是“無黨派者”或“獨立者”。這一組織與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有松散的聯系。他們采取恐怖行動的對象是非洲人中的通敵者和白人。非洲人國民大會要求人們認識到這一新的戰斗特點，同時也要認識到新的軍事行動是有節制和負責任的。

政府作出了決定，加速實施“隔離”計劃，以便向世界表明，這種隔離允許種族有自己的“自由”。樣板地區就是特蘭斯凱。1962年1月，沃爾沃德宣布，南非打算批準成立特蘭斯凱“自治政府”。1963年，特蘭斯凱成為南非“自治政府”的起始地。1963年11月舉行了投票，選舉特蘭斯凱立法議會。但是，特蘭斯凱選民選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立法議會代表都反對這項政策。

班圖體制最終得以實行。實際上選民們都反對，他們僅僅是參加了投票而已。盡管我不贊成班圖體制，但是，我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應該利用這一體制及其內部機構作為宣傳我們的政策的平臺。特別是我們有那么多的領導人當時正在被監禁、禁止或流放，有這樣一個平臺是十分重要的。

反對班圖當局的恐怖活動增加了。隨著破壞行動的開展，政府的警惕性也越來越高。新司法部部長約翰·沃斯特是一個特別沒有感情的人。他自己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反對政府支持同盟組織而被拘留過。他認為，鐵拳是對搞顛覆活動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回答。

1963年5月1日，政府頒布法律，按照沃斯特的解釋，目的是“粉碎民族長矛軍的脊梁骨”。《普通法修正案》，又叫《90日拘留法》，撤銷了人身保護權，授權任何警察只要懷疑任何人有政治犯罪，不需要逮捕證就可以逮捕。凡是被逮捕者，不需要經過審訊、起訴、律師辯護和自我申辯就可以被拘留90天。根據沃斯特的惡意解釋，“90天拘留期”可以一直無限期地延長。這項法律使這個國家變成了一個警察政府，沒有哪一個專制者能給當局像“90天拘留”這樣多的權力。結果，警察變得更加野蠻：被監禁者常常遭到毒打，我們很快就聽到了電擊、窒息和其他形式的刑罰。在議會中，只有自由進步黨的代表海倫·蘇茲曼一人對這一法案投了反對票。

對非法組織的成員增加了罪責，判刑從5年直到繼續堅持共產主義或其他被取締組織的目標可判處死刑。政治犯可以再次被拘留，正如我在1963年所看到的那樣，索布克韋3年判刑期滿后，政府不但沒有釋放他，反而再次宣布對他逮捕，然后未經審訊就把他投進了羅本島監獄。

沃斯特通過在1962年6月出臺《破壞法》也創下了立法之最，這項法律允許實施軟禁，而且更嚴厲的處罰也不必通過法院。它嚴格限制了公民的自由，達到了最極端的法西斯專制的程度。破壞罪本身最輕也需要判處5年監禁，而且不準保釋，最高處罰可以判處死刑。由于這項法律管轄面很寬，連“擅自進入”或非法擁有槍支也構成破壞罪。議會通過的另一項法律則禁止被禁止的人繼續發表任何言論，我說的或曾經說過的話都不能在報紙上報道。1962年底，《新時代》周報遭到了取締，而擁有被取締的刊物也被視為一種犯罪，可以被判處長達2年的監禁。對軟禁也作了規定，大家都知道，這種規定曾被用在了白人政治活動家海倫·約瑟夫身上。

54...

5月末的一個夜晚，一個獄警來到了我的囚室，他要我收拾好我的東西。我問他為什么，但他沒有回答。不到10分鐘，我就被押解到了接待室，在那里我看到了其他三個政治犯：德福、約翰·基茨韋和艾倫·莫萊特。奧卡木博上校三言兩語地告訴我們，要把我們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哪里？”德福問。“很美麗的地方。”奧卡木博說。“哪里？”德福又問。“海島。”奧卡木博說。這里說的海島只有一個，那就是羅本島。

我們四人被銬在一起并押上一輛沒有窗子、只有一個馬桶的囚車。我們行駛了一整夜才到達開普敦，到達開普敦海港時已經是下午晚些時候。四個人被銬在一起，并在一輛行駛的囚車中使用一個馬桶，那可不是一件安逸或愉快的事。

開普敦港有許多武裝警察和神情緊張的便衣官員，我們只好站在一條木制渡輪的船艙里，手上仍然戴著手銬。當船只駛離波濤洶涌的海岸時，站在船艙里是非常困難的。船艙上面只有一個透光、通氣孔，當然除了透光、通氣外還有另外一個用途：獄警們喜歡從上往下沖著我們溺尿。當我們被帶上甲板的時候，天還沒黑，我們第一次看見了羅本島。島上是一片綠色，十分秀麗，乍看上去，與其說這是監獄，倒不如說是一塊度假勝地。

“Esiquithini”（島上），這是科薩人對這座距離開普敦海岸18英里的、狹窄的、被風吹得巖石裸露的小島的稱呼。每個人都知道它指的是哪個島，我孩提時代也曾第一次聽說過這個島。自從1819年第四次科薩戰爭中科薩軍隊那位6英尺6英寸高的統帥馬卡納（也被稱作恩凱樂）被英國人囚禁在那里之后，科薩人對羅本島就十分熟悉。此前，馬卡納曾經領導一支萬人軍隊在格雷厄姆斯敦作戰。后來，他試圖駕小船逃離羅本島，但是在快抵達岸邊的時候被淹死在海中。這個不幸的記憶融入了我們的語言之中，我們科薩人用成語“Ukuza Kuka Nxele”表示“渺茫的希望”。

馬卡納并不是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第一位非洲英雄。1658年，奧祖茂（歐洲歷史學家稱他為“海濱之波”哈里）在考伊考伊與荷蘭之間的一場戰爭中被俘后就曾經被簡·范·里貝克囚禁在那里。我從對奧祖茂的記憶中而得到安慰，因為他被視為第一個也是僅有的一個從羅本島脫逃的人。當時，他是靠搖著小船逃到大陸上去的。

羅本島的命名來自荷蘭語中的海豹，曾經有數百只海豹騰躍在沖刷海岸的本格拉寒流中。后來這個島先后被用作麻風病人居住地、精神病醫院和海軍基地。現在，政府剛剛又把這個島變成了監獄。

迎接我們的是一伙身材魁梧的獄警，他們高聲喊著“Dis die Eiland！ Hier gaan julle vrek！”（這里是羅本島！你們將在這里死去！）在我們前面是一個院子，四周有幾間獄警住的房子。全副武裝的警衛兵站在通向院子的路上，氣氛特別緊張。一位高個子、紅臉膛的獄警沖我們高聲說：“Hier is ek jou baas！”（注意，我是你們的老板！）他是臭名昭著的克雷漢斯兄弟之一，大家都知道，他對被監禁者十分殘忍。獄警總是說南非荷蘭語，如果你用英語回答，他們會說：“Ek verstaan nie daardie kaffirboetie se taal nie”（我不懂你們這些喜歡卡非爾語言的人說的話）。

當我們朝著監獄走去的時候，警衛兵高聲說“兩個！兩個！”意思是讓我們兩個兩個地排著隊走。我與德福排列在了一起。警衛兵開始尖聲叫喊“Haas！ Haas！”在南非荷蘭語中，“Haas”是“往前走”的意思，但是，這種喊聲通常用來趕牛。

獄警們要求我們跑步前進，我轉身低聲對德福說，我們必須做一個榜樣，如果現在屈服，我們將來會受他們的氣，德福點頭表示贊成。我們必須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由于信仰被懲處的政治犯。

我示意德福，我們兩人應該在前面帶頭。我們一到了前面就放慢了步伐，故意慢慢地走。警衛兵產生了懷疑。“聽著，”克雷漢斯說，“這里不是約翰內斯堡，也不是比勒陀利亞，這里是羅本島，我們這里不允許調皮搗蛋。Haas！Haas！”但是，我們繼續慢條斯理地走著。克雷漢斯命令我們停下來，站在我們面前說：“注意，伙計，我們將會殺掉你們，我們不是在騙你們，你們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你們的父母將不會知道你們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這是最后一次警告。Haas！Haas！”

于是我說：“你有你的責任，我們有我們的責任。”我們決心不屈服，我們也沒有屈服，因為我們已經來到了監獄里。我們被趕進一個長方形石頭建筑內，并被帶到了一個空曠的房間里。地面上有幾英寸深的水。警衛兵喊叫著：“Trek uit！ Trek uit！”（脫衣服！脫衣服！）當我們一件一件地脫下衣服的時候，獄警們就拿過去迅速地進行搜查，然后把衣服扔進水中。就這樣，每件衣服都脫掉了，每件衣服都經過了檢查，每件衣服都被扔進了水中。然后，獄警命令我們穿上衣服，他們的意思是讓我們把濕衣服穿在身上。

有兩名獄警走進了房間，其中那位年輕的獄警就是隊長格里克。從一開始，我們就已經看出，他在有意粗暴地對待我們。這位隊長指著我們四人中最年輕的艾倫·莫萊特說：“你的頭發為什么留那么長？”艾倫是一位非常溫和、非常文雅的人，他什么也沒有說。隊長大聲說：“我在與你說話！你的頭發為什么那么長？這不符合規定。你應該把頭發剪短。為什么不留……”他然后停頓了一下，扭頭看著我，并指著我說，“……像這小子那么長的頭發？”我開始講話了：“好了，看這里，我們的頭發的長度是由規定決定的……”

沒等我講完，他不高興地大聲說：“小子，不能那樣對我講話！”然后開始向前走。我感到害怕——知道有人想要打你，并且你又不能自衛，這不是一種好的感覺。

當他離我只有幾步的時候，我盡量鎮定地說：“如果你對我行兇，我將帶你去大陸上的最高法院，當我打贏了你，你將會成為窮光蛋。”我說話的時候，他停住了腳步，等我講完后，他吃驚地看著我。我自己也有點吃驚，我已經被嚇住了，因為我這樣講話不是出于勇氣，而是出于一種虛張聲勢。這時，你必須裝腔作勢，不管你內心怎么想。

“你的票在哪里？”他問，我把票遞給他。我能看出他有些神經質。“你叫什么名字？”他問。我沖著我的那張票點了點頭，說：“票上寫著呢。”他說：“你被判了幾年？”我又指了指票說：“票上寫著呢。”他低頭看了看票說：“5年！你被判了5年，還那么傲氣！你知道判你5年意味著什么嗎？”我說：“那是我的事，我準備坐5年牢，但是不準備被人欺侮，你必須依法辦事。”

沒有人告訴他我們是什么人，沒有人告訴他我們是政治犯，也沒有人告訴他我是律師。我自己也沒有注意到這些，但是，另一位獄警在我們沖突期間突然走了出去。后來我發現他就是羅本島的指揮官斯特恩上校。那位隊長隨后也走開了，走的時候比進來的時候要安靜得多。

然后，只有我們四人在一起，斯蒂芬喋喋不休地說起來，并且是沒完沒了。“我們已經向布爾人進行了挑釁，”他說，“現在，我們在監獄里的日子大概就不會好過了。”正當他說話的時候，一位人稱普雷特利葉斯中尉、身材不高但十分健壯的人走了進來。讓我們吃驚的是，他竟然對我們講科薩語，看來他十分熟悉科薩語。“我看了你們的檔案，檔案里寫得不怎么壞。除了這一位，”他向斯蒂芬點了點頭說，“你的檔案是不干凈的。”

斯蒂芬非常生氣。“你是什么人，竟然對我這樣說話？你說我的檔案不干凈，你一定是看過我的檔案了，對不對？那么，你會發現所有對我的那些指控都是我為人民的權利而戰斗的事實。我不是一名罪犯，你們才是罪犯。”那位中尉警告斯蒂芬，如果再那樣對他講話，他就起訴斯蒂芬。在離去之前，普雷特利葉斯說他準備把我們放在窗子朝外的一間單獨的大房子里，然后又惡狠狠地說了一句：“但是，我不想讓你們通過窗子對任何人說話，特別是你，曼德拉。”

然后，我們被帶到了囚室。這是我們見過的最好的一間囚室，窗子很大并且也不算高。通過一面墻上的幾扇窗子，我們能看到其他犯人和獄警在外面走過。這是一間寬敞的、足夠我們四個人住的大囚室，并且有單獨的衛生間和沖澡的地方。

那是十分令人疲憊不堪的一天，晚上吃過涼玉米片粥后不久，其他三人就都睡著了。我躺在地板上面的毯子上，忽然聽到有敲打窗子的聲音。我抬頭一看，發現一個白人招呼我到窗子跟前去。我記得那個排長的警告，因此，躺在那里沒動。

然后，我聽見那個人低聲說：“納爾遜，你過來。”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因此我決定碰碰運氣。我走到窗子前，要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他一定是認為我把他當成了白人，因為他低聲說的第一件事是：“我是一個來自布隆方丹的有色人獄警。”然后，他向我透露了我夫人的消息。在約翰內斯堡的報紙上有報道，說我夫人曾經去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探視我，但是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沒告訴她我已經被轉移到了羅本島。我對他的通風報信表示感謝。

“你吸煙嗎？”他問我。我告訴他我不吸煙，他看上去有點失望。我立即有了主意：“但是，我的同志吸煙。”他聽了后很高興，說，他幾分鐘后就給我們送煙和三明治來。這時，大家都醒了。德福和約翰·基茨韋吸煙，我就把煙分給了他們兩人，把三明治分給我們四個人。

接下來的幾周，這位有色人獄警幾乎每天夜里都給我們送煙和三明治。我總是把煙均等地分給德福和基茨韋。這位獄警冒了很大的風險，他提醒我說，他直接同我一個人打交道，不然的話，他將無法對我們進行照顧。

剛來到羅本島的時候，我們不知道島上到底有多少囚犯。幾天后，我們得知，大約有1000人，他們都是非洲人，而且都是最近幾天才來的。多數人都是普通犯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政治犯。我很想與他們接觸，但是，我們是完全彼此隔離的。開始幾天，我們被關在我們的那間囚室里，甚至不準出囚室的門。我們要求像其他囚犯一樣去工作，這個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批準。但是，我們被單獨從囚室里帶出來，并且由克雷漢斯看管著。我們干的第一個工作是把新鋪設的管道蓋起來，工作地點位于一座小山上，在那里可以看到島上的一些荒涼而美麗的景致。

第一天，我們工作很賣力。但是到了第二天，克雷漢斯卻催促我們更加努力地干。他非常粗野，就像是在驅趕牛馬。“Nee, man, Kom aan! Gaan aan!”（“不，伙計，快干！快些干！”）斯蒂芬比我們其余三人年齡都要大，有一次當他放下手中的鐵鍬時，立即遭到克雷漢斯的威脅。但是，斯蒂芬用南非荷蘭語回敬說：“你不學無術，連自己的語言都講不好，你用不著告訴我如何做。我將按我們的節奏工作，我們就是想這么干，我所能干的只有這么快。”然后，他十分威嚴地拿起鍬重新開始工作。斯蒂芬一直是一位南非荷蘭語教師，他不但能講一口流利的南非荷蘭語，而且還可以講南非荷蘭語的母語——荷蘭語。斯蒂芬能以十分謙遜而夸張的口氣對獄警講話。他們對他說的話可能不怎么理解，但是他們知道最好不要與他打嘴仗。

島上有兩個克雷漢斯，他們都身背毆打犯人的惡名。大克雷漢斯負責看管我們，他一定知道我們不是那么好欺侮，因此有些收斂，因為后來他再也沒有惹我們。小克雷漢斯就沒有那么老實。有一天，我們干完活后沿著一條路往回走，中間路過一支數百名犯人組成的勞動大軍，他們正在用獨輪車運沙子。他們不是政治犯，我們兩伙人都被命令停下來，克雷漢斯兄弟倆聊了起來。小克雷漢斯一邊聊，一邊讓他手下的一個犯人給他擦皮靴。我認出另一伙人中有一些是在1958年塞庫庫尼蘭農民起義中被判死刑的人，于是我回轉身來仔細地看著他們。小克雷漢斯粗暴地命令我回頭朝別的方向看。如果我不是站在那里處于其他犯人的眾目睽睽之下，我可能還知道如何作出反應。但是，當時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我拒絕回頭。小克雷漢斯朝我走來，顯然是想毆打我，但是，當他走到離我幾步遠的時候，他的哥哥跑過來攔住了他。他們小聲嘀咕了幾句，一場風波就過去了。

有一天，監獄長塞倫來看我們，他負責管理整個羅本島，當時是來聽取我們有什么抱怨的。塞倫是一個脾氣不怎么好的人，不喜歡面對面地與犯人交流。我既不想表現得對他不友好，又不想阿諛奉承他。我代表我們一伙人說：“你來看望我們，這使我們十分感激。我們有幾個問題想對你反映，相信你一定能解決。”我列舉出了我們的問題，當我說完后，他說：“我看看我能為你們解決什么問題。”

可能他認為自己太好說話了，因為，當他正準備往外走的時候，他轉身對德福說：“Jou groot pens sal in die plek verdwyn”，意思是“你這個大肚子會在這里消下去的”。“pens”意思是指肚子，不過這個詞常常用來指牛羊之類動物的肚子，人類的肚子則要用“maag”。

斯蒂芬對塞倫的戲弄也不客氣，他無法忍氣吞聲地對待這種侮辱。“你知道，監獄長，”他說，“你不能對我怎么著，因為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政治組織——共產黨的一個成員，共產黨在為世界被壓迫人民服務方面是著名的。當我們統治這個世界的時候，你和你的國民黨將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在全世界，我比你們愚蠢的全國主席還要著名。你是什么人？不過是一個不值得注意的小芝麻官。到我離開監獄的時候，我將連你的名字都不記得。”塞倫轉身就走了。

那位有色人獄警夜間會來探望我們，這對減輕我們在島上的痛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就是有這樣奢侈的條件，斯蒂芬仍然不滿足。德福是一個大煙筒，他有時竟然吸一整宿，第二天自然就無煙可吸。但是，基茨韋卻總是保留他自己的那份煙，從來不會把當天的煙全部抽光。一天晚上，德福心急氣躁地面對著我，“納爾遜，”他說，“你故意少給我煙，你給基茨韋的煙比給我的多”。

這顯然是不對的，不過，我想與他開個玩笑。“那好，”我說，“每天晚上我得到煙的時候，我將先把它分成兩份，然后我將讓你選擇你想要的那一份。”那天晚上，不，是從此之后的每天晚上，我總是把煙分成相等的兩份，然后對斯蒂芬說：“你先選。”

德福為難作決斷而苦惱萬分。每次他都是看著兩份煙，頭不住地在兩者之間搖來搖去。最后，他總是失望地拿起一份，然后躲到一邊開始吸起來。盡管我似乎認為這個辦法十分公道，但仍然有些滑稽，德福也還是不滿意。當那位有色人獄警來到窗邊的時候，他就開始在旁邊來回走動，以便看我是否私下把香煙囤積起來，這讓那位獄警感到很不高興。“注意，”他對我說，“我只與你打交道。這是一個安全問題。”我說我理解。然后我告訴德福，當我與獄警接頭的時候，不要站在我身邊。

第二天夜間，當那位獄警來到窗前時，德福走上前去對他說：“從現在開始，我要我自己的那份煙，請直接給我。”那位獄警感到有些吃驚。“曼德拉，”他說，“你沒有遵守你的諾言。算了，我不會再給你帶這些東西了。”我把德福噓走，然后就勸說獄警。我說：“看，伙計，他是一位老家伙，”我的意思是指德福，“他精神不很正常，”我指著我的頭說，“請原諒這一次”。這樣他軟了下來，把煙交給了我。但是，他警告說，如果再發生這樣的事情，他將就此收手。

那天夜里，我認為必須處罰一下德福。我說：“現在，你看，你危及了我們的貨源。今天晚上，你不要再指望有煙或三明治。你幾乎讓我們失去了這些特殊待遇。現在，我準備切斷對你的供應，直到你變乖后再給你。”德福無言以對。

我們三個人那天待在囚室的一個角落里，一邊吃三明治一邊讀報紙，報紙也是那位獄警送的，而德福自己則坐在另一個角落里。最后我們都睡著了。大約半夜時分，我感到有人推我的肩膀，把我從睡夢中推醒。“納爾遜……納爾遜。”原來是德福。

“納爾遜，”他輕聲說，“你觸到了我的軟肋。你不給我煙吸，可我是一個老人。我為了我的人民而遭受這般痛苦。你在監獄里是我們的領導，但這樣處罰我是不公平的，納爾遜。”

他也觸到了我的痛處，因為我覺得自己似乎是在濫用職權。他遭遇的痛苦確實遠比我遭遇的痛苦要多。我的三明治還有一多半，我立即把三明治給了他。我又喚醒基茨韋，把煙都給了他，請他與德福共同分享。德福總是喜歡找麻煩，但是，從此之后，他的行為規矩多了。

我們一旦開始工作，我立即對島上的其他犯人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當局也把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一些年輕政治犯轉移到了與我們的囚室相對的囚室里來。夜間，我們可以通過上了鎖的柵欄門與他們談話。在這些年輕人中，我發現了恩卡貝尼·門耶，他是我的一個外甥，家住在穆克孜韋尼，我上次在1941年見他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嬰兒。

我們談了一些有關特蘭斯凱的事情，并得到了一些關于家庭歷史方面的信息。一天夜里，當他的朋友們都圍在他身邊的時候，他說：“舅舅，你屬于什么組織？”我說，當然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我的回答使那些年輕人有點驚慌失措，忽然，他們的面孔從窗子里消失了。等了一會兒之后，我外甥又出現了，他問我是否曾經是一位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會員。我回答說，我沒有參加過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然后他說他聽說我在出訪非洲其他國家期間加入了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我告訴他，我出訪期間也沒有加入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我一直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而且將來也還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這又使他們感到非常驚愕，他們又一次消失在窗后。

后來我得知，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宣傳機構聲稱我在出訪非洲大陸的其他國家期間加入了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盡管我聽后不大高興，但是，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在政治上，我們絕不能過高地估計真正了解形勢的人數。不大一會兒，我的外甥又回來了，他問我是否在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與索布克韋交談過。我說談過，并且與他進行了友好的討論。這讓他們很高興，他們向我說了聲再見，從此之后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們。

幾個小時后，一個隊長來到了我的牢房里，讓我們四個人收拾行李。幾分鐘內，我的同志們都被帶走了，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個人。在獄中，一個人能與同志們揮手告別是幸運的。一個人能夠與另一個人非常親密地共同生活幾個月，然后就再也見不著他了。這是滅絕人性的一幕，因為這樣的事情會使你不得不沉默地與世隔絕。

盡管我被單獨關在一間牢房里，我仍然有些憂慮不安。有時幾個人在一起會有安全感，當你獨自一人的時候，你也就沒有見證人了。我發現沒有人給我飯吃，便使勁地撞擊地板：“獄警，我還沒吃晚飯呢。”

“你必須叫我baas（老板）。”他叫喊道。那天晚上我沒吃上晚飯。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押解回比勒陀利亞。監獄管理局通過媒體發表聲明說，為了我的安全而把我從羅本島轉移出來，因為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犯人要毆打我。這完全是赤裸裸的謊言。他們把我押回比勒陀利亞，自有他們自己的想法，這很快就會大白于天下。

我在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被單獨關押，但是犯人們是足智多謀的，我很快通過那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收到了秘密紙條和其他信息。我收到了亨利·法茲的消息，他是民族長矛軍的一個干部，曾經在埃塞俄比亞接受過軍事訓練，他在企圖返回南非時被捕。他們都是根據《破壞法》被審判的第一批非國大人士。

通過監獄這個暗中傳遞信息的渠道，我試圖在他們的辯護方面提供一些幫助，并建議他們與哈羅德·沃爾培聯系。我后來聽說，沃爾培也遭到了拘留。這使我第一次感覺事情出了什么嚴重閃失。有一天，當我在放完風后被帶離院子的時候，我見到了安德魯·木蘭基尼。我上次見他，是1961年9月份，當時他正準備出國參加軍事訓練。我在想，除了沃爾培和木蘭基尼，還有誰遭到了逮捕？

1961年初，溫妮被實施禁止2年。我從另一名犯人那里聽說，最近溫妮由于違反對她的禁止而被指控，這會使她坐牢或被軟禁。溫妮很固執，禁止只能是讓她火上加火。我不懷疑她違反了對她的禁止令，我不會勸她不要那么做，但是，她有可能坐牢的消息卻讓我十分擔心。

1963年7月的一個上午，正當我沿著走廊回牢房的時候，我看見了托馬斯·馬士法尼，他一直是立里斯里夫農場的工頭。盡管我知道這毫無疑問是監獄當局故意領著他來到我牢房的走廊里，看我是否認識他，但我還是熱情地與他打招呼。我別無選擇，只能這樣做。他的出現只說明一件事：當局已經發現了利沃尼亞。

一兩天后，我被召到了監獄辦公室，我在那里看見了瓦爾特、戈萬·姆貝基、阿邁德·卡特拉達、安德魯·木蘭基尼、鮑勃·赫普爾、雷蒙德·穆拉巴——穆拉巴是民族長矛軍最高司令部的成員，他當時剛剛從中國接受培訓回國。其他還有伊萊亞斯·莫佐萊迪，也是民族長矛軍成員；丹尼斯·戈爾德伯是位工程師，他是民主人士大會的成員；拉斯迪·波恩斯坦是個建筑師，也是民主人士大會的成員；吉米·坎特是位律師，他是哈羅德·沃爾培的內弟。我們都被指控犯有破壞罪，第二天將被送上法庭。這時，我5年的監禁生活剛剛過了9個月。

我零零星星地聽到可能發生了什么事情。7月11日下午，一輛干洗店的面包車駛進了農場的汽車道，立里斯里夫沒有人要送洗衣服。干洗店的面包車被一位年輕的非洲警衛人員攔了下來。但是，從車上下來了十幾名武裝警察和幾條警犬，那個年輕的非洲警衛被他們的氣勢給壓倒了。他們包圍了房屋，幾名警察沖進了主要建筑和主要附屬建筑。在附屬建筑內，他們發現有十幾個人正圍在桌子周圍討論一份文件。瓦爾特從窗子跳了出去，但是卻被狂吠的警犬切斷了去路。被逮捕的人中還包括阿瑟·戈德里克，在警察進行襲擊的過程中，他正好開車來到了農場。

警察對整個農場都進行了搜查，沒收了幾百份文件和資料，但是，他們沒發現武器。有一份極其重要的文件就在桌子上放著，文件的名稱是“Operation Mayibuye”（《行動計劃》），是一項關于在南非開展游擊戰的計劃。警察一下子得到了民族長矛軍最高司令部的全部資料。于是，大家都被按照《90日拘留法》逮捕了。

在這次襲擊發生時，喬·斯洛沃和布拉姆·費希爾僥幸不在農場。但是，他們經常每天去農場兩三次。從事后看，立里斯里夫是一定會暴露的，因為管理越來越嚴格，管理方式也越來越成熟。由于能實施24小時監聽，竊聽器成了普通的監聽工具。對于政府來說，這次襲擊是一次漂亮的行動。

開庭的第一天，我們沒有任何機會把情況告訴律師。我們被帶到一位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破壞罪。幾天后，我們被允許與布拉姆、弗農·貝瑞奇、喬爾·喬菲、喬治·畢佐斯和阿瑟·查斯卡爾松見面，他們都是我們的辯護律師。由于我是已經判過刑的犯人，所以我仍然被單獨關押，這些審理程序使我第一次有機會與我的同事們交談。

布拉姆非常沮喪。他小聲告訴我們，我們正面臨著極其嚴厲的指控，政府已經正式通知他，會要求對我們依法實行最重的懲處——死刑。布拉姆說，根據現實情況，這種結局是十分可能的。我們都生活在絞刑的陰影之下，因為這種可能性使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從一開始，我們就認為死刑是審判的最有可能的結果，因為比我們輕得多的犯人最近都被判了死刑。

監獄官員時刻都在提醒你，你可能被絞死。那天夜里，一位獄警敲著我的牢房門說：“曼德拉，你不必為睡覺而擔心，你將會有很長很長的時間去睡覺。”我等了一會兒說：“我們大家，也包括你，都會有很長很長的時間去睡覺。”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安慰吧。

55...

1963年10月9日，我們被押上一輛加強了保安設施的警車。沿著車的中心線裝有鋼制隔板，把白人犯人和非洲人犯人相互隔開。我們將被送到比勒陀利亞的司法大廈，最高法院就設在那里。“政府對（民族長矛軍）全國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員”的指控將在那里開庭。后來，這次審判被大家稱作“政府訴納爾遜·曼德拉及其他人”的審判，而更多的人把這次審判叫做“利沃尼亞審判”。在法庭附近，矗立著保羅·克魯格的雕像，他是德蘭士瓦共和國的總統，在19世紀曾經領導人民抗擊過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入侵。在這位布爾英雄雕像的下面，有一段從他的講話中選出來的語句：“我們滿懷信心將我們的事業置于全世界的面前，無論我們是獲勝還是死亡，自由將像太陽一樣從清晨的云霧中在非洲升起。”

我們的警車行駛在裝滿警察的卡車護送隊中間。在護送隊的前面行駛的是幾輛坐著高級警察官員的豪華轎車，司法大廈周圍到處是武裝警察。為避開聚集在大廈前面的我們的支持者，我們被押解到大廈的后面，通過大鐵門進入大廈。在審判大廈周圍，虎視眈眈地站著手握機槍的警察。當我們從車上下來的時候，我們能聽到群眾的歌聲。一進入大廈，我們就被關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等候開庭。這次審判被國內外的報紙描繪成南非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審判。

當我們從牢房里出來的時候，我們每一位被告都由兩名全副武裝的法警押解。當進入裝飾華麗、天花板很高的法庭時，我們每個人都握緊拳頭向人民群眾致非洲人國民大會禮。在旁聽席上，我們的支持者高呼“Amandla！Ngawethu！”和“Mayibuye Afrika！”這是鼓舞人心的口號，但同時也是危險的口號。因為警察把每個旁聽者的姓名和住址都記錄了下來，并且在他們離開法庭的時候，都被拍了照。法庭上有許多國內和國際記者，還有幾十名外國政府代表。

我們就位后，警察在我們與旁聽者之間形成了一條嚴密的警戒線。我為必須在法庭上身穿卡其布短褲和做工粗劣的拖鞋而感到氣憤。作為一名已經判了刑的犯人，我不能穿正常人穿的衣服，許多人后來評論說，我當時看上去是何等的一副慘相。這不僅僅是由于我的那身打扮，還因為我幾個月來被出出進進地單獨關押，我的體重減了25磅多。當我步入法庭的時候，我痛苦地向旁聽席微笑，看到我的支持者是我能得到的最大安慰。

安全防范特別緊，因為僅僅在幾周前，阿瑟·戈德里克、哈羅德·沃爾培、摩西·穆拉和阿布杜雷·扎賽特賄賂了一位年輕獄警而逃出了監獄。阿瑟和哈羅德扮成牧師逃到了斯威士蘭，然后又去了坦噶尼喀。當時，他們的出逃在地下組織中引起了一場興奮，成為報紙上的頭條新聞。這件事使政府十分尷尬，但是它卻大長了我們的士氣。

在利沃尼亞審判中，我們的法官是德蘭士瓦的大法官夸突斯·德·韋特先生。他身穿紅色長袍，坐在一片木制華蓋下。德·韋特是在國民黨執政前由合眾黨任命的最后一批法官之一，大家并未把他當成政府的走狗。他是一個不動聲色、對蠢人沒有耐心的法官。公訴人是珀西·尤塔博士。他是德蘭士瓦的副檢察長，當時正野心勃勃地要當南非的檢察長。他身材矮小、禿頭頂、衣冠楚楚，當生氣或感情沖動的時候，他說話就會尖聲尖氣。他具有表演的天賦，或者用不很確切的話說，他天生就是一個夸大其實的人物。

尤塔站起身來向法庭發表講話：“閣下，我把這個案子稱作‘政府起訴（民族長矛軍）全國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員案’。”我是第一號被告。尤塔遞上了控告書，并被授權立即對我們起訴和即決審判。這是他們第一次向我們出示控告書，而公訴書則沒給我們看。但是，他們卻把公訴書給了《蘭德每日郵報》社。該報社把它刊登在當天出版的報紙上，并四處散發。他們在控告書中指控我們11人共同密謀搞了200多次破壞活動，目的是促進暴力革命和對國家實施武裝攻擊。政府聲稱，我們是密謀推翻政府活動的策劃者和參與者。

我們被指控犯有破壞罪和陰謀推翻政府罪，而沒有指控我們犯有高級叛國罪，原因是法律對破壞罪和陰謀推翻政府罪不要求進行長時間的預審（預審程序對辯護是很有幫助的），而法律規定，叛國罪則必須進行長時間的預審。而且量刑標準是一樣的，最高都可以判處絞刑。對于高級叛國罪，政府必須證明犯罪事實毋庸置疑，并且每項指控都需要有兩人作證。按照《破壞法》，舉證責任要求辯方必須證實被告無罪。

布拉姆·費希爾站起身來，請求法庭羈押候審，因為辯方沒有時間準備辯護材料。他說，幾名被告一直長期在監獄里被單獨關押。政府已經準備了三個月，而我們則剛剛收到控告書。德·韋特給了我們三周的準備時間，案子推遲到10月29日開庭審理。

我發現第一天溫妮未能到庭，并為此感到心煩意亂。因為她當時正處于禁止期，僅限于在約翰內斯堡活動。她若要到庭，則需要經過警察批準。她申請過，但遭到了拒絕。我還獲悉，我的家遭到了襲擊，警察拘留了溫妮的一個年輕的親戚。事實上，溫妮并非唯一遭受這種煩惱的非國大人士的妻子。阿爾博提娜·西蘇陸和卡羅麗尼·莫佐萊迪都依據《90日拘留法》被拘留，瓦爾特的小兒子馬科斯也遭到了逮捕。這是政府施加壓力時使用的最野蠻的伎倆，他們把自由戰士的妻子兒女也投進了監獄。許多人在監獄里能忍受對他們自己所進行的任何打擊，但是，想到政府對他們的家人也進行如此的打擊則幾乎是無法忍受的。

溫妮后來上訴到司法部部長，部長批準她出席旁聽，但條件是不能穿傳統服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讓我們保護家鄉文化的政府卻不同意溫妮穿科薩民族服裝進入法庭。

在接下來的三周時間里，我們被允許在一起準備辯護材料。現在我又回到了我的被告同事中間，與我的同事們在一起是令人振奮的。作為等候審判的犯人，我們每周有兩次30分鐘互訪的權利，并且被允許每天從監獄外面送一次飯。吃著皮利太太做的可口的飯菜，我很快恢復了失去的體重。

在我們準備辯護材料的同時，政府企圖把案情交給報社報道。正常情況下，尚未判決的案子是不能公布于眾或在報紙上報道的。但是，既然在利沃尼亞遭逮捕的人都是被依據《90日拘留法》逮捕的，因此，無法從法律意義上判罪，只能把這項法律原則丟到一邊。從司法部長以下，大家都說我們是暴力革命分子，報紙經常使用的標題是“用軍事手段進行革命”。

10月29日，我們又一次走進了司法大廈，這里仍然有大批群眾，還是那樣一種令人激動的場面。安全防范還是特別嚴格，法庭上也有許多來自國外使館的重要人物。與我們的同志們在一起生活了三周之后，我感覺精神煥然一新，甚至感到在法庭上遠比住在一個套房里舒服。我們的律師反對法官讓我們穿著囚服走上法庭，我們因此獲得了在法庭上穿我們自己服裝的權利。我們向旁聽席揮拳致意，當局警告我們，如果我們再這樣無理取鬧就強迫我們穿著囚服上法庭。為了避免暴亂，當局一改讓被告先上法庭的正常次序，開庭那天，法官首先進入法庭，這樣，當我們走上法庭的時候，法庭就已經進入了審判程序。

我們立即發動攻擊，布拉姆·費希爾批評政府的控告書是卑劣的、胡編濫造的。控告書竟然斷言我在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坐牢的時候參加了破壞活動之類的荒唐事，尤塔被搞得亂了方寸。德·韋特法官指望他回答布拉姆的質疑，但是，他不但沒有提供特別說明，而且開始發表演講，法官把他的演講嘲笑為“政治性演講”。德·韋特對尤塔的支支吾吾很不耐煩，并且直接告訴他：“你的論點的全部基礎，據我理解，應該是希望被告有罪。”德·韋特然后撤銷起訴，把木槌一敲，宣布閉庭。

當時，我們在法律意義上仍然是自由的，法庭上一片沸騰。但是，沒等德·韋特法官離開他的座位，我們就又被逮捕了。斯瓦尼普爾中尉拍著我們每個人的肩膀說：“我們準備按照破壞罪指控重新逮捕你。”這樣，我們就又被帶回我們的牢房。盡管如此，這仍然是對政府的一次打擊。因為，當時不得不回到本案的起步階段，所有的審判都要停下來。

政府撤回起訴后，我們直到12月初才又回到法庭上。我們都感覺德·韋特法官在休庭期間對我們敵意漸深。我們懷疑，他先前的秉公執法招致了政府的不滿，政府因而對他施加了壓力。新的指控是，我們被認為招募人員進行破壞活動和開展游擊戰，以便發動暴力革命。根據他們的斷言，我們計劃幫助外國軍隊入侵南非共和國，以支持共產主義革命。為此，我們爭取并接受了資金援助。尤塔聳人聽聞地說，被告訂購的彈藥足以把約翰內斯堡炸掉。

然后，書記員要我們進行第一次答辯。我們已經同意不按傳統方式進行辯護，但是，我們將利用這種機會說明我們鄙棄這種訴訟程序。

“第一號被告，納爾遜·曼德拉，你服不服罪？”

我站起來說：“閣下，受審的不應該是我，而應該是政府。我是無罪的。”

“第二號被告，瓦爾特·西蘇陸，你是否服罪？”

西蘇陸說：“政府應該對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負責。我是無罪的。”

德·韋特法官說他對政治演講不感興趣，只要求我們表示服罪或不服罪。大家對他的要求不予理睬，每位被告都在表示不服罪之前說政府有罪。

為了加強訴訟程序的宣傳效果，政府安排通過南非廣播電臺現場轉播尤塔的講話。公訴人和法官面前都放了麥克風。正當尤塔清理一聲嗓子準備講話時，布拉姆·費希爾站起來申請法庭把麥克風拿掉。因為這種轉播會使人們對案子產生偏見，并且有失法庭的尊嚴。盡管尤塔聲嘶力竭地要求保留麥克風，但是，法官德·韋特還是命令把麥克風拿掉了。

尤塔在他的講話中爭辯說，自從非洲人國民大會被趕入地下后，該組織就著手實行暴力政策，準備以游擊戰的形式進行破壞，直至對國家進行武裝侵害。他聲稱，我們計劃在全國部署數千支經過訓練的游擊隊，這些游擊隊準備擔任暴動的先鋒，然后讓外國軍隊武裝入侵。“在造成混亂、動亂和無序之后，”尤塔聲稱，“被告計劃建立臨時革命政府接管和控制這個國家。”實施這個計劃的引擎就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共產黨政治領導下的、司令部設在利沃尼亞的民族長矛軍。

在其夸夸其談的演講中，尤塔描述了我們如何招募民族長矛軍成員，如何計劃在1963年舉行全國起義（這里他把我們與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混淆了），如何在利沃尼亞建立強大的無線發射系統，以及我們如何應該集體對222次破壞行動負責。他說，伊萊亞斯·莫佐萊迪和安德魯·木蘭基尼負責招募人員，丹尼斯·戈德堡在開普開辦了招募人員的專門學校。他詳細描述了各種炸彈的制造和到國外募集資金的情況。

在后來的三個月中，政府提供了173名證人，收集歸檔了數千份文件和照片，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著作、游擊戰爭史料、地圖和大衛·莫扎馬義的出國護照。第一位證人是一名警察攝影師，他拍攝了利沃尼亞的照片。然后是戈德里克家的傭人們，他們當時一直被拘留，盡管他們與戶主在政治上沒有任何聯系。這些傭人對我們多數被告都算是熟悉，但是，老杰利曼先生試圖保護我，當他被要求指認第一號被告時，他假裝不認識我。公訴人說，再仔細看看，請認真端詳每一位被告。“我認為他不在這里。”杰利曼平靜地說。

我們不知道政府有什么證據證明我有罪。在實施利沃尼亞計劃期間，我大多數時間都在國外和監獄里。當我在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見到瓦爾特的時候，我已經被判刑，我催促他一定把我的所有書籍和筆記都從農場轉移出來。但是，在審理的第一周，當拉斯迪·波恩斯坦申請保釋的時候，珀西·尤塔突然出示了我在福特監獄坐牢時畫的福特監獄草圖和關于越獄逃跑的筆記。尤塔聲稱，這就是我們所有被告企圖越獄逃跑的證據。這說明，我的東西都沒有從利沃尼亞轉移出來。后來我被告知，我在利沃尼亞的同事決定保留我畫的逃跑路線草圖，因為他們認為這個草圖具有歷史價值。但是，現在，拉斯迪·波恩斯坦卻因此而不能獲得保釋。

政府的重量級證人是布魯諾·姆陀羅，或者如法庭上稱他那樣叫他“X先生”。在介紹“X先生”的時候，尤塔告訴法庭，審問將歷時三天，然后，他用表演的腔調說，這位證人正處于“致命的危險”中。尤塔請求以照片的形式提供證據，但是，假如他們不講明證人是誰，媒體將不可實名報道。

姆陀羅身材高大、體格健壯，具有出色的記憶力。他是一位來自德班的祖魯人，已經成為納塔爾民族長矛軍地區司令部的領導人。他是一個有經驗的破壞專家，曾經去過利沃尼亞。我只見過他一面，當時我剛從非洲大陸其他國家回來，并在納塔爾為那里的民族長矛軍干部發表了一次講話。他專門針對我的證詞使我意識到，政府必然會判我有罪。

他的證詞從說他是一個民族長矛軍破壞專家開始，他曾經炸過政府的辦公室、電力塔和電力線。他非常精確地說明了炸彈、地雷和手榴彈的使用方法，并描述了民族長矛軍是如何在地下開展工作的。姆陀羅說，雖然他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理想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但是，當他意識到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民族長矛軍變成了共產黨的工具時，他確實對組織喪失了信心。

他的證詞簡明扼要，看起來似乎是直率而公正的。但是，姆陀羅在對他的證言所作的潤色方面卻有點兒過頭，這顯然是按照警察的要求做的。他告訴法庭，在我向納塔爾地區民族長矛軍發表講話期間，我曾經說過所有的民族長矛軍干部都應該成為優秀的共產主義者，但不能公開自己的觀點。事實上，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他的這段證詞不過是想把我與民族長矛軍和共產黨聯系在一起。他的記憶力似乎太準確了，以致任何普通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認為他說的話是真的。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姆陀羅的背叛使我不知所措，因為無法排除甚至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高級成員在警察的折磨下也會屈服的可能性。但是，根據各種流傳的消息，姆陀羅從來就沒有被警察觸及過。他卻超出尋常地把案中沒有涉及的人都牽連了進來。我知道，他可能改變了自己的信仰，但是，背叛那么多人，而且他們許多都是無辜的，這對我來說是不可原諒的。

在反詰期間我們得知，姆陀羅在加入民族長矛軍之前曾經因盜竊被監禁過三次。盡管有這些新發現，他仍然是一個有殺傷力的證人，因為法官認為他是靠得住的和可以信賴的。他的證言幾乎牽連到我們每一個人。

政府指控我們的全部依據是在利沃尼亞突擊搜查時沒收的一份6頁紙的《行動計劃》。當警察襲擊利沃尼亞農場時，民族長矛軍最高司令部官員正在開會研究這個文件。該《行動計劃》在整體上勾畫了開展游擊戰的可能性和如何發動群眾舉行反抗政府的武裝起義的情況。其中設想在南非4個不同的地區建立小股游擊隊，并對預先選出的目標進行攻擊。該文件提出在全國招募大約7000名民族長矛軍戰士，以便與經過培訓的120名游擊隊骨干相配合。

公訴書以很大的篇幅強調《行動計劃》已經經過非洲人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研究通過，并且已經成為民族長矛軍的具體行動計劃。我們堅持認為，《行動計劃》并沒有被正式采納，在我們被捕的時候，它仍然處于討論之中。我堅持認為，《行動計劃》只是一個草稿，它不僅沒有得到批準，而且其目標和行動方案都完全是不現實的。我指出，游擊戰在當時的那個階段是一個不可實施的方案。

《行動計劃》是我不在場的情況下起草的，因此，我對這個文件知道得很少。即使是在這些被審判的人中，是否把它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項政策進行采納也仍然存在著分歧。戈萬與喬·斯洛沃起草了這個文件，戈萬堅持認為大家意見是一致的，我們在法庭上爭論這個文件仍然處于討論之中是錯誤的。但是，其他被告認為，這個文件盡管由最高司令部完成了草稿，但卻沒有被非洲人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批準，魯圖利酋長連見都沒見到過這個文件。

盡管死刑審判往往是令人恐怖的，但是我們的情緒仍然十分高漲。我們中間出現了許多關于絞刑的幽默故事。丹尼斯·戈德堡是我們被告中最年輕的一位，他有一種抑制不住的幽默感，常常使我們在不應該笑的時候禁不住大笑。當一位公訴方的證人描述雷蒙德·穆拉巴如何裝扮成一位牧師的時候，丹尼斯從此之后就稱呼雷蒙德·穆拉巴為穆拉巴牧師。

在樓下的咨詢室里，我們經常互相傳遞紙條，我們看后就把紙條燒掉并丟進垃圾桶。負責看管我們的特警斯瓦尼普爾中尉，是一個高個子紅臉大漢，他覺著我們總是背著他干什么事情。一天，當斯瓦尼普爾正在門口注視著我們的時候，戈萬·姆貝基故意鬼鬼祟祟地寫了一個紙條，然后又鬼鬼祟祟地把紙條遞給我。我看后謹慎地點了點頭，然后把紙條遞給了凱西。凱西故弄玄虛地掏出火柴，似乎要把紙條燒掉。這時，斯瓦尼普爾突然闖了進來，一把就把紙條從凱西手中抓了過去，嘴上嘟囔著說，在房間里點火是很危險的。然后，他走出房間去欣賞他的戰利品。幾秒鐘后，他氣沖沖地回來說：“我要找你們算賬！”原來戈萬用大寫字母寫了一句“難道斯瓦尼普爾不是一個英俊的伙計嗎？”

我們被關在牢房里，并且政府要判我們死刑。但是在監獄外面，新的生命正在誕生。吉米·坎特的夫人不幾天就要分娩了。吉米是一位律師，他僅僅因為是哈羅德·沃爾培的內弟就被政府抓來受審。

一天上午，我們正坐在被告席上，從被告席的另一端傳給我一張紙條：

芭芭拉和我詳細討論了教父的人選，我們得出了結論，不管嬰兒是男是女，如果你同意接受這個職務，作為你過去擁有的名聲欠佳的職務的一種附加，我們將認為這是一種光榮。

作為答復，我給吉米回了一個紙條：

我將比什么都高興，光榮是屬于我的，并非嬰兒的光榮。現在，他們不敢把我絞死了。

56...

政府的審判在1963年的圣誕休假期間繼續進行，到1964年2月29日結束。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我幾乎沒有時間檢驗證據和準備辯護材料。我們并不是每個人都同等地受到證據的影響，例如就沒有針對詹姆斯（吉米）·坎特的證據。他連我們組織的成員都不是，根本就不應該受審。對于拉斯迪·波恩斯坦、雷蒙德·穆拉巴和阿邁德·卡特拉達，證明他們與陰謀叛國有牽連的證據也不多。我們決心不讓他們受到牽連。在拉斯迪的案子中，證據是微不足道的。他僅僅被發現曾經在利沃尼亞與其他人在一起過，我們其余的六個人也將只承認在某些指控方面是有罪的。

布拉姆十分悲觀，他宣稱，即使是我們證明沒有批準實施游擊戰，而且我們的破壞政策不足以判處死刑，政府也仍然會判我們死刑。被告方按照是否找人作證劃分成兩派，有人斷言，如果我們找人作證，將對我們不利。喬治·畢佐斯認為，除非我們提供證據使法官相信我們沒有決定實施游擊戰，否則法官肯定會判我們死刑。

從一開始我們就很清楚，我們的目的不是把這次審判作為法律上的審判，而是把它作為宣傳我們的信仰的一個平臺。例如，我們將不會否認我們對破壞活動負有責任，我們也不會否認我們這伙人已經不再堅持不使用暴力。我們并不是想逃避或減輕對我們的懲處，而是想通過這次審判增強我們大家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為我們的事業而斗爭的決心。我們將不從法律意義上對我們自己進行太多的辯解，而是更多地從道德上進行辯護。我們把這次審判看作斗爭的繼續。我們承認政府知道的一切是真實的。但是，我們將拒絕提供任何我們認為會涉及其他人的情況。

我們將抗拒政府關于我們著手游擊戰的核心指控。我們承認，我們的確制訂了如果破壞不成功則開展游擊戰的應急計劃。但是，我們堅持認為破壞并沒有失敗，因為破壞活動本來就沒有得到充分地實施。我們將否認政府所聲稱的我們殺害或傷害無辜旁觀者的指控。這種指控完全是一派謊言，要不然，這些事情就是其他人所為。我們從來沒有考慮讓外國軍隊介入。為了辯護，我們認為不得不就《行動計劃》向法庭作出說明。

在我自己的案子中，法庭已經對刑事定罪有了充分證據。我的親筆文件可以證明，我非法離境、安排軍事訓練和支持組建民族長矛軍都是事實。還有一份我親筆寫下的文件手稿，題目是《如何做一個優秀的共產主義者》，政府認為這個文件證明我是一個正式的共產黨黨員。事實上，這個文件的題目源自一位名叫劉少奇的中國理論家的著作，是我為了向摩西·考塔尼證明一個觀點而寫的。我們一直在辯論，普通南非人是否對共產主義感興趣。我老早就堅持認為，共產主義文獻多數是難懂的、深奧的和以西方為中心的，而這些文獻本應該簡單、明了，并適合南非群眾閱讀。但是摩西堅持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為了證明我的觀點，我就拿了劉少奇的一篇文章為非洲讀者進行了改寫。

我將是第一位證人，因而能夠確定辯護方的基調。在南非法庭上，證人席上的證言只能以回答問題的方式提供。我不想局限于這種模式。我們決定不提供證言，而是在被告席上宣讀一個聲明，其他人則對此提供證據并進行盤問。

對于被告席上的證人作證，法官不能反詰或提問。因此，這種證言沒有普通證言那樣的法律分量。選擇這種方式作證的人通常是為了避免遭到反詰。我們的辯護律師提醒我，這樣會使我在法律上陷入更危險的境地。我在作證期間所說的任何關于我是無辜的話都會被法官大打折扣。但是，那不是我們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用陳述我們的政策和理想的方式進行辯護才是最重要的問題，這將為隨后而來的一切建立上下聯系。我很想與珀西·尤塔過過招，不過，更重要的是，我想利用這個平臺申訴我們的冤枉。

通過協商，我們達成了一致意見。由于咨詢室安裝了竊聽裝置，我們是通過相互傳遞紙條的方式進行協商的。我們甚至利用政府的竊聽器向政府提供虛假信息。我們盡量表明我將作證，這樣他們就會花費時間準備反詰。在故意安排的交談中，我告訴我的辯護律師喬爾·喬菲，我需要上次的叛國審判資料來準備證詞。看到尤塔專心致志地閱讀上百卷叛國審判資料，我們感到好笑。

我大約用了兩周的時間準備我的證言，我的證言主要是在牢房內利用晚上的時間完成的。當我完成了我的證言講稿的時候，我首先宣讀給我的被告同志和同事們聽。他們基本同意我的講話稿，只提了幾條修改意見。然后，我又請布拉姆·費希爾過目。布拉姆閱后非常擔心，他又請一位名叫哈爾·漢森的非常令人尊敬的辯護律師過目。漢森告訴布拉姆：“如果曼德拉在法庭上宣讀這個講話稿，他們可能會直接把他帶到法院后面送上絞刑架。”他的話使布拉姆更加擔心，第二天他來到我面前，督促我修改講話稿。我認為不論我們說什么，我們都有可能被絞死。因此，還不如索性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當時的氣氛特別令人感到恐怖，報紙天天都在猜測我們何時會被判處死刑。布拉姆請求我不要讀最后那段話，但是，我仍然堅持了自己的意見。

4月20日禮拜一，在最嚴格的安全防范下，我們被帶到了司法大廈，這次我們將進行辯護。溫妮和我母親都來到了法庭，當我們走上法庭的時候，我向她們點頭示意。法庭上又擠滿了人。

布拉姆宣布，被告將承認政府的某些證言，法庭上立即出現了嘁嘁喳喳的交談聲。但是，他繼續說，被告方將對政府提出的幾項指控予以否認，其中包括民族長矛軍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軍事組成部分的說法。他說，民族長矛軍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盡力使兩個組織保持完全獨立。雖然他們在這方面并非總是成功的，但是他們盡一切努力去實現這個目標”。他堅決否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執行共產黨的指令。他說，辯護方將否認關于戈德堡、卡特拉達、波恩斯坦和穆拉巴是民族長矛軍成員的說法。他說，辯護方將表明，民族長矛軍事實上沒有采納《行動計劃》，民族長矛軍也沒有著手準備實施游擊戰。

“要否認嗎？”法官德·韋特有些懷疑地問道。

“要否認，”布拉姆說，“證言將表明，雖然準備實施游擊戰，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采納過這個計劃。我們自始至終一直希望避免走這一步。”

然后，布拉姆輕聲說：“閣下，辯護將以被告席上第一號被告進行說明開始，他本人參與了民族長矛軍的創建，他能告訴法庭該組織的創建情況。”

這時，尤塔忽然從席位上站起來：“閣下！閣下！”他對我們不作證感到失望，因為他毫無疑問已經做好了反詰的準備。“閣下，”他相當失望地說，“在被告席上作陳述沒有發誓作證那樣的分量。”

“尤塔博士，我認為，”德·韋特法官干巴巴地說，“不需要你的幫助，被告律師有足夠的經驗勸說他的委托人。”尤塔于是坐了下來。

“我們和我們的委托人都不知道刑法的規定，”布拉姆說，“我們可以仰仗納爾遜·曼德拉。”

我站起身來，面對法官慢慢地照著我的講稿念起來。

我是第一號被告。

我擁有文科學士學位，與奧利佛·塔博先生合伙在約翰內斯堡從事律師工作數年。我是一個被判了刑的犯人，因為我未經批準離境出國和煽動人們在1961年5月底舉行罷工而被判處了5年監禁。

我直接承認，我是組建民族長矛軍的人員之一。直到1962年8月被逮捕，我一直在民族長矛軍事務中擔任重要角色。

首先，我要說政府在開庭時關于南非的斗爭受外國人或共產黨人的影響的指控是完全錯誤的。作為個人，同時也作為我們人民的領導，我做了我所做的一切。這些完全是緣于我在南非的經歷和我自身引以自豪的非洲背景，而不是因為任何外界可能說過的什么原因。

在特蘭斯凱我的青年時期，我曾經聽我們的部落老人們講過過去發生的故事。在故事中，他們向我講述了我們的祖先為捍衛祖國而進行斗爭的事跡。丁岡和巴木巴塔、辛沙和馬卡納、斯廣提和達拉希勒、莫肖伊休和塞庫庫尼的名字被全非洲民族引以為驕傲和光榮。當時，我希望生活為我提供服務于我的人民并為他們的自由斗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的機會。這就是本案指控我所干的一切的動機。

說了這些以后，我必須對暴力問題多說幾句。在法庭至今所了解的事情中，有些是真實的，有些則是不真實的。但是，我并不否認我策劃了破壞活動。我并不是因為不計后果或喜歡暴力才策劃這些破壞活動。我之所以策劃這種破壞活動，是清醒地分析了白人多年的專制、剝削和壓迫之后出現的政治形勢的結果。

我想給法庭留下這樣的印象，即，我們的行動并不是不負責任的或沒有考慮采取暴力行動所帶來的后果。我特別強調了我們不想對生命造成傷害的決心。

我們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主張不分種族的民主政治，我們避免采取任何導致加劇現有種族隔閡的行動。但是，無情的事實是，50年的非暴力斗爭給非洲人帶來的是更嚴厲的立法，從而使非洲人的權利越來越少。讓這個法庭理解這種情況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這又的確是事實。多年來，人民一直在談論暴力，談論他們將有一天與白人開戰并奪回他們的國家。而我們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層總是試圖說服他們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和平方式，盡管我們中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曾經進行過討論。不能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努力以非暴力方式使政府放棄種族歧視的政策并沒有獲得任何結果，我們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群眾開始對這種政策喪失信心，并產生了采取恐怖活動的念頭……

民族長矛軍是在1961年11月創建的。當作出這個決定之后，我們立即制訂了計劃，我十分重視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非暴力傳統和種族和睦政策。我們感到，這個國家正在滑向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一場內戰。我們冷靜地分析了形勢。內戰將意味著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張毀于一旦，將使種族之間的和解更加難以實現。我們南非歷史上已經有過戰爭的經驗教訓，用了50多年才消除了南非（英布）戰爭造成的傷疤。這種種族之間的內戰會造成雙方大規模的犧牲，由此而留下的傷疤又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消除呢？

我說，破壞活動也許可以為將來的種族關系帶來最好的希望。白人統治者對我們的努力作出的反應是迅速而殘酷無情的：破壞活動被宣布為一種可以判處死刑的罪過。我說，我們不要內戰，但是，我們需要做好內戰的準備。

經驗讓我們相信，暴動將為政府提供無限的濫殺無辜人民的機會。但是，正是因為南非的土地已經灑滿了無辜非洲人的鮮血，我們才認為做好長期準備，用暴力反對暴力來捍衛我們自己是我們的責任。如果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希望戰爭在最有利于我們的人民的條件下進行。對我們來說最有可能、雙方犧牲風險最小的戰爭形式就是游擊戰。因此，在準備將來開展的戰爭中，我們首先考慮了游擊戰的可能性。

白人都經歷過強制性軍事訓練，但政府卻不給黑人這種訓練的機會。因此我們認為，建立一個訓練有素的核心層是絕對必要的。一旦游擊戰爭爆發，這個核心層將能夠起到游擊戰爭所需要的領導作用。我們必須提前做好應對這種形勢的準備。

我介紹了在我們討論的這個階段我出國參加“東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運動大會”和接受軍事訓練的情況。我說，我接受軍事訓練，是因為如果發生游擊戰爭，我希望能夠與我的人民站在一起，并同他們并肩戰斗。盡管如此，我仍然相信采取破壞行動的可能性沒有消失，應該努力堅持下去。

我告訴法庭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民族長矛軍之間的不同之處，并說明我們如何誠心誠意地把兩者分開。這是我們的政策，但是，在實踐中并不那么簡單。由于禁止和監禁，人們常常不得不參與兩個組織的工作。盡管這樣有時會混淆兩者的界限，但是，界限仍然存在。我反駁了政府關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共產黨的目標是完全相同的論斷。

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思想路線過去是并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義，它與“把白人趕進大海”的吶喊所表達的非洲民族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堅持的非洲民族主義是非洲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實現自由。非洲人國民大會所認可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一直是《自由憲章》。它絕非一個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藍圖……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其歷史上的任何階段從未在國家的經濟結構上發動過革命性的變革，并且就我記憶所及，也從未譴責過資本主義社會……

與共產黨不同，非洲人國民大會只接納非洲人作為自己的成員。它的主要目標過去是并且現在仍然是為非洲人民贏得統一的和全部的政治權利。而共產黨的主要目標卻是消滅資產階級，用工人階級的政府取代資產階級政府。共產黨強調階級劃分，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則尋求階級之間的和諧。

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共產黨之間經常進行密切合作也是事實。但是，這種合作僅僅說明彼此之間有著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消滅白人霸權，而不能說明利益完全一致。世界歷史上充滿了類似的例子。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大不列顛、美利堅合眾國和蘇聯之間在反對希特勒時的合作關系。只有希特勒才敢說，這種合作把丘吉爾或羅斯福變成了共產黨人或共產黨人的工具，或者說英國和美國正在致力于建立一個共產主義世界。

對于對共產主義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的南非白人來說，要理解為什么有經驗的政治家那么愿意把共產黨人作為朋友可能是困難的。但是，對我們來說，理由則是十分顯然的。在反對壓迫的那些黨派之間進行理論上的區分是一種奢望，現階段我們還做不到。特別是幾十年來，共產黨人是南非唯一把非洲人當做人類并予以平等相待的政治黨派。他們愿意與我們一起吃飯，一起談話，一起居住，一起工作。因此，現在有許多非洲人把自由等同于共產主義。

我告訴法庭，我不是共產黨員，我總是把自己視為一名非洲愛國者。我并不否認，無階級社會的思想對我產生了誘惑，或者說，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對我產生了影響。這對許多新獨立的非洲國家的領導人來說都是事實，他們承認需要社會主義的某些方式使他們的人民能夠趕上西方先進國家。

通過閱讀馬克思主義文獻和與馬克思主義者交談，我得到了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人認為西方的議會制是不民主的和反動的。但是，與他們相反，我卻是這種制度的崇拜者。

《大憲章》、《權利請愿書》、《權利法案》都是全世界民主人士奉若神明的文獻。我對英國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十分欣賞。我認為英國的議會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將永遠令我羨慕。美國國會、國家權力分立理論，以及司法獨立也使我產生了相似的激情。

我詳細論述了南非黑人與白人生活中的巨大差別。在教育、衛生、收入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黑人僅僅處于維持生計的水平上，而白人卻處于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并且還準備繼續維持這種狀況。我說，白人常常聲稱南非的非洲人比非洲大陸上的其他非洲人富裕。我們的抱怨不是說我們與非洲大陸上的其他非洲人相比是貧窮的，而是說與我們國家的白人相比我們是貧窮的，而且法律剝奪了我們平等致富的權利。

非洲人缺少人格尊嚴是白人霸權政治的直接結果。白人霸權政治意味著黑人只能是次等公民。企圖保留白人霸權的立法制度讓這種狀況得以維持。在南非，卑賤工作不可變更地要由非洲人去做。有什么要搬運的或要清理的活，白人可以在周圍隨便找一位黑人去為他做，不管這個非洲人是否被他雇用……

貧窮和家庭生活崩潰是第二種后果。孩子們在大街上到處閑逛，因為他們沒有學上，或者因為他們沒有錢上學，或是沒有家長留在家中照管他們的學習，因為他們的父母（如果父母都在）不得不都去工作，以維持家庭生活。這就導致了道德標準的崩潰，使不法事件和暴力事件日趨頻繁，到處滋生，而不僅僅是政治性暴力事件……

非洲人要求在南非這個整體中得到公正。他們要求在社會中得到安全保證和居住場所。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求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因為沒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我們將永遠無能為力。我知道這種聲音在這個國家的白人聽起來像是革命的言論，因為多數選民將是非洲人。這使白人害怕民主……

這就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為之戰斗的目標。他們的斗爭是真正的民族斗爭。這是非洲人民的斗爭，是非洲人民在他們自己的遭遇和自己的經歷鼓舞下所進行的斗爭，這是爭取生存權利的斗爭。

我一直在念我的講話稿，談到這里，我把我的講話稿放在了辯護席的桌子上，轉臉面對法官，法庭變得特別靜。當我脫稿說出最后幾句話的時候，我的眼睛一直盯著德·韋特法官。

在我過去的生活中，我已經把自己獻給了非洲人民的斗爭事業。我反抗了白人專制，我也反抗了黑人專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會的理想，希望大家在這樣的社會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機會。我希望為這個理想而生活，并努力把它變為現實。如果需要，我愿意為了這個理想而犧牲自己的生命。

這時法庭上下鴉雀無聲。在我的講話結束之后，我直接坐了下來。我沒有回頭向旁聽席上致敬，盡管我感到他們的眼睛都在看著我。寂靜似乎持續了老長一段時間，但事實上大約只持續了不到30秒。然后，我從旁聽席上聽到長長的一聲嘆息，緊接著就是女士們嗚嗚哭泣的聲音。

我念了4個多小時，當時是下午剛過4點，通常應該是休息的時間。但是法庭剛剛靜下來，德·韋特就立即請下一個證人到庭。他決心減少我的講話對法庭產生的影響。他不想那天就此結束，只讓我一個人作證。但是，他的努力并沒有見效。當我講完話并坐下來的時候，德·韋特最后看了我一眼。

我的講話在本地和外國媒體上得到廣泛的關注，并且被逐字逐句地刊登在《蘭德每日郵報》上。他們忽視了我所說的話都是被禁止的這一事實。這個講話既顯示了我們的辯護思路，又消除了控方對我們的傷害，因為控方預計我將提供否認對破壞活動擔負責任的證言，并完全是在這個預測的基礎上準備的指控材料。他們現在明白，我們不想利用法律技巧避免承認對我們的行動負責。我們以自己的行動為驕傲，并且也早就想到了這一點。

第二號被告瓦爾特·西蘇陸是下一個發表證言的人。瓦爾特不得不首當其沖地面對尤塔為我準備的反詰。瓦爾特頂住了一系列不懷好意的提問。他擺脫了尤塔的雕蟲小技，用簡明扼要的語言對我們的政策作了說明。他說，《行動計劃》和游擊戰政策并沒有作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被采納。事實上，瓦爾特告訴法庭，由于這個計劃還不成熟，他本人就反對采納《行動計劃》和游擊戰政策。

戈萬在瓦爾特之后走上了證人席，他自豪地告訴法庭，他長期以來一直是共產黨黨員。公訴人問戈萬，如果他承認對他的幾項指控中的許多行動，為什么不干脆認罪？“首先，”戈萬說，“我認為我應該在這里如實說明一些導致我加入這些組織的原因，這里面有道義上的責任感。第二，簡單的原因是，認罪則說明心中認為道義上有罪。而我不承認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義上的罪責。”

像戈萬一樣，阿邁德·卡特拉達和拉斯迪·波恩斯坦都證實自己就是共產黨黨員，也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盡管拉斯迪是在警察襲擊期間在利沃尼亞被逮捕的，但是政府起訴他唯一的直接證據是他在農場幫助架設過無線電天線設施。凱西在證言中聰明地否認了參與和煽動別人進行破壞活動。但是，他說，如果他們采取這樣的斗爭行動，他將給予支持。

當第八被告詹姆斯·坎特被逮捕并與我們關押在一起時，我們大家都感到吃驚。除了是哈羅德·沃爾培的內弟和法律合伙人之外，他與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或民族長矛軍都沒有任何牽連。哈羅德通過他的辦公室曾經為我們辦過幾件事，但事實上并沒有起訴他的證據。我推測，政府堅持在監獄里起訴他的目的是恐嚇進步律師。

在德·韋特法官準備審理吉米一案的那天，我們等候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我對吉米說：“為了吉利，我們交換一下領帶。”當他接過我那條又寬又舊的領帶并與他給我的那條漂亮的絲綢領帶相比較時，他可能想我僅僅是企圖改善一下自己的著裝。盡管吉米有點講究穿戴，但他還是戴著我的那條舊領帶上了法庭，當德·韋特法官撤銷對他的指控時，作為一種告別的禮節，他向我舉起了那條領帶。

雷蒙德·穆拉巴是東開普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民族長矛軍的領導人，但是政府并沒有多少起訴他的證據。他否認他是民族長矛軍的成員之一，也否認知道有關破壞活動的任何事情。我們認為，第九號被告伊萊亞斯·莫佐萊迪和第十號被告安德魯·木蘭基尼都不應該作證，他們是民族長矛軍的低級成員，他們不能對已經說過的事情增加多少新的內容。伊萊亞斯·莫佐萊迪盡管在監獄中遭到了毒打和折磨，但是他并沒有屈服。安德魯·木蘭基尼是最后一個被告，他發表了一個違背誓言的聲明，承認曾經為民族長矛軍傳送過信息和指令，并為了便于做這個工作而把自己化裝成了牧師。他還告訴法庭，他在監獄里的時候曾經遭到過毆打，并被使用了電刑。安德魯作完證后，辯護方就停止了辯護。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最終的合議判決。

5月20日，尤塔向媒體提交了他最后講話的皮面精裝本，并給了辯護方一個副本。盡管裝幀漂亮，但尤塔的講話是對起訴書篡改性的歸納，并沒對控告書作任何的說明或對證言作任何核實，其中充滿了對人身的侮辱和攻擊。“被告的欺騙性是引人注目的，”他說，“盡管他們幾乎代表不了班圖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們卻自以為有責任告訴世界，南非的非洲人是被鎮壓的、被壓迫的和被征服的。”就連德·韋特法官也似乎被尤塔的講話搞得迷惑不解。有一次，他打斷尤塔的講話說：“尤塔先生，你確實承認你沒有證實被告決定開展游擊戰，對不對？”

尤塔愣住了，因為他認為正好相反。我們也感到吃驚，因為法官的提問為我們提供了希望。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訴法庭，關于開展游擊戰的準備工作確實已經展開了。

“是的，我知道，”德·韋特不耐煩地說，“辯護方承認。但是，他們說在他們被捕之前并沒有決定開展游擊戰。我認為你沒有證據推翻這種說法，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隨閣下的便。”尤塔用從喉嚨里擠出的聲音說。

尤塔最后說，這個案子不僅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高級叛國案，而且還是一個在控告書里沒有提及的殺人和故意殺人案。他氣勢洶洶地宣布：“我不無冒昧地說，控告書中每一項指控都已經被證實。”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話也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辯護律師阿瑟·查斯卡爾松第一次站起來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問題進行交涉。他反駁了尤塔關于此次審判與殺人有任何關系的說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長矛軍的政策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當阿瑟開始說明其他組織進行的破壞活動也被強加給了被告的時候，德·韋特插話說他已經作為事實予以承認。這是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勝利。

緊接著布拉姆·費希爾發表意見，他準備反駁政府提出的兩個最要害的指控問題，即，我們實施了游擊戰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民族長矛軍是一回事兒。盡管德·韋特說他相信我們沒有開始實施游擊戰，但是，我們并不敢冒這個險。但是，當布拉姆談到他的第一個問題時，德·韋特忽然有點不耐煩地插話說：“我想我的態度已經表明了，我承認在開展游擊戰這個問題上并沒有作出決定，或者說沒有確定日期。”

當布拉姆開始談第二個問題的時候，德·韋特又突然打斷他的話說，他也承認兩個組織是不同的這個事實。布拉姆準備得非常充分，但卻幾乎對德·韋特的回答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他忽然坐了下來。法官竟然在他說這兩個問題之前就已經承認我們的說法是正確的。我們感到高興，也就是說，如果對于正在面臨死刑的人來說可以算是高興的話，我們就可以說是高興的。法庭宣布休庭三個禮拜，德·韋特可以利用這段時間考慮對案子作出判決。

57...

全世界一直在關注著利沃尼亞審判。倫敦的圣保羅大教堂為此而舉行了徹夜的守夜活動，倫敦大學的學生們選舉我為學生會的缺席主席，而聯合國的一群專家要求為南非召開專門緊急會議，以敦促南非建立真正的代議制議會，并建議對所有種族隔離反對者實行特赦。在德·韋特準備判決的前兩天，聯合國（有4個國家缺席，包括英國和美國）敦促南非政府結束審判，并對被告給予特赦。

在我們即將重新走上法庭接受判決之前的幾天里，我一直在撰寫論文，以便通過倫敦大學的一系列考試而取得法學學士學位。我要在對我判決之前參加法律考試，這似乎有點荒唐。對關押我的獄警來說，這似乎也有點稀奇古怪。他們說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法律學位。但是，我在整個審判期間一直在堅持學習，我要參加這次考試，并專心致志地進行準備。后來我發現，這是使我消除雜念的一種好方法。我知道我很快就不能做律師工作了，但是我暫時不想考慮其他的事情。最后，我通過了這項考試。

6月11日星期四，我們又集中在司法大廈聽候最終判決。我們知道，我們當中至少有六人沒有定論卻被判有罪。問題是判什么刑。

德·韋特沒進入角色前一點時間都沒有浪費。他低聲而迅速地說：“我已經把我得出結論的理由記錄在案，我建議不再宣讀這些記錄。第一被告被發現在四項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二被告被發現在四項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三被告被發現在四項指控方面都有罪。”對每一位主要被告，德·韋特都宣布在四項指控方面有罪。凱西被發現在四項指控方面只有一項罪名成立，拉斯迪被宣布無罪并被撤銷指控。

“我建議今天不考慮量刑問題，”德·韋特說，“政府方面和被告明天上午10點將被提供發表意見的機會。”然后，他宣布休庭。

我們曾經希望凱西和穆拉巴能夠逃過判決，但是，那就是另一個信號：如果必要的話，政府將采取更為嚴厲的措施。如果法官能以不多的證據判穆拉巴四項指控都有罪，那么，難道他還不能把我們這些有確鑿證據的人判處死刑嗎？

那天夜里經過討論后，瓦爾特、戈萬和我告訴律師，不管我們被判什么刑，甚至是死刑，我們也不上訴。我們的決定使我們的律師感到迷惑不解。瓦爾特、戈萬和我相信，上訴將有損我們的道德立場。我們從一開始就堅持認為，不管我們干什么，我們必須問心無愧，必須堅持道德原則。我們現在不準備在上訴中發表我們的意見。如果我們被判死刑，我們將不再約束必然爆發的群眾運動。根據我們一貫堅持的、大膽的、具有挑戰性的路線，上訴似乎會表明我們虎頭蛇尾，甚至表明我們是令人失望的。我們要傳達的信號：為了自由，即使在斗爭中犧牲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

律師對我們的決定感到不滿，想與我們談談上訴的事。但是，戈萬、瓦爾特和我卻要求討論第二天判決程序的細節問題。如果我們被判處死刑，將會履行哪些程序？律師告訴我們，德·韋特宣布死刑后，他將問我這個第一被告：“你是否還有任何理由認為死刑不該被通過？”我告訴布拉姆、喬爾和弗農，在那樣的情況下，我會有許多話要說。我將告訴德·韋特，我準備去死，并知道我的死將對我為之獻身的事業是一種鼓舞。我的死，我們的死，都不會白費。如果作為烈士為我們的事業而死，比活著服務于我們的事業更好，那么，我們就會去死。律師說，這樣的話對上訴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我重申我們將不上訴。

即使是，或者說特別是，如果我沒被判處死刑，我們也有現實的理由不上訴。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可能會失敗。上訴法庭可能會認為德·韋特一直太寬容，判我們死刑是罪有應得。上訴將會有礙于國際社會為釋放我們而繼續施加壓力。

對于政府來說，死刑可能是最現實的判決。我們聽說，司法部長約翰·沃斯特告訴他的朋友們，總理史末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因為他的叛國而把他絞死。他說，國民黨人將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我做好了被判處死刑的準備。一個人如果真正對某件事已經做好準備，他一定真的企盼這件事的到來。而一個人如果沒能為某件事做好準備，他就會暗暗地相信這件事不會發生。我們都做好了準備，不是因為我們勇敢，而是因為我們注重現實。我想起莎士比亞的一句話：“能夠抱著必死之念，那么活果然好，死也無所惶慮。”

58...

1964年6月12日禮拜五，我們最后一次來到法庭上。自從在利沃尼亞遭到逮捕，將近一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別緊，我們的護衛隊鳴著汽笛穿過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鎖了，不準正常通行。對任何企圖走近司法大廈的人，警察都要檢查其身份。他們甚至在當地的公共汽車站和火車站設立了檢查站。盡管有種種威脅，仍然有2000人打著旗幟和條幅聚集在法院前，寫著“我們支持我們的領袖們”之類的標語，法院里面旁聽席上坐滿了人，本地媒體和外國媒體的記者只有站著的空間。

我揮手向溫妮和我母親致意。看到她們在場，我十分高興。我母親是從特蘭斯凱趕來的。來到法庭看自己的兒子是否被判處死刑，一定讓她心情十分沉重。盡管我猜想我母親不了解將要發生的全部情況，但是，她的支持絕不會動搖。溫妮也一樣堅定，她的支持給我增添了力量。

書記員高聲喊出案子的名稱：“政府訴納爾遜·曼德拉及其他人員案”。在宣判前，收到了兩份減刑申請。一份是哈羅德·漢森提交的；另一份則是作家艾倫·佩頓提交的，他也是自由黨的全國主席。漢森口才很好，他說全國上下的不滿情緒不能被壓制，人民總是要找到申訴不滿情緒的途徑。“犯罪并不是他們的目標，”漢森說，“只是他們所采取的斗爭方式。”漢森說法官應該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為了他們的自由也曾頑強地進行過斗爭。

盡管佩頓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說只有兩種選擇：“低頭屈服，或以暴力對抗。”被告應該得到仁慈，他說，不然南非的前途將是沒有希望的。

但是，德·韋特似乎對兩個人的申訴根本沒有聽進去，在他們兩個申訴時，他既不抬頭看，也不做記錄，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當中。他顯然是已經作出了決定，他僅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決定。

他點頭讓我們站起來，我試圖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連看都不向我們這個方向看。他的兩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臉色蒼白，粗粗地喘著氣。我們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將被判死刑，不然這位通常冷靜的人為什么那樣緊張？然后他開始講話。

在審理這個案子期間，我聽到很多關于非歐洲人不滿的事情。被告告訴我，他們的律師告訴我，這些被告都是非歐洲人的領袖，他們是在希望減少不滿情緒的動機的驅使下而變成罪犯的。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動機，就像他們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樣他們是毫無私心的。組織革命的人往往試圖取代政府，個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動機之外。

德·韋特中間停頓了一會兒，好像是為了緩口氣。他的聲音以前就很低，但現在僅僅是可以聽得到而已。

這個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國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樣，旨在加強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強其所在國的所有法律。被告被判的主要罪名是陰謀叛國罪，實際上是高級叛國罪。政府決定不以高級叛國罪提起公訴。考慮到這種情況，并對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之后，我決定不使用最高刑罰，像這樣的案子通常是應該判處最高刑罰的，但是，按照我的職責，這個判決是我能表示的唯一從寬懲處。這個案子的被告將全部被判處終身監禁。

我們相互看了看，臉上露出了微笑。當德·韋特宣布他不判處我們死刑的時候，法庭上的群眾深深地松了一口氣。但是，在一些旁聽者中，有的感到驚惶，因為他們沒能聽清德·韋特的宣判。丹尼斯·戈德堡的夫人叫著他的名字高聲說：“丹尼斯，是什么刑？”

“終身監禁！”他回答說，臉上堆滿了笑容，“終身監禁！沒有判處死刑！”

我回頭面對旁聽席，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四下搜尋溫妮和我母親的面孔。但是，法庭內太亂，人們在喊叫，警察不知所措地對群眾指手畫腳，我無法找到她們。當許多旁聽者沖出法庭向外面的群眾通報宣判結果的時候，我向他們伸出拇指行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禮。押解我們的警察開始把我們從被告席上驅趕出來，并押解著我們朝通向地下的門口走去。我又一次尋找溫妮的面孔，但是在我低頭穿過那個通往下面牢房的門口之前仍然沒有看見她。

我們戴著手銬，待在法院下面的牢房里。面對外面的人群，警察們十分緊張。他們讓我們在地下的牢房里待了半個多小時，希望人群散去。我們被從司法大廈的后面押送上囚車。我們能聽見護送的摩托車在我們兩邊行駛的聲音。為了躲避人群，囚車選擇了另外的路線行駛，盡管如此，我們仍能聽到群眾高喊“Amandla！”的口號聲和高唱“Nkosi Sikelel’ iAfrika”那節奏緩慢、曲調優美的歌聲。我們通過加了防護條的囚車窗子揮動拳頭，希望群眾能看到我們，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否看到了我們。

我們都成了判過刑的囚犯。我們與丹尼斯·戈德堡分離關押，因為他是白人，他被帶到了另外的牢房。我們其余的人都被關押在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的牢房里，與其他囚犯隔離開來。在這里，我們無法聽到呼喊聲和歌唱聲，現在只能聽到牢房門和監獄大門的吱呀咣當聲。

那天夜晚，當我躺在鋪在地板上的席子上的時候，開始思索德·韋特作出這個判決的原因。毫無疑問，南非的全國性示威和國際社會的壓力使他難以承受。國際商會對審判提出了抗議。全世界碼頭工人聯合會威脅不再裝卸南非的貨物。蘇聯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給沃爾沃德博士寫信，要求對我們寬大處理。美國國會議員們提出了抗議。英國議會的50名議員在倫敦舉行了游行。有傳言說，英國外交大臣亞歷克斯·道格拉斯－霍姆在幕后支持我們的事業。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艾德萊·史蒂文森寫信說，他的政府將盡一切努力阻止我們被判死刑。德·韋特曾經承認，我們還沒有開展游擊戰，并且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民族長矛軍是兩個獨立的組織，因此，對他來說，判處我們死刑是有難處的，似乎顯得太過分。

沃爾沃德告訴議會，判決并沒有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抗議電報和呼吁的影響。他吹噓說，他把所有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報都扔進了垃圾桶。

在審判快要結束的時候，德·韋特法官順便對布拉姆·費希爾說，辯護在這個案子中產生了廣泛的宣傳作用。這可能是他自己承認受到壓力影響的一種方式。我知道，如果我們被判死刑，那么大多數人將會把他視為殺害我們的兇手。

他也受到了來自他所屬種族的巨大壓力。他是一個南非白人，是一個受南非體系影響的人，也是一個有思想傾向的人。他不想違背自己的信仰體系去行事。他屈服于讓我們生的壓力，而頂住了判我們死的壓力。

我對德·韋特給卡特拉達、莫佐萊迪和木蘭基尼的刑罰感到吃驚和不滿。我原來期望他會解除對凱西的指控，并給伊萊亞斯和安德魯較輕的刑罰。后兩位是民族長矛軍職位比較低的成員，他們三人的罪過加在一起也沒有我們其余任何人的罪過大。但是，由于沒有上訴，我們深信凱西、安德魯和伊萊亞斯為此付出了代價：上訴法庭可能會為他們減刑。

每天晚上熄燈前，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都會回蕩著非洲囚犯歌唱的自由歌曲。我們也加入了這支情緒激昂的大合唱隊伍之中。但是，每天晚上，人們似乎是遵循一個無聲的命令，大家在熄燈前的幾秒鐘，都會立即停止歌唱，整個監獄會變得一片寂靜。然后，從整個監獄的十幾個地方，人們會高呼“Amandla”，從而引來數百人高喊“Ngawethu”！我們經常自己喊這個應答式的口號，但是，在那天晚上，其他所有不知名姓的囚犯帶頭喊這個口號還是第一次。來自監獄四周的聲音似乎特別響亮，好像在鼓勵我們堅強地迎接面前的考驗。

# 第八部 羅本島：黑暗的歲月

59...

午夜時分，我醒來并注視著天花板，審判的情形仍然像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地在腦海里浮現，此時我聽見走廊里有腳步聲。我被單獨關在我的牢房里，和別人不在一起。忽然有人敲我的牢房門，我能從柵欄門認出是奧卡木博上校。“曼德拉，”他用沙啞的聲音小聲說，“你醒著嗎？”

我告訴他，我醒著。“你是一個幸運的人，”他說，“我們準備把你帶到一個你可以享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四處走走，能看見海洋和天空，而不是每天只能看見灰墻。”

他并不是故意嘲笑，但是我十分清楚，他所指的那個地方并不會給我我所渴望的自由。然后他神秘地說：“只要你不惹麻煩，你將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然后，奧卡木博叫醒了其他犯人并命令他們收拾東西，他們都在獨立的牢房里。15分鐘之后，我們直接向比勒陀利亞地方法院的鋼鐵迷宮走去，鐵門的叮當聲不絕于耳。

一走出牢房，我們七個人就都被戴上手銬，押上了警車的后車廂。其中有瓦爾特、雷蒙德、戈萬、凱西、安德魯、伊萊亞斯和我。午夜已過，但是我們卻沒有人感到疲倦，氣氛一點都不憂傷。我們坐在滿是塵土的車廂地板上，唱歌、聊天，重新回顧審判的最后時刻。獄警給我們提供了三明治和冷飲，中尉范·威克與我們一起坐在后車廂內。他是一個樂呵呵的人，在唱歌的間歇，他主動就我們的前途談了他的看法。“好，”他說，“你們這些家伙不會在監獄里待多久。釋放你們的要求太強烈了，一兩年你們就可以從監獄里出來，將作為國家的英雄歸來。群眾將歡迎你們，每個人都想做你們的朋友，女士們會希望嫁給你們。嗨，你們這些家伙真行。”我們聽他嘮叨著，沒作任何評論。但是我承認，他的話讓我非常高興。不幸的是，他的預言過了將近30年才得到證實。

深更半夜，我們在警察的押解下靜悄悄地離開了比勒陀利亞。我們不到半小時就來到了市外的一個小型軍用機場，然后被押上了一架達庫塔（Dakota）大型軍用運輸飛機。飛機上沒有暖氣，我們在飛機里凍得瑟瑟發抖。有的人以前從來沒有坐過飛機，他們似乎對坐飛機比對我們的目的地還要懼怕。飛機在15000英尺的高度突然上升和下降，似乎比關押在高墻里面的牢房里還要危險得多。

大約在空中飛行了一個小時，飛機下面的大地開始出現了黎明的曙光。飛機上有舷窗，我們剛剛能看到飛機外面那柔和灰暗的光線，同志們就立即紛紛把臉貼在玻璃上向外看。我們是朝東南方向飛行，越過了奧蘭治自由邦那干旱的平原和翠綠而多山的開普半島。我也伸長脖子通過舷窗向外看，但是，我并不是作為一個旅游者觀看風景，而是作為一個戰略家進行觀察，看游擊隊在哪里能找到隱藏自己的地方。

自從組建民族長矛軍以來，關于南非的農村是否適合游擊戰，一直存在爭論。多數最高司令部成員都認為不適合。當我們飛過開普地區一個叫默里斯堡的山林的時候，我向同志們說，這里是我們可以進行戰斗的地方。大家感到十分高興，都伸長脖子想看個明白。真的，這片茂密的山林看起來完全可以隱藏一支新生的游擊隊。

幾分鐘之后，我們就到達了開普敦郊外的上空。我們很快就看到了開普平原上那火柴盒式的房子、市中心閃爍燈光的高樓和桌山的平頂。然后，在桌灣、在大西洋那湛藍湛藍的碧水之中，我們模模糊糊地看見了羅本島。

我們降落在位于羅本島一端的飛機跑道上。那是一個陰暗多云的日子，當我們走出飛機的時候，寒冷的冬風刺透了我們單薄的囚服。我們受到了帶自動武器的獄警們的迎接，氣氛十分緊張，但非常安靜，不像我兩年以前到達這個島上所受到的接待那樣喧鬧。

我們被押送到老監獄區，那是一個孤零零的石頭建筑物，在那里，我們被命令脫光衣服站在外面。監獄生活侮辱性的儀式之一就是當你從一個監獄轉到另一個監獄時，第一件事就是脫下原監獄的囚服換上新監獄的囚服。當我們脫光衣服時，他們扔給我們每人一套羅本島監獄的平紋卡其布囚服。

種族隔離甚至也體現在著裝方面。除凱西之外，我們每人都是一條短褲、一件質地很差的緊身上衣和一件帆布夾克。凱西是我們當中的一個印度人，他領到了一條長褲子。一般情況下，非洲人會領到一雙用汽車輪胎做的拖鞋，但是，這次給我們每人發了一雙鞋。只有凱西一人還額外領到了一雙短襪。給非洲人發短褲子的意思只不過是在提醒我們是“男仆”。那天我穿上了那件短褲子，但是，我發誓不會長時間穿它。

獄警用槍指了指我們要去的地方，用簡單的單詞發號施令：“走！”“靜！”“停！”他們不像我們以前在這里的時候那樣虛張聲勢地威脅我們，而是不再表露任何感情。

老監獄區僅僅是我們的臨時住所，當局正在為政治犯建一座完全隔離的、結構最安全的新監獄。當時，新監獄正處于收尾階段。在那里，不允許我們到外面來或與其他囚犯有任何接觸。

第四天上午，我們戴著手銬被押上了一輛封閉的卡車，前往另一個獄中之獄。這個新監獄是一座長方形的單層碉堡式建筑，中間有一個院子，是一片大約長100英尺、寬30英尺的水泥地。它的四周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墻，墻上有狹小的通道，獄警帶著德國牧羊犬在通道上巡邏。

三排牢房分別叫做A、B、C區，我們被關押在B區，位于四邊形庭院的最東側。我們每人住一間單獨的牢房，分布在長長的走廊兩側，只有一側牢房的窗戶面對著院子。總共大約有30間牢房，而單個牢房里的囚犯通常有24個。每間牢房有一個窗戶，大約有一英尺見方，用鐵欞子封著。牢房有兩道門：里面是鐵門或叫鐵柵欄門，外面是厚厚的木門。白天，只有鐵柵欄門是鎖著的，而夜間外面的木門也要上鎖。

牢房建得很倉促，墻仍然是潮乎乎的。當我把這個情況反映給監獄長時，他刻薄地告訴我，我們的身體可以吸潮氣。我們每人發了三條毯子，但都很薄，也很舊，幾乎是透明的。我們睡覺的地鋪只有一片劍麻席或草席。后來，我們又領到了一個氈墊子，有的人把氈墊子放在劍麻席的上面，以增加一些柔軟度。那年月，牢房里很冷，毯子又不暖和，所以我們總是穿著衣服睡覺。

我被關押在走廊頭上的一個牢房內。它的窗戶面對著院子，高度與眼睛齊平。我三步就能從牢房的一頭走到另一頭。當我躺下的時候，我的腳和頭都能觸及水泥墻。牢房的寬度大約有6英尺，而墻的厚度卻至少有2英尺。每間牢房外面都有一個白色的卡片，上面寫著囚犯的名字和牢房號。我的卡片上寫著：“N.曼德拉466/64”，意思是說我是466號囚犯，于1964年來到羅本島。我當時46歲，是一個被終身監禁的政治犯，這個小天地就是我不知還要住多長時間的“家”。

在普通監獄區里關押的幾位犯人很快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他們原來被關押的地方離B區不遠，是一個低矮的磚結構建筑。普通監獄稱F區和G區，關押著大約1000名最普通的囚犯。他們中有四分之一是政治犯，只有少數人在B區與我們關押在一起。我們因為兩個原因被與普通犯人隔離關押：從安全角度看，我們被認為是危險人物，但是，從政治角度說，我們具有更大的危險性。當局認為，我們會把我們的政治觀點“傳染”給其他犯人。

與我們關押在一起的有喬治·皮克，他是南非有色人組織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叛國審判的涉案人員，最近剛剛成為開普敦市政府的成員，因在開普敦監獄的外面安裝爆炸物而被判刑；還有丹尼斯·布魯特斯，他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動家，也是伊麗莎白港的詩人和作家，因違反禁止令而被投進了監獄；另外，比利·奈爾也與我們關押在一起，他是納塔爾印度人大會的老會員，因參加民族長矛軍從事破壞活動而被判刑。

幾天后，我們有了更多的伙伴，其中有內維爾·亞歷山大，他是一位杰出的有色人知識分子，是“非歐洲人團結運動組織”的成員，他在開普組建了一個名叫“游擊戰俱樂部”的激進支部，專門研究游擊戰術。內維爾在開普敦大學獲得了學士學位，在德國圖賓根大學獲得了德國文學博士學位。與內維爾一起的還有斐濟萊·巴姆，他是開普敦大學法律專業的學生，也是“游擊戰俱樂部”的一個成員；澤法尼·馬托朋則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他一直在奧蘭多西任教，是班圖教育制度的堅決反對者，并且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領袖中頭腦最清醒的一個；來自特蘭斯凱的三位上了年紀的農民因策劃襲擊特蘭斯凱自治政府總理K. D.馬嘆茲瑪，也被判入獄同我們關在了一起。

這些人組成了我們大約20名囚犯的核心團體。他們當中，有的我認識，有的只是聽說過，其他人則根本不認識。正常情況下，監獄里很少有的節假日，往往是看望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機會。但是，頭幾周氣氛非常緊張，我們甚至不能相互打招呼。獄警的人數與囚犯的人數一樣多，他們以威脅和恐嚇強化著每一項獄規。

我們第一周就開始工作，在隨后的幾個月內，我們將一直干這項工作。每天早晨，院子的入口處都堆放著大量排球般大小的石頭，我們必須用獨輪車把它們運到院子中間。監獄為我們配備了4磅重的鐵錘，或是用來砸碎較大的石塊的14磅重的鐵錘。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石塊粉碎成石子。我們被劃分成四排，彼此相間1.5碼，大家雙腿叉開席地而坐。我們每人發了一個用輪胎做的厚橡膠圈，用來把石塊圍在中間，以防碎石飛濺。

獄警在我們中間走來走去，不準我們相互說話。在開始的幾周內其他監獄區的獄警，甚至其他監獄的獄警都來看我們，好像我們是一群被關在籠子里的稀有動物。這項工作是單調而艱苦的，它不是多么費勁就能使我們感到暖和，但卻使我們渾身肌肉酸疼。

在羅本島上，6月和7月是最冷的月份。空氣寒冷，雨季剛剛開始，似乎從來沒有到過華氏40度以上。就是在太陽底下，我穿著卡其布襯衣也凍得直打寒戰。這時，我第一次懂得了“透骨寒”這個被用得再濫不過的字眼的含義。中午，我們停下來吃午飯。第一周，我們的伙食全是湯，而且味道很不好。下午，我們被允許在嚴格的監督下活動半個小時。我們排著隊，輕快地繞著院子散步。

在開始砸石子的頭幾天里，有一次獄警吩咐凱西推著獨輪車為停在院子入口處的汽車運石子。凱西身體比較單薄，不適合干重體力活，推不動獨輪車。獄警們高聲吆喝著說：“Laat daardie kruiwa loop!”（使勁往前推！）當凱西用力推的時候，獨輪車眼看著就要翻車，獄警們幸災樂禍地笑起來。我看得出來，凱西決心不讓他們看笑話。我會推獨輪車，于是趕忙站起來過去幫他。在獄警命令我坐下之前，我設法教凱西慢慢地往前推，并告訴他，那是一個掌握平衡的問題，而不純粹是一個力氣問題。他點頭稱是，然后小心翼翼地推著獨輪車穿過了院子。獄警們總算是停止了嘲笑。

第二天早晨，監獄當局在院子內停放了一輛很大的運石子的翻斗車，要求我們到周末完成半車石子的工作量。我們努力地干，最終完成了定額。第二周，獄警要求我們完成四分之三車的石子。我們賣命地干，也完成了定額。第三周，獄警要求我們完成滿滿的一車石子。我們知道根本無法堅持長時間的拼命工作，但是，我們也沒有說什么。我們甚至一直埋頭苦干。但是，獄警激怒了我們，于是我們悄悄地低聲喳咕了一個主意，那就是不要定額。接下來的一周，我們開始在島上第一次進行消極怠工：我們的工作速度比以前放慢了一半還多，以此抗議對我們過分的、不公平的要求。獄警立即發現了我們的意圖，并對我們進行威脅。但是，我們就是不加快速度，我們在院子里一直堅持這種消極怠工的策略。

從我1962年在羅本島待了兩個星期之后，羅本島就發生了變化。1962年沒有幾個囚犯，羅本島與其說是個監獄，倒不如說是一個試驗基地。兩年后，羅本島儼然成了南非監獄體系中最嚴厲、最殘酷的監獄。它不僅對囚犯來說如此，對監獄管理人員而言也是最艱苦的地方。過去曾經為我們提供香煙、向我們表示同情的有色人獄警都走了。現在的獄警都是白人，都說南非荷蘭語。他們要求與囚犯保持主仆關系，命令我們稱他們老板，對此我們予以拒絕。羅本島上的種族劃分是絕對鮮明的：沒有黑人獄警，也沒有白人囚犯。

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總是需要一段調整時間。來到羅本島，就像來到了另一個國家。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僅僅是另外一個監獄，而且與我們原來的監獄相比，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我們離開比勒陀利亞的那種歡快心情完全讓羅本島嚴酷的氣氛窒息了。我們面面相覷，知道我們面對的生活將是嚴酷的。在比勒陀利亞，我們可以感覺到我們與我們的支持者和家人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這個島上，我們感覺這種聯系被割斷了，而且是實實在在地被割斷了。我們相互安慰，而且這是唯一的一種安慰。我的失望之情很快被一種新的、完全不同的戰斗即將開始的感覺所代替。

從第一天起，我就對被強迫穿短褲提出了抗議。我要求見監獄長，并且起草了一個意見清單。獄警對我的抗議置之不理，但是，到了第二周周末，我發現一條舊卡其布褲子被隨便丟在了我的牢房的地板上。這種不帶條條的三件一套的衣服從來沒有讓我如此高興過。但是，在我穿上這條褲子前，我還要看看我的同志們是否也發了這樣的褲子。

他們沒有發。我告訴獄警把褲子拿回去，并堅持每個非洲囚犯必須都有長褲子。獄警嘟嘟囔囔地說：“曼德拉，你說你要長褲子，我們給你長褲子你又不要。”這個獄警拒絕碰黑人穿過的褲子，最后，監獄長親自來到我的牢房，把褲子撿起來。“很好，曼德拉，”他說，“你就等著跟其他囚犯穿同樣的衣服吧。”我說，如果同意給我長褲子，那么為什么不給每一個人發一條呢？他沒有回答。

60...

在島上住了兩周之后，有人告訴我們，我們的律師布拉姆·費希爾和喬爾·喬菲第二天將來羅本島訪問。當他們來到羅本島的時候，我們被押到會見地點同他們見面。他們來羅本島訪問有雙重目的：看看我們在監獄里生活得怎么樣，并確認我們是否仍然不想就我們的判決提出上訴。離上次我們見面只過去了幾周，但是，我們卻感覺好像分別了很長時間，他們似乎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訪問者。

我們坐在一個空蕩蕩的房間里，一位少校就在房外監視我們的談話。我很想與兩個律師擁抱，但是，由于那個少校的存在，我們受到了限制。我告訴他們，我們大家都很好，并且說明，因為以前我們列舉的那些理由，我們仍然不想上訴，其中包括事實上我們不想因為我們的上訴而影響到其他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被告。布拉姆和喬爾似乎贊成這個意見，盡管我知道布拉姆認為我們應該上訴。

當我們的談話快要結束的時候，我順便向布拉姆詢問了他夫人莫莉的情況。沒等我說完莫莉的名字，布拉姆就站起來走出了房間。幾分鐘后他又回來了，他還是那么鎮定自若，并重新開始談話。但是，他最終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們的會見緊接著就結束了，當我在少校的監視下回我的牢房的時候，他對我說：“曼德拉，你注意到布拉姆·費希爾的舉動了嗎？”我說，我注意到了。他告訴我，莫莉在上周發生的車禍中遇難了。他說，布拉姆駕駛著汽車，為了躲讓馬路中間的一只動物而不幸沖進了河中，莫莉是被淹死的。

我們為這個消息感到震驚。莫莉是一位特別好的女士，她慷慨、無私、沒有偏見，一直從多方面支持布拉姆。她是他的夫人、同事和同志。布拉姆一生已經歷過巨大的不幸：他的兒子因患囊腫性胰腺炎而少年早逝。當我問莫莉的時候他轉身離去，這是布拉姆的典型性格。他堅韌不拔，是一個不把自己的痛苦和麻煩留給他的朋友的男子漢。作為一個南非白人，他的良心使他不得不反抗自己的血統，并為此而受到了南非白人的排斥。他顯示出一種勇氣和犧牲精神，而這種勇氣和犧牲精神本身就是一種大家風范。我只需反對不公正，而不用與我自己的人民對立。

我告訴少校我想給布拉姆寫一封信，他說我可以寫。當時，關于寫信的規定十分嚴格。我們只被允許給直系親屬寫信，并且每半年才允許寫一封不超過500字的信。所以，當少校不反對我給布拉姆寫信的時候，我感到既吃驚又高興。但是，他并沒有遵守我們的協議，我寫了信并交給了監獄當局，但是，那封信根本就沒有寄出。

幾個月內，我們的生活總是遵循一個模式，監獄生活千篇一律：每天都與昨天一樣，每周都與上周一樣。這樣，月份和年份有時就被相互混在了一起。任何有違這個模式的事情都會使監獄當局感到不安，因為千篇一律是監獄管理完善的標志。

千篇一律對囚犯也是一種安慰，這就是監獄之所以被看作牢籠的原因。千篇一律就像是一個難以忍受但卻又令人愉快的家庭主婦，因為千篇一律能夠讓時間過得更快。手表和任何計時物品在羅本島上都被禁止使用，所以，我們絕對不知道什么是準確時間。我們依靠鐘聲和獄警的口哨及吆喝聲生活。每周都與上一周雷同，你必須記住那是哪一月哪一天才行。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的牢房的墻壁上填日歷。沒有時間感會很容易使一個人失去注意力，甚至失去判斷力。

監獄里的時間過得很慢，正所謂度日如年。時間過得慢通常與不得不閑散和沒有生氣相聯系，但是，在羅本島卻不是這樣，我們幾乎總是忙于工作、學習和解決爭端。然而，時間仍然過得很慢。部分原因是，在外面花幾小時或幾天就能解決的事，在監獄里要花上幾個月或幾年。請求發一個新牙刷可能要六個月或一年的時間才能實現。阿邁德·卡特拉達曾經說過，在監獄里幾秒就像監獄外幾年，而年卻像分秒那樣流逝。在院子里砸一下午石子可能感覺時間無限長，但是，一年的時間又感覺忽然就結束了，你不知道那些歲月都是怎么過的。

對每一位囚犯的挑戰，特別是對政治犯的挑戰，是如何完好地在監獄里生存下來，如何完整地從監獄里走出來，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強自己的信仰。為了應對這個挑戰，我要完成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做一些為了生存而必須做的事情。為此，你必須知道敵人的目的，然后再采取策略去破壞敵人的圖謀。監獄就是要摧毀你的精神和決心，為此目的，監獄當局企圖利用你的每一個弱點摧毀你的所有念頭、消滅你的全部個性。他們就是想撲滅我們每個人保持人性和本來面目的火花。

我們的生存有賴于知道當局打算對我們作何處理，并且在我們之間共同分享這些信息。任何個人的反抗，就算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我一直是孤家寡人，我就不能做這件事。但是，當局最大的錯誤就是讓我們生活在一起。因為在一起，我們增強了決心和信心。我們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不管我們知道什么情況和獲得什么消息，我們都一起分享。通過一起分享，我們個人的勇氣得到了提升，但這并非意味著我們對我們遭受的困難的反應是完全一致的。人的能力有差別，對壓力的反應也不一樣。但是，強者要幫助弱者，使強者和弱者在這個過程中都變得更強。最終，我們不得不在監獄里創造自己的生活，以監獄當局認可的方式去創造，秩序不是由監獄當局維持，而應該由我們自己維持。

作為一位領導人，他有時要采取不受歡迎的行動，或是那些多少年后方見效果的舉措。有時候，成功的榮耀僅僅在于取得這些成功的人知道這些成功。這對監獄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在監獄里，你必須在忠于你的理想之中尋求安慰，哪怕是沒有任何人知道。

我現在是在外圍，但是，我知道我將不會放棄戰斗。我處于一個完全不同的、比較小的角斗場，其觀眾只有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壓迫者。我們把在監獄里的斗爭作為整個斗爭的一個縮影。我們將如同在監獄外堅持進行戰斗一樣，在監獄里進行戰斗。種族歧視和鎮壓沒有什么不同，但我們將不得不在不同的條件下進行戰斗。

監獄及其當局陰謀剝奪每個人的尊嚴，但我完全有信心生存下去，任何想剝奪我的尊嚴的個人和團體都將會失敗，因為無論以任何代價或在任何壓力下，我都不會放棄生存的希望。對于我將終身被監禁的可能性，我決不會太看重，我決不認為終身監禁就真的意味著在監獄里待一輩子，并必然死在監獄里。也許我否認這樣的前景，是因為這樣太令人不愉快，也是令人無法想象的。不過，我總是相信，有一天，我將再次作為一個自由人感受走在陽光下的草地上的心情。

我基本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說不清這種樂觀主義是天生的還是后天培養起來的。這種樂觀部分地來自迎著太陽勇往直前的勇氣。有許多黑暗的時刻，人道主義信仰一時經受了痛苦的考驗，但是，我將不會也不可能向悲觀低頭。向悲觀低頭就意味著失敗和死亡。

61...

我們每天早晨5點30分由值夜班的獄警叫醒，他總是在走廊頭上敲著銅鈴喊：“Word wakker! Staan op!”（醒來！起床！）我一貫起得比較早，這個時間起床對我來說并不是一個負擔。盡管我們5點30分起床，但是，直到6點45分才讓我們從牢房里出來，我們在這段時間打掃牢房，并卷起我們的席子和毯子。我們的牢房里沒有自來水，也沒有衛生間，但是有被稱作“ballies”的馬桶。這種馬桶直徑有10英寸長，上面有中間凹的陶瓷蓋，蓋子上面可以盛水。蓋子上的水是用來刮臉、洗手、洗臉的。

6點45分，當我們被允許走出牢房的時候，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走廊頭上的洗滌槽內徹底清洗馬桶，不然會產生一種臭氣。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清洗馬桶唯一令人開心的就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小聲與我們的同事說句話。清洗馬桶的時候，獄警不喜歡在旁邊逗留，所以是相互說話的一種機會。

有那么幾個月，早飯由普通監禁區的囚犯負責送到我們的牢房。早飯是玉米片粥，是用玉米加工而成的食物。普通囚犯笨手笨腳地把玉米片粥舀到碗里，然后，從牢房柵欄門遞進牢房。這是一個技術活，要想不把粥灑在外面，手必須靈巧些才成。

幾個月后，我們的早飯被用舊金屬油桶盛著送到院子里，然后我們用簡易的金屬碗自己盛飯。我們每人發了一袋被叫做咖啡的飲料，實際上只是一種烤糊了的玉米粉而已，我們可以用熱水沖著喝。后來，當我們能進入院子為自己打飯的時候，我會在院子里繞著院子散散步，直到早飯送到為止。

像在監獄里的一切事物一樣，伙食是有區別的。一般來說，有色人和印度人的伙食比非洲人的伙食好，不過差別并不大。當局總是說我們的伙食是均衡的，也的確是均衡的——介于不可口與不能吃之間。伙食是我們許多次抗議的原因，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獄警說：“伙計，你們卡非爾人在監獄里吃的比在家中吃的都好！”

在吃過早飯后，獄警吆吆喝喝地說：“Val in! Val in!”（集合！集合！）我們都要站在牢房外面接受檢查。監獄當局要求每個囚犯，必須把卡其布夾克上的三個扣子扣好，當獄警走過時還要求脫帽。如果我們的扣子沒扣、沒脫帽或者牢房內部不整潔，我們就因違反了獄規而受到懲罰，不是被罰單獨監禁就是不讓吃飯。

檢查過后，我們就在院子里砸石子，一直干到中午，中間也不休息。如果我們慢下來，獄警們就會喊著讓我們加快速度。中午，監獄里會響起午飯的鈴聲，盛午餐的金屬圓桶將被運進院子里。對于非洲人，午餐有煮玉米，即煮粗玉米粒。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午餐則是玉米片，或玉米飯，這種玉米飯只不過是用一種磨過的玉米做成的粥。玉米片有時還給配上蔬菜，而我們的煮玉米則只能干啃。

我們午飯常領到一份phuzamandla，意思是“健力飲”，是一種用玉米片加少許發酵粉做成的粉狀物。它需要用水或牛奶沖起來喝，如果濃一點，味道還不錯。但是監獄當局只給一點點兒，僅僅能改變一下水的顏色而已。我通常把我的那份省下來，直到積攢幾天后，足夠沖一碗地地道道的飲料才把它喝掉。如果當局發現你積攢飲料粉，就會把它沒收，你也會受到懲處。

午飯后，我們一直工作到下午4點，當獄警們吹響刺耳的哨子的時候，我們要再一次排隊報數和接受檢查。然后，我們被允許有半小時的洗漱時間。我們的走廊頭上的洗澡間里有兩個海水淋浴噴頭，一個咸水水龍頭和三個用來洗澡的大電鍍金屬桶。沒有熱水，我們只能站在或蹲在桶里用咸水打打肥皂，洗掉一天的灰塵。當外面很冷的時候，用冷水洗澡不怎么舒服，但是我們洗得還是很開心。有時，我們邊洗邊唱，這樣感覺水就不那么涼。在那些日子里，這是我們唯一能說話的時間。

正好4點30分，走廊頭上會響起咚咚的敲門聲，這意味著晚飯已經送來了，普通犯人給我們打飯，然后我們回到牢房里吃。我們還可以得到一份玉米片粥，有時，玉米片粥里面有少量的胡蘿卜、卷心菜或是甜菜，但通常是少得可憐。我們一旦吃上一種蔬菜，通常是連續幾周都吃同樣的蔬菜，直到胡蘿卜或卷心菜不再新鮮或者發霉，我們徹底吃夠為止。每隔一天，我們的粥里面會有一小塊肉，那塊肉通常大部分是軟骨。

晚餐時，有色人囚犯和印度人囚犯每人有一塊面包（通常叫katkop，即“貓頭”，因面包的形狀而得名）和一塊人造黃油。一般認為，非洲人不喜歡吃面包，因為面包是“歐洲食品”。

通常，我們得到的食物比本來規定的那點不多的食物還要少，這是因為伙房里盛行克扣之風。伙夫都是普通犯人，他們往往把最好的食物留給自己吃或給他們的朋友吃。他們還常常把最可口的放在一邊留給獄警，用來換取獄警的好感或優待。

晚上8點，值夜班的獄警會把自己鎖在走廊里與我們在一起，鑰匙則通過門上的小孔遞給外面的獄警。然后，值班獄警就在走廊里來回走動，命令我們睡覺。在羅本島上從來不喊著讓關燈，因為我們牢房里的帶網罩的燈泡白天黑夜都亮著。后來，那些攻讀更高學位的囚犯被允許學習到晚上10點或11點。

走廊上的傳音效果不錯，所以我們睡覺前總是設法相互聊幾句。但是，如果我們能十分清晰地聽見低聲說話，那么獄警也就能聽見，他就會喊“Stilte，in die gang!”（走廊里不準說話！）獄警一般會來回走上幾趟，以確定我們不再讀書或寫字。幾個月后，我們沿著走廊撒上了一些沙子。這樣，我們就能聽見獄警的腳步聲，也就有停止說話或隱藏非法物品的時間。只有當我們都靜下來的時候，他才在走廊頭上的小辦公室里坐下來，一直瞌睡到第二天早上。

62...

一天上午，我與布拉姆和喬爾見面后不幾天，我們被帶到了監獄辦公室。這里距離我們的牢房大約有四分之一英里遠，是個與我們的監獄十分相似的石結構建筑物。一到了那里，我們就排著隊按手印，這是監獄里的慣例。但是，在等候的時候，我看見一旁有一個拿相機的獄警。按過手印后，獄警吩咐我們排隊照相。我示意我的同事不要動，并向獄警說：“我希望你出示監獄管理局局長讓我們照相的文件。”根據規定，給囚犯照相要有授權。

熟悉規定總是有好處的，因為獄警也常常不知道這些規定。當你知道的比他們知道的多時，他們就多少有點兒膽怯。獄警對我的要求感到吃驚，但卻不能提供任何說明或書面文件。他威脅說，如果我們不同意照相，他將控告我們。但是我說，如果沒有授權，就不能為我們照相，這就是問題所在。

作為一條原則，我們反對在監獄里給我們照相，因為，身為囚犯照相是不體面的。但是，有一次我確實同意照了一張相，那是我在羅本島上同意照的唯一一張相片。

幾周后的一個上午，獄警隊隊長不是發給我們鐵錘在院子里砸石子，而是為我們每人發了針、線和一堆破囚衣，讓我們縫補。但是，我們發現這些衣服多數已破得無法縫補，因而認為這是一個不好干的活兒。我們不知道為什么給我們換了工作。大約到了上午11點鐘，前門開了，我們發現監獄長帶著兩個穿西裝的人進了院子。監獄長說，這兩位來訪者，一個是記者，一個是攝影師，他們來自倫敦《每日電訊報》。他說話的語氣，好像國際媒體的訪問對我們來說將是常有的事。

盡管這兩位是我們的第一批官方訪問者，我們仍然對他們有所懷疑。首先，他們是在政府資助下來訪問的；其次，我們知道《每日電訊報》是一份保守報紙，不可能同情我們的事業。我們十分清楚，國際社會對我們的處境十分關注，因此，政府很想證明我們沒有受到虐待。

兩位記者慢慢繞院子轉了一圈，仔細對我們的情況進行了考察。我們低著頭，一直集中精力地工作。他們轉了一圈之后，一位獄警拽著我的肩膀說：“曼德拉，來，你來談談。”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代表獄友們講話。監獄當局的規定很清楚，每個囚犯只允許代表自己講話。這樣做的目的是削弱組織的作用，分散集體的力量。我們對這一規定提出過異議，但是沒有多大改善。當局不允許我們使用“我們”這樣的詞。不過在頭幾年，當監獄當局需要一個囚犯代表其他囚犯說話時，那個囚犯通常就是我。

我與那個名叫紐曼的記者談了大約20分鐘，直率地對監獄和利沃尼亞審判談了我們的意見。他是一個很爽快的人，在我們的交談就要結束的時候，他說想給我照張相。我不愿意照相，不過在這種場合下我卻有些寬容。因為我知道，照片將只在國外發表，只要文章稍顯友好，也可能對我們的事業有所幫助。我告訴他，如果西蘇陸先生和我一起照，我將同意。那張照片表現出我們兩個人在院子里談話的場景，到底談的是什么內容我已記不清楚了。不過，我后來一直也沒看到過或聽到過那篇文章。當獄警們把舊囚衣拿走并把錘子還給我們的時候，那兩位記者幾乎已經不見影兒了。

在最初的幾個月中，來自《每日電訊報》的兩個記者是小批量來訪者中的第一批。當利沃尼亞審判的陰影仍然在人民心中產生共鳴的時候，政府急于向國際社會顯示我們得到了公正的對待。媒體上一直有關于島上的非人類狀況和我們如何被毆打、被折磨的報道。這些報道使政府十分尷尬，為了進行反擊，他們讓許多局外人士來島上考察，用意是反駁來自輿論的批評。

一名英國律師對我們進行了簡短的訪談，這位律師曾經在國際法庭為納米比亞獨立作過辯護。他訪談后不久我們就被告之，美國律師協會的代表海寧先生將來看望我們。當時，整個非洲對美國人還有些新奇感，我很想與這樣一個令人敬畏的律師組織的代表見面。

在海寧先生來訪的那天，我們被召集到院子里。他是在監獄管理局局長斯特恩將軍陪同下來到羅本島的。斯特恩很少在羅本島上露面，所以他的露面在監獄事務中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他是一個舉止高雅、處事老練的人。他總是穿著質地優良、裁剪時髦的衣服。他對人客氣，稱我們“先生”，甚至脫帽向我們致意，這在監獄里是絕無僅有的事情。但是，斯特恩將軍是用忽視而不是用權勢來對付我們，對島上所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他不經常露面，使殘酷無情的監獄官員們更膽大妄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這位將軍以最和善的態度向我們的客人作了介紹，并對我們說：“先生們，請選出你的發言人。”許多囚犯喊出了我的名字。

斯特恩將軍朝我點了點頭，于是，我站起身來。與斯特恩將軍相比，海寧先生則是一位粗壯、不修邊幅的人。我感謝他對我們的訪問，并說，他的來訪使我們感到非常榮幸。然后，我概括地向當局提了我們的意見。我首先談了一些核心的、最重要的問題。我說，我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我們應該受到政治犯的待遇。我一一詳細列舉了我們對伙食、居住條件和工作方面的不滿。但是，當我在講話的時候，海寧先生老是插話。當我說我們工作時間太長時，他說，作為犯人必須要工作，不然就會變得懶散。

當我開始說我們的牢房問題時，他突然插話說，美國監獄里的條件遠比羅本島的條件更差，相比之下，羅本島算是天堂。他補充說，對我們的判決是公正的，沒被判處死刑我們應該感到幸運，因為按罪過可能該判死刑。

海寧先生信口胡言，我們中的有些人因此認為他一點兒也不穩重。他說話的口音，在我看來似乎是一種噪音，并且，他說話時特別喜歡吐唾沫，我們過去誰也沒見過如此“大雅”之舉。

最后，我再也不愿聽下去了，于是打斷了他的講話：“不，先生，你誤解了我所說的話。”海寧生氣地說我是在頂撞他，而斯特恩將軍則只是在一旁一邊觀察一邊聽，沒有發表任何看法。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很難保持冷靜，紛紛對海寧先生的話表示不滿。大家氣憤地說，根本不應該讓他來看我們。正常情況下，任何一種訪問都會使我們感到高興，但是，海寧先生的訪問卻使我們感到沮喪。或許，這正是當局所希望的。與一個傾向如此明顯、知識如此貧乏的人會見是令人不愉快的。海寧最后連“再見”都沒說就扭頭走了，我們對此一點都不感到遺憾。

隨后的幾年中，我們經常議論起海寧先生，我們許多人都模仿他說話的方式進行取樂。我再也沒有聽見過他的消息，他當然也不會在羅本島上為美國律師協會贏得任何朋友。

63...

在獄中，所有的囚犯都被當局劃分成A、B、C、D四類當中的一類。A類為最高級別，享受最好的待遇；D類是最低的級別，享受最差的待遇。一切政治犯，即被當局稱作“治安犯”的犯人，自然被劃歸為D類。與這些類別劃分有關的待遇包括探視、書信、學習和購買日用品的機會，所有這一切對每個犯人的生活來說都是必需的東西。一個政治犯一般要花幾年的時間才能從D類升為C類。

我們對這種分類方法十分反感，因為這樣的分類是不道德的、有辱人格的。它不僅對普通犯人是一種打擊，而且對政治犯也是一種特別的打擊手段。我們要求，所有的政治犯應該被劃成一類。盡管我們對這種劃分提出了抗議，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一點就是，這種劃分在監獄生活中是無法變更的。如果你抗議作為一名D類囚犯每6個月只能收到一封信，監獄當局就會說：改進你的行為，成為一個C類囚犯后，你每6個月就能收到兩封信。如果你抱怨吃不飽，監獄當局就會提醒你，如果你是一個A類囚犯，你就能從監獄外得到錢，那樣，你就可以在監獄的糖果店內購買額外的食物。即使是一位自由戰士，能購買日用品和書籍也是大有益處的。

這種分類一般與囚犯的刑期有關。如果你被判8年監禁，你一般會在頭兩年被劃為D類，隨后兩年被劃為C類，再后兩年被劃為B類，最后兩年被劃為A類。但是，監獄當局把這種分類作為對付政治犯的一種武器，他們往往以降低我們的類別相威脅，借此來控制我們的行為。

盡管我被帶到羅本島以前就已經被關押了近兩年，但是，我來到羅本島之后仍然被劃為D類。雖然我也希望得到高一級類別的權利，但是我卻拒絕在行為方面讓步。最快的升級辦法是聽話、不抱怨。“我說，曼德拉，你是個愛找麻煩的人，”獄警們會說，“你將終身被劃為D類。”

囚犯每6個月被召集到監獄委員會面前評估一次級別。監獄委員會有意以監獄規定的名義對我們的行為進行評價，但是，我們發現這種評分與其說是一種行為評分，倒不如說是一種政治評判。在我第一次與監獄委員會見面期間，委員會的官員們詢問了我有關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我的信仰問題。盡管這與分類沒有什么關系，但是我仍然耐心地予以回答，并試圖以此感化他們，使他們也接受我們的信仰。這一次還算是把我們當人看待，但這是不多見的，我也是第一次作出了響應。后來我發現，這僅僅是當局從我們身上收集情報的一種辦法，我反而無意之中中了他們的圈套。隨后不久，我們一致認為不應該與監獄委員會討論政治問題。

作為一名D類囚犯，監獄當局只允許我每6個月有一次被探視的機會，只能寫一封信和收一封信。我認為，這是監獄系統最不道德的規定之一。與家人溝通是一種人權，不應受到監獄系統人為分類的限制。但是，這卻是監獄生活中的一個事實。

探視和書信僅限于“直系”親屬，我們發現，這個限制不僅是令人討厭的，而且也是一種種族歧視。非洲人直系親屬的概念與歐洲人或西方人的直系親屬概念大不相同。我們的家庭結構更大，更具有包容性，任何來自一個共同祖先的后代都被視為同一家庭的組成部分。

在監獄里，比來自家中的壞消息還要壞的事情莫過于根本就沒有家人的消息，思念家人的不幸和悲傷比實際上的憂傷和失望更令人難以承受。我們寧愿收到一封寫著壞消息的信，也不愿意連信都收不到。

更有甚者，這個令人痛苦的限制也被當局濫用了。期待來信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每月有一次通知來信的機會，有時6個月過去了，但一封信也沒有。雖然6個月允許收一封信，但是6個月卻沒有收到一封信，這是一個更大的打擊。誰不想知道自己的夫人和孩子們、母親和姊妹們發生了什么事情？當我接不到信的時候，我感覺心情像大卡魯高原一樣干旱和荒蕪。有時，當局還常常惡意扣壓信函。我不會忘記獄警們說的話：“曼德拉，我們收到了給你寄來的一封信，但是，我們不能給你。”他們不說明為什么，也不告訴你信是誰寄來的。這時，要完全靠自我約束，不能為這樣的事情發火。后來，我通過適當的渠道提出了抗議，有時還真能要回自己的信。

當真的有書信寄來的時候，收到這些書信簡直可以說是如獲至寶。一封信就像夏天的甘霖，甚至能使沙漠變成綠洲。當當局遞給我一封信的時候，我不會急不可待地沖上前去，一把把它接過來。盡管我渴望立即把它拆開并當場展讀，但是我不想讓當局因看到我那急切的樣子而感到滿足，而是拿著信慢慢地回到牢房，似乎在展讀家書之前還有許多事要做一般。

在頭幾個月里，我收到了一封溫妮的來信，但是，信卻被當局作了審查和刪節，除了問候之外幾乎什么內容也看不清。島上的審查人員竟然用墨水把不允許讀的段落全部涂掉，但是，當他們發現我們能把涂在信上的墨水清洗掉從而看清墨水下面的內容時，他們又改變了刪節方式。他們用刀片把要刪節的內容裁下來，由于多數信反正兩面都寫了字，因此其反面上的內容也往往被剪掉。看來，他們巴不得把信弄成碎片。對信箋的審查和刪節往往延誤信的分發時間，因為有的獄警文化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審查、刪節一封信可能要用一個月的時間。我們發出的信也要經過審查和刪節，常常與收到的信一樣，被剪得亂七八糟。

8月末，我來到羅本島還不到三個月，當局告訴我，第二天將有人來探視，但卻不告訴我來探視的人是誰。瓦爾特也被告知有人要來探視。我猜想、我希望、我期待、我相信——探望者會是溫妮和阿爾博提娜。

自從溫妮得知我們被關進羅本島監獄的時刻開始，她一直都在設法來島上探視。作為一個身背禁止處罰的人，她必須經司法部特許才能來羅本島，因為從法律上說，她與我聯系是不被允許的。

即使得到了當局的批準，來羅本島探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探視時間最多不能超過30分鐘，政治犯則不允許與來探視的人有任何直接接觸，但探視人與囚犯卻在同一個房間里見面。

當局似乎從不提前安排探視。不定哪一天，他們與你的夫人取得聯系，并說：“明天你被允許探視你的丈夫。”這是非常不方便的，常常使探視無法進行，如果某一親屬提前計劃到獄中探視，當局有時會故意拖延時間，直到飛機起飛后才批準。由于多數囚犯的家都在離開普地區很遠的地方，并且沒有多少錢，所以常常無法到羅本島探視。有的人來自貧窮的家庭，可以說多年甚至根本就見不到自己的妻子。我認識一個人，他在羅本島上待了十幾年，一次也沒有人來探視過。

非直接接觸探視室很狹窄，而且沒有窗子。囚犯這邊是一個只有5平方米的房間，通過一個小方塊玻璃與另一邊具有相等面積的房間相望。一個人坐在椅子上，通過厚厚的、模糊不清的玻璃看著對方，并通過打在玻璃上的小孔與對方交流，因此，只有大聲說話才能使對方聽清。后來，當局在玻璃前安裝了麥克風和喇叭，效果稍有改善。

瓦爾特和我被叫到探視室，并在室內的一個角落坐下來。我心情有點不安地在那里等待著。忽然，窗子的另一端出現了溫妮那可愛的面孔。為了探監，溫妮總是把自己刻意打扮一番，設法穿得新一點、優雅一點。不能與我的夫人直接接觸，不能溫情地與她說說話，不能與她單獨在一起，這是一種極大的失望。在我們看不起的人的眼皮子底下，我們不得不在保持一定距離的條件下進行接觸。

我立即看出，溫妮精神壓力很大。看到我在這樣的處境下，她認為我一定是一直在受苦。僅僅來到這個島上本身就夠苦的了，另外還要忍受監獄中嚴厲的規矩、獄警們的侮辱和無人格可言的待遇。

我隨后了解到，溫妮近期又遭到了一次禁止處罰，并且由于被禁止而失去了在兒童福利辦公室的工作。在她被解雇之前，她的辦公室也遭到警察的搜查。當局一直認為，她正在秘密與我保持聯系。溫妮很喜歡她的工作，一天到晚忙于為孤嬰尋找養父養母、為沒有工作的人找工作、為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提供醫療幫助。我夫人的被禁止和煩惱使我感到極大的不安：我不能照顧她和孩子們，而政府正在為她自己照顧自己制造麻煩。我的無能為力使我感到十分苦惱。

我們的談話一開始就很尷尬，她身后有兩名獄警，我身后有三名獄警，這使得我們的談話難以開場。獄警的作用不僅僅是對我們進行監視，而且也是一種恐嚇。當局規定，談話必須用英語或南非荷蘭語，用非洲人的語言進行談話是被禁止的，談話的內容也僅限于家庭方面的事情。任何離開家庭的話題和與政治沾邊的字眼都將意味著探視的終止。如果談到獄警不熟悉的名字，他們會要求我們停止談話，并問該人與我們是什么關系。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因為獄警一般不熟悉非洲人姓名的多樣性和特點。有時不得不浪費幾分鐘寶貴的探視時間向獄警解釋族系的不同分支，令人感到無奈和討厭。但是，他們的無知也給我們帶來了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為我們想談的人起一個假名，謊稱我們談的人是我們家中的成員。

第一次探視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知道溫妮對我的健康感到不安：她聽說我的身體被摧垮了。我立即告訴她我的身體很好，她也能看出我的身體是健康的，只不過是比以前瘦了一點兒而已。她也瘦了，我認為這是由于精神緊張而造成的。當溫妮在探視中表現出發愁或緊張的樣子時，我會敦促她適當增加體重。她總是想減肥，而我則總是不讓她減肥。我逐個詢問了孩子們的情況，以及我母親、姊妹和溫妮家的情況。

忽然，我聽見身后的獄警說：“時間到了！時間到了！”我用懷疑的目光回頭看了他一眼，意思是不可能已經用完了半小時的探視時間。但是，事實上他是對的，探視總是感覺一眨眼就過去了。在我被監禁的歲月中，每當獄警喊叫“時間到了”的時候我總是為時間過得快而感到詫異。溫妮和我只好從椅子上站起來，并匆匆告別。溫妮走后，我總是感覺戀戀不舍，很想保持她在我身邊的那種感覺。當然，我不會讓獄警們看出這種情感。當我走回牢房的時候，我回味著我們所談的話。隨后的幾天、幾周甚至幾個月中，我會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探視時的情景。我知道，至少6個月內我不能再次見到我的夫人。事實上，溫妮在隨后的兩年中一直沒能再來監獄探視我。

64...

元月初的一個上午，當我們在院子里開始工作之前排著隊報數的時候，當局不是讓我們步行到外面去，而是吩咐我們上了一輛悶罐車。這是我們第一次離開我們的監禁區。沒有人告訴我們要到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我們將被帶到什么地方。幾分鐘后，我們來到了一個地方，當我1962年第一次來到這個島上的時候曾經見過的地方，它就是石灰石料場。

石灰石料場看上去就像是山腳下挖出來的一個巨大的白石坑。從懸崖到山腳下，到處是一片令人目眩的白色。石灰石料場的頂部長滿了青草和棕櫚樹，山腳下則是用舊金屬板搭成的幾間棚子。

監獄長韋塞爾斯上校接見了我們，他是一個相當缺乏個性的人，只關心嚴格堅持監獄里的規定。我們以立正姿勢站在那里，他告訴我們，我們要干的這個工作將持續6個月，然后，他將在我們服刑期間讓我們干一些比較輕的活兒。然而，他定的時間后來大大延長了，我們在這個石灰石料場一干就是13年。

監獄長講完話后，獄警們給我們發了鎬頭和鐵鍬，并告訴我們挖石灰石的基本知識。挖石灰石可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第一天，我們對使用新工具不怎么熟練，挖的石灰石很少。石灰石本身是貝殼和珊瑚的鈣化積淀物，比較松軟，被埋在巖石層中，必須用鎬頭挖開巖石層，然后再用鐵鍬把石灰石挖出來。這項工作遠比在院子里干的那個差事要費力得多，所以在石灰石料場干了幾天之后，我們下午4點30分吃過晚飯就立即躺下睡覺。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我們感覺渾身疼痛、疲勞不堪。

當局從來沒有說明為什么把我們從院子里轉到石灰石料場去。他們可能僅僅是需要更多的石灰石以修建島上的道路。不過，后來討論這次工作變動時，我們推測，這是另一種加強紀律性的方法，同時表明，我們與在島上石料場干活的普通囚犯沒什么差別，像他們一樣，我們也必須去贖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從精神上摧垮我們。

但是，在石灰石料場工作的頭幾周，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效果卻正好相反。盡管手上起了泡并流著血，但是，我們的精神卻十分飽滿。我更喜歡在外面的大自然中干活，因為在外面，能夠看到草和樹木，能夠觀察鳥兒在頭頂上飛來飛去，能夠感受從大海吹來的風。背朝著太陽渾身使勁令人感覺舒服，而堆起一堆堆石灰石也會令人產生某種成就感。

幾天以來，我們都是步行到石灰石料場，而不是乘卡車，這本身也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在20分鐘的步行過程中，我們更好地了解了羅本島，可以看見島上的灌木叢和高大的樹木、聞一聞桉樹的芳香，偶爾還能看到跳羚和捻角羚在遠處吃草。盡管有的人認為步行是一種苦差事，但我卻不這樣認為。

盡管在石灰石料場工作說明我們與其他囚犯沒有什么區別，但是，當局仍然像對待曾經在這個島上居住過的麻風病人一樣地對待我們。有時，我們可以看見一伙普通犯人在路邊干活，看管他們的獄警會吩咐他們躲進灌木叢。這樣，當我們從旁邊走過的時候，他們就不會看見我們，似乎僅僅看見我們就會影響他們的紀律。有時，通過眼睛的余光，我們能看見某個囚犯舉起拳頭向我們行非洲人國民大會禮。

那條泥土路在石灰石料場附近分開，向右是通往普通犯人干活的石料場。這個十字路口后來成為我們與普通囚犯溝通的重要地點。在岔路口處，我們可以在灌木叢中看見一幢白色小屋，羅伯特·索布克韋就住在那里。這座小房子是幾年前為一位黑人獄警建造的，現在只有索布克韋一個人住在那里。那是一小塊灌木叢生的土地，除了站在房子前面的一個獄警，誰也不會知道有別人住在那里。

索布克韋的刑期于1963年期滿，但是，按照1963年“普通法修正案”中被大家稱作“索布克韋條款”的規定，司法部部長不經控告就可以對政治犯進行無限期的關押。他們對鮑勃也是這樣處理的。6年來，索布克韋在島上一直過著這種半關押式的生活。他是一個失去了自由的自由人。有時，我們能在花園里看見他，但也僅僅是看一眼而已。

上午到達后，我們從石灰石料場上的鋅皮棚子里領到鎬頭、鐵鍬、錘子和獨輪車，然后，在石灰石料場前集合，通常是三四個人一組。持自動武器的獄警站在高高的瞭望臺上監視著我們。不帶武器的獄警則在我們中間走來走去，督促我們更賣力地干活。“Gaan aan! Gaan aan!”（快點干！快點干！）他們像趕牲口一樣喊著我們。

到11點，這時太陽高高地在空中照射著大地，我們開始感到筋疲力盡。此時，我已經是汗流浹背。獄警仍然催著我們更努力地干。“Nee， man! Kom aan! Kom aan!”（不，伙計！快點干！快點干！）他們不住地喊叫著。快到中午的時候，我們就停下來吃午飯。我們把石灰石裝在獨輪車上，然后運到卡車跟前，最后用卡車運走。

中午時分，哨聲響了，這時我們會走到山腳下，在為我們遮蔽太陽的鋅皮棚子下坐在極為簡陋的座位上準備吃午飯。獄警們則坐在有桌子和板凳的大鋅皮棚子里用餐。有人會把盛煮玉米的圓桶送到我們的旁邊。當我們吃飯的時候，數百只海鷗尖叫著不住地在我們頭頂上盤旋、俯沖，一次準確的俯沖有時會糟蹋掉一個人的午飯。

我們一直干到下午4點鐘，這時，我們就把挖出的石灰石運到在石灰石料場附近等候的卡車上。一天下來，我們的臉上和身上沾滿了白色的粉塵，要不是汗水已經把部分粉塵沖掉，我們看上去肯定就像一個個白色的小鬼。當回到牢房的時候，我們就在涼水中擦洗一下，身上的粉塵似乎怎么也不能完全洗干凈。

在石料場，比熱更厲害的是光線。我們的脊背有襯衣遮擋太陽，但太陽的光線卻通過石灰石折射到我們的眼睛上。炫目的光線和石灰石粉塵對眼睛的傷害使我們無法睜眼。我們的雙眼不停地流淚，必須老是瞇縫著才行。每天工作過后，我們要花很長時間才能使眼睛恢復到正常狀態。

在石灰石料場工作幾天后，我們正式向當局提出了戴太陽鏡的要求。當局拒絕了我們的要求，這是意料當中的事情，因為當局連閱讀眼鏡也不讓我們戴。我先前對監獄長說過，允許我們讀書但卻又不讓我們戴眼鏡讀書是沒有道理的。

后來，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戴太陽鏡，幾乎用了三年的時間才爭取到了戴太陽鏡的權利。當時，幸虧一位有同情心的醫生說，為了保護我們的視力，戴眼鏡是必要的，當局才最終同意我們戴太陽鏡。就是這樣，我們也必須自己花錢買太陽鏡。

對于我們來說，這種斗爭，其中包括爭取太陽鏡、爭取長褲子、爭取學習權利和爭取伙食平等的斗爭，是我們在監獄外長期進行斗爭的必然結果。為改善監獄中的生活條件而進行的斗爭，本身就是反對種族歧視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斗爭是完全一樣的。我們在哪里看到不公平，就在哪里進行斗爭，不管這種不公平是大是小，我們反對不公平，以保留我們自己的人性。

我們開始在石灰石料場工作不久，一伙B區的其他著名政治犯也加入了我們的勞動隊伍。有幾位是民族長矛軍成員，他們是在1964年7月被逮捕的。他們被指控犯有50多起破壞活動，這次審判被稱作“小利沃尼亞審判”。這些人包括：麥克·馬哈拉基，他是南非共產黨的成員，在斗爭中頭腦最為敏銳；拉魯·奇巴，他是民族長矛軍最高司令部的成員，并且是一位不屈不撓的同志，他的這一偉大優點在監獄里得到了證實。維爾頓·穆夸毅，他是叛國審判的涉案人員之一，在1960年政府宣布緊急狀態的混亂期間，他因為錯誤地在別人引導下繼續在大街上行走而被逮捕。他秘密離開過南非，接受了軍事訓練，在利沃尼亞審判之后，他成為民族長矛軍的司令員。艾迪·丹尼爾斯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他是自由黨的有色人，被指控參與了非洲抵抗運動組織并進行破壞活動，該組織是由自由黨黨員組成的一個破壞活動小組。在監獄里，艾迪成為我最偉大的朋友之一。

為了平衡這些新政治聯盟的影響，監獄當局也在我們這個監禁區摻雜了一小部分普通犯人。這些人是不知改悔的罪犯，被指控犯有殺人、強奸和暴力搶劫。他們是羅本島上臭名昭著的罪犯幫伙，不是“大五幫”（Big Fives）就是“二八幫”（Twenty-Eights），他們專門恐嚇別的囚犯。這些人體格健壯、粗暴無禮，臉上大多都有械斗時留下的傷疤。在這些幫派成員中，械斗是常有的事情。他們被派到我們監禁區的作用就是尋釁滋事，他們仗勢欺負我們，拿我們的食物，不讓我們開展政治討論。其中一人名叫博加特，用的就是美國硬漢電影演員的名字。他的牢房與瓦爾特的牢房對著門，瓦爾特曾經抱怨說，他每天早晨都索要食物，瓦爾特怕他，不敢不給他。

犯罪幫伙在石灰石料場內另外合伙干活，不與我們在一起。一天，他們開始唱起了一首像勞動號子的歌。實際上，那是一首著名的歌曲，但是，他們換上了自己編的詞：“Benifunani eRivonia？”意思是：“你們要在利沃尼亞干什么？”第二句歌詞似乎是：“你們認為你們將成為政府？”他們起勁地唱，歌聲中帶有嘲笑的意思。他們顯然是受到了獄警的鼓動，希望通過這首歌曲激怒我們。

盡管我們中有一些頭腦發熱的人想與他們翻臉，但是，我們還是決定用以牙還牙的方式與他們斗爭。我們當中有些比他們唱得好的歌手，我們湊在一起，琢磨著我們應該唱什么歌對付他們。幾分鐘之后，我們就唱起了《斯蒂邁勒》，這是一首贊揚從南羅得西亞向南奔馳的一輛列車的歌曲。《斯蒂邁勒》不是一首政治歌曲，但卻含有政治意味，因為它暗示游擊隊戰士乘著火車南下去打南非軍。

連續幾周，我們兩伙人一邊干活，一邊對唱，并不時增加曲調、變更歌詞。我們的節目增加了，并且公開唱起了政治歌曲，如游擊隊戰士之歌——《阿瑪卓尼》，歌名是一個廢棄了的英文俚語，意思是歌頌游擊隊戰士約翰尼；《措措拉茲》，這首歌曲把斗爭比喻成即將到來的列車（如果重復這個歌名，聽起來就像列車行駛的聲音）。我們還唱了一首有關《自由憲章》的歌，而另一首是關于特蘭斯凱的歌曲，其歌詞大意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馬嘆茲瑪之路，一條是曼德拉之路，試問您將走哪條路？”

歌唱使工作變得輕松了一些。有幾個人嗓子特別好，我感覺像是放下了鎬頭，僅僅是在那里聽他們歌唱。罪犯幫伙不是我們的對手，當我們繼續歌唱的時候，他們很快就變成了啞巴。但是，有一位獄警精通科薩語，懂得我們所唱的內容。他很快命令我們停止歌唱（也不準吹口哨），從那天起，我們又只好默默地工作。

我并不把罪犯幫伙看作敵人，而是把他們看作轉化的對象。我們中間有個綽號叫“Joe My Baby”（我的孩子喬）的非政治犯——后來他加入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幫助我們向監獄內外傳遞材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有一天，我們聽說博加特在石灰石料場遭到了一名獄警的毆打。我們沒有親眼看見，但是我們卻看到了結果。他的臉上有傷，而且傷勢很重。博加特在走廊里走到我的面前請求幫助，我立即接受了他的請求。

我們一直在尋找與當局對抗的方式，報告打人事件就是我們能夠與監獄當局交涉的一種方式。在博加特被打前不久，我們得知一位名叫“甘亞”的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會員也遭到了一位獄警的毆打。我以一名律師的身份致函監獄長，代表甘亞提出抗議。我被帶到監獄長辦公室，監獄官員們在那里接待了我。他們一致否認有打人事件發生，問我是怎么聽說的。我堅持要求把毆打甘亞的獄警趕出羅本島。他們拒絕了我的要求，說沒有證明他打人的證據。但是，隨后不久，那位打人的獄警還是被從島上調走了。

這件事使我受到了鼓舞，所以，當博加特請求幫助的時候，我立即要求見監獄長。第二天，我又被叫到監獄長辦公室，監獄長和藹地告訴我，他們已經對案件進行了調查，打人的人也被解雇了。“那是違反規定的，”我說，“這個案子應當進行審訊。”

“不，”他說，“我們已經調查過所謂的受害人，他否認曾經遭到過毆打。”

“那是不可能的，”我說，“我昨天才與他談過話。”

監獄長向一位中尉招了招手說：“你親自去了解一下。”中尉把博加特帶進辦公室，他的臉上還綁著繃帶。監獄長問他是否遭到過毆打。“沒有，老板，”他輕聲說，沒有理會我正在瞪著他，“我從來沒有遭到過毆打。”然后，他立即被帶走了。

“好了，曼德拉，”監獄長說，“這個案子了結了。”監獄長因羞辱了我而感到非常得意。他顯然為了讓博加特撤訴而用額外的食物和香煙賄賂了他。從此之后，在接受案子之前，我要求當事人一定要提交簽過字的書面委托書。

65...

1965年夏季的一天，我們發現早飯的粥上漂著閃光的肥肉，晚飯的半流質食物里也有大塊大塊的肉。第二天，有人還領到了新襯衣。石灰石料場的獄警們和我們監禁區的獄警們似乎對我們恭敬有加。對此，我們大家都有些懷疑，在監獄里，條件的改善不可能是無緣無故的。一天后，我們得知，國際紅十字會官員將于第二天到島上來。

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會，他們比以前的任何探視者都重要。國際紅十字會是一個負責任的、獨立的組織，是西方國家和聯合國關注的國際組織。監獄當局很尊重國際紅十字會，我在這里用“尊重”這個詞，其中當然也包含“害怕”的意思，因為當局只尊重他們害怕的人和組織。監獄當局對能夠影響世界輿論的一切組織都不信任，不把他們當做合法的、忠誠相待的調查者，而是把他們視為能欺騙則欺騙的愛管閑事的人。避免國際輿論的譴責是當局的主要目的。

在那些年月，國際紅十字會是唯一既能夠傾聽我們的抱怨意見又受我們愛戴的組織。這至關重要，因為當局不聽我們的抱怨意見。按規定，當局應當提供了解我們的抱怨意見的正規程序。他們也的確提供了讓我們反映意見的渠道，但不過是敷衍了事而已。每到禮拜六上午，獄警隊長就進入我們的監禁區吆喝：“Klagtes en Versoeke! Klagtes en Versoeke!”（快提意見和要求!快提意見和要求!）我們中許多人排著隊找獄警隊長，因為幾乎大家都有抱怨意見和要求。我們紛紛對伙食、囚服和探視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正式的意見。獄警隊長對每個人點點頭，只是說“Ja， ja”（是，是），然后就喊“下一個！”對我們所提的意見連記錄都不記錄。如果我們以我們組織的名義說話，獄警們會大聲說：“這里不允許有非洲人國民大會或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Verstaan？（懂不懂）”

在國際紅十字會官員來訪問前不久，我們向監獄長遞交了一份正式的意見書。當時，只允許我們用紙和鉛筆寫信。我們秘密在石灰石料場和廁所里相互征求意見，然后，綜合成一份意見書。我們把意見書遞交給我們的獄警隊長。他不接受我們的意見書，并指責我們寫這樣的意見書是違反規定的。我們向國際紅十字會提的意見之一就是監獄當局不聽取我們的抱怨意見。

在國際紅十字會組織來訪的那天，我們被叫到監獄長辦公室與國際紅十字會的代表見面。那年，甚至隨后的幾年中，國際紅十字會的代表一直是森恩先生，他在他的國家瑞典曾經是監獄管理局局長，后來移民到了羅得西亞。森恩有55歲左右，是一個沉默寡言卻又有點神經質的人，對周圍的環境似乎一點都不滿意。

會見是在沒有監視的情況下進行的，這與幾乎所有的其他人訪問和探視我們的情況有所不同。他要求聽取我們的所有抱怨意見，并且聽得很認真，還不住地記筆記。他十分客氣，對我所告訴他的一切表示感謝。盡管如此，他的第一次訪問還是使我們感到相當緊張。我們都不知道對方有什么目的。

我們對我們的服裝十分不滿，實話實說，我們不想穿短褲，希望有合適的衣服穿，其中包括短襪和內衣。當時，我們沒有這些東西。我對我們的伙食、探視、通信、學習、早操、工作條件和獄警的工作作風都提了意見。我也提了一些我知道當局將不會予以滿足的要求，例如，希望被轉到離我們的家較近的監獄。

會談后，森恩讓我們在那里等候，他又會見了監獄長及其他訪問團成員，我估計他把我們的意見告訴了監獄當局，并指出了他認為是合理的意見。森恩訪問后不久，我們的服裝確實得到了改善，當局給我們發了長褲子。但是，森恩無論如何算不上是一個進步人士；他在羅得西亞居住了幾年后，似乎對種族歧視已經司空見慣。在我返回我的牢房之前，我又提醒我所提的關于非洲人吃面包的抱怨意見。森恩先生看上去似乎心神不安，并掃了那位監獄長一眼。“面包對你們的牙齒很不好，你知道嗎，曼德拉？”森恩先生說，“玉米對你們更好些，可以使你的牙齒變得更結實。”

在后來的幾年中，國際紅十字會派了一些更開明的人士來訪問，他們全心全意地為改善我們的條件進行斗爭。國際紅十字會在不太顯眼但對我們卻十分重要的方面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們經常向我們的家屬提供資金，不然，他們就無力到島上來探視我們。

被送到羅本島之后，我們的支持者中有的擔心當局會不允許我們學習。但是，到島上幾個月以后，當局宣布，要學習的人可以提出申請。我們多數人都交了申請。盡管是D類囚犯，我們也得到了許可。利沃尼亞審判后，政府感到很有信心，認為準許我們學習沒有什么壞處。后來，他們為此而后悔不迭。讀研究生是不允許的，但是，他們對我卻網開一面，因為我在比勒陀利亞監獄時就已經開創了這個先例。

我們監禁區很少有人擁有學士學位，但多數都在學習大學課程。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高等學校畢業證書，他們選擇進修課程，以便爭取拿到高等學校畢業證書。有的人已經受過良好的教育，像戈萬·姆貝基和內維爾·亞歷山大，但是其他人還沒有通過五級或六級考試。在幾個月內，我們大家實際上都在學習這樣那樣的學位課程。每到夜晚，我們的牢房與其說是監獄，倒不如說是一個學習的大課堂。

但是，學習的權利受到了許多條件的限制。某些學科，如政治學或軍事史，是被禁止的。多年來，當局不準我們接收我們家庭以外的資助，所以，我們這些窮囚犯很少有錢買書和交學費。因此，學習機會的多少取決于我們手中攥著的錢數。監獄當局也不允許我們把書借給別的囚犯，如果允許借閱，就會使我們身邊較窮的獄友也能夠有學習的機會。對于我們應不應該接受學習的權利一事，大家經常爭吵。有的團結運動組織的成員起初認為，我們接受政府的免費學習材料會有損我們的政治形象。他們堅持認為，學習不應該是一種有條件的特許，而應當是一種不受限制的權利。盡管我接受這個觀點，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拒絕學習。作為一名自由戰士和政治犯，我們有責任提高和加強我們自己，而學習是提高和加強我們自己的為數不多的方式之一。

監獄當局允許囚犯報考南非大學或速成學院，這兩所學校都可以為學習者提供高等學校學歷證書。就我的情況而言，在倫敦大學的資助下學習是一種禍福兼而有之的事情。一方面，我可以得到在南非閱讀目錄上沒有的那種激勵人奮發向上的書籍；另一方面，監獄當局必然把它們視為不適合學習的書籍，因此而禁止我學習。

一般而言，獲得書籍也并非易事。你必須按照合同法，向某個南非圖書館提出申請。該圖書館將對你的申請進行審查，然后，通過郵局把書寄給你。但是，由于郵遞系統不正常，羅本島又比較遙遠，再加上信件檢查人員故意拖延時間，所以，當你拿到書的時候也就到了還書的日期。如果日期已過，獄警將會連看也不讓你看就把書直接退回圖書館。正是由于郵遞系統這種固有的特點，你很可能沒收到書卻收到過期罰款單。

除了書籍，我們還可以借閱學習所需要的雜志。當局對此特別嚴格，唯一能通過檢查的雜志可能是一種供囚犯學習會計用的保險計算科學類季刊。但是，有一天，麥克·馬哈拉基告訴一位同志，他正在學習經濟學，想申請借一份《經濟學人》。我們譏笑說，我們可能還需要一份《時代》周刊，因為《經濟學人》也是一個新聞周刊。但是，麥克僅僅一笑說，監獄當局不會知道這些情況，他們只是從標題上判斷書刊。不到一個月，我們就真的收到了《經濟學人》，通過這本雜志，我們獲得了我們渴望得到的新聞。但是，當局很快發覺了他們的疏忽，并停止讓我們繼續借閱。

一旦多數人都開始學習，我們就都抱怨連書桌、椅子這樣起碼的學習條件都沒有。我向國際紅十字會提出了這個意見。最后，監獄當局為每個牢房制作了一個可以站著學習的書桌，即一塊從墻上伸出的、齊胸高的木板。

這不是我們所渴望得到的那種學習條件。在石灰石料場勞作一天之后，誰也不想站著在這樣的書桌旁學習。我們中有許多人對這種書桌提出了抱怨意見，而凱西的意見最大，他告訴監獄長，站著學習的書桌不但是一種負擔，而且由于書桌的坡度太大，書老是往下掉。監獄長突然來到凱西的牢房里查看，他要了一本書并用力把它放在凱西的書桌上，書沒有動。他又向凱西要了一本書，把它放在第一本書的上面，書還是沒有動。他放了四本書之后，轉身對怯弱的凱西說：“伙計，這些書桌沒有問題。”然后，他走出了凱西的牢房。不過，六個月后當局發了慈悲，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個三條腿的凳子，書桌的高度也降低了一些。

我向國際紅十字會反映的另一個意見是獄警動不動就告我們的狀。告某個囚犯的狀就意味著獄警聲稱他違反了某項具體規定，不是被隔離關押就是不給飯吃，或喪失其他權利。獄警們一般不能隨意告囚犯的狀，因為，當一個囚犯被告了狀，根據違反規定的程度，可以舉行聽證會，并且邀請開普敦地方法官出席。當時，監獄當局拒絕舉行聽證會。當我把這個問題反映給國際紅十字會的時候，我自己也經歷過這樣的問題。但是，情況很快得到了改善。

在我來到島上的第一年里，周末除了半小時的早操時間，我們必須一直待在牢房里。有一個禮拜六，在院子里做完操回到牢房后，我發現一個獄警在走廊頭上的凳子上放了一份報紙。他對我們很友好，我猜測他并不是偶然把報紙丟在那里。

對政治犯來說，報紙比黃金或鉆石都更寶貴，比渴望得到食物和香煙還迫切，可以說是羅本島上最珍貴的違禁物品。新聞是斗爭的思維原材料，當局絕對不允許我們得到新聞。我們渴望得到新聞，沒有新聞，瓦爾特比我還要憂傷。監獄當局企圖實行新聞封鎖，他們不想讓我們知道任何可能鼓舞我們士氣或讓我們相信外面的人們仍然牽掛著我們的事情。

我們把堅持及時了解國家的政治作為我們的職責，并為得到看報的權利而長期不懈地進行斗爭。多少年來，我們想了許多弄到報紙的辦法，但是，當時我們的辦法并不那么高明。去石灰石料場的好處之一是獄警的三明治往往用報紙做包裝，他們常常用完后把這些報紙當垃圾扔掉。有時我們從垃圾中偷偷把它們撿回來。我們設法轉移獄警們的注意力，把撿回來的報紙藏在我們的襯衣底下。

設法弄到報紙的最可靠的辦法之一就是行賄。這是我們為獲取信息而經常采取的一種非道德手段，也是我能夠容忍的唯一手段。獄警們似乎總是缺錢，他們的“貧困”變成了我們的機會。

當我們真的弄到一份報紙的時候，由于風險太大，我們不敢在獄友中直接傳閱，因為囚犯擁有報紙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我們先讓一個人閱讀，通常是凱西，后來是麥克·馬哈拉基。凱西負責傳遞消息，他為此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凱西先通讀報紙，并把重大消息做成剪報，然后把剪報悄悄在我們中間進行傳閱。我們每人再根據剪報寫出摘要，然后再把摘要傳遞給大家。最后，我們再把摘要傳遞給普通犯人監禁區。當監獄當局特別警惕的時候，凱西或麥克就把報紙寫成摘要，然后把報紙銷毀。通常的方法是把它撕成碎片，然后扔進馬桶里，因為獄警從來不檢查馬桶。

當我發現走廊頭上的板凳上有報紙，我就迅速從牢房里出來，到走廊頭上向兩側望一下，然后從板凳上拿起報紙并迅速地把它塞進我的襯衣底下。通常，我把報紙藏在我的牢房里的某個地方，直到睡覺時才拿出來看。但是，我就像一個在吃正餐前先吃布丁的孩子，恨不得立即從我的牢房里拿出報紙，了解上面的新聞。

我不知道閱讀了多長時間，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那份報紙上，以至于沒聽見腳步聲。忽然，一名獄警長官帶著兩名獄警出現在我的面前，我連把報紙藏在鋪蓋下面的時間都沒有。可以說，我是當場被抓的。“曼德拉，”那位長官說，“我們告你擁有違禁物品，你要對此負責。”然后，兩位獄警對我的牢房進行了徹底搜查，看是否還有別的違禁物品。

一兩天內，一位地方法官被從開普敦請到了羅本島，我被帶到了監獄指揮部的一個房間里，這個房間將被臨時用作島上的法庭。在這種情況下，監獄當局總是喜歡從島外請地方法官，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案子是一個一目了然的案子。我不要求辯護，然后被判處三天的隔離關押，并且不給飯吃。

我并不認為我是中了那個往凳子上放報紙的獄警的圈套，盡管有的人這樣猜測。在聽證會上，監獄當局嚴加盤問我是如何拿到那份報紙的，我拒絕予以回答。如果我是中了圈套的話，監獄當局自然就會知道我是如何得到那份報紙的。

隔離牢房也屬于我們那個監禁區，不過是在另一側。盡管只是隔了一個院子，但是它卻令人感覺十分遙遠。在隔離關押期間，沒有人做伴，不準做操，甚至連飯都不讓吃：三天中一日三餐只有米湯（米湯僅僅是煮過米的水）。相比之下，我們的正常伙食——玉米片粥，就算得上盛宴了。

被隔離關押的第一天似乎是最痛苦的。因為習慣了正常飲食，對挨餓很不習慣。到了第二天，我發現自己多多少少對餓肚子有些適應，第三天根本沒有感覺怎么餓就過去了。在日常生活中，這種對基本權利的剝奪對非洲人來說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本人前些年在民族長矛軍就曾經連續幾天沒有飯吃。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我發現被隔離關押是監獄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沒有結束，也沒有開始，只有自己那顆寂寞的心。我的心開始胡思亂想：這只是一個夢，還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情？這顆心開始對任何事情都產生懷疑：我的決定是否正確？我的犧牲是否值得？在隔離關押期間，除了老是考慮這些事情之外，再無心思考慮別的事情。

但是，人的身體在適應環境方面具有很大的潛力。我發現，如果一個人的精神十分頑強，就是在身體經受考驗的時候，他也能承受不能承受的極限。堅定的信仰是經受住挨餓的秘訣，即使是腹中無食，精神也仍然是飽滿的。

在早期的歲月中，隔離關押變成了監獄當局的一種習慣性手段。我們常因小事受到指責，然后被罰以隔離關押。一個人可能因為斜視某個人而被剝奪了吃飯的權利，或者因為某個獄警走進牢房時沒有站起來而被隔離關押。有些來自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囚犯經常嘲笑這些規定，為此，他們的許多時間不得不在隔離關押中度過。當局認為，隔離關押是對我們反抗和叛逆的最好的救治辦法。

我第一次被隔離關押后不久，接著就又受到指控并第二次遭到了隔離關押。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那樣，我們為了讓當局知道我們的抱怨意見而遇到了許多困難。監獄天高皇帝遠，當局認為可以無所顧忌地對我們置之不理。他們認為，如果他們對我們的意見充耳不聞，我們就會在受到挫折后屈服，島外的人也會把我們忘掉。

有一天，我們正在石灰石料場干活，這時，監獄長來到了石料場進行視察，陪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我們不認識的人。我的一個同事低聲對我說，他是監獄管理局的奧卡木博準將（他與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的那位曾在利沃尼亞審判中給予我們照顧的奧卡木博上校并非同一人），是我們監獄長的上司。當時，兩個人站在遠處注視著我們。

奧卡木博身材不高、體格健壯，他身穿一身西服，而沒有著警裝。通常情況下，他兩年來島上視察一次。他來島上視察時，我們被吩咐立正站好，舉著自己的監號牌站在鐵柵門后面接受他的檢閱。

我斷定，奧卡木博的突然出現正是我們反映意見的好機會，因為只有他有能力解決我們所反映的問題。我放下手中的鎬頭，朝他們走去。獄警立即警覺起來，沖著我就走過來。我知道我是在違反規定，但是，我希望獄警們對我的行動感到吃驚而手足無措，因此就不會阻攔我。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當我走到兩位官員面前的時候，我們那位監獄長生硬地說：“曼德拉，回到你干活的位置上去，沒有人叫你。”我沒有理會他，而是直接對奧卡木博說話。我之所以采取這樣的特別行動，是因為監獄不理睬我們所提的意見。監獄長打斷我的話說：“曼德拉，我命令你立即回到你的工作崗位上去。”我回頭從容不迫地對他說：“我已經來到這里，我不想回去。”我希望奧卡木博能聽我把話說完。但是，他冷冷地看了看我，然后回頭對獄警說：“讓他老實點。”

當獄警把我帶走的時候，我繼續據理力爭。“把他弄回牢房！”監獄長喊著。我又一次被起訴到法庭，不準辯護。這次對我的懲罰是隔離關押四天。雖然我在這方面已經有過教訓，而且我也知道這條教訓，但是，卻由于走投無路而沒有記住。尤其是在監獄里，沒有人樂意聽任自己的權威公開地遭到挑戰。要接受我的要求，奧卡木博就不得不使他的下級難堪。監獄官員更喜歡私下提意見，要改變羅本島的現狀，最好的辦法就是設法私下對監獄官員產生影響，而不是公開對他們施加這種影響。我有時因為對監獄官員太客氣而遭到批評，但是，我愿以承受批評去換取我們生活條件的改善。

66...

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長、監獄管理局局長，甚至也不是監獄長，而是負責其監禁區的獄警。如果你因為睡覺時感到寒冷而額外需要一條毯子，你也許可以向司法部部長提出要求，但是，你卻不會得到任何回音。如果你向監獄管理局局長和監獄長提出這樣的要求，監獄管理局局長就會說：“對不起，這不符合規定。”監獄長則會說：“如果我額外給你一條毯子，那么我就必須給每個囚犯發一條。”但是，如果你走到走廊內的那位獄警面前，你又與他關系比較好，他可能會什么話也不說，而立即到倉庫里給你拿一條毯子。

我總是設法與我們監禁區的獄警和平相處，與他們對抗無異于自討苦吃。作為犯人，老是與獄警為敵是沒有道理的。設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們的敵人，這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個方針。我們認為，所有的人甚至監獄里的獄警，都可以被改變，所以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設法讓他們改變對我們的看法。

我們一般都能做到與獄警平等相待。如果一個獄警體諒我們，我們也會反過來對他溫和一些。其實，并不是所有的獄警都是魔鬼。我從一開始就注意到，獄警中也有一些人主持公道。與獄警交朋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為他們一般都認為對一個黑人謙恭是沒有必要的。由于與獄警搞好關系是有益的，我經常讓某個人有選擇地與某個獄警搞好關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這樣做。

在石灰石料場，有一個獄警似乎對我們很不友好。這很麻煩，因為我們要在石灰石料場討論問題，如果獄警不允許我們說話，那就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我要求一個同志與這位獄警搞好關系，以便使他不阻攔我們的談話。這位獄警十分粗野，但是，他很快開始對那位囚犯有些收斂。有一天，這位獄警要那位囚犯的夾克，他要把夾克鋪在草地上坐一下。盡管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志不情愿，但是，我向他點頭示意，還是讓他把夾克給了獄警。

幾天后，我們正在鋅皮棚子底下吃午飯，這位獄警走了過來。他有一個多余的三明治，他把三明治放在我們附近的草地上說：“給。”顯然，這是他表示友好的一種方式。

這讓我們進退兩難。一方面，他拿我們不當人看待，如果拿了那個三明治，我認為將有損我們的人格。另一方面，我們在忍受饑餓，并且，拒絕他的表示對我們設法與其搞好關系的這位獄警就是一種羞辱。我能看得出，我們那位同志也很想要那個三明治。于是，我點頭示意，讓他把三明治收下。

這個策略起了作用，因為這位獄警不再對我們保持警惕，甚至開始問我們有關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情。通常，如果一個人在監獄里工作，他可能早已經被政府的宣傳清洗了大腦。他很可能認為我們是要把白人扔進大海里的恐怖主義分子和共產黨人。但是，由于我們平和地向他解釋過我們的非種族主義思想、希望得到的權利和重新分配財富的計劃，他撓了撓頭說：“這他媽的似乎比民族主義更有道理。”

取得獄警們的同情則解決了我們在羅本島上的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即傳遞信息。我們認為與F區和G區的同志們保持聯系是我們的義務，F區和G區都是關押普通犯人的地方。我們抱定決心，在監獄內也要像在監獄外一樣，繼續加強我們的組織建設。如果，我們要想在提抗議和抱怨意見方面協調一致，那么，傳遞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大量的囚犯都屬于普通監禁區，F區和G區的人不但對外面的運動情況有更新的消息，而且對我們的朋友和家人所發生的新情況也比我們知道得多。

監禁區之間的相互聯系是嚴重違反規定的。我們發現，有許多能繞開這種禁令的有效方法。給我們送飯的人都是來自普通監禁區的囚犯，頭幾個月，我們設法向他們悄悄地了解情況，在了解情況的同時，我們也讓他們幫助傳遞消息。我們組建了一個秘密信息傳遞委員會，由凱西、麥克·馬哈拉基、拉魯·奇巴和其他幾位同志組成，他們的任務就是組織這類傳遞信息的活動。

第一個方法是由凱西和麥克策劃的。他們注意到，在我們去石灰石料場的路上，獄警經常亂扔空火柴盒。于是，他們就秘密收集空火柴盒。麥克設法對這些空火柴盒的底部進行偽裝，并把寫好的紙條藏在火柴盒的底部。拉魯·奇巴曾經學過裁剪，因而會寫一種蠅頭小字的編碼信息，他就把信息用這種小字寫在改造過的火柴盒上。喬·基卡比也是一名民族長矛軍戰士，他當時與我們在一起。他負責在去石灰石料場的路上把這些火柴盒放在普通囚犯將要路過的那個十字路口上。通過給我們送飯的普通囚犯，我們就可以把信息傳遞給F區和G區的囚犯。F區和G區的人會指定人員在路上把火柴盒撿起來，信息就這樣傳遞過去。我們獲取信息也采取同樣的辦法，這種辦法遠遠談不上十分完善，有時下一場雨就可能使我們這種傳遞信息的辦法泡了湯。因此，我們緊接著又研究出了更有效的辦法。

我們發現，獄警有時候會放松警惕。一種機會是吃中午飯的時候和剛剛吃完飯之后。我們都是自己盛飯，于是我們想出了一個主意，讓在伙房里工作的普通囚犯用塑料把信或紙條包好后放在盛飯的圓桶底下。我們回復消息也采用同樣的辦法，用同一塊塑料把紙條包起來，并把它藏在準備送回伙房洗刷的盤子底下。我們努力制造混亂，故意用剩飯把盤子搞得一塌糊涂。獄警甚至對此頗為不滿，但是，他們從來就不會自找麻煩去查個究竟。

我們的衛生間與隔離關押區相鄰，普通犯人被判隔離后常常被關押在那里。我們與他們使用同一個衛生間，但是，我們使用的時間與他們使用的時間不同。麥克想辦法把紙條包在塑料布里，然后把它藏在便盆的內沿下面。我們鼓勵被關押在普通犯人區的同志故意違反規定，以便順理成章地受到隔離關押。這樣，他們就可以把紙條拿走，并反饋信息。獄警絕不會自找麻煩去搜查便盆。

為了萬一我們寫的紙條被當局發現也不讓他們看懂所寫的內容，我們還研究出了各種不容易被破譯的書寫方式。一種辦法是用牛奶書寫。牛奶干得極快，并且干后看上去沒有字跡。但是，如果把當局發給我們清理牢房用的消毒液涂在用牛奶書寫過的紙上，字跡就會立即顯現出來。不幸的是，我們并不是每天都有牛奶。如果我們當中有人被診斷為胃潰瘍，他就可以得到牛奶，我們就用他的牛奶書寫。

另一種辦法是在衛生紙上寫小字。衛生紙很小且容易藏匿，所以這種辦法成為我們傳遞信息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當監獄當局不止一次地發現這些用來傳遞信息的衛生紙的時候，他們便采取了特別的發放措施。戈萬當時有病，不能到石灰石料場去干活，他被指派負責每天為每個囚犯分8張衛生紙。

在所有這些巧妙的辦法中，效果最好也是最容易的辦法是在監獄醫院里傳遞信息。島上有一座醫院，當我們在那里住院的時候，醫院就無法把我們同普通囚犯分開。有時，甚至來自不同監禁區的囚犯也由同一伙獄警看管，F區和G區的囚犯混雜在一起，相互交流有關政治組織、罷工、怠工以及所有監獄中存在的問題等信息。

與監獄外的聯系一般通過兩種方式進行：通過刑滿離島人員和與探視者接觸。出獄的人可以把信藏在他們的衣物里或行李中。通過來探視的人傳遞信息危險性較大，因為探視者本身就擔負著風險。當律師訪問我們的時候，不允許獄警在房間里，所以我們有時把信交給律師，讓他們帶出去，因為律師不會遭到搜查。在這些會見中，我們有時也采取我們在利沃尼亞審判期間采取的書寫方式傳遞信息。由于房間安裝了竊聽器，我們會說：“請告訴……”然后停下來把下面的話寫在紙上：“O. T.”——意思是奧利佛·塔博，“我們同意他關于削減……規模的計劃”。然后再在紙上寫出“全國執行委員會”。

通過藏在盛飯的圓桶里的一個用塑料布包裹著的紙條，我們得知，普通監禁區的囚犯將于1966年7月開始絕食，以抗議監獄里的惡劣條件。紙條寫得不太清楚，我們不知道舉行這次絕食的準確日子或明確目的。但是，對于囚犯以任何理由舉行的任何抗議形式，我們都將給予支持。我們大家相互傳遞信息，決心在下一次開飯時就開始絕食，以表示我們對他們的支持。絕食當然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吃飯。

由于信息傳遞不及時，普通監禁區的犯人可能一兩天之后才知道我們參與了他們舉行的絕食行動。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消息會使他們受到鼓舞。當局當然會告訴他們，我們并沒有參加他們的絕食，而是在那邊美餐。其實，這是當局慣用的伎倆。在一場危機中，當局必然會發動假情報攻勢，挑動一個監禁區去反對另一個監禁區。在這種情況下，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往往一致地支持抗議行動，而某些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人有時卻反其道而行之。

在我們進行絕食的第一天，我們都拒絕打飯。第二天，我們發現我們的伙食加大了分量，并且，玉米片粥里面加了更多的蔬菜。第三天，晚飯還增添了肉。第四天，玉米片粥里面不但有肥肉，還有大塊大塊的瘦肉，并且上面還有新鮮的燉蔬菜。飯菜著實讓人垂涎欲滴。當我們拒絕這些食物的時候，獄警們在一旁竊喜不已。誘惑力是巨大的，但是，我們還是頂住了這種誘惑，哪怕把我們驅趕到特別累人的石灰石料場，我們也拒絕進食。我聽說，主要監管區的人都被餓垮了，只能用獨輪車把他們運離工地。

我被叫到監獄長辦公室，與韋塞爾斯上校進行了交談。這種交談很微妙，正如我的獄友們都知道的那樣，監獄當局想對我施加影響，讓我取消絕食計劃。韋塞爾斯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他問我為什么要舉行絕食行動。我告訴他，作為政治犯，我們把要求改善監獄里的生活條件作為反對種族隔離斗爭的延伸。他說：“但是，你甚至并不知道F區和G區正在為什么舉行絕食。”我說：“沒關系，F區和G區的人都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斗爭是不可分離的。”他哼了一聲，然后就讓我回了牢房。

第二天，我們得知絕食還有另一個特別的原因：獄警們也在為他們的伙食而進行聯合抵制，并拒絕去他們的自助餐廳就餐。他們并不是為支持我們而進行絕食，而是認為如果我們能絕食，他們為什么不能？他們要求改善伙食，提高生活條件。兩種人聯合起來絕食使監獄當局難于應對。后來，他們與獄警實現了和解，一兩天后，我們聽說監獄當局去了普通監禁區，請普通犯人派三名代表與他們談判。普通犯人宣布取得了勝利，取消了絕食。一天之后，我們也停止了絕食。

那次絕食是島上發生的第一次絕食，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絕食。作為抗議的一種形式，絕食并沒有多大的成功率，但是，其背后的基本道理總讓我產生幻想。為了使絕食斗爭取得成功，必須讓監獄外面的人知道我們正在進行絕食，不然的話，囚犯只是被餓死而已，并沒有人會知道。我們正在進行絕食的消息悄悄傳到監獄外面，將通過報紙廣泛傳播，因此，支持我們的團體就會對當局施加壓力。但是，尤其在早期的年代里，讓監獄外面的人知道我們正在監獄內舉行絕食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認為，絕食完全是一種消極行為。因為，我們已經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這些痛苦正在威脅著我們的身體健康，甚至正在危及我們的生命。我一直贊成開展更積極、更具戰斗性的抗議活動，例如罷工、怠工或拒絕打掃衛生。開展這樣的斗爭，受傷害的是監獄當局，而不是我們自己。他們需要鋪石子，我們就拒絕為他們砸石子；他們需要打掃院子，我們就拒絕為他們打掃院子。這類行為無疑會使他們感到惱怒和不安。我認為，他們看著我們絕食肯定會偷偷地高興。因此，每當我們為開展絕食進行表決時，我總是投反對票。

但是，一旦要表決，我常常被推舉為決策者。有時，我的同事甚至譏諷說我不想因此而丟掉一頓飯。主張絕食的人認為，絕食是一種傳統上可以被接受的抗議形式。世界上著名的人物，如圣雄甘地，都曾經開展過絕食斗爭。不過，一旦決定開展絕食斗爭，我會全心全意地像那些發起者一樣予以堅決支持。事實上，在絕食期間，我常常規勸那些不想遵守絕食決議的獄友支持開展絕食斗爭。“馬迪巴，我要吃飯，”我記得一位獄友這樣說，“我不明白我們為什么絕食。我參加斗爭已經很多年了。”

獄友們有時會偷偷摸摸地吃東西。我們通過一個簡單的道理就可以知道：絕食斗爭到了第二天時，就應該沒有人再去廁所。但是，第二天早晨，你會看到有人去衛生間。我們內部有自己的情報系統，我們知道有的人經受不住饑餓的折磨。

67...

1966年7月中旬進行絕食斗爭期間，我夫人第二次來監獄探視。這次探視與第一次探視正好相隔兩年，并且差一點兒就不能成行。自1964年第一次探視之后，溫妮一直受著折磨。她的姊妹們和兄弟們都遭到了警察的迫害，當局企圖禁止她家中的任何人與她在一起生活。有些情況我及時得到了消息，而多數情況我是后來才知道的。最壞不過的事情是當我從石灰石料場回來的時候得知這些消息，我常常發現關于溫妮的消息被從報紙上剪下來整整齊齊地疊在一起，不知是哪位獄警把這些消息放在了我的床上。

當局竭盡其卑鄙之能事，使溫妮來島上的行程盡可能地令她感到不快。兩年來，地方法官一直從中作梗，一次又一次地對她下達禁止令，不準她外出。我從律師那里聽說，警察告訴溫妮，她只有帶通行證才能到羅本島來探視我。溫妮恰恰拒絕攜帶讓她討厭的通行證，因為她從1950年起就一直抗議政府對女人實行通行證的政策。當局顯然是蓄意侮辱她。但是，她認為我們彼此見面比抵制當局的卑鄙陰謀更重要，因此，溫妮只好同意攜帶通行證。我十分想念她，只有見到她我才放心，并且我們還有家庭方面的問題需要商量。

溫妮每次來島上探視的手續特別冗長而繁瑣。不準她乘坐火車或汽車，只能乘飛機，使一趟探視的花費頗為昂貴。當局要求她必須從機場取道最近的路線奔赴凱里頓廣場，開普敦警察局位于凱里頓廣場附近，她必須在開普敦警察局辦理各種文件。回去的路上，她還必須向開普敦警察局報告，并辦理更多的手續。

通過剪報我還得知，有一次溫妮正在穿衣的時候，有一位特警闖入了奧蘭多西我的家中，溫妮憤怒地作出反應，把特警推出了臥室。那位特警控告她襲警，于是我請我的朋友喬治·畢佐斯為她辯護。他巧妙地進行了周旋。我在報上看到了這個消息，有人甚至為溫妮的好戰與我開玩笑。他們說：“馬迪巴，在家中你并不是唯一的拳擊手。”

第二次探視只有半小時，我們要商量的事情很多。溫妮由于在開普敦遭到了無禮刁難而有點激動。事實上，警察只準她坐在擺渡的船艙里，船艙內的汽油味把她熏病了。她為了我而忍痛裝成沒事的樣子，但是她看上去又瘦弱又憔悴。

我們商量了孩子的教育問題、我母親的健康問題和我們的經濟狀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澤尼和津澤的教育問題。溫妮把兩個女兒送進了一所專門為印度人辦的學校，當局以學校招收“非洲學生”違反法律為借口設置障礙。我們只好作出困難的決定，把澤尼和津澤送到了斯威士蘭的寄宿學校。這對溫妮是一個打擊，她把兩個孩子看作是最大的安慰。我為她們在那里可能會受到更好的教育而感到欣慰，但是，我也為溫妮而感到不安。她將寂寞地孤身一個人生活，并且，我擔心有人會假裝成她的朋友算計她。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溫妮會由于太輕信別人而容易上當。

為了繞開不準談論自己家庭之外的事情的限制，我們使用了一些我們兩人都清楚而獄警不明白的名字。如果我要知道溫妮的真實情況，我會說：“你最近聽說過恩古提亞納嗎？她過得怎樣？”恩古提亞納是溫妮的一個氏族名，當局并不知道。然后，溫妮就會告訴我，恩古提亞納正在如何如何。如果獄警問恩古提亞納是誰，我們會說她是一個表妹。如果我想了解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情況，我會問：“教堂怎么樣？”溫妮將以適當的語言告訴有關“教堂”的情況，然后我可能又問：“牧師們怎么樣？有沒有布道演說？”就這樣，我們即興地設法交流了大量的信息。

正如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當獄警喊“時間到了”的時候，我總是覺得好像僅僅過了幾分鐘。我想隔著玻璃與她吻別，但是，最后還是控制住了自己。我總是等溫妮先離去，這樣，她就不會看到我被帶走時的情景。我眼巴巴地看著她低聲說再見，并盡量不讓獄警看出她的傷痛。

溫妮離開之后，我又重新回憶了探視時的一切詳細情況：溫妮穿的是什么衣服，她說了些什么話，我又說了些什么話。然后，我會把我們商量過的某些事情寫信再次告訴她，并提醒她我是何等地關心她，我們的感情是如何不可動搖，她又是如何勇敢。我把我的信既當做情書，又當做對她唯一的情感支持。當時，這種支持正是她所需要的。

溫妮探視后不久，我聽說溫妮因為到開普敦時沒有到警察局報告，并拒絕回去時為警察局提供自己的地址而遭到了指控。她在渡口上已經提供了自己的地址，而回去的時候，警察卻又要她提供。她拒絕再次提供自己的地址，說在這之前已經提供過了。

溫妮遭到了逮捕，她受到審判并被判處一年監禁，但隨之被保釋出獄。一年的監禁只執行了四天，其余的時間都被保釋監外執行。溫妮因被判刑而最終丟掉了作為一名社會工作者的第二份工作，因此也就失去了她的主要生活收入。

政府千方百計地為我制造麻煩，因為認為我已經無力進行反抗。1966年年底，德蘭士瓦法律協會在司法部部長的教唆下，作為利沃尼亞審判的一個結果而提議取消我的律師資格。顯然，他們并沒有因上次的失敗而死心。早些時候，他們就曾借口我在反抗運動中被指控而企圖取消我的律師資格。

我發現法律協會在我被指控后立即采取了行動，德蘭士瓦律師協會是一個特別保守的組織，該組織尋求在他們認為我不能自我辯護的時候來懲處我。對于一個羅本島上的囚犯，到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卻恰恰準備這么去做。

我告訴監獄當局，我計劃對德蘭士瓦的做法提出抗議，并準備親自出庭辯護。我告訴監獄里的官員，為了做好充分準備，我希望當局允許我不去石灰石料場工作，并且我還需要好用一點的桌子、椅子和臺燈。我說，我需要去比勒陀利亞，到那里的法律圖書館去查資料。

我的策略就是用合法的要求打敗監獄當局和法庭，當然我也知道，他們不會滿足我的要求。當我要求去法院為自己辯護的時候，當局總是感到煩惱不已，因為伴隨而來的公開露面，可以表明我仍然在為我一貫堅持的價值原則而戰斗。

他們的第一反應是：“曼德拉，你為什么不委托律師為你辯護？律師會正確處理你的案子，你為什么自己親自出庭？”我繼續堅持自己的要求，并向最高法庭注冊主任申請得到我所需要的資料、文件和書籍。我還請求，我必須得到一個政府方面的證人名單和他們將要作的證言。

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說，法庭在同意我的請求前，他們必須要知道我的辯護性質。這是不正常的。在審判前詢問律師的辯護性質？沒有一個辯護人在真正走上法庭前可以被迫說出自己的辯護性質。我給他回信說，我的辯護性質到我提交辯護資料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不到那個時候，我不能告訴你。

這是我與注冊主任及政府檢察官之間的分歧的開始，當時，注冊主任就代表著法律協會。我沒有放棄我的請求，但當局也同樣不妥協：我沒有被允許脫離石灰石料場的工作，我沒有得到桌子和椅子，我更不可能去比勒陀利亞法律圖書館。

我繼續與法律協會和注冊主任交涉，他們對此繼續予以拒絕。我交涉了幾個月，寫了許多封信，最后他們沒有大張旗鼓，僅僅草率地給我發了個通知，等于是完全放棄了這件事。這個案子并非像他們預料的那么簡單。他們原來認為，我并沒有主動權和必要的資金為自己辯護，但是，他們想錯了。

我能夠詳細了解官方有關我反對法律協會的做法的態度，因為我們每天都能收到一份報紙，報紙就像直接發到我們的門口那么方便。事實上，也確實就是這么方便。

負責夜間看管我們的那個獄警是一位沉默寡言、上了年紀的衛理公會教徒。當時，麥克·馬哈拉基與他已經成了好朋友。一天夜間，他慢慢地走到麥克的牢房，并告訴麥克，他想參加一次新聞寫作比賽，需要寫一篇作文，他想知道麥克愿不愿意幫他寫篇文章。這位獄警表示，如果麥克幫他這個忙，他會有所報答。麥克同意了，并按時寫出了文章。兩周之后，那位老獄警非常高興地來到麥克面前。他現在成了參加決賽的選手，問麥克能不能再給他寫一篇文章。這位獄警還答應麥克，如果幫他寫，他會送給他一只烤雞。麥克告訴那位老獄警，他將考慮考慮再作答復。

第二天，麥克來找瓦爾特和我，把情況向我們作了說明。瓦爾特建議麥克接受他的獎品，而我則贊成他不接受那只烤雞，因為那樣看起來就像是麥克受到了特別關照。那天夜里，麥克告訴那位獄警，他將給他寫那篇文章，條件是想得到一包香煙。那位老獄警表示同意，并且第二天晚上他就送給了麥克一包新買的香煙。

第二天，麥克告訴我們，他現在已經有辦法控制那位老獄警了。“怎么控制？”我們問。“因為煙盒上有他的手印，”麥克說，“我可以敲詐他。”瓦爾特說，那是不道德的。我沒有批評麥克，但是，我問他準備向老獄警索要什么。麥克瞪大眼睛說：“報紙。”瓦爾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我認為，瓦爾特是島上唯一與我一樣喜歡看報紙的人。麥克已經與秘密信息傳遞委員會交流了他的想法，盡管我們兩人對麥克的這個辦法都有保留意見，但是，我們并沒有制止他。

那天夜間，麥克告訴那位老獄警，他在煙盒上留下了指紋，如果不合作，他就會告訴監獄長。由于害怕被解雇，或許還會丟掉養老金，那個獄警同意麥克要什么就向他提供什么。在接下來的六個月中，直到他被調走，老獄警一直悄悄地為麥克提供當天的報紙。麥克每天把報紙上的新聞進行綜合整理，并把它們裁成紙條，再在我們中間傳閱。不幸的是，那位老獄警后來并沒有在比賽中勝出。

要說我們在石灰石料場做得更多的是什么，是開采石灰石還是說話？這很難說。到1966年，獄警采取了自由放任態度：只要我們干活，我們能說多少話就說多少話。我們分成一個一個的小組，四五個人圍成一個小圈子，在太陽底下說一整天話，所談的內容涉及各種各樣的話題。我們連續不斷地討論著，既談論嚴肅的重大問題，也談論日常的閑話瑣事。

關于坐牢，自然沒什么好處可言，可能只有一件事是個例外，那就是有時間思考。在斗爭的旋渦中，當一個人不斷地應付變換著的情況時，那么，他就很少有機會認真、全面地考慮自己所作的決定或策略。而監獄卻提供了時間，而且是非常充足的時間，通過這些時間可以對自己所做過的和沒有做過的事情進行反思。

我們經常進行政治辯論，有的問題需要辯論一天，有的則需要辯論幾年。我總是喜歡激烈的辯論，并且一直是激烈辯論的參與者。我們所進行的最早、最長的辯論之一就是關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共產黨之間的關系問題。有的人，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參加過訓練的民族長矛軍戰士，認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共產黨是一回事兒。甚至像姆貝基和哈里·格瓦拉這樣的資歷很深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也贊成這個看法。

在羅本島上，并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而存在的所謂黨派。在監獄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各黨派之間不像在監獄外那樣存在實質上的差別。我自己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群眾性的解放運動組織，它歡迎斗爭目標相同的所有黨派共同前進。

隨著時間的推移，關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各黨派關系的辯論越來越激烈。我們有一位同志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給流亡盧薩卡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寫信。我們起草了一份長達22頁的秘密文件，專門論述這個問題，并附上我個人的親筆信，一起發往盧薩卡。起草并私自向國外發出這樣的文件是有風險的。最終，流亡盧薩卡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確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各黨派是有區別的。隨之，這場辯論也就被畫上了句號。

另一個反復爭議的政治問題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是否應該全部從工人階級中產生。有人堅持認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主要由普通工人組成的群眾組織，因此，領導人也應當在這個階級中產生。我認為，要求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必須從工人階級中產生與要求他們都應該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都是不民主的。如果這個運動組織堅持這樣的準則，那么，其中的多數領導人，例如魯圖利酋長、摩西·考塔尼、達布醫生，都將被認為是沒有資格的。因此，革命者應當來自各個階級。

當然，并非所有的辯論都是政治性的。引起爭議最多的一個問題是行割禮問題。我們中有人認為，割禮作為科薩及其他民族的一種風俗，不僅對身體是一種不必要的傷害，而且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準備廢除的部落制度來說也是一種倒退。這種論點并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多數人還是認為割禮是一種民族文化儀式，它不僅具有有益健康的長處，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精神意義。這是一種強化種族身份的習俗，具有一定的積極價值。我本人也同意這個觀點。

辯論持續了多年，我們中仍然有人完全贊成割禮。一個在醫院工作的囚犯過去曾經為別人行過割禮，還舉辦了一個秘密割禮培訓班，并且我們監禁區的幾位年輕囚犯都在培訓班上行了割禮。隨后，我們為這些年輕人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茶話會，他們還按照習俗圍著毯子走了一兩天。

我們經常反復議論的一個話題是非洲是否有老虎。有人認為，雖然普遍推測老虎生活在非洲，但是，這是一個荒誕的說法，老虎的原生地是亞洲和印度次大陸。非洲有大量的豹子，但是卻沒有老虎。另外有人認為，孟加拉虎原產于非洲，并且，有的老虎現在仍然生活在非洲。有人則聲稱，曾經在非洲的灌木叢中親眼看到過這種最強壯、最漂亮的貓科動物。

我認為，雖然在現代非洲已經見不到老虎，但是，在科薩語詞匯中有一個詞與豹子這個詞不同，是老虎的意思。既然我們的語言中有這個詞，那么，這種動物就肯定曾經在非洲存在過。不然的話，為什么會有這種動物的名字呢？這個話題被爭議了一次又一次，我記得麥克反駁說，幾百年前印地語中就有在空中飛行的飛機這個詞，并且遠在發明飛機之前，但是，這并不能說明飛機在古老的印度就已經存在了。

68...

“Zithulele”（文雅一號），這是我們對看管我們在石灰石料場干活兒的那個寬容而講話和氣的獄警的稱呼。當我們干活的時候，他總是例行公事般地站在遠處，只要我們遵守秩序，他似乎對我們干什么并不介意。當他發現我們倚著鐵鍬在那里講話的時候，他從來也不訓斥我們。

我們對他也十分尊重。1966年的一天，他走到我們面前說：“先生們，雨水把路上的線沖沒了，今天我們需要20公斤石灰。你們能幫幫忙嗎？”盡管我們當時已經不需要干什么活兒，但是，由于他對我們以禮相待，我們也都愿意幫助他。

那年春天，我們感到當局從一定程度上說對我們變得越來越親切、溫和，島上盛行的嚴格管制制度有所放寬，囚犯與獄警之間的緊張關系也有了一定的緩解。

但是，這種寬容并沒有維持多久，9月份的一個上午，這種寬容就突然不復存在了。當時，我們剛剛從石灰石料場放下我們手中的鎬頭和鐵鍬，準備去鋅皮棚吃午飯。當一位普通犯人推著飯桶朝我們走來的時候，他低聲說：“沃爾沃德死了。”他就說了這么一句話，這個消息很快就在我們中間傳開了。我們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相信他所說的話，而獄警們則似乎不知道有什么重要事情發生。

我們不知道這位總理是如何死的。后來，我們聽說是一位默默無聞的白人議會通信員把沃爾沃德刺死的，但我們不知道他刺死沃爾沃德的動機是什么。盡管沃爾沃德認為非洲人比動物還低級，但他的死并沒有讓我們感到絲毫的高興。我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從來不支持政治暗殺。政治暗殺是一種對待敵手的野蠻方式。

沃爾沃德被證明既是種族大隔離的理論干將，又是種族大隔離的實踐大師。他史無前例地創造了班圖斯坦和班圖教育體制。在他被刺之前不久，他還領導國民黨進行了1966年的大選。在這次大選中，種族隔離黨派贏得了多數，獲得了126個席位，而合眾黨則獲得了39個席位，進步黨只獲得了1個席位。

正如島上常常發生的那樣，我們總是先于我們的獄警得知重大的政治新聞。但是，第二天，獄警們顯然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因為他們把氣都撒在了我們的身上。這種花了幾個月才得以緩解的緊張關系忽然又緊張到了極點。當局開始對政治犯進行鎮壓，好像我們的手中正握著刺殺沃爾沃德的匕首一般。

當局總是在懷疑我們秘密地與外界各種力量保持著聯系。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納米比亞的盟友——西南非人民組織（SWAPO）成立的游擊隊，襲擊南非警察的浪潮也使南非當局非常擔心。我猜想，當局過高地估計了我們——政府認為，我們新組建的民族長矛軍羽翼已經豐滿，足以成功地打垮政府。但是，這種懷疑只能說明他們這些心胸狹小、目光短淺的人開始感到不安，他們不是把問題歸咎于自己的錯誤政策，而是歸罪于他們的對手——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

對我們的懲處根本沒有正式政策的依據，而是我們剛剛來到這個島上時的嚴酷環境的再現。“文雅一號”被一個邪惡無比的家伙所取代。他名叫范·任斯博，在沃爾沃德被暗殺后，他被派到島上對我們實行24小時監視。他很有名氣，因為他的名字在囚犯中就是“殘忍”的代名詞。

范·任斯博是一個高大、愚笨而粗野的人，他似乎不會說話，只會喊叫。他上班的第一天，我們就發現他的手腕上刺著納粹的“卐”字記號。不過，他用不著用這個符號證明他的殘忍，因為他的工作使我們的生活要多慘就有多慘，并且他還在瘋狂地追求著他的這個目標。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范·任斯博每天都會以不服從管理或詐病不工作的罪名把我們中的人送上行政法庭。每天早晨，他和其他獄警都要商量下午要處罰誰。這是一種恐嚇辦法，只要決定懲處某個人，那么，不管這個人那天工作有多么賣力，他都將會受到懲處。當我們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牢房的時候，范·任斯博會拿著名單點名：“曼德拉（或西蘇陸或卡特拉達），我想立即在監獄長面前見到你。”

很快，羅本島上的行政法庭開始加班。為應對這種情況，我們也組成了自己的法律委員會，由我本人、菲基萊·巴姆和麥克·馬哈拉基組成。麥克學過法律，他善于讓當局處于防御的地位。菲基萊當時正在攻讀法律學位，他頭腦清醒、足智多謀，成為我們監禁區囚犯法律委員會的負責人。我們法律委員會的職責，就是為我們的同志提供在行政法庭上如何應對指控方面的咨詢。

范·任斯博并不是一個聰明人，他在石灰石料場上對我們耍威風，我們會在行政法庭上讓他黔驢技窮。我們的策略是不在現場與他爭論，而是在法庭上與他辯理。在法庭上，我們就有機會在相對比較開明的官員面前進行申訴，指控狀也會由主持審理的地方法官宣讀。他可能會指控我們“在石灰石料場詐病不工作”，此時的范·任斯博會有點兒自鳴得意。當指控狀全部宣讀完畢后，我總是讓我的同事做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事：請法官允許“更詳細地提供案情”。這是作為被告的一種權利，盡管經常會有這種請求，但是，范·任斯博幾乎總是拿不出更詳細的證據，然后法庭就不得不休庭，而范·任斯博則會走出法庭，去搜集“更詳細的情況”。

不論事情大小，范·任斯博從來都不懷好意。當我們的午飯送到石灰石料場的時候，我們會坐下來吃午飯。這時，我們已經有了簡單的桌子，范·任斯博必然選擇這個時間在靠近我們飯桶的地方撒尿。我們認為，他沒有直接把尿撒在我們的飯上就已經謝天謝地了。當然，我們就此提出了抗議。

囚犯能報復獄警的為數不多的方式之一就是說笑話，于是，范·任斯博就成了我們許多笑話中的笑料。我們背地里稱他“小提包”。我們把獄警們的午餐盒稱作“小提包”。一般來說，獄警總是指定一名囚犯給他提“小提包”，通常會找他最喜歡的囚犯，然后獄警會獎勵給他半個三明治。但是，我們拒絕提范·任斯博的“小提包”，他只好自己提著。因此，我們給他送了個“小提包”的綽號。一個獄警自己提午餐盒，可以說是對他的一種羞辱。

有一天，維爾頓·穆夸毅一時疏忽，叫他“小提包”時讓范·任斯博聽到了。范·任斯博問：“誰是小提包？”維爾頓停了一會，然后脫口而出：“就是你！”

“你為什么叫我小提包？”范·任斯博問，維爾頓不予回答。“伙計，快講。”范·任斯博又喊了一聲。“因為你自己提自己的‘小提包’。”維爾頓試探著回答說，“普通犯人為他們的獄警提小提包，而我們不幫你提，因此我們叫你‘小提包’。”

范·任斯博考慮了一會兒，他非但不生氣，而且說：“我不叫小提包，我叫Dik Nek。”大家沉默了一會，然后都大笑起來。在南非荷蘭語中，“Dik Nek”字面上是“粗脖子”的意思，被用來形容某個人固執己見、毫不通融。我認為“小提包”太愚蠢，他不知道大家是在侮辱他。

有一天，我們在石灰石料場又討論起了老虎是否原產于非洲這個話題。在范·任斯博擔任我們的監管獄警期間，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自由談話，但是，我們可以邊干活邊討論。

還是有些人認為老虎并非原產于非洲，其中主要是安德魯·馬桑多。他是開普地區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曾經是福特黑爾大學的講師。馬桑多是一個比較容易激動的人，他激動地斷言在非洲從來沒有發現過老虎。大家爭來爭去，爭到激烈的時候，干脆放下了手中的鎬頭和鐵鍬。這樣一來，就引起了獄警的注意。于是，他們喊叫著讓我們干活。但是，我們爭得正起勁兒，沒有理會他們的喊叫。幾位身份比較低的獄警命令我們繼續干活，但是，我們也沒有服從他們的命令。最后，“小提包”走了過來，用英語吆喝我們。他的英語講得不怎么樣：“You talk too much, but you work too few!”（“你講話太多，而干活太少！”）

大家并沒有拿起自己的工具，因為他們只顧在那里捧腹大笑了。“小提包”的語法錯誤更讓大家感到特別好笑。不過，“小提包”一點都沒有笑。他立即叫人去叫監獄長克勒曼少校。

克勒曼不一會兒就來到了現場，他發現我們還在那里笑個不停。他到島上的時間不太長，決心為自己定一個正確的調子。一位獄警向克勒曼報告說，安德魯·馬桑多和我一直不干活兒，他們將以詐病怠工和不服從管教對我們進行處罰。在克勒曼的淫威下，我們被戴上手銬帶走了，然后被隔離關押。

從此之后，“小提包”似乎對我特別仇恨。有一天，他正在監督我們勞動，我與菲基萊·巴姆緊挨著在一起干活兒。我們兩人干活兒的地點位于石灰石料場最邊緣的地方。當時，我們工作很賣力。但是，由于我們兩人當時都在學習法律，因此，我們彼此交流了頭一天晚上學習的內容。那天勞動結束的時候，范·任斯博站在我們面前說：“菲基萊·巴姆和納爾遜·曼德拉，我要帶你們去見監獄長。”

我們被帶到了監獄長面前，范·任斯博說：“這兩個人一整天沒干活兒。我告他們不服從命令。”監獄長問我們是否有話要講。“監獄長，”我應聲說，“我們不服他對我們的指控。我們一直在工作，事實上我們也有證據證明我們一直在工作，這對我們的辯護是至關重要的。”監獄長對我說的話嗤之以鼻。“你們都在同一個地方干活兒，”他說，“怎么可能會有證據？”我解釋說，菲基萊和我一直單獨在一起干活，我們能指給你看我們兩個到底干了多少活。當時，“小提包”也傻乎乎地承認我們兩個在一起。因此，監獄長同意去查看。于是，我們又回到了石灰石料場。一到那里，菲基萊和我就走到我們干活兒的那個地方。我指著我們堆起來的一大堆石塊和石灰石說：“那就是我們今天干的活兒。”“小提包”對檢查我們干的活從來不怕麻煩，并對我們所完成的工作量說三道四。“不，”他對監獄長說，“那是干了一周的結果。”監獄長對他說的話有些懷疑。“那好，”他對“小提包”說，“讓我看看曼德拉和巴姆今天干的那一小堆兒在什么地方。”“小提包”沒有回答。監獄長干了一件我很少見到的一個高級監獄官員所干的事：他當著囚犯的面訓斥了他的下級。“你在說謊。”他說，并當場撤銷了對我們的指控。

1967年年初的一個上午，在“小提包”任職期間，我們正準備去石灰石料場。這時，“小提包”告訴我們，克勒曼少校下達了命令，在路上和石灰石料場都不準講話。“從現在起不準講話！”他高聲叫著。

對這個命令，大家都感到失望和氣憤。說說話、討論討論問題是我們可以減輕勞動強度感的唯一方式。由于不準講話，我們在去石灰石料場的路上當然也就不能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在吃中午飯休息期間，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班子和其他政治組織的首腦們秘密地制訂出了一個方案。

在我們悄悄地制訂方案的同時，克勒曼少校本人也來到了我們吃午飯的棚子里。這極不平常，在我們如此簡陋的棚子里從來沒有如此高級別的人來看望過我們。他尷尬地咳嗽了一聲說，他的命令是錯誤的，只要不大聲喧嘩，我們可以在石料場講話。他讓我們繼續吃午飯，然后，轉身走出了棚子。我們為取消不準我們講話的命令而感到高興，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要取消這個命令。

那天下午剩下的時間里，獄警不再強迫我們非常努力地干活兒，“小提包”也盡可能地向我們表示友好。他說，作為友好的一種表示，他決定撤銷對我們的一切指控。

那天下午，我發現自己被從靠近監禁區入口處的第4號牢房轉移到了靠后面的第18號牢房。我的所有東西都被搬到了新的牢房。與通常一樣，也沒有人告訴我為什么。

我們猜測，可能是有人來島上訪問。我之所以被更換牢房，是因為當局不想讓我第一個與來訪者交談。如果每個囚犯輪流發表他們的不滿意見，在來訪者到達第18號牢房之前，監獄當局就可以說：“時間到了！”我們決定，為了統一，如果有人來訪問，每個人僅限于向來訪者反映自己的意見，其他意見都由第18號牢房的人負責集中反映。

第二天吃完早飯后，“小提包”告訴我們，我們不去石料場了。然后，克勒曼少校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對我們說，海倫·蘇茲曼女士不久將來島上訪問我們。海倫·蘇茲曼是議會中唯一一位自由進步黨黨員，也是國民黨在議會中的唯一真正的反對派。不到15分鐘，蘇茲曼女士在監獄管理局局長斯特恩將軍的陪同下走進了我們監禁區的大門。她一一看望了每個囚犯，并詢問每個囚犯是否有抱怨意見。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回答：“我有許多不滿意見，但是，我們的代言人是走廊那頭的納爾遜·曼德拉。”讓斯特恩將軍吃驚的是，蘇茲曼很快就來到了我的牢房。她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并熱情地作了自我介紹。

法官和地方行政長官可以不經允許而直接到監獄進行訪問，而議員則不同，他們必須先提出申請，得到批準后才能到監獄來。蘇茲曼女士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位，也肯定是為數不多的對政治犯感興趣的議員之一。關于羅本島有許多傳說，因此，蘇茲曼女士親自來島上開展調查。

因為這是蘇茲曼女士第一次來島上進行訪問，所以，我首先讓她放心行事。她非常自信，完全不在乎周圍的環境，她建議我們立即開始談正題。斯特恩將軍和監獄長站在她身邊，但是，我談問題并沒有轉彎抹角。我告訴她，我們希望伙食和服裝能得到改善，并要求伙食標準應該人人平等。我們希望提供必要的學習條件，我們沒有獲取信息的權利。例如，我們不能看報紙和其他更多的資料。我告訴她，獄警們野蠻粗暴，特別是范·任斯博。我說，他前臂上還刺著納粹“卍”字標志。海倫的反應就像是一個律師。“好，曼德拉先生，”她說，“我們不要把話題扯得太遠，因為我們不知道那是什么時候刺的。譬如說，是不是他父母給他刺的？”我向她保證，肯定不是他父母給他刺的。

正常情況下，我不會對某一位獄警提出不滿意見。在監獄中，最好是圍繞總的原則目標開展斗爭，而不能與個別人進行糾纏。但是，不管一個獄警多么冷酷無情，他總得要執行監獄里的規定。不過，范·任斯博自己屬于另一類情況。我們認為，如果他不在羅本島，我們大家的情況將大不相同。

蘇茲曼女士聽得很認真，把我說的情況一一記錄在了一個小筆記本上，并許諾把這些情況反映給司法部。然后，她察看了我們的牢房，并與其他人簡單地進行了交談。看到這樣一位勇氣十足的女士走進我們的牢房和在我們監禁區的院子里漫步，本身就是一種少有的、令人稱奇的景象。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心懷善意進入我們牢房的女議員。

在蘇茲曼女士來訪期間，范·任斯博顯得十分緊張。凱西說，在蘇茲曼女士與我們談話的時候，范·任斯博就他過去的所作所為道了歉。但是，他的悔悟并沒有堅持多久，因為第二天他就告訴我們，他將恢復對我們的所有指控。后來我們得知，蘇茲曼女士把我們的情況上報到了議會，她訪問后僅僅過了幾周，“小提包”就被調離了羅本島。

69...

我從來也不認為，斗爭只是短期的或輕而易舉的。在羅本島被關押的頭幾年，對島外的組織和獄中的我們這些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利沃尼亞審判后，多數地下運動組織都被摧毀了。我們的組織結構被發現并遭到了徹底破壞，沒有遭到逮捕的成員則提前敵人一步逃走了。實際上，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高級領導人不是被關進了監獄就是遭到了流放。

利沃尼亞審判后的幾年內，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派駐國外的機構，原來的任務只是募集資金、開展外交活動和安排軍事訓練，但現在就必須從總體上管理整個組織。這些駐外機構不僅要創建流亡組織，而且還有一個更艱巨的任務，那就是設法在南非重新建立地下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

政府變得更加強硬。警察擁有了更多的權力，他們的手段更加殘忍，技術更加成熟。南非的國防軍隊正在準備進行擴編，經濟上也比較穩固，全體白人選民都高枕無憂。南非政府在英國和美國有實力強大的盟友，這些盟友只滿足于維持現狀。

但是，其他地方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正在興起。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后期，武裝斗爭的烈火燃遍了整個南部非洲。在納米比亞（當時叫西南非），西南非人民組織首先進入了卡普里維地帶；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游擊隊組織正在成長和壯大；在津巴布韋（當時叫羅得西亞），反對少數白人統治的戰斗正在向前推進。伊恩·史密斯白人政府得到了南非國防軍隊的支持，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把津巴布韋的戰斗作為我們國內斗爭的延伸。1967年，我們獲悉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津巴布韋非洲人民聯合會（ZAPU）結成了聯盟。當時，津巴布韋非洲人民聯合會是由喬舒亞·恩考茂締造的。

那一年，一伙在坦桑尼亞和贊比亞接受訓練的戰士渡過了贊比亞河進入了羅得西亞，試圖返回他們的家園。第一伙民族長矛軍戰士被命名為魯圖利特遣部隊，他們是武裝斗爭的先鋒。8月份，當魯圖利特遣部隊在津巴布韋非洲人民聯合會部隊的策應下向南運動時，他們被羅得西亞軍隊發現，在接下來的幾周內，雙方進行了激烈的戰斗，并且雙方都有傷亡。最后，我們的部隊被在人數上占優勢的羅得西亞部隊打敗了，有的被俘，其他人則退回了貝專納。貝專納獨立后，成為現在的博茨瓦納。到1968年年初，另一支較大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特遣部隊進入了羅得西亞，不但與羅得西亞軍隊作戰，而且也與一直支持羅得西亞的南非警察部隊作戰。

當月，我們就聽到了謠傳，但是，直到參加打仗的戰士同我們關押在一起后才知道了全部情況。盡管我們的軍隊并沒有取得勝利，但是，我們仍然默默地慶祝，我們的民族長矛軍指戰員在他們自己現有的條件下牽制敵人，這本身就是斗爭中的一個里程碑。“佳士提斯”（正義）·潘扎是魯圖利特遣部隊的一位指揮員，后來，他也與我們關在了一起。他簡單地向我們介紹了特遣部隊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以及他們在戰場上英勇殺敵的情況。作為一位前民族長矛軍的總司令，我為我的戰士感到特別驕傲。

在聽到關于民族長矛軍在國外作戰的消息之前，我們也得到了關于魯圖利于1967年7月在家中去世的消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是在他的農場附近被火車撞死的，他經常到那里去散步。我被允許給他的遺孀寫了慰問信。魯圖利的去世，在組織中留下了巨大的真空。魯圖利酋長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是一位世界著名人士，黑人和白人都很尊重他，因此，沒有人可以取代他。人選落到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代理主席奧利佛·塔博身上，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發現，他是一個能夠頂替魯圖利酋長的位置的人。像魯圖利一樣，他善于表述而又不炫耀，有信心但又非常謙虛。在他的身上也體現了魯圖利的格言：“讓你的勇氣隨著危險而提高。”

我們在B區為酋長組織了一個小型的悼念儀式，供每個想表示追憶的人進行悼念。那是一個肅穆的悼念儀式，只有一件事令人不愉快。當非歐洲人團結運動組織的內維爾·亞歷山大站起來講話的時候，顯然他并不是稱贊酋長，而只是為酋長送葬。他對魯圖利酋長的去世，連表示起碼的遺憾都沒有，他甚至責備魯圖利是白人的幫兇，主要根據就是酋長接受了諾貝爾和平獎。

除了錯誤的思想，內維爾的講話與我們試圖努力在島上創造的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合作氣氛也完全不相稱。從到達島上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與斗爭中的敵手尋求和解作為我的使命，我把羅本島作為一種使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與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消除長期存在且經常頗為痛苦的分歧的機會。如果我們能把島上的兩個組織團結起來，那將為兩個組織在整個解放斗爭中團結在一起開創先河。

從一開始，與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關系就是競爭多于合作。有一些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成員早先已經來到了這個島上，他們把我們的到來看作是對他們領地的侵犯。我聽我們的某些同事講，多數來自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囚犯都為我們沒有被絞死而感到遺憾。

1962年，在我第一次來到羅本島上的時候，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從數量上已經遠遠超過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而到了1967年，這個數字被顛倒了過來。這使得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立場似乎更加強硬，他們開始公開反對共產黨人和印度人。在早些年，我曾經與澤法尼·馬托朋交談過多次，他一直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澤法尼認為，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比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更具有戰斗性。在監獄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應該服從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領導。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認為，與當局談判是一種背叛，但是，他們的這種立場并沒有妨礙他們享受談判帶來的好處。1967年，我與塞爾比·恩根達尼就團結問題交換了意見。在監獄外，恩根達尼一直強烈反對《自由憲章》，但在監獄里，特別是來到我們這個監禁區之后，塞爾比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態度變得友好了。后來，我們分別給各自的組織寫了信，倡導兩個組織之間的團結。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克拉倫斯·馬克韋圖也實現了和解，他后來成了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主席。馬克韋圖曾經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的成員，他也被關押在我們的監禁區，是一個沉著、鎮定而思維敏捷的人。我與他在兩個組織團結方面進行過多次富有成果的商討。但是，馬克韋圖被釋放后，約翰·波凱拉繼任羅本島上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領導職務，雙方的會談未能繼續下去。

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不穩定性有時會導致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有一次，比勒陀利亞當局下達了一項命令，把我與石灰石料場的其他囚犯隔離開來。我只能單獨工作，單獨就餐，單獨被看管。我們后來發現，這個新情況在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囚犯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幾天后，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決定，對他們的領導人澤法尼·馬托朋也實施隔離，他們自行讓他單獨工作、單獨就餐的時間與我單獨工作、單獨就餐的時間一樣長。

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經常拒絕參加與黨派無關的會議。當我們召集會議，討論我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再彼此通報從報紙上獲得的新聞時，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抵制了這次會議。對此，我十分反感。我們得知，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對自己組織內部在外面發生的變化一無所知。當時，島上的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不相信我們關于流亡國外的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已經向白人和印度人敞開了大門的說法，認為那只是謠言。但是，我們已經從報紙上看到，白人激進主義分子帕特里克·鄧肯已經成為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執行委員會成員。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成員當時認為，這不過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宣傳手段。

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羅本島上成立了自己的國際組織。該組織被稱作最高司令部，或者更正式地稱為最高組織機關，由島上最高級別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組成。這些人都是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他們是瓦爾特·西蘇陸、戈萬·姆貝基、雷蒙德·穆拉巴和我本人。我擔任最高組織機關的領導人。

從一開始我們就決定，最高組織機關不干預外面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我們對國內的形勢沒有可靠的評估辦法，所以我們認為，對我們并不知道的事情提供指導并不是公正而明智之舉。我們所領導的事務，只是一些與囚犯們的不滿意見以及罷工、郵信、伙食等有關的事情，這些都是監獄生活中的日常問題。可能的話，我們將召集一般成員開會。我們認為，這種會議對于保持組織的健康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召開這些會議也是十分危險的，所以不能經常召開，于是最高組織機關通常用傳達的方式把所作的決定通知到其他所有成員。最高組織機關還建立了基層組織，每個基層組織由三名成員組成。

在島上的頭幾年中，最高組織機關還起著我們監禁區的所有政治犯人的代表委員會的作用。1967年，我們起草了一個要求得到較好待遇的請愿書，大家都在該請愿書上簽了名，其中包括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團結運動組織的成員和以艾迪·丹尼爾斯為代表的自由黨的成員。后來，雖然大家都認可了這種組織結構，但內維爾·亞歷山大一直在抱怨，最高組織機關既不民主又沒有真正的代表性，他認為應當創立其他組織機構。

在內維爾的建議下，最終成立了一個犯人委員會，由來自各政治黨派的人組成。其他組織的人擔心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凌駕于該委員會之上，于是精心制定了工作準則，限制該委員會的權力純粹是咨詢式的，其決定不具有約束力。即使如此，該委員會也很難達成解決問題的一致意見。我們建議，由游擊戰俱樂部的成員菲基萊·巴姆主持會議。后來，該委員會的領導人由各組織的人輪流擔任。最后，大家把該委員會稱作“烏倫迪”，成為所有政治犯的一個紀律委員會。

最高組織機關由于其各族成分雜處而成為某些分歧的源頭，四個常委都是科薩族。這是一種巧合，而不是故意這樣安排的。島上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最高領導班子中，只有4個人曾經擔任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而這4個人偏偏都是科薩族。僅僅因為不是科薩族就把某個級別較低的人推上最高組織機關的領導崗位顯然是不妥當的，但是，最高組織機關成為科薩族一統天下的事實也讓我大傷腦筋，因為，這樣似乎會讓大家產生誤解，認為我們只是一個科薩人的組織。

我對這樣的批評總是感到惱火，認為這種批評說明他們既不了解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歷史，也不懷好意。我有時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一直由祖魯人、巴索托人、佩迪人和茨瓦納人擔任這個事實予以反駁，說明執行委員會一直是一個包括各個不同民族團體的混合組織。我記得有一次，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們正在院子里勞動，有些來自普通犯人監禁區的人在我上面的房頂上干活兒，他們朝著我喊：“Mdala（老伙計），你為什么只同科薩人說話？”這種責備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抬起頭說：“你們怎么不分青紅皂白地責備我？我們都是一家人。”他似乎對我說的話感到滿意，但是，他們的意見卻牢牢地記在了我的心中。自此之后，無論知道什么事情，我總是會走到普通犯人監禁區的囚犯面前，設法與凱西或丹尼爾斯或其他非科薩人士進行溝通。

我們后來決定，最高組織機關中應該有第五個人選，輪流負責最高組織機關的工作。這個第五人通常不是科薩人，例如，凱西在最高組織機關成員中擔任領導職務長達五年多，拉魯·奇巴也擔任過一段時間。最后，這種批評也就慢慢地聽不到了。

我并不是想獨攬最高組織機關的大權，事實上，我自己覺得重要的一些建議都被拒絕了，我認為就是應該這樣。但是，有時候我發現，這樣也沒有什么益處。有兩個與當局有關的問題，對于這兩個問題，我就沒能說服我的同事。監獄規定，在高級官員面前，犯人們必須起立。我主張我們不應該起立，因為，不得不尊重敵人而敵人又不把我們當政治犯對待是對自己的貶低。我的同志們則認為這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反抗的后果并沒有什么好處。

第二個問題出于同樣的原因也遭到了最高組織機關的拒絕。獄警既不稱呼我們的姓，也不稱呼我們的教名。這是對我們的侮辱，應該讓他們在我們的稱呼前加“先生”二字。我為此堅持了多年，但是一直沒有成功。后來，這甚至成了一種幽默，因為我的同志們有時就稱呼我“曼德拉先生”。

70...

對我們這些身在獄中的人來說，時間似乎是靜止不動的，但是，對監獄外的人，時間則是不停步的。當我母親于1968年春天來探望我的時候，我就有這樣的感覺。自從利沃尼亞審判結束之后，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她。變化是逐漸地、一點一點地發生的。當你生活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很少注意到家人的變化。但是，當你多年不見你的家人的時候，他們的變化則讓你感覺是非常明顯的。我母親似乎一下子變得很老了。

她在我兒子馬卡托、我女兒馬卡紫薇和我妹妹巴貝爾的陪同下從特蘭斯凱來島上探望我。因為有四個人來訪，并且他們又是遠道而來的，當局把探視時間從半小時延長到45分鐘。

自從利沃尼亞審判之前，我就沒見過我的兒子和女兒，在這期間，他們已經長大成人。我端詳著他們，感到由衷的高興和自豪。但是，盡管他們已經長大了，我恐怕多多少少地仍然拿他們當孩子對待，就像我進監獄前一樣。他們可能變了，但是，我卻沒有變。

我母親瘦了許多，這使我非常擔心。她面色顯得有些憔悴。只有我妹妹似乎沒怎么變樣。盡管見到他們并與他們一起商量家庭問題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情，但是，我對我母親的健康卻感到不安。

我向馬卡托和馬卡紫薇表達了讓他們繼續讀書的愿望，并向巴貝爾詢問了住在特蘭斯凱的親戚家的情況。時間過得太快，正如每一次有人來探視時一樣。最愉快的事情在于對親人探視的回憶，但是這一次，我卻無法擺脫對母親的擔心。我害怕這將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她老人家。

幾周后，我們從石料場回來，有人告訴我去監獄辦公室拿電報。電報是馬卡托發來的，他告訴我：我母親因心臟病去世了。我立即向監獄長辦公室申請，要求去特蘭斯凱參加她老人家的葬禮。我的請求被監獄長拒絕了。“曼德拉”，他說，“盡管我知道你是一個守信用的人，你不會逃跑，但是，我對你們的人不信任，擔心他們會綁架你。”我為不能給我母親送葬而更加傷心——作為她的大兒子，又是唯一的兒子，為她老人家送葬是我的責任。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一直十分懷念她老人家。她的一生遠遠談不上安樂。在我當律師的時候，我還能夠贍養她，但是，進了監獄之后，我就再也不能贍養她老人家了。我欠她老人家太多了。

我母親的去世使我對自己的人生再次進行回顧和評價。她的艱難、她的貧窮，使我又一次對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提出了疑問。這一直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自己家庭利益的位置上，這是不是一種正確的選擇？長期以來，我母親對于我獻身于斗爭事業一直不能理解。我的家人并不想卷入這場斗爭，但是，我的卷入使他們也受到了連累。

但是，我又回到了同一個答案。在南非，對于一個男子漢來說，不顧人民的需要是很難做得到的，就是犧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應顧全人民的利益。我作出了自己的選擇，最終，我母親也支持我所作的選擇。但是，這樣也不能減輕我為沒能使她老人家生活得更好一些以及沒能讓她安息而感受到的悲哀與痛苦。

1969年5月12日一大早，安全警察在我們奧蘭多西的家中把溫妮喚醒，并根據1967年通過的《反恐怖法》，未經指控就逮捕了她。《反恐怖法》給政府提供了不用審判就可以對某人實施逮捕和囚禁的權力，這個權力是空前的。我后來得知，這次襲擊是全國性襲擊的一部分。在這次襲擊中，另有十幾個人遭到了拘留，其中還包括溫妮的姐姐。警察是在澤尼和津澤雙雙抓著溫妮的裙子的情況下硬把她拉走的。后來，她被單獨關押在比勒陀利亞的監獄里。在那里，她被剝奪了保釋權和被探視權。緊接著，她一連被野蠻地審訊了好幾個月。

6個月后，溫妮最終被提起公訴，我設法讓長期反對種族歧視的律師喬爾·卡爾森為她辯護。溫妮和其他22位人士被指控違反了《鎮壓共產主義條例》，企圖重新組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后來，喬治·畢佐斯和阿瑟·查斯卡爾松都參加了辯護。他們都曾是利沃尼亞審判的辯護律師。10月份，溫妮被捕17個月后，政府撤銷了對她的指控，溫妮被無罪釋放。釋放兩周內，溫妮又遭到禁止，被軟禁在家中。她立即提出申請來探視我，但是遭到了拒絕。

在監獄里，想到溫妮也被關進了監獄，這比什么都痛苦。我勇敢地面對這一現實，但是，在內心深處，我感到十分不安。溫妮被單獨關押的時候是我內心最為痛苦的時候，盡管我經常勸說別人不要為自己管不了的事情去擔心，但是，我自己卻不能聽從自己的勸告。我有許多個不眠之夜：當局想對我的夫人下什么樣的毒手？她是否能夠承受？我們的女兒由誰來照管？誰將為她們支付賬單？我不斷地思考這樣的問題，但是又無法回答，這簡直是一種精神折磨。

奧卡木博準將允許我給溫妮寫信，但有一兩封信沒有及時得到她的回信。正常情況下，等待審判的囚犯是不能通信的。但是，奧卡木博作為對我的關照卻允許我們通信，我對他十分感激。不過，我知道當局允許我們通信并不是出于仁慈：他們企圖通過閱讀我們的書信，從中得到對溫妮不利的證據。

在這段時間，我又經歷了另一場不幸。1969年7月一個嚴寒的早晨，也就是我得知溫妮被關進監獄三個月后，我被叫到羅本島監獄辦公室，有人遞給了我一封電報。這封電報是我的小兒子馬卡托發來的，只有一句話，告訴我他的哥哥，即我的大兒子馬迪巴·泰姆比基勒——我叫他泰姆比，在特蘭斯凱發生的一次車禍中喪生。泰姆比當時只有25歲，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一個人對于這樣的悲劇還能說什么呢？我對我的夫人的不幸已經夠傷心了，我母親的去世一直使我十分難過，此時，又聽到這樣的噩耗。我簡直無法用語言形容我的悲傷，我的心中留下了一個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彌補的創傷。

我回到我的牢房，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在那里躺了多久，只知道那天晚上我沒去吃晚飯。有人來看我，我什么話也不說。最后，瓦爾特來到我的牢房。他跪在我的床前，我把那封電報遞給了他。他什么話也沒說，只是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他陪了我多長時間。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無法對另一個人說什么。

我請求當局允許我去參加我兒子的葬禮。作為一個父親，保證使兒子的靈魂得到安息是我的責任。我告訴他們，可以派保安警察同我一起去，我可以立下保證書，保證按時返回監獄。但是，我的請求又一次遭到了拒絕。當局只是允許我給泰姆比的母親艾韋琳寫一封信，我只能在信中盡力安慰她，告訴她我會分擔她的悲傷。

我記得有一天下午，當泰姆比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就到我曾經從事秘密工作的西里爾德尼的一所能安全藏身的房子里來看過我。由于我一直忙于地下政治活動和法律案件，當時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能見到他了。有一次，我突然回到家中，看見他穿著一件舊礦工服，衣服搭到他的膝蓋。他一定是穿著他父親的衣服有一種安慰感和自豪感，就像我曾經穿我父親的衣服一樣。當我不得不向他說再見的時候，他直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經長大成人。他說：“你不在家的時候，我會照顧我們的家。”

# 第九部 羅本島：希望的曙光

71...

在監獄里，條件的改善從來不會持續太久。改善的步伐要停止時，通常還會伴隨著倒退。前進一步可能要花幾年的時間才能取得，而倒退回去，則只需要一天的時間。就好像是我們把巖石推到山頂，但是它又從山頂上滾落了下來。不過，生活條件的確有了改善。我們打了幾次“勝仗”，使島上的氣氛發生了變化。如果我們不合作，當局沒有我們也無法開展工作，在范·任斯博離去后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生活環境也寬松了一些。

我們來到島上的頭三年中，每人都發了長褲子。到1969年，我們每人都發了屬于自己的囚服，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每周都換一套。這些囚服很合體，當局也允許我們自己洗自己的囚服。周末的時間，我們被允許隨時到院子里活動。盡管我們的伙食當時還不平等，但是，非洲囚犯有時早上也能吃到面包。我們犯人之間可以共同分享食物，因此，有些差別也沒有關系。我們發了各種象棋和撲克牌，禮拜六和禮拜天我們常常下棋和打撲克。在石料場，我們可以自由談話。如果監獄長要來，值班的獄警會吹哨讓我們拿起工具。我們與最壞的獄警的關系也得到了緩解，與對我們比較好的獄警則都成了朋友，盡管當局對此有所察覺，并每幾個月就輪換一次獄警。

實際上，我們隨時都可以召集會議。我們可以召開最高組織機關成員的會議，一般成員和“烏倫迪”開會只要不太扎眼，也一般不會被迫中斷。看起來，就像是囚犯們而不是監獄當局在管理著監獄。

由于信仰堅定和害怕上帝，南非白人對他們的宗教特別認真。每周雷打不動的活動就是禮拜天上午做禮拜，這是當局認為必須進行的一種宗教儀式。他們似乎認為，如果不讓我們在禮拜天做祈禱，就危及他們自己的道德精神。

每個禮拜天上午，都會有一個來自不同宗教團體的牧師為我們布道。這個禮拜天是英國圣公會的牧師，下一個禮拜天將是一個荷蘭歸正會的傳教士，再下一個禮拜天則是衛理公會的牧師。牧師由監獄服務部門招募，其中一條規定是被招牧師布講的內容僅限于宗教方面。獄警參加所有的宗教活動，如果某個牧師的布道偏離了宗教，下一次他就不會再被邀請到島上進行傳教活動。

在島上的頭兩年里，即使是做禮拜時也不準我們離開我們的牢房。牧師就在我們的走廊頭上進行布道。到了第三年，做禮拜改在院子內進行，我們更喜歡在院子里做禮拜。在那些年月里，這是我們在禮拜天除了半小時的早操之外唯一被允許在院子里活動的時間。我們中很少有人信教，但是，沒有人介意布道的時間太長，因為我們希望在院子里多待上一會兒。

每逢在牢房外舉行禮拜儀式，我們可以隨便參加。有的人只參加自己信奉的宗教的布道活動。盡管我是一個循道宗的信徒，但是，我還是每種宗教活動都參加。

第一輪給我們布道的牧師是一個叫休斯的英國圣公會牧師。他是一個性情粗暴而魁梧的威爾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經在潛艇部隊中當過隨軍牧師。當他第一次來島上的時候，他對在走廊里布道很是不滿，認為這是對上帝的大不敬。因此，他第一次來島上沒有向我們布道，而是從溫斯頓·丘吉爾的戰時廣播講話中節錄了一段話，用他那動聽的男中音背誦出來：“我們將在海灘上戰斗，我們將在空降點戰斗，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道上戰斗，我們將在山地里戰斗，我們將決不投降。”

不久之后，休斯牧師就改在院子里為我們布道，我們發現他的布道演講很精彩。他布道時不時小心謹慎地加入了一些我們喜歡聽的新聞。例如，像古埃及的法老、南非的總理正在招募部隊之類的故事。

布道結束后，我們總是唱圣歌，我認為休斯牧師之所以那樣頻繁地來探望我們，僅僅是為了聽我們唱圣歌。他隨身帶著一架便攜式風琴，有時就為我們伴奏。他對我們的演唱十分欣賞，說我們的演唱是唯一能與他家鄉威爾士唱詩班相媲美的演唱。

衛理公會的傳教士是瓊斯牧師，他是一個神情緊張、情緒低落的人。在剛果發生革命期間，他曾經一直生活在剛果。他在那里的經歷似乎是他精神憂郁的主要原因。他一遍又一遍地強調和解的重要性，其用意無非是我們需要與白人和解。

有一個禮拜天，當這位衛理公會的牧師正在作他那慣有的片面布道時，我注意到艾迪·丹尼爾斯一直煩躁不安。到最后，艾迪顯然無法再忍耐下去。“你在這里大談和解，但卻找錯了對象，”他大聲說，“過去的75年，我們一直在尋求和解。”這對瓊斯牧師已經是夠受的了，因此我們以后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瓊斯并不是唯一被艾迪嚇跑的牧師。一位稱作賽普泰姆波兄弟（Brother September）的有色人牧師也曾經來島上為我們傳過教。有一個禮拜天，一位名叫赫尼·費里斯的囚犯自告奮勇帶頭祈禱，他口才特別好。對于這種宗教熱情，賽普泰姆波兄弟當然非常高興。赫尼開始用高昂的語調祈禱，在祈禱時，有時他請大家閉上眼睛進行默禱。包括賽普泰姆波兄弟在內的每個人都閉上了眼睛。艾迪躡手躡腳地走到前面，打開賽普泰姆波兄弟的公文包，拿走了當天的《星期日時報》。當時，沒有人察覺此事，但是賽普泰姆波兄弟從此之后給我們布道時再也沒有帶過報紙。

安德烈·斯凱福勒是南非荷蘭歸正會的牧師。南非荷蘭歸正會與荷蘭歸正會是姐妹教會，幾乎全體布爾人都是其信奉者。其傳教團教堂只供非洲白人使用。斯凱福勒牧師是一個固執而又保守的家伙，他通常只對普通囚犯布道。有一個禮拜天，他信步來到了我們監禁區，我們就問他為什么不對我們布道。“你們這些人認為自己是自由戰士，”他傲慢地說，“逮捕你們的時候，你們一定在酗酒和吸毒（大麻）。自由戰士，哼，去你的！”但是，我們要求他給我們布道，到20世紀60年代末，他終于答應了。

從某個方面講，斯凱福勒牧師并不是正統的宗教人士。他對宗教采取科學的態度，我發現這很有意思。許多人都是運用科學反對宗教，而他卻把科學作為自己宗教信仰的支柱。我記得在一次傳教演講中，他談到了來自東方的三位智者，他們在一顆彗星的指引下來到了伯利恒。他說：“這并不僅僅是一個迷信或神話。”然后他從天文學家那里找了證據，在歷史上的那個時刻，有一顆彗星運行的軌跡恰恰與《圣經》中描述的路線相吻合。

由于斯凱福勒對我們越來越了解，他對我們也就更加同情。他富有一種冷峻的幽默感，喜歡拿我們開玩笑。“你知道，”他說，“在這個國家里，白人比黑人的任務更艱難。無論什么時候出了問題，我們必須找到解決辦法，而無論什么時候你們黑人有問題，你們總是有借口。你們可以簡單地說一句‘Ingabilungu！’”我們立即哈哈大笑起來，不僅因為他的發音滑稽，而且還因為他的這個觀點把我們逗樂了。“Ingabilungu”是一個科薩詞，意思是“這是白人干的”。他是在說，我們總是能把我們所有的問題都歸咎于白人。他的意思是我們也要在自己中間找原因，也要對我們的行為負責。對此，我倒是完全贊成。

正如禮拜天是每周的休息日一樣，圣誕節則是每年的休息日。只有在這一天，當局才對我們表示出某種善意。在圣誕節，我們不必去石料場勞動，我們被允許買少量的糖果。雖然我們吃不到傳統的圣誕飯，但是，我們吃晚飯時會得到額外的一杯咖啡。

當局允許我們組織音樂會，舉辦比賽或演話劇。音樂會是最引人注目的集會。我們的音樂指揮是來自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塞爾比·恩根達尼。在加入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前，塞爾比一直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團員。他是個天生的演藝者，擁有一副美妙的好嗓子和很高的欣賞品位。

塞爾比選擇歌曲，改編和弦，選出獨唱演員，并親自導演。音樂會于圣誕節上午在院子內舉行。我們演唱了傳統的英國圣誕歌曲和非洲傳統歌曲，其中也包括一些抗議歌曲，當局對此似乎并不在意，或許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差別。獄警們是我們的觀眾，他們與我們一樣，對我們的演唱非常入迷。

在來監獄之前，塞爾比被認為是一個在政治上無足輕重的人物。但是，在監獄里，他才真正顯示出他的氣質。在監獄中，誰性情開朗，誰就是有人緣的人。

監獄是一個鍛煉人的性格的大熔爐。有些人在身陷囹圄的壓力下才顯示出真實的氣質，而有些人在監獄中展現的氣質則與原先相比打了折扣。

除了舉行音樂會之外，我們還舉辦象棋和跳棋比賽，有時也玩拼字游戲和橋牌。我每年都參加國際跳棋比賽，并且有幾年我獲得了大獎，獎品通常只是一根糖棒。我玩游戲的風格是慢條斯理和深思熟慮，策略上則偏于保守。我每走一步都要進行認真思考，步與步之間往往花費很長的時間。我不贊成類推，但是，這不但是我在下國際跳棋中推崇的操作方式，而且在政治問題上，我也堅持這樣的方式。

我的對手多數都喜歡速戰速決，常常對我這種玩游戲的方式失去耐心。與我一起玩游戲最多的對手是唐·戴維斯。他是非歐洲人聯合運動組織的成員，是在金伯利的一個鉆石礦區長大的。他是一個能吃苦耐勞、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一個容易激動的人。唐是個優秀的國際跳棋棋手，但是，他的風格正好與我的風格相反。當他下棋時，他的臉上總是掛滿汗水，有時，他會變得十分緊張和激動。他落子飛快，好像速度快也能得分似的。在年終決賽中，我們有好幾次一起進入了總決賽。

唐稱我為“Qhipu”，因為在下跳棋的時候，我有一個習慣。我會認真地考慮每一種可能性，當我準備移動棋子的時候，我總是說“Qhipu！”意思是“來吧”，然后才移動棋子。對這一點，唐感到有些沮喪，他稱呼我“Qhipu”并不是出于友好，而是由于惱怒。

唐和我舉行過多次比賽，即使是贏了棋，他也要立即回到棋桌上向我挑戰，提議再下一盤。唐總是要玩國際跳棋，直到我應戰后他似乎才感到滿意。我與他玩得時間太多，因此，我的其他愛好都荒廢了。每當我在學習中沒能通過一門考試，而有幾位同事問我為什么的時候，我的回答都是：“因為唐·戴維斯！”我的回答往往會引起一場哈哈大笑。

我們的業余戲劇協會每年在圣誕節都有展示才華的機會。自從在福特黑爾大學扮演約翰·威爾克斯·布斯后，我的悲劇藝術才能就再也沒有施展的機會，但在羅本島上我卻又一次走上了舞臺。我們演的戲可能類似于現在的簡單抽象派表演藝術：沒有舞臺，沒有道具，也沒有戲裝，我們所有的只是臺詞。

我只在幾出戲中扮演過角色，但是有一個角色讓我至今記憶猶新，那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寫的悲劇《安提戈涅》中的底比斯國王克瑞翁。我在獄中讀過一些希臘古典戲劇，我發現這些戲劇意境很高。我從這些戲劇中學到的東西是這些人物的個性通過勇敢面對艱難環境得以證明，英雄就是在最艱難環境中仍然不屈服的男子漢。

當選中《安提戈涅》這個劇本時，我自愿報名參加演出，并請求扮演克瑞翁。克瑞翁是一個老國王，為了他所熱愛的城邦，他發動了一場爭奪王位的內戰。開始，克瑞翁是一個誠實的、愛國的國王，在他早期的講話中充滿著智慧。他認為，經驗是擔當領袖的基礎，對人民負責高于對個人的忠誠。

當然，直到一個人暴露出他的立場，他對人民的統治，以及法律的制定，你才能完全了解一個人，其中包括他的性格、處世原則和判斷力。經驗才是試金石。

但是，克瑞翁對他的敵人進行的鎮壓是殘酷無情的。他頒布命令，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呂尼克斯的尸體不能享受正常的葬禮，因為他發動了反對城邦的叛亂。安提戈涅基于比國家的法律更高的法律而違抗了克瑞翁的命令。克瑞翁不聽安提戈涅的話，也不聽別人的勸說，只服從他自己內心的邪念。他的固執和愚昧使他成了領袖，但作為一個領袖，必須把仁慈之心融入公正。安提戈涅正是我們事業的象征。她以自己的方式證明，她是一個自由戰士，因為她由于法律不公正而藐視法律。

72...

有的獄警開始同我們對話，而我則絕不主動與獄警對話。但是，如果他們問我什么問題，我將盡量作出回答。當一個人要學習的時候，對他進行教育是比較容易的。通常，提出這樣的問題往往帶有一種不滿的意味：“好，曼德拉，你到底要什么？”或“看，你頭頂上有房頂，并且有足夠的食物，你為什么找那么多麻煩？”這種情況下，我會平靜地向獄警說明我們的政策，目的是解除他們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神秘認識，消除他們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偏見。

1969年，島上來了一位年輕獄警，他似乎特別想了解我。我聽到謠傳，我們在監獄外面的人準備策劃幫我越獄逃跑，并且已經有一個內線獄警混進了羅本島，將為我提供幫助。這個人開始與我接頭，說他打算設法幫我逃跑。

他零零碎碎地把打算告訴了我：在某個夜間，他會用麻藥把燈塔內的獄警麻翻，以便使船靠岸。他會為我提供我們監管區的鑰匙，以便開門逃到船上去。在船上，我就可以穿上潛水衣，然后游到開普敦港。有人會把我從開普敦帶到當地的飛機場并逃往國外。

我聽完了他的全部計劃，但是，我當時沒有告訴他，這個計劃聽起來是多么牽強和不可靠。我與瓦爾特商量過此事，我們兩人都認為這個家伙不怎么靠得住。我絕不跟他說我不打算逃跑，但是，我也絕不采取對于實施這個計劃所必要的行動。他一定是有所覺察，因為，不久他就被從島上調走了。

實際上，我的懷疑是正確的。因為后來我們得知，那個獄警是國家安全局（BOSS）的一個偵探。國家安全局是南非的秘密情報部門，他們的陰謀是先把我從島上放走，然后，在我企圖逃離國境的時候由安全部隊把我擊斃。整個計劃都是由國家安全局制訂的，就連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計劃幫我越獄逃跑的謠言也是他們制造的。

監獄長的任期通常不超過三年，到1970年時，我們已經度過了好幾個三年。那一年，羅本島監獄長是范·阿德上校。他是一個非常友好、和善的人，他給了我們充分的行動自由。但是，那年年底，監獄當局決定改變島上的氣氛，任命皮特·巴登霍斯特上校為新監獄長。

這是一個不祥的兆頭。巴登霍斯特是全監獄管理人員中最野蠻、最專橫的官員之一。他的被任命證明了一件事：政府認為島上的管理太松懈，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鐵腕人物使我們就范。巴登霍斯特的任命甚至讓我們懷念起“小提包”管理我們的那些日子。

每當任命一個新監獄長的時候，我都要求見見他。我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他對我們的情況引起重視，同時也了解一下新監獄長的性格特點。于是，我要求見巴登霍斯特，但遭到了拒絕。他是第一個拒絕這種請求的監獄長。

我們見到他之前早就已經領教了他的管理手段。許多有關學習和自由時間的新規定立即被取消了。顯然，他想把我們通過多年努力才爭取到的權利收回去。老的監獄管理人員被紛紛調離羅本島，取而代之的是巴登霍斯特挑選的人。這些新獄警都是一些年輕而粗野的人，他們對瑣碎小事都加強了管理，目的就是讓我們煩惱，使我們的意志消沉。巴登霍斯特被任命后不幾天，我們的牢房就遭到了搜查，書籍和資料都被沒收，并且動不動就不給飯吃。就連去石料場的路上，也由獄警推推搡搡地押解著。

巴登霍斯特企圖把時間退回到20世紀60年代初，用那時島上的管理方式對付我們。對于我們提出的任何問題，答案始終是一個“不”字。要求見律師的囚犯反而遭到隔離關押，有任何不滿意見也統統不予理睬。有人來探視，有時會無緣無故地被隨意取消，伙食標準被降低，而審查措施則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巴登霍斯特來島上大約一周后，當我們正在石料場干活的時候，他和他的司機開著車來到了石料場。當時既沒有介紹，也沒有事先通知，他在遠處從車內走出來，開始考察我們勞動的情況。我們停下手里的活兒，看著我們的新監獄長。巴登霍斯特盯著我們高聲說：“曼德拉，Jy moet jou vinger uit jou gat trek（你必須把你的手指頭從你屁股里拔出來）。”我根本沒有在意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什么，并且連想都沒有想。我開始朝巴登霍斯特走去。他離我有一段距離，沒等我走到他跟前，他就鉆進指揮車跑掉了。

在車內，巴登霍斯特就通過無線電通信設備向獄警下達了命令，幾分鐘之內，一輛大卡車來到了石料場，把我們拉回了B監禁區。他們不許我們在車上說話，到了院子里，我們被命令下車并呈立正姿勢站在那里。巴登霍斯特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然后在我們面前來回地走動著。他似乎不吐臟字就不會說話。“Jou ma se moer”是他經常掛在嘴邊兒的話。“你母親是個moer。”moer是一個粗俗詞，在解剖學上指女人的隱私處。

他用粗啞的聲音告訴我們，他看見我們在石料場偷懶很生氣。他說，因此，他可以任意地降低我們的監禁級別。盡管我們藐視這種級別劃分，但是，多數人當時已經至少升到了C級。他們在C級就可以學習，D級囚犯則不準學習。監獄當局為給了我們學習的權利而感到后悔，巴登霍斯特決心糾正這個“錯誤”。

后來，我們的氣消了之后，我發現巴登霍斯特在石料場對我說的那句粗話是有預謀的。他一直想在羅本島恢復原來的管理秩序，一直試圖挑出他認為不服從管教的人。這就像一個教師，剛接過一個好鬧事的班級之后，總是企圖管教那個他認為是帶頭鬧事的學生。

73...

1971年5月末，有幾個西南非人民組織的人士被帶到了隔離關押區。當時，西南非人民組織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納米比亞爭取獨立的同盟組織，領導人就是該組織的締造者之一、勇敢的自由戰士安迪巴·托伊佛·杰·托伊佛。聽說他們正在為抗議對他們的隔離關押而開展絕食，我們立即決定參加這次行動。這使得巴登霍斯特及其監獄當局十分惱火，他認為這是公然不服從管教。

5月28日深夜，我們被喊叫聲和急促的敲門聲驚醒。“起來！起來！”獄警們喊叫著。我們被命令脫光衣服，排著隊面對院墻站著。獄警們顯然是喝醉了，對我們又是叫喊又是辱罵。他們的頭兒是一個名叫佛利的虐待狂，我們私下里都叫他“土匪”。

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們呈立正姿勢赤身裸體地站在那里達一個小時之久，直凍得瑟瑟發抖。在這期間，我們的牢房被挨個搜查了一遍，獄警不住嘴地辱罵。一個小時即將結束的時候，戈萬感覺胸部劇烈疼痛，很快就昏了過去。這似乎讓佛利感到有點兒害怕，他趕緊吩咐我們回到我們的牢房。

獄警們對我們的牢房上上下下地搜查了一遍，卻什么也沒有搜查到。但是，這次搜查似乎僅僅是佛利虐待狂發作的一個借口。隨后我們才知道，他在普通犯人監禁區以虐待狂而名聲掃地。第二天，我們發現這伙獄警在來我們監禁區之前毆打了幾名普通犯人，后來，他們又襲擊了杰·托伊佛。托伊佛進行了還擊，把一個毆打他的獄警擊倒在地。為此，托伊佛受到了嚴厲的懲罰。

我們對獄警的虐待正式提出了抗議，但是，監獄當局沒有理睬我們的意見。這個經歷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之中。但是，這種經歷絕對不止一次，像這樣的事情，在巴登霍斯特的指揮下是常有的事。

我們決心不能讓巴登霍斯特如此肆意妄為下去。我們偷偷給島外的人傳信，讓他們做工作以解除他的職務。同時，我們決心在自己內部組成一個代表團去見巴登霍斯特。我們商量了幾個月的時間，最后決定了代表團的組成人員：瓦爾特和我代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其他黨派也各派兩名代表參加。

巴登霍斯特同意見我們。我們要求他改變工作方式，恢復我們被他取消的許多權利，不然我們就要停止工作、消極怠工、絕食，甚至使用手邊可用的武器。他說，他會考慮我們所提的要求。我們認為，這次同他見面為我們贏得了先機。因為，他對我們所作的努力已經有所察覺，知道我們已經把抱怨意見告訴了監獄外面的人民大眾。這些努力很快就產生了效果。

幾周后，我們意識到將有重要人物來探視。因為，那天是個雨天，我們正在石料場干活，監獄當局一反常態地允許我們避雨休息。第二天，我們被告知，三位大法官將來羅本島。當局要求我們指定一個人代表大家反映意見。于是，大家選我當他們的發言人。

當我在為會見三個法官作準備的時候，有可靠消息告訴我，普通監禁區的一名囚犯遭到了一個獄警的毒打。我決定把這個情況反映給三位法官。三位法官是最高法院開普地區分院的簡·斯特恩、M. E.賽倫和邁克爾·科貝特。他們上有監獄管理局局長斯特恩將軍的護送，下有巴登霍斯特的陪同。那天，我在我們干活兒的地方與三位法官見了面。

斯特恩將軍把我介紹給了三位法官，并解釋說，我是被大家選舉出來代表其他囚犯反映意見的。于是三位法官說，那說明我必須與他們私下交談。我回答說，我沒有什么事情需要藏著掖著的，我們歡迎斯特恩將軍和巴登霍斯特上校參加我們的會見。我能看得出，他們對我的話感到吃驚。我補充說，他們有機會回答我們的問題這是最好不過的。三位法官不情愿地默認了我的意見。

我開始逐項列舉最近在普通監禁區發生的獄警毆打囚犯的事件。我告訴他們，我已經了解了這些事件的真相、毆打囚犯的兇狠程度，他們對犯罪事實做了手腳。我剛一開始說話，就發現巴登霍斯特不怎么自在，老是在那里動來動去。當我說完打人事件的時候，他粗暴而咄咄逼人地突然插嘴說：“這個打人事件是你親眼看見的嗎？”我冷靜地回答說，我沒有親眼看見，但是，我相信告訴我這件事的人。他哼了一聲，用手指著我的臉說：“曼德拉，你要當心。如果你談論你沒有親眼看見的事情，你就是在自找麻煩。我的意思你是知道的。”

我沒有理會巴登霍斯特，而是回頭向三位法官說：“先生們，你們可以自己看看，我們所面對的這位身為監獄長的人到底是怎樣的人。如果他能在這里當著你們的面威脅我，那么，你們可以想象，你們不在這里的時候他將會干些什么。”科貝特法官回頭對另外兩位法官說：“這個囚犯說的話是十分在理的。”

我用剩余下來的時間就我們的伙食、學習方面的意見一一向法官作了反映。巴登霍斯特心里一定一直在生氣，而表面上，他似乎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緒。在會見結束的時候，三位法官向我表示了感謝，我也向他們說了聲“再見”。

對于法官在會見后說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不過，在隨后的幾個月中，巴登霍斯特似乎有所收斂，他不再像過去那樣蠻橫。三位法官會見我們之后不到三個月，我們就聽說巴登霍斯特即將被調離羅本島。

在巴登霍斯特離任前幾天，我被叫到了監獄長辦公室。當時，斯特恩將軍正在島上視察，想聽聽我們是否還有抱怨意見。當我一項一項地提出我們的要求時，巴登霍斯特就在現場。當我反映完我們的意見的時候，巴登霍斯特直接對我說，他將離開羅本島，并補充說：“我只能祝你們好運了。”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是否看上去被驚呆了，但是，我非常高興。他說了人話，顯示了我們以前從來沒見過的一面。我感謝他的好意，并祝他在事業中也有好運。

后來，好長時間我都在思考這一個時刻。巴登霍斯特可能是我們在羅本島上碰到的最無情、最野蠻的一個監獄長。但是，那天在辦公室里，他暴露了他的本性中還有另一個側面，這個側面雖然不怎么明顯，但是，它確實還存在著。這對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好的啟示，即使是似乎最冷血的人，有時也會有一顆寬容的心。如果觸動到他們的心弦，他們也能有所改變。歸根結底，巴登霍斯特并不邪惡，他的野蠻是由于野蠻的社會制度造成的。他行事如殘暴之人，只因他因自己的野蠻行為而得到了獎勵。

74...

據了解，威廉姆斯上校將接替巴登霍斯特上校擔任監獄長。威廉姆斯上任后，我就要求見他，并且在他來島上不久就見到了他。盡管他顯然不是一個進步人士，但是，他待人客氣、通情達理，與他的前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我們希望，巴登霍斯特任期的結束將成為我們環境條件穩定改善曲線上的一個起點。

那些野蠻的年輕獄警也與巴登霍斯特一起離開了羅本島，我們不久就又恢復了我們以前在石料場和監禁區內的正常生活。威廉姆斯可能一直就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但是，當他看到我們在石料場說話的時間比干活的時間還要長的時候，他也感到不怎么高興。

他來島上只有幾周后，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曼德拉，”他真誠地說，“你必須幫幫我。”我問他讓我幫他做什么。“你們的人不干活兒，他們不聽吩咐，只干自己想干的事。這里是監獄，必須講紀律性。講紀律不僅對我們有好處，對你們也有好處。我們必須要有規矩，不然他們將召回像前任監獄長那樣的人來管理你們。”

上校的一番話是有道理的。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并告訴他，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不過，我在答復前需要與我們的人商量一下。那時候，把單個牢房里的所有囚犯都召集起來開會顯然是不允許的。通過請求他允許我們召開這樣的會議，我要求他放寬規定。就像我所了解的那樣，他也知道這個情況，他需要一些時間對這個問題進行考慮。

幾天之內，我就接到了威廉姆斯的回話，他允許我們召開會議。一天下午，我們大家都集中在院子里，也沒有獄警監視我們。我把威廉姆斯的話告訴了大家，我們認識到，通過現在讓一點步，我們最終會使我們的環境條件得到改善。我決定，至少我們要像干活兒的樣子。不過，不管干什么活兒，快慢必須適當。從此之后，我們說到做到，因此，我們再也沒聽見監獄長對我們有什么抱怨。

在威廉姆斯任監獄長的初期，也就是說，在1971年至1972年期間，不斷有被抓的民族長矛軍戰士被關進羅本島。這些人都經歷過戰斗，對國外的運動情況非常了解。雖然我對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被關進監獄感到很難過，但是，他們到來后，我渴望聽他們的匯報，我特別想知道奧利佛的消息和訓練營的情況，以及民族長矛軍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

這些人雖然戰斗力特別強，但他們對監獄生活還很不習慣，其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吉米·阿普里爾。他是曾經在喬·斯洛沃的帶領下接受過軍事訓練的民族長矛軍軍官，并曾經在羅得西亞與敵人戰斗過。民族長矛軍用假身份證慢慢地滲透回國內，而吉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南非被捕的。

吉米給我們講述了他們經歷的戰爭故事，但是，我也悄悄地向他打聽過民族長矛軍存在的問題。因為我是民族長矛軍的締造者，也是民族長矛軍的第一任司令，吉米和其他人對我要比對其他人更坦率一些。他告訴了我一些軍營中不盡如人意的事情以及民族長矛軍軍官濫用權力的問題。我要他對這些問題保守秘密，我則設法給奧利佛去信，建議對軍隊進行改革。

有一天，我正在監獄長辦公室里會見威廉姆斯上校時，我看見吉米在另一個官員的辦公室的外面。他激動地對我說：“他們扣押了我的信。”

“為什么？”我問道。

“他們說里面有不準許讓我看的內容。”他說。我走進了那個官員的辦公室協商此事，但是沒等我開口，吉米就魯莽地沖進了辦公室，大聲對那個官員說：“把信給我！”吉米把我推到一邊，沖到那個官員的辦公桌前，想自己去拿那封信。這時，那個官員拿起那封信躲在了我的身后，似乎害怕吉米襲擊他。這在電影中可能是充滿喜劇色彩的一幕，但是，當時卻有點兒令人氣憤。我回頭嚴肅而堅定地對吉米說：“不要這樣，冷靜下來。我會幫你解決這個問題，設法讓你拿到信。現在，請你先離開。”

我的話起到了預想的效果，吉米離開了辦公室。然后，我轉身走到那個官員面前，他似乎特別生氣。我所處的位置使我感到左右為難。我不準備與監獄當局進行對抗，而是想在我自己的人和我與之長期斗爭的人之間盡量斡旋。剛剛來到島上的那些人的好戰性越來越頻繁地讓我陷入這種兩難之境。他們的激進情緒在鼓舞我們的同時，也會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更多的麻煩。

一周內，那位官員把吉米的信交給了我。

75...

一天上午，我們沒有去石料場，而是被吩咐登上了一輛大卡車。卡車拉著我們朝一個新的方向駛去，15分鐘后，我們被吩咐從卡車上跳下來。在我們面前的晨光中，我們看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巖石海岸在遠處閃閃發光，看到了開普敦那一幢幢玻璃幕墻的大廈。我們知道那必定是一種幻覺，這座背靠赫然聳立的桌山的城市看上去離我們出奇的近，似乎伸手就能摸得到。

一位地位較高的獄警告訴我們，我們是來海邊拾海草的。他讓我們把沖到沙灘上的大海草撿起來，并且把粘在巖石或珊瑚上的海草拽下來。海草本身又細又長，并且呈深綠色。有的海草有6——8英尺長，有30磅重。我們把海草從淺水中撈出，然后把它們一排排地晾在海灘上，最后再把它們裝在卡車的車廂里。有人告訴我們，這些海草當時是運往日本，在日本，這些海草可以用作肥料。

那天，我們感覺這個工作似乎并不累，但是，干了幾個星期、幾個月后，我們發現這個工作也并不十分輕松。這倒沒有關系，因為我們可以從眼前這種生動的景色中找到樂趣。我們眼望著一艘艘輪船在海面上航行，油輪在遠處緩緩地移動，海鷗從海中捕魚，海豹在浪花中騰躍。一群企鵝惹得我們大笑了一通，它們就像一伙笨拙的、走路姿勢十分難看的士兵。我們對桌山上空一日多變的天氣感到驚奇，一會兒陰云滿天，一會兒又晴空萬里。

夏天，海水讓人感覺是神奇美麗的。但到了冬天，本格拉寒流使那里的海水變成了驚濤駭浪。岸邊的巖石被海水擊打得凹凸不平，我們的腿常常在工作中被擦傷。盡管我們并沒有在那里干多長時間，但是，我寧愿在海邊撿海草也不愿去石料場挖石灰石。

大西洋就是一個聚寶箱。我撿到了漂亮的珊瑚和貝殼，我有時也把這些漂亮的珊瑚和貝殼帶回到我的牢房里。有一次，有人在沙灘上撿到了一瓶葡萄酒，瓶蓋仍然完好無損。有人說，這種葡萄酒喝起來味道像是醋。泛非大會的杰夫·馬塞莫拉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藝術家和雕塑家，當局讓他收集漂流的木塊，他把這些木塊雕刻成了神奇的藝術品，獄警都愿意花錢購買這些藝術品。他為我做了個書架，后來我使用了好多年。而監獄當局則告訴來島上訪問的人，那個書架是他們為我提供的。

海邊的氣氛比石料場的氣氛更令人放松。我們也喜歡海邊，因為我們在海邊吃得特別好。每天上午我們去海邊的時候，總是帶上一大鐵桶清水。后來，我們又增加了一個鐵桶，就用鐵桶當羅本島上的海鮮燉鍋，可以撿蛤蜊、貝類燉著吃。我們也抓龍蝦，龍蝦往往藏在石縫里。抓龍蝦是個技術活兒，必須緊緊抓住龍蝦的頭部與尾部的中間，不然，它就會蠕動著逃之夭夭。

鮑魚，我們稱它為“perlemoen”，是我最喜歡吃的海鮮。鮑魚是軟體動物，它緊緊地貼在巖石上，必須把它撬下來才行。鮑魚很難對付，把它的硬殼打開并不容易，如果稍一煮過頭，它將變得很硬，無法下口。

我們把抓到的海鮮放在第二個鐵桶中，維爾頓·穆夸毅是我們的廚師，由他負責烹調海鮮。海鮮做好了的時候，獄警們就和我們一起分享，大家坐在海灘上享受豐盛的野炊。1973年，在我們偷偷搞到的報紙上，我們看到關于安妮公主與馬克·菲利普舉行婚禮的消息，詳細報道了婚宴的盛況。菜單上有貝類、龍蝦和鮑魚，這讓我們十分高興，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吃這些美味。

一天下午，我們正坐在沙灘上吃我們的燉海鮮，這時，特布蘭奇中尉忽然走了過來，他當時是監獄長。我們假裝在工作，但是，我們沒能瞞過他，他很快就發現了在火上燉得滾開的一鍋鮮貝。中尉打開桶蓋，看了看桶內的海鮮。然后，他撈起了一個鮮貝吃起來，嘴里說著“smaaklik”。這是一句南非荷蘭語，意思是“好吃”。

76...

在斗爭中，羅本島被大家認為是一座“大學”。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從書本上所學到的東西，或因為囚犯學習英語、南非荷蘭語、藝術、地理和數學，或因為有那么多人，像比利·奈爾、阿邁德·卡特拉達、麥克·丁加克和艾迪·丹尼爾斯獲得了多個學位。羅本島之所以被大家認為是一座“大學”，是因為我們可以互相學習。我們自己教自己，我們有自己的教授、自己的課程、自己的教材。我們還對正式的理論學習和非正式的政治學習進行了區分。

我們這所大學部分地是在需要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當年輕人來到島上的時候，我們發現他們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歷史知道得很少。瓦爾特可能是最偉大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歷史學家，他開始給他們講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的起源和早期歷史。他的教學方法很科學，也很容易理解。這種非正式的歷史知識經過最高組織機關編撰，逐漸形成了一種學習教材。這部教材叫做《教學大綱A》，涵蓋了關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和解放斗爭的材料，可以學習兩年。《教學大綱A》還包括由凱西講授的“印度人斗爭史”，另有一位同志還在這個大綱中增加了有色人的歷史，麥克曾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學習過，他就給大家講馬克思主義。

當然，教學條件不太理想。大家按學習小組在石料場工作，大家圍成一圈，把主講人圍在中間。教學風格從本質上講是蘇格拉底式的，思想和理論通過主講邊問邊答給大家講得又深又透。

我們整個教學的核心材料是瓦爾特的教材。到島上來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年輕會員對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就存在的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知道得太少，于是，瓦爾特就帶領他們學習了從1912年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創建以來的全部歷史。對于這些年輕人中的許多人來說，這是他們所接受到的唯一的政治教育。

由于這些教材逐漸被普通監禁區的人所了解，普通監禁區的同事們開始向我們索要這種教材。從此之后，這種教材也成為適合普通監禁區的囚犯學習的教材。教師把演講材料偷偷地傳給他們，而他們再把問題和評論偷偷地傳回到教師手中。

這不但對我們有好處，而且對他們也有好處。這些人幾乎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但是，他們都很了解世道的艱難。他們所關心的是實際問題，而不是哲學問題。如果有一個演講材料講到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他們就會問：“是的，但在實踐中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有地沒有錢，而我的朋友則有錢沒有地，我們兩人誰的需求更大些？”這種問題提得很有價值，能夠迫使我們對自己的觀點進行認真思考。

我給大家講了幾年的政治經濟學。在講課時，我總是試圖講述經濟從最古老的時代到現代社會的演變，讓大家大概知道原始社會向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程。我絕不是一個學者，也不擅長當教師，我一般喜歡讓大家提問題，并不僅僅是作講演。我的教學方法并不屬于哪個思想體系，但是，它有社會主義的傾向，我認為社會主義是當時人類經濟生活最先進的階段。

我除了進行非正式學習之外，仍然繼續做法律工作。我有時想在我的牢房外掛上一個牌子，因為每周我都要花費許多時間為其他囚犯寫申訴書。盡管根據監獄服刑規定，這是不允許的，但有各種不同的政治想法的囚犯都想得到我的幫助。

南非法律沒有給辯護人進行法律陳述的權利，由于缺少這種陳述，每年有成千上萬的窮人被關進了監獄。很少有非洲人能雇得起律師，他們絕大多數除了接受法院的判決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普通犯人監禁區的許多人都是沒有辯護就被判了刑。有的人找我為他們寫申訴書，他們大多數都是第一次與律師接觸。

我收到了一個悄悄從F區或G區的一名囚犯那里傳來的紙條，請求我提供幫助。我當時需要了解有關案子、起訴、證人和證詞方面的詳細情況。由于彼此之間的交流需要偷偷摸摸地進行，信息傳遞得很慢，并且是零零星星地傳遞。在“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只需要不超過半小時的咨詢，而在島上則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

我建議我的“當事人”給最高法院的注冊官寫信，要求提供一份案情記錄。我告訴那個囚犯，向注冊官說明自己沒有錢，希望能免費提供。有時，注冊官會大發慈悲，免費為當事人提供這些材料。

得到這些案情記錄后，我就立即整理出一份申訴書。通常，我寫的申訴都是根據法律上的反常現象提出的，例如，偏見、程序不正確、證據不足等。我親筆給法官寫了信，然后，把信傳到普通犯人監禁區。因為給另一個人寫申訴書違反監獄規定，因此，我就讓“當事人”自己抄寫一遍，如果他不會寫字，我就讓他找一個會寫字的人代他抄寫。事實上，許多囚犯都不會寫字。

我為能通過這種方式保持自己的法律知識不被荒廢而感到高興。在我幫助申訴的幾個案件中，有的判決被推翻，有的被減了刑。這些小小的勝利令人感到欣慰和滿意。監獄當局人為地讓一個人感到無能為力，這也是改變這個制度的原因之一。我常常見不到我為他提供法律幫助的人，有時候，有人出乎意料地請我吃午飯，并低聲向我表示感謝，因為我幫了他的忙。

77...

那時，對我夫人的迫害并沒有停止。1972年，安全警察踢開了奧蘭多西8115號的大門。他們把磚頭從窗子扔進了房內，并朝著前門開槍射擊。1974年，溫妮被指控違反了對她的禁止令，因為當時除了孩子和她的醫生之外，不準有任何其他人與她來往。她當時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在她吃午飯期間，有一位朋友帶著澤尼和津澤去看她。為此，溫妮受到指控并被判處6個月的監禁。她被關在奧蘭治自由邦的克龍斯塔監獄，但是，她在那里的經歷倒是沒有她上次在比勒陀利亞監獄時那樣可怕。溫妮給我寫信說，這次她在監獄里感覺自由了些，這更讓她堅定了獻身于斗爭事業的信心。當局允許津澤和澤尼在禮拜天去探視她。

當溫妮在1975年被釋放的時候，我們通過書信和其他方式與我們的律師聯系，制訂了一個讓我同津澤見面的計劃。監獄規定，不準年齡在2歲至16歲的孩子探視囚犯。在我去羅本島的時候，我的子女都在法定禁止探監的年齡段之內。這個規定背后的推理倒算不上惡毒：制定法律的人認為，探監會對兒童敏感的心靈產生負面影響。但是，對囚犯的影響可能也是同樣有害的：不能看到自己的子女正是一個悲傷的源泉。

1975年，津澤已經15歲了。我們計劃讓她母親更改她的出生證，證明她是16歲而不是15歲，這樣她就能來監獄里看我。對于非洲人，出生記錄檔案的保管并不統一和規范，溫妮更改出生證以證明津澤早一年出生并不困難。她提出了申請，并很快得到了批準。

在津澤計劃12月份來探視我的幾周前，我有一個早就安排定的探視，即溫妮的母親。當我在探視區隔著玻璃與她會面的時候，我對她說：“媽，我非常高興，因為我不久就能見到津澤了。”我岳母以前當過教員，她當時對此有些吃驚，并且怒氣沖沖地說：“不，津澤不能來看你，因為她還不到16歲。”

我立即意識到，還沒有人把我們精心策劃的計劃告訴她。我們身后各有一個獄警監視著我們，所以我決定，對她所說的話僅僅予以搪塞了事。于是，我含含糊糊地說：“哦，那好，媽，沒事。”

但是，我岳母是一個倔強的人，她不想讓這件事就此罷休。“好，Mkonyanisi（這是科薩語中對‘女婿’的愛稱，她總是這樣稱呼我），你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津澤只有15歲。”

我瞪大眼睛讓她警惕，她一定是知道了我向她傳遞的信息，因為她再也沒提津澤的事。

自從津澤3歲之后，我就再也沒見過她。她也是通過一張舊照片而不是通過記憶才認識她爸爸的。那天我穿上了一件新襯衣，在衣著上比平日多下了一番工夫。這是我自己的虛榮心使然，但是，為了我最小的女兒，我不想讓自己看上去像一個老人。

我一年多沒有見到溫妮了，看到她很好我感到很高興。我看到最小的女兒已經長成漂亮的女人，并且長得那么像她母親，我感到更加高興。

一開始，津澤有些害羞和猶豫。我相信，她最終看到她不真正熟悉的、只能從遠方愛她的、似乎不屬于她而是屬于人民的這個父親是不好受的。在內心深處，她一定對她父親感到怨恨和生氣，因為她的父親在她童年和少年期間沒在她身邊呵護她。我能立即看出，像她自己的母親在她這個年齡時一樣，她也是一個自強不息而充滿激情的年輕女人。

我知道她肯定感覺很不舒服，于是，我盡量使氣氛緩和下來。當她到來的時候，我對她說：“你見到我的貼身警衛了嗎？”我的意思是指隨時隨地跟在我身后的獄警。我詢問了她的生活、學習情況，以及她的朋友等方面的情況，然后我試圖把她帶回到過去的日子。對于那些日子，她幾乎不記得了。我告訴她，我經常回憶起在家中度過的那些禮拜天上午，那時候，媽媽在廚房里做飯，我把她放在我的腿上逗著她玩。我記得當她還是一個嬰兒的時候，在奧蘭多發生過一次次小小的事故和危險，那時候，她雖然很小，但她卻很少哭鬧。透過玻璃，我能看見她在說話的時候盡量設法控制自己，強忍住就要流出的眼淚。

這次探望使我得到了一個悲痛的消息，溫妮告訴我，布拉姆·費希爾出獄不久就得癌癥去世了。布拉姆的去世使我非常難過。盡管政府沒有直接對布拉姆下毒手，但是，是政府對他的無情騷擾才使他最終得上了很快奪走他的生命的絕癥。甚至在他去世后，他們也仍然迫害他，政府竟然在他被火化后沒收了他的骨灰。

布拉姆是一個純粹主義者，利沃尼亞審判后，他決定通過轉入地下去過一種被剝奪了法律保護的人的生活，以便更好地為斗爭事業服務。他在法庭上所代表的許多人都走進了監獄，而他自己卻能自由自在地生活，這使他感到十分煩惱。在審判期間，我勸說布拉姆不要走這條路，并強調他在法庭上就是對斗爭的最大貢獻，因為在法庭上，人民可以看到一個南非白人法官主席的兒子正在為無權利的人獲得權利而戰斗。但是，他不愿意讓別人受苦受難而自己卻享受自由的生活。就像一個在前線與戰士們并肩戰斗的將軍一樣，布拉姆不愿意讓別人承擔他自己不愿意承擔的犧牲。

布拉姆在被保釋出獄后轉入了地下，并于1965年被捕。他因被指控犯有陰謀破壞罪而被判處終身監禁。我曾經在監獄中給他寫過信，但是，監獄里規定不準囚犯之間互相通信聯系。在他被診斷出得了癌癥之后，新聞媒體根據人道主義精神要求釋放他。新聞媒體的要求對政府產生了影響，當局把他從監獄里放了出來，并把他送到了布隆方丹他哥哥的家里，但他在布隆方丹期間仍然被軟禁。僅僅幾周后，他就與世長辭了。

這位奧蘭治河殖民地總理的孫子布拉姆·費希爾，以各種方式作出了偉大的犧牲。不管在追求自由過程中遇到什么困難，我總是能從他那里獲得力量，他始終同我的人民在一起，并且為了我的人民而戰斗。布拉姆是一個為了其他民族的自由而同他自己的人民進行斗爭的自由戰士。

這次探視一個月后，我收到了溫妮的信，她最近要求來監獄探視我的請求被當局以荒唐的理由拒絕了——當局說我不希望見溫妮。我立即去見普林斯中尉，他當時是監獄長，我向他提出了抗議。

普林斯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一個老練的人，當我去見他的時候，我心平氣和地說明了情況，一點也沒有生氣的意思。但是我說，像這樣的情況是無法接受的，必須允許我夫人前來探視。

普林斯似乎根本就沒有聽進去，當我說完后，他說：“曼德拉，你夫人只是想引起公眾注意。”我告訴他，我反對他的這種說法，還沒等我把話說完，他就對我的夫人出言不遜，這讓我立即發了火。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繞開他的辦公桌向他走去。普林斯開始退卻，但是，我又立即克制住了自己。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頓，但是，我沒有用拳頭教訓他，而是用語言狠狠地教訓了他一頓。我不是一個喜歡出言不遜的人，但是，那天我違反了自己的原則。我告訴他，他是一個不知廉恥的人，如果他再重復一次他所說的那些話，我那天絕對不會輕饒他。

我說完話后，立即氣沖沖地轉身走出了他的辦公室。我走的時候看見凱西和艾迪·丹尼爾斯站在外面，但是，當我走回我的牢房的時候，我與他們連招呼都沒打。盡管我讓普林斯閉了嘴，但是，他卻使我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我認為這是自己在對手面前打了一個大敗仗。

第二天吃過早飯后，兩名獄警來到了我的牢房，說讓我去監獄長辦公室。當我到了監獄長辦公室的時候，有六名武裝獄警圍住了我。普林斯中尉站在一邊，中間是個準尉，他是監獄的起訴官。當時，氣氛十分緊張。

“好啊，曼德拉，”起訴官說，“我聽說你昨天很得意，但是，今天你就不會那么高興了。我要指控你侮辱和威脅監獄長，你要知道，這是一個嚴厲的指控。”然后，他把指控書遞到了我的手上。

“你還有什么話要說嗎？”他問。

“不，”我回答說，“你可以與我的律師去說。”然后，我要求回我的牢房，普林斯一句話也沒有說。

我立即意識到自己應該做什么：起草一個反起訴書，指控從中尉到司法部部長都在濫用職權。我要控告整個監獄系統是一個種族歧視機構，這個系統企圖永遠保持白人的霸權地位。我要把這個案子辦成一個有轟動效應的案子，讓他們為開始起訴我而追悔莫及。

我請喬治·畢佐斯代表我打這場官司，并很快安排與他見了面。在喬治來探視之前，我告訴當局，我要向他提供書面說明。他們問我為什么，我坦率地說，我認為探視室安裝了竊聽設備。當時，監獄當局不允許我提交書面說明，我必須作口頭說明。我告訴他們，他們無權拒絕批準我的要求。事實上，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證明我的懷疑是正確的。

事實上，當局是在擔心喬治會把我寫的說明透露給媒體。這的確是我們斗爭策略的一部分。他們也擔心我通過喬治與在盧薩卡的奧利佛·塔博取得聯系，并認為書面說明會包含敏感的信息。我以前曾經通過喬治干過類似的事，但是，我這次寫的書面說明卻沒有包含這樣的信息。

島上開庭的日期確定了，并且從開普敦指定了一個地方法院來審理此案。在舉行聽證會的頭一天，我被告知，我的律師將在第二天到達，我可以隨便為他提供書面材料。第二天上午，我在監獄辦公室里見到了喬治，我們在開庭前簡要地進行了溝通。但是，沒等舉行聽證會，起訴官卻突然宣布監獄當局打算撤訴。法官把法槌一敲，宣布閉庭，然后唐唐突突地走出了法庭。喬治和我驚奇地互相看了一眼，互相慶祝這個顯而易見的勝利。我正想把書面材料收起來，這時，另一個準尉走了過來，他指著我的書面材料說：“把這些材料交給我。”

我拒絕把材料交給他，并說，這些材料是我與我的律師之間的機密。我把起訴官叫過來說：“請告訴這個人，這些材料是受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權利規定保護的，我不想把材料交給他。”起訴官說，你說得很對，但是，案子已經結束，法庭不再開庭，這個房子里唯一說了算的就是這個準尉。準尉從桌子上拿起了那些材料，我沒辦法制止他。我認為監獄當局之所以撤訴，僅僅是為了這些文件。正如他后來所發現的那樣，這些文件并沒有包含他們尚不知道的東西。

期望逃跑也許是可能的，然而，我在島上卻從來沒有考慮過逃跑。麥克·馬哈拉基和艾迪·丹尼爾斯都是勇敢而足智多謀的人，他們兩人總是在想辦法逃跑，并研究了逃跑的可能性。多數逃跑方案都太冒險，但是，這并沒有妨礙我們對這些方案進行考慮。

我們在預謀逃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杰夫·馬斯莫拉是我們的能工巧匠，他設法制作了一把能打開我們監禁區及其周圍所有的門的鑰匙。一天，一個獄警把鑰匙忘在我們走廊頭上那個辦公室的桌子上，杰夫拿了一塊肥皂，并把那把鑰匙印在了肥皂上。他通過這個在肥皂上印下來的鑰匙模型和一塊金屬板，用銼刀做了一把鑰匙。借助于這把鑰匙，我們就可以進入我們牢房后面的倉庫和隔離區。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的監禁區。不管怎么說，大海是羅本島周圍不可逾越的障礙。

1974年，麥克想出了一個逾越這個障礙的辦法。他剛剛去過開普敦的一家牙科診所，并發現那個牙科醫生與一個很著名的政治犯有姻親關系。這位牙科醫生很同情我們，他曾經堅持，不取下腳鐐就不給麥克治病。麥克還注意到，這位牙科醫生家二樓會客室的窗子外面就是一條小街道，因此，我們可以從那里逃跑。

麥克回來后，他與我們幾個人見了面，并催促我們與牙科醫生預約，我們這樣做了，并很快得知當局將安排麥克、維爾頓·穆夸毅、我本人和另一位囚犯在同一天去開普敦。我們三人都愿意逃跑，但是，當麥克與第四個人聯系的時候，他卻拒絕與我們一起走。我們對他的忠誠產生了懷疑，我擔心他知道了我們的逃跑計劃。

我們三人被用船送到了開普敦，然后在重兵押送下來到了牙科醫生的辦公室。我們三人都參加過軍事訓練，所以最有可能實施逃跑。麥克還帶了一把刀子，準備必要時派上用場。在牙科醫生的辦公室里，獄警首先把所有其他病人都清理出去。我們要求把腳鐐取下，在那位牙科醫生的幫助下，獄警把我們的腳鐐取了下來。

麥克把我們領到那扇窗子前，并向外指了指那條可供我們逃走的小街道。但是，他一看到那條街道，就立即擔心起來。我們處在開普敦的市中心，并且是正中午，而那條街道卻空無一人。而在他以前來這里的時候，街道上卻是行人不斷。“這是個圈套。”麥克低聲說。我也感覺事情有些不對頭。維爾頓非常生氣，他說麥克是在胡說八道。“馬迪巴，你害怕了？”他說。但是，我同意麥克的意見，不如我們三人索性讓醫生為我們徹底檢查一下我們的牙齒。那位牙科醫生對我們的到來感到奇怪，因為，我們的牙都沒有病。

當麥克在考慮最可行的逃跑計劃時，艾迪·丹尼爾斯想出了一個最富有想象力的逃跑計劃。在早些時候，飛機還不準飛越羅本島。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們發現不僅有飛機從我們的頭頂上飛過，而且有直升機在駛離海岸的油輪與海岸之間來回飛旋。艾迪帶著他的逃跑方案來到我的面前。他的這個方案就涉及了直升機，把直升機刷上南非軍用顏色，用它把我從島上接起來，然后飛到開普敦與我們有友好關系的外國大使館的房頂上，隨之在外國使館尋求庇護。我告訴艾迪，這個方案倒不錯，應該設法把這個方案傳給盧薩卡的奧利佛。艾迪確實設法把他的想法傳到了盧薩卡，但是，我們沒得到任何回音。

78...

在羅本島上，祝壽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沒有生日蛋糕和生日禮物，我們就湊一點兒食物，多給過生日的人一片面包或一杯咖啡。菲基勒·巴姆和我都是7月18日生人，我把圣誕節買的糖果省下一點兒，等我們兩人共同過生日時盡情分享。1968年，我的50歲生日靜悄悄地就過去了。但是，在1975年，當我滿57歲的時候，瓦爾特和凱西帶著他們的長期計劃來到了我的面前，他們要使我的60歲生日更讓人難以忘懷。

我們經常擔心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在人民面前保持斗爭的意志。在前幾十年里，政府封殺了絕大多數的激進媒體，并禁止刊登被禁止或被監禁的個人的言論或照片。若是給我或我的同事拍一次快照，一個編輯就可能被關進監獄，而且他的報紙也會被取締。

一天，凱西、瓦爾特和我正在院子里談話，他們建議我寫一寫自己的回憶錄。凱西認為，出版這本書的最佳時間是我的60歲生日這一天。瓦爾特說：“這樣一本書，如果寫得真實而公正，可以讓人民了解我們的戰斗歷程。”他還說：“同時，它將成為鼓舞年輕自由戰士斗志的源泉。”這個想法打動了我，在后來的討論中，我同意寫一本回憶錄。

當我決定干什么事情的時候，我總是喜歡說干就干。于是我很快就投入到了這項新的工程之中。我制訂了一個相當反常的工作計劃：在夜間寫作，而在白天睡覺。在開始的一兩周里，吃過晚飯后我先睡一小覺，到晚上10點鐘起來，然后一直寫到第二天吃早飯。在石料場干完活兒后，我會一直睡到吃晚飯，這樣周而復始地一直繼續下去。如此干了幾周后，我告訴監獄當局我身體不太好，無法去石料場勞動，他們似乎對此并不介意。從此之后，我就能在白天大部分時間睡覺。

我們創建了一條處理手稿的流水線，每天我把我寫好的稿子交給凱西，他看過后再交給瓦爾特。凱西會把修改意見寫在手稿的空白處，瓦爾特和凱西總是樂意給我提意見，我也很重視他們的意見，并總是按他們的意見進行修改。

被標注得密密麻麻的稿子傳遞給拉魯·奇巴后，他再花上一夜的時間把手稿轉換成幾乎是微型的速記稿，把十頁大紙轉換成一張小紙。設法把稿子偷偷地傳到島外則是麥克的工作。

很快，獄警們就產生了懷疑。他們走到麥克面前說：“曼德拉在干什么？他為什么夜間老是不睡覺？”麥克只是聳聳肩說不知道。我迅速地寫，僅用了4個月就完成了初稿。在措辭方面，我并沒有過多地斟酌。我的回憶錄涵蓋了從我出生到利沃尼亞審判的主要經歷，最后以羅本島的日記作為結尾。

我隨寫隨回憶我的經歷。在那些不眠之夜，當我默默地寫作的時候，我再一次回憶起我在庫努和穆克孜韋尼的情景、來約翰內斯堡之后的興奮和恐懼、青年團的風風雨雨、叛國審判的無休無止、利沃尼亞的轟動事件。它們就像是正在醒來的夢一樣，我盡量寫得簡單，盡量真實地用白紙黑字把它們表達出來。

麥克機智地把抄寫好的書稿藏在他用于學習的一捆記錄本內。只能用這個辦法才能使全部書稿瞞過監獄當局的眼睛，然后才能在1976年他被釋放時偷偷把書稿從監獄里帶出去。我們的安排是，當書稿被安全轉移到國外的時候，麥克會秘密通知我們，只有接到書稿已經被安全轉到國外的消息后，我們才能把原稿銷毀。同時，我們需要先把這部500頁的手稿進行妥善處理。我們認為，能夠采取的唯一辦法就是把手稿埋在院子的花園里。院子內的監視不很嚴密，并且是斷斷續續的，因為獄警們通常都是坐在北頭的一個辦公室里聊天。他們從辦公室里看不見與隔離關押區相鄰的南端，而在南端恰恰就有一個小花園。我早上散步的時候順便考察了一下那個小花園，我決定就把手稿埋在那里。

為了避免挖的坑太大，我們決定把手稿分成三份掩埋。我們分了兩個小包和一個大包，每個包都先用塑料布包裹起來，然后再放進空的可可容器里。這項工作必須盡快完成，于是，我請杰夫·馬塞莫拉準備挖坑工具。不幾天的工夫，我們就找到了幾根鋒利的鐵釬。

一天早上吃過早飯后，凱西、瓦爾特、艾迪·丹尼爾斯和我悄悄地來到院子南端的花園中。我們假裝在那里商量事情，每個人的襯衣下都藏了一部分手稿。我使了個眼色，我們立即彎下腰開始挖坑。我在中間挖，正位于一個通向排水管檢修井的井蓋附近。當挖到排水管的時候，我在排水管的下面挖了個洞，把三包中最大的那包手稿放在了洞內。他們三個人挖了兩個較淺的洞，把另外兩包手稿埋在了里面。

在大家就要排隊去石料場的時候，我們已經及時地把手稿掩埋好了。那天上午我走在路上，一直為手稿的安全藏匿而感到莫大的安慰。以后，我們再也不用為手稿的事擔心了。

幾周后的一天，我們剛剛被叫醒，就聽見院子里有一種使我不安的聲響，那是鎬頭和鐵鍬刨地的碰擊聲。當我們被允許從牢房里出來進行洗漱時，我走到走廊的頭上，設法向門外窺視。在院子南端，有一伙來自普通犯人監禁區的人正在干活。使我緊張的是，他們正在掩埋手稿的地方挖土。

監獄當局決定在隔離關押區前面壘一道墻，因為他們發現，被隔離關押的犯人能在院子里與我們聯系。這伙人是在挖一道淺溝，以便為壘墻打混凝土地基。

我一邊洗漱，一邊設法告訴瓦爾特和凱西關于外面挖溝的事情。凱西認為，那一大包手稿被埋在排水管底下，應該是安全的，但是，另外兩個小包卻有可能暴露。當早飯送到院子里的時候，負責看管那伙干活的人的獄警吩咐他們離開了院子。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防止他們與政治犯有任何親善的機會。

我端著飯碗把瓦爾特和凱西領到院子的南頭，假裝有什么私事需要商量。開挖的地基溝的一頭已經接近了那兩個小包。同時，艾迪·丹尼爾斯也來到我們跟前，他立即發現了這個問題。

只有一件事要做：盡量不露馬腳。于是，我們四人開始在掩埋兩小包書稿的位置上挖起來。我們設法以最快的速度把兩個小包挖出來，然后重新用土把兩個坑填好。要挽救埋在排水管下面的那一大包手稿，就需要更多的時間，但是，我們相信它不會被發現，因為當局不會為壘墻而把排水管移走。

我們把挖出來的書稿藏在我們的襯衣下，然后回到了我們的牢房。艾迪那天不去石料場，我們把兩包書稿交給了他，讓他盡快把它們銷毀。要做這件事，艾迪必然會冒著很大的危險。知道挽救了那兩包書稿后，我松了一口氣，并盡量在那天工作的時候不再去想那包仍然埋在地下的書稿。

當我那天下午從石料場回到牢房的時候，我并沒有像往常那樣去洗澡，而是直接走到院子的南頭。我盡量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我被我所見到的情景嚇了一大跳。那些囚犯已經平行著隔離關押區的墻挖好了地基溝，并真的把排水管給挖了出來。毫無疑問，他們已經發現了手稿。

我必須以某種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退回來或作出反應。當時我并不知道，我一直受到幾名獄警的監視。這些獄警后來說，我的反應證實我知道有什么東西藏在那里。我回到走廊里先去洗臉，并告訴瓦爾特和凱西，我懷疑書稿已經被發現了。還好，艾迪已經對另外兩包書稿進行了妥善處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監獄長召進了監獄辦公室。站在他身邊的是一位剛剛從比勒陀利亞來的高級監獄官員。監獄長直截了當地說：“曼德拉，我們發現了你的手稿。”

我沒有回答。然后，監獄長從他的辦公桌后面拿出一捆稿子。

“這是你的筆跡，對不對？”他說。我還是沒有開口。“曼德拉，”監獄長惱怒地說，“我知道這是你的書稿。”

“那好，”我回答說，“你必須提供證據。”

他嘲笑我的回答，并說，書稿空白處的批注是瓦爾特·西蘇陸和阿邁德·卡特拉達加上去的。我再一次指出，如果要興師問罪，他們必須提供證據。

“我們不需要證據，”監獄長說，“我們有證據。”

盡管那天沒有問罪，但是，不長時間之后，瓦爾特、凱西和我被召到監獄管理局副局長路易將軍面前。他告訴我們，我們在濫用學習權利，書寫非法書稿。因為這個罪過，我們的學習權利被無限期地剝奪了。結果，我們失去了學習權利長達四年之久。

麥克于12月份被釋放后，他把記錄本寄到了英格蘭。在南非被軟禁6個月后，他逃出了南非，首先去了盧薩卡，到那里去找奧利佛·塔博，然后又去了倫敦。他在倫敦住了6個月，并同一個打字員一起，重新對書稿進行了整理，最后形成了一份打印稿。然后，他又回到了盧薩卡，給了奧利佛一本。

從那之后就漸漸斷了消息。關于書稿的事，我從盧薩卡沒聽見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奧利佛對書稿做了些什么工作。盡管我在監獄里的時候，這個書稿并沒有出版，但是，卻為這本回憶錄打下了基礎。

79...

1976年，我接待了一個非同尋常的訪客：吉米·克魯格。他是國家監獄管理局局長，是總理內閣的重要成員。克魯格不僅對監獄的政策很有影響力，而且在政府對解放斗爭的處理方面也是一個關鍵人物。

我對他到來的原因多少有點兒了解。當時，政府正在大張旗鼓地推行其隔離發展政策和描繪“準獨立”國的藍圖。隔離發展政策的樣板就是我的侄子、恩人K. D.馬嘆茲瑪領導下的特蘭斯凱。當時，他已經成功地把幾乎所有的合法反對派都鎮壓了下去。我記得監獄長最近以嘲笑的方式對我說：“曼德拉，你應該回特蘭斯凱好好地休息休息。”

原來，這也正是吉米·克魯格的企圖。吉米身材不高，但很健壯，是一個非常直率的人。他并不像我想象中的一個內閣部長那么干練。我把這次與他見面當做反映我們的抱怨意見的又一次機會。一開始，他似乎在認真地聽取我所反映的意見。我首先提醒他，1969年我們曾經給他寫過一封信，但一直沒有聽到回音。他僅僅聳了聳肩，然后我又詳細地反映了島上的惡劣條件，并重申我們是政治犯，并不是刑事犯，應該按政治犯對待。但是，克魯格對此卻不以為然，說：“哼，你們都是共產黨暴徒。”

然后，我開始給他講我們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歷史，以及我們轉入暴力斗爭的原因。顯然，他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幾乎一無所知，他所知道的僅僅是右翼媒體關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反面宣傳。當我告訴他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歷史遠比國民黨的歷史長的時候，他竟然無言以對。我說，如果認為我們是共產黨人，那他應該再讀一讀《自由憲章》。他茫然地看著我。看來，他從來也沒有聽說過《自由憲章》。我發現一個內閣部長竟然如此閉目塞聽。是的，我不應該為此而感到驚奇，國民黨政客慣常于對那些他們并不懂的東西一概橫加譴責。

我提出了我們的釋放問題，并提醒他1914年發生的南非白人造反案。南非白人盡管在議會中有代表，并且也能召集會議甚至可以投票表決，但他們還是使用了暴力。即使是德·威特將軍和凱普將軍領導著12000人的武裝力量，攻城略地，造成了許多死亡，但他們兩人在被判處高級叛國罪之后不久就被釋放了。我還提到了勞貝·雷布朗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組建了地下組織，反對南非支持同盟軍，為此，他被判終身監禁，但不久也被釋放了。克魯格對他自己人民的歷史中的這些事件就像對《自由憲章》一樣，似乎一無所知。與那些沒有共同語言的人商討問題，無異于對牛彈琴。

克魯格把所有這些事實都擱置到一邊，他說：“那只不過是古老的歷史。”于是，他提了一個具體的建議。盡管他以粗暴著稱，但是，他卻以恭恭敬敬的態度提出了他的建議。他簡明扼要地說，如果我承認特蘭斯凱政府的合法性，并愿意搬到那里去居住，就可以大大縮短我的刑期。

我也恭恭敬敬地聽著，直到他把話講完。我說，首先我反對班圖斯坦政策，我不會給予支持；其次，我來自約翰內斯堡，我回去的地方也應該是約翰內斯堡。克魯格對我進行了勸說，但是，他并沒有成功。一個月后，他帶著同樣的建議又來到羅本島，我再一次拒絕了他的建議。這是一個只有叛徒才能接受的建議。

80...

盡管我們在收集新聞和情報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們對現實形勢的了解仍然是膚淺的。外界所發生的事件往往被我們首先聽到的傳聞所蒙蔽，只有隨后通過報紙報道或來島上探望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證實。

1976年6月，開始我們聽說國內發生了大動亂。這種謠傳稀奇而荒唐：索韋托的年輕人打敗了政府的軍隊，軍隊的士兵放下武器開了小差。直到第一批參加過6月16日暴動的年輕犯人于8月份來到羅本島的時候，我們才知道了真實情況。

1976年6月16日，15000名學生在索韋托集會，抗議政府關于中學要有一半班級必須在接受教育時使用南非荷蘭語的規定。學生們不愿意采用壓迫者的語言學習，教師也不愿意用壓迫者的語言教學，但家長和教師們的懇求和請愿都遭到了拒絕。于是，警察特遣隊與群情激奮的學生隊伍發生了對峙。警察沒有示警就開了槍，打死了年齡只有13歲的學生赫克托·彼得森和其他許多人。孩子們用棍棒和石塊進行反抗，接著就演變為群眾暴亂，有幾百名孩子傷亡，并且有兩名白人被用石頭砸死。

那天發生的事件震撼了南非的每一個村鎮。暴動又進一步在全國引發了騷亂和暴力活動。為政府暴力的殉難者舉行的集體葬禮變成了全國聯合行動的導火索。南非的年輕人突然爆發出前所未有的反抗精神，而學生們則在全國范圍內發起了聯合抵制運動。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組織者們加入了學生的抗議行列，積極支持學生的抗議活動。班圖教育制度弄得其發明者焦頭爛額，因為這些憤怒而勇敢的年輕人就是這種教育制度的受害者。

9月份，隔離關押區關押了幾位暴動中被逮捕的年輕人。通過在相鄰走廊中與他們低聲交談，我對所發生的真實情況有了一定了解。我的同志們和我都特別高興，似乎在20世紀60年代體現出來的這種群眾抗議精神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大爆發。在這些年輕人中，多數人都離開南非參加過我們的軍事行動，然后又悄悄地回到南非。他們數以千計地在坦桑尼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軍訓營中接受了軍事訓練。沒有什么事情比知道監獄外的人正在支持我們的事業更讓人歡欣鼓舞了，因為我們就是為了這個事業而被關進監獄的。

這些年輕人與我們以前見過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樣。他們勇敢、好斗，富有攻擊性；他們不守紀律，一有機會就喊“政權”。他們的天性就是好斗，而不是合作。監獄當局不知道如何對付他們，他們把羅本島攪了個底朝天。在利沃尼亞審判期間，我曾經對安全警察說過，如果政府本身不進行改革，將來取代我們的那些自由戰士總有一天會使得當局懷念我們。這一天真的在羅本島上到來了。

在這些年輕人中，我看到了時代所應有的那種狂熱的革命精神。事實上，我早就知道一些。幾個月前，我與溫妮見面的時候，她就用我們的語言代碼設法告訴我，有一個新興的對社會不滿的階級，他們富有戰斗精神，并信仰非洲主義。她說，他們正在改變斗爭的性質，我們應該注意他們。

這伙新囚犯對島上的惡劣條件感到吃驚，他們認為島上的環境是無法容忍的，他們不理解我們是如何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的。我告訴他們，應該了解一下1964年的羅本島，但是他們幾乎與懷疑監獄當局一樣地懷疑我們。他們對我們關于紀律性的要求不予理睬，認為我們的勸告是軟弱的、不果敢的表現。

顯然，他們認為我們這些曾在利沃尼亞受過審的人是溫和派。那么多年以來，我們一直被譴責為激進的革命分子，而現在卻被認為是溫和派，這是令人感到新奇但又不十分愉快的。我知道，我可以采取兩種方式：責備他們的粗野，或者聽聽他們要說什么。我還是選擇了后一種方式。

當這些人中有人來到我們監禁區的時候，例如南非學生組織的斯特里尼·穆德雷和黑人大會組織的薩特斯·庫珀，我要他們向我們提供有關他們的組織及其哲學的資料。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參加了斗爭，是什么東西對他們產生了激勵作用，他們對今后又有什么打算。

他們來到島上不久，監獄長就來找我，要我幫他一下忙，特別與這些年輕人談一談。他要我告訴他們，應該對自己進行約束，應該知道他們是在監獄里，要接受監獄的管教。我告訴他，我不想做這件事。如果我這樣做了，他們就會把我看成是壓迫者的幫兇。

這些人連監獄里的基本規定都拒絕遵守。有一天，我在監獄長辦公室里剛剛與監獄長談完話。當我與少校走出辦公室的時候，正好遇見一個年輕的囚犯，他正在那里與一位監獄管理人員交談。這位年輕人大概還不超過18歲，在高級監獄官員面前仍然戴著囚帽，這顯然違反了監獄的規定。當少校走過去的時候，他也沒站起來，這又違反了監獄的規定。

少校看了看他說：“請把帽子摘下來！”那個年輕囚犯沒有理睬。然后，少校生氣地說：“摘掉你的帽子！”那個年輕囚犯回頭看著少校說：“為什么？”

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為什么？”這樣的反問無疑具有反叛意味。少校似乎大吃一驚，但是，他還是對年輕人的反問作了回答。他說：“這是違反規定的。”那位年輕囚犯反駁說：“你們為什么有這樣的規定？制訂這個規定的目的是什么？”對于少校來說，囚犯提這樣的問題是無法容忍的，他生氣地跺著腳走出了那個房間，說：“曼德拉，你與他談一談。”但是，我不會管他的閑事，僅僅朝那個年輕囚犯點了點頭，讓他知道我站在他這一邊。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黑人覺醒運動組織接觸。隨著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和共產黨被取締，黑人覺醒運動幫助年輕人填補了真空。“黑人覺醒”與其說是一種運動，倒不如說是一種哲學思想，即黑人必須把自己從長達三個世紀的白人統治造成的自卑感中解放出來。只有這樣，非洲人民才能增強自己的信心，真正把自己從被壓迫狀態下解放出來。雖然黑人覺醒運動組織提倡建立一個非種族歧視的社會，但是，他們排斥白人在建設這樣的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

這種思想對我來說并不陌生，可以說與我在25年前創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時的思想十分相似。那時候，我們也是非洲主義者，我們也強調自尊心和自信心，我們也反對在斗爭中得到白人的幫助。從許多方面看，“黑人覺醒”集中體現了黑人對從來沒有消失的同樣的問題的一種相同的反應。

但是，正如我們已經超越了我們的青年團世界觀一樣，我相信這些年輕人也將會超越“黑人覺醒”思想的種種束縛。盡管我為他們的戰斗精神所鼓舞，但是我認為，他們以黑人為中心所體現的哲學思想是宗派主義的，它集中體現了一種不十分成熟的中間觀念。我認為，作為一個老一代政治領導人，我的作用可能會幫助他們樹立包容性更強的“大會運動”思想。我也知道，這些年輕人最終將會遇到挫折，因為“黑人覺醒”思想既沒有提供行動綱領，也沒有提供斗爭方式。

盡管我們把黑人覺醒運動組織階層作為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塊沃土，但是我們并不想吸收這些人作為我們組織的成員。我們知道，這樣會使他們和島上的其他黨派彼此之間的關系有所疏遠。我們的政策是對他們友好、熱情，并贊賞他們所取得的成績，而不是讓他們改變信仰。如果他們來到我們面前問：“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對班圖斯坦是什么政策？”“《自由憲章》關于民族化是怎么說的？”我們會向他們作出回答。他們也的確有許多人都來問過我們諸如此類的問題。

我個人也曾用偷偷遞條子的方式與他們中的某些人接觸過。我同來自特蘭斯凱的一些人交談過，并向他們詢問了有關我老家的一些問題。來到這個島上的這些人中，有的在斗爭中已經很出名。我聽到過關于帕特里克·“泰勒”（恐怖）·勒寇塔斗爭如何勇敢的報道。他是南非學生運動組織的一個領導人，我給他傳遞過一個歡迎他來羅本島的條子。

“恐怖”這個綽號來源于他在足球場上的威猛。不過，他的辯論能力也非常強。他不贊成他的一些同志存在的種族排他性思想，而是逐步接近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觀點。有一次，“恐怖”決定在島上參加我們的組織，但是，我們卻讓他很失望。不是我們不想要他，而是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會在普通監禁區造成緊張氣氛。

但是，“恐怖”絕不會以“不”字作為回答，反而公開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表示擁護。隨后不久，對他不滿的黑人覺醒運動成員用園丁叉襲擊了他。他被救治之后，監獄當局指控了襲擊他的那些人，并想把他們送上法庭。但是，為了和睦相處，我們勸說“恐怖”不要提起訴訟。他聽從了我們的勸說，并拒絕承認遭到過他們的襲擊。于是，這個案子就這樣被擱置了起來。我認為，這樣的審判正中監獄當局的下懷。我想讓這些年輕人知道，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就像一個巨大的“帳篷”，能夠容納許多持不同觀點和不同身份的人。

發生這件事之后，閘門似乎已經被打開，許多黑人覺醒運動組織的年輕人都決定加入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策劃襲擊“恐怖”的人。“恐怖”在普通犯人監禁區中上升到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的最上層，不久就開始向其他囚犯宣傳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像他這樣的人，他們的勇氣和眼光都可以證明，我們的觀點仍然是有說服力的，仍然在總體上代表了統一解放斗爭的最良好的愿望。

政治斗爭在F區和G區仍然在繼續。我們聽說，在普通犯人監禁區，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和黑人覺醒運動組織之間發生了沖突，有數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遭到了毆打。另外，一大批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被監獄當局指控，審判將在羅本島行政法庭進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從島外請了一位律師來處理這個案子。盡管我沒有親眼看見這次沖突，但是，我仍然被邀請作為人格證人參加審判。當然，這不是一個好差使。雖然我非常愿意為我們的同志提供證詞，但是，我不想采取會使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和黑人覺醒運動組織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擴大的任何行動。

我認為，我在監獄內的角色不僅僅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而且也是團結的促進者、忠誠的中間人以及和平的使者。我不愿意在這次爭端中袒護任何一方，甚至是我自己的組織。如果我代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作證，那將危及我在不同黨派之間進行協調的可能性。如果我要竭力維護團結，我就必須擔當起協調員的職責，盡管這可能會導致我自己的某些同事因此而疏遠我的后果。

因此，我決定不去作證。我的這個決定使我的一些同事感到失望，但是，我認為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到足以使他們產生不滿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必須讓黑人覺醒運動組織的年輕人明白，斗爭是不可分割的，我們有著共同的敵人。

81...

當局只顧對付這些年輕的“雄獅”，而或多或少地讓我們自己管理自己。我們在石料場進行的消極怠工已經進入了第二個年頭，我們要求徹底結束一切體力勞動。我們要求得到的權利就是，要做對我們的時代有用的事情，例如研究或學習一門手藝。我們甚至不想去石料場走走過場、裝裝樣子，但我們也僅僅是在我們自己的人中間談談而已。在1977年年初，監獄當局宣布結束體力勞動，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可以在監禁區打發我們的日子。他們為我們安排了一些在院子里干的活兒，但是，這不過是一塊掩蓋他們“宣布投降”的遮羞布。

這個勝利是我們不停地進行抗議和當局的后勤管理跟不上兩方面結合在一起產生的結果。監獄當局一般是每三個囚犯配備一名獄警。在索韋托事件的囚犯到來之前，獄警的人數就顯得不夠用，而富有造反精神的年輕學生來到島上之后，就需要更多的人對他們進行管理。他們是那么勇敢，似乎每個人都必須有一個專門的獄警才能應付得過來。如果我們都在自己的監禁區里，這樣就只需要較少的獄警。

對我們來說，體力勞動的結束是一種解放。現在我可以讀書、寫信，與我的同志們討論問題，或者處理法律文件。自由時間允許我去追尋我在羅本島養成的最大的業余愛好：收拾菜園和打網球。

要在監獄里存活下去，你必須要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滿足的辦法。你可以通過許多辦法去實現這種滿足，例如：洗衣服，使自己的衣服特別干凈；打掃走廊，使走廊上沒有一點兒灰塵；收拾自己的牢房，使自己的牢房盡可能有更大的空間。一個人在監獄外干大事會感到自豪，而在監獄內干小事同樣會感到滿足。

幾乎自從我在羅本島上開始服刑，我就要求監獄當局允許我在院子內開辟一個菜園子。幾年中，他們毫無理由地拒絕了我。不過，最終他們總算同意了，我在對面的墻根處開墾了一片狹長的小塊土地，搞了個小菜園。

院子內的土地非常干旱，而且有很多石塊。院子是用廢渣墊起來的，為了開辟菜園，我必須把大量的石塊挖出來，使植物有生長的空間。那時候，我的一些同志與我開玩笑，說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礦工，因為我白天在石料場挖石灰石，而業余時間又在院子內挖石頭。

監獄當局為我提供了種子。開始，我種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蔥，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第一茬收成不怎么好，但后來收成很快增加了。當局并沒有為允許我開辟這個小菜園而感到后悔，因為這個小菜園綠色滿園之后，我常常為獄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蔥。

雖然我一直喜歡種植蔬菜，但是直到我被關進監獄后我才能夠得到一小塊土地種植蔬菜。我第一次在菜園里種菜是在福特黑爾大學學習的時候。在那里，作為大學要求體力勞動的一部分，我曾經在我的教授的一個菜園里勞動過。作為腦力勞動的一種調節，我喜歡與土坷垃打交道。到了約翰內斯堡后，一開始是學習，然后是工作，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地方去施展我的園藝才能。

我開始訂購種植蔬菜和園藝方面的書籍。我學習了各種種植技術和施肥技術。但是，我沒有那么多書中介紹的材料，只能通過試驗并在一次次的失敗中學習種植技術。有一段時間我想種花生，用了不同的土壤和肥料，但是最終還是沒有成功。這是我遭遇的唯一一次失敗。

對我來說，種植蔬菜是監獄中為數不多的自己能說了算的事情之一。先是播種、觀察各種植物的生長，然后是照料植物，最后就是收獲。這樣的勞動過程可以提供一種簡單但是經久的滿足。作為這一小塊土地的主人，它為我提供了一點自由的感覺。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把菜園作為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象征。一位領導人也必須管理好自己的菜園，他也要播種、看護、耕作，最后才能去收獲。像一個園丁一樣，一個領導人必須對他所培育的東西擔負起責任。他必須關心自己的工作，要驅趕敵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東西、除掉不應保留的東西。

我給溫妮寫了兩封信，介紹一棵長得特別漂亮的番茄。我告訴她，我如何精心地侍弄它，從播種一直到長成一棵結出深紅色果實的大番茄樹。但是，后來不知出了什么差錯或缺乏護理，那棵番茄開始凋零、枯萎，而我對此卻毫無辦法。當它最終枯死的時候，我小心地把它從地里拔出來，洗干凈后“埋葬”在菜園的一個角落里。

我用很長的篇幅敘述了這個小故事，不知她是否讀懂了那封信。但是，當我寫那封信的時候，我有一種復雜的感情：我不想使我們之間的關系像那棵番茄一樣枯死，但是，我又感覺沒有能力培養我們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關系。對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時你是無力回天的。

結束人工勞動的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我的體重增加了。盡管我們在石料場很少干得滿身是汗，但是，來回步行去石料場足以使我保持著原來那修長的體形。

我一直認為，體育鍛煉不僅對身體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對心情平和也非常關鍵。以前，很多時候我只能通過擊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氣憤和驅趕煩惱。鍛煉能消除緊張，而緊張是心情平靜的敵人。我發現，當我身體狀況好的時候，我的工作也會好，而且腦子也好使。因此，鍛煉成為我生活中雷打不動的活動。在監獄里，有一種驅除煩惱的方式是絕對重要的。

就是在羅本島上，我仍然堅持我以前的拳擊訓練模式，從禮拜一到禮拜四，我堅持跑步和體能訓練，然后，休息三天。禮拜一到禮拜四早晨，我在牢房里跑45分鐘，然后做100個俯臥撐、200個仰臥起坐、50個下蹲運動和其他各種體能訓練活動。

在我給孩子的信中，我經常督促他們堅持做鍛煉，參加像籃球、足球或網球之類的快速體育活動。通過參加這些活動，就可以消除一切可能發生的煩惱。盡管我在督促我的孩子們堅持身體鍛煉方面不能算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仍然設法影響我那些更不愿意活動的同志去參加鍛煉。對于我這個年齡的非洲人，鍛煉身體通常不是能夠堅持下來的一種運動。經過一段時間之后，瓦爾特早上也開始在院子里跑上幾圈。我知道有些年輕同志看我在那里鍛煉，他們會自言自語地說：“如果那個老年人能鍛煉身體，我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們也開始鍛煉。

從一開始與監獄外的探視者和國際紅十字會的來訪者見面時，我就在強調為我們提供適當的鍛煉時間和設施的重要性。可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國際紅十字會的資助下，我們才得到了像網球和乒乓球臺這樣的運動設施。

在我們停止了石料場勞動的同時，一位獄警主張把我們的院子改造成一個網球場。院子的大小倒是正合適。于是，普通犯人監禁區的囚犯把水泥地面涂成綠色，然后，按照傳統網球場的樣子畫上白線。幾天后就拉起了球網，我們突然在前院里有了自己的溫布爾登球場。

我在福特黑爾大學讀書的時候打過幾次網球，但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網球手。我的正手相當有力，而反手卻比較弱。但是，我打網球是為了鍛煉身體，并不是為了追求風度。這是取代來回去石料場步行的最好的、唯一的一種運動方式。在我們監禁區中，我是第一批打網球的人之一。我是一位后場網球手，輕輕一抽就可以過網。

結束體力勞動后，我有了更多的讀書時間，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書現在都讀透了。當我所學的那幾門課程被取消的時候，我仍然在攻讀倫敦大學的法律學士學位。在利沃尼亞審判期間，我就開始攻讀這個學位，學習權利被剝奪了四年，這將毫無疑問地使我在攻讀這個學位時花費更長的時間。

但是，中止學習權利也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那就是使我閱讀了許多其他的書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學習權利，我就不會閱讀這么多的書。現在，我對小說也十分感興趣，而不是僅僅鉆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在羅本島上，并沒有供我隨便挑選書籍的圖書館。我們看了許多不易記憶的神話小說、偵探小說和少量達夫妮·杜穆里埃的著作。政治書籍是被禁止的，任何關于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書都是絕對不準讀的。要借閱一本書名里頭有“紅”這個字的書，哪怕是《小紅帽》，都會被審查官拒絕。盡管H. G.威爾斯寫的《星球大戰》是一本科幻小說，但也由于書名中有“大戰”二字而被拒絕。

開始，我想閱讀一些關于南非的書或由南非作家寫的書。我閱讀了納丁·戈迪默寫的所有當時未被禁止的小說，學到了大量有關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識。我還讀了許多美國小說，印象特別深的是約翰·斯坦貝克寫的《憤怒的葡萄》。我發現，該書中描寫的移民的困境與我們南非勞動人民的處境十分相似。

我多次反復閱讀過的一本書是托爾斯泰的巨著——《戰爭與和平》（盡管書名中有“戰爭”二字，但是，這本書卻允許閱讀）。我特別喜歡關于庫圖佐夫將軍的描寫，俄國宮廷中的每個人都低估了他。庫圖佐夫之所以打敗了拿破侖，正是因為他沒有被宮廷大臣們那種目光短淺的觀點所動搖，并在對他的將士和人民的深切理解的基礎上作出了自己的決定。這就又一次提醒我，一個人要想真正領導他的人民，那么他必須真正地了解他的人民。

82...

在索韋托學生暴動之后，我得知溫妮與我的老朋友恩塔托·莫特拉納醫生一起參與了“黑人父母聯合會”的活動。該聯合會是一個與當地專業人士和教會首腦有關的組織，他們對學生起到幫助和中間調解人的作用。當局像擔心年輕造反派一樣，對父母聯合會也十分擔心。8月份，學生暴動后不到兩個月，溫妮被依據《國內安全法》逮捕，并未經指控就被關進了約翰內斯堡的福特監獄。她在那里被關押了5個月。在這期間，我能給她和我的兩個女兒寫信，表示我對她們的支持和休戚與共的情感。對于她被關押，我感到非常苦惱，盡管這次她顯然沒有受到虐待。12月份被釋放后，她更堅決地投入到斗爭事業中去。

盡管被禁止活動，溫妮決心從哪兒跌倒還從哪兒站起來，當局為她在索韋托年輕激進分子中有那么高的知名度而感到吃驚。他們試圖削弱她的影響，并采取了厚顏無恥的行動：對她實行國內流放。1977年5月16日夜間，多輛警車、轎車和一輛卡車停在奧蘭多西我們的房子外面，他們把我們的家具和衣物裝上了卡車。這一次，溫妮并沒有被逮捕、拘留或審問，她被流放到自由邦的一個名叫布蘭德福特的小鎮上。我從凱西那里得知了詳細情況，而他是從一個來探視的叫辛杜的牧師那里聽到這個消息的。

布蘭德福特大約位于約翰內斯堡西南250英里處，在自由邦布隆方丹的正北面。經過長途跋涉之后，溫妮、津澤和她們的衣物都被扔在一座三間式鋅皮頂的鐵皮房子前面。這座房子位于布蘭德堡一個荒涼的非洲人居住的鄉鎮上，是一個非常貧窮、非常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生活在當地白人農場主的控制之下。溫妮感到驚恐不安，因為當地語言是塞索托語，溫妮不會講這種語言。

她的新處境使我感到悲傷和憤怒。當她在索韋托的家中的時候，我至少能想象她在廚房里做飯和在休閑室里閱讀的情景，我還能夠想象她在房內醒來時的身影。對我來說，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也是我感到安慰的源泉。在索韋托，即便是她被禁止活動，周圍也有朋友和親屬。而在布蘭德福特，她和津澤卻是孤立無援的。

我在去布隆方丹的路上走過那個鄉鎮，但是當時并沒有怎么注意它。在到處充滿了貧窮和荒涼的地方，也確實沒有什么可記憶的。當時我不知道布蘭德福特802號這個地址有一天對我來說會是如此的熟悉。我又一次感覺到，似乎溫妮和我同時都被關進了監獄。

通過溫妮的來信，我知道她們在布蘭德福特的生活是非常艱難的。她們沒有取暖設施，沒有衛生間，也沒有自來水。鄉鎮上沒有商店，而鎮上的小賣部對非洲顧客都是充滿敵意的。大多數白人講南非荷蘭話，并且十分保守。

溫妮和津澤一直處在警察的監視下，并且經常遭到他們的騷擾。幾個月內，津澤被安全警察的恐嚇攪得十分煩惱，但津澤并沒有遭到禁止。9月份，在溫妮的律師們的幫助下，我提交了一份緊急申請，要求禁止布蘭德福特的當地安全警察對我女兒進行騷擾。書面材料遞交給了法官，描述了警察闖入房間對津澤進行恐嚇的詳細情況。法官認為，津澤應該在安靜的狀態下接受探視者。

溫妮是一個適應能力很強的人。沒過多長時間，她就贏得了鎮上人們的好感，其中也包括周圍的一些有同情心的白人。她在“反饑餓組織”的幫助下向鎮上的人提供食物，還為鎮上的兒童興辦了一個托兒所，并募集資金，在很少有人見過醫生的地方建立起了一家診所。

1978年，澤尼與斯威士蘭的索布胡薩國王的兒子圖布姆茲王子結了婚。澤尼是我的第二年輕的女兒，也是我與溫妮生的第一個孩子。那時，他們兩個是在學校里認識的。由于身陷囹圄，我無法履行一個父親的傳統責任。按照我們的風俗，新娘的父親必須與沒過門的女婿談一次話，對他的前途作出評價。他還必須確定送多少聘禮，然后要新郎親自送到新娘的家中。在舉行婚禮的那一天，女方的父親必須把女兒交給新郎。盡管我對新郎沒有任何不放心的地方，但是，我請我的朋友和法律顧問喬治·畢佐斯代替我履行了父親的職責。我請喬治與王子談一下，問問他打算如何照顧我女兒。

喬治在他的辦公室里與王子見了面，然后安排在羅本島上與我商量此事。由于澤尼不到21歲，在法律上我必須同意她結婚才行。我在咨詢室與喬治見了面，他看見一個獄警和我在一起而感到吃驚。我解釋說，這是按規定辦事，因為這次被認為是家人探視，而不是一次法律訪談。我開玩笑地對喬治說，我沒有什么事情需要對我的警衛人員保守秘密。

喬治對我說，兩個孩子如何互相愛慕，我未來的女婿又是如何有前途，等等。他的父親索布胡薩國王是一個開明的傳統領袖，同時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當喬治轉告我新郎家所提的條件時，他不厭其煩地指出，新郎是斯威士蘭的王子。我讓喬治轉告新郎，他要娶的也是一位泰姆布的公主。

澤尼成為斯威士王室的成員有許多好處：她立即被授予了外交特權，可以隨便探視我。那年冬天，她與圖布姆茲結了婚之后，他們一起來看我，還帶著他們的新生女兒。由于王子的社會地位，我們被允許在咨詢室里相互見面，而沒有用那個用墻和玻璃隔離開的探視室。我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到來。

當他們走進咨詢室的時候，那確實是一個美妙的時刻，我站起身來，當澤尼看見我的時候，她把她的小女兒遞給丈夫，穿過咨詢室來擁抱我。自從她大約與她自己的女兒那么大之后，我就再也沒有抱過我這個已長大成人的女兒。這是一場令人激動的經歷，時間似乎就像科幻小說中過得那么快，轉眼之間，自己的孩子就已經長大成人了。然后，我又與我的女婿擁抱，他把我的小外孫女遞給我，在整個探視期間，我再也沒有把她放下過。用我一雙長期以來一直在握著鎬頭和鐵鍬的粗糙的大手托著那么脆弱、那么柔軟的新生嬰兒，是那么令人由衷地高興。我想，任何一個男子漢抱著一個嬰兒時，都不會比那天的我更高興。

那天見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讓我給小外孫女起個名字。在南非，由外祖父起名是一種風俗習慣。我給她起的名字是扎孜蔚，意思是“希望”。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我在監獄里那么多年從來沒有放棄過希望，現在，我也決不會放棄希望。我相信這個孩子將是南非新一代的組成部分，對他們來說，種族隔離將成為一種遙遠的記憶，這就是我的夢想。

83...

我不知道索韋托動亂之后到底是監獄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還是監獄外我的家庭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1976年以后的一兩年里，我一直處于朦朧、懷舊的心緒之中。在監獄里，一個人有許多時間回憶過去。可以說，記憶既是一個朋友，也是一個仇敵。我的記憶把我帶到了一個既大喜又大悲的時刻。我夢中的生活非常富有，我似乎在重新經歷過去的那些令人高興和令人悲傷的舊時光中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夜晚。

我做了一個揮之不去的噩夢。在夢中，我剛剛從監獄里放出來。不過，那個監獄并不是羅本島，而是在約翰內斯堡。我走到進入市區的大門之外，發現沒有人迎接我。事實上那里什么也沒有：沒有人，沒有汽車，也沒有出租車。然后，我開始步行去索韋托，我走了好幾個小時才到達奧蘭多西，然后轉彎來到了8115號，最后我看到了我的家。但是，那里卻是一座空房子，是一個鬼屋，所有的門和窗子都敞開著，但卻一個人也沒有。

不過，并不是我所有被釋放的美夢都是那么黑暗。1976年，我給溫妮寫信，向她訴說了一個比較愉快的夢：

2月24日夜里，我夢見開著車回到了8115號，發現房子里有許多青年人在跳搖擺舞和銀莫巴舞。我的突然到來使他們感到非常吃驚。有人熱情地向我打招呼，其他人則悄悄離去，我看見，臥室里同樣擠滿了家人和關系密切的朋友。你正在床上休息，馬卡托（我兒子）看上去很年輕，正面朝著墻躺在那里睡覺。

可能我在夢中回想起了1956年12月份那兩周的情景，當時馬卡托才6歲，我把馬庫魯（艾韋琳的母親）一個人留在家中。當時，馬卡托與他母親還住在奧蘭多西，但是，我回家前幾天，他來到了他姥姥的身邊，并睡在了我的床上。他非常想念我，睡在我的床上一定能多多少少地減少他對我的思念之情。

我在詳細敘述那些愉快時刻并感到幸福的同時，也為因我不在家經常給我的家庭帶來痛苦而感到懊悔。下面是我在1976年寫的另一封信：

當我2月25日早晨醒來的時候，我正在像往常一樣地深深思念著你和孩子們。這些天來，我有相當多的時間是在想念你們母子，也想念母親和親朋好友們。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如何一直在思念，并且實際上經常想象使你身心保持良好狀態的所有的一切，其中包括每天都要說的那些充滿深情的話和使別的女人灰心喪氣的那些令人惱火的事……我甚至還記得，有一天，當你正懷著津澤的時候，你在費力地修剪指甲。我現在滿懷羞愧地回想這些事情，對于這些事情，我本應該替你去做。不管我是否意識到了這些事情，我的看法是，我盡到了我的職責，第二個孩子就要出生了，現在由于你的身體狀況而面臨的一切困難都只能由你一個人承擔。我唯一的安慰是當時我所過的那種生活幾乎沒有足夠的時間讓我去想這些事情，也不知道我回去的時候，情況將會是個什么樣子……

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你美麗的照片仍然懸掛在我的左肩上方2英尺高的墻上，我每天早晨都仔細地把上面的灰塵拂去，這樣做能使我感到高興，就像以前我正在對你愛撫的感覺一樣。我甚至用我的鼻子去觸你的鼻子，以便重新感受過去每當我這樣做的時候在我的血液中產生的那種通電的感覺。諾利莎的照片正對著我在桌子上放著。當我得到這樣兩位漂亮的女士的脈脈注視的時候，我的情緒怎么會低落呢。

諾利莎不是我的家庭成員，但我一直保存著她的照片。我在1976年給我女兒津澤的信中透露了有關她的身世的秘密：

順便告訴你，你母親告訴過你關于我的牢房中那個來自安達曼群島的女士諾利莎的事情嗎？她曾一直與你、澤尼、恩丁迪、南迪、曼拉（后三位是我的孫子、孫女）、馬基和你母親做伴。這是你母親很少向你們提及的一件事，因為她在某些程度上把俾格米美女當做情敵了，幾乎不會懷疑我是從《國家地理》雜志上把她的照片裁下來的。

當我自由散步的時候，我不停地思念著那一天。我一遍又一遍地幻想著，自己可能做些什么。這是打發時間的一種最好的辦法。我于1976年再一次把這些白日夢寫在了紙上：

我希望能開著車拉著你進行一次很遠很遠的旅行，就像我在1958年6月12日所做的那樣。不同的是，這一次我更喜歡我們兩個單獨旅行。我離開你已經有那么長的時間，我回去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你離開那個令人窒息的環境，自由自在地開著車與你在一起，使你有機會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看一看南非的美麗景點，看一看那些綠草和樹木、鮮艷的野花、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在草原上吃草的動物，并能與沿途我們遇見的那些淳樸的村民聊聊天。我們的第一站就是你父母安息的地方。我希望，他們互相靠著靜靜地躺在那里。那樣，我就能向使我可以像現在這樣愉快而自由的人表示敬意。也許，這些年來我很想告訴你的這些故事就是從這里作為開始。這種氣氛可以使你的耳朵更靈敏，并使我把精力集中在吸引人、啟迪人和有建設性的那些方面。然后，我們就停下來，然后接著去穆帕卡尼斯瓦和諾塞凱尼（我的父母）居住的地方，那里的環境也是同樣美好。我相信，當我駕車回到8115號的時候，我們的精神將更加飽滿，意志將更加堅定。

20世紀70年代初，當局開始允許我們接收直系親屬的照片，溫妮給我寄來了一個影集。無論什么時候，只要收到溫妮、子女或孫子、孫女的照片，我都會小心翼翼地把它們貼在影集里。我珍視這本影集，通過它，我就可以隨時看到我所愛的人了。

但是，在監獄里，任何權利的獲得都會伴隨著煩惱。盡管我被允許接收照片和保存影集，但是，獄警們卻經常搜查我的牢房并沒收溫妮的照片。最后，當局終于不再沒收照片，我也最終整理好了我的影集。影集厚厚地集了一本，其中有全家所有人的照片。

我不記得誰是第一個請求借我的影集的人，但肯定是我們監禁區的人。我高興地借給了他，隨后還有兩個人也曾經借過。很快，許多人都知道我有一本影集，因此，就連F區和G區的人也來借閱我的影集。

一般情況下，F區和G區的人很少有人探視，甚至很少有人來信，拒絕讓他們通過這個窗口觀察外面的世界未免有點兒太吝嗇。但是，沒有多長時間，我就發現我那本寶貴的影集被弄得破舊不堪，并且有許多絕版照片被人取走了。這些人在他們的牢房里見到某些個人的東西就會引發絕望的情緒，因而無法控制自己。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我就會下決心重新整理一本影集。

有時候，人們僅僅是向我要一張照片，而不是整個影集。我記得有一天，一個普通犯人監禁區的黑人覺醒運動組織的年輕人給我帶來了食物，并把我拉到一邊說：“馬迪巴，我想要一張照片。”我說：“好啊，就給你一張。”“什么時候給？”他十分直率地問。我回答說，我可以在周末給他。這似乎使他感到滿意，于是就想離去，但是，他忽然又轉身說：“注意，不要給我老太太的照片。你要給我一個年輕姑娘的照片，津澤或澤尼的照片。記住了，不是老太太的照片！”

84...

1978年，經過將近15年要求聽新聞廣播和讀報的權利的斗爭終于有了結果，監獄當局向我們作了妥協。他們開始為我們提供自辦播放新聞的服務，但仍然不允許我們得到報紙和聽新聞廣播。他們所提供的所謂服務，只是每天通過監獄內部的播音系統廣播一下經過篩選的新聞摘要。

這種新聞廣播既不客觀也不全面。島上的幾個信件審查員只是通過其他的每日新聞編一個簡單的新聞摘要。所以，播放的內容針對政府來說都是好消息，而對政府反對派來說則是壞消息。

第一次廣播以關于羅伯特·索布克韋之死的報道開始，其余的早期報道則大都是關于伊恩·史密斯的軍隊在羅得西亞打了勝仗和在國內拘留政府反對派的新聞。盡管全是歪曲事實的報道，但是，我們仍然愿意得到這些新聞。從字里行間去解讀有一種自我滿足感，并且，我們還可以根據明顯的刪節進行種種猜測。

那一年，我們通過內部消息得知，P. W.博塔已經接替約翰·沃斯特出任總理。獄警沒告訴我們的是，沃斯特的辭職是媒體揭露信息部濫用政府基金這一丑聞的結果。除了知道博塔一直是一位霸氣十足的國防部長并曾經在1975年支持軍事入侵安哥拉之外，我對他并沒有多少了解。我絕對不認為他會是一個改革者。

我剛剛看了一本沃斯特的官方自傳（這是一本不在監獄圖書館收藏之列的書），發現他是一個肯為自己的信仰付出代價的人，并且曾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支持德國而進過監獄。對沃斯特的下臺，我們一點兒都不感到惋惜，因為他把反對自由的戰斗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不過，就是沒有這種經過刪改的廣播新聞，我們也能知道當局不想讓我們知道的事情。我們得知，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于1975年取得了解放斗爭的勝利，從而成為擁有革命政府的獨立國家。時代的潮流正在沖刷著南非的路。

隨著島上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們此時也有了自己的電影院。我們幾乎每周都能在與我們的走廊相鄰的大房間里通過掛在墻上的一面床單湊合著看電影。后來，我們有了正規的銀幕。電影是一種奇妙的娛樂方式，對凄涼的監獄生活來說無疑是一種逃避。

我們最初看的電影都是好萊塢的無聲、黑白動作片和美國西部片。這些電影甚至是我們之前那個時代的產品。我記得其中有一部電影是《佐羅的面具》，影片中有一個闖蕩江湖的道格拉斯·范朋克斯（佐羅扮演者）。這部電影是1920年拍攝的。當局似乎有些偏愛歷史電影，特別是對有嚴肅道德寓意的電影更是偏愛有加。我們看過的早期電影現在都已經拍成了彩色片，并且都配上了音，像由查爾頓·赫斯頓主演摩西的影片《十誡》、尤·伯連納主演的《國王和我》、理查德·伯頓和伊麗莎白·泰勒主演的《埃及艷后》。

我們對《國王和我》一片十分感興趣，因為它描寫了東西方價值觀之間的沖突，似乎說明，西方有許多東西需要向東方學習。對于《埃及艷后》大家是有爭議的，我們許多同志對埃及王后由一個黑頭發、紫眼珠的美國女演員扮演有異議，這不僅僅是個漂亮不漂亮的問題。持不同意見的人們堅持認為，該電影是西方宣傳的一個例證，他們企圖抹殺克利奧帕特拉是一個非洲女人這個事實。我向他們講述了我去埃及時，曾親眼見過年輕、黑膚色的克利奧帕特拉的漂亮雕像。

后來，我們也看到了黑人影星演的南非本土電影，我們以前都知道這些黑人影星。在那些夜晚，我們那個簡陋的劇院里回蕩著喊叫聲、口哨聲和歡呼聲，有時是在為一位老朋友出現在銀幕上歡呼。隨后，我們被允許自己選擇看紀錄片。我喜歡紀錄片，從此之后，我開始跳過傳統電影（但我絕不漏過片中有索菲亞·羅蘭的任何電影）而選擇看紀錄片。紀錄片要從國家圖書館租用，通常由阿邁德·卡特拉達挑選，因為，他是我們監禁區的圖書管理員。我看過的一部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歷次大海戰的紀錄片，它對我影響很大。這部紀錄片展現了被日本人擊沉的英國皇家海軍艦艇“威爾士王子號”的特寫，而最讓我感動的是當溫斯頓·丘吉爾聽說英國艦艇被擊沉而流淚的那個鏡頭。這個鏡頭在我腦海里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它向我展示，有時一個領導人也可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自己的悲傷，而這并不會影響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我們還看過一個關于長期存有爭議的美國摩托車俱樂部——“地獄天使”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把地獄天使們描寫成為一群不顧后果、崇尚暴力和反社會的人，而把警察們描繪成正派、正直和值得信賴的人。當電影結束時，我們立即開始討論這部紀錄片的意義，大家幾乎無一例外地批評地獄天使們無法無天的舉動。但是，一位名叫斯特里尼·穆德雷的黑人覺醒運動組織的年輕成員站起來，譴責大家看問題脫離了時代這個具體條件。因為，摩托車騎手代表的是1976年反抗當局的索韋托學生。他還責備我們就像影片中的右翼當局，屬于落后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不代表摩托車騎手。

斯特里尼的責備引起了轟動，許多人起來譴責他，認為地獄天使們沒有辯護的余地，把我們的斗爭與這幫反社會分子相比擬實際上是對我們的一種侮辱。但是，我對斯特里尼所說的話進行了思考，雖然我不贊成他的觀點，但是我仍然為他進行了辯護。即使地獄天使們冷漠無情，并且他們都是令人討厭的反叛者，但是，他們針對的卻是統治者當局。

我對地獄天使并不感興趣，但是正如斯特里尼認為的那樣，我比較關注的問題是，我們的革命意志是否出了問題。我們被關在監獄里的時間已經超過了15年，而我自己則已經在監獄里待了將近18年。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我們的危險就在于思想已經僵化。監獄在這個轉動著的地球上是一個靜止點，在世界滾滾向前的同時，我們在監獄里很容易停留在原來的地方。

我一直努力接受新的思想，從不拒絕接受任何新的或不同的觀點。在島上的那些歲月里，我們始終就我們的信仰和思想不斷進行對話，并就此開展辯論和提出問題，因而使我們的信仰和思想得到了凈化。我認為，我們并沒有停滯不前，我們的思想已經有所進步。

盡管羅本島越來越開放，但仍然沒有跡象表明政府正在改變自己的看法。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懷疑我們總會有一天將獲得自由。我們也許受制于某個地方，但是，我們深信世界將朝著對我們有利的方向轉動，而不是背離我們而去。這部影片又一次提醒我，當有一天我真的走出監獄時，我不想成為一塊年代久遠的政治化石。

經過了漫長的15年之后，當局終于于1979年通過島上的內部廣播系統宣布，從此之后，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享受一樣的伙食標準。但是遲到的正義就像被否定的正義一樣，一種如此滯后、如此勉強宣布的改革似乎并不值得慶祝。

所有的囚犯早晨都可以得到同樣多的糖：一調羹半。但是，當局并非僅僅給非洲人增加定量，而是在為每個非洲人增加半調羹糖的同時，少給了每個有色人和印度人半調羹糖。沒有多長時間，非洲囚犯早晨開始有了面包，但是，并沒更多的改善。幾年以來，我們獄友之間一直把分得的面包集中起來，然后再共同分享。

我們的伙食在前兩年就已經得到了改善，但是這種改善并不能歸功于當局。在索韋托暴動之后，當局作出了決定，羅本島將成為關押南非“治安囚犯”的專門監獄。普通囚犯的數量大幅度地減少。結果，政治犯第一次被分派到伙房工作。政治犯一進伙房，我們的伙食馬上有了改善。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做飯的技術更高超，而是因為偷拿食物的現象立即得到了制止。新的炊事員們不再克扣我們的食物或用我們的食物賄賂獄警，而是把我們應得的那份口糧全部分給了我們。蔬菜的數量更多了，我們的湯中和菜中也有了肉味。只有到這時，我們才知道我們多年來應當吃到的是怎樣的伙食標準。

85...

1979年夏季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打網球，我的對手打了個讓我很難接的斜線球。當我快速地橫向移動去接球的時候，我感到我的右腳跟痛得很厲害，使我不得不停下來。接下來的幾天里，我走路時就一瘸一拐的。

我在島上找一個醫生為我做了檢查，他認為我應該去開普敦找一個專家看一看。監獄當局對我們的身體健康越來越重視，害怕我們死在監獄里，果真如此，他們就會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盡管在正常情況下，我和別人都希望去開普敦，而作為一名囚犯，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我戴著手銬被放在船上的某個角落里，周圍有五個全副武裝的獄警看管著。那天海浪很大，船顛簸得很厲害，當船行駛到羅本島與開普敦之間的半路上時，我感覺我們的船有傾覆的危險。在兩個按年齡足以充當我的孫子的年輕獄警后面，我發現有一件救生衣。我自言自語地說：“如果翻船，我會在這個世界上作最后一次孽，越過兩個獄警先搶到那件救生衣。”但是，船最后并沒有翻。

在碼頭上，有更多的獄警在迎接我們，另外還有少量圍觀的群眾。當那些普通市民看到一個服刑的囚犯在他們面前走過時，臉上露出了懼怕和厭惡的表情，看到這種情形，使我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污辱。我真想躲藏起來，但是卻又無法躲藏。

一個年輕的外科醫生給我做了檢查，他問我以前腳跟是否受過傷。事實上，我在福特黑爾大學讀書時曾經傷過腳。一天下午，我正踢足球，就在我搶球的時候，感覺我的腳跟像燒灼一樣疼痛。我被弄到了當地醫院，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醫院看病。在我生長的那個地方，沒有非洲醫生，找白人醫生看病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情。

福特黑爾的醫生檢查了我的腳后跟，他說我需要動手術。這個診斷結果使我十分恐懼，我生硬地告訴他，我不讓他給我動手術。在我生命的那個階段，我認為找醫生看病就不是男子漢，接受治療就更不用說了。“隨你自己的便，”他說，“但是，當你年齡大了的時候，這個病肯定會給你帶來麻煩。”

開普敦的外科醫生用X光對我的腳后跟做了檢查，發現里面有碎骨片，這些碎骨片可能自從我在福特黑爾大學時就已經存在。他說，他要通過局部麻醉把碎骨片取出來，這一次我立即就同意了。

手術很順利。當做完手術后，醫生告訴我如何注意保護我的腳后跟，他的話被獄警負責人野蠻地打斷了，那個獄警負責人說我必須立即返回羅本島。外科醫生對此非常生氣，他以極其威嚴的語氣說，曼德拉先生必須在醫院里住一夜。他無論如何也不肯讓我離開醫院。那個獄警負責人被鎮住了，只得默然同意了醫生的意見。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一個正規醫院里住了一夜，這使我感到非常愉快。護士們一直在為我跑前跑后。那天夜里，我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一伙護士走進我的病房說，我應該穿醫院發的睡衣睡褲和病號服。我向她們表示感謝，并告訴她們，我所有的同志們都會因此而羨慕我。

從另一方面說，我認為這次來開普敦也是有啟示意義的。因為，在醫院里，我感受到了黑人與白人之間的融洽關系。醫生和護士都對我很好，似乎他們平生一直都在平等地對待黑人。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不同的感受，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鼓舞。我再一次堅定了我長期堅持的“教育是偏見之敵”的信仰。這些人都是科技人員，而科技是不分種族的。

我唯一的遺憾是，在我去醫院前沒能有機會與溫妮聯系。報紙上出現了謠言，說我快要死了，她為此十分擔心。但是，當我回到島上的時候，我立即給她去信，消除了她的擔憂。

1980年，我們擁有了購買報紙的權利。這雖然是一個勝利，但是，正如司空見慣的那樣，每得到一個新的權利，里面都會包含著意料不到的復雜情況。新的規定要求，A類囚犯可以每天購買一份英語報紙和一份南非荷蘭語報紙。但問題是，如果A類囚犯被發現把報紙給了非A類囚犯看，那他將喪失購買報紙的權利。我們對這個限制提出了抗議，但是，抗議也沒有用。

我們得到了兩份日報——《開普時報》和《公民》，都是比較保守的報紙，特別是后者。盡管如此，監獄審查員每天都要對每份報紙進行審查，把他們認為對我們來說是不安全的文章剪掉。到我們收到這些報紙的時候，上面到處都是“天窗”。很快我們就能用《星報》、《蘭德每日郵報》和《星期日時報》對剪掉的內容進行補充。但是，這些報紙卻審查得更為嚴格。

我肯定不可能讀到的一篇文章是1980年3月刊登在《約翰內斯堡星期日郵報》上的，標題是“釋放曼德拉！”上面還有一個請愿書，人們可以在上面簽名要求釋放我和我的政治犯同志。盡管報紙上仍然禁止刊登我的照片或任何我曾經說過或寫過的話，但是，這份郵報仍然發起了一場關于釋放政治犯的公開大討論。

這個主意是奧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盧薩卡想出來的。這次請愿運動是我們實施新戰略的一個基礎，而這一新戰略將使我們的事業更加深入人心。非洲人國民大會決定，通過把這個運動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可以使要求釋放我們的請愿更有針對性。毫無疑問，后來成為這一運動支持者的數百萬人當時還不知道到底誰是曼德拉。（有人告訴我，當郵報刊登的“釋放曼德拉！［Free Mandela］”這一消息傳到倫敦時，多數年輕人都認為我的教名就是“自由”［Free］。）島上有少數人對此事也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請愿運動針對某個人違背了組織的集體原則。但是，多數人則認為，這是喚起民眾的一種策略。

前一年，我在印度獲得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人權獎”，這是斗爭出現轉機的另一個證明。我當然還是被拒絕出席頒獎儀式，溫妮也沒得到準許，但是，奧利佛還是在我缺席的情況下接受了這個獎。我們感到，非洲人國民大會正在復興。民族長矛軍的破壞戰正在升級，這支軍隊已經更加成熟。6月份，民族長矛軍戰士在約翰內斯堡正南的薩索爾堡大型煉油廠實施了爆炸。同時，民族長矛軍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地點精心策劃了為期一周的系列爆炸活動。炸彈在東德蘭士瓦、杰米斯頓、戴維頓和新布賴頓等地的發電廠，在比勒陀利亞郊外的福爾特萊克霍爾特軍事基地遍地開花。這些都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地點，很容易引起世人的注意和政府的擔心。在P.W.博塔的支持下，國防部長馬格納斯·馬倫將軍采取了一項被稱為“總攻”的政策，這是為對付解放斗爭而在全國實行軍事化的一項應急措施。

“釋放曼德拉”運動也有它的薄弱環節。1981年，我得知倫敦大學的學生提名我作為大學榮譽校長的候選人。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而我的對手不是別人，正是安妮公主和貿易聯合會的會長杰克·瓊斯。最終我得了7199票，敗給了英國女王的女兒。我給在布蘭德福特的溫妮發了一封信，告訴溫妮，我希望這次投票能有片刻把她那簡陋的鐵皮房變成一座城堡，使那些小房間像溫莎古堡的舞廳那樣豪華。

要求釋放我們的運動重新讓我們燃起了希望。在20世紀70年代初那些艱難的日子里，非洲人國民大會似乎墜入了陰影之中，我們不得不強迫自己不向絕望低頭。我們在許多方面都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我們認為，到20世紀70年代，我們就會生活在一個民主的、無種族歧視的南非。但是，隨著我們進入了又一個新的十年，我們對一個新南非感覺到的希望又重新燃燒起來。有時，我清晨起來走出牢房，進入院子，發現那里的每一種有生命的動物和植物，像海鷗、鹡鸰、小樹，甚至小草的葉片，都在陽光下微笑和閃光。正是在這個時候，我才感覺到這個狹小的、封閉的世界角落的美麗。我知道，有一天我的人民和我都將會獲得自由。

86...

像我父親一樣，我一直是作為泰姆布國王的參事接受培養的。盡管我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但是我仍然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去實踐我一直被培養的那個角色的責任。在監獄里，我努力與泰姆布國王保持聯系，盡最大努力去勸說他。隨著我的年齡越來越大，我的心思也經常回到特蘭斯凱的那些青山綠水之中。盡管我不會在政府的勸誘下到那里去，但是，我夢想有朝一日能回到一個自由的特蘭斯凱。1980年，我聽說泰姆布的最高首領薩巴塔·達林迪葉波國王被特蘭斯凱的首相、我的侄子K. D.馬嘆茲瑪罷黜了王位，對此我感到十分震驚。

一群泰姆布酋長緊急要求與我見面，他們的要求得到了當局的批準。當局通常愿意讓我與那些傳統領導人見面，因為他們相信，我越是參與部落和特蘭斯凱的事務，我對斗爭事業的參與就越少。

政府提升了那些傳統領導人的權力以便與非洲人國民大會相抗衡。盡管我的許多同志認為，我們應該拒絕承認那些傳統領導人，但我仍然傾向于對他們加以關注。做一個傳統領導人還是當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兩者之間并沒有沖突。這個問題在島上引起了一場最持久、最復雜的論戰：非洲人國民大會是否應該參加政府設立的機構。許多人認為這是通敵行為。我又一次想，有必要在原則和戰術之間加以區別。我認為，關鍵的問題是一個戰術問題：我們的組織是通過參加這些機構才能更強大，還是拒絕參加這些機構才能更強大？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還是通過參加這些機構，我們的組織才會更強大。

我在探望區的一個大房間里與酋長們見了面，他們向我介紹了他們進退兩難的處境。盡管他們從內心里贊成薩巴塔，但是他們都害怕馬嘆茲瑪。聽了他們的介紹之后，我勸他們支持薩巴塔，反對馬嘆茲瑪，因為馬嘆茲瑪正在非法地、厚顏無恥地篡奪國王的權力。我同情他們的處境，但是我卻不能寬恕馬嘆茲瑪的所作所為。我請他們轉告我對薩巴塔的支持和對馬嘆茲瑪的反對態度。

馬嘆茲瑪也要求探視我，以便與我討論薩巴塔和家庭問題。作為我的侄子，他實際上多年來一直想安排這樣的探視。盡管馬嘆茲瑪聲稱要討論家庭問題，但是，這樣的探視無疑會引起政治后果。從馬嘆茲瑪第一次提出這種要求的那一時刻起，我就征求過我監禁區內的最高組織機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的意見。有的僅僅聳聳肩說：“他是你的侄子，他有權來探視你。”但是，雷蒙德、戈萬和凱西則堅持認為，盡管這樣的探視可以被解釋為家庭事務，但是，里面和外面的人都會認為這是我對一個人及其政策的支持。這就是為什么馬嘆茲瑪想來看我的原因，也是我不能接受這種探視的原因。

我理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贊成他們的觀點，但是，我還是想見見我這位侄子。我也許總是過高地估計面對面探討問題的重要性和我自己在這種探討中能夠說服對方改變觀點的能力。我一直希望，我能說服馬嘆茲瑪更改自己的政策。

最終，我們監禁區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決定，不反對馬嘆茲瑪來島上探視我。為了發揚民主，我們然后又就這個問題征求了F區和G區里我們的人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堅決反對。斯蒂夫·茨韋特說，這樣的一次探視將在政治上幫助馬嘆茲瑪，因此是不能接受的。斯蒂夫·茨韋特是普通犯人監禁區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他們許多人都注意到，馬嘆茲瑪已經設法通過任命溫妮的父親——哥倫布·馬蒂奇澤拉為其政府的農業部部長來拉攏我。他們說，如果馬迪巴不同意他來探視，這對他來說將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我接受了普通犯人監禁區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的意見，遺憾地告訴監獄當局，我不接受我侄子的探視。

1982年3月，監獄當局告訴我，我的夫人出了車禍，并住進了醫院。他們了解的情況很少，我對她的情況可以說一無所知。我譴責監獄當局封鎖消息，緊急要求允許我的律師來看我。監獄當局把這個消息作為一件武器，并且被證明是一件很管用的武器。我一直對我夫人的健康狀況憂心忡忡，直到3月31日溫妮的律師和我的朋友杜拉·奧馬爾來探視，我才感到好了一些。

很快，杜拉就使我不再擔心溫妮了。她乘坐的車確實翻了車，但是，她一點兒也沒傷著。我們見面的時間很短，當我被帶回B區的時候，我心里仍然老是想著溫妮，我為自己無能為力和不能幫助她而煩惱不已。

我剛回到我的牢房不久，監獄長和其他監獄官員就來探望我。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因為監獄長一般不到牢房里看望囚犯。當我剛剛站起身來的時候，他們就到了，并且監獄長真的進了我的牢房，而我的牢房卻幾乎無法容納下我們兩個人。

“曼德拉，”他說，“我要你收拾起你的東西。”

我問他為什么。

“我們準備把你轉移到別的地方。”他簡單地說。

“轉移到哪里去？”

“我不能說。”他回答道。

“我要求知道為什么。”他只告訴我，他接到來自比勒陀利亞的指示，要求立即把我轉移出羅本島。監獄長走出了我的牢房，然后又去了瓦爾特、雷蒙德·穆拉巴和安德魯·木蘭基尼的牢房，向他們下達了同樣的命令。

我的心里很不安。這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將到哪里去？在監獄里，一個囚犯只能提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駁，但卻不能違抗命令。我們既沒有得到警告，也沒有任何準備。我在島上被關押的時間已經超過了18年，難道就這樣突然地離開？

我們每人發了幾個大硬紙盒，以便裝我們的東西。我在近20年中所積攢的全部家當用這幾個紙箱就可以裝得下。我們收拾了半個多小時。

當其他人知道我們將離開這里的時候，走廊里出現了一陣混亂，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向我們這些年的同志好好地道別。對監獄來說，這是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與其他囚犯結成的友誼和忠誠關系，對監獄當局根本就不算什么。

幾分鐘之內，我們都上了渡船，向開普敦駛去。我借著落日的余暉回頭看著那座小島，不知道我是否還能再見到它。一個人對任何事情都能夠習以為常，我就已經習慣了羅本島。我在那里生活了將近20年，雖然它不是一個家——我的家在約翰內斯堡，但是，它已經成為一個能夠使我感覺舒服的地方。我一直認為，改變是困難的，離開羅本島也不例外，不管當時它是多么令人可怕。但是，我不知道在企盼什么。

在碼頭上，我們在武裝獄警的包圍下被推上了一輛悶罐車。悶罐車似乎行駛了一個多小時，我們四個人就一直在黑洞洞的車廂里站著。我們通過了一個又一個檢查站，最終悶罐車停了下來。車的后門被打開了，我們下車后摸著黑沿著水泥臺階向上走，通過幾道鐵門后，進入了另一個安全設施。于是，我設法問一個獄警我們來到了什么地方。

“波爾斯穆爾監獄。”他說。

# 第十部 與敵人對話

87...

波爾斯穆爾是最大的安全監獄，它位于開普敦東南幾英里處一個名叫陶凱的、由綠草坪和整齊的平房構成的繁華的白人住宅區附近。監獄本身坐落在開普敦一個十分漂亮的風景區，北面有康斯坦提亞伯格山脈，南面有數百公頃葡萄園。但是，我們在波爾斯穆爾監獄那高高的水泥墻后面，卻看不到這種自然美。在波爾斯穆爾，我第一次體會到了奧斯卡·王爾德關于囚犯稱天空為藍色帳篷的絕妙比喻的真實性。

波爾斯穆爾監獄表面上很摩登，但內里卻很原始。樓房特別是監獄管理人員住的樓房既整潔又新潮，但是，囚犯住的牢房卻陳舊而又污濁。除了我們幾位，波爾斯穆爾監獄里的囚犯都是普通犯人，他們的待遇很差。我們被同他們隔離開，待遇也不一樣。

直到第二天早晨，我們才對周圍的環境有了全面的了解。我們四人被安排在監獄的一個頂層公寓里居住。那是一個位于三樓的寬敞的房間，整個三層樓上只有我們四個囚犯。主房間干凈而且時髦，是一個50英尺長、30英尺寬的長方形房間，并有單獨的衛生間，里面有馬桶、小便池，還有兩個水池和兩個淋浴頭。房間里有四張正規的床，床上有床單和毛巾被。對于18年來多數時間都睡在鋪著薄席的石頭地板上面的我們來說，這是十分奢侈的。與羅本島相比，我們就像住進了五星級大酒店。

我們的樓層有一個L形陽臺，是一個露天的、有半個足球場那么大的戶外場所。白天，我們可以在陽臺上活動一下。陽臺壘著大約12英尺高的白色混凝土墻，因此，我們只能看見藍天。在一個角上，我們可以看到康斯坦提亞伯格山脈的山梁，特別是那個叫“象眼”的山頭。我有時認為，這個山頭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冰山之巔。

沒說明原因忽然就被轉移到一個新地方，這一點令人感到十分迷惘。一個人在監獄里必須做好準備應付突如其來的變化，但是，對于這樣的變化我們卻從來沒有料想到。雖然我們現在是在大陸上，但是，我們卻感覺更加孤單。對于我們來說，羅本島現在已經成為斗爭的中心。我們從眼下尚能彼此為伴而得到一些安慰，并在我們為什么被轉移的沉思中度過了幾周的時間。我們知道，當局早就對我們在青年囚犯中所產生的影響而感到不滿和懼怕。但是，似乎更合邏輯的理由是，我們認為監獄當局企圖通過把領導班子轉移出來以斬斷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島上的龍頭。羅本島本身正在斗爭中變成支撐斗爭事業的神話，他們要通過把我們轉移到別的地方消除某些象征性的意義，因為像瓦爾特、雷蒙德和我都是最高組織機關的成員。但是，有一件事不太好理解，那就是木蘭基尼也在這次轉移之列。安德魯不是最高組織機關的成員，也不在羅本島上的主要領導人之列。我們認為，監獄當局可能并不知道這個情況，他們關于我們的組織的情報時常不夠準確。

我們的推測幾個月后似乎得到了證實。這時，凱西也被轉移到了波爾斯穆爾監獄，他的確一直是最高組織機關的成員。更重要的是，凱西一直還是我們聯絡工作的負責人，正是由于他所做的工作，我們才能與新的年輕囚犯進行溝通。

凱西到來幾周后，還有一個我們不認識的人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他甚至不是來自羅本島。帕特里克·馬庫貝勒是一個年輕的律師，也是東開普省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他之前與格里菲思·穆森基簽了約，成了格里菲思的入門弟子。格里菲思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律師，他曾經為許多被扣押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擔任過辯護律師，而于去年在德班附近遇刺身亡。馬庫貝勒因叛國罪被判刑20年，是從約翰內斯堡的迪普克魯夫轉到波爾斯穆爾監獄來的。原因是他在迪普克魯夫監獄組織囚犯興風作浪。

開始，我們對這個新來的囚犯抱有戒心，懷疑他有可能是監獄當局安插在我們中間的密探。但是，我們不久就發現并不是那么回事兒。帕特里克是一個聰明、和藹、勇敢的人，我們與他相處得很好。對于他來說，與一伙20年來一直在一起生活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的老年人在一起生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現在就生活在一個混凝土世界之中，所以，我更懷念羅本島上的自然景觀。但是，我們的新家也有許多令人感到欣慰的東西。首先，波爾斯穆爾監獄的伙食遠比羅本島的伙食好，經過多少年一日三餐全是玉米片粥的生活之后，我們感到波爾斯穆爾的伙食就像是宴會，能正常地吃到肉和蔬菜。允許我們看的報紙和雜志也相當多。我們可以看諸如《時代》雜志和每周從倫敦發來的《衛報》之類的報刊，這在過去是不允許的。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大的了解世界的窗口。我們還有一臺收音機，但是，只能收當地的電臺，聽不到我們一直想收聽的BBC世界廣播電臺。我們可以整天隨意地到陽臺上活動，但是，12點到下午2點獄警們吃午飯期間卻是例外。我們甚至不需要去裝裝樣子參加勞動。我們的大房間附近還有一個小房間，那里可以當做學習的書房，里面有椅子、書桌和書架，我白天就在那里讀書和寫東西。

在羅本島上，我在自己狹小的牢房里做鍛煉，而現在，我們有了鍛煉的地方。在波爾斯穆爾監獄，我早晨5點起床，然后在我們的公共房間鍛煉一個半小時。我每天重復著同樣的鍛煉內容：跑步、跳繩、仰臥起坐、俯臥撐。我的同志不喜歡早起，所以我的這些鍛煉項目很快使我在牢房里成了一個很不受歡迎的人。

我到了波爾斯穆爾監獄不久，溫妮就來探視我。看見探視區遠比羅本島上的探視區好，并且設施先進，她很高興。我們有一個大玻璃隔墻，通過它可以看到探視者的上半身，麥克風也遠比以前的更先進，所以，我們不費勁就可以聽清彼此講的話。這樣的窗子至少給你一種更加親近的幻覺。在監獄中，幻覺可以讓人感到舒服。

我夫人和家人到波爾斯穆爾監獄遠比到羅本島容易得多。這樣一來，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對探視的監督也顯得更人道了一些。溫妮來探視時，通常總是由準尉詹姆斯·格雷戈里負責監視，他曾經做過羅本島上的信件審查官。我對他不怎么熟悉，但他對我們卻十分了解，因為他一直負責檢查我們的來往信件。

在波爾斯穆爾，我越來越熟悉格雷戈里，發現他與普通獄警不大一樣。他處世圓滑，說話和氣，對溫妮也很客氣、很尊重。探視時間快結束的時候，他會說：“曼德拉太太，你還有5分鐘的探視時間。”而不是厲聲喊叫：“時間到了！”

《圣經》告訴我們，先有菜園后有園丁。但是，在波爾斯穆爾，情況卻并非如此。在那里，種植菜園成了我最愉快的消遣，也是我逃避周圍單調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種方式。經過幾周的考察，我發現我們的樓頂上整天都能見到陽光。于是，我決定在那里開辟一個菜園，并且得到了監獄長的批準。我請求監獄后勤部門給我提供了16個大油桶，并讓他們把油桶鋸成兩半。然后，他們又在桶內裝上潮濕、肥沃的土壤，制成了32個大花盆。

我種上了各種蔬菜，如洋蔥、茄子、卷心菜、花菜、豆角、菠菜、胡蘿卜、黃瓜、球莖甘藍、甜菜、生菜、番茄、辣椒、草莓等。最多時，我在這個小小的“農場”里種了接近900棵植物，這個菜園遠比我在羅本島上經營的菜園要大得多。

有的種子是我買來的，有的則是監獄長芒羅準將給的，例如球莖甘藍和胡蘿卜種子。監獄長特別喜歡這些蔬菜，獄警們也給我一些他們所喜歡的蔬菜種，并且也有足夠的糞肥可供使用。

每天早晨，我戴上草帽和手套在菜園里工作兩個小時。每個禮拜天，我都會向伙房里提供蔬菜。這樣，他們就能為普通囚犯做一頓特殊的飯菜。我有時也把我種的相當一部分菜送給獄警，他們通常用書包把新鮮蔬菜帶走。

在波爾斯穆爾監獄，我們的問題似乎比羅本島上遇到的問題少得多。芒羅準將是一個正派、樂于幫助別人的人，他特別盡職盡責地確保讓我們得到所需要的東西。然而，小的問題也時有發生。1983年，在溫妮和津澤來探視期間，我對我夫人說，我發了一雙鞋，號碼太小，擠得腳趾生痛。溫妮對此非常關心，并且我不久就聽說，有媒體報道我的一個腳趾被切掉了。由于通信比較困難，來自監獄里的消息常常在監獄外被夸大。如果我能打一個電話，告訴我夫人我的腳沒有毛病，這樣的亂子也就不會發生。不久，海倫·蘇茲曼被允許來探視我，她問了我關于我的腳趾的問題。我認為最好的回答就是讓她看一下。我脫下襪子把腳放在玻璃墻上，扭動著我的腳趾讓她看了看。

我們抱怨房內太潮濕，常常弄得我們患上感冒。而后來，我卻聽說南非的報紙刊登文章說，我們的牢房里發了大水。我們要求與別的囚犯進行接觸，并且一直在提同樣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求拿我們當政治犯對待。

1984年5月，我發現還有一些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這些事情似乎可以彌補所有的遺憾。有一次，溫妮、澤尼和她的小女兒來探視我。準尉官格雷戈里沒有帶我去正常的探視區，而是讓我走進了一個單獨的房間，里面只有一張桌子，沒有任何隔離設施。他很客氣地對我說，當局已經作了調整。從那天開始，他允許我們進行“接觸性”探視了。

然后，他走到外面去找我的夫人和女兒，并單獨找溫妮談話。當格雷戈里把她叫到一邊和她單獨談話的時候，溫妮被嚇了一跳，認為我可能是得了病。但是，格雷戈里陪同她來到門口，我們兩人不知不覺地就來到了同一個房間，然后就相互擁抱在一起。這么多年以來，這是我第一次擁吻我的妻子。這曾是我千遍萬遍地夢想的時刻，而在當時，似乎我們仍然在夢中。我擁抱著她，時間似乎不再流動。我們靜靜地擁抱在一起，除了我們的心臟跳動的聲音外，什么聲音都聽不見。盡管我不想放開她，但是，我還是放開了她，去與我女兒擁抱，然后又把澤尼的小女兒放在我的腿上。算起來，我已經有21年沒有碰過我夫人的手了。

88...

在波爾斯穆爾，我們與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觸。我們注意到，斗爭正在加劇，敵人的鎮壓也同樣在加強。1981年，南非國防軍在莫桑比克的馬普托對非洲人國民大會辦事處發動了襲擊，殺害了我們13個人，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1982年12月份，民族長矛軍在開普敦郊外建成的庫伯格原子能發電廠實施了爆炸，并在全國許多其他的軍事目標和種族隔離地區放置了炸彈。同一個月內，南非軍隊又攻擊了位于馬塞盧和萊索托的一個非洲人國民大會前哨基地，殺害了42個人，包括十幾名婦女和兒童。

1982年8月，活動家魯思·弗斯特在她的流放地馬普托打開一個郵遞包裹的時候，被郵件炸彈炸死了。魯思是喬·斯洛沃的夫人，是一個勇敢地反對種族隔離的活動家，并曾經因此被關押了好幾個月。她是一位足智多謀、有立場有觀點的女士，我是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學習時第一次認識她的。她的死充分說明了政府鎮壓我們斗爭事業的野蠻程度。

民族長矛軍第一次用汽車炸彈進行攻擊發生在1983年，攻擊的目標是位于比勒陀利亞市中心的一個空軍情報部門。這是對政府在馬塞盧及其他地方無故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發動軍事攻擊的報復，這顯然表明武裝斗爭開始升級。當時有19人被炸死，另有200多人受傷。

殺害公民是一大悲劇事件，我對那么多人在斗爭中被殺感到極度震驚。但是，我在為這些悲劇感到不安的同時，也知道這顯然是決定開展軍事斗爭引起的必然結果。人類的錯誤總是離不開戰爭，而其代價通常是昂貴的。正是由于我們知道要發生這樣的悲劇，我們作出武裝斗爭的決定時才會那么慎重和無奈。但是，正如奧利佛在發生爆炸時所說的那樣，武裝斗爭是種族隔離政策強加給我們的。

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雙方都在兩個方面做著努力：軍事戰線和政治戰線。在政治戰線上，政府實行標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企圖把非洲人同有色人和印度人分離開。在1983年11月舉行的公民投票中，白人選民贊成P. W.博塔關于創建一個所謂的“三方分立”議會的計劃，即除了白人以外，還吸收印度人和有色人參加。這是政府為拉攏印度人和有色人并使他們同非洲人分離開所作的努力。但是，這不過是為印度人和有色人提供的一種“玩具”而已。因為所有印度人和有色人在議會中采取的行動，都受制于白人的否決權。這也是欺騙外界、讓外界認為政府正在改革種族隔離體制的一種手段。博塔的騙術并沒有蒙蔽住人民群眾，因為1984年，80%的印度選民和有色選民都抵制參加新的議會選舉。

國內出現了強大的基層政治運動組織，這些組織與非洲人國民大會有著牢固的聯系。其中一個主要的基層組織就是聯合民主戰線，我被提名擔任該組織的負責人。聯合民主戰線是為了協調反對1983年通過的新隔離憲法和1984年第一次投票選舉“三方分立”議會的斗爭而創立的。聯合民主戰線很快就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組織，聯合了600多個反對隔離制度的組織，其中包括貿易聯合會、社區團體、宗教團體和各地的學生會。

非洲人國民大會正在經歷一次新的振興——越來越為公眾所接受。民意測驗表明，盡管非洲人國民大會已經被取締了25年之久，但是，它在非洲人中仍然是最有群眾基礎的政治組織。反對種族隔離的斗爭，作為一個整體運動已經引起了世界的關注。1984年，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我曾向他寫信表示祝賀，但是，當局拒絕把我寫的信轉交給他）。南非政府處在不斷加大的國際壓力之下，因為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開始對比勒陀利亞當局實行經濟制裁。

幾年來，政府一直派“探子”對我進行試探，開始是由克魯格部長做我的工作，勸我搬到特蘭斯凱。做這些工作并不是要進行和談，而是企圖把我與我的組織分離開。克魯格多次對我說：“曼德拉，我們可以與你合作，但是，我們不能與你的同事合作，請你明智一點兒。”盡管我沒有對這些意見作出反應，但是，他們想與我們談話而不是想攻擊我們這個事實可以看作他們真正想與我們談判的一個序曲。

政府正在試探我們。1984年末和1985年初，兩位西方著名的政治家訪問了我。他們是尼古拉斯·貝泰爾爵士和塞繆爾·達什。尼古拉斯·貝泰爾是英國上議院的議員和歐洲議會的議員，而塞繆爾·達什則是喬治敦大學的法律教授和前美國國會水門委員會的公訴律師。這兩次訪問都是由新司法部部長科比·庫依茨批準的，他似乎是一位新型的南非白人領導人。

我在監獄長辦公室會見了貝泰爾爵士。當時，室內墻上的顯要位置懸掛著醒目的博塔總統的巨幅照片。貝泰爾是一位善良而開朗、身體矮小而結實的人。當我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我拿他的體形開玩笑：“你看上去好像與溫斯頓·丘吉爾沾親帶故。”我一邊與他握手一邊說著，他聽后不由地笑了。

貝泰爾爵士想了解我們在波爾斯穆爾監獄里的生活條件，我向他作了介紹。我們討論了武裝斗爭方面的問題，我向他表明，放棄武力的主動權不在我們一邊而在政府。我重申，我們的武力是針對頑固的軍事目標，而不是針對人民。“我不會要求我們的人去實施暗殺，例如在座的這位少校。”我指了指弗里茨·范·西特爾特少校。此時，他正在監視我們談話。范·西特爾特是一個善良的人，寡言少語，但是，聽了我的言論，他開始說話了。

貝泰爾訪問過后，達什緊接著訪問了我。在他的訪問中，我提出了作為將來南非非種族歧視的最低要求：建立一個不分故土、不分種族、一人一票選舉的中央議會制的統一國家。達什教授問我，政府聲明擬廢除關于禁止通婚的法律和其他種族隔離法，是否使我受到某種鼓舞。“這是小問題，”我說，“與白人女士結婚或與白人一起游泳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標，我要的是政治上的平等。”我十分坦誠地告訴達什，現在我們還不能在戰場上打敗政府，但是，我們卻能給他們的統治制造困難。

兩個美國人的來訪對我而言可不能算是一次愉快的經歷，他們都是保守報紙《華盛頓時報》的編輯。他們似乎不是想了解我的觀點，而是想證明我是一個共產黨人和恐怖分子。他們所提出的所有問題都有這個傾向，而當我反復講我既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恐怖分子的時候，他們卻企圖通過引證馬丁·路德·金牧師從來沒有使用過武力來說明我也并不是一個基督徒。我告訴他們，馬丁·路德·金開展斗爭時的環境條件與我們的條件完全不同：美國是一個由憲法保證人人權利平等、保護非暴力斗爭的民主國家（雖然美國仍然存在著對黑人的偏見），而南非卻是一個其憲法把不平等奉為神圣、其軍隊以武力對付非暴力的警察國家。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基督徒，并且一直是一個基督徒。我說，即使是基督，當沒有別的選擇的時候，他也會被迫驅趕圣殿里的放債人。他并不是一個崇尚暴力的人，但是，他除了使用武力對付邪惡之外沒有別的選擇。當時我想，我并沒有能說服他們。

面對國內的麻煩和國外的壓力，P. W.博塔采取了一個不冷不熱的折中措施。在1985年1月31日的一場議會辯論中，這位國家總統公開說，如果我“無條件拒絕以暴力作為政治手段”，我就可以獲得自由，并且這種寬宏大量可以延伸到所有的政治犯。然后，他好像向我公開挑戰似的說：“因此，阻礙曼德拉先生走上自由之路的并不是南非政府，而是他本人。”

當局一直在提醒我，政府準備提出一項關于釋放我的動議，但是，我卻對國家總統在議會中提出這個動議沒有作任何準備。根據我的記憶，在過去十年中，這是政府第六次提出有條件釋放我的建議。我在收音機里聽到這個建議后，便要求監獄長允許我的夫人和律師伊斯梅爾·阿堯博立即到監獄里與我見面，以便讓我對國家總統的建議作出反應。

一周后，溫妮和伊斯梅爾并沒有獲得批準。在此期間，我致信外交部部長皮克·博塔，拒絕釋放我的條件，同時，我也準備公開作出反應。我急于通過作出這種反應做幾件事，因為，博塔之所以提議釋放我，只不過是想通過引誘我接受非洲人國民大會拒絕接受的條件，從而在我與我的同志之間打入一個楔子。我要向整個非洲人國民大會特別是奧利佛·塔博證明，我對組織的忠誠是不容懷疑的。我還希望給政府傳遞一種信息，讓他們知道我拒絕他們的提議是因為附加的條件，但是，我認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談判，而不是戰爭。

博塔想把暴力的責任強加在我的身上，而我則想向世界重申，我們只是以暴力反對暴力。我想說清楚的是，如果我從監獄出來后又陷入我過去被捕時的那種境地，我將被迫繼續開展我被捕之前曾經采取的各種行動。

在一個禮拜五，我見到了溫妮和伊斯梅爾。禮拜天，聯合民主戰線大會將在索韋托雅布拉尼體育場舉行，在會上，我將把對國家總統的提議所作出的反應公布于眾。我不熟悉的一些獄警在監視我與溫妮和伊斯梅爾的會見，當我們開始討論我對國家總統的提議作出反應時，其中一個十分年輕的獄警插話說，只準討論家庭事務。我沒理會他，幾分鐘的工夫，他叫來了一個我剛剛認識的年齡大些的獄警。這位年長的獄警說，我必須停止討論政治問題。我告訴他，我們正在討論如何回答國家總統提議的有關國家的大事。我警告他，如果他想停止我們的討論，他必須得到國家總統本人的指令。“如果你不愿意給國家元首打電話要求得到這種指令，”我嚴肅地說，“那么就請你不要干預我們的討論。”還好，他沒有再做傻事。

我把我準備的講話稿交給了伊斯梅爾和溫妮。除了對總統的提議作出反應外，我還想公開感謝聯合民主戰線工作做得好，并祝賀圖圖大主教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我強調，他的榮譽屬于全體人民。1985年2月10日禮拜天，我女兒津澤在一個群情激昂的集會上宣讀了我的這個講話。二十多年來，人民群眾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合法的方式聽到我的聲音。

津澤像她母親一樣，也是一個善于演講的演說家。她說，她的父親應該到體育場親自講話。知道是她代我演講，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名成員。我一直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在我的生命停止之前，我將仍然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成員。奧利佛·塔博勝過我的親兄弟。近50年來，他一直是我最偉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們中有人珍視我的自由，那么奧利佛·塔博就更加珍視，并且我知道，為了看到我獲得自由，他可以放棄自己的生命……

我對政府想加在我身上的條件感到吃驚。我不是一個喜歡暴力的人……只有在所有其他形式的反抗都不再適合我們的時候，我們才轉向了武裝斗爭。要讓博塔顯示他與馬倫、斯揣敦和沃爾沃德到底有什么不同，讓他聲明放棄暴力，讓他自己說出將廢除種族隔離制度，讓他承認人民的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讓他釋放所有因反對種族隔離而被關押、禁止、驅逐和流放的人士，讓他確保人民的自由政治活動，以便人民能夠自己決定將來讓誰管理自己。

我十分珍視我自己的自由，但我更珍視你們的自由。自從我進了監獄之后，已有太多人犧牲了生命；因為熱愛自由，已有太多人遭受了苦難。我感激他們的遺孀、他們的遺孤、他們的母親和他們的父親，是這些人為他們承受了痛苦。在這些漫長、孤獨、荒廢的年月里，不僅僅是我遭受了痛苦。在熱愛生命方面，我一點也不比你們遜色。但是，我不能出賣我與生俱有的權利，我也不想出賣人民與生俱有的享受自由的權利……

在人民的組織仍然處于被取締狀態的同時，政府能給我什么自由？當我可能在某個通行檢查站被逮捕的時候，政府能給我什么自由？當我親愛的夫人仍然在布蘭德福特遭到禁止的時候，政府會給我什么樣的家庭生活的自由？當我必須請求被允許居住在某個城市的時候，政府會給我什么自由……當連我的南非公民身份都沒受到尊重的時候，政府又會給我什么自由？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討價還價，囚犯又怎么能談和約……當我和你們，我的人民，還沒有獲得自由的時候，我不能也不會提供任何承諾。你們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分不開的。我會回來的。

89...

1985年，監獄里的醫生給我做完一次常規健康檢查后，我被轉診到一個泌尿科專家那里。他診斷我患有前列腺腫大，并建議我做手術治療。他說這是普通手術。我征求家人的意見后，決定接受手術治療。

在嚴密的安全措施下，我被轉到開普敦人民醫院。溫妮乘飛機趕到開普敦，趕在我進行手術前看望了我。當時，還有另一位探視者，也是一位讓我感到吃驚和沒有預料到的探視者——司法部部長科比·庫依茨。不久前，我曾給庫依茨寫過信，敦促他安排一次見面的機會，共同討論一下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政府之間進行談判的問題。他并沒有作任何答復。但是，那天上午，他像是看望一位幾天沒見的老朋友一樣，沒有預先通知就忽然來到了醫院。他總體來說是既熱情又友好，多數時間我們都在開玩笑。盡管我假裝把這件事當做世界上最正常的一件事，但實際上，我仍然感到吃驚。政府正在以緩慢、試探的方式希望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在某些方面實現和解。庫依茨的到訪無疑就是一根橄欖枝。

盡管我們沒有討論政治，但我確實提出了一個敏感的話題，那就是我夫人的處境。8月份，就在我住院前不久，溫妮不得不回約翰內斯堡接受治療。當時，她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從布蘭德福特去看我或她的醫生。當她在約翰內斯堡的時候，她在布蘭德福特住的房子及其后面的診所都因遭受到了火焰彈的襲擊而被破壞，溫妮已經沒有地方安身。盡管約翰內斯堡對她來說是禁區，但是，她還是決定繼續留在約翰內斯堡。她連續在約翰內斯堡住了幾周，沒發生任何問題。緊接著安全警察就寫信通知她，布蘭德福特的房子已經修好了，她必須返回布蘭德福特。但是，她拒絕回去。我請庫依茨允許溫妮留在約翰內斯堡，不要強迫她回布蘭德福特。他說，他不能作任何承諾，但是，他會實實在在地處理這件事。我向他表示感謝。

我在醫院里住了幾天，以便身體在手術后得到恢復。當我出院的時候，芒羅準將把我從醫院里接了出來。監獄長一般是不到醫院里接囚犯的，因此，我立即產生了懷疑。

在開著車返回監獄的路上，芒羅就像與我閑聊那樣隨便地對我說：“曼德拉，我們現在不準備把你送回到你的朋友中間去。”我問他是什么意思。“從現在起，你將單獨住在一個地方。”我問他為什么。他搖了搖頭說：“我不知道，我僅僅是服從監獄管理局的指示。”這一次又是事先既不警告又不解釋原因。

我一回到波爾斯穆爾監獄，立即被帶到監獄一樓的一個新的牢房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側樓，上面還有三層。我一共有三間房子，還有一個單獨的衛生間。一個房間可以用來睡覺，一個房間在大廳的對面，用來做書房，另一個房間可以鍛煉身體。按照監獄的標準，這有點兒過于奢侈了。但是，這些房間有一個缺點，那就是潮濕發霉，只能見到很少的自然光線。我對準將沒說什么，因為我知道這并不是他的決定。我需要時間考慮他們把我轉移到這里的意圖。政府為什么要采取這一步呢？

稱作一次新發現或許有點兒牽強，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天到幾周的時間內，我悟出了把我轉移到新住處的原因。我認為，這種變化也許并不僅僅是一種傾向，而是一種機會。與我的同事分開，我當然很不高興，我也懷念我的菜園和三樓上的陽臺。但是，我單獨居住也為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我決定用這個機會做我長期以來一直想做的事情：開始與政府談判。我認為，通過談判把斗爭向前推進的最佳時機已經到來。如果我們不立即開始對話，雙方都將很快陷入鎮壓、暴力和戰爭的黑夜。單獨居住無疑為我提供了一次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第一步的機會，如果不認真地審時度勢，有可能導致這種努力歸于失敗。

我們反對白人少數統治的歷史已有大半個世紀之久，我們進行武裝斗爭也已經有20多個年頭。雙方有許多人已經死去。敵人強大而堅決，他們雖然擁有各種轟炸機和坦克，但是，他們一定感覺到自己是在逆歷史潮流而動。盡管我們還不算強大，但是，正義卻在我們這一邊。我很清楚，軍事勝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雙方在沒有必要的沖突中使成千上萬的人犧牲生命，這是毫無道理的。他們也一定知道這一點，是到了和談的時候了。

這是一個特別敏感的問題。雙方都認為，和談是軟弱和背叛的象征。沒有一方會在另一方作出重大讓步之前走到談判桌前。政府一遍又一遍地聲稱我們是共產黨恐怖組織，而他們不可能與恐怖分子或共產黨人談判，這是國民黨的信條。非洲人國民大會也同樣一遍又一遍地聲稱政府是法西斯和種族歧視主義者，除非解除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取締令，無條件釋放所有的政治犯，把軍隊從各個城鎮撤走，否則就沒有什么好談的。

與政府進行談判的決定是極其重要的，所以這個決定只能在盧薩卡作出。但是，我認為談判的程序需要先著手安排，可是，我卻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與奧利佛進行全方位的溝通。我方需要有人邁出這第一步，而單獨居住既為我提供了這樣做的自由，又可以至少暫不讓別人知道我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現在處于一種貌似受到優待實則孤立無援的境地，盡管我的同事們與我相隔只有三層樓，但是，就像他們是遠在約翰內斯堡一樣，為了見到他們，我必須提出正式要求探視的申請。這種申請還必須由比勒陀利亞總部批準，常常需要幾周的時間才有回音。如果得到了批準，然后我才能在探視區與他們見面。這豈不是咄咄怪事：獄友之間現在竟然也成了探視和被探視的關系。多少年來，我們一天就能談上幾個小時，現在我們卻必須正式提出申請進行約定，并且我們的談話也要受到監視。

我住進新牢房幾天之后，我請監獄長安排一次這樣的會見，他很快就作了安排。我們有四人參加了討論，主要是關于我的轉移問題。瓦爾特、凱西和雷蒙德對我們被分開關押感到十分氣憤。他們要提出強烈的抗議，要求我們重新生活在一起。我的反應卻出乎他們的預料。“伙計們，”我說，“我認為，我們不應反對這件事。”我說，我的新牢房條件更優越，這完全有可能為所有的政治犯樹個先例。然后，我又含糊其辭地說：“這可能也是出于好意。我現在的處境更便于我們與政府接近。”他們并沒有怎么關心我后面的解釋，我知道他們也不會關心。

對于我打算做的事，我決定先不告訴任何人，既不告訴樓上的我的同事，也不告訴盧薩卡的那些人。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集體，但政府卻讓這個集體無法發揮集體的作用。我沒有把握或時間與整個組織討論這些問題。我知道，我樓上的同事可能會因我提出這樣的建議而譴責我，甚至沒等我的這種進取精神發揮作用就把它扼殺掉。有時，作為一位領導人，他必須在前面站出來，帶領大家朝著一個新的方向前進，并確信自己正在帶領大家走上正確的道路。最后，當出現問題的時候，我的孤立處境可以為我的組織提供一個借口：老人被單獨關押，完全與外界斷絕了聯系，他的行動完全屬于個人行為，不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

90...

從樓上搬到樓下幾周之內，我就致信科比·庫依茨，建議就談判問題進行一次對話。正如以往的情況一樣，我沒有得到答復。我又給他寫了一封信，還是沒有回音。我發現這件事很奇怪，并且有點兒泄氣。我意識到，我必須尋找別的機會與他取得聯系。1986年初，這種機會終于等來了。

1985年10月份，在拿騷舉行的一次英聯邦會議上，與會領導人在是否參與國際社會對南非進行制裁的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主要原因是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堅決反對這樣做。為了打破這個僵局，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同意組成一個“著名人士”代表團出訪南非，并對制裁是否有助于結束種族隔離寫出報告。1986年初，由七位著名人士組成的代表團，在尼日利亞前軍界領導人奧盧塞貢·奧巴桑喬將軍和前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的帶領下，肩負著實事求是的使命到達了南非。

2月份，奧巴桑喬將軍訪問了我，向我簡要介紹了代表團訪問南非的真實目的。他迫切希望我能與代表團全體團員見上一面。經政府批準，會見安排在5月份進行。代表團與我見面后將與內閣交換意見，所以我把這次會見看成是提出談判問題的一次機會。

政府對我與代表團的會見顯得異乎尋常地重視。在我與代表團會見的前兩天，芒羅準將探望了我，并帶來了一位服裝師。“曼德拉，”監獄長說，“我們希望你以平等的身份與這些人見面，不希望你穿那些破舊的囚服，因此，這位服裝師要給你量量尺寸，做一套正規的服裝。”這位服裝師一定是個高手，因為第二天，我就試了一套已經裁剪好了的完全合體的服裝。我還領了一套襯衣、領帶、鞋、襪子和內衣內褲。監獄長似乎十分欣賞我的新服裝。“曼德拉，你現在看上去像是一位總理，哪像是一個囚犯。”他笑著說。

在我與著名人士代表團會見的時候，另外還有兩位重要觀察員也參加了會見，他們就是科比·庫依茨和監獄管理局局長W. H.威廉姆斯中將。像那個服裝師一樣，這兩個人似乎也在那里對我“量體裁衣”。但奇怪的是，會見開始后不久他們就走了。我請他們留下來，說我沒有什么事情要保密。但是，他們最終還是走了。在他們離開之前，我告訴他們談判的時刻到了，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坐下來談判。

著名人士代表團帶來了許多問題，其中包括暴力問題、談判問題和國際制裁問題等等。開始，我為我們的討論定下了幾條基本原則。“我不是運動組織的領導人，”我告訴他們說，“運動組織的領導人是盧薩卡的奧利佛·塔博。你們一定要去見見他。你們可以告訴他我是什么觀點，但是，這些觀點僅僅是我個人的觀點，這些觀點甚至不能代表我在監獄中的同事。說到底，我贊成非洲人國民大會開始與政府談判。”

代表團許多成員都非常關心我的政治傾向和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下的南非到底是個什么樣子。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南非民族主義者，不是一個共產黨人。民族主義者承認在南非長期居住的人，不分膚色，都屬于南非民族，并且我決心致力于建設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社會。我告訴他們，我相信《自由憲章》，這個憲章體現了民主和人權原則，但它并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藍圖。我談到了我對白人的關注，少數白人在一個新的南非中應當有安全感。我告訴他們，我認為，我們的許多問題都是由于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缺少溝通造成的，有些問題可以通過面對面的談判來解決。

他們廣泛地向我詢問了暴力方面的問題。盡管我還不打算正式宣布放棄暴力，但是，我盡可能地以最強烈的語言聲明，暴力絕不是解決南非問題的最終辦法，并且不分男女，人在本性上都需要通過某種談判達到相互理解。我再一次聲明，這些觀點是我自己的觀點，并不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同時，我建議，如果政府從各個城鎮撤出軍隊和警察，非洲人國民大會將同意停止武裝斗爭，作為談判的序幕。我告訴他們，僅僅釋放我，并不會阻止這個國家發生暴力或帶來和平。

代表團結束與我的會見后，他們打算去見一見盧薩卡的奧利佛和比勒陀利亞的政府官員。在我的談話中，我已經向盧薩卡和比勒陀利亞傳遞了信息。我希望政府明白，可以在適當的情況下與我們舉行談判，并希望奧利佛知道我的立場與他的立場是相同的。

5月份，著名人士代表團準備與我一個人進行最后一次會見。我很樂觀，因為他們已經去過盧薩卡和比勒陀利亞，并且我也希望已經播下了談判的種子。但是，在我們準備會見的頭一天，南非政府采取了措施，從而破壞了英聯邦代表團剛剛帶來的善意。在著名人士代表團計劃會見內閣部長們的那天，依照博塔總統的命令，南非國防部隊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博茨瓦納、贊比亞和津巴布韋的基地發動了空襲和突然襲擊。這完全破壞了和談的氣氛，著名人士代表團立即離開了南非。我又一次感到，我為促進和談所做的工作遭到了挫折。

奧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國民大會號召南非人民舉行武裝暴動，人民積極響應。動亂和政治暴力達到了新的高潮。群眾的憤怒失去了控制，城鎮變得動蕩不安。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與日俱增。1986年6月12日，政府宣布全國處于緊急狀態，企圖捂住抗議浪潮的蓋子。從表面上看，選擇這個時間似乎對和談不怎么吉利。但是，最讓人灰心喪氣的時候，常常也正是發生轉機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人們往往要尋找走出困境的辦法。當月，我給威廉姆斯將軍寫了一封很簡單的信，只是說：“我希望看到你能在國家重大問題方面發揮作用。”在一個禮拜三，我把信交給了芒羅準將。

那個周末，監獄長通知我做好準備去見威廉姆斯將軍，當時他已經在從比勒陀利亞來開普敦的路上。這次會見沒有按通常的模式進行。我被帶到了他在波爾斯穆爾監獄的住所，而不是被帶到探視區與這位將軍進行會談。

威廉姆斯是一個坦率的人，我們很快就進入了正題。我告訴他，我要見司法部部長科比·庫依茨。他問為什么，我猶豫了一會兒，不想與一個監獄管理官員討論政治問題，但是，我還是坦率地作了回答：“我想見部長，以便提出在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舉行談判的問題。”

他想了一會兒，然后說：“曼德拉，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樣，我不是一個政客。我不能與你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些問題超出了我的職責范圍。”然后他停了一會兒，似乎剛剛想起了什么事情。“竟然如此湊巧，”他說，“司法部長現在就在開普敦。你或許能夠見到他，我會設法找他的。”

然后，威廉姆斯將軍給部長打電話，兩個人在電話上談了好大一陣子。放下電話之后，威廉姆斯將軍轉身對我說：“部長說，‘把他帶到這里來。’”幾分鐘后，我們坐著威廉姆斯的轎車離開了他的住所，直奔部長在開普敦的住宅而去。安全保衛措施并不怎么嚴格，只有另外一輛車與威廉姆斯將軍的車隨行。這次會見安排得如此容易和迅速，這使我懷疑政府可能提前就對這次會晤作出了安排。他們是否提前作出安排并無關緊要，但是，這無疑是一次朝著和談邁出第一步的機會。

在他的官邸里，庫依茨熱情地歡迎我，我們在會客廳里那舒適的椅子上落了座。他對沒有讓我有足夠的時間換掉囚服而表示抱歉。我與他談了三個小時，他那種機警老練和愿意傾聽我的意見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并且切中要害的問題，這些問題說明，他對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在某些問題上的分歧十分熟悉。他問我，我們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才會停止武裝斗爭？我講話是否能在整體上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我對新南非中少數民族在憲法保障方面有什么打算？他所提的這些問題切入了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分歧的核心。

如同我對著名人士代表團所作的答復一樣，我以同樣的方式對他提的問題也作了回答。然后，我感到庫依茨希望得到某種答案。“下一步將怎么辦？”他問。我告訴他，我要見國家總統和外交部部長皮克·博塔。庫依茨把我的要求記在他隨身攜帶的一個便箋上，然后說，他會通過正常渠道轉達我的要求。然后，我們相互握手告別，我被送回波爾斯穆爾監獄一樓的那個單身牢房。

我很受鼓舞。我感覺到，政府正急于打破國家面臨的僵局，并且他們現在開始相信，必須拋棄自己原來的立場。此時，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對自己與庫依茨的這次會見，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不希望在我與庫依茨的會見有任何結果之前就告訴別人。有時候，必須要等到某項政策既成事實之后，才能告訴自己的同事。我知道，一旦他們認真分析了形勢，我在波爾斯穆爾監獄和盧薩卡的同事都會支持我。但是，在情況開始有了轉機之后，反而又沒了音信。幾周過去了，然后幾個月又過去了，庫依茨沒給任何回話。于是，我在心灰意冷之中又給他寫了一封信。

91...

盡管我沒有直接從科比·庫依茨那里得到答復，但是，另有跡象表明，政府正在為了讓我獲得另一種生存方式做著準備。在圣誕節前的那一天，波爾斯穆爾監獄的副監獄長加韋·馬克斯中校吃過早飯后來到我的牢房，他非常隨便地說：“曼德拉，你要不要去看看市容？”我雖然并不十分清楚他心里是什么想法，但是，我覺得說聲“是”也沒有什么害處。“好吧，跟我來。”他說。我跟著中校穿過從我的牢房到監獄大門之間的15道上了鎖的鐵門，當我們走出監獄的時候，我發現他的車正在那里等著我們。

我們驅車沿著漂亮的海濱大道向開普敦駛去。他心中并沒有目的地，我們僅僅是圍著開普敦市轉彎抹角地隨意行駛著。看到人們正在從事簡單的活動，這種生動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老人坐在太陽底下曬太陽，女士們忙著去商店購物，有的人在遛狗。這些正是在監獄里的人最渴望做的再簡單不過的日常活動。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個來到陌生去處的好奇游客。

轉了一個小時左右之后，馬克斯中校把車停在了一條僻靜街道上的一家小商店門前。“你想喝冷飲嗎？”他問道。我點了點頭，于是他進了那個小商店。我單獨一人坐在那里。開始的幾分鐘，我并沒考慮我的處境，但是，隨著秒針滴答滴答地往前走，我越來越感到不安。22年來，我第一次來到了監獄外面的世界，并且沒有人看管。我有一種打開車門、跳出車外并一直跑得無影無蹤的幻想，有一種內在的東西在督促我這樣做。我注意到，在道路附近有一片森林，我可以在那里躲藏起來。我特別緊張，身上開始冒汗。中校去了哪里？但是，我后來控制住了自己。對于這樣一種行為，先不說它有多么危險，它是不明智的和不負責任的。從整個情況來看，很可能就是人為地在讓我逃跑，盡管我認為并非完全如此。一會兒，我不再感到緊張，這時我看見中校朝著車走來，手里拿著兩罐可口可樂。

后來發生的事情表明，那天只不過是在開普敦作多次短途旅游的第一次。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與中校又一次外出旅游，不僅到開普敦市區，而且還去了開普敦市區周圍的一些景點，游覽了秀麗的海灘和漂亮而涼爽的山區。不久，一些職位更低的監獄官員也被允許帶著我出去游覽。與他們常去的地方之一是一個被稱作“菜園”的地方，那是監獄附近的一些小農場，專門種植農作物供應監獄的伙房。我喜歡到外面的大自然之中，在那里，我能看到遠處的地平線，感受太陽照射在我肩頭上的美妙。

有一天，我與一位隊長一同去了菜園。走進菜地之后，我們信步來到了一個馬廄。當時，有兩位身穿工作服的年輕白人小伙子正在那里收拾馬匹。我走到他們面前，對一匹馬稱贊了一番，然后對小伙說：“請問這匹馬叫什么名字？”那個年輕小伙子似乎很緊張，低著頭沒有看我。然后，他喃喃地說出了那匹馬的名字。但是，他是在告訴隊長，而不是告訴我。然后，我又問另一個小伙子，他的馬叫什么名字，他的反應也與第一個小伙子完全一樣。

在我與隊長一起返回監獄的時候，我對隊長說，我認為那兩個小伙子的行為讓人莫名其妙。隊長笑了，“曼德拉，你知不知道那兩個小伙子是什么人？”我說不知道。“他們是白人囚犯。以前，在白人官員在場的時候，他們從來沒有被非洲犯人提問過。”

一些年輕的獄警帶我去了相當遠的地方，我們在海灘上漫步，甚至在咖啡館停下來喝上一杯茶。在這些場合，我常常試圖看一看是否有人能認出我，但是，從來沒有人認識我。報紙上曾經刊登過我的照片，那還是1962年照的。

從幾個方面來說，這樣的游覽都是有益的。我看到在我被關進監獄之后的這段時間內，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去的地方主要是白人居住區，因此，我可以看到白人生活得特別富足和安逸。盡管這個國家正處在動亂之中，并且有些城鎮正處于開戰的邊緣，但白人的生活卻十分平靜，一點也沒有受到打擾。他們的生活并沒有受到影響。有一次，一位被稱作布蘭德準尉的十分文雅的年輕人把我帶到他的公寓里，讓我認識了他的夫人和孩子們。從那天之后，我每年都給他的孩子們寄圣誕卡。

我非常喜歡這些小小的冒險活動，我非常明白，當局并不是有意讓我純粹地進行消遣，而是有別的想法。我意識到，他們是在讓我適應南非的生活，可能同時也想讓我先熟悉一下這種有限的自由，這樣我將會為了獲得徹底的自由而自愿和解。

92...

1987年，我恢復了與科比·庫依茨的接觸。我在他的住所同他有過幾次私下會晤，政府于當年年底提出了第一個具體的建議。庫依茨說，政府愿意委派一個高級官員組成的委員會與我單獨進行討論。并且，一切都將在總統完全知情的情況下進行。他本人將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成員將包括監獄管理局局長威廉姆斯將軍，監獄管理處主任范尼·范·德默韋和前大學教授、時任國家情報局局長的尼爾·巴納德博士。前面三人都熟悉監獄系統，因此，如果談判失敗或走漏風聲，雙方都能夠設法掩蓋，完全可以說我們是在討論監獄的條件，而不是別的什么內容。

然而，巴納德博士的存在讓我感到不安。他相當于南非的中央情報局局長，也負責軍事情報。我能夠向我的組織證明與其他官員談判的正確性，但是不能證明與巴納德談判也是正確的。他的存在使談判變得更為棘手，同時也意味著擴大了討論的范圍。我告訴庫依茨，我將利用一個夜晚的時間對這個建議進行認真考慮。

那天夜里，我考慮了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我知道P. W.博塔設立了一個被稱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機構，這是一個由安全事務專家和情報官員組成的影子秘密部門。根據媒體報道，他創建這個部門的目的是遏制內閣影響，從而擴大自己的權力。巴納德博士是這個內部機構的關鍵人物，并且據說還是總統的門客。我想，如果拒絕巴納德參加談判，就會因此而疏遠博塔，所以我斷定這樣一個策略太冒險。如果總統放棄談判的計劃，那將什么事情也不會發生。早晨，我給庫依茨傳話，接受了他的建議。

我知道，我有三個重要問題需要講明：第一，我要在往下進行之前與我三樓上的同事溝通；第二，關鍵是把將要發生的情況告訴盧薩卡的奧利佛；第三，我打算給P. W.博塔起草一個備忘錄，把我和非洲人國民大會在重大問題上的觀點擺在世人面前。這個備忘錄將為今后舉行任何談判列明談判要點。

我申請與我的同事見面，讓我吃驚的是，當局立即予以拒絕。這是很不正常的，因此我推測，這反映了我本人與政府之間的秘密談判的前景，仍然籠罩著一種非常緊張的氣氛。我又向更高一級的官員提出了這個要求。最終當局同意了，但卻附帶了一個條件：我只能一個一個地分別與我的同事見面，而不是與他們全體一起見面。

我與他們在探視區見了面。我決定忽略一些細節，僅僅準備征求一下他們關于與政府談判的意見，而不提政府實際上已經組成了談判班子。我第一個見的是瓦爾特，我把我給監獄管理局局長寫信和與庫依茨見面的事告訴了他。我說，我已經與庫依茨討論了與政府開始談判的想法，政府對此很感興趣。然后，我問他對這個問題是什么意見。

我一直與瓦爾特同甘共苦，他是一個聰明而有理智的人，并且他對我也最了解。在所有的人中，我最相信他，也最尊重他的意見。瓦爾特對我告訴他的事情進行了認真的思考。我能看得出，他很擔心，或者說只能算是反應冷淡。“原則上講，”他說，“我不反對和談。但是，我希望政府主動與我們和談，而不是我們主動與他們和談。”

我回答說，如果你原則上不反對和談，那么誰主動與誰談又有什么關系？重要的是取得談判成功，至于如何開始談并沒有多大關系。我告訴瓦爾特，我認為，我們應該推動和談，不必擔心誰先敲誰的門。瓦爾特看出我的決心已定，他說他不會阻止我，但是，他希望我對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到心中有數。

緊接著，我見到了雷蒙德·穆拉巴。我像對瓦爾特一樣，全面地向他介紹了有關情況。雷蒙德總是少言寡語，當時，他對我所說的話考慮了許久。然后，他看著我說：“馬迪巴，你一直在等什么？我們早在幾年前就應該開始這樣的談判。”安德魯·木蘭基尼的意見與雷蒙德的意見完全一致。我最后會見的人是凱西。他的意見正好相反，堅決反對而不是像雷蒙德和安德魯那樣堅決支持我的提議，他比瓦爾特還要堅決，認為主動與政府和談，會顯得我們是在有條件地投降敵人。像瓦爾特一樣，他說他原則上不反對和談，我對他給予了與給瓦爾特一樣的答復。但是，凱西很固執，他認為我所走的道路是錯誤的。不過，盡管他十分擔心，但是他說他不會當我的攔路石。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奧利佛·塔博通過我的一個律師秘密捎給我的一個紙條。他已經知道，我正在準備與政府秘密地進行談判，他對此十分關心。他說，他知道我在這段時間里一直在做什么，并且沒有與我的同事關押在一起。他肯定一直在想：曼德拉怎么樣？奧利佛的條子很簡單，但很重要：他要知道的是我打算與政府談什么？奧利佛不會相信我會背叛，但是，他可能認為我會犯判斷上的錯誤。事實上，他的條子的大體意思已經透露了這樣的想法。

我用一封非常簡短的信對奧利佛作了答復，告訴他我準備只與政府談一件事，而且是唯一的一件事：非洲人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與政府之間舉行一次會晤。我沒有作詳細說明，因為我不能保證這種通信方式的保密性。我僅僅說，這種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并且我無論如何也不會背叛組織。

盡管非洲人國民大會幾十年以來曾經呼吁過與政府進行談判，但是，我們卻從來也沒有面對過真正的談判。從理論上考慮談判是一回事，而真正面對談判則是另一回事。在我打算給奧利佛回信的同時，我也在開始起草給P. W.博塔的備忘錄。我要確保也讓奧利佛能理解這件事。我知道，當奧利佛和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的同事們看到我的備忘錄的時候，他們對我偏離正確道路的擔心會隨之消除。

93...

秘密工作組的第一次正式會晤于1988年5月在波爾斯穆爾監獄區的一個最高檔的官員俱樂部舉行。盡管我認識庫依茨和威廉姆斯，但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范·德默韋和巴納德博士。范·德默韋是一個沉默寡言、沒有成見的人，只有當他有重要事情要說時才開口講話。巴納德有35歲左右，是一個極其聰明、機智而又嚴于律己的人。

會談一開始，大家都有些古板，不過，后來再談，大家講話就自由、坦率得多了。幾個月中，我幾乎每周都和他們會談。后來，間隔時間就不怎么固定了。有時一個月談不了一次，然后，忽然又每周談一次。會談通常由政府安排，但有時我也要求安排會談。

在我們早期會談期間，我發現，除了巴納德之外，其他會談伙伴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知道的并不多。他們都是精明干練的南非白人，遠比其他南非白人思想更開明。但是，他們都是南非片面宣傳的犧牲品，因此有必要讓他們了解事實真相。即使是巴納德博士，他雖然研究過非洲人國民大會，但是，他的絕大多數資料都是從警察部門和情報部門的卷宗中得到的。由于搜集者們的偏見，這些資料基本上都是歪曲事實的。所以，他也同樣無法避免這種偏見的感染。

我首先在簡要介紹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歷史方面花了一些時間，然后，又介紹了我們對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政府之間的主要分歧所堅持的立場。澄清了這些基本問題之后，我們把討論的重點放在了某些關鍵問題上，如武裝斗爭、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共產黨的聯盟、多數原則的目標和種族和解的主張等。

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武裝斗爭問題，從各個角度講，這都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來討論這一問題。他們堅持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首先放棄暴力和武裝斗爭，政府才同意正式和談，即由博塔總統出面進行談判。他們的論點是，暴力是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犯罪行為。

我反駁說，政府要對暴力負責，因為總是壓迫者，而不是被壓迫者熱衷于這種斗爭形式。如果壓迫者使用暴力，被壓迫者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以暴力進行反擊。就我們的情況而論，暴力僅僅是一種自衛的合法形式。我大膽地表示，如果政府決定使用和平方式，非洲人國民大會也將使用和平的方式。我說：“放棄暴力的主動權在你們的手中，而不是取決于我們。”

我認為，在這一點上得到了他們的理解，但是，問題很快從哲學討論轉向了實踐方面。正如庫依茨部長和巴納德博士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反復強調，不會同任何提倡暴力的組織和談。因此，如何忽然宣布與非洲人國民大會談判而又不使自己失信呢？他們說，為了使我們能夠開始談判，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作出一些讓步。這樣，政府就不至于在他們自己的人民面前丟面子。

這種說法是合情合理的，我能夠理解，但是，我沒有辦法為他們找到別的出路。“先生們，”我說，“解決你們自己所面臨的困難并不是我的工作。”我索性告訴他們，他們必須告訴他們的人，不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坐下來談判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解決南非面臨的問題。“人民是通情達理的。”我說。

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共產黨聯盟這個問題似乎與武裝斗爭一樣，讓他們感到棘手。國民黨接受了20世紀50年代最頑固、最保守的冷戰思維方式，把蘇聯當做邪惡的帝國，把共產主義當做惡魔的作品。我沒有辦法能讓他們從這種錯誤觀念中解脫出來。他們堅持認為，共產黨支配和控制著非洲人國民大會，所以要開始談判，我們必須首先同共產黨決裂。

我說，首先沒有哪個有自尊心的自由戰士會服從他正在與之斗爭的政府的命令，或僅僅為了取悅于對手而拋棄自己長期的盟友。然后，我又作了大量的解釋，說明共產黨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是兩個不同的組織，兩個組織的短期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種族壓迫，建立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南非，但是，我們的遠期目標卻是不同的。

這個問題討論了好幾個月。像絕大多數南非白人一樣，他們也認為，由于非洲人國民大會中的共產黨人都是白人和印度人，因此，他們正在控制著非洲人國民大會中的黑人。我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共產黨在政策方面是不同的，并且，非洲人國民大會仍然是占主導地位的。但是，我的話似乎沒能打動他們。最后，我憤怒地對他們說：“你們認為你們自己是理智的，對不對？你們認為你們自己人多勢眾又能說會道，對不對？那么，你們有四個人，而我只有一個人，你們不能左右我，或者說讓我改變我的想法。是什么東西讓你們認為共產黨人能成功而你們則會失敗呢？”

他們對國有化的思想也很擔心，堅持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和《自由憲章》都在支持南非經濟的全盤國有化。我解釋說，我們主張更合理地分配某些工業的收益，即那些已經成為壟斷行業的工業部門，可能要實行國有化。但是，我們建議他們看一看我在1956年為《解放》雜志寫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說，《自由憲章》不是社會主義的構想，而是非洲式資本主義的藍圖。我告訴他們，從那時起，我的這個思想一直就沒有改變。

討論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多數原則。他們認為，如果有了多數原則，少數民族的權利就可能會受到踐踏。非洲人國民大會將如何保護少數民族白人的權利？他們要求搞清楚這一點。我說，在南非歷史上，沒有哪個組織在努力團結南非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種族方面能比得上非洲人國民大會。我請他們讀一讀《自由憲章》的前言：“南非屬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體人民，沒有黑人和白人之分。”我告訴他們，白人也是非洲人，在將來任何形式的治理中，處于多數的民族都需要少數民族。我說：“我們并不想把你們趕進大海里去。”

94...

會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988年冬天，有人告訴我，博塔總統打算在8月底之前與我見面。（南半球的時令變化與北半球相反。）國家仍然處在動亂之中，政府在1987年和1988年兩次宣布實行國家緊急狀態。國際社會的壓力也在加強，有更多的公司離開了南非。美國國會通過了全面制裁南非的法案。

1987年，非洲人國民大會慶祝成立75周年，并于當年底在坦桑尼亞舉行了慶祝大會。當時，有50多個國家派代表團出席了大會。奧利佛宣布，武裝斗爭將會進一步加強，直到政府準備和談、廢除隔離制度為止。兩年前，在為紀念《自由憲章》誕生30周年而在贊比亞的卡布韋舉行的大會上，其他種族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首次被選進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宣布，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全部領導人被從監獄釋放出來前，非洲人國民大會不會再與政府舉行談判。

盡管暴力仍然在到處彌漫，但國民黨卻從來沒有如此強大過。在1987年5月份舉行的白人大選中，國民黨以壓倒性多數贏得了大選。情況更糟糕的是，自由進步聯合黨作為官方反對黨被保守黨所取代，這正好符合國民黨人的利益，便于政府打一場以政府對黑人太寬容為主題的宣傳戰。

盡管我對秘密會談持樂觀態度，但是，當時仍然是一個困難時期。溫妮剛剛來探望了我，她告訴我，我們在奧蘭多西8115號的房子被縱火犯放火燒毀了，那里是我們結婚的地方，我也一直把那里看成自己的家。我們失去了寶貴的家庭檔案、照片和紀念品，甚至包括溫妮為我將來釋放保留的一塊結婚面包。我總是想，有一天，當我從監獄里出來的時候，通過看到那些照片和書信就能回想起過去。但是，現在卻都已經化為灰燼。監獄剝奪了我的自由，但卻無法剝奪我的記憶。然而，現在我感到，某些敵人甚至企圖剝奪能喚起我記憶的東西。

我患上了嚴重的、似乎無法擺脫的咳嗽，并且常常感覺身體虛弱，根本無法進行體育鍛煉。我不斷地抱怨我的牢房太潮濕，但也無濟于事。一天，在探視區與我的律師伊斯梅爾·阿堯博見面期間，我感覺身體很不好，并且不停地嘔吐。于是，我被帶回牢房，并找一位醫生為我做了檢查，我很快就康復了。但是，幾天后，我吃過晚飯正在牢房里待著，忽然來了幾個獄警和一名醫生。醫生給我做了簡單的檢查，然后，一個獄警讓我穿好衣服，說：“我們準備帶你去開普敦的醫院。”在嚴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上了一輛轎車，另外有好幾輛轎車和軍車護送，并且至少有十幾個獄警陪同。

我被送到位于斯泰倫博斯大學校區的泰格堡醫院，那里屬于開普敦的一個綠色富人區。正如我后來發現的那樣，他們選擇了一個特別的地方，因為當局害怕我在一所大學醫院里可能會引起別人的同情和關注。獄警首先進入醫院，把入口處的人統統趕走。然后，我被護送到一樓，當時那里已經空無一人，大廳里卻有十幾名武裝警衛人員一字排開。

當我坐在體檢室內的一張桌子旁邊的時候，一位年輕而友善的醫生給我做了檢查，他也是這個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他檢查了我的喉嚨，聽了一下胸部，并做了一些常規檢查，不大一會兒就給我檢查完了。“你什么病都沒有，”他微笑著說，“我們明天就讓你出院。”我正在擔心我的病會影響我與政府之間的會談，因此，我對這個診斷結果感到很高興。

檢查完后，那位醫生問我是否想喝杯茶，我說好的。幾分鐘后，一位高個子有色人護士端著茶盤走了進來。大廳里全是武裝警衛和獄警，這使她非常緊張，她慌慌張張地把茶盤放在我的病床上，茶水濺到了盤子上，她趕忙離開了大廳。

在重兵保衛下，我在那間空蕩蕩的病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還沒有吃早飯，有一位老醫生就來看我，他是這個醫院的內科主任。老醫生是一個嚴肅認真的人，遠沒有頭一天那位熱情的年輕醫生對病人的態度好。他沒有給我做任何常規檢查，僅僅是在我胸部敲了幾下，然后就生硬地說：“你肺里有水。”我告訴他，昨天那位醫生已經做過檢查，說我沒有病。他有點兒不高興地說：“曼德拉，你看你的肺部。”他說，我的肺部一側比另一側大很多，很可能有積水。

他讓一個護士給他拿了一個注射器，干凈利落地刺進我的肺部，很快就抽出了一些褐色液體。“你吃早飯了嗎？”他問。我說沒有。“那好，”他說，“我立即帶你去手術室。”他告訴我，我的肺里積有大量的水，他要立即把水抽出來。

在手術室里，我被實施了麻醉。我記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當我醒來的時候，那個醫生還在。我感覺有些昏昏沉沉，但是，我聽他在說他從我的胸部抽出了兩升液體，經過化驗，發現有結核病菌。他說，我的病尚在初發期，對肺沒有造成什么損害。他又說，盡管重結核病病人正常需要花六個月才能治好，但我應該有兩個月的時間就能痊愈。醫生還說，可能是潮濕的牢房使我患上了這個病。

我在泰格堡醫院又住了六個禮拜，接受康復治療。12月份，我被轉到了康斯坦提亞伯格專科醫院。這是一家位于波爾斯穆爾監獄附近的豪華醫院，在此之前，還從來沒有黑人來這里看過病。我到了那里后的第一個早晨，科比·庫依茨就來醫院看望了我，陪同他一起來的還有負責照顧我的副監獄長馬雷少校。在我們互致問候的時候，我的早飯也被按時送到了我的病房。

由于我一直在患病，而且有高血壓病史，所以院方要求我嚴格控制進食高熱量的食物。當時，這項醫囑顯然還沒有來得及通知醫院的廚房，因為送來的早餐有炒雞蛋、三片培根和幾塊加了黃油的烤面包。我已經有好長時間沒有吃到培根和炒雞蛋了，而且我已經餓瘋了。正當我準備享用那些可口的炒雞蛋的時候，馬雷少校說：“不，曼德拉，這些食物有違醫囑。”他走過來想把我的早餐盤子端走。我緊緊地抓著盤子說：“少校，很抱歉。就是這份早餐能藥死我，我今天也顧不了那么多了。”

我在康斯坦提亞伯格醫院安頓好后，就又開始與科比·庫依茨和秘密委員會恢復了會談。當我仍然在醫院里住院的時候，庫依茨就說，他想讓我處于半囚禁半自由的狀態。盡管他沒有詳細說明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仍然知道他說這個話的意圖。因此，我只是點了點頭。我當然不會那么幼稚地認為，他的建議就意味著自由。不過我也知道，這是朝著讓我自由的方向邁出的一步。

同時，這個專科醫院條件也特別好，我第一次真正喜歡在醫院里慢慢地康復。那里的護士們似乎把我寵壞了。她們不是白人就是有色人，但不允許有黑人。她們額外給我送來了甜食和枕頭，她們不斷地來看我，甚至不在班上的時候也是如此。

有一天，一個護士對我說：“曼德拉先生，我們今天晚上準備舉行一次聚會，希望你也能參加。”我說，我很榮幸參加你們的聚會，但是，監獄當局對此事肯定會有說法。監獄當局不允許我去，這使護士們很氣憤。于是，她們決定在我的病房里舉行聚會，并堅持說，如果我不參加，她們就不舉行這次聚會。

那天夜晚，有十幾位參加聚會的年輕女士，帶著糕點、飲料和禮物一窩蜂似的來到了我的病房。警衛們似乎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他們幾乎不認為這些活潑的年輕女士會有什么安全方面的危險。當一位警衛企圖阻止某些護士進入我的病房的時候，我還開玩笑地責怪他對一位老人引起那么多年輕漂亮的女士的注意而心生妒忌。

95...

1988年12月份，監獄當局加強了對我的牢房的安全防范措施，值班的獄警們也比往常提高了警惕，這無疑預示著要發生什么變化。12月9日晚上，馬雷少校走進了我的房間，讓我準備離開醫院。“上哪兒去？”我問他。他沒有告訴我。我收拾起自己的東西，四處尋找那些真誠的護士。我為沒能向她們說聲謝謝和再見而感到失望。

我們匆匆忙忙離開了康斯坦提亞伯格專科醫院，大約一個小時后，我們進了一個監獄，我認出這個監獄的名字叫維克多·維爾斯特。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在開普敦東北35英里處，位于美麗的老開普區一個叫做帕爾的荷蘭人居住的城鎮上，那里是開普省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區。這個監獄擁有樣板監獄的“美譽”。我們行駛了很長一段路程，然后沿著穿過監獄后面的相當荒涼的一片密林的泥濘路來到了一座獨立的、刷成白色的單層小別墅，別墅周圍有混凝土墻和高大的冷杉樹。

我被馬雷少校領進了那座別墅，我發現里面有寬敞的客廳和與客廳相鄰的大廚房，后面還有一個更大的臥室。里面雖然配備的東西不多，但很舒適。在我到達那里之前，別墅顯然一直沒有打掃，臥室和客廳里有各種不知哪里來的蟲子、蜈蚣、猴面蜘蛛等，有的蟲子我過去從來沒有見過。那天夜晚，我把床上和窗臺上的蟲子清除干凈，在我將來的這個新家里睡得特別好。

第二天早上，我考察了我的新住處，發現后院里有一個游泳池，另外還有兩間小臥室。我走出房間，欣賞著那一棵棵為房子遮陰納涼的高大樹木。整個去處讓人感到遙遠，似乎與世隔絕。唯一有損這幅田園詩般的圖畫的，就是墻上裝有帶刺的鐵絲網和出口處有警衛站崗。盡管如此，它仍然不失為一處美妙的地方，因為這座別墅可以說是介于監獄和自由之間。

那天下午，科比·庫依茨來看望了我。他帶來了一箱開普葡萄酒，作為為我的新家“溫鍋”的禮物。一個監獄官員給他的囚犯帶來這樣的一件禮物，對我們雙方都具有諷刺意味。他非常熱心，并希望核實一下我是否真的喜歡這個新家。他親自察看了房子，唯一的建議就是房外面的墻應該加高，他說是為了不讓我受到干擾。他告訴我，維克多·維爾斯特這座別墅將是我成為一個自由人之前最后的一個家。他說，這次搬家的理由是想讓我有一個安閑、舒適的地方舉行私下會談。

這座別墅確實讓我有一種自由的感覺，我可以隨意睡覺和起床，愿意什么時候游泳就什么時候去游泳，想什么時候吃飯就什么時候吃飯，吃的也都是可口的飯菜。白天可以隨便到外面走走，在我希望散步的時候去散散步，這是一種自我感到榮耀的時刻。窗子上沒有鐵欞子，也沒有叮叮當當的鑰匙，因為不再需要鎖門和開鎖。在那里，處處都使我感到愉快，但是，我從來沒有忘記那只是一個鍍了金的籠子。

監獄為我配備了一個廚師，都叫他司沃特準尉。他是一個身材高大、性情安靜的南非白人，曾經是羅本島監獄的獄警。我并不記得他曾經在羅本島上工作過，但是他說，有時候他開著車送我們去石灰石料場，并故意開著車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不過是為了讓我們在車上坐不穩當。“那就是我對你們干的事。”他靦腆地說，并且笑出了聲。他是一個正派的、性情十分溫和的人，并且沒有偏見，在我看來就像是我的一個小弟弟。

他每天上午7點過來，下午4點離開，為我做早飯、午飯和晚飯。醫生為我制訂了食譜，他按照食譜準備飯菜。他是一位可愛的廚師，當他回家的時候，他會把我的晚飯放在微波爐里，以便加熱，微波爐當時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新鮮玩意兒。

司沃特準尉為我烤面包、釀造清淡啤酒和其他美味佳肴。當有人來看我的時候，他會準備精美的飯菜。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人來看我。他們總是稱贊飯菜做得好，我敢說我的廚師讓所有來看我的人都有些羨慕。當當局開始允許我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同志、聯合民主戰線（UDF）和群眾民主運動（MDM）組織的人來看我的時候，我敢說他們就是沖著美味的飯菜而來的。

有一天，吃過司沃特先生做的精美飯菜之后，我走進廚房去洗盤子。“不，”他說，“那是我的工作，你一定要回會客廳。”我堅持說，我必須干點活兒，你做飯，我洗盤子，這是合情合理的。司沃特先生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是，他最后還是讓了步。他也反對我早上起來自己整理床鋪，說這些活兒都是他應該干的。但是，多年來，我一直自己收拾自己的床褥，這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有時，我們也從另一方面互相取長補短。像許多講南非荷蘭話的獄警一樣，他也很希望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而我則總是在尋找提高我的南非荷蘭話的方法。我們兩人達成了一個協議：他與我講英語，而我則用南非荷蘭語回答，這樣，我們兩人都能有機會練習自己說得最差的語言。

我經常點幾個菜讓他做。我有時要吃玉米粥和大豆，這些是我從小就喜歡吃的東西。有一天，我說：“你知道，我想讓你給我做一些糙米。”讓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問：“糙米是什么？”司沃特是年輕人，我向他解釋，糙米就是沒有經過精加工的粗米。在戰爭年代，當沒有白米吃的時候，我們常常吃糙米。我說，吃糙米遠比吃白米有利于身體健康。他對我說的話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仍然設法為我找了一些糙米。我親自指導他把糙米做熟，我吃得有滋有味。但是，司沃特先生不喜歡吃這種糙米飯，并鄭重其事地說，如果我再要吃這種糙米，我必須自己去做。

盡管我不是一個喜歡喝酒的人，但是，來了客人，我總是喜歡用葡萄酒招待我的客人。有時，為了讓我的客人感覺舒適，我也會喝上一點兒。但是，我唯一能喝的是一種南非的“半甜”葡萄酒，這種酒實際上很甜。

在我的客人到來之前，我會讓司沃特先生去弄一種尼德堡葡萄酒。這種酒以前我曾經喝過，知道它是一種真正的半甜酒。有一天，我期待著我的朋友和律師杜拉·奧馬爾、喬治·畢佐斯和伊斯梅爾·阿堯博來吃午飯，因此，我讓司沃特先生去買一些尼德堡葡萄酒。喬治·畢佐斯不是穆斯林，他可能會在吃飯的時候喝點兒酒。我發現，當我讓司沃特去買酒的時候，他苦著臉，我問他出了什么事。

“曼德拉先生，”他說，“我總是給你買這種酒，只是因為你老是讓我去買這種酒，但是，這種酒是一種很便宜的飲料，并不怎么好。”我提醒他，我不喜歡干葡萄酒，我認為喬治無論如何也喝不出有什么差別來。司沃特聽著我說的話有點兒好笑，于是建議折中一下：他出去買兩瓶酒，一瓶是干葡萄酒，另一瓶是我要的尼德堡葡萄酒，然后我可以問問我的客人到底喜歡哪一種。“那好，”我說，“讓我們試一試你的主意。”

當我們四個人都已入座準備吃午餐的時候，司沃特拿著兩瓶酒走到我的客人們面前詢問：“先生們，你們喜歡哪種葡萄酒？”喬治看都沒看我，就指向那瓶干白葡萄酒。司沃特準尉笑了。

96...

與談判委員會的會談仍在繼續，但是，我們總是在一些相同的問題上糾纏不休，使我們無法往下談。這些問題依舊是：武裝斗爭、共產黨和多數原則。我一直在敦促庫依茨安排讓我與P. W.博塔會談。這時候，當局已經允許我與我在波爾斯穆爾、羅本島和盧薩卡的同志們進行最起碼的溝通。盡管我知道我比我的同事們先行了一步，但是，我并不想走得太遠，一味地孤軍奮戰。

1989年1月，波爾斯穆爾監獄的四位同志來看我，我們討論了我準備提交給總統的那份備忘錄。備忘錄包含了我們在秘密會談中所談的多數內容，但是，我仍然想讓總統直接聽聽我的想法。他會明白，我們并不是怒目相向的恐怖分子，而是有理性的人。

3月份，我在致博塔先生的備忘錄中說：“正如其他南非人都毫無疑問地感到不安一樣，我為南非分裂成勢不兩立的黑人和白人兩大陣營互相殘殺而感到不安。”為避免這種局面并為和談奠定基礎，我建議政府同意放棄對非洲人國民大會提出的三項要求作為和談的前提條件，即，放棄暴力、與南非共產黨決裂和放棄多數原則。

關于暴力問題，我寫道，非洲人國民大會拒絕放棄暴力并不是主要問題，“問題在于政府還沒有做好與黑人分享政治權力的準備……”我解釋說我們愿意把南非共產黨放在一邊，并重申我們并不處在南非共產黨的控制之下。我寫道：“哪一個有尊嚴的人會在共同的對手仍然存在的時候拋棄仍然與他們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的終身朋友？”我說，政府反對多數原則只不過是試圖維護統治的一種不太巧妙的托詞。我建議他要面對現實。“多數原則和國內和平就像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白人統治的南非必須承認，只有多數原則得到充分實行，這個國家才會有和平和穩定。”

在信的末尾，我提出了關于和談的粗略框架。

有兩個政治問題必須要進行討論。首先，在統一的國家中要求實行多數原則；其次，白人對這種要求的擔心以及白人堅持在政權結構上得到保證，即多數原則并不僅僅意味著少數白人受大多數黑人的統治。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所面臨的最關鍵任務就是要在這兩個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

我建議，完成這個關鍵任務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坐下來討論，創造與和談相適應的條件；第二步是實際和談本身。“我必須指出，我的動議為你提供了打破目前僵局的機會，并且可以使國家的政治形勢正常化。我希望，你能不失時機地抓住這個機會。”

但是，時機還是失去了。1月份，P. W.博塔忽然身患中風。盡管中風并沒有使這位總統喪失執政能力，但是，卻使他更虛弱了，并且據他的內閣講，中風使他變得更加急躁。2月份，博塔出人意料地辭去了國民黨主席的職務，但仍然保留自己作為國家總統的職務。這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出現了一種不協調的局面：按照南非議會制度，處于多數的黨的主席才能擔任國家總統。博塔現在仍然是國家總統，但卻不再是他自己那個黨的主席了。有些人把這件事看成是一種積極的措施：為了給南非帶來真正的變化，博塔想要“超脫政黨政治”。

政治暴力和國際社會壓力仍然在不斷加強。全國被扣押的政治犯成功地舉行了絕食斗爭，要求司法部下令釋放900多名在押的政治犯。1989年，聯合民主戰線與南非貿易工會大會結成了同盟，組建了群眾民主運動，當時正準備著手組織全國性的“反抗運動”向隔離制度挑戰。在國際戰線上，奧利佛·塔博與大不列顛政府和蘇聯舉行了會談，并于1987年1月在華盛頓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美國承認，非洲人國民大會是解決南非問題不可缺少的因素，對南非的制裁仍然在繼續，并且正在進一步加強。

政治暴力也有其悲劇性的一面。隨著索韋托暴力的不斷加強，我的夫人找了一伙年輕人做她在索韋托活動時的保鏢。這些年輕人沒有接受過訓練，組織紀律性很差，參與了一些與解放斗爭的宗旨不相符的活動。后來，溫妮由于她的一個保鏢受審而在法律上受到了牽連，這個人當時被指控殺了一位年輕的同志。這個案子使我非常擔心，因為這樣的丑聞在團結為重的時期只能會使運動組織發生分裂。我全力支持我的夫人，并堅持認為，盡管她判斷有誤，但是，對她的任何嚴重指控，她都是無辜的。

那年的7月，為了我的71歲生日，幾乎我全家都到維克多·維爾斯特別墅來看望了我。這是我第一次與我的夫人、兒子、女兒、孫子和孫女團聚，無疑是一個重要的、令人高興的時刻。司沃特準尉盡其所能地準備了宴會，而當我讓我的一些孫輩在吃正餐之前先吃些布丁時，他甚至一點都不感到麻煩。吃完飯后，我的孫輩們跑到我的臥室去看恐怖錄像片，而成年人則在客廳里閑聊。我的全家人都圍繞在我的身邊，這使我感到特別高興，唯一的痛苦就是多年來我已經失去了許多這樣的機會。

97...

7月4日，威廉姆斯將軍又來看望了我。他告訴我，第二天我將被帶去見博塔總統。他把這次與博塔的會面說成是一種“禮節性拜訪”，并告訴我第二天早晨五點半動身。我告訴威廉姆斯將軍，盡管我期待著這次會見，但是，我認為去見博塔先生應該有一套像樣的西服和領帶（著名人士代表團來訪問時的那套西服早就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威廉姆斯將軍同意給我做一身西服，不大一會兒，一位服裝師來給我量了尺寸。當天下午，我就得到了新的西服、領帶、襯衣和鞋。在動身前，威廉姆斯將軍還問了我的血型，以防萬一第二天會發生任何不幸的事情。

我盡可能仔細地為這次會見做了準備。我又看了一遍我的備忘錄和為起草這個備忘錄所做的筆記。我盡可能多地看了一些報紙和刊物，以便了解時事。博塔總統辭去國民黨主席的職務后，F. W.德克勒克當選為新的國民黨主席，據說兩人之間一直在耍政治手腕。有的人可能把博塔愿意會見我解釋為搶先于其對手的一種方式，但是，我對此并不擔心。我還演練了一番總統可能要堅持的主張以及我如何作出反應。每次與對手會談，你必須確保能夠把要給對方留下的印象準確地留給對方。

我對去見博塔先生有些緊張。大家都叫他“die Groot Krokodil”（大鱷魚），我對他那狂暴的脾氣曾多次有所耳聞。在我看來，他似乎是守舊、固執、倔強的南非白人的典型，認為與黑人領袖沒有多少好商量而只能服從他們的。他剛剛發生的中風顯然只會加劇他的這些傾向。我決心已定，如果他對我指手畫腳，我將不得不告訴他，我對這種行為是不能接受的，然后我將站起來，中止與他的會談。

早晨5點30分，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的監獄長馬雷少校準時來到我住的那座別墅。他走進了客廳，我穿著新做的西服站在他面前讓他看一看。他圍著我轉了一圈，然后一個勁地直搖頭。

“不，曼德拉，你的領帶……”他說。我在監獄里很少戴領帶，我知道那天早上系領帶的時候，我已經不記得如何正確地打結了。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了個結，并希望沒有人會注意到它。馬雷少校解開了我的衣領，松開并取下領帶，然后站在我身后，給我打了一個雙溫莎結。然后，他走到我的面前欣賞他自己為我系的領帶。“好多了。”他說。

我們乘車從維克多·維爾斯特到波爾斯穆爾，然后又到了威廉姆斯將軍的家里。在他家里，將軍的夫人為我們準備了早餐。吃過早飯后，在一個小型車隊的護送下，我們乘車來到了總統府圖因胡伊斯。我們把車停在地下停車場，在那里誰也不會看到我們。圖因胡伊斯是一座優美的19世紀開普荷蘭式建筑，但是，那天我并沒有能好好地看看這座建筑，而只是悄悄地直接進了總統府。

我們在地下停車場乘電梯來到總統辦公室前面的一個華麗的、木板鑲壁的大廳。在大廳里，我們受到了科比·庫依茨、尼爾·巴納德和一批監獄隨從官員的迎接。我早就已經就這次會見與庫依茨和巴納德博士廣泛地交換過意見，他們一直在勸我避免與總統談有爭議的問題。在我們等候在那里的時候，巴納德博士向下看了一眼，發現我的鞋帶沒系好，便立即蹲下來為我把鞋帶系好。當時，我只注意他們如何緊張，卻也沒有使我自己鎮定下來。然后，門開了，我帶著最壞的打算走進了總統辦公室。

P. W. 博塔從他氣派的辦公室對面朝我走過來。顯然，他事先已經對自己的步幅作過演練，因為我們正好到達房中間的時候走到了一起。他笑容滿面地伸出了手，事實上，從這一時刻開始他完全使我放松了下來。他客氣、恭敬而友好，顯得有點兒令人難以置信。

我們很快就擺好姿勢，兩人握著手拍了照，然后與科比·庫依茨、威廉姆斯將軍和巴納德博士一起坐在了一張長桌子旁。有人給我們倒上茶，然后我們就開始談判。似乎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有陷入緊張的政治爭議之中，而是雙方進行生動而有趣的交流。我們沒有討論實質性的問題，而是談了一些諸如歷史和南非文化方面的話題。我提到自己剛剛在一份布爾語雜志上閱讀了一篇關于1914年南非白人叛亂的文章，也提到了他們如何占領了自由邦的城鎮。我說，我把我們的斗爭看作與這次著名的反叛相類似的斗爭。我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討論這些歷史插曲。對南非的歷史，黑人和白人當然有很不一致的看法。他們認為，那次反叛只是兄弟之間的吵架，而我們的斗爭則是一種革命斗爭；我說，也可以把我們的斗爭看作膚色不同的兄弟之間的一種斗爭。

這次會談進行了不到半個小時，自始至終都充滿著友好而輕松愉快的氣氛。就在這個時候，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請博塔先生無條件地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其中也包括我自己。這是會談中唯一比較緊張的時刻，博塔先生說，他恐怕不能滿足我這個要求。

然后，就會談的消息如果透露出去我們將如何解釋這個問題進行了簡短的討論。我們很快就起草了一個輕描淡寫的聲明，把我們的會談說成是促進國家的和平而在一起喝茶。在這一點上達成一致意見后，博塔先生站起來與我握手，并說我們一直談得很愉快。的確一直很愉快。我向他表示感謝，然后沿著我們來的路線離開了總統府。

盡管這次會談從和談的角度講并沒有取得進展，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講，還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博塔先生早就說過，我們必須跨過魯比肯河，但是，他直到那天上午在圖因胡伊斯才親自這樣做了。當時我認為，我們并沒有走回頭路。

一個多月之后，即1989年8月，P. W.博塔走上國家電視臺，宣布辭去國家總統的職務。在一篇近乎漫談式的告別演講中，他指責內閣成員不守信用，對他置之不理，使非洲人國民大會占了便宜。第二天，F. W.德克勒克作為代總統宣誓就職，并宣布將致力于改變和改革。

我們以前認為，德克勒克先生就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在他成為國民黨主席的時候，他似乎是一個典型的國民黨黨員，做起事來不偏不倚，他的過去似乎沒有什么東西表明他具有改革精神。作為一位教育部長，他曾經力主不準白人大學招收黑人學生。但是，他一接管了國民黨，我就開始密切關注他。我讀了他所有的演講，聽了他所發表的談話，開始明白他真正背離了他的前任。他并不是一個理論倡導者，而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認為改變是必須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宣誓就職的當天，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要求與他見面。

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德克勒克說，他的政府將致力于和平，將與任何其他致力于和平的團體進行和談。但是，只有在他就職后，在大主教圖圖和阿倫·布塞克牧師領導群眾在開普敦策劃游行示威、抗議警察的野蠻行徑的時候，他關于新秩序的承諾才得以顯示出來。在博塔總統當政期間，這種游行將遭到禁止，而參加游行的人將會蔑視這種禁止，因此必然會導致暴力。而新總統卻實踐了不限制政治集會的諾言，允許舉行游行示威，只要求游行示威者不訴諸暴力。由此看出，掌舵的是一個新的、與前任不同的舵手。

98...

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總統，我仍然繼續在與秘密和談委員會接觸。憲法發展部部長格雷特·維爾強也加入了我們和談的行列，他是一個卓越的人物，擁有古典文學博士學位。當時，他的職責是把我們的討論納入憲法框架。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實際行動證明其美好的動機，并敦促政府釋放波爾斯穆爾和羅本島監獄的政治犯，以顯示其真正的誠意。在我告訴談判委員會必須無條件釋放我的同事的同時，我說，釋放他們以后，政府就可以看到，他們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戈萬·姆貝基的行為已經顯示了這一點，他是在1987年被無條件釋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總統宣布將釋放瓦爾特·西蘇陸和七名我在羅本島上的同志，他們是：雷蒙德·穆拉巴、阿邁德·卡特拉達、安德魯·木蘭基尼、伊萊亞斯·莫佐萊迪、杰夫·馬塞莫拉、維爾頓·穆夸毅和奧斯卡·穆培塔。那天上午，瓦爾特、凱西、雷蒙德和安德魯來看望了我，他們仍然住在波爾斯穆爾，所以我能夠向他們告別。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釋放的日子也不會太遠了。五天之后，這些人就被從約翰內斯堡監獄釋放了。這是一個立即引起國內、國外稱贊的行動，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與由于瓦爾特和其他人的釋放使我產生的那種興奮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顯得有點兒蒼白。這是我們那么多年一直渴望到來并為之戰斗的一天。德克勒克實踐了他的諾言，人們被無條件地釋放了，他們可以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名義發表講話了。顯然，對組織的取締也已經不再有效，這說明我們的長期斗爭和我們堅持原則的決心是正確的。

德克勒克著手有步驟地拆除各種隔離制度的障礙，他宣布，南非海灘度假勝地向所有膚色的人開放，并聲明，《保留福利設施隔離法》將很快被廢除。1953年以來，這項一直被大家稱作“小隔離”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強，把公園、劇院、餐館、公共汽車、圖書館、廁所和其他公共設施都按照種族進行分離式管理。11月，他宣布解散“國家安全管理系統”。在當時，這是一個在P. W.博塔執政期間建立起來的專門對付反隔離力量的秘密機構。

12月初我被告知，與德克勒克的會見安排在當月的12日。利用這段時間，我就能夠與我的新老朋友進行協商，并在維克多·維爾斯特別墅會見我的老同事和群眾民主運動及聯合民主戰線的領導人。我接見了來自各個地區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和來自聯合民主戰線及南非貿易工會大會組織的代表團。當時，其中有一位年輕人名叫西里爾·拉馬弗薩，他是全國礦工工會的總書記，也是新一代領導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個人。我的羅本島獄友也來看望了我，其中有“恐怖”勒寇塔和道克尤·賽克斯瓦勒，他們兩人還一起與我吃了午飯。他們兩人特別能吃，這是我唯一一次聽到司沃特準尉抱怨別人太能吃，他說：“那兩個人想把我們的家當全吃光！”

在幾位同事的指點下，我給德克勒克寫了一封信。與曾經寄給P. 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這封信的主題是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的談判問題。我告訴這位總統，當前的對立正在消耗著南非的生命力，談判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我說，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接受沒有先決條件的談判，特別是沒有政府要求的那種前提條件：停止武裝斗爭。政府要求“真誠地致力于和平”，而我指出，我們準備和談是真心實意的。

我告訴德克勒克先生，我對他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和闡述和解的內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話深深地影響了千千萬萬的南非和世界人民，因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個新南非的誕生。我說，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徹底廢除隔離制度，以及為加強隔離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說，那個講話精神后來并沒有多少見之于行動。許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為以其他方式繼續實行隔離制度。我說，政府在與“黑人家園”（班圖斯坦）的領袖和其他贊成這種制度的人談得時間太長了。我斷言，這些人是舊的剝削制度的代理人，廣大南非黑人是反對他們的。

我重申，我提議的談判要分兩步走。我告訴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在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采取的方針。這個聲明把消除政府自己制造的和談障礙的責任歸于政府方面，包括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對組織的取締和對個人的禁止，結束緊急狀態，從各地城鎮撤出軍隊。我強調說，共同達成停火協議、結束相互敵對行動應當是當務之急，因為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進行。這封信在我們會談的前一天被轉交給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帶到圖因胡伊斯，在我曾經與其前任喝茶的同一個房間里會見了德克勒克。他的陪同人員有科比·庫依茨、威廉姆斯將軍、巴納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麥克·洛維。我祝賀德克勒克當選總統，并表示希望我們能一道工作。他十分熱情，并對我作出了同樣的表示。

我從一開始就發現，在我說話時，德克勒克先生聽得非常認真。這是一種新鮮的經歷。國民黨的領袖在與黑人領袖們討論問題時，一般都是聽他們想聽的意見，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聽取和理解我們的意見。

那天，我著重強調的一個問題就是國民黨剛剛頒行的“五年計劃”，其中出現了“團體權利”的概念。所謂“團體權利”思想，意思是沒有哪個民族或種族團體高于其他種族團體。盡管他們把團體權利定義為“在南非保護少數種族自由的一種辦法”，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統治。我告訴德克勒克，這一條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我補充說，保留這個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為不放棄這一條，就會給大家造成他要使種族隔離現代化的印象，這會在國內和國際社會進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損于他和國民黨的形象。我說，對于一種壓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須全部拋棄。我提到了最近國民黨在開普地區的喉舌——《公民》報刊登了一篇社論，其中暗示，團體權利的概念被理解為從后門把隔離制度弄回來的一種企圖。我告訴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黨報這樣理解團體權利，那么，他又會怎么認為我們將如何理解團體權利的概念呢？我補充說，75年來，非洲人國民大會沒有反對隔離制度，這只是由于隔離制度有一層偽裝。如果他的真實意圖是通過團體權利這個特洛伊木馬來保留隔離制度，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想結束種族隔離。

我發現，那天德克勒克的反應有些遲鈍。這個人的特點就是，他注意傾聽我必須要說的話，并不與我爭論。“你知道，”他說，“我的目標與你的目標并沒有什么區別。你在給P. W.博塔的備忘錄中說，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府應當一道工作，去解決白人擔心的黑人統治問題，而‘團體權利’的思想就是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這種解釋對我有所觸動，但是，我說，“團體權利”與其說是減輕白人的擔心，倒不如說是增加黑人的擔心。然后，德克勒克說：“那么，我們就對它進行修改。”

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自由問題，并說，如果他認為我準備竭盡全力爭取自己獲得釋放，那他就大錯特錯了。我重申，如果我被釋放后，環境條件與我被捕時的環境條件仍然一個樣，那么我還會去干我被逮捕前所干的同樣的事情。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動和談的最好辦法就是取消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其他政治組織的禁令，停止實行緊急狀態法，釋放政治犯并讓被流放的人士回來。如果政府不取消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取締令，那么我一走出監獄，將仍然是在為一個非法組織工作。“那么，”我說，“你一定會在我走出監獄大門之后重新把我逮捕。”

他又一次認真傾聽了我所說的話。他肯定對我說的話不感到奇怪，因為他說他將考慮我所說的一切，但是，他不會作任何承諾。這次會談是一次試探性的會談，我知道，那天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但是，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談，就像我剛到羅本島的時候試探監獄長一樣，我對德克勒克進行了一番試探。我可以給盧薩卡的同志寫信，告訴他們，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的與以往的國民黨政客不同。我說，德克勒克先生印證了撒切爾夫人對戈爾巴喬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們能夠與之共事的一個人。

99...

1990年2月2日，F. W.德克勒克站在議會前致了傳統的開幕詞。他要做一些別的南非國家領導人沒有做過的事情：真正開始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從而為建設一個民主的新南非奠定基礎。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宣布：取消對非洲人國民大會、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南非共產黨和其他31個非法組織的禁令，釋放非暴力活動的政治犯，停止實行死刑，取消緊急狀態法及其規定的各種限制。他說：“和談的時刻已經到來。”

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因為，他真的一下子就使南非的形勢實現了正常化。我們的世界在一夜之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過40年的被迫害和被取締，非洲人國民大會現在又成了一個合法組織。我和我的所有同志不會再由于是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由于高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綠黃黑三色旗、由于說非洲人國民大會這個名字而被逮捕了。近30年來，我的照片、我說的話和我所有被禁止的同志們的照片及言論第一次可以出現在南非的報紙上。國際社會為德克勒克的勇敢行為喝彩。但是，在所有的這些好消息中，非洲人國民大會仍然對德克勒克先生沒有完全取消緊急狀態并命令軍隊從各城鎮撤離表示反對。

2月9日，也就是德克勒克在議會致開幕詞七天之后，我又一次接到了去圖因胡伊斯的通知。下午6點，我到達了總統府。我與微笑著的德克勒克在他的辦公室里見了面，當我們握手的時候，他告訴我，他準備第二天就把我從監獄里放出來。盡管南非和全世界的媒體幾周來一直在推測我即將被釋放，但是，這個宣布無論如何對我來說都算是一個驚喜。并沒有人告訴我，德克勒克要見我的原因是告訴我他打算讓我獲得自由。

我感覺我的內心和大腦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我很想盡快離開監獄，但是，根據如此簡短的一個通知就離開監獄卻是不明智的。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感謝，然后說，冒著看上去不領情的風險，我寧愿讓大家再關注一周，以便讓我的家庭和組織對我的釋放做好準備。我說，明天就這樣出去，可能會引起混亂。我請求德克勒克，從那天算起一周后再釋放我。等了27年后，我當然能夠再等上一個禮拜。

德克勒克對我的反應感到吃驚，他沒有對我的要求作出答復，而是繼續講述釋放我的計劃。他說，政府會用飛機先把我送回約翰內斯堡，并正式在那里釋放我。沒等他說完，我就告訴他，我強烈反對以這種方式釋放我。我想步行走出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的大門，并能向那些關照我的人表示感謝，向開普敦的人民表示問候。盡管我來自約翰內斯堡，但是，我已經在開普敦待了接近30年。我要回約翰內斯堡，但是，我會自己選擇在什么時候回去，而不是在政府要我回去的某個時候回去。“一旦我獲得自由，”我說，“我會自己照顧自己。”

德克勒克又一次顯得不知所措。但是，他這次還是對我的拒絕作出了反應。他說了聲“對不起”，就離開他的辦公室去與別人商量。10分鐘后，他滿臉不高興地回來說：“曼德拉先生，現在太晚了，計劃已經無法改變了。”我回答說，這個計劃是無法接受的，我想一周后在維克多·維爾斯特被釋放，而不是在約翰內斯堡。這是一個十分緊張的時刻，當時，我們兩人都沒有顧得上琢磨其中的諷刺意味：一個囚犯要求待在監獄里，而監獄警當局反而催他快走。

德克勒克又一次說了聲“對不起”，便離開了他的辦公室。10分鐘后，他帶回了一個折中辦法：“好，我可以在維克多·維爾斯特釋放你，但是，釋放時間不能往后延了。”政府已經告訴國外的媒體，我第二天將被釋放，他們認為不能違背自己作出的聲明。我覺得，不能再在這件事上爭論。最后，我同意了這個折中辦法，德克勒克為我們每人倒了一杯威士忌以示祝賀。我舉起威士忌呷了一口，但僅僅是假裝喝而已，因為這樣的烈性酒對我來說勁兒太大了。

我直到接近午夜的時候才回到了我的別墅，一到了那里，我立即給我在開普敦的同事們捎信，我將在第二天被釋放。我又設法給溫妮捎信，并給住在約翰內斯堡的瓦爾特打了電話。他們都將于第二天乘包機飛到開普敦。那天晚上，幾位來自被大家稱為全國接待委員會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人士來到我的別墅，為我起草我將在第二天發表的聲明。他們一早就離開了我的別墅，盡管我心情十分激動，但我當晚還是好好地睡了一覺。

# 第十一部 自由

100...

釋放我的那天，我4點半就醒了，只睡了幾個小時。那天是2月11日，是一個萬里無云的日子，也是開普敦結束夏季的一天。我做了一番簡單的常規鍛煉，然后洗漱并用了早餐。早飯后，我給幾位住在開普敦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和聯合民主戰線人士打了電話，讓他們來我住的別墅為我的釋放做準備工作，并幫助我寫講話稿。監獄里的醫生過來給我做了一次簡單的身體檢查。當時，我并沒有老是在想我被釋放后的前景，而是在想釋放前我必須要做的許許多多的事情。正如人生經常發生的事情一樣，重要關頭往往使人感到千頭萬緒、不知所措。

有許多必須要討論和解決的事情，但又幾乎沒有時間去做。接待委員會的幾位同志，其中包括西里爾·拉馬福薩和特雷弗·曼紐爾，高高興興地一大早就來了。我想首先向帕爾區人民發表講話，他們在我被囚禁期間一直對我很好。但是，接待委員會堅持認為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如果我首先向那些富有的帕爾區白人發表講話，會讓人感到奇怪。確實，按照計劃，我首先應該在開普敦大廣場向開普敦人民發表講話。

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我獲得自由后的第一個夜晚在什么地方度過。我傾向于在開普公寓區度過那個夜晚，因為那里是開普敦黑人和有色人居住區，可以顯示我和人民團結一致的決心。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夫人都堅持認為，為了安全，我應該在主教大院與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住在一起，那是位于白人居住區內的一座豪華住宅。在我被關進監獄之前，一直不允許我住在這個居住區。我想，在一個高檔的白人居住區度過我獲得自由后的第一個夜晚，可能會傳遞一個錯誤的信號。但是，接待委員會解釋說，主教大院已經成為圖圖領導下的多種族居住地，是開放的、包容的非種族主義的象征。

監獄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在我被囚禁的大約頭20年里，我幾乎沒積累下什么東西。但是，最后幾年我卻攢了足夠多的財產——主要是書和資料，足以彌補過去幾十年的不足。我這些家當裝了十幾個箱子。

我釋放的準確時間定在下午3點，但是，溫妮、瓦爾特及其他從約翰內斯堡乘包機過來的人直到下午2點多才到達。房子里已經有幾十個人，整個場面呈現出了一片喜慶的景象。司沃特準尉為我們大家準備了最后一次美餐。我對他表示感謝，不僅僅是因為他為我做了兩年的飯，更是因為他和我做了兩年的伴。詹姆斯·格雷戈里準尉也來到了現場，我熱情地與他擁抱在一起。幾年來，從波爾斯穆爾到維克多·維爾斯特，他給了我許多關照，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政治，但是，我們的友誼是不言而喻的，我會懷念他給我帶來的安慰。司沃特、格雷戈里和布蘭德準尉這些人使我更加堅定了對基本人性的信仰，甚至也包括那些把我關押了27年半的人。

當時，幾乎沒有多少告別的時間。根據計劃安排，溫妮和我乘車去監獄的前大門。我已經告訴了監獄當局，我想與關照過我的警衛人員和獄警告別，我請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在前門等著我，在那里，我將與他們一一道別。

下午3點過幾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廣播電臺的主持人給我打電話，他要求我在距離大門前幾百英尺處走下車來，這樣，他們就能夠為我拍攝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這個要求似乎是合理的，于是我同意了。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認識到，事情可能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樣平靜。

到了3點30分，我開始緊張起來，因為已經過了計劃安排的時間。我告訴接待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讓他們再等了。將近4點時，我們乘車離開了維克多·維爾斯特別墅。大約在距大門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車子慢慢地停下來，溫妮和我從車上下來，開始朝監獄的大門走去。

開始，我沒能看到我們前面有什么動靜，但是，當我們走到距離大門大約150英尺的時候，我看到一大群人正簇擁在那里。當時，現場有數百名攝影記者、攝像記者、新聞記者，以及數千名滿懷希望的人。我為此感到震驚，并且有點緊張。我真的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場面，我想象至多會有幾十個人，可能主要也就是獄警和他們的家人。但是，這個場面原來僅僅是開始。我發現，我們沒有充分做好應付要發生的這一切的準備。

在距離大門大約有20英尺的地方，照相機開始咔嚓咔嚓地響個不停，那種聲音聽起來就像“金屬動物”發出的噪音。新聞記者開始大聲地提問題，電視記者也開始向前擠，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支持者則在叫喊和歡呼。即使這種混亂稍稍讓我感到有點兒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一種令人愉快的場面。當一個電視臺記者把一個長長的、黑糊糊、毛茸茸的家伙對著我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還以為那是在我被關押期間發明的一種什么最新式武器呢！溫妮告訴我，那是一種麥克風。

當我來到人群當中的時候，我舉起了右拳，緊接著是一片歡騰。27年來，我一直不能這樣做，現在，它似乎給了我一種涌動的力量和激動。我們只在人群中待了幾分鐘，然后，就回到車上向開普敦駛去。盡管受到這樣的接待使我非常高興，但是，由于沒有機會向監獄的管理人員說聲再見，這還是使我感到十分苦惱。當我最后通過一道道大門從另一側進入汽車的時候，盡管已經71歲，但我仍然感到我的生活才剛剛開始。我想，長達一萬個日夜的囚禁生活終于結束了。

開普敦位于維克多·維爾斯特西南方35英里處，但是，由于沒預料到在監獄門口有那么多人，司機選擇了別的路線。我們的車隊繞到監獄的后面，抄小路和近路向市區駛去。我們穿過美麗的綠色葡萄園和一方方的農田，我盡情地欣賞著周圍的風光。

農村一片繁榮，而且管理得很好，但是，讓我吃驚的是竟然有許多白人家庭全家人都站在路旁觀看我們的車隊。他們從收音機里已經知道，我們要選擇另一條路線。有的人，可能有十幾個人，甚至舉起他們的右拳行非洲人國民大會會禮，這讓我吃驚不小。這些來自保守的農業地區的少有的勇敢人士，表示了團結一致的愿望，這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在一個地方，我停下車并從車里走出來，向一個白人家庭打招呼，感謝他們的支持，并告訴他們，他們的支持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不由地想到，我正在返回的南非與我離開時的那個南非已經完全不同了。

當我們進入開普敦市郊的時候，我可以看到人們正在向市中心蜂擁而去。接待委員會在開普敦大廣場組織了一個盛大的群眾集會，那里是一個十分開闊的廣場，直通到舊市政廳的前面。我將在舊市政廳的陽臺上向群眾發表講話，因為站在陽臺上可以俯視整個廣場。我們聽說，成千上萬的人自從上午就一直等候在那里。根據計劃，我們的車隊將避開人群，轉到市政廳的后面，我要從那里悄悄地進入大廈。

驅車到開普敦只用了45分鐘，當我們行駛到大廣場附近的時候，我們看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司機想右轉彎繞過廣場，但是，他卻莫名其妙地直接闖入了人海之中。人群立即擁了過來，把我們的汽車圍了個水泄不通。我們慢慢往前移動了一兩分鐘，然后被群眾的身體擋在了那里。人們開始敲打車窗，然后又敲行李箱蓋和車頂。在車里，聽著外面就像是下冰雹一般。然后，人們開始興奮地往汽車頂上爬，另有一些人則開始搖晃汽車。這時，我開始擔心起來。我感到，這種愛的表達方式可能會置我們于死地。

司機比溫妮和我更著急，他叫嚷著要從車里下來。我告訴他，先保持冷靜待在車內，我們后面車內的那些人會來救援我們。阿倫·布塞克和其他人開始想把人們從汽車周圍推開，為我的車清出一條路，但是并沒有成功。我們坐在車內，就是想打開車門也是徒勞的，因為有那么多人擠在汽車周圍。就這樣，我們的數千名支持者圍困了我們一個多小時。不用說，我計劃開始發表講話的時間早就已經過去了。

幾十名會議執行官員最終趕過來實施救援，并慢慢地清出了一個通道。當我們最后擠出人群的時候，司機加大油門朝著與市政廳相反的方向駛去。“伙計，你打算去哪里？”我有些不安地問。“我不知道！”他說。從他說話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他十分心焦。“我以前從來沒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他說。然后，他繼續漫無目標地往前行駛著。

當他靜下心來的時候，我告訴他去我朋友杜拉·奧馬爾律師家的方向，他當時住在該市的印度人居住區。我說，我們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這句話使他的情緒好了一點兒。很幸運，杜拉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但是，他看到我們感到很意外。27年來，我第一次成為一個自由人，他們并沒有向我們表示問候，而是有些關心地說：“你們不是去大廣場了嗎？”

我們本來可以在杜拉家喝點冷飲，但是，幾分鐘后，圖圖大主教就打來了電話，因此，我們只在那里待了幾分鐘。當時，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們在那里的。他十分著急，說：“納爾遜，你必須立即回到大廣場。那里的人群開始變得越來越焦躁不安。如果你不趕快回到這里，我不敢說會發生什么事情。我想，或許會發生騷亂！”我說，我馬上就趕過去。

我們的問題在于司機：他堅決不愿意再回大廣場。我說服了他，于是，我們很快就駛上了回市政廳的大路。市政大廈四周都圍滿了人，不過，好像后門的情況稍好一些，于是司機設法把車開到了后門。當我在別人的帶領下登上這座宏偉的、過去都是白人在里面工作的大廈頂層的時候，天幾乎已經到了黃昏時分。我走出大廳，來到了陽臺上，看到一眼望不到邊的人群正在不停地歡呼。他們有的手里拿著小旗，有的舉著標語，有的則在鼓掌，到處是一片歡笑的海洋。

我向人群舉起了拳頭，人群中響起了一片巨大的歡呼聲。這些歡呼聲使我重新煥發了斗爭精神。“Amandla！”（政權！）我高聲喊，“Ngawethu！”（屬于我們！）他們應和著。“非洲！”我又喊，“Mayibuye！”（再回來！）他們呼應著。最后，當人群開始安靜下來的時候，我掏出了我的講話稿，然后伸手從胸前的口袋里掏眼鏡，但眼鏡卻沒在口袋里。匆忙之間，我把眼鏡忘在了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里。我知道，溫妮的眼鏡度數與我的差不多，于是，就戴上了她的眼鏡。

朋友們、同志們、南非同胞們：

我以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義向你們致敬！我在這里，站在你們的面前，不是作為一個先知，而是作為你們——人民的忠實公仆。你們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犧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這里。因此，我將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們的手中。

說句心里話，我想首先告訴人們，我不是一個救世主，而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我之所以能成為一個領導人，實乃特殊的環境使然。我要感謝全世界的人民，他們為我的釋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感謝開普敦的人民，并向奧利佛·塔博、非洲人國民大會及其民族長矛軍、南非共產黨、聯合民主戰線、南非青年大會、南非貿易工會大會、民主運動組織、南非全國學生聯合會，以及南非婦女組成的、長期以來一直反映良知聲音的“黑腰帶”組織致敬。我還公開向我的夫人和家人表達了感激之情，我說：“我深信，與我本人相比，他們遭受的痛苦和磨難要大得多。”

我清楚地告訴大家，隔離制度在南非是沒有前途的，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棄大規模的行動。“地平線上已經出現了自由的曙光，我們更應該加倍努力。”我認為，有必要公開我與政府開始的談判。“今天，”我說，“我想告訴你們，我與政府談判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國家政治形勢的正常化。我要強調的一點是，除了堅持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政府之間就我們國家的未來進行談判，我自己決不單獨與政府談判。”

我說，我希望很快能夠營造一種有益于通過和談取得一致的氣氛，從而為結束武裝斗爭鋪平道路。我說，營造這種氣氛的步驟在非洲人國民大會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已經描述過。作為真和談的一個條件，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實行緊急狀態法，并釋放所有政治犯。

我告訴大家，德克勒克在實現政治形勢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國民黨領導人都要開明。當時，我用經常縈繞在我心頭的話說，我一直稱德克勒克先生是一個“誠實的人”。當德克勒克似乎不想實踐他的諾言的時候，我曾經多次想起這些話。

我絕不會屈服，并且斗爭對我來說并沒有結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剛剛開始。讓我的人民和政府明白這一點，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重申，我是“一個忠誠的、守紀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我鼓勵大家回到自己的戰斗崗位上，加強斗爭，共同走過這段最后的路程。

到我講完話的時候，已經到了晚上，我們被簇擁著回到汽車上向主教大院駛去。當我們進入那片古樸的建筑群時，我看到幾百張黑色面孔正在等待著迎接我。當他們看見我們的時候，大家突然唱起歌來。當我看到圖圖大主教的時候，我張開雙臂和他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這是一個用語言和膽識鼓舞整個國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時刻重新燃燒起了希望的火焰。我們被領進屋內，在那里，有更多的親屬和朋友在等候我們。但是，對于我來說，最高興的還是有人告訴我有一個從斯德哥爾摩打過來的電話的時候。我立即意識到打電話的人是誰。奧利佛·塔博的聲音比較低弱，但是，他的聲音絕對不會被人認錯。在這么多年之后，能再次聽到他的聲音使我非常高興。當時，奧利佛正在瑞典接受康復治療，他于1989年8月患上了輕度中風。我們約好要盡快見面。

我一直在夢想，一離開監獄就從從容容地開著車去特蘭斯凱，去看一看我的出生地，看一看我小時候曾經在那里玩過的山丘及河流，看一看我至今還沒有見到過的我母親的墓地。但是，我的夢想必須推遲，因為我很快得知，非洲人國民大會已經為我制訂了繁重的工作計劃，而在這些計劃中，沒有一項是去特蘭斯凱進行一次輕松的旅行。

101...

根據計劃安排，我釋放后的第二天下午要召開記者招待會。上午，我會見了許多同事，與他們商量招待會的議程和策略。我收到了一大堆賀電，并盡可能一封封地親自拆看。這些賀電來自世界各地，有的是總統發來的，有的是首相發來的。但是，我特別記得有一位開普敦白人家庭婦女發來的一封賀電，她的賀電使我尤為開心。賀電說：“釋放你我很高興，你將回到你的朋友和家人中，但是，你昨天發表的講話卻很令人厭煩。”

在進監獄前，我從來沒有舉行過那天舉行的那種記者招待會。過去沒有電視攝像機，而非洲人國民大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絕大多數都是秘密進行的。那天下午，有那么多的記者，他們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我不知道是在向誰說話。在這些記者中，我發現黑人記者占了很大的比例，這使我很高興。在記者招待會上，我還著重重申了幾個主題：首先，我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個忠誠、守紀律的成員。我對許多資深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在國外觀察我被釋放的這一事件很留心，他們一直試圖從遠處評價我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忠誠。我知道他們聽到了一些謠言，說我偏離了組織，放棄了原則，所以，我每次都要先澄清這一點。當有的記者問我在組織中將起什么作用時，我告訴他們，非洲人國民大會讓我起什么作用我就起什么作用。

我告訴記者們，在我繼續支持武裝斗爭和提倡和談之間并不存在矛盾。正是武裝斗爭的現實和威脅，才迫使政府走到了談判桌前。我補充說，當政府停止向非洲人國民大會實施暴力的時候，非洲人國民大會也會以和平回報政府。有人提到制裁問題，我說，非洲人國民大會還沒有要求減輕制裁，因為導致制裁的主要形勢——黑人沒有政治自由——仍然沒有任何改變。我說，我雖已經走出了監獄，但是，我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還被問及白人的擔心問題。我知道，人們預計我會拿白人撒氣。但是，我并沒有這樣做。在監獄里，我對白人的憤怒已經有所緩和，但是，我對這種制度的仇恨卻變得越來越強烈。我要讓南非人明白，盡管我仇恨這個使我們相互仇視的制度，但是，我甚至對我的敵人也不乏愛意。

我想讓記者們知道，白人在新的權力分配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我也絕不會忽略這個問題。我們不希望這個國家還沒有得到解放就先遭到毀滅，而驅趕白人無疑將會使這個國家毀于一旦。我說，在白人的擔心和黑人的希望之間存在一個中間地帶，我們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會找到這個中間地帶。“白人也是南非的同胞，”我說，“我們想讓他們感到安全，并想讓他們知道，我們對他們為這個國家的發展所作的貢獻表示贊賞。”不分男女，只要是放棄隔離制度的人，都將被團結在我們為建設一個民主的、沒有種族歧視的南非而進行的斗爭之中。我們必須盡我們的所能，說服我們的白人同胞，一個新的、沒有種族歧視的南非對所有的南非人都將是一個更好的國家。

在我第一次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發現，正如記者們很想了解我的政治思想一樣，他們也很想了解我的個人感情和我的親屬。這對我來說是一件新鮮事兒，當我走進監獄的時候，一個記者絕不會想著詢問關于我夫人和家人的問題，關注我的情感和最隱秘的時刻。盡管媒體對這些事感興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發現要滿足他們的這種好奇心是很困難的。我不是，并且從來就不是一個善于在大庭廣眾面前談論自己的情感的人。記者們常常問我獲得自由之后有什么樣的感覺，我只能盡最大的努力去描述這類不好描述的事情，并且，我通常是不成功的。

開完記者招待會之后，圖圖大主教的夫人從約翰內斯堡打電話說，我們必須直接坐飛機去約翰內斯堡。溫妮和我都希望在開普敦放松幾天，但是，根據我們得到的信息，約翰內斯堡的人民越來越焦躁不安，如果我不立即趕過去，那邊就會出亂子。那天晚上，我們乘飛機到了約翰內斯堡，但是，我被告知，當時有數千人圍在我的老家——重新建成的奧蘭多西8115號，去那里是不明智的。我勉強同意了，因為我渴望在自己的家里度過我釋放后的第二個夜晚，但是，溫妮和我還是住在了北郊一個非洲人國民大會支持者的家里。

第二天上午，我們乘直升機飛往索韋托第一國家銀行體育場。我因而能夠在上空轉一圈兒，看一看索韋托這個由火柴盒式的房子、鐵皮棚子和塵土飛揚的道路組成的大都市，這里是南非黑人的母城，也是我作為一個男人走進監獄之前所知道的唯一家園。盡管索韋托有了發展，有的地方也很繁華，但是，絕大多數人仍然十分貧窮。他們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只能勉強維持生計。在像南非這樣比較富裕的國家里，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許多地方，人們比我進監獄時還要貧窮得多。

我們繞著擠滿了12萬人的體育場上空盤旋了一周，然后降落在運動場的中央。體育場里到處都擠滿了人，看上去好像要擠爆了。我表示，回到他們中間我很高興，但是，隨后我就對那些給城市黑人生活造成各種嚴重損害的人進行了譴責。我說，學生們必須回到學校，犯罪行為必須得到控制。我告訴他們，我聽說有的犯罪分子裝扮成自由戰士，騷擾無辜，焚燒汽車，這些流氓在斗爭中絕沒有好下場。沒有教化的自由，沒有和平生活的自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

今天，我滿懷愉快的心情回到了索韋托。同時，我也懷著悲傷的心情回到了索韋托，我悲傷地得知你們仍然在野蠻的制度下遭受痛苦。沒有房子，沒有學校，沒有工作，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雖然我作為索韋托社區的一個成員而感到自豪，但我也為從報紙上看到索韋托的犯罪統計數字而深感不安。盡管我理解我們的人民被剝奪了權利，但是，我必須說清楚，城內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是有害的，必須作為當務之急予以解決。

最后，我向所有善良的、懷有良好愿望的南非人張開了我的雙臂，作為講話的結束，我說：“不分男女，只要是放棄隔離制度的人，都不會被排斥在我們的運動之外，我們的運動正朝著按照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建設一個沒有種族歧視、團結、民主的新南非向前發展。”這就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使命，這就是我多年寂寞地在監獄生活期間一貫堅持的目標，這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要堅持的目標，這也是我44歲走進監獄的時候珍藏在心底里的一個夢。但是，我已經不再是一個年輕人，現在我已經71歲了，我已經浪費不起任何時間。

那個夜晚，我同溫妮一起回到了奧蘭多西8115號，直到這時，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已經離開了監獄。對于我來說，8115號是我的人生世界的中心，是在我的精神地理中標有“X”標記的地方。當時，這套四室的房子在被付之一炬之后已經被重新建好。當我看到它的時候，我為它比我記憶中的那個家小得多又那么簡陋而感到吃驚。與我在維克多·維爾斯特住的那座別墅相比，8115號只比得上別墅后面那個供傭人住的小房子。但是，一個人獲得自由后居住的任何房子，與哪怕是最豪華的監獄相比，都會讓人感到就像是一座城堡。

那一夜，盡管我回到家中很高興，但是，我覺得自己最需要、最渴望的事還是否定現在的自己。我希望恢復一種正常而普通的生活，重新去做我年輕時做的工作，能夠早上去我的辦公室，晚上回到我的家中；能夠出去逛逛，到雜貨店里買一些牙膏；能夠在晚上出去轉轉，看看自己的老朋友。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正是一個在監獄里的人最向往的和獲得自由之后最想干的事情。但是，我很快意識到，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的。那天夜晚，不，而是隨后幾周、幾月中的每個夜晚，房子周圍總是圍著數百位希望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人們在那里歌唱、跳舞和歡呼，他們的愉快情緒感染了我。這些人都是我的人民，面對他們，我沒有權利也不希望否定我自己。但是，在把我自己交給我的人民的過程中，我也明白，我將再一次把自己從我的家中分離出來。

那個夜晚，我沒有睡多少覺，因為歌聲一直持續了好幾個小時。非洲人國民大會和聯合民主戰線負責警衛我這所房子的人要求大家保持安靜，以便讓我們好好休息。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有許多人勸我搬到迪普克魯夫擴建區去住，因為在我蹲監獄的時候，溫妮已經在那里建了一處房子，離8115號只有幾條街。按照索韋托居住水準，它算是一個很氣派的地方，但是對我來說，它卻是一所沒有任何意義或留下任何記憶的房子。不僅如此，由于面積太大，費用太高，似乎也不適合一個人民的領導人居住。我盡可能地拒絕了那個建議，我不但要住在我的人民中間，而且還要像人民一樣住下來。

102...

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向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層匯報情況。2月27日，也就是我出獄兩周多之后，我乘飛機去盧薩卡會見全國執行委員會。能與幾十年沒見面的老同志見面，無疑是一次令人高興的重逢。有許多國家的黑人領袖也參加了我們的聚會，我分別與津巴布韋的羅伯特·穆加貝、贊比亞的肯尼思·卡翁達、博茨瓦納的奎特·馬西雷、莫桑比克的華金·希薩諾、安哥拉的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斯、烏干達的約韋里·穆塞韋尼進行了短暫的會談。

在執行委員會的成員為我的獲釋感到高興的同時，他們也很想對我這個被釋放的人進行評價。從他們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他們有許多問題要問。曼德拉還是27年前走進監獄的那個人嗎？或者，這是一個不同的曼德拉，還是一個被改造了的曼德拉？他挺過來了，還是垮掉了？他們聽到過我與政府對話的報道，對此，他們當然十分關心。我不僅與外界失去了聯系，而且自從1984年開始，我甚至不能與監獄內的同事們進行溝通。

我認真而嚴肅地說明我與政府談判的真實情況，并講述了我提出的要求和所取得的進展。他們看過我給博塔和德克勒克寫的備忘錄，知道這些文件堅持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我知道，前幾年有些被釋放的人去了盧薩卡，并散布謠言說：“曼德拉現在軟下來了，他已經被監獄當局收買了。他穿著三件套的西裝，喝葡萄酒，還吃上等食品。”我聽說過這些謠言，也想過予以駁斥。但我知道，駁斥這些謠言最好的辦法就是直截了當、老老實實地把我所做的一切講清楚。

在全國執行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我被選舉為副主席，在奧利佛康復療養期間，由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總書記阿爾弗雷德·恩佐擔任執行主席。在我們見面之后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我被問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長期支持者、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博士所提的建議：既然我已經被釋放，非洲人國民大會就應該在南非暫時停止武裝斗爭。我回答說，盡管我高度評價卡翁達博士的智慧和支持，但是，停止武裝斗爭還為時太早，因為我們還沒有實現我們之所以拿起武器的目標。我說，幫助德克勒克安撫他的右翼支持者并不是非洲人國民大會要做的工作。

我開始訪問非洲，這次出訪包括許多國家。在我釋放后的頭6個月里，我在國外度過的時間比在國內度過的時間還要長。凡我所到之處幾乎都有大批熱情的圍觀者，盡管我十分疲勞，但仍然有許多人圍觀和護送，他們用這種方式鼓勵我。在達累斯薩拉姆，我受到了大約50萬人的熱烈歡迎。

我的旅途十分愉快。我要看一看新的和老的景觀，品嘗一下不同的食物，與各種各樣的人交談一下。我必須盡快地使自己適應與我離開的那個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隨著旅行、通信和傳播媒介的變化，世界的變化也在加速。現在，事物變化得如此之快，有時使你很難跟上這種變化。溫妮想讓我把速度慢下來，但是，要做的事情簡直是太多了，實在無法放慢速度，組織上也要我好好利用一下由于我的釋放所帶來的歡快氣氛。

在開羅，與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進行私人會晤后的那一天，根據計劃安排，我要在當地會議大廳舉行的大會上發表講話。當我到達會場的時候，那里已經擠滿了人，但安全方面卻準備得并不充分。我對一位警察說，我認為應該加強安全措施，但是，他僅僅聳了聳肩了事。溫妮和我在大廳后面的一個房間里等候，在約定的時間，警察揮手示意讓我走進大廳。我告訴他，可以先護送我們代表團的其他人進去，因為我害怕當我走進大廳時會引起混亂，使他們無法進入大廳。但是，那個警察卻催促我先進入大廳。情況確實如此，我一走進大廳，人群就拼命往前擠，并沖過警察組成的警戒線。他們熱情地把我擠得東倒西歪，我感覺有些緊張，在混亂中還被擠掉了一只鞋。幾分鐘之后，秩序開始恢復正常。我發現，不光找不到自己的鞋，連我的夫人也找不到了。最后，大約過了半個小時之后，溫妮才被領上了演講臺，回到了我的身邊。這時，她已經被搞得心神不安。我再也無法向人群發表講話，因為他們那么瘋狂地喊叫著“曼德拉！曼德拉！”根本無法聽清我的講話。最后，我只好赤著腳與我難得如此安靜的夫人一起離開了大廳。

我在開羅的時候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在招待會上，我說非洲人國民大會“準備考慮停止對抗”。這是給政府發出的一個信號，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府都在盡力制造一種成功地進行談判的氣氛。非洲人國民大會要求政府結束實行緊急狀態，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廢除所有的種族隔離法律，以便使國家的形勢正常化。同時，政府則堅持先說服非洲人國民大會停止武裝斗爭。盡管我們還不準備宣布停止武裝斗爭，但是，我們想為德克勒克先生提供足夠的勇氣，以使他能堅持自己的改革戰略。我們知道，我們最終將停止武裝斗爭，一方面是為更重要的談判創造條件，另一方面也就可以使德克勒克先生能走到他的支持者——南非的白人選民面前，說：“看，這就是我的政策取得的成果。”

在完成非洲旅行之后，我又飛往斯德哥爾摩去看奧利佛。看望我的老朋友、律師和合伙人，這是我一直在盼望的一次重逢。奧利佛身體不太好，但是，當我們見面的時候，我們就像是草原上的兩個孩子，從彼此的愛中找到了力量。我們開始時談了一些往事，但是，當我們兩人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我們談論的第一個話題就是組織的領導班子問題。“納爾遜，”他說，“你現在必須接任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你知道，我僅僅是一直在代你工作。”我拒絕了他的要求，并告訴他，他在流亡中領導著組織，工作遠比我過去做得更好。再說，以這樣的方式變更職務，既不公平也不民主。“你已經被組織選舉為主席，”我說，“讓我們等到下一次正式選舉時再說吧，到那時可以由組織決定。”奧利佛不同意我的意見，但是我也不肯讓步。他要我出任主席，這說明了他為人謙讓和無私，但是，這不符合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原則。

1990年4月，我飛往倫敦參加為我在溫布利舉辦的音樂會。許多國際藝術家都將參加演出，但多數我都不認識，同時，這次音樂會還將向全世界進行電視轉播。我利用這個機會衷心感謝全世界為反對種族隔離所作的努力，他們在對南非實施制裁、督促南非政府釋放我本人和其他政治犯，以及對我國被壓迫人民給予的真誠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03...

當我從監獄里出來的時候，因卡塔自由黨主席、夸祖魯班圖斯坦首相M. 布特萊齊正是南非政治舞臺上的主角之一。但是，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圈子內，他卻遠遠不是受大家歡迎的角色。布特萊齊酋長是大祖魯國王塞奇瓦約的后裔，塞奇瓦約曾經在1879年伊散德爾瓦納戰役中打敗了英國人。他青年時就讀于福特黑爾大學，然后加入了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我把他看作運動組織未來的年輕領導人之一，在非洲人國民大會暗中支持下，他當上了夸祖魯班圖斯坦的首相；即使是他創辦了因卡塔自由黨，作為一個祖魯文化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也沒有表示反對。但是，幾年來，布特萊齊酋長卻脫離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盡管他堅決反對隔離制度，并拒絕按照政府所希望的那樣，把夸祖魯變成“獨立的”班圖斯坦，但他在民主運動中卻是個刺兒頭。他反對武裝斗爭，批評1976年索韋托暴動。他反對國際制裁，并向南非統一思想提出了挑戰。但是，布特萊齊酋長仍然一貫要求釋放我，并拒絕在釋放我和其他政治犯之前與政府談判。

布特萊齊酋長是我出獄后首先給他們打電話的人士之一，我應該感謝他對我的一貫支持。我的想法是盡快與他見面，以便設法解決我們之間的分歧。在我首次出訪盧薩卡期間，我就產生了會見他的想法。但是，我的這個想法被否決了。在我被關押在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的時候，祖魯國王古德威爾·斯維里斯尼一直邀請瓦爾特訪問夸祖魯班圖斯坦首府烏倫迪，當時我曾敦促瓦爾特接受他的邀請。我認為，這是影響南非最受人尊敬、最有實力的王室首腦的好機會。瓦爾特要去的地方是諾格瑪王宮，全國執行委員會有些勉強地批準了這次訪問，因為去烏倫迪也就意味著承認班圖斯坦當局。

當我從盧薩卡回來的時候，我與布特萊齊酋長和國王都通了電話，告訴他們，瓦爾特將去諾格瑪看望國王，但不會去烏倫迪。國王說，他只能接受瓦爾特去首府看望他，其他地方都不行。“我是國王，”他說，“我邀請他到烏倫迪來看望我，他沒有權利說要到別的什么地方看我。”我說：“閣下，我們面對著我們的全體成員構成的一堵墻，他們根本不讓西蘇陸先生去夸祖魯。我們想方設法才使這個折中辦法得到了批準，你能不能也通融通融？”但是，他沒有讓步，拒絕與瓦爾特見面。

從此之后，我們之間的關系就惡化了。5月份，我說服非洲人國民大會讓我去拜訪夸祖魯國王和布特萊齊。國王同意見我，但是，在我出訪前一周左右，我收到了他的來信，說我必須一個人去。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不可能屈服于這樣的要求。我告訴國王，除非在我同事的陪同下，否則我不會去與他見面。夸祖魯國王把這個要求當做對他的又一個冒犯，于是就取消了這次拜訪。

我的目標是與夸祖魯國王建立一種獨立的關系，以便和我與布特萊齊酋長之間的關系分開。夸祖魯國王是祖魯人真正的世襲領袖，他們一直非常熱愛他、尊敬他。在夸祖魯，有更多的人忠于國王，而不是因卡塔自由黨。

與此同時，納塔爾卻變成了殺人場。實際上，全副武裝的因卡塔支持者已經宣布，在納塔爾中部地區和彼得馬里茨堡周圍地區與非洲人國民大會根據地開戰。許多村子被放火燒毀，有幾十人被殺，數百人受傷，數千人成為無家可歸的難民。僅1990年3月一個月里，就有230人在這次滅絕人性的暴力中喪生。在納塔爾，祖魯人正在屠殺祖魯人，因為因卡塔自由黨黨員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都是祖魯人。2月間，我被釋放僅僅兩周，我就去過德班國王公園，向10萬人發表演講，他們幾乎全都是祖魯人。我呼吁他們放下武器，和平地攜起手來：“拿起你的長槍、匕首和砍刀，把它們統統扔進大海！關閉死亡工廠，立即結束這場戰爭！”但是，我的號召沒有人聽，戰爭和死亡仍在繼續著。

我十分擔心，因此，我愿意竭盡全力去會見布特萊齊酋長。3月間，在一場特別恐怖的暴力之后，我自行宣布，我將在彼得馬里茨堡外的一個山村會見他。就個人而言，我們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并且互相尊重，所以我希望能利用這種個人關系。但是，我發現，這樣的會見對納塔爾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來說是無法容忍的。他們認為這是危險的，并且不讓我去見他。后來，我還是去了彼得馬里茨堡，在那里，我看到了非洲人國民大會支持者們被燒焦的遺骸，并盡力安慰他們的親屬，但是，我卻沒有見到布特萊齊酋長。

104...

3月間，經過我們多次協商之后，我們決定與德克勒克政府進行第一次面對面的談判。這是一次“關于談判的談判”，初步敲定于4月初開始。但是，3月26日，在約翰內斯堡以南大約30英里處的斯卜航鎮，警察沒有警告就朝著一群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示威者開槍，當時有12人被槍殺，數百人受傷，并且多數都是在逃跑時被從背后擊中的。警察在對付示威者時使用了真槍實彈，這實在是無法容忍的。警察聲稱他們的生命受到了威脅，而許多被從背后擊中的示威者根本沒有武器，他們不可能受到背向而逃、手無寸鐵的人的威脅。政府不會隨意給予為支持我們的正義要求而舉行集會、示威的權利。這種行動最使我氣憤，我告訴媒體，南非的每一個白人警察都把黑人當成了軍事目標。經過與全國執行委員會商量，我宣布停止我們之間的談判，并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他不能一方面搞和談，另一方面又在屠殺我們的人民。

不過，盡管中止了正式談判，但是，經全國執行委員會批準，我還是在開普敦私下與德克勒克見了面，以便跟上和談勢頭的發展。我們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新的談判日期上，雙方同意定在5月初。我提出了警察在斯卜航制造的駭人聽聞的事件和黑人、白人受到不平等對待的問題，警察使用真槍實彈來對付示威者，而他們絕不會把槍口對準右翼白人抗議者。

政府方面并不急于開始談判，他們指望歡迎我被釋放所帶來的興奮浪潮平息下來。他們想拖延時間讓我丟面子，以便證明被贊頌為救世主的前囚犯是一個很容易犯錯誤的人，已經跟不上當時形勢的發展。

盡管表面上采取了改革措施，但德克勒克絕對算不上是一個偉大的救星。他只是一個漸進主義者，一個謹慎的實用主義者。他不愿意因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丟掉權力。他進行改革的目的恰恰相反：確保南非白人在新的統治制度下仍然占據統治地位。他不準備為結束白人統治制度而進行談判。

他的目標是在“團體權利”的基礎上建立一種分權制度，這種制度可以在南非保留占少數的白人繼續當政的改良形式。他堅決反對多數原則，有時，他把多數原則稱作“簡單的多數主義”，因為，多數原則的實施也就意味著白人統治的結束。我們早就知道，政府堅決反對“大選獲勝者決定一切”的威斯敏斯特議會制。盡管他準備允許占大多數的黑人參加投票和立法，但是，他仍想保留少數團體的否決權。從一開始，我就拒絕同他談這個方案。我對德克勒克先生說，這是一種喬裝改扮了的隔離制度，是一個“大選落選者決定一切”的社會制度。

國民黨企圖戰勝我們的長遠戰略就是與因卡塔自由黨建立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聯盟，引誘開普地區說南非荷蘭語的有色選民參加新國民黨。從我被釋放的那一刻開始，他們就開始拉攏開普地區的布特萊齊和有色選民。政府試圖恐嚇有色人，使他們相信非洲人國民大會是反對有色人的組織。他們支持布特萊齊竭力保留祖魯政權的愿望，并通過讓他相信“團體權利”和聯邦主義使他認同新南非。

5月初，與政府舉行的第一輪談判花了三天多的時間。我方代表有瓦爾特·西蘇陸、喬·斯洛沃、阿爾弗雷德·恩佐、塔博·姆貝基、阿邁德·卡特拉達、喬·莫迪塞、魯思·蒙帕蒂、阿爾奇·古彌德、拜爾斯·諾德牧師、謝里爾·卡羅勒斯和我。談判地點定在格魯特舒爾，這座開普荷蘭式大廈是南非第一個殖民總督府，塞西爾·羅德斯總督曾經在里面住過。我們的代表團成員中有人開玩笑說，我們被帶進了敵人的埋伏圈。

但是，與原來預料的相反，談判是在認真而輕松的氣氛中進行的。歷史上相互打了三個世紀的老對手走到了一起，并相互握手。許多人大聲發出驚嘆，這樣的討論為什么以前沒有舉行！政府向共產黨的總書記喬·斯洛沃和民族長矛軍司令喬·莫迪塞頒發了臨時特赦令，看著這兩個人與幾十年來一直把他們視為惡魔的國民黨政府領導人握手，這是極不尋常的事。正如塔博·姆貝基后來對記者說的那樣，雙方發現對方都沒有“刺兒”。

談判本身這一事實就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樣，談判不僅提供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多年來一直在尋求的東西，而且也結束了以南非黑人與南非白人關系為特點的主仆關系。我們不是以請求者或請愿者的身份，而是以平等的南非人的身份，共同走到了談判桌旁。

對我們來說，第一天或多或少算得上是一個歷史教訓。我向我們的伙伴解釋說，非洲人國民大會自1912年創建時就一直想與政府和談。德克勒克先生出于個人考慮建議說，分離發展的制度是作為一個善良的想法構思的，但是，在實踐中它卻行不通。對這件事，他說很抱歉，并希望通過協商進行彌補。這不僅僅是一種對隔離制度的解釋，而且也表明他比其他國民黨領袖更開明。

討論的主要問題是政治犯和政治流放的界定問題。政府堅持采取一種狹義上的界定范圍定義，試圖限制我方有資格要求被赦免的人數。我們則堅持認為，界定范圍要盡可能地放寬，任何由于政治動機而被判處有罪的人都應該有資格要求被赦免無罪。雙方未能在“政治動機”犯罪定義問題上達成一致，顯然，這將成為一個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

在三天談判結束的時候，我們達成了一個后來被大家稱為“格魯特舒爾備忘錄”的協議。雙方都保證繼續進行和平談判，并敦促政府承諾取消緊急狀態法。他們很快就在暴力事件經常發生的納塔爾省以外的其他各省兌現了這一承諾。我們同意建立聯合工作小組，以解決我們前進道路上存在的障礙問題。

當討論立憲方面的問題時，我們告訴政府，我們準備要求通過選舉產生的立憲機構起草新憲法。我們認為，起草的人應該由人民自己選擇。但是，在選舉憲法起草機構之前，必須要有一個過渡政府，由這個過渡政府監督整個過渡過程，直到選出新的政府。政府不能像現在這樣，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我們倡議設立多黨協商大會，組成過渡政府，并提出指導憲法起草機構的原則。

105...

盡管我曾經想過出獄后立即去庫努，但是，直到4月份我才能成行。在路上，我不能想在什么時候停留就在什么時候停留，因為不光要考慮安全問題，還要準備在各地演講。到了4月，非洲人國民大會和特蘭斯凱的軍隊領導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忠誠朋友班圖·霍勒彌薩將軍作了出訪安排。但是，我心中想的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先去我母親的墳墓祭掃。

我首先去了庫努和我母親的墓地。她老人家的墳墓很簡單，沒有任何裝飾，只蓋著幾塊石頭和一些胡亂堆起的磚塊，與庫努的其他墳墓沒有任何區別。當時，我感到很難描繪我的感情，我惱恨當她老人家去世的時候我沒能在她身旁，懊悔在她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沒能好好地照顧她，想象如果我選擇另一種生活，那該又會是個什么樣子。

那么多年后，我又看到了我的那個村莊，不論是已經發生變化還是沒有發生變化，對我的觸動都很大。我小的時候，庫努人根本不問政治，他們不知道為非洲人的權利而斗爭，人們順其自然地接受生活，并沒有改變它的夢想。但是，當我回來的時候，我聽見庫努村小學的學生們在唱著歌頌奧利佛·塔博和民族長矛軍的歌曲，我為當時斗爭已經滲透到了非洲人社會的各個角落而感到驚奇不已。

我所感受到的是社區的熱情和簡樸，它們把我帶到了我的孩提時代。但是，讓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果說村民們不比過去更窮，至少似乎仍然和過去一樣窮。多數人依舊住在地面很臟的簡易小房子里，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我小的時候，村子很整潔，水也沒有污染，所見之處，到處是綠油油的草場。克拉爾被打掃得干干凈凈，表層土沒有被破壞，田地劃分得整整齊齊。而現在，村莊沒有人打掃，水也已經被污染，遍地都是塑料袋和包裝物。我小時候沒見過塑料，曾認為它肯定在某些方面能夠改善人們的生活。但是，庫努在我眼中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村民們似乎也不再有自豪感。

在那個月中，我還回到了另一個“家”。為了勸說25名民族長矛軍政治犯，讓他們接受政府的大赦離開監獄，我又回到了羅本島。盡管我8年前就離開了這座島，但是，我對這所監獄仍然記憶猶新，懷舊之感沒有絲毫淡化。經過多年都是被別人探視之后，成為羅本島上的一名探視者令我有一種奇特的感受。

但是，那天我并沒有多少機會進行觀光，因為我很快就見到了那些抗議政府實行大赦的囚犯。他們堅稱，只有在戰場上而不是在談判桌上取得勝利之后，才會離開羅本島。他們堅決反對這種特別的和解辦法，因為按照這個辦法，他們必須在接受特赦前列舉自己所犯的罪行。他們譴責非洲人國民大會違背了關于無條件、一攬子赦免包括被流放者在內的所有政治犯的哈拉雷宣言。有一個人說：“馬迪巴，我與政府戰斗了一生，現在我還得乞求他們原諒。”

我很同情他們的意見，但他們的意見是不切合實際的。每個戰士都想在戰場上打敗自己的敵人，但是，就眼下的情況來說，這樣的勝利是不可能實現的。現在，戰場已經轉移到了談判桌上。我強調說，他們留在監獄里并不能推動我們的斗爭事業向前發展。他們在監獄外比在監獄內作用更大。最后，他們同意接受政府的特赦。

6月初，我被安排去歐洲和北美進行為期6周的訪問。動身前，我私下會見了德克勒克先生，他當時想討論一下制裁方面的問題。依據他在南非進行改革的成果，他讓我停止關于繼續進行國際制裁的呼吁。盡管我們知道德克勒克先生所做的工作，但是，我們認為，制裁仍然是迫使他進一步改革的最好的杠桿。我知道，歐共體和美國根據德克勒克所進行的改革努力，都傾向于放松制裁。我對德克勒克解釋說，直到他徹底廢除隔離制度并建立過渡政府之后，我們才能告訴我們的支持者不再繼續呼吁。雖然他對我的答復感到有些失望，但是他并沒有感到吃驚。

我和溫妮第一站先到了巴黎，在那里，我們受到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其迷人的夫人達尼埃爾非常隆重的款待。達尼埃爾一直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支持者。這不是我第一次到歐洲大陸來，但是，我依然被這個“舊世界”的美麗迷住了。雖然我不想吝惜贊美這座燈海城市的美麗，但是，當我在巴黎的時候發生了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南非政府宣布廢除緊急狀態法。我非常高興，然而我很清楚，他們在我訪問歐洲的時候采取了這一行動，目的是破壞我關于繼續制裁的呼吁。

在去瑞士、意大利和荷蘭之后，我又到了英格蘭。我在那里停留了兩天，看望了奧利佛和阿德雷德。我的下一站是美國，但我回南非時還要再回到英格蘭，因為根據日程安排，我要會見撒切爾夫人。作為禮節，我離開英國前與她通了電話，她給了我嚴肅而善意的告誡。她說，她一直在關注我的行程安排，注意我每天參加的各種活動。“曼德拉先生，在我們討論任何問題之前，”她說，“我必須要告誡你，你的行程安排得太累。你必須減掉一半，就是比你年輕一半的人，滿足加在你身上的這些要求也會出現麻煩。如果你堅持這樣做，你可能會無法活著走出美洲。這就是我對你的勸告。”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就在書上看到過關于紐約的介紹。能夠看到成千上萬條電報紙條、彩色紙帶、撕成紙條的報紙同時從大樓窗口拋下以示歡迎，從兩側大廈聳立的大都市街道通過無疑是一種激動人心的經歷。據報道，有100萬人直接觀看了我們的隊伍穿過市區，看見他們對反對種族隔離斗爭給予支持的熱情場面使我深受感動。從報刊上看，紐約總是給人一種冷酷的感覺，但是，我第一天來到這座城市的感受卻恰恰相反。

第二天，我們去了哈萊姆區，自從20世紀50年代看見索韋托的年輕人模仿哈萊姆的花花公子穿著時髦時裝，這里就是在我心目中留下幾分傳奇印象的地方。據我夫人說，哈萊姆就是美國的索韋托。我在揚基體育場向廣大民眾發表演講，告訴他們，一條牢不可破的生命線把南非黑人和美國黑人聯系在了一起。我說，我們都是非洲兒女，兩岸的黑人之間有血緣關系，我們都受到了W. E. B.杜波伊斯、馬庫斯·加維和馬丁·路德·金這些偉大的美國人的鼓舞。在我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時候，我就非常崇拜“褐色轟炸機”喬·路易斯。他們不僅在拳擊場上接受對手的挑戰，而且在拳擊場外也敢于接受種族歧視者的挑戰。在監獄里，我支持美國黑人為反對種族歧視、種族差別和經濟不平等所進行的斗爭。對我們來說，哈萊姆就是反抗力量和黑人驕傲的象征。昨天，我看見一個年輕人穿著帶有“BLACK BY NATURE，PROUD BY CHOICE”（天生是黑人，為選擇而自豪）字樣的T恤衫，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了這一點。我們通過我們的本質聯系在了一起，而且也為我們的選擇而相互感到驕傲。

在去孟菲斯和波士頓之后，我又去了華盛頓。在那里，我在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了演講，并與布什總統單獨進行了會晤。我感謝美國國會關于反對種族歧視的立法，并告訴他，新南非希望實現創建我所面對的這種兩院體制的價值。我說，作為自由戰士，我們不可能不了解像喬治·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和托馬斯·杰斐遜這樣的偉人，也不可能“不被他們的行為所感動”。我還傳遞了繼續對南非制裁的強烈愿望，因為我了解到，布什政府認為已經到了解除對南非制裁的時候。我敦促美國國會不要解除制裁。

甚至是在會見喬治·布什前，我就對他有了正面的印象，因為他是第一位在我出獄后打電話向我表示祝賀的外國領導人。從那時起，布什總統就把我記入了他可以就重大問題相互通氣的世界領導人名錄。我在監獄里的時候，就聽說他是一個熱情而思想敏銳的人。盡管我們在武裝斗爭和制裁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分歧，但是，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有不同意見但能友好共處的人。

我從美國去了加拿大，在那里，我會見了馬爾羅尼總理，并在他們的議會發表了演講。按照計劃，我們下一站是愛爾蘭。在橫跨大西洋之前，我們的小型噴氣式飛機需要在位于北極圈北面的一個遙遠的、被稱作“鵝灣”的地方加油。我想借此機會在清新的空氣中散散步，可當我在停機坪上散步的時候，我發現機場柵欄圍墻外站著一些人，我問一位加拿大官員那是什么人。“愛斯基摩人。”他說。

在我生活在地球上的72年中，我從來沒見過因紐特人（美洲愛斯基摩人），并且從來沒有想到我會遇見他們。我翹首向柵欄墻邊望去，發現有十幾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他們因為聽說我們的飛機將在這里加油而來到了這個邊遠的飛機場。我小時候就曾經在教科書上看到過因紐特人（殖民者給他們起了個“愛斯基摩人”的名字），從殖民主義的教科書中，我印象中的因紐特人是非常落后的。

但是，通過與這些活潑的年輕人交談，我得知他們從電視上看到了我被釋放的消息，并且對南非發生的重大事件都很熟悉。他們有一個人還喊了一句：“Viva ANC！”（非洲人國民大會萬歲！）歷史上，因紐特人一直是受白人殖民主義者虐待的土著人，而南非黑人的情況與因紐特人的情況也差不多。對我觸動最大的是，在我被關押的幾十年里，這個小行星竟然變得如此之小。讓我感覺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世界北屋脊上的年輕因紐特人竟然能看到非洲南端釋放一名政治犯。電視使這個世界變小了，并且正在成為消除無知、促進民主的強大武器。

我在都柏林作短暫逗留之后又去了倫敦，在那里，我要與撒切爾夫人會談3個小時。站在寒冷的室外與青年因紐特人交談，使我有點兒感冒。去會見撒切爾夫人的那天正好是寒冷的冬天，并且下著雨。當我們動身的時候，溫妮告訴我一定要穿上雨衣。當時，我們已經走到了賓館的大廳，如果回去拿雨衣，肯定就會遲到。我是一個嚴格遵守時間的人，這不僅因為我認為遲到是對你要會見的人的不尊敬，而且也是對西方人堅持認為非洲人辦事拖拉這種陳詞濫調的一種反擊。我告訴溫妮，我們沒有時間了，于是我們走出賓館，站在雨中為兒童們簽字留念。當我見到撒切爾夫人的時候，我感覺身體很不舒服，后來經診斷我患上了輕度肺炎。

但是，我的身體狀況并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會談。她像一位小學老師責備她的學生一樣責備我沒接受她的勸告，刪減自己的行程。盡管撒切爾夫人在諸如制裁等許多問題上站在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對立面，但是，她仍然是一位直爽而熱情的女士。在制裁問題上，我們那天的會談沒有取得一點兒進展。

106...

7月份，我對烏干達、肯尼亞和莫桑比克進行短暫的訪問后回到了南非，回國后我立即要求與德克勒克見面。國內的暴力正在升級，1990年在暴力中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了1500人，大大多于前一年因政治原因死亡的人數。經過與我的同事商量之后，我認為必須加快政治形勢正常化的進程。我們的國家在流血，我們必須趕緊行動起來。

德克勒克先生6月份取消了緊急狀態法似乎為恢復談判搭起了舞臺，但是，到7月份，政府安全部隊又逮捕了大約40名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其中包括麥克·馬哈拉基、普拉文·戈德漢、西皮韋·恩衍達和比利·奈爾，聲稱他們參與了被稱作“烏拉行動”的共產黨陰謀，企圖推翻政府。德克勒克要求與我舉行緊急會談，并向我讀了所謂的在襲擊中沒收的文件。當時，我感覺很為難，因為我對這件事一點兒都不了解。

會談后，我想了解一下情況，于是給喬·斯洛沃打了電話。喬解釋說，德克勒克先生讀的那些段落是斷章取義，“烏拉”是一個被廢棄了的計劃。政府想利用這個發現拆散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南非共產黨之間的關系，不讓喬·斯洛沃參加談判。我回頭去見德克勒克先生，并告訴他，他被自己的警察欺騙了，我們不打算與南非共產黨斷絕關系，或者把喬·斯洛沃從我們的談判隊伍中排擠出去。

7月中旬，在計劃與全國執行委員會見面前不久，喬·斯洛沃帶著一個建議單獨來見我。他說，我們自覺自愿地暫時停止武裝斗爭，以便營造恰當的氣氛，推動和談向前發展。他說，德克勒克需要讓他的支持者看到他的政策已經給國家帶來了好處。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反對，我認為時機尚不成熟。

但是，后來我逐漸認識到，我們必須采取主動，而且，這正是采取主動的最好辦法。我也認識到，喬恰恰是提出這個建議的適當人選，因為他作為一個激進分子是沒有爭議的。他不會因此而被責備上了政府的當，受了政府的騙，或者變成了軟蛋。第二天，我告訴喬，如果他在全國執行委員會上提出這個想法，我將給予支持。

當喬第二天在全國執行委員會上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有的人堅決反對，說那樣對德克勒克的支持者無疑是一種鼓勵，而對我們自己的人則是一個打擊。但是，我為這個建議進行了辯護，并說，武裝斗爭的目的是把政府弄到談判桌上來，現在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我爭辯說，“暫時停止”意味著隨時可以撤銷我們的決定，但是，對于顯示我們的誠意卻是必要的。幾個小時的爭論之后，我們的觀點占了上風。

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這也是一個有爭議的意見。盡管民族長矛軍并不活躍，但是，武裝斗爭的氣氛對于許多人來說具有偉大的意義。即使是僅僅作為一種裝飾加以利用，堅持武裝斗爭也是我們積極打擊敵人的一種標志。因此，武裝斗爭深得人心，它遠遠大于地下斗爭實際取得的效果。

8月6日，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府在比勒陀利亞簽訂了后來被大家稱作“比勒陀利亞備忘錄”的協議。在該協議中，我們同意暫時停止武裝斗爭。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地對我們的支持者所講的那樣，盡管我們暫時停止了武裝行動，但是，我們并沒有終止武裝斗爭。該協議也為釋放政治犯和發布某種形式的大赦令提出了具體的日期要求。大赦計劃到1991年5月份完成，政府也同意對《國內安全法》進行審議。

在阻礙和平進程的問題上，唯有國內暴力升級問題最令人頭疼和灰心喪氣。我們都希望隨著談判的進行，暴力事件逐漸減少。但事實恰恰相反。警察和安全部隊也很少抓人，城鎮上的人們開始譴責他們助長和煽動暴力。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安全部隊是在縱容暴力。許多暴力事件表明，警察不是在平息暴力，而是在煽動暴力。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走遍了被暴力困擾的約翰內斯堡南部法爾三角地區，安撫那里的受傷群眾和死傷者的親屬。我一遍又一遍地聽到同一個說法：警察和國防軍正在破壞那里的穩定。有人告訴我，警察頭一天在一個地方沒收武器，第二天，因卡塔自由黨的武裝力量就用那些被沒收的武器襲擊我們的群眾。我們還聽說，警察甚至護送因卡塔自由黨人互相接頭并發動襲擊。

9月份，我發表了一個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我說暴力后面有一只黑手，并暗藏著一支神秘的“第三武裝”，他們由脫離安全部隊的人員組成，一直在企圖破壞和談。我們說不清這支第三武裝的組成人員到底是些什么人，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斷定他們是存在的，他們的殺人黑手正在伸向非洲人國民大會和解放斗爭。

我是在親身經歷了兩次特別的暴力事件后才得出這個結論的。1990年7月份，非洲人國民大會接到情報，屬于因卡塔自由黨的某些人員正在一家旅館里策劃于7月22日在法爾三角區的斯卜航鎮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進行重點襲擊。通過我們的法律代理人，我們告訴法律與治安部部長、警察局局長和地區專員，警告他們即將發生暴力襲擊，并敦促他們采取適當措施。我們要求警察，必須阻止因卡塔武裝人員進入斯卜航參加因卡塔自由黨集會。

7月22日，滿載因卡塔武裝人員的公共汽車在警車的護送下，在光天化日之下進入了斯卜航。他們在那里舉行了集會，然后，這些武裝人員開始實施暴力襲擊，在一次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襲擊中，他們大約殺害了30人。第二天，我探訪了這一地區，親眼目睹了過去我從來沒見過并且希望再也不會見到的悲慘景象。停尸房內堆滿了被砍死的尸體，有一具女尸的乳房都被用刀割掉了。不管這些殺人者是誰，但可以斷定他們無疑是一群野獸。

第二天，我要求會見德克勒克先生，我憤怒地要求他對此事作出解釋。“你們事先已經得到了警告，”我告訴他，“但仍然沒采取措施。這是為什么？為什么一直不采取行動？為什么警察也在那里插手干壞事？”然后，我告訴他，在其他任何國家發生這樣大的悲劇，當有30多人被屠殺的時候，國家的領導人都會發表聲明表示哀悼，但他卻一句話都沒有說。對我提出的問題，他沒有作任何答復。我要求德克勒克向我作出說明，但他卻對此事未置一詞。

第二個暴力事件發生在11月份，一伙因卡塔自由黨黨員進入了約翰內斯堡東部杰米斯頓市郊外的一個名叫藏基茲茲韋（Zonkizizwe）的牧場。Zonkizizwe是祖魯語，意思是“歡迎各個民族的地方”。他們驅趕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有許多人被殺害。然后，因卡塔武裝人員占領了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的鐵皮房屋，并沒收了他們的全部財產。牧場的居民說，因卡塔成員當時是與警察一起來的。發生這一悲劇之后，警察和政府同樣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南非黑人的生命從來沒有像現在這么不值錢。

我又一次會見了德克勒克先生和他的法律與治安部部長艾德里安·弗勞克。我又問德克勒克先生，為什么在這次犯罪后警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說，襲擊者可以很容易地被發現，因為他們現在占領了被害者的房子。德克勒克先生請弗勞克先生說明此事，然后，弗勞克以相當粗野的口氣問我，房子位于誰的地產上，意思是說這些人都是非法定居者，因此，沒有權利受到法律保護。我告訴他，事實上當地政府已經批準這些人在那塊土地上居住。他的態度仍然是許多南非白人所采取的那種態度，只是簡單地認為黑人部落自古以來就一直在相互殘殺。德克勒克再一次告訴我，他將調查和處理此事，但是，他仍然什么也沒有做。

在這一期間，政府采取了另一個行動，使事態更加火上澆油。政府作出了新的規定，允許祖魯人攜帶所謂的“傳統武器”在納塔爾和其他地方舉行政治集會和會議。這些所謂的傳統武器——長矛、標槍、圓頭棒、大頭木棍，實際上是因卡塔自由黨武裝人員殺害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時使用的武器。這件事使我對德克勒克先生的和平誠意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那些反對和談的人從暴力中獲得了好處，而這些暴力總是在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準備朝著達成協議的目標邁進的時候突然發生。這些邪惡勢力企圖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因卡塔自由黨之間點燃戰爭的火焰，我相信許多因卡塔自由黨成員也在密謀策劃發動這樣的戰爭。政府中的許多人，包括德克勒克先生，對發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采取的是一種視而不見或聽之任之的態度。毫無疑問，警察和安全部隊的最高領導正在幫助“第三武裝”。這些疑點后來被媒體所證實。據報紙披露，南非警察的確在秘密資助因卡塔自由黨。

隨著暴力繼續升級，我開始用另一種方式考慮暫時停止武裝斗爭的問題。許多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已經有些躁動不安，于是到9月份，我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暴力的不斷升級可能會使我們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形勢看來很嚴峻，與政府談判所取得的成果似乎要毀于一旦。

107...

1990年12月，奧利佛經過30年的國外流亡生活之后回到了南非。有他在我身邊，使我感到非常高興。他回來是為了參加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協商會議，來自國內外的45個不同地區的1500多名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

在這次大會上，我稱贊奧利佛在非洲人國民大會最黑暗的時期一直領導著非洲人國民大會，斗爭的烈火從來沒有熄滅。現在，他領導我們來到了看到光明和希望的未來的邊緣。在我被關押的27年間，是奧利佛拯救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并把它建設成一個具有實力和影響的國際性組織。在絕大多數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不是被關押就是被流放的時候，他擔負起了領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重任。他是一位戰士、一位外交家、一位政治家。

盡管我批評政府組織反革命活動，但是，正是奧利佛的講話引起了一場風波。在開幕式上，他發表了一個頗有爭議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他要求對我們的制裁政策進行重新評價。他堅持認為，除非采取主動縮小制裁的規模，非洲人國民大會將面臨“脫離國際社會”的危險。歐共體已經開始縮減制裁的規模。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和美國，都要為南非進行的改革對德克勒克先生作出回報，認為這樣就會鼓勵他繼續進行改革。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策略，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國際上的實際情況。

盡管大家對奧利佛的講話進行了討論，并且，他的講話也得到了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批準，但是，他的建議卻遭到了非洲人國民大會軍事領導人的反對，他們堅持認為，必須保持原來的制裁規模。

這樣一來，連我自己也成了抱怨和抨擊的對象。他們批評參加和談的人不與基層接觸，與國民黨領導人在一起的時間比與自己的人待在一起的時間還要多。大會上，有人還批評我搞“個人外交”，不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一般會員溝通。作為一個群眾組織的領導人，必須傾聽群眾的意見。我接受了大家對我的批評，承認在讓整個組織都了解談判的過程方面有所疏忽。但是，我也知道我們與政府進行談判的微妙，我們達成的任何協議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他們保守機密。盡管我接受了批評，但是，我相信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沿著同一條路向前走。我知道，我必須更加虛心和務實，讓更多的人充分了解我們在談判中所取得的進展，我在后面的談判中沒有忘記這一條原則。

每天，每個周末，報紙都會及時報道在我們的社區和城鎮發生的新的流血事件。顯然，暴力已成為南非的第一大問題。在納塔爾以及約翰內斯堡周圍的里夫地區，各種犯罪、政治對抗、警察暴行和地下團伙殺人事件時常發生，攪得許多社區的群眾不得安生。只要暴力問題不解決，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的道路就仍然是艱難曲折和不可想象的。

為了遏制暴力事件的升級，我與布特萊齊酋長取得了聯系，安排與他進行會談。1月份，我們在德班的王室賓館見了面。布特萊齊酋長首先向出席的代表們和媒體發表了講話，但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翻老賬。他列舉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對他進行的語言攻擊，批評非洲人國民大會提出的和談要求。當輪到我說話的時候，我不是選擇與他針鋒相對，而是感謝他多年來為我的釋放所做的工作。我用事實敘述了我們之間長期存在的關系，強調了有關兩個組織團結而不是分裂的許多問題。

我們的私下會晤取得了進展，布特萊齊酋長和我簽訂了一個規范雙方下轄組織行為的協議。這是一個公平的協議，我認為如果這個協議得以執行，肯定會有助于制止流血事件的發生。但是，我要說的是，因卡塔自由黨從來也沒有執行過這個協議，當然我方也有違反這個協議的地方。

我們兩個組織之間的暴力活動仍在繼續著，每個月都有數百人死亡。3月份，因卡塔自由黨成員在約翰內斯堡北部的亞歷山大鎮發動了一次進攻，在3天的沖突中有45人被殺死，但仍然沒有人被逮捕法辦。

隨著暴力活動的繼續，我不能坐視不管，于是試圖再與布特萊齊酋長見面。4月份，我去了德班，我們又一次發表了措辭強烈的聲明，并簽訂了另一個協議。但是，上面的字跡還沒有干，協議就被浸泡在了血泊之中。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信，政府在背后支持暴力活動，而暴力活動正在阻礙和談。德克勒克先生對暴力不采取措施，使我們的關系瀕臨危險的邊緣。

4月間，在全國執行委員會為期兩天的會議上，我提出了對德克勒克先生誠意的懷疑。全國執行委員會相信，政府在后面支持暴力活動，暴力正在攪亂和談的氣氛。在致政府的一封公開信中，我們要求罷免國防部部長馬格納斯·馬倫和法律與治安部部長艾德里安·弗勞克的職務；禁止在公共場合攜帶傳統武器；逐步取消移民工客棧，因為約翰內斯堡周圍的城鎮上的客棧里住著很多因卡塔自由黨成員；撤銷政府的反暴亂秘密部門；指定獨立的委員會調查安全部隊的不正當行為。

我們要求政府最晚在5月份滿足我們的要求。德克勒克先生通過要求5月份召開多黨派會議討論暴力問題對我們的要求作出了答復，但是，我的回答是，召開這樣的會議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政府完全知道要結束暴力必須做什么事情。5月份，我們宣布停止與政府談判。

1991年7月，非洲人國民大會30年來第一次在南非國內召開了年會。有2244名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們都是從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國內外的分支機構民主選舉產生的。在這次大會上，我全票當選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西里爾·拉馬福薩被選為總書記，充分表明火炬將從老一代領導人手中傳遞給年輕一代。我只是在出獄時才與西里爾見過面，他被許多著名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認為是一個合格的接班人。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他可能是最有經驗的談判人，他的談判藝術無疑是在他擔任全國礦工工會總書記時磨礪而成的。

在講話中，我對大家賜給我如此大的榮譽而表示感謝，并告訴大家，要跟上我的前任奧利佛·塔博的巨大步伐是何等的困難。雖然我們當時正在與政府爭吵，但是我說，和談本身就是一種勝利。政府參加和談這一事實，正是他們沒有能力維持種族隔離的表現。我反復講，和談的過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因為我們與之談判的那些政客根本就不想交出他們自己的權力。“大家必須明白的一點，就是斗爭并沒有結束，和談本身也是一種斗爭，正如其他任何形式的斗爭一樣，和談可能會發生多次反復。”

但是，和談不能靠等待。就我們的利益來說，絕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種族隔離的痛苦。我說，有必要盡快創建一個過渡政府。

大會強調，非洲人國民大會面臨著一個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把一個非法的地下解放運動組織轉變成一個合法的群眾性政黨。30年來，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秘密地在南非發揮作用，有些工作習慣和斗爭技巧已經根深蒂固。我們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完整的組織，從最小的支部到全國執行委員會。在這個非常的變化時期，我們必須利用大約幾個月的時間做好這件事情。

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共產黨的大部分領導人都已經被流放。他們多數都在7月份回來參加了年會。他們并不熟悉今天的南非，對他們和我來說，南非是一個新發現的地方。但是，卻有一批杰出的留在國內的聯合民主戰線和南非貿易工會大會的年輕領導人，以我們無法想象的方式全面了解了政治形勢。從一定程度上說，這些組織在20世紀80年代一直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南非的替身開展活動。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要把這些人吸收進自己的組織。

我們不僅面臨著邏輯上的問題，而且面臨著哲學方面的問題。當你們在與一個共同的敵人打仗的時候，使運動組織保持一致是一個相當簡單的命題。但是，當敵人走到了談判桌旁的時候，要制定一種政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兒。在新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我們不僅必須與許多不同的組織結合在一起，而且還必須考慮許多不同的觀點。我們需要把組織統一到和談的思想上來。

在頭17個月的合法活動期間，非洲人國民大會吸收了70萬新會員。這是激動人心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對此沾沾自喜。就比例而言，這些會員中只有少部分是來自邊遠地區，這些地區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長期以來一直是最薄弱的地區。同時，國民黨正在向非白人敞開大門，正忙著吸收那些對非國大不滿的有色人和印度人。

自從我出獄后，政府就一直在對我夫人進行誹謗。在她被聲稱綁架了四位住在迪普克魯夫的年輕人并造成其中一人死亡之后，溫妮第一次遭到了謠言的詆毀，然后，她被指控綁架四人并造成一人死亡。連續對她的人格進行的這種造謠中傷，使溫妮和我都很想趕快走上法庭，證明溫妮在這些指控中都是無辜的。

2月，對我夫人的正式審判在約翰內斯堡市內的蘭德最高法院開庭。我參加了第一天的審理，像許多非洲人國民大會資深人士一樣，我盡量多去參加對她的審理。我之所以這樣做，既是為了表達對我夫人的支持，同時也為表明我相信她是無辜的。喬治·畢佐斯為她作了辯護，努力證明溫妮與這起綁架和打死人的案件沒有牽連。

3個半月之后，法官認定她在這起綁架案中是有罪的，并且在一起流氓殺人案中是同謀。但是，法官很清楚，她本人并沒有親自參與殺人。她被判處6年監禁，但是根據她的請求，她很快被保釋出獄。對我來說，不管判決結果如何，她毫無疑問都是無辜的。

108...

1991年12月20日，經過長達一年半的關于“談判的談判”之后，真正的談判開始了：民主南非大會（CODESA）是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及其他南非黨派之間舉行的第一次正式和談。我們以前進行的所有雙邊談判為這次談判奠定了基礎。談判在約翰內斯堡史末資機場附近的一個現代化的展覽中心，即世界貿易中心舉行。出席民主南非大會的共有18個代表團，他們代表著南非各政治黨派。另外，出席大會的還有來自聯合國、英聯邦、歐共體和非洲統一組織的代表。這個大會是在南非召集的一次最廣泛的政治團體橫向聯合大會。

這次談判無疑是一個歷史盛會，當然也是自1909年開普和納塔爾英國殖民地與前德蘭士瓦布爾共和國及奧蘭治自由邦同意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以來最重要的立憲大會。1909年召開大會的目的并不是發揚民主，而是對民主的違背，因為當時的代表中沒有一個是黑人。但是在1991年的今天，南非黑人已經占了大多數。

我們的籌備小組由西里爾·拉馬福薩牽頭，成員還有喬·斯洛沃和瓦利·穆薩。一周以來，他們一直與政府就選舉、憲法、憲法起草機構和過渡政府問題進行討論。來自20個不同黨派的代表，包括來自班圖斯坦政府的代表，已經同意了召開大會的基本原則。

在談判開始就持樂觀態度的人不會因為幾個拆臺者而掃興。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決定抵制談判，他們指責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國民黨勾結在一起，試圖建立一個多種族政府。盡管一個月前，非洲人國民大會、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和阿扎尼亞人民組織圍繞共同目標發表聲明，組建了聯盟組織——愛國陣線，但是，仍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害怕民主選舉，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選舉將暴露他們并沒有多少支持者。布特萊齊酋長也在抵制談判，因為不允許他組成三個代表團：因卡塔、夸祖魯政府和斯維里斯尼國王。我們認為，國王應當不屬于任何政黨，如果把國王納入政黨的范圍之內，那么南非各部落應該都能派他們的最高領袖參加談判。

在世界貿易中心舉行的和談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也具有自力更生的意義。與津巴布韋和安哥拉那樣的非洲國家為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所進行的和談不同，他們需要外國人調解，而我們南非則是依靠我們自己消除分歧。德克勒克先生講了關于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過渡性“權力共享”政府的必要性，國民黨的首席談判代表大衛·德維利爾斯甚至為實施種族隔離政策表示了道歉。

我在自己的公開講話中指出，隨著民主南非大會的產生，進步在南非最終將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我說，政府通過其所管理的人民的批準才能取得統治權和合法性，我們正在舉行的會議就是要創造這樣一個合法的政權。我說，民主南非大會標志著選舉產生一個起草新憲法的機構的開始，我看不出這樣的一個憲法起草機構有任何理由在1992年不能產生。我呼吁政府，可以組成一個全國統一的過渡政府監督這種選舉，控制國家宣傳機構和武裝部隊，全面負責向新的、無種族歧視的、民主的南非過渡。

在第一天的大會上，最大的與會黨派，其中包括國民黨和非洲人國民大會，都支持簽署一個意向聲明，號召所有的黨派都支持建立一個統一的南非，其最高法律將是受獨立司法系統保護的憲法。國家的司法系統將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起草“權利法案”，以保護公民的自由權利。總之，我們將要建立的是一個以成人普選權為基礎的、多黨派執政的民主政府。就我們而言，這是對新南非提出的可接受的最低立憲起點。因卡塔自由黨拒絕簽署這個聲明，因為聲明中要求建立“統一的南非”，這意味著不可能采取聯邦制。

大會選舉產生了五個工作組，以便在1992年初開始工作，做好1992年5月召開第二輪“民主南非大會”的各項籌備工作。工作組將探討營造自由政治氣氛中面臨的問題、班圖斯坦的未來、重新組建南非廣播公司、檢驗諸如聯邦制之類的各種立憲原則和創建過渡政府。各黨派同意，各項決議將在“充分一致”的基礎上作出，雖然沒有作出界定，但實際上，充分一致就意味著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及其他多數黨派之間達成了協議。

召開第一次民主南非大會的第一天，直到臨近休會都沒有出現意外的事情。在召開大會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電話里與德克勒克先生一直談到晚上8點。德克勒克先生問我，是否同意讓他在第二天最后一個發言。盡管按照日程安排，我將對大會作總結，但是，我告訴他，我將把這個問題提交全國執行委員會。那天晚上，我的確也這樣做了。盡管大家有些擔心，但是，我說服他們允許德克勒克先生最后發言。我認為，這個問題不是一個關鍵性問題，我準備讓德克勒克滿意。

到這次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講了談判的重要性，我講完話后，德克勒克接著講。他強調了這次盛會的歷史意義，論述了克服相互不信任的必要性。但是，隨后他卻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開始攻擊非洲人國民大會不堅持與政府之間達成的協議。他開始像一個校長訓斥一個調皮的小孩子那樣對我們講話。他嚴厲地指責非洲人國民大會沒有公布武器庫的位置，然后又譴責我們保留“秘密武裝”——民族長矛軍，違反了1991年9月份達成的《全國和平條約》。他甚至用激烈的言詞質問，非洲人國民大會是否有足夠的誠意遵守自己簽訂的協議。

這是我絕對不能容忍的，如果我聽任德克勒克先生講這種話而不予以駁斥，那么我當時就會受到譴責。他講完后，當天的會議本應隨之結束。但是，會場的氣氛變得非常安靜。我沒有允許會議就此結束，而是朝講臺走去。我不能讓他講完話就這樣算了。我的聲音里帶著憤怒：

我對今天德克勒克先生的行為十分擔心。他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發動了攻擊，并且在攻擊中一直很不誠實。即使是像他這樣一個非法的、名聲敗壞的、少數人當政的政府的首腦，也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規范。他沒有理由僅僅因為他是這樣一個名聲敗壞的政府的首腦，就可以不遵守道德規范……如果一個人能來到這種性質的大會上玩弄他已經玩弄過的政治手腕，那么就沒有人愿意同這樣的人打交道。

政府官員曾一再勸說我，允許他們最后講，他們特別期望在這里最后一個發言。現在我明白了他們為什么要最后講，他濫用了他的職權，因為他指望我不會反駁他。他完全錯了，我現在就要說幾句。

我說，德克勒克先生用這樣的語言對我們說話，這是不能接受的。我重申，是非洲人國民大會，而不是政府提出了和平討論的倡議；是政府，而不是非洲人國民大會，一次又一次地不遵守自己簽訂的協議。以前我已經告訴過德克勒克先生，公然攻擊非洲人國民大會沒有什么用處，但是，他仍然在這樣做。我強調，我們已經暫時停止了武裝斗爭，以顯示我們支持和平的誠意，而政府卻仍然在與發動戰爭的那些人共同策劃戰爭。我要告訴他，只有當我們成為收繳武器的政府的一部分時，我們才上繳我們的武器，不到那時我們是不會上繳的。

我補充說，政府顯然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盤。他們參加和談不是為了爭取和平，而是在謀取自己的小政治利益，即使是在和談的時候，他們也在暗地里資助秘密組織對我們實施暴力。我提到了最近披露的向因卡塔提供100萬蘭特的事實，德克勒克先生聲稱不知道此事。我說，如果擁有他這個職位的人“不知道這些事，那么他就不配當政府首腦”。

我知道我說得太嚴厲，于是，為了使整個談判不再陷入僵局，我以緩和一點兒的口氣結束了我的講話：

我請他攤出牌來。讓我們坦誠地在一起工作，不要有背著對方的事情。不要私下再打什么小算盤，也不要說服我們允許他最后發言，因為他想濫用這個特權攻擊我們，并希望我們不予駁斥。盡管他犯了這樣的錯誤，但我仍然準備與他一道工作。

第二天，民主南非大會召開了最后一次會議。德克勒克和我都盡力表現得像沒發生不可挽回的傷害一樣。在會議開始時，他和我公開握手，并表示我們將一道工作。但是，彼此之間已失去了信任，因此，和談陷入了僵局。

民主南非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6周后，國民黨在波切夫斯特魯姆參加了“補缺選舉”。波切夫斯特魯姆是德蘭士瓦的一個保守的大學城，歷史上一直是國民黨的一個根據地。但是，國民黨人出乎意料地被保守黨右翼的候選人擊敗。保守黨堅決反對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進行和談的政策，其黨員主要由認為德克勒克先生不再靠得住的南非白人組成。選舉結果似乎讓人對德克勒克先生的改革及和談政策產生了懷疑。國民黨十分驚慌，他們自己心臟地區的嫡系選民也在反對他們的政策。

德克勒克決定孤注一擲。他宣布，根據在波切夫斯特魯姆補缺選舉的結果，他號召于3月17日進行全國白人公民復決，對他的改革政策和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和談進行投票表決。他說，如果公民復決遭到失敗，他可以辭職。公民復決對年滿18歲的所有的白人選民提出了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你支持繼續實行總統于1990年2月2日開始進行的、旨在通過和談建立新政府的改革嗎？”

非洲人國民大會反對把一切非白人排除在外的這種公民復決。同時，我們也很現實：我們當然不想讓白人選民反對德克勒克為堅持和談所作的努力。盡管我們原則上反對這次選舉，但是，我們還是鼓勵白人投“贊成”票。我們把這種投票表決看作支持和談的一個信號，當然并不是支持德克勒克本人。

我們懷著幾分不安的心情關注著德克勒克采取的這個行動。他和國民黨搞了一次微妙的、昂貴的、美國式的政治活動，與此相伴的還有廣泛的報紙和電視宣傳、大量的廣告和各種各樣的集會。我們把這場鬧劇看作德克勒克先生將對我們發動進攻的一次彩排。

最后，69%的白人選民支持和談，這給了德克勒克很大的鼓舞。他感覺自己是正確的，我卻認為投票結果讓他有點兒自鳴得意。他的手腕更強硬了，結果，國民黨人在和談中的立場也就強硬起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109...

1992年4月13日，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在我的兩位老朋友、老同志——瓦爾特和奧利佛的陪同下，我宣布與我夫人分手。形勢變得如此困難，我認為我們的分手對各有關方面——非洲人國民大會、家庭和溫妮，都是最佳選擇。盡管我把這件事提交非洲人國民大會進行了研究，但是，離婚本身是基于我個人的原因。

我宣讀了以下聲明：

我自己同我夫人諾姆薩莫·溫妮·曼德拉同志之間的關系已經成了眾多媒體炒作的主題。我現在發表這個聲明，以澄清自己的立場，希望我的聲明能夠使各種猜測不攻自破。

諾姆薩莫同志和我本人，在我們國家解放斗爭的關鍵時刻結為連理。由于我們獻身非洲人國民大會和為結束種族隔離進行的斗爭而承受的壓力，我們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盡管存在這些壓力，我們相互之間的愛戀和雙方對婚姻的忠貞卻絲毫沒有動搖……

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羅本島坐牢，對我個人而言，她是必不可少的支柱和安慰……諾姆薩莫同志單獨承擔起了撫養我們子女的重擔……她以非凡的剛毅承受了政府對她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并從來沒有動搖過自己對自由斗爭的無私奉獻和支持。她的頑強精神進一步加強了我對她的尊敬、愛戀和不斷加深的感情，也贏得了全世界廣泛的欽佩。我對她的愛是始終不渝的。

但是，由于我們之間最近幾個月中對許多問題有不同看法而造成的緊張狀況，我們都認為分手將對我們雙方是最好的選擇。我的行動并不是因為媒體現在正對她進行指責而采取的……諾姆薩莫同志完全可以像過去一樣，在她有生之年繼續依靠我的慷慨支持。

我個人絕不會對諾姆薩莫同志和我曾經共同分享的生活感到后悔。盡管不應該出現這樣的結局，但是，情況使我們不得不分手。離開我的夫人，我并無任何怨恨。從我第一次遇到她的那一刻起，我就以我在監獄內外對她培育出來的所有的愛戀愛著她。女士們，先生們，希望你們能理解我所經歷的這種痛苦。

或許，由于我為沒能盡到一個做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感到痛苦而對一些事情視而不見。但是，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樣，當我在監獄里的時候，我夫人的生活比我的生活更艱難，我的回歸對她比對我來說也更艱難。她嫁給了一個很快就離她而去的人，那個人變成了一個神，后來那個神又回了家，并證明他不過是一個人。

正如我后來在我女兒津澤的婚禮上所說的那樣，自由戰士似乎命中注定要過不穩定的個人生活。當你的生命就是斗爭，像我的生命那樣，你就幾乎沒有家庭生活的余地。這一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也是我所作的最痛苦的選擇。

“我們看著我們的孩子們在沒有我們的指引下成長，”我在我女兒的婚禮上說，“當我們真的［從監獄里］出來的時候，我的孩子們說，‘我們認為我們有父親，并且有一天他將會回來。但是，讓我們失望的是，我們的父親回來后又不和我們在一起了，因為他現在成了國父。’”作為一國之父是莫大的榮譽，但作為一個家庭之父卻是莫大的愉快。然而，這種愉快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少了。

110...

1992年5月，在中斷了4個月之后，多黨會議在世界貿易中心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即民主南非大會第二次會議。為了準備談判，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府的談判者之間，以及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其他黨派之間已經進行了秘密的磋商。在民主南非大會第二次會議開幕前一天，德克勒克先生與我之間進行了最后的會談，就各代表團的磋商結果進行了討論。自從民主南非大會第一次會議以來，這是我們兩人第一次會見。

在民主南非大會準備召開的幾天前，政府被兩個丑聞搞得焦頭爛額。第一個丑聞是負責改善班圖斯坦黑人生活水平的發展援助署暴露出來的大規模腐敗和行賄受賄案，第二個丑聞則是政府高級安全官員卷入了1985年殺害4名聯合民主戰線成員案，這4名成員中最著名的是馬修斯·戈尼韋。這兩個丑聞為警察涉嫌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實施襲擊增添了證據。兩個丑聞先后曝光，大大削弱了政府的信譽，提高了我們的威信。

在前幾個月中，政府提出了許多半途而廢的建議。這些建議，例如輪流執政，多數都是在竭力保護他們的權力。但是，通過過去幾個月的和談，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府達成了一個關于實行兩步過渡、最終建立一個完全民主的南非的嘗試性協議。第一步，由民主南非大會各代表團任命一個多黨“過渡執行委員會”，起到臨時政府的作用，以便為各黨派“建立平臺”，起草臨時憲法。第二步，舉行大選，選出一個憲法起草機構和立法機關。在選舉中，得到5%以上選票的所有政黨都可以參加組閣。憲法起草機構的成員，50%通過全國選舉產生，另外50%通過地方選舉產生。這個機構將被授予起草憲法的權力和通過法律的權力。另外，還將成立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主持選舉和保證選舉的自由和公正。

還有許多問題，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府沒能達成協議，譬如說，憲法起草機構決定憲法方面的問題和同意某項“權利法案”所必需的投票率。在召開民主南非大會第二次會議前幾天，政府才建議成立第二個機構——參議院，人員由各地區選出的代表組成，作為行使少數否決權的一種方式。他們還建議，在完成這些工作之前，民主南非大會第二次會議首先必須就臨時憲法達成協議。但是，起草臨時憲法將要花幾個月的時間。

所有這些問題的談判都在幕后進行，到1992年5月15日召開民主南非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時候，達成協議的希望似乎依然十分渺茫。我們感到擔心的是，已經達成的協議會因此受到影響。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在多數重大問題上都沒有達成共識。政府似乎準備無限期地拖下去，他們的想法是等的時間越長，支持我們的人就會越少。

大會第一天結束的時候就出現了僵局。當時，主持談判的兩個法官建議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晚上再舉行一次會談，以便設法找到一個妥協的辦法。那天晚上，我們確實邊喝咖啡邊進行了會談，雖然我們沒有找到打破僵局的辦法，但是我們卻同意繼續進行談判。“全南非和全世界都在看著你和我，”我告訴德克勒克先生，“我們要挽救這個和平進程。讓我們達成某種協議，讓我們至少確定下一次談判的日期。”我們決定，兩人都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本著讓步的精神發表講話。

第二天下午，我們按照與民主南非大會第一次會議期間雙方同意的相反順序發表講話：由德克勒克先生先講，我最后講。德克勒克先生在講話中堅持國民黨不尋求“少數否決權”，但是，他們確實想要一種制衡制度，以防止占多數的種族“濫用權力”。盡管他的意見讓我聽起來像是對多數原則的公然反對，但是，當德克勒克講完話后，我還是僅僅說，我們需要本著建設性的態度去工作，以便消除圍繞和談的緊張氣氛。

盡管我們想在這個問題上持積極態度，但是大會第二天仍然在僵持不下的狀態下閉幕。根據我的看法，僵局的原因是國民黨一直不愿意由大多數人的意志決定他們的命運。

最終，民主南非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四個基本問題上沒能取得突破：政府堅持反對憲法起草機構以高得票率通過憲法（他們主要是要求擁有不正當的否決權）；維護地方政權，以便對將來的憲法進行限制；反對民主選舉參議院，要求參議院對內閣的立法有否決權；把經過大會協商通過的臨時性憲法定為永久性憲法。

這些都是難題，但是并不是無法解決的難題，我決心不讓民主南非大會第二次會議出現的僵局阻礙和談的進程。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都同意雙方繼續談判，以促使問題得到解決。但是，后來發生的事情使問題的解決變得不再可能。

隨著和談陷入了僵局，非洲人國民大會及其盟友一致同意采取“浩浩蕩蕩的群眾運動”的策略，以便通過這個策略向政府顯示全國人民支持我們的程度，并表明南非人民不準備為了自由永遠地等待下去。群眾運動的形式包括罷工、示威和聯合抵制等。開始采取群眾運動的日期定在1992年6月16日，因為這個日子是1976年索韋托暴動周年紀念日，并計劃在8月3日和4日舉行兩天的全國大罷工，把群眾運動的聲浪推向高潮。

但是，在舉行罷工前又發生了一件事，使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府之間的分歧進一步擴大。1992年6月17日，因卡塔自由黨的武裝力量偷襲了博伊帕通市的法爾鎮，有46人被殺，其中多數都是婦女兒童。這是一周內非洲人國民大會人士遭到的第四次大屠殺。全國人民都為此感到震驚，并指責政府參與了這次大屠殺。警察沒有制止這次犯罪，他們什么事情都沒有做，既沒有逮捕犯罪分子，也沒有調查案情。德克勒克先生一聲不吭，我感到忍無可忍，我的耐心已經達到了極限。政府正在使和談陷入僵局，同時也在以隱秘的方式向我們的人民開戰。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同他們談判？

發生大屠殺后的第四天，我向兩萬多名憤怒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支持者發表了講話，告訴他們，我已經指示非洲人國民大會總書記西里爾·拉姆福薩停止直接與政府接觸。我同時還宣布，全國執行委員會正在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一時間，我們似乎又回到了沙佩維爾那些黑暗的日子。我把國民黨的行為比作德國的納粹黨，公開警告德克勒克，如果他企圖采取新的措施限制群眾示威和自由表達，非洲人國民大會將發動全國范圍的反抗運動，并且，我將是第一個志愿者。

在大會上，我看見有人打出了標語口號，上面寫著：“曼德拉，給我們槍！”“勝利來自戰斗而不是來自談判！”我理解這種情緒，人民的確遭到了傷害，他們認為談判不會有積極的結果。他們開始認為，推翻隔離制度的唯一辦法是拿起槍桿子。發生博伊帕通慘案后，全國執行委員會中有人說：“我們為什么要放棄武裝斗爭？我們應該放棄和談，而不是放棄武裝斗爭。和談絕不可能使我們實現自己的目標。”我開始同情這伙強硬派，但我逐漸認識到，沒有別的選擇，和談是我多年來一直竭力主張的，我不能放棄和談，但是，也到了讓和談涼下來的時候了，群眾運動是介于武裝斗爭與和談之間的中間道路。人民需要有一個出氣的方式，群眾運動就是這種出氣的最好方式。

當我告訴政府我們準備停止和談的時候，我們向德克勒克先生提交了一個備忘錄，簡要說明了我們退出和談的理由。除了要求解決在民主南非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的關于立憲的僵局，我們還要求追查暴力責任人，將他們繩之以法，并拿出加強對暴力事件發源地——客棧的治安管理辦法。德克勒克先生給我們作了答復，要求與我面談。我拒絕了他的要求，因為我認為，這樣的面談應該是有什么事情要談，而當時我們沒有什么事情好談。

8月3日和4日舉行了大罷工，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和談要求，并抗議政府支持的暴力活動，群眾運動終于達到了高潮。全國有400萬工人待在家中拒絕上班工作，這是南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罷工。這次罷工的重頭戲是10萬人到比勒陀利亞工會大廈進行游行示威，我們在大廈前面的大草坪上舉行了大規模的露天集會。我告訴游行群眾，我們總有一天會作為南非第一個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占領這座大廈。

面對這次群眾運動，德克勒克先生說，如果非洲人國民大會故意把這個國家搞亂，政府將被迫考慮采取某種不愉快的措施。我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任何反民主的行動都將產生嚴重的后果。我說，正是由于存在這種威脅，建立過渡政府才是最為關鍵的當務之急。

在這次群眾運動的鼓舞下，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有一伙人決定去畢曉舉行游行示威。畢曉是東開普西斯凱邦的首府，是由奧帕·基考佐準將領導的一個班圖斯坦。西斯凱素有鎮壓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傳統，1991年，奧帕·基考佐準將宣布西斯凱處于緊急狀態，以制止他所謂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支持的恐怖主義。1992年9月7日上午，7萬名抗議者從四面八方向畢曉體育場涌去。當一支游行隊伍想從一個籬笆墻開口處通過、選擇另一條路進城時，毫無人性的班圖斯坦軍隊朝游行隊伍開了槍，打死了29人，打傷了200多人。那一天，畢曉作為野蠻的代名詞被載入了史冊。

正如古老的諺語所說的那樣，最黑暗的時刻是黎明的前奏。畢曉的悲劇反而導致和談的重新開始。為了找到共識，避免再發生畢曉這樣的悲劇，我會見了德克勒克。談判雙方又開始定期進行會晤。雙方作出了真誠的努力，希望和談能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于是，9月26日，德克勒克先生和我舉行了一次正式的高峰會談。

那天，我們兩人簽訂了“諒解備忘錄”——一份為以后舉行的所有和談樹立樣板的協議。根據這份協議，設立一個獨立的機構監督警察的行動，采取措施對客棧加強管理，禁止在集會上攜帶“傳統武器”。不過，“諒解備忘錄”的真正重要意義在于，它打破了民主南非大會第二次會議關于立憲的僵局。政府最終同意建立一個單獨的、選舉產生的憲法起草機構，該機構將采用一個新憲法，并作為新政府的過渡立法機構。其余需要協商的事就只有選舉這一機構的日期和該機構要形成決議所必須達到的得票率了。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要構建把南非建成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框架。

“諒解備忘錄”迫使因卡塔宣布，從所有涉及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和談中退出來。這個協議使布特萊齊十分惱火，他因此與國民黨疏遠了關系，而與其他不講信譽的班圖斯坦領導人和只關心建立南非白人班圖斯坦的白人右翼黨派結成了聯盟。布特萊齊要求廢除“諒解備忘錄”，結束民主南非大會，解散民族長矛軍。

正如在停止武裝斗爭問題上首先建言一樣，喬·斯洛沃又率先提出了一個有爭議的建議：建立全國統一政府。10月份，喬·斯洛沃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與政府的和談并不是像在戰場上向被打敗的敵人發號施令地提條件那樣的停戰談判。甚至在大選后，非洲人國民大會要想控制局勢也可能需要花幾年的時間。非洲人國民大會執政的政府將仍然需要許多現政府的公共服務人員去管理國家。喬建議為全國統一政府增加“落日條款”，根據這一條款，在一定的時期內，非洲人國民大會將同國民黨共同分享權力，大赦國家安全官員，并尊重公務員與政府簽訂的任何合同。“共同分享權力”本身就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有爭議的條款，被認為是政府所要求的“少數否決權”的代名詞。但是，在這個文件中，它僅僅意味著，如果國民黨在大選中能獲得足夠的票數，就可以參加任何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

經過多次討論之后，我支持喬的意見，并在11月18日得到了全國執行委員會的認可。只要少數黨沒有否決權，全國執行委員會就同意“共同分享權力”的方案。12月份，我們與政府舉行了新一輪秘密談判。這次談判共用了5天多的時間，是在叢林中一個狩獵別墅舉行的。后來的情況表明，這輪談判是一次關鍵的談判，因為這是建立在“諒解備忘錄”基礎上的一次談判。在這次叢林會議上，我們原則同意建立一個為期5年的全國聯合政府，在聯合政府中，所有在大選中得票率超過5%的黨派，都將按得票率參加政府內閣。5年后，聯合政府將變成一個按照簡單多數規則選舉的政府。1993年2月份，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政府宣布，就5年聯合政府、多黨內閣以及建立一個過渡性行政院原則上達成了協議。選舉將在1993年底舉行。

111...

我一直認為，一個人應當在其出生的地方有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家。自從被釋放后，我就打算在庫努為自己建一所村舍。1993年秋天，房子建成了。這所房子是模仿我在維克多·維爾斯特住過的那所房子建造的。大家經常對這所房子評頭論足，但是，我對這些評論的回答很簡單：維克多·維爾斯特那所房子是我住過的第一所寬敞、舒適的房子，我很喜歡那種樣式。我對那所房子的結構十分熟悉，因此，在庫努我也就不必在夜間摸索著找廚房。

4月份，我在特蘭斯凱的住處休了幾天假。4月10日上午，我剛要走出房子，去迎接特蘭斯凱警察橄欖球隊的幾個隊員，這時候，我的管家跑過來告訴我，有我的緊急電話，而且她失聲痛哭起來。我向幾位年輕人說了聲“對不起”，然后就去接電話。一個同事告訴我，南非共產黨總書記、民族長矛軍的參謀長、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最有影響的人士之一克里斯·哈尼，在約翰內斯堡郊區博克斯堡的家門口被近距離射殺身亡。博克斯堡多數居民都屬于白人工人階級，克里斯當時正在他們中間做團結工作。

克里斯之死對我本人和運動組織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是一個自由戰士和愛國志士，對工作盡職盡責。在南非青年中，他是一個偉大的英雄，他與青年人同呼吸共命運，青年人對他言聽計從。如果有的年輕人不守規矩，能駕馭他們的可以說只有克里斯。南非失去了一位最偉大的兒子，失去了一位在把南非轉變成一個新的國家過程中十分難得的人才。

南非是脆弱的。有人擔心，哈尼的被殺可能會引發種族戰爭，青年們認為他們的英雄應該成為烈士，為了這位烈士，他們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我首先乘直升機去薩巴萊勒看望克里斯的那位82歲高齡的父親，向他老人家表示慰問。薩巴萊勒是位于特蘭斯凱市科斐法巴區的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我對這個地方很熟悉，因為馬嘆茲瑪就住在這里。當我到達這個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的村鎮的時候，我對這個小地方竟然孕育出像克里斯·哈尼這樣以其激情和能力喚起整個民族的偉大人物而感到吃驚。他對鄉下窮人的關心源于他在薩巴萊勒的童年，因為他的根扎得深而且實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丟掉自己的根。克里斯的父親深切地表達了他失去兒子的痛苦，但是，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兒子是在斗爭中犧牲的。

我一回到約翰內斯堡，就聽說警察逮捕了一位南非白人抵抗運動右翼武裝力量的成員。他是一位從波蘭移居南非的移民，是被一位勇敢的南非白人婦女向警察報告了殺人犯的汽車牌照號之后被捕的。這個殺人犯是一個絕望的狂徒，一直試圖破壞和談進程。那天晚上，我應邀在南非廣播電臺向全國人民發表了講話。在這種情況下，總是非洲人國民大會，而不是政府在努力地安撫人民。

我說，和平進程及和談不能停止，我以我所擁有的權威“呼吁我們的人民保持冷靜，以保持一支紀律嚴明的和平力量的方式向克里斯·哈尼表示懷念和敬意”。

今天晚上，我要向每一個南非人，其中包括黑人和白人，講一講我的肺腑之言。一位心懷偏見和仇恨的白人，一到我們的國家就犯下了如此卑鄙的罪行，把我們全國的人民推向了災難的邊緣。一位屬于南非荷蘭人的白人婦女，我們可以想象她冒著生命危險，使這個殺人犯被繩之以法……現在，是所有的南非人站在一起，從各個角落抗擊那些想破壞克里斯·哈尼為之獻出生命的屬于我們大家的自由的時候了。

殺害克里斯是白人至上主義者企圖阻止這種歷史的必然結果，他們寧愿讓國家陷入內戰也不接受通過和平方式實現多數裁定原則。

我們采取了一個策略以便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支持者有所交代。為避免報復性暴力事件的發生，我們在全國安排了為期一周的、一系列的群眾集會和示威。這樣，就可以為人民提供一個表達他們不滿的方式，而且又避免了暴力。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已經私下里進行了會談，并一致認為，我們決不讓殺害哈尼的兇手破壞和談。

幾天后，我們得知，保守黨成員克萊夫·德比－劉易斯因與殺害克里斯·哈尼有牽連而遭到了逮捕。這就進一步說明，南非的確存在著“第三武裝”。克里斯本人就曾經批評過最近有人從一個空軍基地盜竊武器，警察初步進行的調查報告顯示，殺死克里斯·哈尼的槍恰恰是來自那個空軍基地的武器庫。

整兩周之后，又有一個重要人物去世了。這個人物的去世并不像克里斯之死那樣使全國感到震驚，但是，卻使我十分悲痛。長期以來，奧利佛·塔博身體就一直不太好，中風使他突然死亡。他的夫人阿德萊德早上一早就給我打來了電話，我立即趕到了奧利佛的床前。我沒有得到向他告別的機會，因為當時他已經去世。

在柏拉圖關于金屬的寓言中，先哲把人分成了金、銀、鉛三類。奧利佛就是純金，他的智慧、他的友情和博愛、他的寬容和慷慨、他的始終不渝的忠誠和自我犧牲精神，就像金子一樣閃閃發光。他作為一個領導人，我非常尊敬他；他作為一個人，我是那樣地熱愛他。

盡管我被關押期間我們一直不在一起，但是，奧利佛在我的心目中從來就沒有遠離過我。盡管我們不在一起，但是，我通過許多方式一生中都在心里與他進行交流。這可能就是在他去世的時候，我之所以感到如此悲痛的原因。正如我對一位同事說的那樣，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仿佛是我們剛剛重逢，他就被死神從我身邊奪走了。當我看著他靜靜地躺在棺材里的時候，我感到自己身體的某個部分也離開了這個世界。

盡管我們還沒有執政，但是，我要為奧利佛舉行國葬。這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所能給他的最后的安慰。在索韋托體育場舉行的群眾集會上，數百名來自外國政府的顯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向這位在流亡期間仍然使非洲人國民大會充滿活力的偉人表示敬意。民族長矛軍為他舉行了游行，并在他的墓前鳴槍21響志哀。奧利佛活著看到了釋放政治犯和流亡者的歸來，但是，他沒能活到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南非親自投上自己的一票。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南非，這仍然是我們要實現的目標。

112...

盡管很少有人能記住1993年6月3日這個日子，但是，這一天卻是南非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就在這一天，經過在世界貿易中心舉行了幾個月的和談之后，多黨會議投票確定了南非第一次進行全國性、不分種族、一人一票式選舉的日子：1994年4月27日。在南非歷史上，占多數的黑人將第一次走到投票地點選舉自己的領導人。根據協議，選民將選出400名代表，組成一個憲法起草機構。這一機構將既負責起草新憲法，又起到議會的作用。選舉產生這個機構之后，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選舉總統。

談判在4月份就已經恢復。當時，26個黨派，包括因卡塔自由黨、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和保守黨，幾個月以來一直敦促政府確定選舉日期，但他們卻一直敷衍搪塞。然而今天，這個日期被實實在在地確定了下來。

一個月后，即7月份，多黨會議同意先起草一部臨時憲法。其中規定，在全國和地區黨派名單中，按比例選舉成立400人的兩院制議會，而參議院則通過地方立法機構間接選舉。

地方立法機構選舉與全國大選同時進行，地方立法機構可以起草自己的地方法規，而地方法規必須符合全國憲法。

布特萊齊酋長要求在選舉前起草憲法，并站出來抗議在完成起草憲法之前確定選舉日期。8月份起草的臨時憲法第二稿雖然賦予了地方更大的權力，但是，卻仍然沒有平息布特萊齊酋長和保守黨的不滿。保守黨把這些決議描繪成違背了南非白人的利益，他們成立了一個由南非國防部前部長康斯坦·維爾強將軍領導的名為“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陣線”的組織，企圖聯合白人保守組織，統一到所謂“人民國家”，即“白人家園”的思想上來。

11月18日午夜剛過，多黨會議舉行了一次會議，批準了臨時憲法。政府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攜手搬掉了其余的障礙。新的內閣將由得票率超過5%的政黨組成，形成決議需要一致通過，而不是政府建議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全國大選將在1999年舉行，這樣，全國統一政府的任期將長達5年。最后，政府同意我們所堅持的一次投票選舉辦法，而不是由全國立法機構和地方立法機構分別選舉。兩次選舉只能使多數選民產生混亂，因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一生中第一次參加投票選舉。在選舉前的一個時期內，由各黨派人士參加的一個過渡性執行委員會將確保為選舉創造合適的氣氛。事實上，過渡委員會就是1993年12月22日至1994年4月27日大選期間的臨時政府。一個擁有廣泛權力的獨立選舉委員會將負責選舉的管理工作。我們真正地邁進了新時代的門檻。

我從來沒有過分關心對個人的獎勵。一個人不會僅僅為得獎而成為一名自由戰士，但是，我與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1993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這讓我深受感動。對我來說，諾貝爾和平獎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涉及南非的歷史。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是諾貝爾委員會給予這種殊榮的第三個南非人。阿爾伯特·魯圖利酋長于1960年獲得過這個獎項。第二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人是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他在種族隔離制度最恐怖的歲月里無私地與種族隔離邪惡勢力進行了斗爭，在1984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榮譽屬于全體南非人民，特別是屬于那些在斗爭中戰斗的南非人，我要代表他們接受這個榮譽。但是，諾貝爾獎是我從來沒想到過的一種獎勵。即使是在羅本島上那些最艱難的歲月里，因為我們一直堅持武裝斗爭，“大赦國際”也未曾支持過我們，這個組織不可能為堅持暴力的人撐腰。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認為諾貝爾委員會絕不會把和平獎授予一個創建民族長矛軍的人。

我對挪威和瑞典人民懷有特別的感情。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當我們去西方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尋求支持的時候，我們的處境十分艱難。但是，在挪威和瑞典，我們卻受到了熱情的歡迎，他們為我們合法的自衛行動提供了各種援助，其中包括獎學金和其他資金，并為政治犯提供了人道主義援助。

在挪威，我利用發表演講的機會，不僅感謝諾貝爾獎委員會，并向他們介紹了南非將成為一個正義和平等的新南非的未來藍圖，而且也稱贊了我的獲獎伙伴F. W.德克勒克先生。

他承認在實施種族隔離制度的過程中對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犯下了嚴重的錯誤，這需要巨大的勇氣。他深謀遠慮，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須通過和談并作為和談過程中的平等參與者，一起決定他們的未來。

常常有人問我，我怎么能夠在那么嚴厲地批評德克勒克先生之后與他一起接受這個獎項。盡管我不會收回我對他的批評，但我可以說，他對和平進程作出了真正的、不可缺少的貢獻。我不想損害德克勒克先生的威信，因為他威信越低，和談進程就會越慢。要想與對手和平共處，你就必須與對手一道工作，使對手變成你的伙伴。

盡管正式選舉全國憲法起草機構直到1994年2月才開始進行，但是，我們在新憲法被批準通過后就立即開始準備競選。其實我們算不上超前，因為國民黨從釋放我們那天起就已經開始了競選活動。

盡管民意測驗顯示非洲人國民大會遙遙領先，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認為勝利已經在握。我告誡大家，要克服過分的樂觀主義。我們閱讀了好多關于某些政府有望贏得大選而最終卻得了個第二名的資料。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經驗豐富、組織嚴密、經濟實力雄厚的競選對手。

我們的競選是在由珀珀·莫萊斐、泰勒·勒寇塔和凱特索·戈德漢組成的領導能力很強的競選班子的領導下開展的，他們都是聯合民主戰線中善于動員群眾的活動家。任務十分艱巨，我們估計將有2000萬人參加投票，而且他們多數都是第一次參加選舉。我們的許多選民都是文盲，投票的場面也有可能把他們嚇回去。根據獨立選舉委員會統計，全國將設立一萬個投票站。我們設法對十多萬人進行了培訓，對他們實施選舉方面的教育。

我們選舉工作的第一個階段是開展被大家稱作“人民論壇”的活動。非洲人國民大會候選人將走遍全國各地，在鄉鎮和村子里召集會議，聽取人民的愿望、擔心、想法和不滿意見。“人民論壇”與候選人比爾·克林頓在美國問鼎總統道路上舉行的選民見面會差不多。“人民論壇”就相當于人民的議會，與我小時候在“大王宮”看見的那種酋長會議是完全不同的。

我醉心于“人民論壇”這種形式，11月份，我在納塔爾開始參加“人民論壇”，然后去了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北部的PWV地區。有時，我一天參加多達三四個“人民論壇”。人民當然也非常喜歡“人民論壇”這種形式，過去沒有人就他們自己的國家應該做什么征求過他們的意見。

把“人民論壇”的建議搜集起來之后，我們開始走向全國各地，把我們的信息傳遞給人民。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有的人主張把競選活動簡化成一種解放選舉，并告訴人民：請投我們的票，因為我們使你們得到了解放。我們決定，向他們描繪我們創建的新南非的前景，請求人民投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票，這不僅因為我們與種族隔離政策斗爭了80年，更因為對于建立一個他們所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南非來說，我們是最有資格的。我認為，我們的競選應該著眼于將來，而不是盯著過去。

非洲人國民大會起草了一個長達150頁的文件。這個文件被稱作《建設與發展綱領》。它簡要說明了我們的計劃：我們將通過發展公共事業創造工作機會，建造100萬戶帶有供電設施和沖水廁所的新房子，擴建基本衛生設施并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10年義務教育，通過土地產權法重新配置土地，停止對基本食品征收增值稅。我們還將致力于在私人和公共領域采取一系列更廣泛、更積極的措施。這個文件被編寫成一個名為《為全南非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宣言，這個標題后來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競選的口號。

正如我們告訴人民我們將要干什么那樣，我認為我們還必須告訴人民我們能干什么。許多人認為，通過自由、民主選舉，生活一夜之間就會發生變化，但是，情況遠非如此。我經常對大家說：“不要指望大選之后，馬上就能坐上奔馳車，在自己后院的游泳池里游泳。”我告訴我們的支持者：“除了你們將增加自尊心并成為你自己國家的公民之外，生活不會戲劇性地發生變化。你們必須要有耐心，可能必須等上5年才能看到結果。”我向他們提出挑戰，我說不會資助他們。“如果你們想繼續在貧窮中生活，沒有衣服穿，也沒有飯吃，”我告訴他們，“那么你就到那些黑酒店里去酗酒吧。但是，如果你們想過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須努力工作。我們不能為你們包辦一切，你們必須腳踏實地地去勞動。”

我還告訴白人聽眾，我們需要他們，不想讓他們離開這個國家。他們像我們一樣，都是南非人，這里也是他們的家園。直言不諱地說，我對隔離制度十分反感。但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說，我們應該忘記過去，把精力集中到為大家創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上來。

每逢集會，都要告訴大家如何投票。選票本身是一張窄長的紙條，左邊是按降序排列的政黨的名稱，右邊是該政黨的符號和政黨領袖的照片。選民要在靠近他們選擇的政黨的下一欄中打上一個“×”號。我告訴我的聽眾：“選舉那天，認真看一下你們的選票，當你看見一個年輕、漂亮的人，就打個‘×’號。”

113...

通向自由的道路遠不是平坦的。盡管在新的一年里，過渡執行委員會開始行使職權，但是，仍有幾個政黨退出了大選，并采取了抵制政策。在布特萊齊的支持下，斯維里斯尼國王要求夸祖魯實行自治，呼吁夸祖魯省內的人都不參加投票。白人右派把這次大選說成是一次背叛，吵鬧著要建立所謂“人民國家”，但是，他們又沒有說在哪個地方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在整個南非，沒有一個白人占多數的地方行政區域。

1994年2月12日是各政黨登記注冊的最后一天。這一天，因卡塔自由黨、保守黨和“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陣線”沒有參加登記。博普塔茨瓦納班圖斯坦政府也拒絕參加大選，并反對被并入統一的南非。我為這些重要的群體選擇不參加大選一事感到煩惱不已。為了爭取他們，我們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讓步：同意他們就本地和全國立法機構進行兩次投票，保證地方有更大的權力，把納塔爾省重新命名為夸祖魯－納塔爾，同意把具有共同文化和語言的群體可以實行“內部”自決這一原則寫進憲法。

我安排于3月1日在德班與布特萊齊酋長見面。我在這次會見之前的一次集會上說：“我將向這些想把我們的國家拖向戰爭深淵的人跪下乞求。”布特萊齊酋長同意臨時登記參加選舉，以換得把我們之間在立憲問題上的分歧提交國際調解的許諾。我非常高興地同意了他的意見。在注冊登記的最后一天，維爾強將軍也以一個名為“自由陣線”的新政黨的名義登記參加選舉。

盡管博普塔茨瓦納的首領盧卡斯·曼高佩選擇了不參加大選，但是，大選的浪潮很快使形勢發生了變化。我多次敦促他，讓他的人民自行決定是否參加大選，但是，他根本不聽。要參加大選的人發動了群眾游行示威和罷工，并很快蔓延到了博普塔茨瓦納的公共服務部門，廣播和電視也停止了播放。在馬費坑大街上，班圖斯坦警察與罷工工人和罷課學生們之間發生了沖突。曼高佩從他的白人右翼盟友那里調來了援兵。很快，他自己的軍隊就拋棄了他，在3月初的一次政變中，他被趕下了臺。幾周后，西斯凱的基考佐準將也宣布繳械投降，并請求南非接管西斯凱班圖斯坦。

納塔爾的暴力越來越嚴重。因卡塔自由黨的支持者們不準我們在納塔爾進行競選。15名非洲人國民大會選舉工作人員在張貼非洲人國民大會宣傳品之后被槍殺和砍死。3月份，約翰·克里格勒法官向我和德克勒克先生報告，由于缺乏夸祖魯政府的合作，如果不直接進行政治干預，自由選舉將無法舉行。為了顯示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納塔爾的力量，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德班市中心舉行了游行示威，然后，因卡塔自由黨企圖也在約翰內斯堡舉行游行示威，從而造成了悲慘的后果。

3月28日，數千名因卡塔自由黨成員揮舞著長矛和圓頭棒穿過約翰內斯堡市區到市中心集結。同時，一伙因卡塔武裝人員企圖進入非洲人國民大會總部謝爾大廈，但是被武裝警衛擊退。市中心也發生了不明身份槍手的槍擊事件，共造成53人死亡。這是一個令人恐怖的景象，南非似乎已經瀕臨內戰的邊緣。因卡塔正在企圖拖延大選，但是，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是不會動搖的。這個日子是神圣的，不允許有任何改變。

我已經同意國際調解，4月13日，一個由前英國外交大臣卡林頓爵士和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為首的代表團來到了南非。但是，當因卡塔自由黨被告知，選舉日期不容調解時，他們拒絕與調解人見面，因此，兩位調解人沒有與任何人進行會談就離開了南非。當時，布特萊齊酋長知道，無論發生任何情況，大選日期都是不會更改的。4月19日，離大選日期僅剩一周的時候，布特萊齊酋長接受了關于允許祖魯民主立憲的條件，并同意參加大選。

在投票日的10天前，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單獨在電視上進行了辯論。在福特黑爾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就是一個聲情俱佳的辯論選手。在我參加非洲人國民大會后的最初幾年中，我走上講臺參加過多次激烈的辯論。在羅本島開采石灰石的時候，我們也鍛煉過辯論的技巧。所以，我對電視辯論充滿了信心。盡管如此，辯論前一天，我們舉行了一次模擬辯論。在模擬辯論中，記者艾利斯特·斯帕克斯巧妙地充當了德克勒克先生的角色。據我的競選顧問班子說，我過于認真，他們說我講話的速度太慢，缺乏進攻性。

但是，當舉行實際辯論的時間到來的時候，我非常堅決地抨擊了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我指責國民黨，通過散發說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口號是“殺一個有色人，殺一個農民”的富有煽動性的連環畫，煽動開普地區的有色人與非洲人之間的種族仇恨。我說：“在這個國家中，沒有一個組織像新國民黨那樣故意制造分裂。”當德克勒克先生批評非洲人國民大會計劃耗資數百萬美元用來建造房屋和提供社會福利的時候，我反駁說，他是在擔心我們會把如此多的財力用在黑人身上。

但是，當辯論接近尾聲的時候，我感覺我對將來在全國統一政府中成為我的伙伴的這個人也許過于殘酷無情了。在作總結時，我說：“德克勒克先生與我本人之間的交流不應掩蓋一個重要的事實。我認為，我們是全世界來自不同種族但卻對同一個國家有著同樣的忠誠和同樣的愛的人之光輝典范……盡管德克勒克對我提出了批評，”我然后看著他說，“先生，你依然是我信賴的人士之一。我們將共同面對這個國家的問題。”這時，我伸過手去握住了他的手說：“我為握著你的手共同前進而感到自豪。”德克勒克先生似乎有些吃驚，但他很高興。

114...

我于4月27日參加了投票選舉，這是4天的投票時間中的第二天（某些特定群體包括老人、殘疾人和住在國外的南非人被允許在4月26日投票選舉）。我之所以選擇在納塔爾參加投票是想向住在這個分離省份中的人民顯示，去投票站投票并沒有什么危險。我是在位于德班正北一個青翠的小山城伊南達的奧哈蘭治高等學校參加投票的，因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第一任主席約翰·杜比就安葬在這里。這位非洲愛國戰士于1912年幫助建立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在他的墳墓旁邊投上我神圣的一票，讓歷史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因為他82年前開創的歷史使命馬上就要完成了。

當我來到位于一所小學上面的土坡上，佇立在他的墳墓前的時候，我所想的不是現在，而是將來。當我走到投票站的時候，我腦子里想的是那些用他們的生命換來了今天的英雄，他們為了現在即將完成的事業作出了最后的犧牲。我想到了奧利佛·塔博、克里斯·哈尼、魯圖利酋長和布拉姆·費希爾。我懷念那些偉大的非洲英雄，正是因為他們作出了偉大的犧牲，幾百萬南非人才能在這個日子里參加投票選舉。我想起了喬西亞·古彌德、G. M.奈克、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莉蓮·恩高義、海倫·約瑟夫、玉蘇福·達杜、摩西·考塔尼。4月27日那天，我并不是一個人去投票站，我與他們一起投上了我那神圣的一票。

在我走進投票站之前，一位不恭敬的媒體記者問：“曼德拉，你要選誰？”我笑了，說：“你知道，整個上午，我一直在為選誰而感到苦惱。”我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幾個字后面的空格中打了個“×”號，然后把折疊起來的選票投進了一個簡易的木箱中。我投下了我有生以來第一張選票。

非洲人那天去投票站投票的情景一直在我記憶中燃燒。耐心的人們排著長龍，蜿蜒穿過鄉鎮和城市那塵土飛揚的道路和街道。那些等了半個世紀才等來一生中第一次投票選舉的老年婦女說，她們一生中第一次感覺自己像人類；白人則說，他們為最終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里而感到自豪。投票期間，全國人民沉浸在一片歡快的氣氛之中。暴力和爆炸事件也不再發生，我們的國家宛若獲得了新生。投票選舉工作中，后勤服務方面發生了問題，選票放錯了位置，有的地方出現了非法投票站和騙人的謊言，但與民主和正義的壓倒性勝利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統計投票結果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我們獲得了全國選票的62.6%，略低于我們希望的三分之二的得票率（不需其他政黨幫助就可以通過最終的憲法），從而使我們有資格在國家機構中的400個席位中占有252個席位。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北德蘭士瓦和東德蘭士瓦、西北地區、東開普和自由邦取得了絕對優勢。在西開普，我們的得票率是33%，而國民黨在這個地區獲得了勝利，他們在有色選民中的得票率特別高。在夸祖魯－納塔爾，我們獲得了32%的選票，因卡塔自由黨在這一地區的大選中勝出。在納塔爾，由于害怕發生暴力和恐嚇，我們許多選民都待在家中，沒有能參加投票。有人舉報，出現了許多假票和廢票。但是，這些問題并沒有影響大局。我們低估了因卡塔自由黨在夸祖魯的力量，他們在選舉那天充分顯示了自己的影響力。

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有人因我們沒有進入三分之二這個門檻而感到失望，但我卻不這樣認為。事實上，我倒是松了一口氣，如果我們得到三分之二的選票，并能夠起草憲法而不受因別的政黨介入而帶來的影響，那么，人們就會說我們通過了一個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憲法，而不是南非的憲法。我要的是一個真正全國統一的政府。

5月2日晚間，德克勒克先生發表了一個措辭溫和的講話，承認競選失敗。在經過了3個多世紀的統治之后，占少數的白人終于承認在大選中失敗，并把權力交給了占多數的黑人。那天晚上，非洲人國民大會準備在約翰內斯堡市中心的卡爾頓大酒店舞廳里舉行慶祝大會。當時，我患了重感冒，我的醫生要我待在家中休息。但是，沒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去參加慶祝大會。大約9點鐘，我走上了舞臺，看到的是一張張幸福、快樂的笑臉。

我向大家解釋說，我的聲音由于感冒有些沙啞，我的醫生勸我不要來參加這個慶祝會。然后我說：“我希望你們不要告訴他我沒能遵守醫囑。”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賀，他表現得很得體。我感謝所有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和民主運動組織的成員，他們工作得如此出色，如此長久。那天晚上，偉大的自由戰士馬丁·路德·金的夫人科雷塔·斯科特·金也在舞臺上，當我引用她丈夫那段不朽的名言時，我敬重地看了她一眼。

這是我們國家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我滿懷驕傲和欣喜站在你們的面前——我為這個國家的每一個普通老百姓而驕傲。你們表現了這樣一種鎮定而有忍耐的決心，要求收回自己的國家政權。現在，令人高興的是，我們可以公開大聲宣布：我們終于得到了自由！我們終于得到了自由！我為你們的勇氣所折服，并懷著對你們大家充滿熱愛的心情站在你們面前。在我們歷史上的這個時刻，領導非洲人國民大會對我來說是最高的榮譽。我是你們的公仆……重要的不是個人，而是集體……現在，醫治舊傷、建設一個新南非的時候已經到來。

自從統計結果明確顯示將由非洲人國民大會組建政府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呼吁和解、包扎這個國家的傷口、加強信任和信心作為自己的使命。我知道，許多人，特別是在人數上占少數的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正在對前途感到憂慮，我希望他們放心。我反復提醒大家，解放斗爭并不是一種反對任何一個團體或種族的戰斗，而是反對一種壓迫制度的斗爭。我利用一切機會表明，全南非人現在必須團結起來，我們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樣的人民，我們要攜手并肩走向未來。

115...

5月10日拂曉，天空中萬里無云。在過去的幾天里，我一直高興地忙于接待政要和前來在就職典禮之前表示敬意的各國領導人。這次就職典禮將是國際領導人在南非土地上的一次最盛大的聚會。

就職典禮在比勒陀利亞由工會大廈組成的一個美麗的圓形露天戲場舉行。幾十年來，這里一直是白人霸權的象征，現在，這里卻變成了各種膚色和民族織成的一道彩虹，南非第一個民主的、沒有種族歧視的政府就要在這里誕生。

在這個秋風送爽的日子里，我在我女兒澤尼的陪同下來到了會場。在講臺上，德克勒克先生首先宣誓就任第二副總統，然后，塔博·姆貝基宣誓就任第一副總統。當輪到我宣誓就職的時候，我莊嚴地說出了自己的誓言：遵守和堅持憲法，為共和國的繁榮、昌盛和共和國的人民貢獻自己的一切。面對在座的嘉賓和全世界的目光，我說：

今天，我們大家歡聚一堂……為新生的自由帶來了光榮和希望。經受了太長太長的人道災難之后，一個全人類都為之驕傲的社會就要誕生了。

……我們，不久前還是囚犯，今天卻被給予了寶貴的特權——在自己的土地上作為主人接待世界各國的客人。我感謝我們尊貴的國際友人出席這個大會，與我國人民共同慶祝這個屬于正義、和平、人類尊嚴的偉大勝利。

我們終于獲得了政治解放。我們決心把我們所有的人民都從貧窮、被剝奪、痛苦、性別歧視及其他歧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絕不能讓這個美麗的國家再次發生一伙人壓迫另一伙人的悲劇，絕不能！絕不能！……太陽將永遠照耀在這個輝煌的人類成就之上。

讓自由主宰一切。上帝保佑非洲！

不長時間之后，當南非噴氣式飛機、直升機和軍事運輸機壯觀的編隊從工會大廈上空呼嘯著進行各種造型表演的時候，我們都驚奇地抬頭望著天空。這不僅是尖端技術和軍事力量的展示，而且也是軍隊忠于民主、忠于自由公正選舉出來的政府的表現。僅僅不長時間之前，南非國防軍和警察的最高將領，胸前掛著綬帶和勛章向我敬禮，并宣誓效忠。我不禁想起沒有多少年前，他們不但不向我敬禮，而且還逮捕過我。最后，排成V字形的黑斑羚噴氣式飛機在其尾部噴出了黑、紅、綠、藍和金黃色的彩煙，那是新南非國旗的圖案。

那天，我認為更有象征意義的是黑人、白人分別用科薩語和南非荷蘭語演唱我們的兩首國歌。白人唱的是“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而黑人唱的是“Die Stem”——原先的共和國國歌。盡管那天黑人和白人都不熟悉各自唱的歌詞，但是，他們將很快從心底里體會到這些話語的含義。

就職典禮那天，我一直沉浸在一種歷史感之中。20世紀中的第一個十年期間，也就是殘酷的英布戰爭之后以及我本人降生之前不幾年，南非的白人解決了他們之間的分歧，并建立起了一種白人在黑人自己的土地上統治黑人的社會制度。他們創造的這種制度，形成了世人皆知的最殘酷、最野蠻的社會基礎。現在，在20世紀最后一個十年，也就是在作為我個人的第八個十年里，這個制度被永遠地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承認所有的人，不分他們是什么膚色都享有權利和自由的社會制度。

正是由于成千上萬的難以想象的犧牲才換來了今天，這些人作出的犧牲是絕對無法計算的，也是絕對無法得到回報的。正如過去的那么多其他日子一樣，那一天我感到，我僅僅是那些先我而去的南非愛國者的代表。那條漫長而崇高的斗爭道路似乎已經到了終點，現在將由我把它延續下去。我為不能向他們表示感謝和他們不能看到自己的犧牲換來的今天而感到難過。

種族隔離政策在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持久的傷痕。我們大家要從深深的傷害中得到康復，即使不需要花費幾代人的時間，也可能要花費許多年的時間。但是，幾十年的壓迫和野蠻統治還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它造就了像奧利佛·塔博、瓦爾特·西蘇陸、魯圖利酋長、玉蘇福·達杜、布拉姆·費希爾、羅伯特·索布克韋這樣偉大的時代人物。對于這些如此勇敢、智慧、慷慨大方的人物，可能再也沒有人去了解他們。也許，只有如此深重的壓迫才能打造出這種高尚的人格。我們國家的地底下蘊藏著許多礦產和寶石，但是，我總認為，我們國家最寶貴的還是它的人民，他們比最純正的鉆石還要純凈和寶貴。

我正是從這些斗爭中的同志身上弄清楚了勇敢的含義。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們不分男女，為了一個理想而去冒險和犧牲生命，我親眼目睹了我們的人民勇敢地、不屈不撓地面對攻擊和折磨，顯示了難以想象的力量和堅韌。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懼，而是戰勝了畏懼。我記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懼，但是我把這種畏懼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覺不到畏懼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懼的人。

我從來也沒有對發生這種偉大轉變喪失希望。這不僅僅是因為我提到的那些偉大的英雄人物，而且也因為我們國家的普通老百姓所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我知道，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存在著仁慈和慷慨。沒有一個人由于他的膚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個人。人們一定是通過學習才會有恨，如果他們能夠學會恨，那么他們也一定能夠學會愛，因為愛在人類的心中比恨來得更自然。即使是在監獄里那些最冷酷無情的日子里，我也會從某個獄警身上看到若隱若現的人性，可能僅僅是一秒鐘，但是，它卻足以使我恢復信心并堅持下去。人的善良就像是可以隱藏但絕對不會熄滅的火焰。

我們睜大眼睛開展斗爭，絕不能幻想斗爭的道路是一帆風順的。當我作為一個年輕人參加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時候，我看到了我的同志為他們的信仰付出的代價，并且，這種代價往往是十分昂貴的。對于我自己，我絕不會為獻身于斗爭而后悔，我隨時準備去面對影響我個人的各種困難。但是，我的家庭為我獻身斗爭付出了可怕的代價，或許，他們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高了。

在生活中，每個男人都有兩項義務：一項是對家庭、對父母、對妻子、對孩子的義務，另一種是對人民、對社會、對國家的義務。在文明的社會中，每個男人都能根據自己的愛好和能力盡到這些義務。但是，在像南非這樣的國家里，對于像我這樣的出身和膚色的男人，要想盡到這兩項義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南非，一個黑人要想作為一個人去生活，可能會受到處罰和隔離；在南非，一個想為他的人民盡義務的人，必然會被迫離開他的家和家人，去過一種孤身奮戰、帶有秘密和反叛性質的生活。我并非一開始就作出了把我的人民置于我的家人之上的選擇，但是，為了為我的人民服務，我被剝奪了作為一個兒子、兄弟、父親和丈夫盡自己的義務的權利。

這樣，我獻身于我的人民——我從來不認識、從來沒見過面的數百萬非洲人，是以犧牲我最了解、最熱愛的人為代價的。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是在一個孩子問他父親時讓人難以回答的問題。“你為什么不能和我們在一起？”這位父親一定會說出這樣一句近乎可怕的話：“還有與你一樣的別的孩子，許許多多的孩子……”然后，他的聲音就漸漸地聽不清了。

我并不是一生下來就渴望著自由，因為我生下來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種方式享受著自由：我在我母親那個小房子周圍自由地奔跑，我在穿過我村莊的清清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我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我騎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只要我聽我父親的話并遵守部落的風俗習慣，人間和天上的律條都不會找我的麻煩。

只有當我開始知道我童年的自由之夢其實是幻想的時候，我才發現，作為一個年輕人，我的自由已經被剝奪，因此，我開始渴望自由。開始，作為一個學生，我僅僅是要我自己的自由：晚上能待在戶外的自由，想讀什么書就讀什么書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這些都是一些暫時的自由。后來，作為約翰內斯堡市的一個年輕人，我渴望得到基本的、有尊嚴的自由：發揮自己潛力的自由，維持生計的自由，結婚的自由和擁有家庭的自由，這些都是在遵紀守法的生活中不受束縛的自由。

但是，后來我慢慢地發現，不僅我沒有自由，我的兄弟姐妹也沒有自由。我發現，不僅我的自由被剝奪，像我一樣的每個人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加入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對自己自由的渴望轉變成了對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正是這種更大的渴望，即為人民爭取尊嚴和有尊嚴地生活的自由，才使我的生活充滿了活力。因此，我從一個膽怯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勇敢的青年，從一個遵紀守法的律師變成了一個“罪犯”，從一個熱愛家庭的丈夫轉變成了一個沒有家的人，從一個熱愛生活的人轉變成了一個“修道士”。我并不比別人道德高尚和富有自我犧牲精神，但是，我發現在我知道我的人民不自由的時候，我甚至不能享受我被允許享受的最起碼、最有限的自由。自由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我的人民任何一個人身上戴著枷鎖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著枷鎖，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著枷鎖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著枷鎖。

正是在那些漫長而寂寞的歲月里，我對我自己的自由的渴望才變成了我對所有的、不論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我同時也知道，正像被壓迫者的親身感受一樣，壓迫者必須得到解放。剝奪別人自由的人是可恨的囚犯，他被鎖在偏見而心胸狹窄的鐵窗背后。如果我要剝奪別人的自由，我也就不是真正自由的，就像當我的自由被別人剝奪時我也一定不自由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壓迫者和壓迫者同樣都被剝奪了人性。

當我走出監獄的時候，解放被壓迫者和壓迫者雙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說，這個使命已經完成了，但是我認為，情況并非如此。事實上，我們還沒有自由，我們僅僅是獲得了要自由的自由，獲得了不被壓迫的權利。我們還沒有邁出旅途中的最后一步，而且在更漫長、更困難的道路上，我只不過剛剛邁出了第一步。因為，獲得自由不僅僅是擺脫自己身上的枷鎖，而是尊重和增加別人的自由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們獻身于自由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我已經走過了漫漫的自由之路。我一直在努力地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但在這條路上，我也邁錯過腳步。我已經發現了一個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你會發現還有更多的山要去攀登。我在這里稍停片刻，悄悄地看一看周圍的壯麗景觀，回頭看看我已經走過的那段路程。不過，我只能稍息片刻，因為伴隨著自由而來的責任，使我不敢就此卻步，我的漫漫自由路還沒有到達終點。

A

阿比索托 abeSotho

阿比泰姆布 abeThembu

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Abdullah Abdurahman

阿布杜拉葉·迪亞羅 Abdoulaye Diallo

阿布杜雷·扎賽特 Abdulhay Jassat

阿布拉姆·莫伊勒娃 Abram Moilwa

阿德萊德·塔博 Adelaide Tambo

阿爾伯特·魯圖利 Albert Luthuli

阿爾博提娜·西蘇陸 Albertina Sisulu

阿爾弗雷德·恩佐 Alfred Nzo

阿爾及利亞抵抗組織 FLN（Algerianresistance）

阿爾奇·古彌德 Archie Gumede

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陣線 Afrikaner Volksfront

阿倫·布塞克 Allan Boesak

阿馬巴查 amaBaca

阿馬崩瓦納 amaBomyana

阿馬恩古提亞納 amaNgutyana

阿馬嘎萊卡 amaGcaleka

阿馬木棼古 amaMfengu

阿馬木旁多 amaMPodo

阿馬木旁多米斯 amaMPodomis

阿馬穆俳夫家族 amaMpemvu clan

阿邁德·布拉 Ahmed Bhoola

阿邁德·卡特拉達 Ahmed Kathrada

阿蒙苦梢 umngqusho

阿米納·帕哈德 Amina Pahad

阿穆佛蘇拉 umphothulo

阿瑟·戈德里克 Arthur Goldreich

# ［譯名對照表］

阿瑟·萊泰勒 Arthur Letele

阿瑟·威靈頓 Arthur Wellington

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 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PACA）

阿扎尼亞人民組織Azanian People’s Organizaation

埃達·馬提木苦陸 Ida Mthimkhulu

埃德溫·莫福參亞納 Edwin Mofutsanyana

埃克蘇瑪，A. B.　A. B. Xuma

埃勞佛大街 Eloff Street

埃里克·恩彩樂 Eric Ntsele

埃馬非卡尼 iMfecane

埃米格蘭特 Emigrant

埃塞俄比亞暴動軍司令部Ethiopiaan Riot Battalion

艾德萊·史蒂文森 Adlai Stevenson

艾德里安·弗勞克 Adriaan Vlok

艾迪·丹尼爾斯 Eddie Daniels

艾爾克特·格溫奇 Alcott Gwentshe

艾哈邁德·本·貝拉 Ahmed Ben Bella

艾麗斯市 Alice

艾利伽·莫考尼 Elijah Mokone

艾利斯特·斯帕克斯 Allister Sparks

艾倫·莫萊特 Aaron Molete

艾倫·佩頓 Alan Paton

艾諾奇·恩拉珀 Nnoch Nhlapo

艾韋琳·馬賽·曼德拉 Evelyn Mase Mandela

愛國陣線 Patriotic Front

愛倫·恩卡彬德 Ellen Nkabinde

安布羅斯·里夫斯 Ambrose Reeves

安德烈·斯凱福勒 Andre Scheffler

安德魯·庫耐尼 Andrew Kunene

安德魯·馬桑多 Andrew Masondo

安德魯·默里 Andrew Murray

安德魯·木蘭基尼 Andrew Mlangeni

安迪巴·托伊佛·杰·托伊佛Andimba Toivo ja Toivo

安東·萊彼德 Anton Lembede

安卡利巴 Khalipa

奧卡木博準將 Brigadier Aucamp

奧蘭多 Orlando

奧蘭多東 Orlando East

奧蘭多西 Orlando West

奧蘭治自由邦 Orange Free State

奧利佛·塔博 Oliver Tambo

奧盧塞貢·奧巴桑喬 Olusegun Obasanjo

奧帕·基考佐 Oupo Gqozo

奧斯卡·穆培塔 Oscar Mpetha

奧斯瓦德·皮洛Oswald Pirow

奧祖茂 Autshumao

B

巴雷特·鐵西 Barrett Tyesi

巴利韋·曼德拉 Baliwe Mandela

巴木巴塔 Bambatha

巴納巴基·布拉伊 Banabakhe Blayi

巴納德 Barnard

巴培迪 Bapedi

巴斯納，H. M.　H. M. Basner

巴蘇陀蘭 Basutoland

巴索托 Basotho

拜爾斯·諾德 Beyers Naude

班圖·霍勒彌薩 Bantu Holomisa

班圖管理機構 Bantu Authorities

班圖教育法 Bantu Education Act

班圖世界報 Bantu World

班圖體制 Bantustan System

班圖自治政府促進法Bantu Self Government Act

棒哈立法大會 Bunga Legislation

保留福利設施隔離法

Reservation of Separate Amenities Act

保羅·馬哈巴內 Paul Mahabane

寶施（公訴人） Prosecutor Bosch

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

鮑勃·赫普爾 Bob Hepple

貝瑟爾 Bethal

貝專納人民黨 Bechuanaland People’s Party

本·馬拉賽拉 Ben Mahlasela

本·穆貝基拉 Ben Mbekela

本杰明·博格蘭德 Benjamin Pogrund

比爾·克林頓 Bill Clinton

比基沙 Bikitsha

比克法官 Justice Bekker

比勒陀利亞 Pretoria

比勒陀利亞備忘錄 Pretoria Minute

比利·奈爾 Billy Nair

畢曉 Bisho

波爾斯穆爾監獄 Pollsmoor prison

波特拉考·利寶羅 Potlako Leballo

伯塔·瑪裟巴 Bertha Mashaba

博茨瓦納 Botswana

博達豪爾 Beda Hall

博福特堡 Fort Beaufort

博克斯堡 Boksburg

博普塔茨瓦納 Bophuthatswana

博塔，P. W.　P. W. Botha

不道德行為法 Immorality Act

布克·華盛頓 Booker Washington

布拉姆·費希爾 Bram Fischer

布拉姆方丹 Braamfontein

布蘭德準尉 Warrant Officer Brand

布隆方丹非洲人國民大會Bloemfontein Conference

布魯諾·姆陀羅 Bruno Mtolo

布特萊齊 Mangosothu Buthelezi

C

采波·萊特拉卡 Tsepo Letlaka

晁塔·摩特拉醫生 Dr. Chota Motala

城市區域法 Urban Areas Act

茨瓦納人 Tswanas

D

達布拉曼茲 Dabulamanzi

達夫妮·杜穆里埃 Daphne du Maurier

達利班佳 Dalibunga

達利基里·曼德拉 Daligqili Mandela

達利旺伽（即K. D. 馬嘆茲瑪） Daliwonga

打敗丁岡紀念日 Dingane’s Day

大會聯盟 Congress Alliance

大赦國際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衛·阿斯特 David Astor

大衛·博帕佩 David Bopape

大衛·德維利爾斯 Dawie de Villiers

大西洋憲章 Atlantic Charter

大學教育擴展法Extens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ct

丹尼爾·馬倫 Daniel Malan

丹尼斯·布魯特斯 Dennis Brutus

丹尼斯·戈爾德伯 Dennis Goldberg

丹尼斯·希利 Denis Healey

旦·圖魯麥 Dan Tloome

道克尤·賽克斯瓦勒 Tokyo Sexwale

德·韋特·納爾 De Wet Nel

德·韋特法官 Judge de Wet

德比·辛格 Debi Singh

德拉米尼神甫 Father Dlamini

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執行委員會Transvaal Executive Committee

德蘭士瓦律師協會 Transvaal Law Society

德蘭士瓦印度青年大會 Transvaal Indian Youth Congress

德蘭士瓦印度人大會 Transvaal Indian Congress（TIC）

德斯蒙德·圖圖 Desmond Tutu

迪迪·庫瑪 Didid Xhoma

迪利扎·穆吉 Diliza Mji

東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運動組織Pan African Freedom Movement for East，Central，and Southern Africa

杜波伊斯 Du Bois

杜拉·奧馬爾 Dullah Omar

杜馬·諾克韋 Duma Nokwe

E

恩彩拉曼茲 Ntselamanzi

恩德貝勒人 Ndebeles

恩干蓋里茲韋國王 King Ngangelizwe

恩古奔庫卡國王 King Ngugengcuka

恩古尼人 Nguni people

恩卡貝尼·門耶 Nqabeni Menye

恩卡佩尼，J.　J. Nkampeni

恩凱達瑪 Nkedama

恩凱考·達林迪葉波 Nxeko Dalindyebo

恩科薩納·穆格基 Nkosana Mgxaji

恩科波 Engcobo

恩塔托·莫特拉納 Nthato Motlana

F

發展援助署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法達納 Fadana

法蒂瑪·彌爾 Fatima Mere

法里德·亞當姆斯 Farid Adams

法納加洛語 Fanagalo

凡爾賽和會 Versilles peace conference

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聯盟 anti-ANC alliance

反恐怖法 Terrorism Act

范·阿德上校 Colonel Van Aarde

范·赫爾頓 Van Heerden

范·尼克（公訴人） Prosecutor Van Niekerk

范·任斯博獄警 Warder Van Rensburg

范尼·范·德默韋 Fanie van dr Merwe

非歐洲人團結運動Non-European Unity Movement

非英格蘭（納爾遜·曼德拉養母，攝政王夫人）No-England

非洲礦工工會African Mine Workers Union（AMWU）

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非洲人民組織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APO）

非洲聲明 African Claims

非洲統一組織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菲利普·考薩納 Philip Kgosana

菲什·基茨英 Fish Keitsing

斐濟萊·巴姆 Fikile Bam

費雷德·卡恩森 Fred Carneson

費斯特爾（金礦老板） Festile

佛利獄警 Warder Fourie

佛羅倫斯·麥托米拉 Florence Matomela

弗拉格·博西亞羅 Flag Boshielo

弗蘭克·勒本特萊勒 Frank Lebentlele

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弗朗西斯·巴爾德 Frances Baard

弗雷達·萊弗森 Freda Levson

弗雷迪耶·恩基迪Freddie Ngidi

弗里茨·范·西特爾特 Fritz Van Sittert

弗農·貝瑞奇 Vernon Berrange

福特黑爾大學Fort Hare（University College）

G

高爾·瑞德貝 Gaur Radebe

高誥（馬布托太太）　Gogo（ Mrs. Mabutho）

戈佛雷·皮徹 Godfrey Pitje

戈佛雷·塞庫庫尼 Godfrey Sekhukhune

戈利克·穆貝基尼 Garlick Mbekeni

戈萬·姆貝基 Govan Mbeki

哥倫布·馬蒂奇澤拉 Columbus Madikizela

格達拉·穆帕卡尼斯瓦 Gadla Mphakanyiswa

格拉姆斯敦 Grahamstown

格雷特·維爾強 Gerrit Viljoen

格里菲思·穆森基 Griffiths Mxenge

格里克隊長 Captain Gericke

格林伍德·恩告提亞納 Greenwood Ngotyana

格特·西班德 Gert Sibande

格特魯德·恩特拉巴提 Gertrude Ntlabathi

隔離法 Ghetto Act

工商工人聯盟Industrial and Comercial Workers Union

公共安全法 Public Security Act

古德威爾·斯維里斯尼 Goodwill Zwelithini

國際紅十字會組織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國家安全管理系統N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國家安全局 Bureau of State Security（BOSS）

國家緊急狀態/緊急狀態令 State of Emergency/Emergency regulations

國民黨 National Party

國內安全法 Internal Security Act

H

哈比卜·布爾吉巴 Habib Bourguiba

哈拉雷宣言 Harare Declaration

哈里·格瓦拉 Harry Gwala

哈利斯，C.　C. Harris

哈羅德·漢森 Harold Hanson

哈羅德·麥克米倫 Harold Macmillan

哈羅德·沃爾佩 Harold Wolpe

海爾·塞拉西 Haile Selassie

海爾曼－邁克爾合伙律師事務所Helman and Michel law firm

海倫·蘇茲曼 Helen Suzman

海倫·約瑟夫 Helen Joseph

海彌·巴薩納 Hymie Basner

海彌·達維多夫 Hymie Davidoff

海寧 Hynning

漢斯·穆勒 Hans Muller

豪利沙沙（曼德拉的氏族名） Rolihlahla

合眾黨 United Party

和平主義 Pacifism

荷蘭歸正會 Dutch Reform Church

赫爾伯格中士 Sergeant Helberg

赫克托·彼得森 Hector Pieterson

赫尼·費里斯 Hennie Ferris

赫索格，J. B.　J. B. Hertzog

黑人大會組織 Black People Convention

黑人父母聯合會 Black Parents Association

黑人覺醒運動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BCM）

黑腰帶組織 Black Sash Group

黑茲爾·戈德里克 Hazel Goldreich

亨德里克·沃爾沃德 Hendrik Verwoerd

亨利·法茲 Henry Fazzie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華金·希薩諾 Joaquim Chissano

J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Seventh-Day Adventist

基卡雷卡蘭 Gcalekaland

吉克瓦 Giqwa

吉米·阿普里爾 Jimmy April

吉米·坎特 Jimmy Kantor

吉米·克魯格 Jimmy Kruger

加韋·馬克斯 Gawie Marx

佳巴福，D. D. T.　D. D. T. Jabavu

佳克·吐力 Jake Tuli

佳士提斯·達林迪葉波 Justice Dalindyebo

佳士提斯·潘扎 Justice Panza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人權獎Jawaharlal Nehru Human Rights Award

簡·范·里貝克 Jan van Riebeek

建設與發展綱領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杰夫·馬塞莫拉 Jeff Masemola

杰克·霍奇森 Jack Hodgson

杰里邁亞·莫爾森 Jeremiah Mollson

杰利曼 Jelliman

杰瑞·摩勞伊 Jerry Moloi

金礦協會 Chamber of Mines

津巴布韋非洲人民聯合會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津澤斯娃·曼德拉 Zindziswa Mandela

進步聯合黨 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

禁止通婚法Prohibition of Mixed Marriages Act

90日拘留法 Ninety-Day Detention Law

K

卡非爾（非洲黑人） Kaffir

卡林頓爵士 Lord Carrington

卡羅麗尼·莫佐萊迪 Caroline Motsoaledi

卡馬利爾·法巴薩 Gamaliel Vabaza

開普敦 Cape Town

凱普將軍 General Kemp

凱特索·戈德漢 Ketso Gordhan

凱西姆·帕特爾 Cassim Patel

堪格魯·冒托 Kangaroo Maoto

康古萊斯·穆巴塔 Congress Mbata

康斯坦·維爾強 Constand Viljoen

康斯坦茨·穆貝基尼 Canstance Mbekeni

抗議不公平法律運動 Campaign for the Defiance of Unjust Laws

考拉尼·克高勞考 Kolane Kgoloko

科薩 Xhosa

柯萊門茨·卡德利埃 Clements Kadalie

科比·庫依茨 Kobie Coetsee

科嘎瑪 Kgama

科克女士 Miss Koch

科雷塔·斯科特 Coretta Scott

科莫 Komo

克拉爾 kraal

克拉基伯雷寄宿學院

Clarkebury Boarding Institute

克拉倫斯·馬克韋圖 Clarence Makwetu

克萊夫·德比－劉易斯 Clive Derby-Lewis

克朗金礦 Crown Mines

克勒曼少校 Major Kellerman

克雷漢斯兄弟 Kleynhans brothers

克里斯·哈尼 Chris Hani

克里斯田·德·維特 Christiaan De Wet

克魯格中士 Sergeant Kruger

克羅伊斯 Croesus

克瓦麥·恩克魯瑪 Kwame Nkrumah

肯尼迪法官 Justice Kennedy

肯尼思·卡翁達 Kenneth Kaunda

庫克，A. J.　A. J. Cook

庫魯尼·木卡伊 Krune Mqhayi

庫瑪 Xhoma

庫努（村） Qunu

夸馬塔 Qamata

夸祖魯 Kwazulu

奎特·馬西雷 Quett Mashire

L

拉夫迪 Laveday

拉各斯獨立國家大會 Lagos Congference of Independent States

拉哈貝王朝 Rharhabe

拉魯·奇巴 Laloo Chiba

拉麥拉（間諜） Rammaila

拉默哈諾，C. S.　C. S. Ramohanoe

拉姆拉爾·布里亞 Ramlal Bhoolia

拉姆頗福，F. L.　F. L. Rumpff

拉澤·希代爾斯基 Lazar Sidelsky

萊昂內爾·波恩斯坦 Lionel Bernstein

萊克斯·塔塔尼 Rex Tatane

萊索托 Lesotho

萊瓦尼卡 Lewanika

萊衛·馬迪 Levi Madi

蘭道爾·皮特尼 Randall Peteni

蘭奈爾·馬喬寶茲 Lionel Majombozi

勞貝·雷布朗特 Robey Leibbrandt

勞吉·恩扎邁拉 Locke Ndzamela

勞斯伯瑞·鮑克韋 Roseberry Bokwe

雷·哈麥爾 Ray Harmel

雷基·賽普泰姆波 Reggie September

雷克斯·維爾什 Rex Welsh

雷蒙德·穆拉巴 Raymond Mhlaba

莉蓮·恩高義 Lilian Ngoyi

里昂·萊韋 Leon Levy

麗比葉·曼德拉 Leabie Mandela

麗波曼 Lieberman

利奧波德·桑戈爾 Leopold Senghor

利比里亞 Liberia

利沃尼亞立里斯里夫農場Rivonia Liliesleaf Farm

利沃尼亞審判 Rivonia Trial

聯合民主戰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UDF）

聯合民族獨立黨 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UNIP）

聯合猶太改革圣教United Jewish Reform Congregation

聯盟大會 All-in Conference

諒解備忘錄 Record of Understanding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林肯·木肯塔尼 Lincoln Mkentane

盧卡斯·曼高佩 Lucas Mangope

魯道夫法官 Judge Ludorf

魯思·弗斯特 Ruth First

魯思·蒙帕蒂 Ruth Mompati

路德宗傳教團Lutheran mission

羅貝·雷布朗特 Robey Leibbrandt

羅本島監獄 Robben Island prison

羅伯特·萊沙 Robert Resha

羅伯特·穆加貝 Robert Mugabe

羅伯特·索布克韋 Robert Sobukwe

羅得西亞 Rhodesia

羅德尼·邁克爾 Rodney Michel

羅德斯大學 Rhodes University

羅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

羅斯·穆達 Rose Mda

M

馬貝爾·曼德拉 Mabel Mandela

馬布托，J.　J. Mabutho

馬迪巴（曼德拉的氏族名） Madiba

馬迪巴·泰姆比基勒·曼德拉Madiba Thembekile Mandela

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馬爾科姆·弗雷澤 Malcolm Fraser

馬格納斯·馬倫 Magnus Malan

馬基德·莫佛　Mackeed Mofokeng

馬卡納 Makanna

馬卡托·萊瓦尼卡·曼德拉Makgatho Lewanika Mandela

馬卡紫薇·曼德拉 Makaziwe Mandela

馬科斯，J. B.　J. B. Marks

馬科斯·西蘇陸 Max Sisulu

馬克·穆瑯葉尼 Max Mlonyeni

馬克漢達 Makhand

馬庫斯·加維 Marcus Garvey

馬雷少校 Major Marais

馬麗·本森 Marry Benson

馬尼拉·甘地 Manilal Gandhi

馬薩巴萊拉·英瓦 Masabalala Yengwa

馬斯拉·帕澤 Masla Pather

馬嘆茲瑪，K. D.　K. D. Matanzima

馬替奧羅牧師 Reverend Matyolo

馬修斯，Z. K.　Z. K. Mathews

馬修斯·戈尼韋 Matthew Goniwe

瑪格麗特·撒切爾 Margaret Thatcher

瑪庫茨瓦娜·曼德拉 Makhutswana Mandela

瑪托娜 Mathona

邁克爾·哈邁爾 Michael Harmel

邁克爾·科貝特 Michael Corbett

邁克爾·斯克特 Michael Scott

麥克·丁加克 Mike Dingake

麥克·洛維 Mike Louw

麥克·馬哈拉基 Mac Maharaj

麥克唐納·馬賽庫 MacDonald Maseko

麥里塔法 Melithafa

曼彩博·摩什威士韋 Mantsebo Moshweshwe

曼德拉方案 Mandela Plan

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Mandela and Tambo law firm

芒羅準將 Brigadier Munro

貿易工會南非大會 South African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SACTU）

梅利格立酋長 Chief Meligqili

蒙齊瓦 Montshiwa

彌爾敦·瑪蓋 Milton Margai

秘密兄弟會 Broederbond

民主南非大會 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CODESA）

民主人士大會Congress of Democrats（COD）

民族長矛軍/民族之矛 Umhonto we Sizwe

民族青年團 League of Nations

民族意識團體 National Minded Bloc

敏納爾上校 Colonel Minnaar

摩洛哥 Morocco

摩舒舒 Moshoeshoe

摩西·考塔尼 Moses Kotane

摩西·馬布黑達 Moses Mabhida

摩西·穆拉 Mosie Moola

莫才泰，K. T.　K. T. Motsete

莫基提彌，S. S.　S. S. Mokitimi

莫拉維·凱查利亞 Maulvi Cachalia

莫萊特，Z. B.　Z. B. Molete

莫莉·費希爾 Molly Fischer

莫里斯·弗蘭克斯 Maurice Franks

莫羅卡，J. S.　J. S. Moroka

莫洛默曹·塞庫庫尼Moroamotsho Sekhukhune

姆孫古利·穆古達爾瓦 Msunguli Mgudlwa

姆衛佐 Mvezo

木丁基酋長 Mdingi Chief

木棼古人 Mfengu people

穆巴謝河 Mbashe River

穆丁佳尼 Mdingane

穆考瑪 Maqoma

穆克孜韋尼 Mqhekezweni

穆拉爾瓦·曼德拉 Mlahlwa Mandela

穆旁多比尼酋長 Chief Mpondombini

穆旁多人 Mpondo people

穆薩·迪納特 Moosa Dinath

穆斯塔法博士 Dr. Mustafa

N

內森·馬庫斯 Nathan Marcus

內維爾·亞歷山大 Neville Alexander

納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

納爾遜·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納納·西塔 Nana Sita

納稅人協會 Ratepayers Association

納塔爾 Natal

納塔爾南非印度人大會Natal Indian Congress

娜達伊瑪妮 Nodayimani

奈杜，G. R.　G. R. Naidoo

奈杜，M. D.　M. D. Naidoo

奈克，G. M.　G. M. Naicker

耐特·布瑞格曼 Net Bregman

南非白人/阿非利卡人 Afrikaner

南非白人抵抗運動右翼武裝力量Afrikaner Weerstandsbweging（AWB）

南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南非婦女聯合會 South African Women’s Federation（SAWF）

南非廣播公司 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SABC）

南非國防軍隊South African Defense Force（SADF）

南非荷蘭語 Afrikaans

南非貿易工會大會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COSATU）

南非衛理公會Methodist Church of South Africa

南非學生組織 South African Students’Organization（SASO）

南非印度人大會 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SAIC）

南非有色人組織 South African Coloured People’s Organization（SACPO）

尼爾·巴納德 Niel Barnard

尼古拉斯，G.　G. Nicholas

尼古拉斯·貝泰爾 Nicholas Bethell

尼古拉斯·戈德里克 Nicholas Goldreich

尼亞提·康基薩 Nyathi Khongisa

紐克萊爾 Newclare

諾瑪福·達林迪葉波 Nomafu Dalindyebo

諾瑪木旁多 nomaMpondo

諾曼·羅森伯 Norman Rosenberg

諾曼·賽伽帕尼 Norman Sekgapane

諾塞凱尼·范妮 Nosekeni Fanny

諾坦楚·曼德拉 Notancu Mandela

P

帕特里克·“泰勒”（恐怖）·勒寇塔Patrick “Terror” Lekota

帕特里克·馬庫貝勒 Patrick Maqubela

帕特里克·莫勞 Patrick Molaoa

潘金達沃 Bangindawo

叛國審判辯護基金會Treason Trial Defense Funds

旁多蘭/旁多人 Pondoland/Pondo people

佩迪（族） Pedi

皮克·博塔 Pik Botha

皮克雷·卡賽彌 Pixley ka Seme

皮利斯·馬賽庫 Phyllis Maseko

皮利索 Piliso

皮特·巴登霍斯特 Piet Badenhorst

皮特·貝萊威爾德 Piet Beyleveld

皮特·恩泰特 Peter Nthite

皮特·拉寶羅克 Peter Raboroko

皮特·摩洛茨 Peter Molotsi

皮特·穆達/A. P. 穆達 Peter Mda/A. P. Mda

皮特勒斯·莫萊福 Petrus Molife

貧民窟法 Ghetto Act

珀珀·莫萊斐 Popo Molefe

珀西·尤塔 Percy Yutar

破壞法 Sabotage Act

普雷特利葉斯中尉 Lieutenant Pretorius

普林斯陸上校 Colonel Prinsloo

普林斯中尉 Lieutenant Prins

普通法修正案 General Law Amendment

Q

喬·格里蒙德 Jo Grimond

喬·基卡比 Joe Gqabi

喬·馬修斯 Joe Matthews

喬·莫迪塞 Joe Modise

喬·斯洛沃 Joe Slovo

喬丹·恩古巴尼 Jordan Ngubane

喬爾·卡爾森 Joel Carlson

喬爾·喬菲 Joel Joffe

喬納斯·馬特羅 Jonas Matlou

喬舒亞·恩考茂 Joshua Nkomo

喬舒亞·馬庫伊 Joshua Makue

喬西亞·古彌德 Josiah Gumede

喬治·畢佐斯 George Bizos

喬治·馬嘆茲瑪 George Matanzima

喬治·穆貝基拉 George Mbekela

喬治·皮克 George Peake

喬治·舒爾茨 George Shultz

喬治高詩鎮 George Goch

青年團 Youth League

瓊斯牧師 Reverend Jones

丘脈河 Tyume River

全非大會 All-African Convention

全國和平條約 National Peace Accord

全國行動理事會 National Action Council

全國行動委員會 National Action Committee

全國志愿者委員會 National Volunteer Board

R

人口登記法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

人民大會 Congress of the People

人民公投 Votes for All

人民論壇 People’s Forums

容欣利茲韋·達林迪葉波Jongilizwe Dalindyebo

容欣塔巴·達林迪葉波Jongintaba Dalindyebo

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

S

薩巴塔·達林迪葉波 Sabata Dalindyebo

薩克韋，C. K.　C. K. Sakwe

薩雷爾·替基 Sarel Tighy

薩姆·馬賽 Sam Mase

薩特斯·庫珀 Saths Cooper

塞爾比·恩根達尼 Selby Ngendane

塞庫庫尼蘭 Sekhukhuneland

塞倫，M. E.　M. E. Theron

塞繆爾 ·木卡伊 Samuel Mqhayi

塞繆爾·達什 Samuel Dash

塞奇瓦約國王 King Cetywayo

塞索托語 Sesotho

塞西爾·羅德斯 Cecil Rhodes

塞西爾·威廉姆斯 Cecil Williams

賽法庫·馬寶高·馬卡托Sefako Mapogo Makgatho

賽羅佩·苔瑪 Selope Thema

賽皮瑞皮爾·馬如朋 Seperepere Marupeng

森恩先生（國際紅十字組織代表） Senn

沙卡 Shaka

沙佩維爾大屠殺 Sharpeville Massacre

山迪勒國王 King Sandile

山杠人 Shangaans

社團區域法 Group Areas Act

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釋放曼德拉運動 Free Mandela Campaign

司馬利·西萬德拉 Smallie Siwundla

司沃特準尉 Warrant Officer Swart

斯蒂芬·德福 Stephen Tefu

斯蒂夫·茨韋特 Steve Tshwete

斯彭格勒上校 Colonel Spengler

斯坦雷·羅蘭 Stanley Lollan

斯特恩上校/將軍 Colonel/General Styn

斯特勞斯，J. G. N.　J. G. N. Strauss

斯特里尼·穆德雷 Strini Moodley

斯瓦尼普爾中尉 Lieutenant Swanepoel

斯威士蘭 Swaziland

所羅門·恩古貝斯 Solomon Ngubase

索布胡薩國王 King Sobhuza

索菲亞頓 Sophiatown

索托人 Sotho people

索韋托（西南城鎮的縮寫）Soweto（South-Western Townships）

T

塔博·姆貝基 Thabo Mbeki

塔德賽上校 Colonel Tadesse

塔陶木庫魯 Tatomkhulu

塔亞納基·皮利太太 Thayanagee Pillay

泰姆布蘭/泰姆布人Thembuland/Thembu people

坦茨，N. B.　N. B. Tantsi

坦噶尼喀 Tanganyika

坦桑尼亞 Tanzania

唐·戴維斯 Don Davis

唐納森奧蘭多社團中心Donaldson Orlando Community Center

陶布盧克 Tobruk

特布蘭奇－布雷基施律師事務所Terblanche &amp; Briggish Law Firm

特布蘭奇中尉 Lieutenant Terblanche

特蘭斯凱 Transkei

特雷弗·曼紐爾 Trevor Manuel

特魯特準尉 Warrant Officer Truter

特瑞弗·赫德爾斯頓 Trevor Huddleston

特瑞格福辯護律師 Advocate Trengove

提亞拉哈 Tyhalarha

通行制度 Pass system

圖布姆茲王子 Prince Thumbumuzi

土地法 Land Act

土著人代表權利法Representation of Natives Act

土著人代表委員會Natives Representatives Council

土著人管理法 Native Administration Act

土著事務部門 Native Affairs Department

團結運動組織 Unity Movement

托馬斯·馬士法尼 Thomas Mashifane

托馬斯·提圖斯·恩考比Thomas Titus Nkobi

托尼·奧多德 Tony O’Dowd

W

瓦爾特·波拉克 Walter Pollak

瓦爾特·苔卡 Walter Teka

瓦爾特·西蘇陸 Walter Sisulu

瓦利·穆薩 Vallii Moosa

旺多尼·貝非卡杜 Wondoni Befikadu

威爾遜·康考 Wilson Conco

威利·麥瑞 Willie Maree

威廉 ·史密斯 William Smith

威廉·阿龍桑 William Aronsohn

威廉·恩考茂 William Nkomo

威廉·土布曼 William Tubman

威廉姆斯，W. H.　W. H. Willemse

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威特沃特斯蘭德土著勞工協會

Witwatersrand Native Labor Association

韋塞爾斯上校 Colonel Wessels

韋賽爾，F. C.　F. C. Wessel

韋斯雷旅社 Wesley House

維爾比拉伍德先生 Wellbeloved

維爾頓·穆夸毅 Wilton Mkwayi

維克多·穆珀博 Victor Mbobo

維克多·提亞姆扎西 Victor Tyamzashe

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 Victor Verster prison

維克多·西爾維斯特 Victor Sylvester

維特金－希代爾斯基－埃代爾曼律師公司Witkin, Sidelsky and Eidelman law firm

魏斯勒陽 Wesleyan

文達人 Vendas

溫妮·曼德拉 Winnie Mandela

溫妮婭 Winnie

溫斯頓·丘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沃爾菲·克代士 Wolfie Kodesh

沃爾斯特中士 Sargeant Vorster

烏拉行動 Operation Vula

烏姆塔塔 Umtata

烏蘇姆茲·梅克 Vusumuzi Make

烏伊西勒·米尼 Vuyisile Mini

X

西德尼·恩克蘇 Sidney Nxu

西德尼·肯特利奇 Sydney Kentridge

西里爾·拉馬弗薩 Cyril Ramaphosa

西蒙·卡普韋普韋 Simon Kapwepwe

西蒙·薩巴拉拉 Simon Tshabalala

西南非人民組織 South-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

西蘇陸太太（瓦爾特·西蘇陸的母親）MaSisulu

希爾德頓 Healdtown

消極抵抗 passive resistance

小利沃尼亞審判 Little Rivonia Trial

謝里爾·卡羅勒斯 Cheryl Carolus

辛格，J. N.　J. N. Singh

辛沙 Hintsa

新時代 New Age

刑法修正案 Criminal Laws Amendment Act

行動計劃 Operation Mayibuye

休·蓋茨凱爾 Hugh Gaitskell

休斯牧師 Father Hughes

選民分離代表法Separate Representation of Voters Act

學生基督教協會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

雅各布斯上校 Colonel Jacobs

亞的斯亞貝巴 Addis Ababa

亞歷克斯·道格拉斯－霍姆Alex Dougglas-Home

亞歷克斯·赫普爾 Alex Hepple

亞歷山大·克爾 Alexander Kerr

亞歷山大鎮 Alexandra Township

亞洲人土地占有權利法Asiatic Land Tenure Act

揚·史末資 Jan Smuts

耶和華見證人教會 Jehovah’s Witnesses

葉甫（埃塞俄比亞外交部長） Yefu

伊恩·史密斯 Ian Smith

伊夸狄 Iqadi

伊萊亞斯·莫佐萊迪 Elias Motsoaledi

伊麗莎白港 Port Elizabeth

伊薩克·本蒂 Isaac Behndy

伊斯雷爾·梅賽爾斯 Israel Maisels

伊斯梅爾·阿堯博 Ismail Ayob

伊斯梅爾·彌爾 Ismail Meer

醫生公約 Doctors’　　Pact

因卡塔自由黨 Inkatha Freedom Party

英格考勃 Engcobo

游擊戰俱樂部 Yu Chi Chan Club

有色人 Coloureds

有色人人民大會 Coloured People’s Congress

玉蘇福·達杜 Yusuf Dadoo

玉蘇福·凱查利亞 Yusuf Cachalia

約翰·波凱拉 John Pokela

約翰·杜比 John Dube

約翰·基茨韋 John Gaetsewe

約翰·威爾克斯·布斯 John Wilkes Booth

約翰·沃斯特（B. J.沃斯特） John Vorster

約翰內斯堡福特監獄Johannesburg Fort prison

約翰尼斯·摩洛茨 Johnnes Molotsi

約翰森·恩格衛韋拉 Johnson Ngwevela

約韋里·穆塞韋尼 Yoweri Museveni

Z

澤法尼·馬托朋 Zephania Mothopeng

澤盧斯特 Zeerust

澤尼·圖布姆茲·曼德拉（曼德拉的小女兒）Zaziwe Thumbumuzi Mandela

扎查里亞·莫萊泰 Zachariah Molete

扎丘斯·馬哈巴內 Zaccheus Mahabane

詹姆斯·恩章韋 James Njongwe

詹姆斯·格雷戈里 James Gregory

詹姆斯·卡萊塔 James Calata

鎮壓共產主義條例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

志愿者日 Day of Volunteers

種族隔離法 Color Bar Act

朱利斯·布朗德 Jules Browde

朱利葉斯·尼雷爾 Julius Nverere

孜林德勞佛酋長 Chief Zilindlovu

茲韋立班紀利·兆伊 Zwelibhangile Joyi

自由黨 Liberal Party

自由日大罷工 Freedom Day Strike

自由憲章 Freedom Charter

自由陣線 Freedom Front

祖備達·帕特爾 Zubeida Patel

祖魯蘭/祖魯人 Zululand/Zulu people

# ［納爾遜·曼德拉年表］

1918年7月18日：納爾遜·曼德拉出生在特蘭斯凱首府烏姆塔塔附近的姆衛佐村。

1923年：南非土著人國民大會（1912年成立）正式改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

1927年：曼德拉9歲，父親逝世前把他托付給泰姆布部落攝政王容欣塔巴收養。

1928年：曼德拉到克拉基伯雷寄宿學校讀書。

1937年：曼德拉到希爾德頓省博福特堡的魏斯勒陽學院學習。

1938年：曼德拉開始在福特黑爾大學讀書，在此期間與奧利佛·塔博等人結識。

1940年：曼德拉因參與學生罷課被校方暫令退學，回到家鄉后，又因不滿容欣塔巴為他操辦的婚事而出走。

1941年：曼德拉到約翰內斯堡，先是在克朗金礦當保安，后搬到亞歷山大鎮，并結識了瓦爾特·西蘇陸。

1942——1947年：在維特金－希代爾斯基－埃代爾曼律師事務所工作。

1942年：曼德拉通過函授獲得福特黑爾大學的文科學士學位。隨后，靠貸款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攻讀法律。

1943年：亞歷山大黑人居住區的非洲人為抗議車票漲價，舉行了為期9天的抵制公共汽車運動。曼德拉參與了這次運動。

1944年：曼德拉結識了當護士的艾韋琳，不久即結婚。 同年參加非洲人國民大會，并參與組建主張改革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

1946年8月：德蘭士瓦金礦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遭到政府武裝鎮壓。

1948年：曼德拉當選為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全國書記。同年，國民黨競選獲勝，馬倫政府上臺，開始全面推行種族隔離制度。

1949年12月：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團推舉詹姆斯·莫羅卡為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候選人，他擊敗埃克蘇瑪當選為主席，瓦爾特·西蘇陸當選為秘書長，曼德拉與塔博進入非國大全國執委會并通過“行動綱領”。

1950年：馬倫政府通過《人口登記法》和《社會區域法》，使種族隔離制度進一步系統化。

1950年5月1日：非洲人國民大會、印度人大會、南非共產黨組織罷工集會，遭馬倫政府鎮壓，18名非洲人被殺，30多人受傷。

1950年6月20日：面對即將于7月生效的《鎮壓共產主義條例》的威脅，南非共產黨宣布自行解散。

1950年6月26日：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印度人大會聯合組織全國性大罷工，曼德拉負責兩個組織間的協調工作。

1950年底：曼德拉當選非國大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非國大青年團全國主席。

1951年：馬倫政府頒布《班圖權利法》。

1951年12月：曼德拉和西蘇陸將“行動綱領”的具體計劃提交非國大年度大會，建議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慶祝統治300周年時舉行群眾抗議活動。

1952年4月6日：在兩次致函馬倫總理均未得到合理答復后，非國大決定在全國舉行抵制不公正法律的群眾大會，曼德拉當選為反抗運動全國志愿者總指揮。

1952年6月26日：1950年全國大罷工紀念日，反抗運動正式開始。當天深夜，曼德拉散會后因宵禁時間在外行走而遭到逮捕。這是他第一次進監獄，但很快被釋放。

1952年7月30日：警察在全國范圍內襲擊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印度人大會的16處工作站。兩個星期后，逮捕了反抗運動的20位領導人，其中包括納爾遜·曼德拉。他們后來被判9個月監禁，緩期兩年執行。

1952年10月：曼德拉當選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德蘭士瓦省主席。

1952年12月：非洲人國民大會全體會議選舉阿爾伯特·魯圖利為主席，選舉納爾遜·曼德拉為副主席。曼德拉在取得律師合格證書后，與奧利佛·塔博合辦律師事務所，并受非國大委托制訂了“曼氏計劃”。

1953年：馬倫政府頒布《班圖教育法》，曼德拉提出建立社區學校以進行抵制。

1954年：德蘭士瓦法律協會請求最高法院取消曼德拉的律師資格，理由是他在反抗不公正法律運動中所起的領導作用，但這一請求被最高法院駁回。在“曼氏計劃”獲得通過后，曼德拉著手落實組織機構的改革工作，并全力準備召開南非人民代表大會。

1955年6月26日：南非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著名的《自由憲章》。

1955年9月27日：警察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規模搜捕活動，至少有500人在辦公室或家里遭到搜身。

1955年底：對曼德拉的管制禁令到期；隨后，警察又對他宣布了為期5年的禁令。同年，與艾韋琳的婚姻關系破裂，3個孩子隨母親生活。

1956年12月5日：1000多名警察同時出動，在全國范圍內對黑人解放運動積極分子進行搜捕，曼德拉與其他非國大領導人被捕。被捕的156人被控犯有叛國罪。

1957年12月：大法官放棄起訴叛國案中的61名被告，其中包括魯圖利酋長、奧利佛·塔博等。

1958年：曼德拉與溫妮相識。

1958年6月14日：處于管制禁令之下的曼德拉爭取到6天婚期，在溫妮的家鄉比薩納舉行婚禮。

1958年8月：叛國案的正式審判開始。

1958年底：溫妮·曼德拉因參加反通行證法游行而遭到逮捕，當時她已有身孕，出獄后不久生下澤尼。

1959年1月19日：法庭又宣布撤銷對64名被告的指控。這樣，156名被告僅剩下31人受審，曼德拉仍在其中。

1959年4月6日：非國大中的非洲主義派和自由憲章派正式分裂。在羅伯特·索布克韋領導下，非洲主義派正式宣布成立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

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證運動游行開始。沙佩維爾慘案發生，警察向示威群眾開槍，打死69人，傷180人。隨后，警察在蘭伽地區又殺害了6名示威者。

1960年3月30日：政府宣布實行緊急狀態法。

1960年4月8日：南非議會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宣布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泛非主義者大會兩個組織為非法。

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緊急狀態，釋放被捕者。

1960年12月： 曼德拉與溫妮的第二個女兒出生，取名津澤。

1961年3月29日：法庭對叛國案作最后宣判：所有被告無罪。隨后不久，曼德拉開始轉入地下活動。

1961年5月29日：曼德拉號召全國舉行為期三天的罷工，但因為組織不得力，曼德拉于第二天即宣布停止罷工。

1961年6月26日：反抗運動9周年紀念日。轉入地下的曼德拉向南非人民發表長篇聲明。

1961年12月：曼德拉創立“民族長矛軍”。

1961年12月16日：“民族長矛軍”發起第一次軍事行動。

1962年7月20日：曼德拉在出席“東非、中非和南部非洲泛非自由運動大會”、訪問非洲15國以及倫敦后，潛回南非。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在從德班返回約翰內斯堡途中被捕。

1962年10月25日：曼德拉被指控犯有煽動罷工罪和無護照出國罪。

1962年11月7日：曼德拉被判處5年監禁。

1963年7月11日：非國大“民族長矛軍”司令部被查獲，一些非國大的主要領導人被捕，其中包括西蘇陸等人。警方發現曼德拉參與了“民族長矛軍”的組織工作，將他從羅本島轉到比勒陀利亞監獄。

1963年10月9日：震驚世界的利沃尼亞審判開庭。由于起訴書不準確，法官不得不撤銷起訴。

1963年12月3日：利沃尼亞審判重新開庭。

1964年4月20日：法庭辯論開始，曼德拉利用提供供詞的機會宣讀了著名的“法庭宣言”。

1964年6月11日：法庭裁定，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條罪行。9名被告中，有8名被判有罪。

1964年6月12日：法官宣布判處曼德拉等8名被告終身監禁。

1965年：溫妮·曼德拉受到5年管制禁令的處罰。

1967年6月21日：《恐怖主義法》正式生效。

1969年5月21日：溫妮被捕。

1970年2月16日：溫妮與其他被告全部獲釋。

1976年6月16日：索韋托學生舉行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野蠻鎮壓，導致了持續多年的索韋托暴動。

1976年8月：溫妮再次被捕，后不久在判決中勝訴并獲釋。曼德拉代表羅本島的政治犯起草了一份聲明，支持學生的抗議運動，譴責南非當局的鎮壓暴行。

1976年10月26日：特蘭斯凱黑人家園宣布“獨立”。

1977年5月16日：溫妮又一次被捕，次日被流放到奧蘭治自由邦布蘭德福特鎮。

1979年：津澤離開了母親溫妮去讀書。

1980年：非國大宣布當年為“行動年”。“釋放曼德拉”的群眾運動從南非國內蔓延到國外。

1981年3月：曼德拉被提名為倫敦大學名譽校長候選人，得票達7199張。

1982年4月1日：曼德拉與西蘇陸等人從羅本島監獄被秘密轉移到開普敦的波爾斯穆爾監獄。

1983年：博塔正式提出“三院制議會”方案。

1983年8月：南非聯合民主戰線成立。

1984年5月：監獄當局通知曼德拉夫人可以開始“接觸性探視”。

1984年9月：法爾三角地區的黑人城鎮發生暴亂，并迅速蔓延到全國。

1985年初：南非當局允許英國保守黨人貝泰爾勛爵和美國喬治敦大學法律系教授達什訪問曼德拉。

1985年6月：非國大在贊比亞舉行協商會議，專門討論政策問題。

1985年7月13日：南非政府宣布實行緊急狀態。

1986年起：以南非政府司法部長庫依茨西為首的4名部長開始與獄中的曼德拉舉行談判。

1986年9月16日：歐洲共同體宣布對南非實行經濟制裁。

1986年10月2日：美國參議院投票贊成對南非實行經濟制裁。

1987年11月5日：利沃尼亞叛國案中年齡最大的姆貝基被釋放。獲釋前，他在波爾斯穆爾監獄會見了曼德拉。

1988年2月24日：南非政府禁止聯合民主戰線和17名其他黑人反對派組織參與政治活動。

1988年8月：曼德拉因肺病住院治療。4個月后，他又被轉移到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

1988年12月28日：溫妮領導的“曼德拉聯合足球俱樂部”將4名黑人青年綁架到溫妮的住宅。

1989年1月27日：索韋托社區領袖要求溫妮解散她的足球俱樂部，被溫妮拒絕。

1989年2月2日：博塔因病辭去國民黨領袖職務，德克勒克當選為新主席。

1989年7月5日：南非總統邀請曼德拉到官邸“用茶”。獄中的曼德拉接受了邀請，并向博塔遞交了一份聲明。

1989年8月14日：博塔辭去總統職務，由德克勒克繼任。

1989年8月21日：《哈拉雷宣言》獲得通過，提出南非談判七點方針。

1989年9月20日：國民黨在大選中獲勝，德克勒克正式宣誓就任南非總統。

1989年10月11日：德克勒克總統會見一批黑人宗教領袖，其中包括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

1989年10月15日：包括西蘇陸在內的8名黑人領袖被南非政府無條件釋放。

1989年11月23日：曼德拉在獄中與姆貝基長談3個小時，討論西蘇陸等人訪問盧薩卡非國大總部一事。

1989年12月13日：德克勒克在總統官邸會見曼德拉。

1990年1月25日：開普敦左派周報《南方》全文發表了曼德拉在會見博塔時遞交的5000字聲明。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議會宣布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對非國大、泛非大和南非共產黨的取締令。

1990年2月11日：南非當局無條件釋放曼德拉。當晚，曼德拉在開普敦市政大廈廣場發表演說。第二天，他在開普敦舉行了出獄后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2月13日，他回到索韋托家中。

1990年2月25日：曼德拉到黑人暴力沖突最嚴重的德班訪問，呼吁加強團結，實現和平。

1990年2月27日：曼德拉率非國大國內代表團到贊比亞盧薩卡的非國大總部參加非國大全國執委會議。

1990年3月2日：曼德拉當選為非國大副主席。

1990年5月2——4日：以曼德拉為首的非國大代表團和以德克勒克為首的政府代表團舉行首次會談。

1990年5月：曼德拉訪問非洲6國。

1990年6月4日：曼德拉出訪非洲、歐洲和美洲14國。

1990年7月25日：南非警方制造“紅色陰謀”事件，逮捕了40多名非國大成員和南非共產黨員。

1990年7月26日：曼德拉與德克勒克舉行緊急會晤。

1990年8月6日：非國大與政府的第二次會談如期舉行。

1990年底：非國大與政府談判又一次陷入僵局。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先后兩次會晤，使氣氛得到緩和。

1991年6月30日：種族隔離制正式宣告結束。

1991年7月2——7日：曼德拉當選為非國大主席。

1991年12月20——21日：舉行關于制定新憲法的談判。

1992年3月17日：白人公民投票結果表明，大部分人對德克勒克總統的改革持贊成態度。

1992年6月17——18日：發生博伊帕通大屠殺。

1992年11月26日：德克勒克提出時間表，最遲在1994年4月底以前舉行多種族選舉。

1993年4月1日：在中斷9個多月后，恢復制憲談判。

1993年6月3日：談判會議確定1994年4月27日為選舉日。

1993年9月8日：曼德拉呼吁取消對南非的所有經濟制裁。

1993年10月15日：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993年11月14日：曼德拉表示，非國大承諾次年組成的民族團結政府將包括當時的白人總統德克勒克。

1993年11月16日：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就制憲談判關鍵問題再次舉行會談，并取得進展。

1993年12月7日：過渡行政委員會正式成立，從而使黑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國家事務上有發言權。

1993年12月10日：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在奧斯陸接受諾貝爾和平獎。

1993年12月22日：南非白人議會通過了南非歷史上第一部非種族主義的臨時憲法。該臨時憲法被用來指導南非民主進程，直至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1994年2月：曼德拉作出重大讓步，表示非國大同意起草有關建立一個白人家園的憲法草案。

1994年4月8日：德克勒克總統、非國大主席曼德拉、因卡塔領袖布特萊齊和祖魯國王古德威爾·斯維里斯尼舉行四方首腦會談，談判解決威脅選舉的暴力行為。隨后，非國大發表聲明，承認斯維里斯尼為夸祖魯－納塔爾省的合法君主。

1994年4月19日：布特萊齊正式宣布參加南非首次大選。

1994年4月26——28日：南非舉行第一次多種族大選，非國大取得決定性勝利。

1994年5月9日：多種族議會正式開幕，納爾遜·曼德拉當選為新政府總統。

1994年5月10日：納爾遜·曼德拉宣誓就職總統。翌日，南非新內閣宣誓就職。

1998年7月18日：曼德拉80歲生日，與第三任妻子格拉薩結婚。

1999年6月：曼德拉卸任總統。后大力興辦學校，并為南非防治艾滋病投入大量心力。

2004年：南非廣播公司舉辦“最偉大的南非人”票選活動，曼德拉被選為“最偉大的南非人”。

2013年6月8日：曼德拉因肺部感染病情惡化，緊急入院救治。后病情緩慢好轉。

2013年7月18日：曼德拉在病床上度過95歲生日。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住所逝世。

# image00419.jpeg

LONG WALK TO FREEDOM

by Nelson Mandela

Copyright © 1994, 1995 by 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登記圖字：20-2010-224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漫漫自由路 : 曼德拉自傳 / (南非) 曼德拉著 ; 譚振學譯. —3版.—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9（2015.2 重印）

ISBN 978-7-5495-5490-4

Ⅰ. ①漫… Ⅱ. ①曼… ②譚… Ⅲ. ①曼德拉，N.（1918～2013）－自傳Ⅳ. ①K834.787=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17429號

本書中部分圖片由CFP提供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桂林市中華路22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發行熱線：010-64284815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臨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華路　郵政編碼：276017

開本：965mm×635mm 1/16

印張：42　插頁：16　字數：625千字　圖片：30幅

2014年9月第3版 2015年2月第3次印刷

定價：98.00元（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系調換。